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边臣与疆吏



法国汉学 第十二辑

中华书局

法国汉学 第十二辑

边臣与疆吏

Les fonctionnaires des frontières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柯兰 谷岚 李国强 主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臣与疆吏/《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2
(法国汉学; 第12辑)
ISBN 978-7-101-05906-9

I. 法… II. 法… III. ①汉学-研究-法国-文集②边疆地区-地方史-中国-文集 IV. K207.8-53 K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7953 号

书 名	边臣与疆吏
丛 书 名	法国汉学(第十二辑)
编 者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7 插页 4 字数 45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906-9
定 价	58.00 元

《法国汉学》第十二辑 《边臣与疆吏》编辑委员会名单

编委: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法国远东学院)

廖育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李学勤(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李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柯 兰(Paola Calanca,法国远东学院)

谷 岚(Fabienne Jagou,法国远东学院)

吕 敏(Marianne Bujard,法国远东学院)

马 克(Marc Kalinowski,法国远东学院)

吴 旻(法国远东学院)

李 零(北京大学)

邓文宽(中国文物研究所)

柴剑虹(中华书局)

端木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韩 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刘国忠(清华大学)

李晨光(中华书局)

孙文颖(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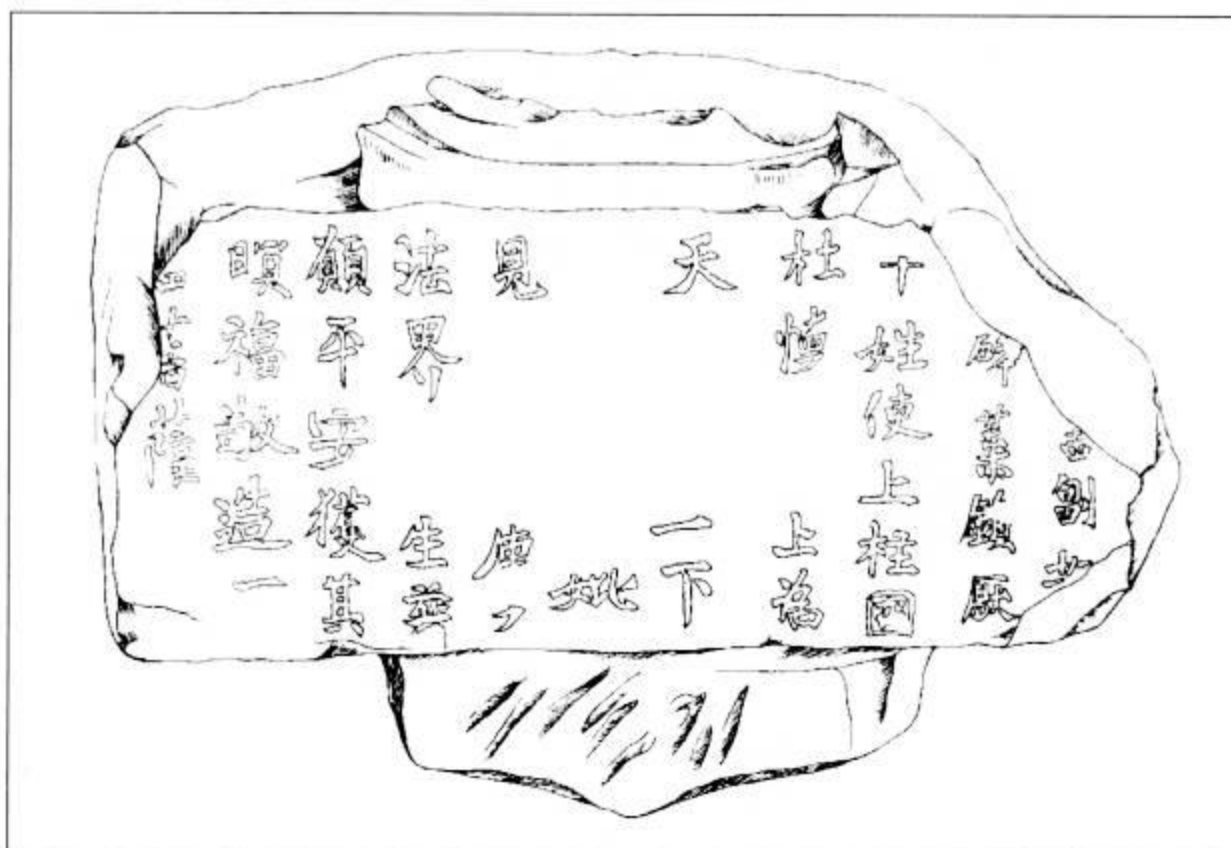


图1 杜怀宝造像题铭摹本（丁志勇摹）
（周伟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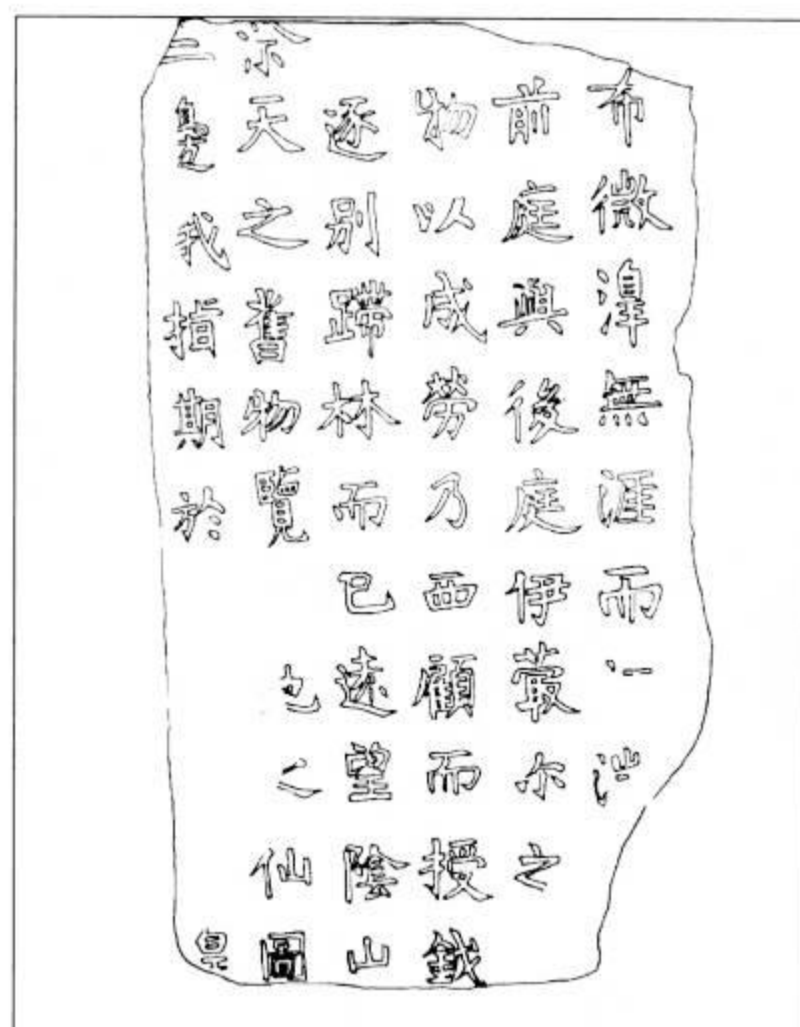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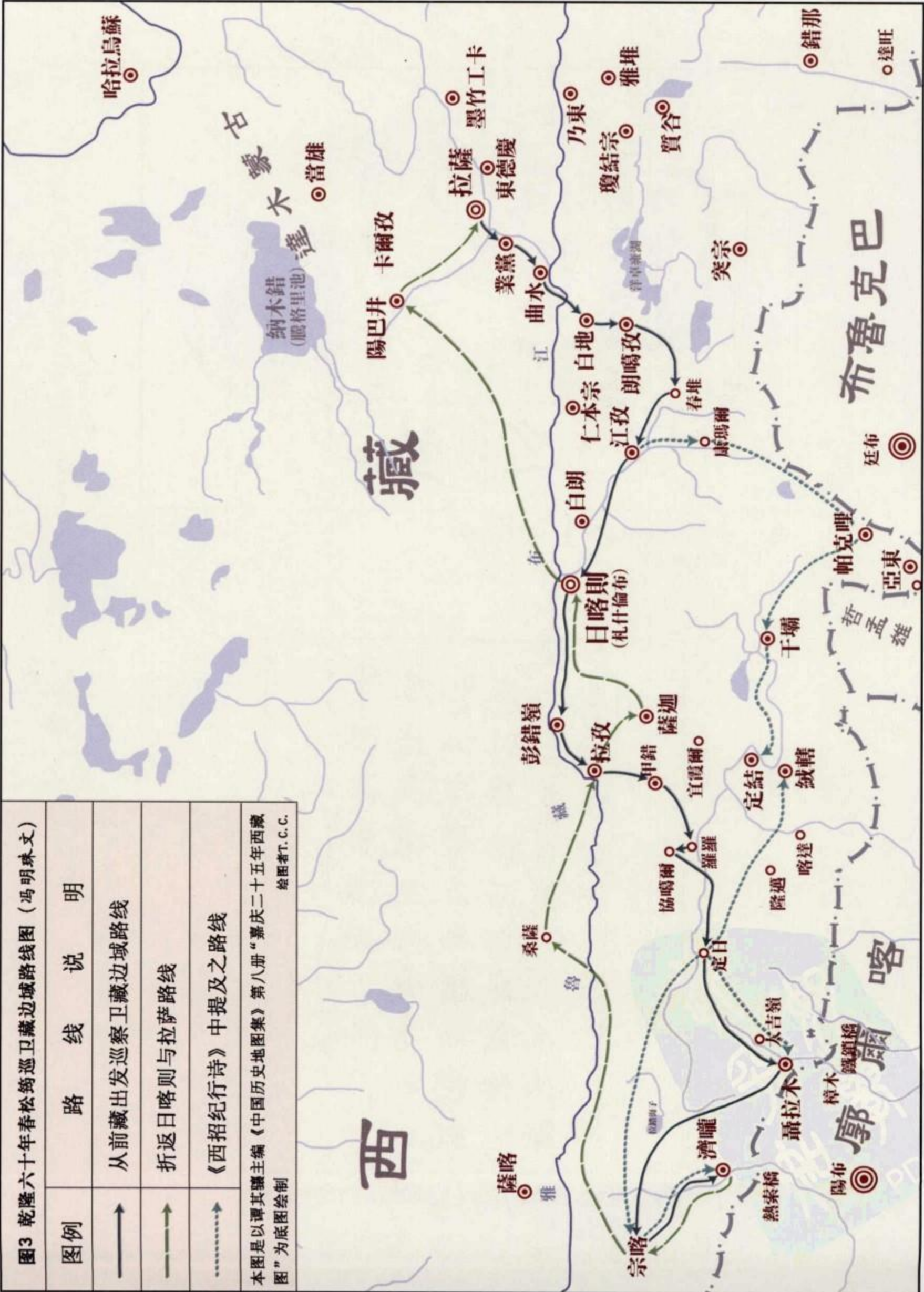
图2 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残碑摹本（丁志勇摹）
（周伟洲文）

图3 乾隆六十年春松筠巡卫藏边域路线图（冯明珠文）

图例	路线说明
→	从前藏出发巡察卫藏边域路线
→	折返日喀则与拉萨路线
→	《西招纪行诗》中提及之路线

本图是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嘉庆二十五年西藏图”为底图绘制

绘图者T.C.C.



图例 路线说明

从前藏出发巡察卫藏边域路线

折返日喀则与拉萨路线

本图是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嘉庆二十五年西藏图”为底图绘制

图”为底图绘制

绘图者T. C.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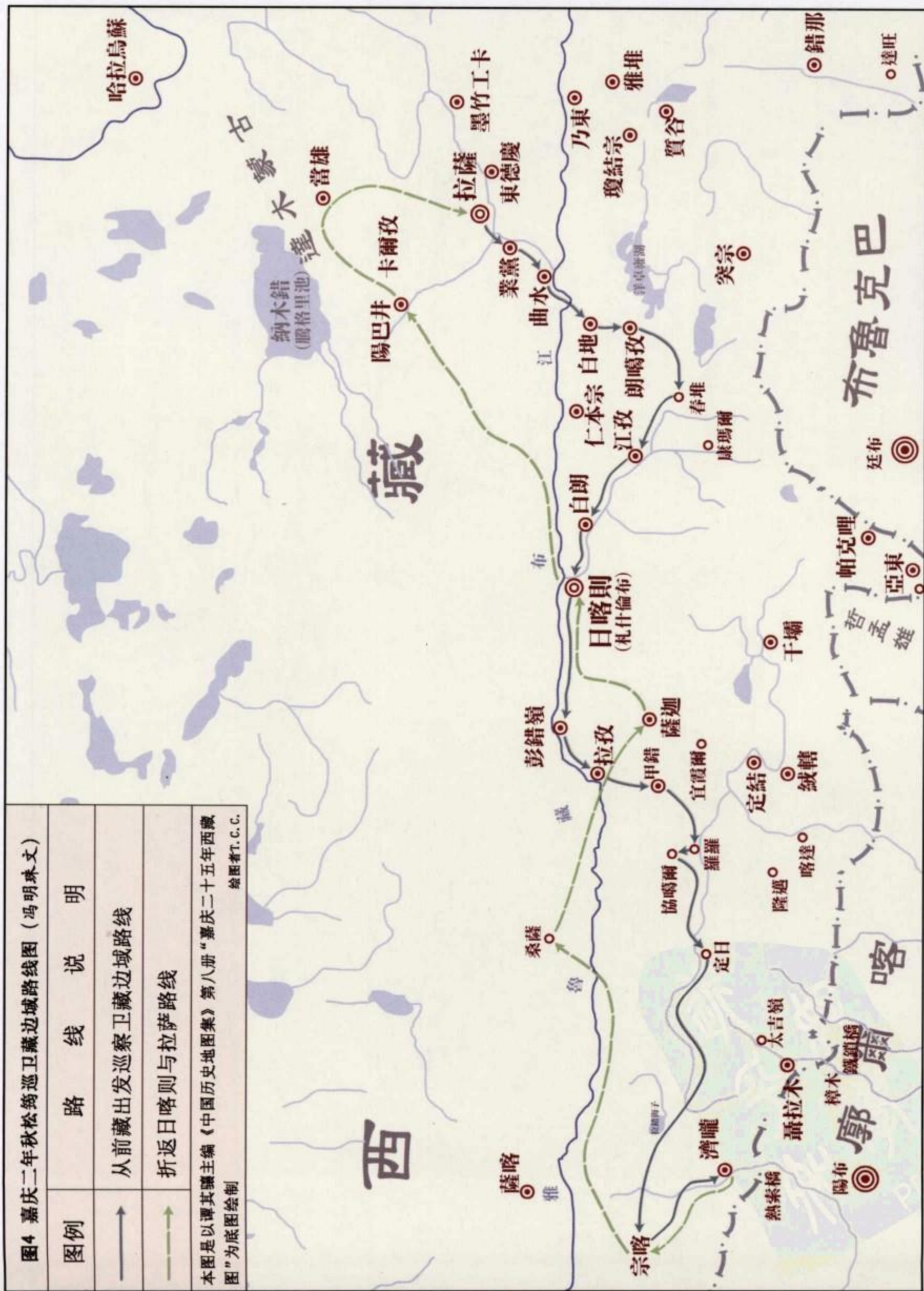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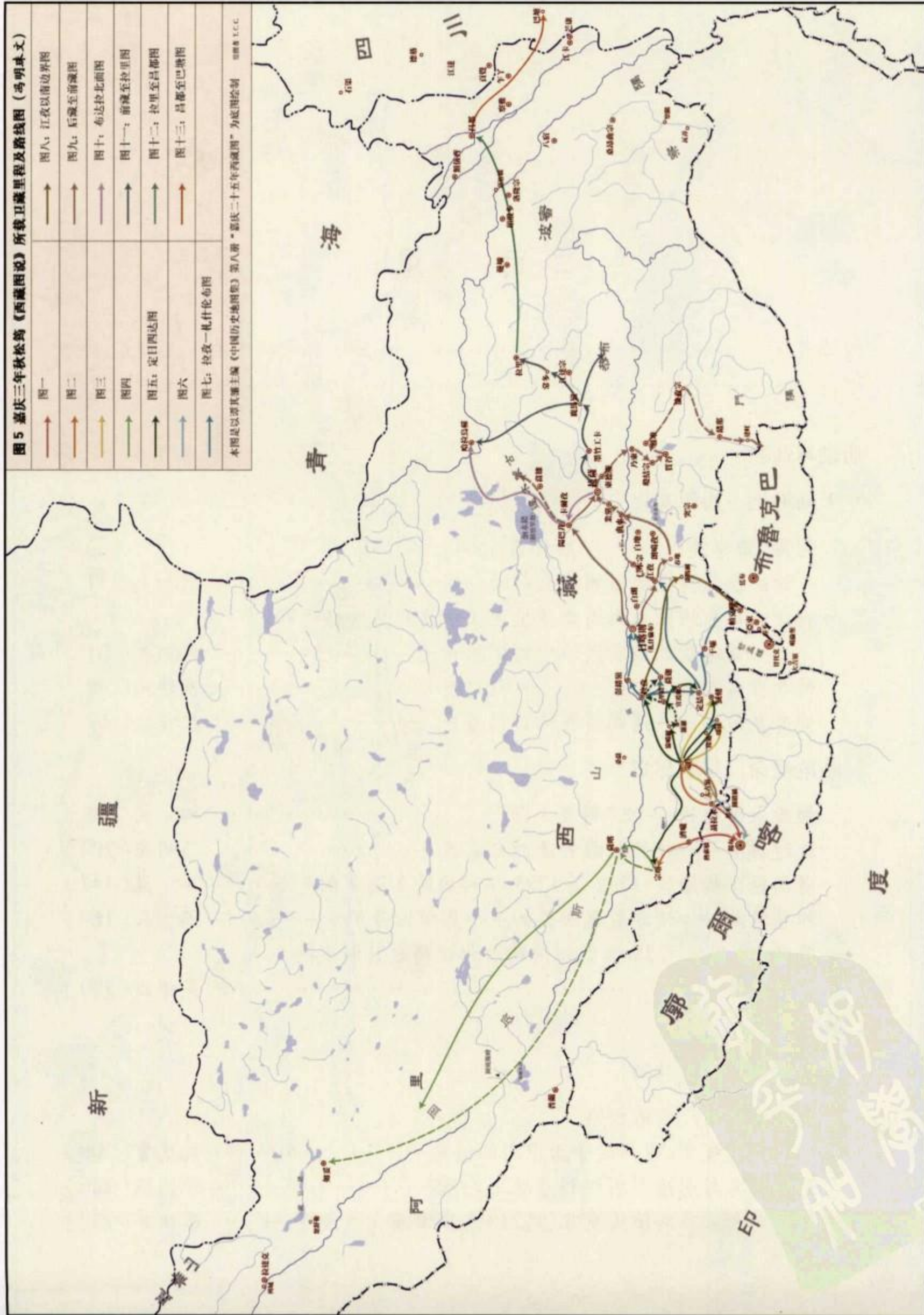


图5 嘉庆三年秋松筠《西藏图说》所载卫藏里程及路线图（冯明珠文）

图一	图八：江孜以南边界图
图二	图九：后藏至前藏图
图三	图十：布达拉北面图
图四	图十一：前藏至拉里图
图五：定日四达图	图十二：拉里至昌都图
图六	图十三：昌都至巴塘图
图七：拉孜—札什伦布寺图	

本图是以冯其庸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嘉庆二十五年西藏图”为底图绘制 制图者王仁仁



目 录

致读者 柯兰 谷岚(1)

序言 马大正(5)

功勋与仕途

天高地远 边臣疆吏

何得“边事捷报”? ——唐代西北 648、655、657 年

诸战役指挥官的军事文化行动 斯加夫(11)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两件汉文碑铭考释

——兼论唐朝经营西域中疆臣的作用 周伟洲(31)

明朝官员与西北中国 罗萨比(43)

天高皇帝远——清朝西陲的边臣疆吏 庄吉发(62)

临危受命 尽职尽责

福建水师将领:一支“精英之师”? 柯 兰(86)

走过留痕——松筠驻藏的政绩与著述 冯明珠(102)

满洲将军福康安:1792 至 1793 年西藏政务改革的先驱 谷 岚(147)

和琳驻藏——清朝驻藏大臣的一个典型性分析 张 云(168)

羁縻:18 世纪至 19 世纪初清朝西北边疆政策制定的

动态性 吴劳丽(190)

乡谊姻亲 同衷共济

北宋晚期对广西的经略

——以程节、程邻父子为中心的讨论 黄宽重(208)

论郑芝龙与明清王朝权利互动之关系 李国强(226)

从朱一贵起事的镇压事宜(1721)来看漳浦人之网络 苏尔梦(237)

朝廷与边疆

且战且和 有礼有兵

- 从南诏与唐朝之关系看唐朝治边及其边疆官吏 方 铁(255)
- 清代边臣明谊与中俄勘定西北边界交涉 陈维新(285)
- 晚清康区甘孜地方势力与改土归流 王秀玉(314)

同族异族 治边治心

- 和林元碑与岭北官员管窥 洪金富(324)
- 试论元朝对岭北行省的统治政策 赵 琦(352)
- 晚明福建财政与福建结束对台湾问题的处理 徐晓望(370)
- 赛因诺颜部族与清朝
——兼论清朝的北方民族政策 王希隆(382)

结语 李国强(418)

附录 作者、译者的联系方式..... (421)

Paola Calanca, Fabienne Jagou, *Notes aux lecteurs*

Ma Dazheng, *Avant-propos*

Formations et carrières : un tour d'horizon

Des tendances

Jonathan Skaff, *Victoire aux frontières. Une comparaison des commandants des campagnes du Nord-Ouest de 648, 655 et 657.*

Zhou Weizhou, *Le rôle des fonctionnaires dans l'entreprise frontalière du Nord-Ouest à l'époque Tang, vu à travers deux stèles en chinois découvertes à At-Beshim.*

Morris Rossabi, *Les fonctionnaires Ming dans le Nord-Ouest de la Chine.*

Chuang Chi-fa, *Loin du pouvoir central : les fonctionnaires des frontières nord-ouest à l'époque Qing.*

Les hommes des situations

Paola Calanca, *Les officiers navals du Fujian, un «corps d'élite»?*

Fung Ming-chu, *Song Yun et son «Xizang tushuo».*

Fabienne Jagou, *Fuk'anggan : un général mandchou à l'origine de la réforme administrative tibétaine de 1792—1793.*

Zhang Yun, *Helin, un haut commissaire impérial au Tibet.*

Laura Newby, *La dynamique de la politique Qing sur la frontière nord-ouest (18^e-début 19^e siècle).*

Les hommes de réseau

Huang Kuan-chong, *Les commissaires militaires du Guangxi à la fin des Song du Sud. Chen Jie et son fils Chen Lin.*

Li Guoqiang, *Zheng Zhilong et les gouvernements Ming et Qing : des relations de pouvoir réciproques.*

Claudine Salmon, *Le réseau de Zhangpu vu à travers la répression de la rébellion de Zhu Yigui (1721).*

Centre et périphérie : les interactions

De l'usage de la guerre, de la paix et des convenances

Fang Tie, *Les fonctionnaires et les politiques frontalières des Tang à travers les relations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avec le royaume de Nanzhao.*

Chen Wei-hsin, *Mingyi et les négociations sino-russes autour de la rectification du tracé frontalier nord-ouest.*

Wang Xiuyu, *Pouvoirs locaux et régularisation administrative à Garze (Tibet oriental) à la fin des Qing.*

Spécialisation ethnique des tâches

Hung Chin-fu, *Les fonctionnaires mongols et chinois dans la province du Lingbei sous les Yuan.*

Zhao Qi, *La politique de la dynastie Yuan à l'égard de la province du Lingbei.*

Xu Xiaowang, *Le rôle des finances et des fonctionnaires du Fujian dans la résolution de la question de Taiwan à la fin des Ming.*

Wang Xilong, *La politique ethnique sur la frontière septentrionale à travers les relations du gouvernement Qing et du clan mongol des Sayin Noyan.*

致 读 者

本辑《法国汉学》辑录了部分学者在“中国历代边臣疆吏”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简介附后)。研讨会于2006年10月2日至4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行,由法国远东学院(驻北京、台北中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北京)协办。会议得到了法国远东学院、“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中国台湾)、法国在台协会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赞助。

研讨会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其主题突出,还表现在它聚集了来自不同文化地域的研究专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跳出其研究的地理区域来进行比较切磋和分析研究成果的难得机会。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前所长黄宽重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教授,他们对研讨会的组织工作和成功举办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次研讨会聚集了来自不同国家一流研究机构的40多位专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也积极参与了研讨会的辩论,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收录本辑《法国汉学》的文章都请研究不同时期和地区的专家以及中外研究学院的研究员和教授审阅并写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对于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我们深表感谢。

柯兰 谷岚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台北中心

附：内容简介

本辑一共有 19 篇文章,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对应本次“中国历代边臣疆吏”研讨会的两个方向,即中国边疆官员的形成和仕途,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其中的焦点有中央政府为了管理这些地区而确立的职责、边境官员的性格、他们所拥有的资历。目的要了解是边境影响了官员的任命,还是这些管理者赋予边疆以特殊性。最终,我们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和被任命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发展,乃至国家的政治走向。此外,中央政府的代表,他们的行为和个性也影响了政策的制定,以及这些人对边境的认知程度。

本书研究涉及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从汉朝一直到清朝,研究的个案也各不相同,其重要原因在于不同地区归入中国的过程并不相同,也不呈线形发展。其类型是多样的,发展也是很曲折的:首先,有一些是无主之地;其次是边境地区或者缓冲地区;最后是一些界限明确的行政单位。因此,地区不同,其模式和所经历的时间也不同,并会导致一些特殊的政府机构的出现。根据遭遇的对手、所处的时代(包括内外局势)以及所派出的代表,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的占领或统治也会在时间和方式上发生变化。吴劳丽研究并指出了 19 世纪末中国对西北“新边疆”在认识和管理上的变化,在那个时期,一个更为行政化的体系缓慢地被确立起来,进而取代了之前扩张时期的军事考虑。从突厥斯坦到西南,再到台湾,在中国历史上,这些边疆地区经历了无数次的反叛和动荡,这通常反映出民生疾苦,或者一些管理者在治理边疆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

多样化只是边疆治理和发展中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能通过研究中央政府官员及其所处环境来总结出一些共性特征或者发展趋势呢? 这些文章都强调并提到了政府对于边境地区官员选派的重要性。不管他们是否完成了使命,这些文武官员大多数都是少有的边疆“专家”,他们对自己所管辖的地区非常了解(见周伟洲的文章)。他们的知识或者来自家庭背景,或者由于他们曾经在这些地区和前任官员一起工作过,或者因为这些官员曾经履行过特殊的使命,因此他们在这些地区任职很有经验(见斯加夫的文章)。他们也可能就是当地人,在清朝初期,特别是在福建省,很多在沿海服役的水师军官就属于这种情况(见柯兰的文章)。

在这些边臣疆吏中,不乏精明强干者,他们有些人洞察秋毫,能施行因地制宜的政策(见庄吉发的文章),而且还懂得当地方言,非常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

有时中央制定的政策也会根据他们所提供的信息或者提议而改变(见罗萨比的文章)。这些信息都是他们在边疆或京城居住时期,通过接触外国使臣、商人和当地人等搜集而来。比如,松筠就他的西藏之行写了大量的笔记,这些材料很可能使得后来到这些地区任职的官员能更好地了解这片土地(见冯明珠的文章)。此外,很多被委派到边疆担任要职的文职官员也精通军事,他们通常也会根据形势和自己的判断而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以保障边疆的安全。

他们中一些人本身就是武官,在其一生中曾被派遣到多个前线,经历多次危难时期;有时被作为特使去结束那里长期的动荡,恢复秩序和安定。福康安(?—1796)就是如此,他在乾隆年间多次镇压了规模较大的暴乱,与其说是因为他有管理军队的智慧和才能,不如说是形势所迫、临危受命。然而他出使西藏不仅有助于解决冲突,而且也加强了清朝政府文职官员在西藏的作用(见谷岚的文章)。事实上,与会者的这些文章都不约而同地证实了武官在边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尤其反映在对新边界地区的治理进程中。也就是说,当局势稳定后,官僚机构通常会取而代之,但是军事统治有时也将继续维持,正如在北方边境地区。

在明清时期,在此前的朝代可能也是如此,当这些人前往平定叛乱时,往往会与先前合作过的文武官员在一起。比如,福康安曾在四川(1773—1776)和阿桂(1717—1797)一起并肩战斗,后来两人又在甘肃共同平定穆斯林叛乱(1784)。在西藏的时候,福康安身边就有曾经在四川、甘肃和台湾(1787)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海兰察(?—1793)。极有趣味的是这三人的上下级关系,是处在微妙的变化之中的。此外,他们的合作也不一定出于他们的本意,特别是海兰察,他的军事才能使他享有良好的声誉。或许这是福康安有意要求的缘故,因为福康安和朝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希望能有他欣赏的人来辅佐自己。或许这些合作是由中央政府指定和安排的。

在福康安和与他合作过的这些人之间,也许没有裙带关系。但是在其他地方存在的这种关系很明显,而且情况不一:他们有的是亲属,有的是朋友(比如在一次合作之后,在长期共事之后),还有的是同乡等等。第一种情况的绝好例证之一就是程节和程邻父子,他们的影响在西南边境持续了30多年(见黄宽重的文章)。程节被派至广西一事本身可能就不是偶然,因为那里的熊本是他的同乡兼学友。至于由郑之龙来管理部分军队事务,事实上就是授予他福建省海岸的控制权,由此明朝不但化解了一种危机,同时通过郑之龙的直系和嫡系集团保障了该地区的稳定(见李国强的文章)。清初,来自福建南部的军官指挥的海

上行动就得到了各种切实有效的支持,甚至包括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见苏尔梦的文章)。

在通常情况下,政府也会支持这些关系网络以便更好地管理边界。出于同样的目的,在中国边境上,政府还经常和地方名流结盟(见方铁、王希隆的文章),或者建立土司,以维护边疆的统治(见王希隆的文章)。朝廷给其中一些首领足以让他们确立权威的地位和/或职务,寄希望于他们的合作,王希隆的文章就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人接受中央代表的管理,但他们又是民众和地方政府的中介,通常负责收税和维持治安等等。职务分工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其他方面,特别在异族统治时期更具有战略意义。元朝时期,蒙古人和色目人在岭北行省的管理中担当了最高的职务,而在汉朝,他们只处于底层(见洪金富、赵琦的文章)。这种情况在清朝也存在,当时在北方和西北各省,汉人的官员都被排除在高级职务之外(见吴劳丽的文章)。

除了种族因素,政府对派往边境的高级官员的信任也建立在对他们的重视之上。京城和边境之间的来往公文需要时间,因此,有时疆吏需要在等到中央的首肯之前就要做出决定。同样,中央政府的一次人事调动可能颠覆对边远地区的统治政策,并否定某种运作方式。朝廷经常向在这些边境地区主持军政的高级官员征求意见吗?这是无法确定的,并且中央政府的人事变动往往会导致其政策的改变,并对地方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在11世纪时就是如此(见方铁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还不止于此),一些朝廷派遣到边境的官员不一定是朝廷意志的忠实执行者,而另外一些官员则是完全遵守中央作出的决定的(见张云的文章)。

历史上的边臣疆吏,即使具备以上所说的综合条件(即他们对所管辖地区的了解、工作能力、军事才能、关系网等),也不能保证完成他们的使命。而他们若要是有所作为,还必须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通常需要大笔资金的边境治理是无法完成的(见徐晓望的文章)。一些失误很可能由此而来:如专制独裁、国家财政的滥用和挪用等。这些官员必须在京城有牢固过硬的关系作靠山。当然,还要取决于内外形势尤其是朝廷的态度和决策。比如,明谊主持的中俄谈判失败,主观原因是他玩忽职守,遇事推诿,但政府软弱无能,无法抵御和遏制俄国的扩张野心,因此不敢授予谈判代表足够的权利,也是客观原因(见陈维新的文章)。19世纪中期以后,朝廷面临种种危机和困扰,顾此失彼,险象环生,它所关注的的焦点更多是南方而不是西北方,此为国衰势弱的必然结果。

序 言

马大正

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和现实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极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边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了物与人两个方面。可以说,边疆政策是一项针对边疆地区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边疆问题始终是安邦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统治者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实施边疆治理。边疆经略和治理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进行开拓与经营的历史过程,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和治理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是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历代边疆史研究具有丰富的内涵、众多的研究课题,其重要者至少包括:

1. 历朝历代陆疆与海疆政策的综合研究,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政权的边疆政策研究;
2. 边疆史中一些带有共性问题的专题研究,诸如边疆行政建制、边疆经济开发、边疆民族的文化与宗教等;
3. 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历代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边防政策,以及与边界交涉有关的外交政策等方面;
4. 传统的治边思想研究;
5. 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边疆政策的比较研究;

6. 涉及边疆史的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文化诸领域的研究;
7. 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的研究与考证;
8. 近代边疆危机与边疆政策发展演变的轨迹以及相关诸多问题的研究。

中国边疆史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贯穿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所有方面,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和多样性,每个朝代的边疆史研究都有相对独立的特征,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更何况许多问题又具有其自身的发展的内在规律,共性与时代性并存,相互之间一脉相承,又有区别,与现实联系密切,头绪众多,研究难度大,所以这是一个可供研究者群策群力,投入毕生精力,进行全面研究,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领域。

边疆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疆域的变迁沿革,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与盛衰,在历史上尤其如此,当国家势力雄厚、治理稳固时,边疆统治就相对和平和稳定,经济就能获得发展,其中主政边疆地区的边臣疆吏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是国家边疆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其个人的素质和处理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直接影响着朝廷有关政策的制定和边疆治理的好坏,因此,对中国历代边臣疆吏的研究,理所当然地是研究中国历代边疆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为学人所关注。有志于边疆史研究者,均可以从上述八个方面找到边臣疆吏研究的切入点,找到自己展示才华的主攻研究方向,取得丰硕的边疆史研究成果。

2006年10月在中国台北召开的“中国历代边臣疆吏”研讨会,主题突出,准备充分,与会者都是边境史研究的精英,济济一堂,不乏高见宏论,这是一次以边臣疆吏为主题的深化中国古代边疆史研究的成功的学术盛会。会议组织者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提出了研究思路,更为研究者从事此项科研攻关,取得一流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诸如:

1. 边臣疆吏在国家官员整体中的地位;
2. 边臣疆域在历代中央政府实施边疆政策中的作用,以及中央与地方在治理边疆上的互动影响;
3. 历代边臣疆吏对中国疆域形成的重要性;
4. 边臣疆吏与边疆地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互动关系;
5. 边臣疆吏在边疆地区的民事、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作用;
6. 历朝各代边臣疆吏的个案研究,以及历朝各代边臣疆吏的比较研究。

很显然,上述研究课题和诸多领域,不仅对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具有指导作

用,而且对于深化历代边臣疆吏研究更富有启迪意义。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边臣疆吏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值得海内外的研究者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上下求索,大有作为,为构建中国边疆史研究的科学体系打下牢固的基础。

中国边疆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但许多问题,还有待研究者作深入细致的探讨和开拓创新,还有许多未研究的领域,需要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汗水。单就中国历代边臣疆吏而言,我个人认为:“边吏是否善政关系到边政是否得当。边疆地区远离统治权力中心,且情况复杂,边吏的素质要求更应优于内地。应变过激会使事态人为扩大,而过缓消极,本想息事宁人,往往适得其反。用一句大家熟悉的话: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边疆大吏肩负的重任跟一般内地的不一样,跟京官也不完全一样。他如果是个庸才或者是个歪才,那就更糟糕了,要出大事,边疆的事情有的时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瞬息万变。从中央来说,对边疆大吏应该授以便宜之权,让他有一定的机动权,该决断时要给他以决断权。清朝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很多。总而言之,治理边疆是靠人去治理。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那没错,但是我还有一句话,关键在领导,在我们的父母官,在我们的边疆大吏。边疆大吏里边应该有一批经过考验的民族的高层领导干部,再加上中央的权威,中央的正确政策、方针,那么我们边疆的稳定局面,应该说是可以保证的。”¹

法国远东学院的柯兰女士嘱我为“历代边臣疆吏研讨会”论文集的结集出版写几句,言之切切,实在难以婉拒。想到自己未能与会已是很不恭敬,此嘱再推,真有一点难辞其咎了,于是将不成熟的个人感言草成短文,以应命。是为序!

2007年7月14日,北京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注 释〕

1 《中国高端讲座》第一辑,第149页,海南出版社,2006。

勋与仕途

天高地远 边臣疆吏

何得“边事捷报”？——唐代西北 648、655、 657 年诸战役指挥官的军事文化行动

斯加夫 (Jonathan Karam Skaff) 著

孙琢 译

导 言

唐王朝(618—907)的上半叶,以一个广及内陆亚洲的大帝国著称于世,其版图之广,仅其后的元、清两朝有所超越¹。唐朝的领土扩张上可以说是取决于其边将的个人特质。7 世纪 20 年代,唐朝政权巩固之后,其大部分领土扩张是针对北部和西北部的,即位于农业文明的中原与欧亚大陆腹地草原带之间的边疆地区。本文将着眼于帝国早期的扩张,在这一时期,朝廷趋向于选择那些能够卓有成效地统辖边疆地区的将领,这种选将趋向是唐朝领土扩张与巩固的一个核心要件。驻守北方边关的唐将的民族、社会背景极具多样性,他们以多种征募方式入朝为政。虽然当时不乏精晓儒家经典的将领,但朝廷更侧重于甄选那些通晓兵法、了解草原游牧民族敌人情况的将官。功勋卓著的将官们的一个主要共性在于他们能够在边地实施有效统治,土生土长于此,或是在边地的长期执事经历,使他们与边地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也是其能够稳定边关的原因之所在。因此,唐朝的边境扩张是仰仗于那些入乡随俗的将官,而非那些试图以中原形象重塑边地的人。

由于大会文本格式所限,我不能对唐朝边将的课题做全面综合性的展开,本文将集中于三个初唐将领个案的研究,他们在 7 世纪 4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指

挥西北战事,攻占今新疆部分地区。此三人及其所指挥的战事之所以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性,是因为通过对这一切的了解,将使初唐军事特征、将领的战术选择以及朝廷关于边疆远征的选将决策明晰地呈现出来。程知节(?—655)与苏定方(592—667)二将均为汉人,而阿史那社尔(?—655)则为突厥人。苏定方与社尔,汉番配合,成功挥军西北,反观程军则以兵败告终,程知节本人亦被削职。

除去民族差异,战功赫赫的苏定方与阿史那将军作为兵将,较之程知节有较多的共性,这一点在本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成长于内亚的阿史那社尔显然对在新疆作战得心应手,而一如其他北方汉人,由于精于轻骑作战,加之早期对抗突厥时积累的重要经验,苏定方对适用于北方边地作战的军事策略同样耳熟能详。除去苏、程二人同为汉人以外,后者的生活背景与作战经验,较之前者,对于北方边塞作战是处于劣势的。程知节自幼成长于黄河以南,善于重骑作战,其重要军功均建立于东部平原与西南边陲。尽管如此,程知节的兵败仍不失为一种反常,因为在北方战事中,诸如苏定方等汉将、阿史那社尔等番将的取胜是更为正常的。

参考资料

本课题的主要参考资料,出自于两部唐朝断代史中所保留的人物传记,佐之以司马光在其所著《资治通鉴》中对这些人物的相类记述,以为补充,《资治通鉴》一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额外的信息。现代的史学家试图利用这些资料对唐代边将的生平进行重新勾勒,然而这往往会陷入三大难题,致使我们无法随心所欲地了解我们所需要的信息。首先,断代史中的人物列传是经过传统史学家的筛选而得以留存的,而他们往往对现代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只字不提,史传收录与否,是以显位和战功为准绳的,这也就形成了趋附于最高统治阶级偏好的一种选择倾向。那些挥军远征,开疆略地的边将是最有可能名垂青史的,而那些出师不利,或是仅限于在边地统治有方,却无心于大规模扩张的将领们被收录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其次,传统的史学家对传记内容亦加以选择,这往往不利于现代学者的研究。传记的内容一般包括对人物早期生活经历和背景的简介及其一生历任官职的列举。那些诸如出师大捷之类的重要功绩则更有可能被详尽地载入史传。然而,这些将官的从政和个人生活细节往往被忽略掉,有时会由此导致传记中断带的出现²。再次,一般而言,以武将个人记述对其传记内容加以补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有些将官本身是不识字的,亦或是传统的史学家认

为武将的个人记述,其文字粗浅平庸,毫无保留价值。基于上述三个问题,总体来讲,现代史学家对唐代将官的生活背景,军事操练和从政经历是缺乏了解的,当然,我们还是有可能了解到唐代将官的大致执事方式,而从其参与指挥的战事中,亦可对其用兵策略之偏好稍加了解。

另外,现存的历史文献对朝廷为特定边府和边军选将的决策过程着墨甚少。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中推断出唐帝在用人上的偏好,这是因为唐代将领的个人任命、升擢、封赏在其传记中均有记载,有时,关于将官的削职,惩戒的记载在官修史书中亦有据可考。这样一来,把将官们所与战事与其擢迁联系起来观察,我们便可从中得悉唐帝的用人偏好。

指挥西北部战事的唐代将官

这一部分将围绕作为本课题研究对象的三位生活于同一时代的将官展开研究,他们分别是汉将苏定方、程知节与番将阿史那社尔。通过对他们戎马生涯的比较,我们可以认识到,初唐时期唐军在民族及练兵方式上极具多样性。了解他们的个人背景,对我们认识朝廷在西北边疆扩张战争中的选将标准及胜利进军所需的个人素质这两方面,具有启发性意义。

程知节的军事成就在诸多方面与苏定方和阿史那社尔不相伯仲,但当他在655年挥军西北之时,可以说他是毫无胜算可言的。程知节生长于山东北部的济州,地处黄河以南,故此地实际上与北部边陲是完全隔绝的。程知节专擅重骑作战(即披甲作战),犹精马槊³。他作为地方自卫军首领在灭隋(592—618)建唐的起义中力拔群雄,脱颖而出。时隋朝政权土崩瓦解,程知节聚众数百,以保乡里,成为地方军首领,随后以骁勇善战见用于河南李密,成为其重要追随者。时李密(582—618)简800骑为内军以自卫,程领其一。618年后期,李密为王世充所败,遂遁于山西,并于建唐五个月后降唐。程知节走投无路,为王世充所虏。在这一时期,基于广纳贤才,充实自身军事力量是雄踞天下之关键这一典型认识,王世充对程知节恩遇甚隆,以期程知节效忠麾下。然而,或许是对王世充的礼遇并不满意亦或是出于对李密的忠心,程知节后携随从十人出奔唐朝。

入唐后,受敕效命于皇子李世民,而李世民后来身登大宝,成为第二位唐朝皇帝,也就是广为人知的唐太宗(626—649年在位),由此,程知节仕途平坦。受命秦王府左三统军,深受李世民重用。621年,程知节从李世民征窦建德、王世

充,大破之,下河南⁴。随后,唐王朝开国皇帝唐高祖(618—626年在位),以其子世民总理东部平原一切军政要务,程知节则继续为李世民所用。由于李世民与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其兄李建成之间展开皇位之争,程知节的地位危如累卵,然仍不失赢得高位的可能性。当时,李建成把剪除李世民之亲信党羽作为削弱其势力的一部分,遂说服高祖除程知节为康州刺史,康州地处今广州,时为荒蛮瘴病之地,康州府亦备受冷遇。此前,程知节已身为李世民十二肱股亲信之一,626年,此十二人参与谋刺李建成。逾数日,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事成,程知节乃以负险支持新帝的缘故,成为唐太宗一生的亲信重臣⁵。其第二子尚太宗女,由此程氏一门与李唐皇室结为秦晋之好⁶。

太宗在位期间,程知节继续执事于军中,拜右武卫大将军(正三品)。未几,于西南边陲任泸州都督(今四川省东南部,与贵州,云南接壤)。后调山西南部,拜普州刺史,位尊爵贵,世袭罔替。643年,拜左屯卫大将军(正三品),拱卫京师,检校北门屯兵⁷。他在此任上为官直至655年,太宗子,皇嗣高宗(649—683)即位六年之后,他终受诏引军远征西北,关于战事,下文将做进一步的叙述。

苏定方的早期经历在一些方面与程知节相类似,但还是有几点根本性区别。苏定方出身于今河北省中南部的冀州大户,地处黄河以北,这一地区在北朝时期深受鲜卑文化的影响。时逢隋朝分崩离析,与程知节一样,苏定方亦被卷入东部平原的战事。其时,其父领数千人,以安地方,苏定方年十五,即随其父冲锋陷阵,后父卒,代领其众。其后转而追随一位更有势力的地方军首领,这一点亦与程知节相似,后出于此人原因,事窦建德军。这期间,苏定方与窦建德大将高雅贤相厚,高雅贤亦将其视为己出。621年,程知节从李世民军,大败窦建德于洛阳,苏定方与其养父高雅贤遂转投窦建德宿将刘黑闥。623年,高、刘相继为李世民所杀,苏定方则弃甲返乡⁸。

关于这以后数载苏定方的情况,在历史文献中无迹可寻,但可以肯定的是,苏定方(或其主)后投效于时总辖东部平原诸军事的李世民。正如我们从程知节的个案中所看到的一样,李世民从归降于他的东部义军中大量吸纳人才,委以官爵⁹。626年,李世民夺得皇位,苏定方随之青云直上。为了巩固政权,李世民以其亲信据各要职¹⁰。627年,苏定方首度被委以重任,拜匡道府折冲校尉,负责拱卫京师,护卫唐皇,以太宗巩固政权的角度来看,苏得此要职亦不足为奇¹¹。当然,苏定方在与太宗的亲密程度上是无法与程知节分庭抗礼的。

尽管我们对苏定方在青年时代和群雄混战阶段的兵艺及战绩无从深入了解,

但他无疑善于轻骑作战,因为在日后的用兵中,他多次以速袭游牧民族大军而立下赫赫战功。这些作战技巧为其用兵西北边疆铺平了道路。630年,唐军大败东突厥,其中苏定方功不可没。630年,苏定方从唐朝名将李靖征颉利可汗,在这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事中,苏定方率200骑弓箭手为先锋,以雾色为掩护进逼颉利可汗牙帐,雾散之时,突厥牙帐近在咫尺,未等援军抵达,苏定方捉住时机,出其不意,下令猛攻突厥牙帐,敌军方寸大乱,迫使颉利可汗携亲随数人仓皇出奔。自此,颉利可汗再也无力发起同等规模的战争,未几,降唐¹²。此一战亦使时年三十八岁的苏定方声名鹊起,以驍勇善战的轻骑军将领闻名天下。后以功擢左卫中郎将(从四品),时京畿禁卫军(京师折冲府)左军分兵六卫,苏领其一¹³。

遗憾的是,其后的二十五年中,我们对苏定方的情况仅有一个大概的了解。644—648年,从太宗征高句丽,无功而返。后以其在拓边战争中屡建奇功,擢右屯卫将军(从三品)¹⁴。时京畿禁卫军分十二卫,他用事于其中一卫,在本卫兵马的指挥团体中列位第三,位下程知节一品¹⁵。由于史官对苏定方未以勇谋建功的战事情形的忽略,至于其大部分时间是驻守京都还是参与其他边战,我们无从得知。

征伐高句丽是苏定方在这一时期参与的唯一军事行动,但是,唐王朝在7世纪的京畿禁卫军却不失为准备边战的良好所在。京畿禁卫军堪称一个汉番结合的多民族大融合,其中的汉番将领共同操习,相互交流的机会大体是很多的,而文献对这方面信息的记载却惜墨如金,我们仅能找到一些关于社会交往和知识谋略交流的记载。举例来说,苏定方赏识时任从八品左屯卫仓曹参军(译者注,出自《新唐书·裴行俭列传》。此处原文为“右”)的裴行俭,并将其所通之兵法倾囊相授¹⁶。由于高宗设武乐款待九位不同民族的将领,从而使得这些民族背景殊异的将官们齐聚一堂,这是其中比较罕见的个例。此次,苏定方与番将阿史那忠(610—675)即阿史那社尔次侄俱在席¹⁷。阿史那忠曾为突厥首领,后擒其旧主东突厥颉利可汗(社尔兄),630年,归附唐朝。用事于京畿禁卫军(京师折冲府),终其余生。武乐宴阿史那忠时,他官至右骁卫大将军,正三品¹⁸。诸如此类的交结,对苏定方进一步加强对内亚民族的思想、行为的了解,大有裨益。

苏定方晚年,时值高宗在位,开始摆脱程知节的影响脱颖而出,成为这一时代最著名的将领之一。两次挥军西北讨伐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使苏定方的将才展露无遗。他有力指挥汉番步骑混合军作战并对作战策略加以改进使之适应于边疆作战。他身为陆军将领,其非凡的战功名列八世纪中叶中国七十五位最伟大的将军¹⁹。

与苏定方相类似,本课题研究所涉及的最后一位将军,番将阿史那社尔对挥军西北显然游刃有余。635年,社尔降唐,他是本文涉及的三位将官中入朝最晚的一个。社尔出身东突厥统治者阿史那家族,处罗可汗(?—620)之子,处罗可汗继位者颉利可汗弟。其兄颉利可汗于630年为苏定方军所败。早年在草原时,拜拓社,与颉利可汗子,其侄欲谷社共辖碛北²⁰。铁勒、回纥、仆骨、同罗诸部皆处于其统治之下。公元7世纪20年代后期,东突厥内乱,导致唐朝于630年轻取东突厥²¹。铁勒、回纥及薛延陀诸部在蒙古发动叛乱,攻破裕固设,迫使阿史那社尔撤兵。

630年,颉利可汗兵败后,社尔率余部西赴新疆,据可汗浮图城(参见地图)²²。时值西突厥内讧,朝纲混乱,社尔借机侵占西突厥在新疆的大部分领土,由当地各部收编部众逾100,000人。其间,阿史那社尔的重大失误在于他试图通过收复已为薛延陀所据的蒙古来扩张自己的势力。他置其谋臣谏阻于不顾,亲率50,000余骑征薛延陀于蒙古。用兵逾百日,社尔军苦于久役,多弃之而逃。薛延陀借机大举反攻,迫社尔回兵新疆,驻兵复保喀喇和卓(中文:高昌,今吐鲁番)。其时,社尔旧兵仅余10,000人,势力受到极大削弱。

635年,社尔终无力抵御西突厥,遂决计率余部归附唐朝,以求得唐王朝的庇护。其部被安置于鄂尔多斯西部灵州牧区,随后,阿史那进一步东进,并于636年入朝,朝廷待之以太宗肱股近臣之礼,恩遇一如程知节,拜正三品左骁卫大将军,位同程知节。他亦如程知节受天恩与唐皇室联姻,尚太宗姊衡阳长公主²³。太宗对阿史那社尔的知遇是初唐时期朝廷对待归附各部的惯例,并不足为奇。阿史那社尔精晓在亚洲腹地领兵作战,其部属尝专事轻骑击敌,颇有韬略,朝廷对这一切颇为赏识。当时朝廷对其安置妥善若此,双方皆得其益。社尔不仅名利双收,且得以安享稳固升平之世,与此同时,朝廷亦得益于社尔之非凡将才及其麾下精骑。

撇开社尔精于内亚用兵之事不谈,自635年降唐以来,他对唐军及军中执事程序并不熟悉。而在未尝以偏将身份参与唐朝之前的任何用兵的情况下,社尔就在新疆的扩张战争中挂帅,这点是有疑问的。7世纪40年代,社尔两次参与拓疆战争。640年,突袭位于今吐鲁番的绿洲王国——高昌国,平之。但是我们未能看到他在这次用兵中的任何军功记载。645年,从太宗征伐高句丽,此中情形,我们有幸得以做更多的了解。在此次用兵中,社尔将其本部兵卒,此路兵马大体是由轻骑兵组成。及战,敌军进逼太宗帐,社尔为流矢所伤,拔之,继续率部冲锋陷阵。太宗

美其豪壮,师旋回朝,擢升显位,拜从三品鸿胪卿,文武官职并而行之²⁴。至645年,阿史那社尔不仅深谙内亚将兵作战之道,而且深为太宗所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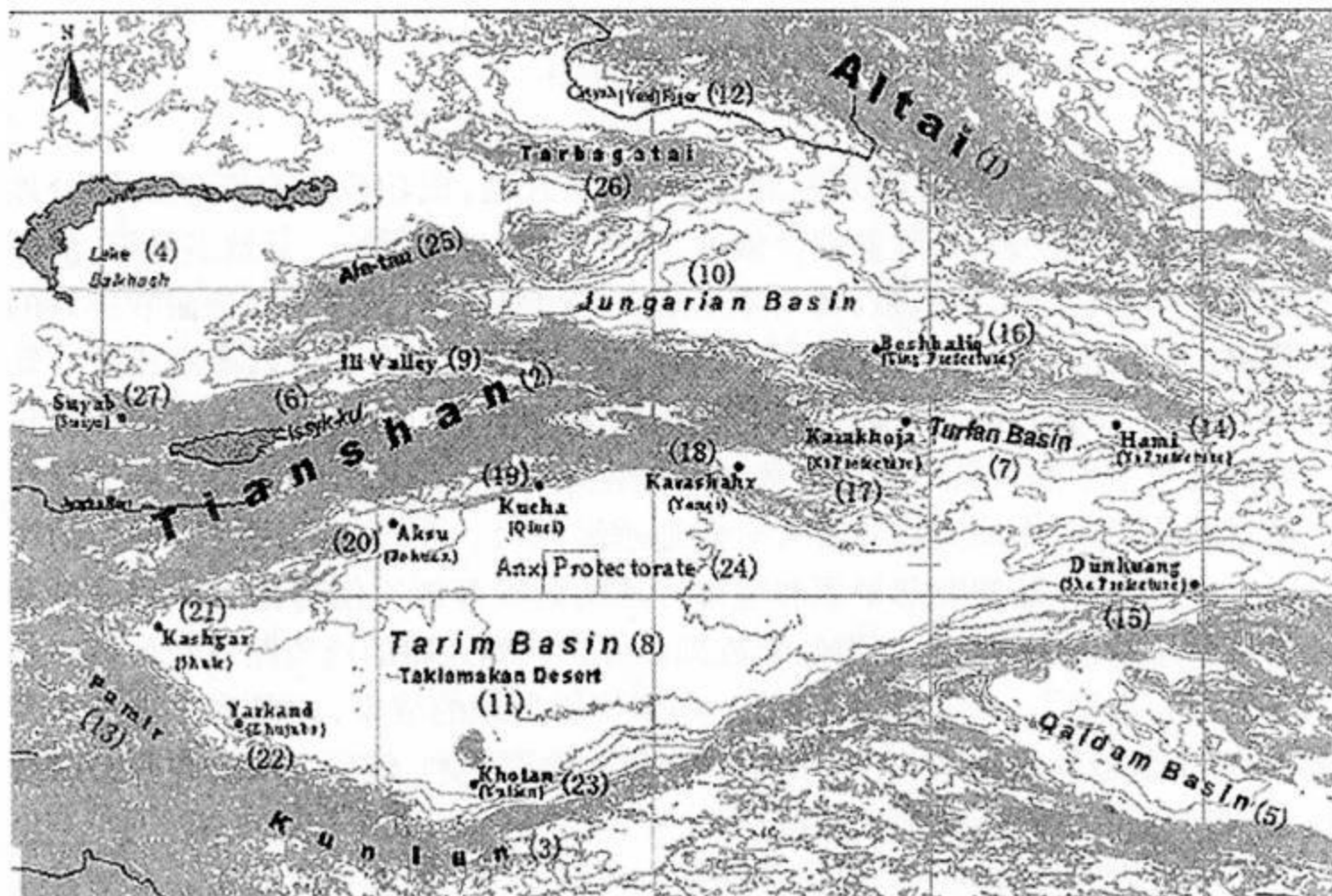
西北战事

640—657年,唐朝连续对西北用兵,拓土开疆,成功攻占今新疆大部分地区。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新疆地处偏远,于牧于耕,皆无所长。其地多沙漠,然亦有宜牧宜耕的特定生态地带,境内降水沿山体倾斜而下,从而为草原游牧民族的放牧提供了水源,并且汇入河流,流经绿洲地区,使当地农民得以灌溉庄稼。新疆的牧场,不像蒙古高原一样足以养活如此多的牧民,同样,其境内的绿洲也只能维持相当于中原人口一小部分的牧民的生活。尽管如此,市镇与牧场的存在仍使得游牧民族,中原人和吐蕃人对此地垂涎三尺。在汉唐之间这段绵长的历史时空中,生活在新疆北部平原和葱郁谷地的游牧部族迫使塔里木绿洲地区和吐鲁番盆地的市镇纳贡。而游牧部族则以保护丝绸之路的商贸路线和市镇中心的安全作为报偿²⁵。唐王朝在7世纪40年代所发动的战事,志在攻占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的绿洲小国。唐军于648年末取得胜利,随后试图粉碎西突厥政权,以期巩固唐朝在绿洲地区的统治²⁶。

本文研究所涉及的三位将领分别于648、655、657年将兵征西北。本文在这一部分将分析其受命领军的原因,并对其作为将帅的表现作出相应的评价。这些拓疆战争为我们评价战事本身与将官成功与否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对于阿史那社尔、程知节、苏定方三者之间的比较证实了那些适应边地作战的将官有更大的胜算把握。尽管皇帝显然并不总是以是否具有北方边地作战经验作为主要的选将标准,但是通过反复尝试,他们逐渐倾向于选择那些熟知如何挫败诸如西突厥之类游牧民族敌人的将官们。

在648年的用兵中,时近太宗在位末期,阿史那社尔拜行军大总管,将兵远征龟兹。虽然龟兹派遣使团纳贡于唐朝,但这个绿洲国度仍然臣属于西突厥。当时,除唐朝近期攻占的吐鲁番高昌王国外,西突厥仍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西突厥与龟兹相厚,这是以他们之间的姻亲关系为标志的,龟兹王后出身于西突厥皇族阿史那部²⁷。顺便提及一下,阿史那社尔亦出身于此部。时攻打龟兹绝非易事,究其原因,此次用兵事涉两种不同兵略,既要攻击游牧民族铁骑于平原,又要围攻其城池。回顾此次用兵过程,阿史那社尔显然是指挥本次作战的

地图：西域（今新疆周边地区）



注释(译者注):

1. 阿尔泰山; 2. 天山; 3. 昆仑山; 4. 巴尔喀什湖; 5. 柴达木盆地; 6. 伊塞克湖;
7. 吐鲁番盆地; 8. 塔里木盆地; 9. 伊犁谷地; 10. 准格尔盆地; 11. 塔克拉玛干沙漠;
12. 曳咥河; 13. 帕米尔; 14. 哈密(伊州); 15. 敦煌(沙州); 16. 可汗浮图城(庭州);
17. 喀喇和卓(西州); 18. 喀喇沙尔(焉耆); 19. 库车(龟兹); 20. 阿克苏(大拨换城);
21. 疏勒; 22. 朱俱波; 23. 于阗; 24. 安西都护府; 25. 阿拉木图; 26. 塔城; 27. 碎叶。

不二人选。他早有在此地作战的经验,在降唐之前,他作为拥有独立政权的突厥可汗已经攻占可汗浮图城(Beshbaliq)与喀拉和卓(高昌)。此战以铁勒十三部与100,000突厥精骑充其军,对他而言,统领这样以轻骑军为主体的兵马实属轻车熟路²⁸。从社尔此时手握重兵这一点来看,太宗对他是深信不疑的,这种信任与阿史那社尔系西突厥之仇讎颇有关系,因为社尔先前在此地的统治地位正是

被西突厥所取代的。显而易见,太宗与社尔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及649年,太宗驾崩,社尔自请殉葬,以侍太宗于泉下,未获批准²⁹。

九月,社尔将兵抵西突厥,两军公开对峙,唐军告捷。至于这次双方对峙的细节文献中没有记载,但战事大体发生在天山以北的平原地区。唐军大破西突厥处密、处月二部,随后,驻扎此地余部悉数投降。据推测,此后唐军越天山,进至唐统治之下的喀喇和卓,以期进一步移师西南,攻打龟兹。喀喇沙尔(焉耆),时为主要的绿洲国度,地处高昌与龟兹之间,焉耆王早年篡位而自立,前焉耆王尝为唐朝所立。当时,唐军出其不意,攻伐焉耆,焉耆王逃遁,途中为唐军所获,并诛之³⁰。

值得庆幸的是,关于其后对龟兹的用兵,文献中有翔实记载,从中可以看到,在社尔的用兵策略中包含着典型的边战特点。社尔兵分五道,西趋戈壁大漠,在这次唐与龟兹的决定性战斗中涉及了另一典型边战策略——声东击西。唐军以1,000骑为前锋,兵临龟兹城下,龟兹王白诃黎布失毕以为唐朝大军俱列阵于此,遂率众50,000拒敌。唐军前锋伪遁,与曹继叔所率垫后兵马汇合,两军相合,大败龟兹军,龟兹王白诃黎布失毕西向亡匿于阿克苏(唐:大拨换城)。敌军既克,社尔留一将驻守龟兹,引主力军继续西向进军阿克苏。攻城四十日,龟兹王白诃黎布失毕遂于649年1月19日率亲随降唐,由此,唐军在塔里木盆地建立了巩固的统治。

为巩固唐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外交途径同样不可或缺。因此,社尔派遣左卫中郎将权祗甫“诣诸部首领,开示祸(叛乱)福(归顺)”³¹。史称这些交涉大获成功,尽管这一说法未免夸大其词,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尔授意权祗甫运用了其早年统治草原地区时所用的外交策略,当时他正是以此来聚拢人心,充实自身力量的。无论如何,这次用兵是太宗一生中军事与外交上的最后一次胜利,同年,太宗驾崩。另外,这也是阿史那社尔戎马生涯中的最后一次重要战事,六年后,他去世了。

高宗继位,继续其父太宗的政策,致力于对今新疆地区的控制。尽管吐鲁番、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国已处于唐朝的控制之下,但西突厥对这一地区仍构成巨大威胁。高宗曾两次发兵征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第一次以程知节为行军大总管,于655—656年伐贺鲁,战败。时苏定方为众郎将之一,领军一路。657年,以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再征伐贺鲁,终于败之。

回顾起来,655年的用兵,以程知节为大总管,实非明智之举。尽管程与太

宗有着非凡的亲密关系,但太宗似乎并不放心将干系重大之事交付于他。与参与政变,助太宗得天下的十二亲信中的其他人相比,太宗似乎并未以要位授予他。以侯君集为例,在共谋起事的名单中,他即名列程知节之前,历任尚书,640年担任征高昌大总管³²。太宗嘉其忠心,但在委托己之大事上显然有所保留。另外,程知节并不善于在向新疆扩张的战事中坐镇。他以重骑作战而负盛名于天下,而在亚洲腹地平原作战中,突厥或是其他游牧民族的轻骑兵,行动更为迅捷,较之他所擅长的重骑,在此作战更具优势。程知节在地处东部平原的河南和西南边陲的四川为将时,颇有建树,而那里的气候,地形与北部边陲有着天壤之别。这些地区更适合于步军和重骑作战。在京畿禁军中用事的经历,为他与熟悉内亚战事的将领相交结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至于程是否抓住了此类机会,则不得而知。尽管史料中缺乏对此事的廷议记载,但是在以程知节为征贺鲁大总管一事上,其地位及与皇家的姻亲关系,似乎比他缺乏督军新疆的相关经验重要的多。对高宗而言,其妹为程知节儿媳,且兼程知节位极人臣,贵为皇亲,又为其父肱股羽翼之臣,他的特殊地位或许对高宗此次选将决策有所影响。

无论如何,程知节引兵于655年5月自京师启程,向西北进发。在此次扩张战事中,苏定方拜前军总管。逾一年之后,656年9月,两军首次小规模作战,据记载当时程知节与副总管周知度已击败贺鲁一部³³。而文献中没有记载关于双方交战的任何细节,可见两军的这些冲突极有可能规模很小,而正是这些小规模的冲突迫使敌军撤退的。最初,程军兵分几路,分头行进,各路兵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这种编军方式与阿史那社尔塔里木一役相似。据文献记载,当时苏定方前军歇马,隔一小岭,去苏海政军十余里。苏海政领兵至鹰娑河(鹰娑川),鹰娑河发源于天山东南,东南向流至位于塔里木盆地的高昌,突厥20,000骑来拒。两军互有败绩。既而,鼠尼施部以20,000余骑攻之。苏定方见远处尘起,遂领500骑驰往击突厥兵,突厥兵溃逃,斩首1,500余人,获马2,000匹。尽管这一记载对突厥军规模有所夸大,但苏定方在击败东突厥颉利可汗之后二十五载,年届六十四岁,仍能率领行动迅捷之轻骑兵与游牧民族敌人作战,我们对这一点仍是饶有兴味的。而且这更加深了我们对苏定方在轻骑作战上资赋过人的印象。

开战前期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这次用兵最终未能决定性地击败阿史那贺鲁及其部属。在程知节列传中,史官责其洗怛笃城,掠其财货,从而贻误战机,致贺鲁脱身³⁴。在苏定方列传中,亦将洗掠怛笃城视为未能击败贺鲁的原因之一,但更强调战略决策选择上的失误。这些历史记载已为慧眼如炬的宋朝史学

家司马光所认同,而根据这些记载,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苏定方的战功,对其所用策略横加诋毁³⁵。王文度以唐军伤亡过重,苏定方胜亦无功,大加抱怨。王援引古代兵书,指责苏定方视险况为儿戏,险中求胜。他提议结方阵以更前策,纳辎重于阵中,敌来即战。此阵在现代军事手册中仍然可以看到,它更适用于行军相对缓慢的步兵和中原重骑作战,而对于在内亚作战,行动迅捷的轻骑兵则并不适用³⁶。据格拉夫(Graff)研究,方阵主要用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势下的防守。倚重于重骑作战的隋军正是以方阵来抗击突厥的,而其在边地的战绩则显逊于唐军³⁷。虽然方阵能够更好地防御敌军偷袭,然贺鲁军机动灵活,在此情况下,这种方阵阻绝了唐军俘获贺鲁的一切机会。

当时王文度矫称奉诏节制唐军,撇开矫诏一事是否属实不谈,唐军各路将领齐聚一处,兵卒跨马被甲结阵,以为更进。由是兵疲马乏,斗志低靡,导致唐军疲于防守。终日身披重甲,其不适与疲惫可想而知,另外,由于难以分散放牧,马多瘦死。如此庞大数目的马匹集中于一处,将导致在达到马匹所需营养之前就已经把此地牧草消耗殆尽。苏定方视之,据实陈于程知节。他认为时下唐军兵疲马弱,逢敌必败。他望以假传圣旨之罪拘王文度,程知节不从。尽管唐军的士疲马弱为阿史那贺鲁提供了良好的进攻机会,贺鲁仍按兵不动。在程知节下令洗掠怛笃城后,程军负耻惨然收兵,其自卫之策及屠怛笃城之事,断绝了唐军战胜贺鲁的一切机会。

随后,高宗以兵败,将程知节、王文度削职为民,此举昭示了高宗对其二人的责惩³⁸。他们的紧密结阵以备重骑作战的观念,表明他们并不适于北方边战。尽管我们对王文度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纵观文中所述,不难看出程知节对北方边陲用兵亦不了解。当他面临从两种相悖的排兵布阵之法中作出选择时,他很可能青睐一种他更为熟悉的阵法。由此可见,以程知节为征贺鲁大总管是朝廷的一次失误。657年3月,朝廷以苏定方为大总管再征西北,高宗的这一决策体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为求出师告捷,朝廷将以是否具有将才及作战的充分准备为基础选将,而非以门第高低和与皇家关系作为标准。此次,仍无关于用兵的廷议记载。但从当时情况来看,高宗及其谋臣已经认识到苏定方的用兵经验及其大将之才,足以使他在边战中大获全胜,而这一认识可能是基于从战场上所得之奏报。通过反复尝试的过程,朝廷最终找到领兵边地的良将。

在657年的用兵中,苏定方从用兵策略以及外交方面展示了他对北方边战需求的灵活理解。他亲率主力人马,军中包含来自蒙古的回纥铁骑10,000人,

唐军步兵、骑兵数目不详。阿史那弥设与阿史那步真,皆与贺鲁有宿仇,率领西突厥兵一支沿南线进军,但这一路人马并未参与首战³⁹。苏军主力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北部向蒙古西部的阿尔泰山(金山)北部地区挺进。至于金山北部的具体所指,并不是十分明确,但行军穿越沙漠,草原所经一、二千里中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囊括在内。初时,苏军击贺鲁处木昆部,大破之,其首领懒独禄以10,000帐降唐军。唐史称,苏定方“抚”处木昆部,发其部1,000骑从回纥骑兵,以为联合。尽管传统的史学家用“抚”这一字眼儿是出于一种自诩天朝上国的意识或是对异邦屈尊纡贵的俯就姿态,但苏定方在争取与处木昆部的军事合作这一问题上所作的和谈是非常务实的。

后两军决战于曳咥河,此河流向与阿尔泰山脉南麓并行。按照阿史那社尔在648年用兵中所使用的策略,苏定方派遣唐、回纥联军10,000骑击贺鲁以为诱敌之师。又令步军攒矛外向,列阵南原。自将“汉”骑兵阵于北原,时诱敌一部佯撤,引贺鲁军深入以陷之。贺鲁军攻步军,三冲南原不动,苏定方引预阵于此之骑兵击之。唐史称,敌骑为唐军斩,虏者数以万计。次日,贺鲁属部降苏定方。贺鲁则携数百骑西撤,前往石国苏咄城(位于今吉尔吉斯)。苏定方、阿史那弥设、阿史那步真遂率联军追歼贺鲁于途中,终破之⁴⁰。此战告捷,巩固了唐朝对东突厥的统治,并使唐朝能够对西突厥建立暂时性的统治。

结 论

唐朝所发动的两次成功的西北战事,退一步来讲,也包括那次失败的战事在内,这几次用兵中所运用的策略,有四点是最为突出的。首先,唐军克服了在人迹罕至之地粮草运输的后勤局限性,纵观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这类穿越沙漠,对草原的用兵,时间都限制在90日之内⁴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据我们所知,苏定方行军所经之处大都为缺少绿洲的沙漠和草原地区。从三月到十一月,苏军始终辗转于此,从今内蒙古西部,穿越蒙古西部,新疆北部,直抵吉尔吉斯,历程3,000公里。尽管我们无法侦知对苏军的给养方式,但推测起来,苏军的马匹应该是自由放养的,而且苏军并无因运粮车而延误行程的迹象,而此类事情在程军中是出现过的。苏定方所率领的汉番军多依内亚旧习,即以其兵所乘牲畜作为给养来源。从其他战例中可以获悉,唐军对这种给养方式时有尝试⁴²。而当其以军中牲畜给养时,游牧民族于草原地区作战的战略优势随之丧失。从另

一角度来讲,当常规给养方式可行时,他们就可以对常规军队配给加以利用了,游牧民族于草原地区作战的战略优势也就重新体现出来。程知节在655—656年的用兵中,军中配有运粮车,据推测,粮草是在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中心区的绿洲中得到补给的,而在这一粮草补给地至少发生过一次激战⁴³。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凯旋之师的军事组织形式,这些远征军多由大规模轻骑分遣军组成,至少在一部分战事中,步兵分道击敌。阿史那社尔和苏定方明晰分兵,这种策略在成就其功业的边战中卓有成效。涉及轻骑作战的战事,分兵是大有裨益的。正如格拉夫所指出的那样,分兵可以防止全军中埋伏⁴⁴。另外,分兵可以在击敌时更为灵活机动地调动兵马,并且在一路兵马中埋伏时,其他几路可以对其进行救援,在第二次边战时,苏定方率部营救苏海政的情况正是如此。进一步来讲,按照内亚的后方安排,自由牧马不失为明智之举,这可以使马匹找到足够的草料。上述两个方面相结合,使苏军行动迅速,机动灵活,平均日行11公里,这为其部虏获贺鲁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程知节运用的方阵是一种时代的倒退,那时中国北方军多倚重于步兵和重骑作战。而这种结方阵的军事组织形式,对于内亚作战,且兼以追歼机动灵活的游牧民族敌人之目的军队来说,是不合适的。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由第二个衍生而来的,即阿史那社尔与苏定方佯撤诱敌之策。佯撤加之以兵马的侧翼移动是游牧民族作战的经典组成部分,这有助于形成梯形编制以排兵布阵。尽管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解释阿史那社尔与苏定方为何决议采取这种策略,但他们对边战情形的了解或许对他们的计划具有极大影响。格拉夫近期研究表明,尽管佯撤诱敌之策在中国历史早期战事中就曾出现过,但是,在隋唐时期的战事中,其应用则更为普遍,这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不无关联⁴⁵。佯撤诱敌这一计策在内亚作战中尤为重要,在这一地区作战,对于进攻方来说诱敌出战实属不易。游牧民族对于以阵地战来捍卫领土了无兴趣,对他们来说,牲畜即是财富,而其帐篷则是可以随时转移的。防御强敌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转移帐篷、牲畜,从而远离祸患。7世纪30年代初期,薛延陀在蒙古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抵御阿史那社尔的进攻的。在这里内亚战事的特点得以突出体现。薛延陀以退为进,避免与社尔军交锋,以逸待劳百日,社尔军多疲于追击,大量逃亡,遂将兵大举反攻。另一方面,佯撤也是诱敌出战的有效方法。当然,扪心自问,此举在与游牧民族作战中百试不爽到底是何原因。内亚各部首领想必早已以诫其部——穷寇莫追,李靖在其兵书中亦如是说⁴⁶。然而,游牧民族

军对此类调兵非常敏感,因为他们要从被其所败的敌军那里多掠夺财货分赏其众。佯撤诱敌这一计谋正是利用了士卒的贪念。面对“弱”敌,轻取敌军之事唾手可成,由此诱其兵众不惜违令追击,以求掠其货,终致大意而中埋伏。

关于这两次卓有成效的征伐,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将官通过和谈赢得归降的游牧民族军队合作的能力。社尔与苏定方似乎对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有所了解,从而以此为唐帝所倚重。游牧民族中势力较大的政权,诸如贺鲁之西突厥,社尔在7世纪30年代的部盟,其众形形色色,他们因忠于其首领而聚集在一起。对于其家庭、牧场、战利品等保护,他们则寄希望于其首领。成千上万的内亚牧民以这种政治组织形式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自主独立的趋势会引发政治势力瞬间倾轧。战败后牧民势必对其首领心生不满,他们将随其家庭与牲畜转而效忠他主。牧民们往往会选择一位铁腕首领,这个首领也就成为了部民新的效忠对象。这种现象致使社尔在635年作为东突厥独立首领的地位土崩瓦解。二十多年后,苏定方利用牧民这一政治价值取向取得了原贺鲁部的支持与拥护⁴⁷。唐朝皇帝,更为直接的来说是苏定方,为那些并入苏军的牧民提供了他们所预期的保护及分享战利品的可能性。648年,社尔在攻占龟兹后亦是如法炮制。苏定方与阿史那社尔所建军功及其对军事胜利的有力巩固,与其掌握游牧民族地区政治情况是分不开的。

阿史那社尔、苏定方、程知节的执事经历,使我们得以深刻地认识初唐时期唐军领导的特质。显然,阿史那社尔早年作为草原地区首领的经历为其在边地实施有效统治做了充分准备。诸如社尔等番将,他们成长于北方边镇或内陆亚洲,他们所掌握的兵法对唐朝在北方边陲的成功统治起到了促进作用。唐王朝的上半叶,朝廷继续征募番将,其后代子孙多继续为唐效命,而他们在保持其自身珍贵的作战策略的同时,已经部分上为汉文化所同化。

程知节与苏定方的个案表明中原武贵各有所长,尽管苏、程有着相似的身世,出身地方豪强,隋亡后崭露头角,进而手握重权,但他们的作战特点却大相径庭。苏定方来自北方,精晓轻骑作战,而程知节来自黄河以南,以重骑作战闻名遐迩。初唐时期,他们的不同执事经历是以他们的军事专长及与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的关系为基础的。由于与太宗的亲密关系,程知节的官位升擢更快,他受命领军西南,这是基于他熟悉步兵和重骑作战而决定的。反观苏定方,他在官位上升擢较慢,而且显然是在建功于沙场之后才得到提拔的。程知节与苏定方在645—655年间开始共事军中,当时二人皆为京畿禁卫军高官及征讨贺

鲁的大将。他们在西北战事中的不同结局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解释。苏定方自幼成长于北部边陲,这使他对轻骑作战更为熟悉。630年,征伐东突厥,他在战场上成功解决了唐与草原游牧民族敌人的冲突。另外,苏定方是一位更具军事禀赋的良将,而程知节则更多的以其在政治上的聪明才智赢得升擢,这造就了他与太宗异常亲密的关系。

边地生活经验在朝廷任命边将时似乎不失为一个重要标准。太宗显然深知阿史那社尔有能力统领一支主要由游牧民族兵卒组成的兵马来征讨龟兹,而龟兹其地正处于其前统治地区可汗浮图成(Beshbaliq)和吐鲁番。如果太宗对社尔稍有疑心,那么社尔在645年征高句丽以后就被弃置不用了。高宗继位后,他要在其父所用的将领中择其良者挂帅出征。最初,他以程身居高位兼为皇室亲眷的缘故,青睐程知节。后程知节出师不利,他转而启用了善于将兵边战的苏定方。这其中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高宗靠反复尝试为特定的军队选将。至少从程知节的个案来看,高宗期望选用一位缺乏边疆生活经验的将领,但却对出师不利没什么耐性。程知节兵败削职,不久再次起用,拜刺史,这对他是更为适合的。因而,通过反复尝试,高宗朝最终得以选择出边战良将——能够有效控制北方边疆的苏定方。

如果我们放眼于本课题所研究的三个个案,不难看出阿史那社尔和苏定方,较之程知节更具为将的典型性。尽管要在相对简要的大会文本中,在这一问题上做到面面俱到,近乎天方夜谭,但是在唐王朝与北方边疆的交往中,涌现出大量不同民族的将领,他们在对草原游牧民族劲敌作战中有出色表现。北方的汉族将领,诸如与草原游牧民族敌军作战的苏定方,在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中,是很容易了解草原地区的军政传统的。汉番共同用事于唐朝的京畿禁卫军及北方边府,这为汉将提供了更多与阿史那社尔等内亚将领们相交结的机会。同样,汉番结合也使番将能够适应中原军队的组织形式。大量来自北方、内亚及其之间的边地合格应征者涌向唐朝廷,皇帝自然不难从中选择善于边地作战的将领。而从扩张的角度来讲,北方是唐代在开疆拓土上最为成功的地区,究其原因,上述最后一点为其作出了解释。

初唐,特别是对于一个多民族将领混合领导团体的形成,是一个关键时期。这种汉番结合的军事领导机制的形成,成功推进了帝国的对外扩张。唐朝早期的统治者决议征募多民族混合军来防御北方边陲。这些政令在无意中为将官通过军事操练成为适合边疆作战的骁勇提供了沃土。最初的边境政策出台之后,

士卒自发为适应北方边战而进行操习。在没有城墙的边境地区,不断发展的边疆交流,使得那些来自草原的新兵了解到如何应对内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威胁。尽管数历兵败,但是这些边疆交流在756年以前为唐王朝培养了大量极富韬略的兵将,他们因军功而青史留名。

〔注 释〕

- 1 756年,安史之乱的爆发迫使朝廷放弃对其东北、西北大部分领土的控制,此后,唐王朝的广袤领土大幅度缩小。
- 2 参见 Denis Twitchett, 1961 及 1962。
- 3 Albert E. Dien, 1972, pp. 39-40.
- 4 《旧唐书》,卷六八,页2503;《新唐书》,卷九〇,页3773; Howard Wechsler, 1979, pp. 166-167。
- 5 《旧唐书》,卷二,页29,卷六八,页2504;《新唐书》,卷九〇,页3773; Wechsler, 1979, pp. 182-187; Howard Wechsler, 1974, pp. 67-68。
- 6 《旧唐书》,卷六八,页2504;《新唐书》,卷八三,页3647,卷九〇,页3773。
- 7 《旧唐书》,卷六八,页2504;《新唐书》,卷九〇,页3773。
- 8 《旧唐书》,卷八三,页2777;《新唐书》,卷一一一,页4136—4137; Wechsler, 1979, pp. 167-168。
- 9 Wechsler, 1979, pp. 182-183。
- 10 Howard Wechsler, 1979, pp. 193-194。
- 11 《旧唐书》,卷八三,页2777;《新唐书》,卷一一一,页4136—4137;张沛,《唐折冲会考》,页336。
- 12 《旧唐书》,卷八三,页2777;《新唐书》,卷一一一,页4136—4137; David Graff, 2002, pp. 53-54。
- 13 《旧唐书》,卷八三,页2777;《新唐书》,卷一一一,页4137。
- 14 《新唐书》,卷一一一,页4137。征高丽战事,参见. Pan Yihong, 1997, pp. 215-217。
- 15 Robert des Rotours, 1974, p. 503。
- 16 此说在裴行俭列传中有所提及(《旧唐书》,卷八四,页2801;《新唐书》,卷一〇八,页4085—4086)。其列传中称裴行俭独得苏定方之所学,此举意在壮裴行俭之声名,未免夸大其词。
- 17 《旧唐书》,卷二八,页1047。
- 18 《旧唐书》,卷一〇九,页3290。
- 19 王溥,《唐会要》,卷二三,页346。

- 20 《旧唐书》，卷一〇九，页3288—3289；《新唐书》，卷八三，页3644，卷一一〇，页4114；Edouard Chavannes, pp. 174—175。
- 21 参见David Graff, 2002并Andrew Eisenberg, 1997。
- 22 可汗浮图城是此市镇后来的回纥名。为唐军攻占之前，称可汗浮图城。唐军破之，更名北庭。Jonathan Skaff, 2002。
- 23 《旧唐书》，卷一〇九，页3289；《新唐书》，卷一一〇，页4114；Edouard, Chavannes, p. 175。
- 24 《旧唐书》，卷一〇九，页3289；《新唐书》，卷一一〇，页4114；Edouard, Chavannes, p. 175。《645年征高丽事》，见注释14。
- 25 突厥统治，参见Jonathan Skaff, 2002。
- 26 唐王朝终在新疆占据了有利形势，而此举劳民伤财，是为险着。然而，出于战略因素的考虑，朝廷决议先行拓展西北地区领土。参见Jonathan Skaff, 1998，第二章。
- 27 《旧唐书》，卷一九八，页5303；《新唐书》，卷二二一下b，页6230，6232；Edouard Chavannes, p. 118。
- 28 《旧唐书》，卷一〇九，页3289；《新唐书》，卷一一〇，页4114；《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页6261；Edouard Chavannes, p. 175。
- 29 《旧唐书》，卷一〇九，页3289；《新唐书》，卷一一〇，页4114；《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页6264—6265；Edouard Chavannes, p. 175。
- 30 《旧唐书》，卷一〇九，页3289；《新唐书》，卷一一〇，页4114；《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页6261；Edouard Chavannes, p. 175。
- 31 《旧唐书》，卷一〇九，页3289；《新唐书》，卷一一〇，页4114；《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页6262—6265；Edouard Chavannes, p. 175。
- 32 此名单，参见注释5。关于侯君集，见《旧唐书》，卷六八，页2509；《新唐书》，卷九四，页3825—3828。
- 33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页6298；《新唐书》，卷215，页6062。
- 34 唐朝的地理资料中并没有提及恒笃城。旧唐书苏定方列传中称之为恒笃城。《旧唐书》，卷八三，页2777。
- 35 史学家司马光，参见Edwin G. Pulleyblank, 1950。
- 36 李靖兵法中的一部分提到过这种方阵（杜佑，《通典》，卷一五七，页4028—4029）。关于方阵的其他图示可以在李筌所著八世纪唐朝兵书《太白阴经》中找到，卷六。
- 37 David Graff, 2005。
- 38 其后为朝廷再度起用。尽管有些人对于苏定方列传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其疑问在于苏定方传是否能够做到真实地叙述整个事件，而相对于其对手程知节与王文度，对苏定方无所偏私。然而其传记中多处表明从苏定方角度来叙述的事件是具有可信

性的。根据苏定方列传,王文度以矫诏获罪,程知节以贻误战机致使阿史那贺鲁脱逃治罪(《旧唐书》,卷八三,页2777;《新唐书》,卷一一一,页4136—4137)。而程知节列传则证实了他以致贺鲁遁获罪(《旧唐书》,卷六八,页2503—2504;《新唐书》,卷九〇,页3773)。最后,司马光在其所著编年史《资治通鉴》中认同了苏定方事(卷二〇〇,页6299)。而司马光正是以严审其所用资料著称的。有时,司马光的优势在于其对遗失史料的研究,这种研究或许使其接受关于苏定方的叙述(见 Edwin G. Pulleyblank)。

- 39 《旧唐书》,卷八三,页2778;《新唐书》,卷一一一,页4137;《资治通鉴》,卷二〇〇,页6301。
- 40 《旧唐书》,卷八三,页2778;《新唐书》,卷一一一,页4137—4138;《资治通鉴》,卷二〇〇,页6305—6306。由于唐朝在651—652年用兵80,000,贺鲁率军100,000,这个数目并不是很大,也不存在夸大之处。
- 41 Peter Perdue, 1996, p. 776.
- 42 Jonathan Skaff (forthcoming).
- 43 此战包括苏定方速袭突厥兵马,援苏海政一事。
- 44 David Graff, 2005.
- 45 David Graff, 2005.
- 46 David Graff, 2005.
- 47 John Masson Smith, 1978, p. 60; Rudi Lindner, 1982, p. 700.

参 考 文 献

- Chavannes, Edouard,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recueillis et commentés. Suivi de notes additionnelles* (西突厥史料), Taipei, [1900] repr. 1969.
- Eisenberg, Andrew, "Warfare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Medieval North Asian Regimes" (中古时代北亚国家的战争与政治稳定), *T'oung Pao* 83, 1997, pp. 300—328.
- Graff, David, "Strategy and Contingency in the Tang Defeat of the Eastern Turks, 629—630" (唐王朝战胜东突厥之策略及可能性, 629—630年), in *Warfa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 (500—1800)* (亚洲腹地战争史, 500—1800年), edited by Nicola Di Cosmo, Leiden, 2002, pp. 33—71.
- , "Li Jing's Antecedent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Pragmatics of Medie-

- val Chinese Warfare” (李靖之先例:中古时代中国战争语用学之沿革),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Chicago, 2005.
- 旧唐书,刘昫等编,卷十六,北京,[945]1975再版。
- 李筌,《太白阴经》(1821—1850),守山阁丛书,中国图书集成2,北京,沈阳,1988。
- Lindner, Rudi, “What Was a Nomadic Tribe?” (什么是突厥游牧民族?),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4, 1982, pp. 689–711.
- Pan, Yihong, *Son of Heaven and Heavenly Qaghan: Sui-Tang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天子与天可汗:隋唐时期的中国及其邻国), Bellingham, WA, 1997.
- Perdue, Peter C., “Military Mobilization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中俄蒙七八世纪的军事转移), *Modern Asian Studies* 30, 1996, pp. 757–793.
- Pulleyblank, Edwin G., “The Tzyhjih Tongjiann Kaoyih and the sources for the period 730—763” (资治通鉴考义及730—763年间的资料),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3, 1950, pp. 448–473.
- Rotours, Robert des, *Le 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de l'armée; traduit de la Nouvelle Histoire des Tang* (ch. XLVI-L) (《新唐书·百官志》和《新唐书·兵志》的法文译注, XLVI-L章), 2nd ed.,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6, 2 vols, San Francisco, 1974.
- Skaff, Jonathan Karam, “Barbarians at the Gates? The Tang Frontier Military and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门外的异族人:唐代边疆及安史之乱), *War and Society* 18, no. 2, 2000, pp. 23–35.
- , “Straddling Steppe and Sown: Ta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Nomads of Inner Asia (640—756)” (横跨草原与农耕区:中国唐朝与内陆亚洲游牧民族的关系, 644—756),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8.
- , “Survival in the Frontier Zon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Identity and Political Allegiance in China's Inner Asian Borderlands During the Sui-Tang Dynastic Transition (617—630)” (在边疆求生:隋唐交界时期中国内陆亚洲边疆的特征与政治效忠之比较),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5–2, 2, 2004.
- , “Tang Military Culture and Its Inner Asian Influences” (唐朝军事文化及其在内陆亚洲之影响), in *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 (中华帝国军事

- 文化), edited by Nicola Di Cosmo, Cambridge, MA (forthcoming).
- , “Western Turk Rule of Turkestan’s Oases in the Sixth through Eighth Centuries” (6—8 世纪西突厥对突厥绿洲国度的统治), in *The Turks* (突厥), edited by Halil Inalcik, Ankara, 2002, pp. 364 – 372.
- Smith, John Masson, “Turanian Nomadism and Iranian Politics” (突厥的游牧业与伊朗政治), *Iranian Studies* 11, 1978, pp. 57 – 81.
- 《通典》, 杜佑, 王文锦等编, 卷五, 北京。
- Twitchett, Denis, “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 (中国传记写作), in *Historians of China Japan* (中日历史学家), edited by 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London, 1961, pp. 95 – 114.
- , “Problems of Chinese Biography” (中国传记存在的问题), in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儒教人物), 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C. Twitchett, Stanford, 1962, pp. 24 – 39.
- 王溥,《唐会要》, 卷二, 上海, [961] 1991 再版。
- Wechsler, Howard,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Kao-Tsu (Reign 618—626)” (唐朝的建立: 高祖(618—626 在位)),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剑桥中国史), Vol.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Part 1*,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U. K., 1979, pp. 150 – 187.
- Wechsler, Howard J., *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 (帝鉴), New Haven, 1974.
- 《新唐书》, 欧阳修编, 卷二〇, 北京, 中华书局, [1060] 1975 再版。
- 张沛,《唐折冲府汇考》, 西安, 2003。
- 《资治通鉴》, 司马光编, 卷十, 北京, 中华书局, [1084] 1956 再版。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 出土两件汉文碑铭考释

——兼论唐朝经营西域中疆臣的作用

周伟洲 著

20 世纪 80 年代,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 8 公里的阿克别希姆(City site Ak-Beshim)古城遗址出土了两件镌刻有汉文的碑石。其一是先后任过唐安西都护、安西副都护的杜怀宝,为其亡父母及众生暎福造像碑之基座;其二是残存约 40 余字的残碑石。承蒙新疆考古所于志勇先生寄赠碑铭拓片,并嘱代为考释。

一 唐杜怀宝造像碑基座题铭考释

出土安西副都护杜怀宝造像碑基座题铭,系红色花岗岩质,呈八角形,厚约 11 厘米,宽约 32.6 厘米,高约 13.5 厘米。下有础柱头。此造像题铭出土后,先后有俄罗斯汉学家斯普尔南科(G. P. Suprunenko)、日本学者林俊雄、内藤みとり等撰文¹,对题铭作了介绍和考释。其中尤以内藤みとり考释研究较为深入。1998 年新疆考古研究所于志勇将内藤みとり发表的论文编译后,发表于《新疆文物》,1998 年第 2 期上²。

据上引内藤みとり文及参照题铭拓片(照片),先将题铭辨识如下(见彩图1):

- (第一行) 安西副都
 (第二行) 护碎叶镇压
 (第三行) 十姓使上柱国
 (第四行) 杜怀宝上为
 (第五行) 天子 一下
 (第六行) 为 妣
 (第七行) 见 使
 (第八行) 法界 生普
 (第九行) 愿平安获其
 (第十行) 暝福敬造一佛
 (第十一行) 二菩萨

据此题铭,可知此乃时任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的杜怀宝,为天子、众生及父母冥福而造的一佛二菩萨像之基座。石像基座上的“题铭”,准确地说,应称之为“发愿文”;在古代中国北方此类祈福之造像碑较为流行,或为单独之释迦造像,或为一佛二菩萨之深浮雕一体造像,而其上之题铭(发愿文)一般都书有纪年。由于此基座残缺及石佛像不存,故未发现纪年之类的文字。

关于杜怀宝其人,现存史籍中,如上述研究者所征引,仅在有关于王方翼(623—685)的史料中,有所提及。为便于讨论,兹引证如下:

其一,《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传》记:

裴行俭讨遮旬,奏为副,兼检校安西都护,徙故杜怀宝为庭州刺史。方翼筑碎叶城,面三门,纡还多趣以诡出入,五旬毕。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货。未几,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遂失蕃戎之和。³

其二,《文苑英华》卷九一三《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又见《张说之文集》卷一六):

裴吏部名立波斯,实取遮旬。伟公威厉,飞书荐请。诏公为波斯军副使、兼安西都护、上柱国,以安西都护怀宝为庭州刺史。大城碎叶,街郭回

互,夷夏纵观,莫究端倪。三十六蕃承风谒贺。洎于⁴海东肃如也。无何,诏公为庭州刺史,以波斯使领金山都护,前使杜怀宝更统安西,镇守碎叶。朝廷始以镇不宁蕃,故授公代宝,又以未(原注:集作“求”)不失镇,复命宝代公,夫然有以见诸蕃之心摇矣。

事实上,以上两处记载为同一事,王方翼神道碑略详于《新唐书》本传。关于裴行俭(619—682)以册送波斯王子泥涅斯为名,征讨西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旬等反乱一事,《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及《张说之文集》卷一四《裴行俭碑》均记为唐高宗仪凤二年(677)时事。此年当为都支、遮旬反乱之时,平乱在调露元年(679)六七月间,九月献俘⁵。值得注意的是,在裴行俭任安抚大食使,册送波斯王子时(约在仪凤三年底至四年初,仪凤四年(679)六月十三日改元为调露),荐王方翼为“波斯军副使、兼安西都护、上柱国,以安西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金山都护⁶。此为杜怀宝首次出现于史籍,其籍贯、身世不明,仅知其在调任前为安西都护。而造像碑铭记其职为“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此乃杜怀宝不可能在仪凤三年末至四年初之前于碎叶造此造像碑的根据之一。

根据之二,即如内藤みとり所说,当时的安西都护治所不在碎叶,也未曾管辖到碎叶。唐安西都护府初治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贞观二十二年唐平龟兹(今新疆库车),移治于龟兹,始统于阗、疏勒、龟兹、焉耆四镇⁷。到高宗咸亨元年(670),吐蕃势力北上,“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于是安西四镇并废”⁸。此时之安西都护府治所,与永徽年间(650—656)第一次放弃四镇时一样,由龟兹迁回到西州。至上元年间(674—676),唐朝在西域的势力有所恢复,先后设置或复设毗沙都督府(本于阗国,今新疆和田)、疏勒都督府(今新疆喀什)、焉耆都督府(今新疆焉耆附近),但四镇并未恢复⁹。一直到调露元年(679),裴行俭、王方翼平定西突厥都支、遮旬之乱后,始重置四镇,并以碎叶代焉耆为四镇之一¹⁰。因此,在王方翼代杜怀宝为安西都护之前,安西都护府治所在西州,时任安西都护杜怀宝不可能在碎叶造此造像碑。

唐朝为何要采取将杜怀宝由安西都护任内调至庭州为刺史的措施呢?据上引《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说:“朝廷始以镇不宁蕃,故授公代宝”。即是说,原安西都护杜怀宝所镇之地(西州)非西突厥十姓所居之地,且对镇压十姓反乱多有不便(“镇不宁蕃”);而此时王方翼随裴行俭到碎叶平定十姓之乱,故令方翼代杜怀宝为安西都护。杜由西州赴任也正便捷,并作裴行俭、王方翼之声援。

调露元年(679)六七月,裴行俭平定西突厥十姓可汗都支等反乱后,时任安西都护的王方翼在碎叶,用“五旬”时间,重筑碎叶城,“街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端倪”。此时,碎叶始代焉耆列为四镇之一。此镇深入西突厥十姓居地之中,成为控制中西交通和统御十姓之重镇。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唐朝又立即将王方翼、杜怀宝相互对调(见上引《新唐书·王方翼传》及《神道碑》)。这次互调之原因,据《神道碑》说是“又以未(或作‘求’)不失镇,复命宝代公。”按文意,似乎是为了保住新列为四镇之一的碎叶,不再落入十姓之手,故以宝代方翼。

关于王、杜再次互调的时间,约在调露元年底至二年初,内藤みとり推测基本可信。调动后的职任,王方翼是清楚的,即由安西都护调任为庭州刺史、金山都护,升为波斯(军)使,属于平级调动。而杜怀宝之任职,据上引史料则较为含混,“更镇安西”,或“更统安西,镇守碎叶”,似乎首先考虑到的是杜继王为“安西都护”。虽然,安西都护治所在龟兹,但方翼为安西都护时驻碎叶,故杜继任安西都护,镇守碎叶,也有先例可循。可是,出土的杜怀宝造像题铭明记其为“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是否唐朝先以怀宝为安西都护,后又降其为安西副都护呢?因其任此职时间较短,故这种再次降职任命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排除因怀宝“遂失蕃戎之和”,而被很快降职的可能性。即是说,在调露元年末或二年初,怀宝与方翼对调之职任是“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驻地在碎叶,也即是造像碑基座出土的阿克别希姆古城。

“碎叶镇压十姓使”,显然是唐使职中的一种,不见于记载。内藤文中,一再强调此使即“碎叶镇守使”和“镇压十姓使”之意,且说题铭中可能省缺字。此说不确,因为在调露元年碎叶列为四镇之一后,唐朝还未曾设置“碎叶镇守使”一职。此职最早见于记载,是在武周延载元年(694)二月,有“碎叶镇守使韩思忠”¹¹。显然,是长寿元年(692)王孝杰(?—696)一举复取四镇后,为加强对西突厥的控制和抵御吐蕃势力而设置的。又从碑题铭看,决无漏损字的可能。因此,杜之造像题铭中的“碎叶镇压十姓使”决没有“碎叶镇守使”的职名在内。碎叶,表示镇守地点;“镇压十姓使”之“十姓”,自然指西突厥十姓(又称“十箭”),即居碎叶以西的五弩失毕部,以东的五咄陆部。

又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杜怀宝造像题铭中的职名之“镇压”二字连读不妥,“按‘镇压’二字连读乃近代的事,古无前例。且‘碎叶镇压十姓使’之名亦不见于唐朝其他诰制典章,我以为‘压’字同‘押’。据此杜怀宝的官号应读作‘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押)十姓使、上柱国’。这一官号实为‘安西副都护、碎叶镇

守使、押十姓使’之简称。绝不可将‘镇压十姓使’作一官名理解,因为唐朝既真的进行镇压也总之以招慰、安抚等名义出现的”¹²。按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说“镇压”一词是近代才有的事,古无前例,不确。“镇压”一词古已有之。如东汉班固《西都赋》有“禽相镇压,兽相枕籍”;《晋书》卷四二《唐彬传》记有:“今诸军已至,足以镇压内外,愿无以为虑”;《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记:“……其酋长咸谏曰:‘今新得西方,须留镇压。’”¹³其次,所谓隋唐时,“押”某蕃落使之官号之“押”与“镇压”一词意相同,也非与招慰、安抚之类词类同。何况当时西突厥十姓“不宁”,确需“镇压”。因此,将杜怀宝造像题铭中的官号按原文释为“碎叶镇压十姓使”,更忠实于原意,是可以成立的。以上两说可以并存,仁者自见;不过笔者还是倾向于原文,以为“碎叶镇压十姓使”为胜。

至于杜怀宝任此职到何时,也即此题铭时代的下限是何时?史籍未载。不过,到武周垂拱二年(686),据史载,因西突厥再次反叛,“安西不宁”,武周朝遂“拔四镇”(即退出四镇),再次放弃四镇¹⁴。如果杜怀宝仍镇守碎叶的话,此时也一定退出了碎叶。若以上推测不谬,则出土的杜怀宝造像(基座)当镌刻于调露元年末二年初至垂拱二年(679—686)之间。

杜怀宝造像基座题铭的发现,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最终确定了唐代碎叶的地理位置,在今托克马克阿克别希姆古城遗址。其余关于唐代于这一时期经营西域疆臣的作用等问题,容后再叙。

二 阿克别希姆古城遗址出土残碑考释

据说,在20世纪80年代,一名摄影爱好者在阿克别希姆古城遗址发现了一砂岩质的残碑,长30厘米,宽20厘米,厚4厘米。上残留汉字(可辨认者)约40余字。现转录于下(见彩图2):

- (第一行) 布微渥无涯而□□
- (第二行) 前庭与后庭伊戛尔之
- (第三行) 物以成劳乃西顾而授钺
- (第四行) 逐别蹄林而已远望阴山
- (第五行) 祭天之旧物览瑶池之仙图
- (第六行) □边俄指期于

皇

托克马克的阿克别希姆古城遗址,过去中外学者大多推定为唐朝西边重镇碎叶城。又因该遗址出土唐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杜怀宝为其亡父母造像碑题铭基座,而得到确认。而碎叶在唐朝直接控制之下,为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也仅有四十多年。残碑与杜怀宝造像基座均出土于碎叶城的遗址之中,其字体与风格也与内地唐碑及出土基座相似,故其时代也与基座相当。

唐代经营西域,在西边重镇碎叶仅有过一次立碑的记载,见两《唐书》的《裴行俭传》和张说撰《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等¹⁵。事实是唐高宗仪凤二年(677),西突厥自称十姓可汗的阿史那斛延都支和李遮旬,联合吐蕃,攻逼唐之安西。唐朝在咸亨元年(670)因吐蕃的进逼,废安西四镇(龟兹、焉耆、疏勒、于阗)¹⁶,安西都护府(治龟兹)失陷,故唐朝迁安西都护府还治于西州。但到上元年间(674—676),唐朝在西域的势力有所恢复,先后重置或新置毗沙都督府、疏勒都督府、焉耆都督府;但安西四镇并未恢复。

到上述的仪凤二年,西突厥都支、遮旬联合吐蕃,势力增长,攻逼安西都督府(时应治西州),西域岌岌可危。唐朝自然是不能坐视,轻易放弃西域。因此,在调露元年(679年,在仪凤四年六月改调露)初,唐高宗听从吏部侍郎裴行俭的建议:以册送在京为质的波斯王子泥涅斯归国为名,乘机平定西突厥都支、遮旬之乱;遂以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行俭又荐王方翼为副手,以检校安西都护代原安西都护杜怀宝。裴行俭、王方翼一行经莫贺延碛(今甘肃敦煌以西至新疆一带戈壁),至西州。因行俭曾任过西州长史和安西大都护,故得到旧吏、百姓的拥护,因召集豪杰子弟得万人,假为行猎,使都支不设备,然后倍道至都支处。都支率儿侄及首领五百余骑来营敬谒,裴行俭遂擒之,护送碎叶。后又以精骑袭遮旬,谕其降。

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一九一号墓出土的《唐永隆元年(680年)军团牒为记注所属卫士征镇样人及勋官籤符诸色事》文书¹⁷,记录了永隆元年前几年征调西州府兵卫士征镇(即派出参加征战)、防戍(文书所记之“捉道”、“守囚”等)卫士之名录,下注录有“送波斯王”、“安西镇”、“庭州镇”等征镇情况。其中,“送波斯王”共残存四例。显然,此“送波斯王”事,即是指永隆元年前一年调露元年,裴行俭等以送波斯王子泥涅斯返国为名,平定西突厥都支、遮旬之乱事。因此,内一名卫士白欢进因功“进上轻车(都尉)”的勋位,并“签符到府”,即履行取得蠲免的凭证¹⁸。这件文书也证实了唐代史籍所载,裴行俭以送波斯王子为

名,平息都支、遮旬反乱的事件。据史籍载,平息反乱后,“于是将吏已下,立碑于碎叶以纪其功,擒都支、遮旬而还”¹⁹;或谓“华戎相庆,立碑碎叶”²⁰。此乃史籍所载唐于碎叶所立的惟一一块碑的情况。时在调露元年六至七月间,九月献俘。同年,唐始复四镇,并以碎叶代焉耆备四镇之一。接着,王方翼重筑碎叶城,“五旬而毕”。

现再考察出土残碑所余文字,因碑四周均残,文意难以完全通晓。

碑首行存“布微澤无涯而□□”,澤,读作 gáo,泽也。“布微”接上句,下句是说有大泽无涯,十分宽广意。

第二行存“前庭与后庭。伊叢尔之……”数字。前庭、后庭之“庭”,是否指“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不能肯定。“叢尔之……”之“叢”,应为“叢”之异体字。叢尔,小之意。此显然指反叛的西突厥都支、遮旬,且为唐朝“讨伐”其反叛的用词。

第三行“物以成劳”接上句,语不明;下句“乃西顾而授钺”,按文意是指裴行俭(或其他人)为解决朝廷“西顾”之忧,而“授钺”,即被授与征伐的任务。钺,一种表示兵器的青铜礼器。

第四行“逐别蹕林而已(已)”,蹕林,应即秦汉以来漠北匈奴秋社八月中会祭处。《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所谓:“秋,马肥,大会蹕林,课校人、畜计。”其地当在漠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似乎与唐西突厥无关。其实,唐人官私文书、史籍,往往借匈奴的族名、地名来指北方的突厥、回纥等。如前引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记,调露元年(679)十月,原东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博、奉职二部反唐。高宗命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之。《神道碑》记此事云:“至朔州,斥候相接,匈奴故态,狙劫粮以喂师……”。内“匈奴”即借指东突厥温博、奉职二部。“逐别蹕林而已”似接上句,意为将反叛的都支、遮旬逐出其根据地。“远望阴山”,此阴山也与蹕林一样为匈奴故地,此处借指西突厥故地。

第五行“祭天之旧物,览瑶池之仙图”,意接上下句,不甚明。

第六行“□边”接上句,不明。下“俄”(或为“我”)指期于……皇”,为一般朝廷檄文或记功之类的常用词,意为“指期”剿灭、攻灭反乱。

从以上六行残文分析,其中“叢尔之……”,“乃西顾而授钺”,“逐别蹕林”,“远望阴山”,“俄指期于……”等片言只语,基本符合唐朝廷任命裴行俭以册立波斯王子归国为名,实为平定西突厥都支、遮旬反叛的事实,以及纪功碑之文体。

再参以前述裴行俭平都支、遮旬后,曾立碑碎叶的记载。使人不得不认为,此残碑很可能就是裴行俭在碎叶所立纪功碑残石。

史称裴行俭“文武兼备”,“工草隶,名家。帝尝以绢素诏写《文选》,览之,秘爱其法,贲物良厚”。且自言:“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余与虞世南耳。”²¹碎叶之纪功碑,虽云裴行俭将吏所立,但书此碑者也很有可能即裴行俭本人。残碑文字妍丽多姿,略带行草,自然有力,如确系裴行俭所书,其价值当倍增也。

总之,出土于唐碎叶遗址(即阿克别希姆古城遗址)的唐代残碑,无论从史籍所载唐立碑碎叶,或是从残留文字的分析,均可断此残碑为唐调露元年裴行俭平西突厥都支、遮旬之乱后,于碎叶所立纪功碑之残石;碑文也有可能系裴行俭本人所书写。如以上考证能成立,则此残碑为唐朝经营西域碎叶又一历史见证,其意义和价值均无法估量。

三 从阿克别希姆古城遗址出土两残碑 看唐朝经营西域中疆臣之作用

阿克别希姆古城遗址出土的两件汉文碑铭,是唐高宗(649—683)至武周(684—704)时期唐朝经营西域的历史见证。它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学术界未有定论的一些学术问题(如碎叶城的地理位置等),而且反映出唐朝经营西域过程中疆臣的活动情况。以上两种残碑碑铭涉及的疆臣有三人,即裴行俭、王方翼和杜怀宝。前两人在两《唐书》均有专传,事绩较详,均为唐代名将。

唐朝在高宗及武后(684—704)执政时期,凭借“贞观之治”之厚积,积极开拓西疆,灭西突厥汗国,锐意经营西域。从残碑及史籍所载,朝廷时任命经营西域之疆臣,多为文武兼备之名将。

其中,裴行俭,在高宗仪凤年间(676—679)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与吐蕃联合,西域动摇的形势下,向朝廷献策,以策立波斯王子泥涅斯为名,进军西域,用计擒都支,袭获遮旬,平定西域之乱,刻石碎叶以记功。后高宗亲自劳宴时说:“行俭提孤军,深入万里,兵不血刃而叛党禽夷,可谓文武兼备矣。”²²史称行俭“善和人”,善用人。其引荐名将王方翼即为一例。《新唐书》本传说:其“所引偏裨,若程务挺(?—685)、张虔勗、崔智誉、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707)、黑齿常之(?—689),类为世名将,廉奏至刺史将

军者数十人”。

王方翼则随裴行俭平定西突厥十姓之乱,镇守碎叶。特别是在永淳元年(682)二月西突厥十姓阿史那车簿啜又起兵围弓月城(今新疆霍城),时任安西副都护的王方翼率军平叛,“献捷无虚岁,蹙车簿于弓月,陷咽窈于热海(今伊塞克湖),剿叛徒三千于麾下,走乌鹘十万于城(集作“域”)外,皆以少覆众,以诚动天”²³。次年,高宗引见方翼,“见衣有汗濯处,问其故,具对热海苦战状。视其创,帝咨嗟久之”²⁴。

杜怀宝,其先后任安西都护,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史称其任内“遂失蕃戎之和”²⁵。即是说,杜怀宝镇碎叶时,不能很好地抚慰西突厥十姓;但其在西域任职时间较长,然功远不及裴、王两人。因史籍阙如,详细情况已不得而知。

从总的方面看,高宗及武后执政时,唐朝在西域的势力远远扩展至碎叶以西,多次平定西突厥十姓贵族与吐蕃的反乱,安定了西域的局势。特别是在武周长寿元年(692),王孝杰一举收复四镇,使唐在西域的势力进一步巩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高宗、武后能够善于选择有才干之疆臣边吏,使之立功西陲。这正如《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薛仁贵(614—683)等名将诸传后“赞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为之牙距也。至师行数千万里,穷讨殊斗,猎取其国内鹿豕然,可谓选值其才欤!”

其次,这一时期唐朝在西域任用的疆臣边吏,大多是文武兼备,既是英勇无比之虎将,又是富于谋略的文臣。上述裴行俭即为代表人物之一。史称其“工草隶,名家……所撰《选谱》、《草字杂体》数万言。又为营阵、部伍、料胜负、别器能等四十六诀”;“通阴阳、历数,每战豫道胜日。”²⁶上述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残碑,如可真为其书写之纪功碑,则从此可睹其书法之风采。而转战万里、勇猛无比的王方翼,也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才,史称其“善书,与魏叔琬齐名”。²⁷这种情况,应是初唐以来,国内人才培养之特点,时代要求亦然。

此外,《资治通鉴》的撰者对安史之乱前,唐朝边臣将帅的任用变化有一段精彩的论述²⁸:

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

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并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

上述武后时,经营西域的几个主要的疆臣裴行俭、王方翼、杜怀宝等人的情况,大致符合开元前唐朝任用疆臣、将帅的情况。如他们均系汉臣,不久任,经常调换,事毕后,多调回内地;亦无遥领和兼统,与开元,乃至天宝年间所任边臣、将帅情况不同。

第三,这一时期唐朝在西域的疆臣,主要的作用是在军事上平定西突厥十姓贵族和吐蕃的联合反乱,以安定西域的局势。与此同时,唐朝的疆臣们也将中国内地的传统文化传入了边远的中亚地区。如王方翼任安西都护后,立即“大城碎叶,街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端倪。三十六蕃承风谒贺”;此城“面三门,纡还多趣以诡出入,五旬毕。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货”。即是说,王方翼所筑(或改筑)之碎叶城,每面(或四面)有城门三个,城内街道回互,是仿中国内地城市建筑格局而建。自然引起西域胡人的惊奇,纵观而莫测其方略。因此,国内学者多以为此系中国城市建筑形式传入中亚之始。

又据《通典》卷一九三引杜环《经行记》说:“又有碎叶城,天宝七年(748)北庭节度使王正见簿伐,城壁推毁,邑落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处建大云寺犹存”。论者一般以此为碎叶城衰落之始。内云“大云寺”,遗址已在阿克别希姆古城遗址中发现。²⁹这是因武则天欲利用佛教为其革命制造舆论,下令于诸州及两京各建大云寺,地处西域的碎叶也建寺。杜怀宝造像题铭基座的发现,再一次证明当时已成为唐朝边远重镇的碎叶,因疆臣的缘故传入了中国内地佛教的信仰。而造像碑的形成,是自北魏以来黄河流域上至贵族、官吏,下至村邑百姓祈福、冥福的一种常见的佛教信仰形式,能在西域远镇碎叶造像冥福,亦可见内地佛教西传的轨迹。

〔注 释〕

- 1 内藤みとり,アクベシム发见の杜怀宝碑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4,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ヤソター研究纪要,中央アジアの佛教遗迹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ヤソター編集发行,1997年3月31日。林俊雄,天山北麓的佛教遗址,Dal-

- vazhintipa DT25 1988—1993 年发掘报告,日本创价大学、The Khamta Fine Arts Research Centre 合作出版。按林文仅在补注中提及此碑铭,并附照片。
- 2 于志勇编译,《吉尔吉斯斯坦发现杜怀宝碑铭》,载《新疆文物》1998 年第 2 期,页 102—108。
 - 3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 4802—4803,内容约同,不赘引。
 - 4 原注:“泊于”二字集作“自泊汗”,似应为“泊瀚”,则此句应为“泊瀚海东肃如也”。
 - 5 详细考证见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页 58。
 - 6 《新唐书·王方翼传》说,方翼徙庭州,“而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故知怀宝由安西都护调任为庭州刺史、金山都护。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 4135。
 - 7 按贞观二十二年唐初置四镇中,有焉耆或是碎叶,至今中外学者意见分歧。笔者主张无碎叶,而有焉耆,见拙作《略论碎叶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事实》,载《新疆历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页 135—150;后收入作者《西北民族史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页 189—196。关于此问题的讨论情况,可参阅吴玉贵《唐安西都护府史略》,载《中亚学刊》第 2 辑,中华书局,1987,页 76—135。
 - 8 见《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页 6076。此时之四镇是:龟兹、于阗、疏勒、焉耆,见[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三引苏冕修《唐会要》部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页 1571。
 - 9 中外学者多有以为上元年间唐已复置四镇,如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进出》,《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科编》第 4 号,1984 年,页 12;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页 74;上引内藤みとり文等。笔者认为上元年间唐仅设几个都督府,四镇之复置应在调露元年,见上引拙作《略论碎叶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事实》。
 - 10 见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页 11372。
 - 11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延载元年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页 6493。
 - 12 薛宗正,《“杜怀宝碑铭”管窥》,载《吐鲁番学研究》,2001 年第 2 期,页 4—6。
 - 13 《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页 3289。又见于[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卷七八《丁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 1922、2062。
 - 14 《千唐志》中《忠武将军裴沙钵罗墓志》,西北大学图书馆藏千唐志原拓片;[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六五,员半千《蜀州青城县令达奚君神道碑》,北京,中华书

- 局,1983,页1683等。关于垂拱二年“拔四镇”问题,学界意见分歧。大多数学者同意“拔四镇”是退出四镇。如上引拙作《略论碎叶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唐安西四镇的历史事实》、吴玉贵《唐安西都护府史略》、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等。
- 15 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四库全书,《张燕公集》卷十八,页13上。
- 16 [宋]王溥编撰《唐会要》,卷七三,页1571。
- 17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页279—284。
- 18 见吴丽娱《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府兵卫士简点文书的研究》,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页672—692。
- 19 《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页2803。
- 20 见上引《赠太尉裴公神道碑》。
- 21 《新唐书》,卷一〇八,《裴行俭传》,页4088。
- 22 《新唐书》,卷一〇八,《裴行俭传》,页4087。
- 23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九一三,《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页4804—4805。
- 24 《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传》,页4135。
- 25 同上。
- 26 《新唐书》,卷一〇八,《裴行俭传》,页4088。
- 27 《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传》,页4136。
- 2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天宝六载十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页6888—6889。
- 29 见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5期,页70—82。

明朝官员与西北中国

罗萨比(Morris Rossabi) 著

汤芸 译

在围绕着中国明朝与其北边的邻国关系而展开的讨论中,学者通常都认为中国官员总在试图限制与邻国的贸易,他们不仅对贸易没有什么兴趣,也不热衷于去了解北边的那些所谓的野蛮人。过去几十年间,学者已经挑战了这一观点,并且开始关注明朝在商业中获得的利益,以及在这些利益的驱使下,官员们对贸易往来的热切程度。亨利·塞瑞斯(Henry Serruys)有两本描绘明朝与蒙古间密切的贸易来往和兴盛一时的马市的专著¹。我也曾撰文描写过茶马贸易,并探讨了明朝与中亚以及与女真之间的贸易来往²。拉夫·夸兹(Ralph Kauz)在新近完成的一本著作中,也强调了明朝与帖木儿之间的经济关系³。

目前关于明朝忽视其西北方疆土的观点已经被动摇,但这一观点还未被根本扭转。研究中外关系的专家,援引清朝官员对西方的无知,断言这种对西方的忽视与无知早已存在,甚至可能贯穿于中国的历史。他们时常引用林则徐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的一段话来证实中国对外界的漠视:“源于中国的任何一件东西可曾伤害过外国?就拿茶叶和大黄来说吧,没有它们,外国人一天也活不了。”⁴ 这一个小事件将人们对中外关系的理解定下基调——暗示着林则徐所表现的信念,代表了整个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中国官员及其对外国的了解程度。

一 出使中亚的使臣

这一阐释并不能代表明朝与中亚的关系。明朝边疆及京城的官员有多种渠道了解中亚的人民及其地域。除了早期与帖木儿之间有过严重的误解,甚至导致其试图入侵中原,但在整个15世纪,明与其关系可以说是大起大落⁵。中亚的国王、王子、皇帝以及绿洲统治者都与明朝交换使节,并向明朝廷呈上非常精美

与奢华的物品,这也就是所谓的朝贡⁶。而明朝廷也回赠礼物,并允许使节(他们常是假扮成官方使节的商人)与中国商人发展贸易。明朝对使团的热情接待也促使帖木儿的儿子沙哈鲁派出一个使团,并在中国停留了较长时间。使团于1419年从哈烈(Herat)出发,并于1421年返回,其中他们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在中国逗留。肩负使命的使节们进入了中国之后,受到永乐帝(1403—1424)的接见,并邀请他们参加朝廷的节日、庆典及狩猎活动,甚至给予他们在中国游走的极大自由。一位使节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观察着他认为是如此遥远与孤立的文明,并对明朝中国作了详尽描述⁷。

与此同时,永乐帝也派陈诚(?—1457)出使中亚,为朝廷收集关于邻近的绿洲与更远一些的城市可靠信息。值得注意的线索是,陈诚在此次西使之前,曾出使位于今天中国西北部的维吾尔领地以及安南。朝廷派遣使臣的举动,显然表明其培养与任用了解中外关系的专家的期望⁸。陈诚共西使中亚三次;他第一次出使归来时,为永乐帝带回了非常精确的关于沿途各地方、绿洲和城市的报告。他的报告之一便是《西域行程记》,简明地记录了他旅途的日程,非常有价值。在书中,他给出了详细的行程路线,标明了他每日行进的里程,描绘了沿途的地形,有时甚至还提及天气状况。因此早在1414年,明朝官员便已经出色地描述了从中国至哈烈沿途的旅行状况。

陈诚还记录了沿途所见的绿洲与城镇。在《西域番国志》一书中,他用了绝大部分篇幅描写哈烈。他花了大量时间呆在帖木儿的首都哈烈,与他曾停留过的其他地区相较之下,他对哈烈要熟悉得多⁹。除帖木儿,陈诚还访问了另外的16个绿洲或王国。尽管他短暂的观察未能给朝廷提供丰富的新信息,但这些观察仍促使朝廷注意到了这些番国。陈诚对这些地区的描述大多也是粗略的,但仍为了解当地族群、环境与特产提供了大量信息。不过他对哈烈的描述却是十分详尽的,这些记录带给朝廷官员一个非同寻常的知识体系。陈诚注意到并描述了哈烈的食物、商业、法律、服饰、习俗(包括穆斯林的澡堂)以及建筑。正如一位研究者最近所指出的:“陈诚的描绘(能)成为到这一城市的外交官的手册……陈诚所想做的是提供有关哈烈的信息,作为基本参考素材,以备日后所用。”¹⁰

陈诚的观察后来被证实大多是准确的。一位学者已经确认了一些陈诚提及的建筑,甚至陈诚描述的一种其上刻有波斯语与阿拉伯语铭文的“类似锅的器皿”,也与1978年仍保存在哈烈的星期五清真寺中的器皿一样¹¹。陈诚对货币

体系与商业税收的阐释,对于朝廷官员与商人而言无疑是有价值的。他对礼节的观察对于其后的使节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他对一些重要的波斯语及其习语的仔细注解对于旅行者而言也会有所帮助。他有时也会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描述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妇女,描写伊斯兰苏菲派的奇异装束,以及“当地人对奢华服饰的偏好”,这些描述的用意在于先给外交官打下铺垫,使他们到此时不至于对当地人的价值准则与信仰大惊小怪¹²。但令人惊讶的是,陈诚忽略了对军事方面的记录。难道是他的帖木儿护卫的限制,使他无法获得一些有用的军事知识?但从他所获得的详细的信息来看,他显然有相当的自由行走或骑游。这样说来,当地官员似乎并未有意防范陈诚,不让他接近军事要地。一个可行的解释是他是以口头方式向朝廷汇报了他所获得的军事方面的情报。

与陈诚同时成为“政府中亚专家”的其他使臣的报告,也成为明朝廷与边疆官员的信息来源。朝廷称赞了这些记录,也嘉奖了带回各自经历与观察的使臣。如陈德文,他曾被任命出使中亚,结果遭到帖木儿拘禁,被释放后,他回到明朝,带回他历险中的许多信息。永乐帝因此给他加官进爵,并赏赐大量物品以嘉奖他的观察与描述¹³。此外,永乐帝还不断地派遣有经验的使臣出使“西域”(汉语中对中亚的通常叫法)。永乐帝共派遣陈诚西使三次,李达至少两次,傅安也有几次。傅安是一位“通事”(口译者),可能通晓波斯语或某种土耳其语。傅安曾被帖木儿王朝拘禁近十年,很可能有这两门语言中一门的基础¹⁴。而且,西班牙大使克拉维约(Ruy Gonzalez de Clavijo)在其旅行记录中,有一段话也从侧面表明了傅安对其中一门语言略有所知:

近侍将我们排列在中国专使的下首……

落座之后,有王公一人走向中国专使之前,

传帖木儿之旨:帖木儿及其子现与西班牙国王亲善,故其专使应到中国专使之前,因中国专使是由帖木儿的敌人,寇盗及坏人所派遣。¹⁵

从这段描述看来,帖木儿的官员们似乎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傅安说话。

二 会同馆与四夷馆内的通事

对于在边疆及在京城官员,他们的另一个信息来源便是通事与译字官。

后来成为清朝俄使团在京驻所的会同馆,在当时不仅是各国使臣的官方驻地,也是培训通事的地方¹⁶。1469年,馆内共有60名通事:其中9名专攻中亚语,7名专攻波斯语和阿拉伯语,2名学习维吾尔语¹⁷。朝廷要求尽快填补通事的不足,但汉文文献的记录表明官员们觉得这很难做到¹⁸。最大的障碍在于朝廷把通事的官衔定得太低,俸禄也很少,这使得许多有抱负且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都在馆内另谋职位。最终,朝廷被迫将一些通事的官职设为世袭。通事的培训需九年时间,并要在通过一个资格考试(译科)之后,才能被朝廷认可,但朝廷显然在他们通过考试之前便已经开始任用其中的一些人。

政府在此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它不希望给仅仅是负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通事以高的官衔和优厚的俸禄,但与此同时,它又需要能与外国人交流的知识渊博的通事。然而,朝廷无法吸引最有能力的年轻人担任通事。由于只能招募到一些资质平庸的生徒,会同馆常因其失职与能力不足而饱受批评。通事有时也会从中亚使臣那里敲诈银钱或其他值钱的东西¹⁹,朝廷也因一些通事不能准确翻译而蒙羞。奏章中不断有官员举报通事的失错与越权,这表明朝廷还是有培养一批称职的通事的愿望,只是无法克服一些制度上的偏见与成规以实现这一目标。

四夷馆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²⁰。四夷馆最初设置于翰林院之下,负责培养译字生与通事,翻译外国文件以便阅读。四夷馆设立于1407年,吸收的生徒都是未能考上进士(通过殿试者为进士)的举人(通过乡试即省试者称为举人)。和会同馆的通事一样,译字生的升迁机会很少,而他们从一开始官衔就很低。明朝之前,作为异族的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统治了中国近一个世纪。刚刚取代元朝的明朝认识到自己需要能通晓蒙古语的译字生。不过,明朝廷很快地就将四夷馆内所传授的语言种类增加到8种,其中包括波斯语和维吾尔语²¹。

在四夷馆中,许多生徒缺乏天赋,尤其是当朝廷将这些官职设为世袭之后。官员抱怨学员懒惰且没有学习的动力。由于生徒的“职业前景并不乐观……这一机构在选取生徒与招募教员方面有着无法克服的困难”²²。和会同馆的通事一样,译字生也需花九年时间来学一门外语,但即便如此,其中仍有大量不合格者。生徒的生活与学习条件及设施很差,也是造成此问题的原因之一。生徒的食物与燃料配给常常是不足的,他们的教室阴暗寒冷,许多生徒甚至没有自己的文房四宝。教授也缺乏教学训练,他们让生徒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背诵外语文章来“学习”外语。不过当这些生徒成为译字官之后,在频繁地与外国人打交道

的过程中,有大量参与非法贸易的机会,他们于是从中获利并致富。一些商人家庭甚至想方设法将他们的儿子送到四夷馆学习,以利用这一便利条件。贿赂也是常见的事,译字官受外贸利润诱惑而变得腐败²³。

明朝的文献记录了所有这些问题。奏稿与诏书中都有对四夷馆的失职和译字官能力不足的责难。朝廷期望培养一个更好更有效的体系。官员也有兴趣创办一个有效率的翻译机构。显然,赋予这一机构中的人以更高的声望、官衔和俸禄,更有利于吸引非常有才能的人,但官员却不愿如此。

三 明朝政府的管理与中亚使臣

在西北边疆以及在京城官员,还能从负责接待使臣的官员那里得到更多的关于中亚的信息。如隶属于礼仪部的主客清吏司便经常与在京城的外国使臣接触来往。主客清吏司的官员在政府机构中有相对较高的官衔,他们常在会同馆内与中亚使臣会面²⁴。他们的职责是检查使臣带来的贡品,如果贡品符合他们的心意,他们便为使臣在会同馆安排食宿。朝廷有自己的一套评估体系,将使臣及其来自国家的地位进行排序,依此为使臣提供相应的大米、酒、面粉、肉和茶。然后,使臣们要呈上他们用所谓的“番文”书写的表文,四夷馆负责翻译成汉语。主客清吏司的官员也为使臣提供仆人,如果有必要的话,也为他们提供医生与药物,甚至为之安排娱乐活动²⁵。

光禄司是负责安排使臣娱乐的部门。光禄司的官员为使臣们安排宴会,并指定宴会所需的肉、酒和各类物品。他们安放鲜花和其他装饰物,指挥教坊司演奏合适的乐曲。他们根据对使臣及其代表的国家的评估来安排宴会的一切细节²⁶。

这些机构显得对中亚的番国都十分熟悉。朝廷根据官员对使臣所代表的统治者及地域的评估,以不同的方式接待使臣。朝廷分别在北京设宴两次,在边境设宴一次,并为来自哈密、吐鲁番、别失八里和撒马尔罕的使臣在行进途中多次设宴款待。朝廷认为这些地方是中亚最为重要的中心地带,也是最具战略意义或最有前景的,于是为来自这些中心地方的使臣提供丰盛的宴席,给予他们荣耀。那些邻近这些中心的不那么强大的或不那么富裕的番国,如喀拉和卓则只能在途中享受一次宴席,而更远的地区,如伊斯法罕和设拉子就仅仅只有一次宴席²⁷。从这种等级体系来看,光禄司是明白中亚的权力格局的,朝廷也是如此。

四 提供信息来源的宦官和商人

宦官,作为政府中非正式官员的一类,在中外关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成为明朝了解中亚的另一类信息来源的渠道。汉文文献中记录了明朝时期,宦官曾带领至少 140 位使臣到异国土地上²⁸。永乐年间,几乎每一次出使中亚的使团都有宦官参与。从文献中随机抽取一些这类出使任务的记录就有:(1) 1408 年,巴泰与李达出使巴达克山;(2) 李达出使哈烈;(3) 1418 年,杨忠出使别失八里;(4) 1418 年,邓诚出使罕东卫;(5) 1418 年,李达出使哈烈和撒马尔罕;(6) 1419 年,李暹出使哈密;(7) 1419 年,鲁安出使设拉子和伊斯法罕;(8) 1420 年,郭骥出使哈烈;(9) 鲁安出使哈密。

明朝皇帝,尤其是永乐帝,依靠信赖宦官,并且不断赋予宦官更多的职责和更大的权威。一位学者解释说“没有家庭拖累的他们(宦官)对君王的忠诚丝毫不亚于那些必须为其后代考虑的官员”²⁹。宦官们的地位完全依赖于皇帝,这使得他们忠实于他们的主人。永乐帝尤为支持宦官的部分原因在于 1403 年,宦官曾帮助他篡位,取代他的侄儿成为皇帝³⁰。永乐帝取得皇位后,还利用宦官作为与那些反对他篡夺正统皇位的官员抗衡的力量。

永乐帝和其后的君王发现在处理与中亚的关系时,宦官极为有用。他们注意到,任职于管理外国使节与商人的部门的官员受到儒学的影响,总是轻慢“番人”,而宦官则不是这样。宦官通常更愿意在一些有争议的事务上与番人进行协商甚至做出一定让步。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宦官不反对贸易通商,而且他们常在会同馆指导商贸。景德镇瓷器的生产由宦官所监控,而瓷器是明朝与中亚和西亚贸易的重要物品。显然,他们经常与中亚与西亚的商人及使臣打交道³¹。由此可见,在明朝与中亚的朝贡与商业来往中,宦官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宦官在中亚的旅行以及他们与中亚使臣及商人的联系,为他们深入了解哈密、吐鲁番、撒马尔罕、哈烈,以及其他中国西北方的绿洲与城镇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中国商人在边境及京城与中亚“使臣”进行贸易往来,他们显然是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渠道。然而,受儒学影响的官员在理论上认为商贸是低贱的,因此他们所修的史籍基本上未提及商人的作用。他们对商人的记录主要是关于商人规避或违反私人进行贸易规则的事件。因此,边境官员们似乎并不会就中亚事

务咨询商人。

五 地理志与辞书

明朝所有与中亚的来往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知识体系。明朝关于中亚的兴趣与知识的产物之一即是中外语言对照的辞书,如《华夷译语》³²。《华夷译语》一书主要是汉语与蒙古语对照的辞书,后来扩展到西亚与中亚的语言。《华夷译语》的第一个版本是在洪武帝(1368—1398)的授意下,由两位蒙古人火源洁和马沙亦黑所编撰的,于1389年成书。《华夷译语》极为准确地用汉语标出蒙古语的发音,还附有汉官与蒙古官员信件的翻译与原文³³。17世纪早期,茅瑞征又用会同馆的一些材料来更新《华夷译语》,加入更多语言,包括波斯语和维吾尔语³⁴。一部更早的辞书约形成于15世纪,包括一本《回鹘馆课》,这里的回鹘或许指的是波斯³⁵。另一部给人印象深刻的著作是约完成于1430年的《异域图志》,书中包括168个异域地区的图示与地图,包括中亚的一些地区³⁶。

明朝与中亚的来往也促成了一系列地理志的酝酿和编纂。洪武帝下旨编撰的《寰舆通志》便是第一部这类地理志,不过负责编撰的官员直至1456年才完成它。五年后,天顺年间(1457—1464),另一部帝国的地理志《大明一统志》编撰完成,这部地理志与《寰舆通志》差别不大³⁷。《大明一统志》内附有图片,这增加了它的实用性。两本书都有关于哈密、巴达克山、别失八里、撒马尔罕、哈烈、和阗、叙利亚、阿拉伯半岛、麦地那、巴格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专门章节³⁸。对上述前六个地区的描述主要得益于陈诚的记录,但更远的地区的资料则来自于其他途径。这些地理志成为至少六部16世纪编撰的同类地理志的范本。如《皇舆考》和《广舆志》都是在《寰舆通志》和《大明一统志》的基础上做出一些变更与增补而编成的³⁹。

一般明朝中外关系研究都关注永乐年间的使臣、记录、地理志及辞书,并认为永乐帝之后的明朝皇帝便丧失了对中亚的兴趣。这些研究都是在这样一个预设下进行的,即永乐年间明朝了解中亚的兴趣只是一个例外。这使得学者们认为,在永乐帝去世后,明朝很快不再对中亚感兴趣,以致于后来的官员在处理中亚事务时对这些异国知之甚少。然而,尽管很少,但在永乐帝之后,明朝仍有使臣出使中亚,宦官、会同馆和四夷馆的通事以及商人仍与来自明朝西北之外的商人与使臣来往,包括帖木儿领地、今新疆境内的蒙古人地域、西亚等地;同时也仍

有地理志与术语表的编撰。事实上,北京的官员与边境上的官员对出入中国西北边境的异国人有更多的了解,这一点对于明朝中外关系的一般理解是一个挑战。

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前后几十年间,边疆官员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关于中亚各国及其政策的信息,朝廷也不断任命同一批官员去处理中国西北之外不同地区的事务。朝廷坚定地期望培养出一群专家,能够就中亚与西亚问题提出建议,并对调整这些地区政策。

六 西北边疆的官员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为保障明朝西北边疆的利益,一批官员被派遣到西北边疆就职,对这批官员的研究证实了掌权的决策者是老练且有见识的。他们认识到,明朝在这一地域面临着极为重大的问题。首先,商业往来与朝贡关系使得明朝与西北的哈密和吐鲁番的关系变得微妙——事实上,明朝廷将哈密视为通往西域(即中亚)的主要门户,因而期望能控制它,至少确保哈密的统治者能与明朝保持友好关系。1465年,礼部尚书姚夔抱怨哈密的使臣出使明朝过于频繁,使得朝廷开支过大。他指出,如哈密最近一次来朝使团共有360人,但贡品只有20匹马,而朝廷却不得不为这些所谓的使臣提供食宿,贡品与朝廷的开销实在太不成比例⁴⁰。明朝官员和中亚商人与使臣都常抱怨他们所接受的贡品或礼物不佳,在交易中换得的商品品质也很差。朝廷也不断哀叹西北边疆所进行的走私和禁买物品的出售⁴¹。

其次,吐鲁番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威胁着明朝在西北的利益,同时明朝军队实力的退化也使得明朝在西北的问题恶化。皈依伊斯兰教的吐鲁番的统治者企图控制原来的丝绸之路,并想将自己的统治势力扩展到哈密⁴²。与此同时,驻守西北的明朝军队的实力自15世纪初起便大大下降。以前军队的武器和士兵的给养都是由朝廷供给,但至15世纪末,由于面临着岁收不足,朝廷便组建军屯,让士兵务农以自给自足。军屯之初,朝廷一度用银两购买粮食和其他供给以帮助军屯,但这很快给朝廷带来了新的财政问题。军队不得不设法自给自足,于是开始着力于农业生产,其作战能力于是下降⁴³。

第三,朝廷也无法保证自身有稳定的马匹供给。与蒙古各部落的紧张关系使得朝廷无法进口蒙古马。西北与西南边地肆虐的茶马走私扰乱了朝廷以茶换

马的贸易,使得可为朝廷所用的战马极为不足。虽然与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的贸易与朝贡来往仍继续着,但要千里迢迢地运送数万匹马到西北边疆却是不可能的⁴⁴。因此,西北边疆的军队没有足够的装备来保卫明朝。1470年,陕西巡抚马文升(1426—1510)上奏朝廷,请求拨给银两用于购买马匹⁴⁵。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于1471年与1472年分别拨给3,000两和20,000两白银给陕西,用于西北驻军购买马匹。与此同时,朝廷还每年拨给陕西官员5,000两白银用于购买茶叶,这样他们可以用购得的茶叶来换取马匹⁴⁶。

面临如此严重的困境,朝廷需要靠中亚事务的专家来制订与实施相应政策,马文升便是这类专家中最杰出的一员。马文升于1451年考取进士,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至1468年,他已经担任了许多政府要职,日益官高权重⁴⁷。在这一年,朝廷第一次任命他到西北边疆⁴⁸。最初他的任务是从乱民手中夺回位于今天甘肃省的一个要塞。马文升没有辜负朝廷的期望,他巧施妙计迫使占夺要塞者投降。因此,朝廷让他继续在西北地区任职长达八年。朝廷将马文升视为通晓中亚乃至各种“番人”事务之人,后来又派他去辽东负责女真事务。此后,马文升澄清几次朝中官员对他的诬陷,同时也与女真建立起了稳定的联系,这在他的《抚安东夷志》中都有记载⁴⁹。1489年,以丰富的经历与显赫的功绩,马文升官至兵部尚书。

就任兵部尚书后,马文升利用他的经验保护着明朝在西北的利益。1493年初,吐鲁番阿黑麻汗纠集300名士兵,夜袭哈密,杀害100余人,并俘获哈密统治者,占领了绿洲⁵⁰。马文升授命解救哈密。他根据自己对西北人的了解,制订了周全的计划。从他的一本传记中可以看到,马文升强调慎用武力,他倾向于向敌方施加压力或以威吓的方式,同时又表示愿与敌方通过和谈重归于好,以此来促使敌人投降。如果发现直接采取军事打击是所有可用方案中,达到安定的最有效的方法,他会将之视为特殊情况⁵¹。这样,马文升开创了一个恩威并重的政策——一面强调军事行动;另一面则提倡更具策略性和环环相扣的战略。他首先采用强硬措施,于1495年派出明军迫使阿黑麻汗从哈密撤军,但阿黑麻汗并未释放哈密的统治者⁵²。并且在接下来的一年之间,阿黑麻汗两次攻打绿洲;这表明他并未被完全打败。马文升于是换了一种较温和的策略:他关闭了连接中亚与明朝的贸易与朝贡通道,以此迫使阿黑麻汗改变主意并送还哈密的统治者。他试图借用在与明朝的贸易中获利的中亚商人、牧人和农民来促使阿黑麻汗屈服。如马文升所谋,阿黑麻汗送回了哈密的统治者,并请求恢复与明朝的贸易与

朝贡关系⁵³。马文升的胜利后来被证明只是暂时的。1513年,也就是在他死后三年,阿黑麻的儿子满速尔占领哈密,明朝此时已无力再将哈密从吐鲁番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⁵⁴。

许进(1437—1510)是明朝廷在处理中亚事务时所依赖的第二位有见识的人。1466年,年仅16的许进通过了最高的科举考试,从此开始在仕途上一步步向上攀升,1488年,他被派往北部边疆的山西大同⁵⁵。他在此任上三年,基本职责是保卫明朝与蒙古的边界。在他的任期内,一直保持着和平,他也积累了如何与外国人协商的经验。朝廷得知他的才能,认为他能在处理困扰着哈密与吐鲁番的骚乱中发挥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1495年初,朝廷任命他治理甘肃,正是在甘肃他受到了马文升的关注。马文升令他重夺哈密,他对此进行了周密计划。第一步,他先消除明朝与西北边疆之外的卫拉特及其他蒙古部落间的紧张关系,以避免这些部落与吐鲁番联合。接下来,他命令一名汉官去探寻前往哈密的最短路线。这名官员果然找到一条捷径,只需十天便可到达哈密。第三步,他确保军队在此次远征途中的充足供给⁵⁶。1495年11月,他出发前往哈密。吐鲁番的阿黑麻汗得知许进来征,便从绿洲撤退了。许进的部队击败了阿黑麻汗的一支未来得及逃脱的部队,共斩首60人,缴获绵羊3,000只⁵⁷。

在接下来的5年中,朝廷将许进安置于北方边界,授予不同官职。他利用自己的知识及时化解了一次蒙古的入侵,尽管此后蒙古人仍不时成功突袭。后来,许进因蒙古人的一次成功侵犯而被解职。但在五年后(1505年),因为朝廷并未遗忘他在处理边疆事务上的才能⁵⁸,再次任用他为兵部侍郎,后来他又担任两年兵部尚书直至退休。在被罢官的时期,许进完成了他的《平番始末》,全面记录了平定吐鲁番的经过。这本书显示出许进关于中国西北边疆以及中亚的丰富知识,也解释了朝廷为何多次重用他负责制定外国政策。

另一位边界事务专家杨一清(1454—1530)在年轻时就已有惊人成就,他18岁便考取进士。1491年,朝廷重用杨一清,其官职升至西北陕西的按察司副使。他在陕西呆了8年,期间潜心学习边疆事务,并对监控马匹交易有特别兴趣⁵⁹。朝廷赏识他的才能,于1501年任命他为陕西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

杨一清很快便意识到,明朝需要更多更好的马匹来防御好战的邻国。1505年,他撰写了一道六千字奏章,请求皇帝重新重视茶马贸易。杨一清在奏章中不断引用自己作边境官员时与蛮人交往的经验,显示了他丰富的个人阅历⁶⁰。尽管他所提出的解决茶马贸易问题的方法并非他的独创,但仍显示出杨一清非同

寻常地通晓茶马贸易的历史及其当时的不足。总的来说,杨一清急于恢复自15世纪末以来便被废除的关于贸易的规章制度。但他也意识到自明初以来许多事情已经改变,并且朝廷也无法贯彻某些法规,于是他也提出一些与传统政策相左的措施⁶¹。如,他提议与购买茶叶的商人进一步合作,允许他们购买茶叶并将茶叶转运至西南与西北边境。这样,商人们可将茶叶卖给茶马司,茶马司于是便能用买进的茶叶换取中亚的马匹。杨一清之所以进行这种改革,是因为政府已无力将茶叶运送至边境。尽管杨一清熟知茶马贸易,但由于腐败、走私,以及政府在控制贸易方面的无能,他的改革未能重振这一重要的商业⁶²。

杨一清并未因这次失败而灰心,他并不想依靠进口方式来获得足够的战马,于是他同时也敦促朝廷在中国境内划出更多的牧地。他认为多一些牧地有利于饲养良马。他的另一个提议是修复与重建边境上的城墙与要塞。他的建议和杰出的才能再次给朝廷以深刻印象,1506年,他被任命为陕西巡抚。然而,上任不久,他便卷入与宦官刘瑾的斗争中,被陷害解职入狱。1507年初他的支持者打通关节将他从狱中解救出来,他又回到仕途上,后来进入内阁⁶³。

不过,如同许进一样,杨一清的才能也未被遗忘。20年后,1525年,朝廷再次起用他为右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以改变明朝在西北边境不断恶化的局面。在一年中,他使用武力驱逐了10,000名占据着今天的甘肃省的骑兵。但官场中的一些冲突迫使他于1529年告老还乡,并于次年初去世。杨一清所留下的不仅是他在任上取得的成就,还有关于西北边境的详细记录。他的《西征目录》记录了他游走于边境地区时,对这些地区及其人民的个人观察。

这三位官员反映了明朝廷任用通晓中国西北邻国的专家的愿望。三位官员都曾努力研究他们所交往的外国人,从而能在明朝与中亚关系发生危机时制订出良好对策。朝廷也因他们的才能而将他们派往边境担任要职。简而言之,与传统的关于中外关系的观点不同,政府对中亚的态度与政策并未被儒学的形态所支配。影响着朝廷在处理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时是采取妥协或是采用武力的,还是对中亚各国的国力以及经济实力的实际评估。至少在明朝的外交政策之中,现实主义政治是主流,这类似于中外各国势均力敌的宋朝时期的情况⁶⁴。

〔注 释〕

1 Henry Serruys, 1966—1967; 1973—1975.

2 如 Morris Rossabi, 1970, pp. 136—168; 1982; 1972.

- 3 见 Ralph Kauz, 2005.
- 4 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1954, p. 25.
- 5 Joseph Fletcher, pp. 208 – 215; 关于帖木儿的更多讨论, 见 Beatrice Forbes Manz; 关于郑和出使与帖木儿入侵之间关系之探讨见 Morris Rossabi, 1973。
- 6 Morris Rossabi, 1972, pp. 206 – 225; Morris Rossabi, 1997.
- 7 这些作品已被译为英文, 分别是 K. M. Maitra 所译的 *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以及 Wheeler Thackston 所译的 *A Century of Princes, Sources on Timurid History and Art*。
- 8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 N. Tay, “Chen Cheng” (陈诚), 1976, p. 144. See Morris Rossabi, 1976; Felicia Hecker, 1993。这些资料提供了关于陈诚的详细资料, 以及汉语文献与日语文献中对他及他的出使的完整记录。
- 9 我对陈诚书中的哈烈一节的翻译, 见 “A Translation of Chen Cheng’s Hsi-yu fan-kuo chih” (译《西域番国志》), 1983, pp. 49 – 59。
- 10 Charles Hucker, 1961, p. 89.
- 11 Charles Hucker, p. 90.
- 12 Charles Hucker, p. 94.
- 13 《明史》, 卷三一二, 页 3829。
- 14 同上, 页 3825。若想了解傅安出使任务, 更好的资料是王鸿绪, 《明史稿》, 1723 版, 页 6a—7b。又见 V. V. Barthold, pp. 48 – 49。
- 15 Guy Le Strange, pp. 222 – 223.
- 16 见 Paul Pelliot, 1948, pp. 81 – 292; Henry Serruys, 1967, pp. 408 – 442。关于其如何用于接待俄罗斯人, 见 Ssu-Ming Meng; Eric Widmer, 1976, pp. 89 – 90。
- 17 申时行等, 《大明汇典》, 卷一〇九, 页 1628。
- 18 同上, 页 1628。
- 19 《武宗实录》, 卷四八, 页 1a。
- 20 查里斯·哈克 (Charles Hucker) 在其书中, 将四夷馆译为笔译机构, 将会同馆译为口译机构。详见 Charles Hucker, 1985, p. 263。
- 21 朝廷于 1579 年增加了泰国语, 因为四夷馆中无人能翻译用泰文书写的贡品清单。见 Tilemann Grimm, 1961, pp. 10 – 15。
- 22 Pamela Kyle Crossley, 1991, p. 46.
- 23 Norman Wild, pp. 618 – 619; Kanda Kiichiro.
- 24 《明史》, 卷七二, 页 743—744。这些外国人中有的的是假扮使节的商人, 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假扮为官方运送贡品的使节才能进入中国 (从而与中国进行贸易, 从中获利)。
- 25 这些精心的安排的细节见《明史》, 卷五六, 页 618—620。

- 26 《大明汇典》，卷一一四，页 1674。
- 27 这种等级的详细记录见《大明汇典》，卷一一四，页 1674—1677。
- 28 Shih-shan Henry Tsai, p. 119.
- 29 Charles Hucker, 1961, p. 56.
- 30 Robert Crawford, pp. 126—127.
- 31 John A. Pope, 1956, p. 59, 121—124; John A. Pope, 1952, p. 18; Ira Lapidus, p. 34; Paul Kahle, p. 39; 关于中国赠与中亚及西亚的瓷器，见《明史》，卷三三二，页 3831; Joseph Marie Amiot, pp. 241—248, 272—279; Edgar Blochet, p. 254; 《大明会典》，卷一一二，页 1654; 沈德符，《野获篇》，卷三〇，页 31a; 关于宦官如何监管景德镇，见石景芬：《饶州府志》，卷三，1872 版，页 54a; Henry Shih-shan Tsai, 1996, p. 185; Kamer Aga-Oglu, p. 14。关于中国瓷器的收集目录，亦见 Regina Krahel *et al.*；此外，还有 Yolande Crowe。
- 32 这一版本的编写详见 Wolfgang Franke, p. 203。
- 33 Pamela Kyle Crossley, 1991, p. 54; Roy Andrew Miller, in Goodrich and Fang, 1976, pp. 1126—1127.
- 34 Chin-yi Yang and L. Carrington Goodrich, in Goodrich and Fang, 1976, p. 1042.
- 35 Pamela Kyle Crossley, 1991, p. 51.
- 36 Wolfgang Franke, 1968, p. 203; Joseph Needham, p. 512.
- 37 Wolfgang Franke, 1968, p. 237; 本人广泛引用了这些作品，见其“Mi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Hami and Central Asia: A Re-exa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oreign Policy”（明与哈密及中亚的关系：对传统中国外交政策的再研究），1970。
- 38 这两个版本的比较，见 L. Carrington Goodrich, 1956, pp. 209—211。
- 39 对这些文本的探讨，见 Wolfgang Franke, 1968, pp. 238—239。
- 40 《宪宗实录》，卷二二，页 3b—4a; 关于姚夔，见《明史》，卷一七七，页 2028;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哈佛燕京学社)，p. 138c; 以及《名人传记词条索引》，页 383。
- 41 《明史》，卷三二九，页 3790; 《宪宗实录》，卷二二，页 3b—4a; 卷七二，页 3b—4a; 卷八六，页 1a。
- 42 详见 Morris Rossabi, 1972, pp. 214—220。
- 43 《孝宗实录》，卷十五，页 1a; 《武宗实录》，卷六七，页 15b。关于商人及军屯，详见王崇武，页 1—15。
- 44 详见 Morris Rossabi, 1970, 1982。
- 45 《宪宗实录》，卷七七，页 10b。
- 46 同上，卷九一，页 1b; 卷一〇一，页 3b—4a; 卷八七，页 8b—9b。
- 47 Benjamin Wallacker, in Goodrich and Fang, 1976, pp. 1027—1028.

- 48 见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II, 1935, pp. 136a - 136b, 以及《名人传记词条索引》, 页 409。
- 49 Wolfgang Franke, 1968, p. 229.
- 50 马文升,《兴复哈密记》, 页 3a;《明史》, 卷三二九, 页 3785。详见 Morris Rossabi, 1997, pp. 90 - 91。
- 51 Benjamin Wallacker, in Goodrich and Fang, 1976, p. 1028.
- 52 关于此次战役, 见 Yuan-chu Lam。
- 53 Morris Rossabi, 1997, p. 93.
- 54 对这些事件的详细分析见 Morris Rossabi, 1997。
- 55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Lee Hwa-chou, in Goodrich and Fang, 1976, p. 576.
- 56 傅维麟,《明书》, 卷一六七, 页 3296; 马文升, 1938, 第 4b—5a 页。
- 57 傅维麟, 卷一六七, 页 3296。
- 58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Lee Hwa-chou, in Goodrich and Fang, 1976, p. 577.
- 59 Tao-chi Chou, in Goodrich and Fang, 1976, p. 1516.
- 60 罗萨比总结了这一奏章, 见 Morris Rossabi, 1970, p. 156。奏章原文见杨一清,《关中奏议全集》(三), 页 5a—20b。
- 61 明朝的茶马互市详见 Morris Rossabi, 1970; A. S. Martinov, pp. 234 - 250; Tani Mitsutaka。关于宋朝的茶马互市, 见 Paul Smith。
- 62 “在他的计划实施的最初四年间, 明朝共收集了 19,077 匹马, 每年不到 5,000 匹。这个数字与一世纪前每年 14,000 匹相比, 显然太少了。”见 Morris Rossabi, 1970, p. 158。
- 63 Chou Tao-chi, in Goodrich and Fang, 1976, pp. 1517 - 1518.
- 6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pp. 253 - 255。该书基于理论分析, 及对明与蒙古的关系的研究之上, 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参 考 文 献

- Aga-Oglu, Kamer, “Blue-and-White Porcelain Plates Made for Moslem Patrons” (为穆斯林主顾所制之蓝白瓷器), *Far Eastern Ceramic Bulletin* 15, 1951, pp. 12 - 16.
- Amiot, Joseph Marie,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 c. des chinois* (北京传教士对中国历史、科学技术及风

- 俗的记载), Paris, Lyon, 1776—1794, 15 vols.
- Barthold, V. V.,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II* (对中亚历史的四个研究), V. and T. Minorsky (翻译), Leiden, E. J. Brill, 4 vols, 1956.
- Bloch, Edgar,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s Mongols de Fadl Allah Rashid ed-Din* (拉就就行了都丁的蒙古史), Leiden, E. J. Brill, 1910.
- 陈诚,《西域番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91。
- 陈诚,《西域行程记》,北京,中华书局,1991。
- Crawford, Robert, "Eunuch Power in the Ming Dynasty" (明朝宦官的权力), *Young Pao* 47, 1961—1962, pp. 115—148.
- Crossley, Pamela Kyle, "Structure and Symbol in the Role of the Ming-Qing Foreign Translation Bureaus (*siyi quan*)" (明四夷馆的结构与象征),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Studies* 5, 1991, pp. 38—70.
- Crowe, Yolande. *Persia and China: Safavid blue and white ceramics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506—1738* (波斯与中国:在维多利亚和阿伯特博物馆萨菲王朝的青白瓷),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2.
- 《大明会典》,台北,东南快报社,1963 版。
- Fletcher, Joseph 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中国与中亚),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中国的天下观:传统中国的外交关系),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06—224.
- Franke, Wolfga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明朝历史文献的介绍),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 傅维麟,《明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1928(再版)。
- Goodrich, L. Carrington, "Geographical Additions of the XIV and XV Centuries" (14 与 15 世纪志书增补), *Monumenta Serica* 15—1, 1956, pp. 203—212.
- Goodrich, L. Carrington and Fang Chao-ying, eds., *A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 vols., 1976.
- Grimm, Tilemann, "Thailand in the Light of Offici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中国正史中的泰国:《明史》中的篇),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49, 1961, pp. 1—20.
-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哈佛燕京学社), *Combined Indices to Eighty-Nine Col-*

- lections of Ming Dynasty Biographies III* (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索引 III), Peiping,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1935.
- Heckler, Felicia, "A Fifteenth-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 (15 世纪兴盛的中国外交),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1, Ser. 3, 1993, pp. 85-98.
- Hucker, Charl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明朝时期的传统中国国家),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1.
- ,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中国帝国的官职词典),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文化现实主义: 中国历史式的谋略文化与重大战略),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Kahle, Paul, "Chinese Porcelain in the Lands of Islam" (伊斯兰地区的中国瓷器), in Paul Kahle,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东方陶器商团的交易), 18, 1940—1941, pp. 27-46.
- Kanda Kiichirō, "Min no shi-i kan ni tsuite", *Shirin* 12-4, 1927, pp. 1-16.
- Kauz, Ralph, *Politik und Handel zwischen Ming und Timuriden*,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2005.
- Krahl, Regina et al., *Chinese Ceramics in Topkapı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的中国陶瓷: 完整名录), London, Sotheby, Parke, Bernet Publications, 1986.
- Lam Yün-chu, "Memoir on the Campaign Against Turfan" (吐鲁番战役),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4-2, 1990, pp. 108-160.
- Lapidus, Ira, *Muslim Cit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中世纪末期的穆斯林城市),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马文升,《兴复哈密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再版)。
- Maitra, K. M. (翻译), *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 (一次出使中国的波斯使团),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oration, 1970.
- Manz, Beatrice, *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rlane* (帖木儿的兴起与统治),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Martinov, A. S., "O nekotorykh osobennostyakh trgovli chaem i loshadmi v epoku min", *Kitai i sosed*, Moscow, Nauka, 1970.

- Meng Sssu-ming, "The E-lo-ssu kuan (Russian Hostel) in Peking" (北京的俄罗斯馆),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3, 1960—1961, pp. 19—46.
- 《名人传记词条索引》,台北,中央图书馆,1965—1966。
- 《明史》,张廷玉编,台北,国防研究院,1962—1963。
- 《明史稿》,王鸿绪编,1723 版。
- 《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1961。
- Needham, Joseph,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III* (中国科学技术史),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 Pelliot, Paul, "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 *T'oung Pao* 38, 1948, pp. 81—292.
- Pope, John A.,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来自于的阿德比尔中国瓷器), Washington, D. C.,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 *Fourteenth-Century Blue and 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üzesi, Istanbul* (14 世纪的蓝与白: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的瓷器), Washington, D. C.,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2.
-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D. C.,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 《饶州府志》,石景芬编,1872 版。
- Rossabi, Morris, "Mi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Hami and Central Asia: A Re-exa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oreign Policy" (明与哈密及中亚的关系:对传统中国外交政策的再研究),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
- "The Tea and Horse Trade with Inner Asia during the Ming" (明朝时期与亚洲内陆的茶马贸易),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4—2, 1970, pp. 136—168.
- "Ming China and Turfan, 1406—1517" (明朝与吐鲁番,1406—1517),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6—3, 1972, pp. 206—225.
- "Cheng Ho and Timur: Any Relation?" (郑和与帖木儿:有关系吗?), *Oriens Extremus* 20, 1973, pp. 129—136.
- "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 (两位出使中亚的使臣), *T'oung Pao* 62, 1976, pp. 1—34.
- *The Jurchens in the Yuan and Ming* (元明时期的女真), Ithaca, China-Japan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82.

- , “A Translation of Ch'en Ch'eng's Hsi-yu fan-kuo chih” (译《西域番国志》), *Ming Studies* 17, 1983, pp. 49–59.
- , “Ming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Hami” (明朝的外交政策: 以哈密为例), in Roderich Ptak and Sabine Dabringhaus (eds.), *China and Her Neighbours* (中国及其邻国),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7, pp. 79–97.
- Henry Serruys,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II: the Tribute System and Diplomatic Missions (1400—1600)” (明朝时期中国与蒙古的关系 II: 朝贡体系与外交使命),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 14, Brussel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66—1967.
- ,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III: trade relations: the horse fairs (1400—1600)” (明朝时期中国与蒙古的关系 III: 贸易关系),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17, Brussel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75.
- 沈德福,《野获篇》,1827 版。
- Smith, Paul, *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Horses, Bureaucra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 1074—1224* (向天府之国征税: 马匹、官僚主义以及对四川茶工业的破坏, 1074—1224),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trange, Guy Le (翻译), *Clavijo: Embassy to Tamerlane* (克拉维约: 出使帖木儿的使臣), London, G. Routledge & Sons, 1928.
- Tani Mitsutaka, “Mindai chama bōeki no kenkyū”, *Shirin* 49, 1966, pp. 733–751, 861–879.
- Teng Ssu-yu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8* (中国对西南的反映: 研究指南),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Thackston, Wheeler (翻译), *A Century of Princes, Sources on Timurid History and Art* (王侯的世纪, 关于帖木儿历史与艺术的文献), Cambridge, The Aga Khan Program for Islamic Architecture, 1989.
- Tsai, Henry Shih-shan, *The Eunuchs in the Ming Dynasty* (明朝的宦官),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 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度》,见《禹贡》,1936(8),页1—15。

-
- Widmer, Eric,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18 世纪俄罗斯在北京的宗教活动),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Wild, Norman,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Ssu I Kuan" (在四夷馆中学习所需物质),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1, London University, 1943—1946, pp. 617 - 640.

天高皇帝远——清朝西陲的边臣疆吏

庄吉发 著

前言

清朝西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块:滇黔、新疆、西藏。这三个边陲的民族关系,边区与内地及相邻国家的关系,错综复杂。把西陲的疆臣边吏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来考察,是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处于同一个时代及社会关系中,边臣疆吏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但同时也不能忽视边臣疆吏的个性倾向。有的边臣疆吏忧患意识浓厚,而献身于遐方绝域;有的边臣疆吏任性乖张,而纵酒于朔漠异域;有的边臣疆吏粉饰太平,而苟安于崇岭秘境。不同个性的边臣疆吏,对边陲地区的经营治理,君臣互动关系,以及边臣疆吏在贯彻中央政府的边疆政策过程中所产生的辅助作用,常常彼此不同。因此,在边疆历史舞台上,有的边臣疆吏扮演了喜剧的角色,有的边臣疆吏扮演了悲剧角色。

清朝初年,由于云南、贵州的历史背景较特殊,边疆危机较严重,当三藩之变平定后,康熙皇帝即谕令免除云南、贵州等省的苛捐杂税,与民休息。为了因应云南、贵州的积极整理,雍正皇帝对云贵总督的任命,都经过精挑细选。从现藏《宫中档》朱批奏折的记载,有助于了解高其倬(1676—1738)、鄂尔泰(1680—1745)等人在云南总督任内的治绩,贯彻中央政策的过程,君臣一体内外夹辅的互动关系,高其倬、鄂尔泰是边臣疆吏的楷模。考察雍正年间的边臣疆吏,高其倬、鄂尔泰是典型的边臣疆吏。

天山南北路,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通卫藏,西倚葱岭,是关陇地区的屏藩。清初以来,天山北路的准噶尔倚藉俄罗斯的势力,积极向东发展,清朝西北边患,日益严重,康熙皇帝御驾亲征,未能直捣巢穴。雍正皇帝筹备多年,和通泊一役,全军覆没。乾隆年间,清军长驱深入,犁庭扫穴,将天山南北路收入清朝版图,由

巴里坤以西直抵伊犁,派兵屯田,携眷驻防,同时设置伊犁将军,这种类似“移民实边”的驻防屯田政策,有利于西北边防的巩固。伊犁将军明瑞、阿桂(1717—1797)等人的周详规划,功不可没。从现藏《上谕档》所载谕旨、供词等数据,也可以反映伊犁将军奎林(?—1792)为人倨傲纵酒、性情躁急、行事乖张、擅杀罪人的劣绩,反映边臣疆吏天高皇帝远的个性。

西藏是青海、四川、云南的屏藩,在清朝国防上处于重要的地位。清初以来,屡平藏乱,西藏久隶职方,雍正年间,正式设置驻藏办事大臣。乾隆年间,廓尔喀两次入侵后藏。清军击退廓尔喀,乘军事胜利余威,提高驻藏办事大臣的地位与权力。从现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军机处档·月折包》供词、呈文,有助于了解道光年间驻办事大臣琦善奏报内容,多有捏饰,虚应故事,粉饰太平,天高皇帝远,而苟安于藏地秘境。雍正年间的云贵总督,乾隆年间的伊犁将军,道光年间的驻藏办事大臣,反映了三个时期西陲边臣疆吏的不同实践过程。

雍正年间的云贵总督——以高其倬、鄂尔泰为中心

探讨雍正年间的边臣疆吏,把焦点放在云贵地区,有其历史背景。顺治年间(1644—1661),南明桂王永历帝(1647—1661)即位于广东肇庆。清军南下,桂王走广西。平西王吴三桂自四川,洪承畴出湖南,都统赵布泰由广西,三路进攻明军,桂王由云南腾越走缅甸。南方军事告成后,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兵力强盛。康熙年间(1662—1722),三藩之变,平西王吴三桂即以云贵等省为根据地,起兵反清。清初以来,由于云南、贵州的历史背景较特殊,满汉矛盾较尖锐化,汉族避难人口大量进入云贵地区,当三藩之变平定以后,康熙皇帝即谕令免除云南、贵州等省的苛捐杂税,与民休息。

雍正年间(1723—1735),在诸王大臣中,内有怡亲王胤祥,外有高其倬、鄂尔泰等人,内外夹辅。为了因应云南、贵州等省的治理,雍正皇帝对云南、贵州两省督抚的任命,都经过斟酌妥当,精挑细选,补授贤臣。为了便于说明,先将雍正年间历任云贵总督列出简表于下:

雍正年间(1723—1735)云贵总督年表

年份	云贵总督		云贵广西总督	
	姓名	记 事	姓名	记 事
元年(1723)	高其倬			
二年(1724)	高其倬			
三年(1725)	高其倬	十月初四日,调浙闽总督。		
	伊都立	十月初四日,由署山西巡抚升。十月二十六日,调山西总督。		
	杨名时	十月二十六日,由云南巡抚升,仍管云南巡抚事务。		
	鄂尔泰	十月二十六日,由广西巡抚调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务。		
四年(1726)	杨名时	七月二十一日,升吏部尚书,仍留巡抚任。		
	鄂尔泰	十月二十六日,实授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		
五年(1727)	鄂尔泰			
六年(1728)	鄂尔泰		鄂尔泰	十月初十日,奉命总督云贵广西三省。
七年(1729)			鄂尔泰	

年份	云贵总督		云贵广西总督	
	姓名	记 事	姓名	记 事
八年(1730)			鄂尔泰	
九年(1731)			鄂尔泰	七月初六日,进京陛见。
			高其倬	七月初六日,以两江总督署云贵广西总督。
十年(1732)			高其倬	
十一年(1733)			高其倬	正月初十日,调两江总督。
			尹继善	正月初十日,自署两江总督调云贵广西总督。
十二年(1734)	尹继善	十二月十二日,以用兵事竣,仍改为云贵总督,广西省就近仍归广东总督统辖。	尹继善	
十三年(1735)	尹继善			

资料来源:《清史稿校注·疆臣年表一》;《清世宗宪皇帝实录》。

由前列简表可知雍正年间高其倬、尹都立、杨名时、鄂尔泰等人先后补授云贵总督。雍正六年(1728)十月初十日,云贵总督奉命兼辖广西,改称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高其倬、尹继善先后补授云贵广西总督。雍正十二年(1734)十二月十二日,以用兵事竣,恢复云贵总督旧制,广西省就近仍归广东总督统辖。

高其倬,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曾兼佐领,五迁至内阁学士。康熙五十九年(1720),补授广西巡抚,亲往招抚叛苗。康熙六十一年

(1722)十一月,雍正皇帝即位后,擢高其倬为云贵总督。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入侵西藏,高其倬檄诸将自中甸进驻察木多。雍正二年(1724),清军平定青海,中甸喇嘛率众纳土请降,雍正皇帝褒奖高其倬筹划周详,料理妥当。高其倬具折奏陈开垦马厂,以济兵食。原折奉朱批:“周详之极,可嘉之至,如此方是封疆大臣也!”¹ 筹划周详是疆臣边吏的职责。高其倬奏闻开垦中甸田地,原折奉朱批:“用心筹划料理,可嘉之至,但此事可与年羹尧商酌。今西海已定,藏兵议彻[撤],中甸一带,若归内地,此事妙不可言矣;若不归内地,仍驻兵弹压,亦甚好事。但外地不宜留兵,若将来兵马全回之时,恐此事空举,可商酌定时,汝二人合同议奏。”² 平定青海,善后措施,经高其倬用心料理,深合圣意。

外任臣工,定期请安,是君臣伦理,从请安奏折,可以反映雍正皇帝和高其倬的君臣关系。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二十日,高其倬具折请安。原折奉朱批:“朕安,你好么? 新正新禧,伏赖天地神明之赐佑,愿尔两省风调雨顺,兵民乐业,一切平安如意也。”³ 雍正二年(1724)六月二十九日,高其倬具折请安,原折奉朱批:“朕躬甚安,都中内外平静,你好么? 今岁上苍垂佑,直省等秋成可书大有,此皆仰赖皇考在天之灵,慈护之所致,朕实感喜不尽,惟有朝干夕惕,与诸臣共勉敬畏二字耳,特谕,赐你眼镜两个,不知可对眼否?”⁴ 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高其倬具折请安,原折奉朱批:“朕安,你好么? 卿之可嘉,朕实谕不尽,诚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也,朕视卿实日重一日也。”⁵ 雍正皇帝以忠臣孝子嘉勉高其倬,对待高其倬日重一日。

雍正二年(1724),高其倬年四十九岁,每当灯下写字,即眼苦昏翳。同年九月十九日,高其倬接捧御赐眼镜两个,使高其倬遂觉“光明顿复”。高其倬与雍正皇帝(1678—1735)年岁相近,高其倬曾奏请陛见。雍正皇帝批谕时指出,“便来陛见,并无可谕,道路甚远,地方责任重大,无益往来何必,我君臣年纪,相见有日。”⁶ 高其倬在云贵总督任内,诸事料理妥当,俱合圣意,屡蒙嘉勉,所以“便来陛见,亦无可谕。”

边陲路远,封疆大吏,凡事都不能欺隐,君臣一体,一心一德,始能形成政治生命共同体。高其倬具折时坦承凡事“不敢稍隐,仅据实奏闻。”雍正皇帝针对“据实”二字批谕说:“朕生平只喜此二字。”⁷ 据实无隐是雍正皇帝对疆臣边吏的基本要求。雍正皇帝认为,“尔等封疆大臣能体朕之委曲,件件据实入告不肯掩蔽〔蔽〕朕之耳目,则与吏治民生大有裨益也。但君父之前那得出真来丝毫不隐,亦是难事,非常人之所能也,勉为之,朕实嘉喜之至。”⁸

高其倬获得雍正皇帝的知遇,昇以云南、贵州两省重任,又屡奉圣旨褒奖,主要是由于高其倬具备了担任边臣疆吏的条件。雍正皇帝披览奏折后指出,“览此奏,足见忠君爱国之心,朕实嘉之。”⁹高其倬治理苗疆,谨慎周密,不敢轻忽。雍正皇帝批谕说:“知道了,你办事,朕是放心。”¹⁰高其倬在云贵总督任内,悉心尽力,所以雍正皇帝可以放心。“总之,内外上下不必存一点忌讳之心,凡事务无隐为要,如此内外一体,上下一心,何愁吏治民生不能尽善也。”¹¹当云南巡抚鄂尔泰具折谢恩时,原折奉朱批云:“朕又得高其倬一人矣,可嘉之至,朕惟以手加额,尔等福寿绵长,永永辅弼朕躬,以利养生也。汝二人实朕之宝栋梁之器,高其倬朕视较汝还优。朕原许你第一大臣,今日要许你第二人也,朕实庆幸之至。”¹²封疆大吏贵能“辅弼朕躬”,同时具备国家栋梁之材。雍正皇帝对高其倬的嘉许,并非溢美之词。

高其倬、鄂尔泰堪称雍正朝边臣疆吏的楷模。鄂尔泰,满洲镶蓝旗人,他自幼兼习满汉文。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举。四十二年(1703),袭佐领,授三等侍卫。五十五年(1716),迁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元年(1723)三月二十二日,擢江南江苏布政使。三年(1725)八月二十五日,补授广西巡抚。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调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务。四年(1726)十月二十六日,实授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

鄂尔泰因受雍正皇帝非常知遇,所以能由员外郎在四年之内超擢巡抚、总督。雍正皇帝不轻许人,惟独对高其倬、鄂尔泰的嘉许,远逾其它臣工。雍正皇帝对鄂尔泰更是深信不疑。雍正皇帝批谕时指出,“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鄂尔泰在江苏布政使任内,无时不以“报君恩,尽臣职”为念,移风易俗,整顿吏治,不遗余力。当署理浙江布政使佟吉图途经江苏时,曾向鄂尔泰口宣谕旨称:“鄂尔泰自到江苏,声名甚好,毫不负朕恩,是天下第一布政。”鄂尔泰补授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务后具折谢恩,原折奉朱批:“览奏,朕甚为欣慰,新正大喜,诸凡平安如意也。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乃无量劫善缘之所致,期共勉之。”¹³鄂尔泰无时不以报雍正皇帝知遇之恩为念。雍正四年(1726)二月二十四日,鄂尔泰具折覆奏称:“自顾钝根,实何修而得此,若不勉力精进,稍有堕落,现在不作善因,未来定受孽果,既不敢亦不忍,惟愿生生世世依我慈父,了臣一大事,以求多福而已。”¹⁴

鄂尔泰与雍正皇帝年岁相近,但他事君如父。雍正皇帝关爱鄂尔泰,远胜己子。鄂尔泰曾具奏,“臣之一身疾痛,屣痒呼吸之间,上关圣虑。”雍正四年

(1726)五月二十五日,鄂尔泰具折奏陈图报圣恩,原折奉朱批云:“闻你总不惜力养精神,朕实忧而怜之,若如此则为不知朕,负朕也。似尔如此大臣,朕之关心若不胜朕顽劣之子,天地神明共鉴。”¹⁵雍正四年(1726)十月初二日,云南府知府袁安煜到任,口传谕旨云:“你到云南下旨与总督鄂尔泰,闻得他些许小事,每办至二、三更天,若是劳坏了时,不是欲报朕恩,反为负朕矣。嗣后但办大事,断不可如此。”¹⁶鄂尔泰具折奏称:“臣之受恩至矣,尽矣,内外臣工无有如臣者。”鄂尔泰凛遵慈训,加意调摄,并奏请雍正皇帝稍就暇豫,勿过于任劳。雍正皇帝日理万机,立志以勤先天下,外任臣工奏折晚间批谕者十居八九。鄂尔泰捧读朱批,每当读至“又系灯下字,堕目批览”等语时,即气咽涕垂,无以自处。直省外任大臣入京陛辞时,雍正皇帝不忍别至于落泪者,只有鄂尔泰一人,君臣之情如同手足腹心。

雍正年间,怡亲王胤祥、云贵总督高其倬、鄂尔泰三人,都是辅弼雍正皇帝的股肱心腹,内外合作无间,为清朝经营云贵苗疆创造了最有力的条件。其中最值得大书特写的,就是改土归流的措施。顺治、康熙年间,虽然已在云南、四川、贵州等边境省份开始改土归流,但当时仍以绥抚为主。到了雍正初年才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高其倬剿抚兼行。鄂尔泰接任云贵总督后日夜筹思,雷厉风行。

明清时期,在云贵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因其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在政治形态方面大体同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流官统治的地区,其各项制度,与内地州县基本相同;第二类是土司统治的地区,由朝廷授给当地部族首领各种官职,例如土府、土州、土县,或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名目,准其世袭,并实行与内地不同的各种制度,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习惯法等苗疆条例;第三类是既未派驻流官,亦未设置土司的所谓生界部落,或称生苗部落,各部落对朝廷并无纳贡、输赋、供征调的义务¹⁷。据统计,清初以来,在西南沿边省份曾经存在过的土司,大约有八百多个,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湖广、广西等省。土司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政权形式,具有浓厚的割据性,土司势力不断发展,边患日益严重。雍正四年(1726)九月十九日,鄂尔泰具折奏称:

苗獠逞凶,皆由土司,土司肆虐,并无官法,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杀相劫之计,汉民被其摧残,职任封疆,日夜筹思,若不尽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渐次擒拿,懦弱昏庸者渐次改置,纵使田赋兵刑,尽心料理,大端终无头绪。稍有瞻顾,必不敢行,稍有懈怠,必不能行,不敢与不能之心,必致负君

父而累官民,故以臣愚昧,统计滇黔,必以此为第一要务。然改归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¹⁸。

改土归流的进行,是以计擒,或令土司自行投献为上策。改土归流以后,地方田赋兵刑,始有头绪。云南布政使常德具折时亦指出,“云贵远处边徼,幅员辽阔,除石山陡崖以外,非尽不毛之地,若能因时制宜,近者种秔稻,高陆者艺菽粟,莫非膏腴沃壤。总缘流官管辖者十之三四,土司管辖者十之六七,土司不识调剂,彝人不知稼穡,俗语雷鸣田,遇雨则耕,无雨则弃,坐守其困。”¹⁹土司占据土地,禁止开垦,以致地荒民穷。

雍正年间,在云南、贵州等省广大的苗疆地区,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据统计,当时被改流的土司、土县和长官司以上,共计六十多个²⁰。改土归流后,原来被土司占有的可耕地,准许贫民开垦,并减轻农人的赋税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改土归流”一词,满文读如“*aiman i hafan be halafi, irgen i hafan obumbi*”,意即“改土官为民官”。改土归流后,土司苗疆,与内地无异,于是更换世袭的少数民族土官,而任命内地民官治理。改土归流的结果,使边疆逐渐内地化,在原来苗疆地区实行和内地各省一致的制度及措施,废除土司制度,改设府厅、州县,委任内地民官进行统治,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设立保甲、编查户口、丈量土地、清理钱粮、治河修路、建立学校。改土归流后,苗疆既成内地,于是提供内地汉人落地生根的广大空间,内地过剩人口,携家带眷地涌入苗疆,开山力作,搭厂垦荒,具有移民实边的意义,对巩固边防,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高其倬、鄂尔泰等边臣疆吏的视角是值得肯定的。

高其倬、鄂尔泰都是旗人,也都曾兼佐领,具有带兵经历。杨名时(1661—1736),江南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为李光地所器重。五十九年(1720),由贵州布政使擢云南巡抚。清军征西藏,杨名时留驻云南,颇能约束兵丁。雍正三年(1725)十月二十六日,擢云贵总督,仍管云南巡抚事务。因杨名时熟谙地方事务,所以继伊都立补授云贵总督。但是,由于雍正皇帝对汉人的防范,杨名时与雍正皇帝的互动关系,并不密切。杨名时在云南巡抚任内由云贵总督高其倬具折代缴朱批奏折,原摺奉朱批:“知道了,杨名时前日之题奏,朕看来只知有身而不知君之人。”²¹奏折制度是一种密奏制度,各报各的,彼此不能相商。巡抚奏折由总督代缴,其例罕见。从奏折数量的多寡,也可以反映君臣互动关系的密切与否。检查《宫中档》中高其倬、杨名时、鄂尔泰三人在云贵督抚任

内的奏折可列出简表如下：

雍正元年至五年云贵督抚奏折件数比较表
(1723—1727)

年份	高其倬	杨名时	鄂尔泰
元年(1723)	28	17	
二年(1724)	52	17	
三年(1725)	58	1	1
四年(1726)		18	52
五年(1727)		12	60
合计	138	65	113

资料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宫中档雍正朝奏折》，1977—1978年。

由前列简表可知雍正元年至三年(1723—1725)，现存高其倬奏折共计138件，年平均46件。从元年至五年(1723—1727)，现存杨名时奏折共计65件，年平均13件。从四年至五年(1726—1727)，现存鄂尔泰奏折共计112件，年平均56件。以年平均百分比来考察，高其倬奏折占40%；杨名时奏折占11%；鄂尔泰奏折占49%。杨名时奏折所占比例偏低，反映杨名时与雍正皇帝的互动关系，并不密切。雍正四年(1726)十二月初二日，杨名时收到御书《魏征十思疏》一卷。十二月十八日，杨名时具折谢恩。原折奉朱批：“看你至于文字奏对，更觉精神吏治，乃一篇大文章。若徒务此空文章，毫无益于世道民生，恐非圣门中人物，为名教中罪类也，慎之，戒之，失之毫厘，则差千里矣，可不可畏乎。”²²雍正五年(1727)十月初八日，鄂尔泰具折奏明云南省筹划养廉事宜，原折朱批提及杨名时云：“此亦杨名时沽名钓誉之举，不管可行与否，暂沽一时之名，而又纵容属员，设法取巧，而又置之不闻，又取悦与属员，成其宽厚，毫无实心惠民利官之意，大巧大诈之作用耳！”²³杨名时虽然声望颇高，是汉人中的领袖，又熟谙地方事务，但雍正皇帝认为杨名时沽名钓誉，有臣无君，徒尚空文，大巧大诈。雍正皇帝对杨名时的不悦，跃然纸上。同年十一月初十日，云南巡抚朱纲题参杨名时狗

隐废弛,藩库不清。《清史稿》记载,雍正四年(1726),杨名时由兵部尚书转吏部尚书,仍以云贵总督管云南巡抚。杨名时具题时,误将密谕载入,被雍正皇帝严责。朱纲题参杨名时后,谕鄂尔泰严讯。杨名时自承沽名邀誉,不敢巧诈,部议以杨名时始终掩护,朦胧引咎,无人臣事君体,坐狭诈欺公,当斩。奉旨宽免,命侍郎黄炳会同朱纲按治。黄炳等主张刑讯,鄂尔泰坚持不可,仅坐杨名时得盐银规八万两,除捐补银厂缺课外,追银五万八千余两²⁴。杨名时出身汉人,又不得君心,君臣之间缺乏良好的互动关系,雍正皇帝并未以杨名时为股肱心腹,注定了杨名时悲剧的命运。

乾隆年间的伊犁将军——以奎林为中心

准噶尔在天山北路,回部在天山南路,天山南北路可以屏蔽关陇。明清之际,正值俄罗斯积极东进之时,清军进讨准噶尔,实含有遏阻俄罗斯东进的意义。乾隆皇帝的本意,原欲俟荡平准噶尔后,即分封四汗,恢复四卫拉特旧规,令其各守疆界,以屏藩清室。因准噶尔汗阿睦尔撒纳降而复叛,遂导致清军第二次用兵,直捣伊犁。乾隆皇帝亦叹称,“此或上天将以全部卫拉特赐我国家耳。”被清军征服的四卫拉特,对清朝而言,可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准噶尔既尽入清朝版图,乾隆皇帝即明降谕旨,将准噶尔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昼夜节气,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其山川道里,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北京东堂天主教传教士天文学者傅作霖(Felix da Rocha)、钦天监监正高慎思(José d'Espinha)等遵旨前往伊犁,测量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各地形胜,绘图呈览。

清军既定准噶尔,随即派兵屯田,以期尽地利,而足兵食,并使远窜的厄鲁特人无从退回复踞故地。陕甘总督黄廷桂奏请由巴里坤以西,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处,以次建堡屯田,派兵驻防,由近及远,渐次举办,直达伊犁。因厄鲁特人不习耕作,而以绿旗兵丁及维吾尔人从事屯粮。驻防屯兵,准其携眷前往,分地垦种,各安其业,生聚畜牧,以期边陲可以渐成内地。

伊犁将军的设置,始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明瑞为首任伊犁将军。其后阿桂、伊勒图、永贵、增海、舒赫德、明亮、奎林、保宁、永铎、永保等人先后为伊犁将军。明瑞是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四年(1749),明瑞由官学生承袭世爵,授三等侍卫。二十一年(1756)五月,赴西路军营,在领队大臣上行走。乾隆皇帝以其奋勇行阵,授副都统。二十四年(1759)三月,授参赞大臣。同年

五月,随将军兆惠,进讨回部。二十六年(1761)五月,授正白旗汉军都统。二十七年(1762)十月十六日,授伊犁将军。明瑞在伊犁将军任内,对驻兵、屯田、设卡伦、添设理事同知等项,筹划周详。

阿桂,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乾隆三年(1738),中式举人。十三年(1748),随兵部尚书班第赴金川军营办事。二十年(1755)六月,清军进讨准噶尔,阿桂奉命驻乌里雅苏台办理台站。二十一年(1756)九月,授参赞大臣。二十四年(1759),随同副将军富德剿办回部。阿桂在伊犁遵旨专办耕作营造,其规划俱称旨。阿桂奏陈伊犁河以南海努克地方,水土沃衍,请于此处先行屯种。乾隆皇帝以阿桂所办甚是,果能实心奋勉,则屯田一事,当录阿桂经始之功²⁵。伊犁屯田,阿桂确实有“经始之功”。二十八年(1763)六月,以阿桂在军营殊为出力,在伊犁办事,俱甚妥协,加恩抬入上三旗,隶满洲正白旗。同年七月,调正红旗满洲都统。二十九年(1764)三月,署伊犁将军。三十二年(1767)三月初六日,实授伊犁将军。三十三年(1768)二月二十八日,阿桂授征缅甸副将军,满洲正白旗人伊勒图,以喀什噶尔办事大臣署伊犁将军。同年十月二十九日,伊勒图回京守制,命满洲正白旗人永贵署伊犁将军。三十四年(1769)十月初七日,永贵免,命满洲正蓝旗人宗室增海署伊犁将军。同年十二月初三日,宗室增海回福州将军本任,授伊勒图为伊犁将军。三十六年(1771)七月初九日,命伊勒图往乌什办事,授满洲正白旗人舒赫德为伊犁将军。三十八年(1773)七月初一日,召舒赫德回京,命伊勒图为伊犁将军。

乾隆五十年(1785)七月初十日,伊勒图卒。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满洲镶黄旗人奎林自乌鲁木齐都统调伊犁将军。五十二年(1787)十一月二十二日,奎林革职,递解入京,授蒙古正白旗人保宁为伊犁将军。

奎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承恩公富文之子,明瑞弟。奎林由拜唐阿(baitangga)承袭云骑尉,乾隆三十三年(1768)正月袭公爵。同年五月,授御前侍卫。六月,兼镶白旗护军统领,管理健锐营。三十七年(1772)十二月,授领队大臣,随副将军阿桂征金川。四十五年(1780)三月,授乌鲁木齐都统。四十六年(1781)七月,授乌里雅苏台将军。五十年(1785)七月二十八日,授伊犁将军。奎林为人倨傲嗜酒,性情躁急,行事乖张,他在伊犁将军任内,曾遭参奏,以致革职拏问。

《清国史·奎林列传》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月,参赞大臣海禄奏劾奎林,包括:任性乖张;毁弃佛像;辱骂职官;非刑致毙罪人;得受遣犯银两;于哈萨

克市易羊只,采买布疋,滥受余价银两等款。乾隆皇帝谕令乌鲁木齐都统永铎查核²⁶。奎林传稿所载参劾内容简略,依据《上谕档》中海禄奏参奎林各款,可将其要点列举如下:

- 一、将子孙娘娘庙内神像撩入河内。
- 二、罚遣犯高五银二千两修理城工衙署。
- 三、滥受哈萨克贸易应需回人布疋余银三千余两。
- 四、将察哈尔兵丁买羊,每只坐扣银三钱,并不照众人一体坐扣银二钱五分,多坐扣银七百余两。
- 五、护庇理事同知敦珠克娶厄鲁特之女为妾。
- 六、将发遣罪犯断去手足,以石压背,割人茎物,塞入口内,弃尸河内。
- 七、理事同知敦珠克在奎林衙署内彻夜醉饮,倚势吓众。
- 八、将枷号遣犯张三等交理事同知敦珠克、同知庄肇奎暗刑致毙。
- 九、与富宁一同酒醉,将同知衙门书办二名传去,鞭责六、七百致毙人命。
- 十、原任道员陈庭学欲保仓官,敦珠克私将陈庭学紧要罪由删去,经海禄看出,而奎林不将敦珠克申饬。
- 十一、任意乖张,无论现任或革职大小官员口出秽言,连其祖父一并辱骂。
- 十二、乌鲁木齐都统永铎查奏伊犁总兵索费英阿因奎林生日,赠送金如意一柄、金盘一个、金杯两个、蟒袍一件、铜镜两面、凉席一块,共六件,交同知庄肇奎变卖。

参赞大臣海禄参劾奎林奏折到京后,乾隆皇帝谕令皇子、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尚书喀宁阿、胡季堂等人针对海禄奏参各款,逐一严加讯问,并令海禄与奎林当面对质。其中海禄原奏内奎林将庙内神像抛弃河中一款,据遣犯于时和供称,“闻得伊犁有子孙娘娘庙内二座,凡妇女人等常到庙内烧香,奎林因新疆地方不便有这些事情,恐招摇滋事。又因没有公所,是以就将泥像撩入河内,庙宇改作公所。”²⁷子孙娘娘崇拜是民间信仰,北亚萨满信仰是一种多神崇拜,子孙娘娘也是萨满信仰中的神祇之一,奎林强行取缔。据奎林供称:

伊犁外城,商民添建娘娘庙三处,满营兵丁及妇女往往入庙烧香作会,竞至夜间聚集念经,男女混杂,甚属不成事体,我所以将念经的人着该管官鞭责,

会中锣鼓等项,全行毁碎,其经语亦即令烧毁,佛像抬出,掳入河内,所有庙宇入官,作为公所,这是有的。但我既将庙宇入官,实是我任性糊涂,办理过当,情甘认罪。²⁸

顺治年间,已经题准禁止妇女入庙烧香²⁹,奎林禁止妇女入庙烧香做会,虽然是他职责所在,但他并未具折奏明,烧毁经语,将佛像掳入河内,引发民怨,造成社会不安,处理过当,可以说明奎林为人任性糊涂,处理事情,并不妥当。

海禄原参奎林任意乖张,无论现任或革职大小官员都口出秽言一款,奎林供认初到伊犁时,以绿营余丁营伍废弛,私自除名,并有外出者,差兵、屯兵、营员多有瞻徇情面,拨给他人使唤,因其不成事体,绿营官员不认真办理,“将他们骂过是有的”。整顿营伍是将军分内的业务,但奎林糊涂性急,出言不能检点,任意乖张,有失大臣体。遣犯于时和亦供出,“他的性情向来急躁,凡是下属办事错误之处,即大声斥喝原是有的”。

海禄原参奎林将遣犯不按律例具奏办理,而将遣犯手足断折,以石压背,弃尸河内一款。奎林在他的供词中指出,伊犁遣犯共六千余人,其中刘四是“积匪猾贼”,发配到伊犁为奴后,又行窃羊只,用刀伤事主。奎林以刘四凶横可恶,若照常办理,各遣犯不知畏惧,所以就吩咐将刘四手足剁去,掷于河内,藉以惩戒众遣犯。奎林剁去遣犯手足,弃尸河内,已是私刑,过于残酷,民怨沸腾,又未将办理缘由具折奏明,心存隐瞒,有失边臣体。

奎亮是奎林之兄,高五是发遣伊犁为奴的罪犯,年满为民,被奎林逐出伊犁城外,高五欲领票回籍,恐怕奎林不准,于是央人请托奎亮,许事成给银二千两,求奎亮说情。奎林以伊犁城垣周围根脚塌陷之处甚多,鼓楼亦已破损,即罚高五出银二千两,以备春融动工之用³⁰。伊犁地处西陲,鞭长莫及,伊犁将军可以藉驿站驰递奏折,军机处即以寄信上谕指授方略。但是奎林希图隐饰,天高皇帝远,任意乖张。奎林罚遣犯高五出银修城,虽然无分毫入己,但他并未将罚出高五银两充公之处,具折奏明办理情形,明显地不合规定。其余参劾各款,奎林亦未将办理缘由具折奏闻。

乾隆五十三年(1788)二月初九日,颁降《内阁奉上谕》,乾隆皇帝指出,奎林受恩深重,身为将军大员,乃率意妄行,殊堪骇异。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定拟具奏将奎林照擅杀罪人律问拟满杖。海禄照诬告人死罪未决律问拟杖流。乾隆皇帝认为海禄是原参之人,所拟罪名,较奎林为重,恐致妄生议论。因此,谕令将奎

林、海禄二人一律定拟。奎林乖张任性,不可复任将军,海禄挟嫌诬捏,亦不可膺参赞之任,奎林业经革职,海禄亦奉旨革职,免其杖流。惟因奎林、海禄二人俱曾带兵出力,尚属有用之才,不可令其终致废弃,故俱罚令在上虞备用处拜唐阿(baitangga)上效力行走。理事同知敦珠克奉旨枷号三个月,满日,发往库伦,效力赎罪³¹。参赞大臣海禄奏参伊犁将军奎林各款恶迹,是否言过其实,挟嫌诬捏,虽然有待商榷,但伊犁将军奎林任性乖张的举止,对边疆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作用,充分反映了边臣疆吏天高皇帝远缺乏忧患意识的个性。

道光年间的驻藏办事大臣——以琦善为中心

西藏是青海、四川、云南的屏藩,自拉萨东行,走茶马古道,可经由西康而入四川、云南;自拉萨北行,可越青海而达蒙古,西藏在清朝国防上处于重要地位。清初以来,屡平藏乱。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月,因青海众台吉与拉藏汗不和,西藏事务不便仍令拉藏汗独理,经王大臣议准派侍郎赫寿前往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这是清朝政府设置驻藏办事大臣的滥觞。但据《清史稿》的记载,驻藏办事大臣的正式设置是始自雍正五年(1727)。是年正月三十日,命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赴藏办事。僧格等抵达拉萨后,遵旨晓谕达赖喇嘛、康济鼐、阿尔布巴等和衷办事。嗣后常川设置驻藏大臣二员,办理前后藏事务³²。乾隆十五年(1750),废除藏中汗王贝子称号,设噶布伦四名,分管政事,增设驻防兵一千五百名。但是驻藏办事大臣形同虚设,对于藏内的用人行政,并无指挥行使实权。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Gurkha)第一次入侵后藏,钦差大臣巴忠听任西藏议和代表丹津班珠尔等许银赎地,迁就议和,办理不善,又导致廓尔喀第二次兴兵再犯藏界,充分反映清朝驻藏办事大臣的无力感。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政府乘进讨廓尔喀胜利余威,由军机大臣阿桂等人议定西藏问题善后章程一百余款,积极改革藏政,提高驻藏办事大臣的地位与权力。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及管事喇嘛,事无大小,均应禀明驻藏办事大臣办理。噶布伦缺出,于戴琿、商上仔琿、商卓忒巴内由驻藏办事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正陪升补。后藏商卓忒巴等缺出,亦照前藏成例,由驻藏办事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补放。遇外国禀请事件,均应由驻藏办事大臣主持,与达赖喇嘛商同办理,噶布伦不得与外国私行通信。各大寺坐床堪布出缺时,应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办事大臣等拣择,派往住持。青海、蒙古

王公大臣等差人赴藏延请喇嘛诵习经典,由西宁办事大臣行文赴藏,再由驻藏办事大臣给与执照,彼此关会。为整饬呼毕勒罕流弊,特制金奔巴,令御前侍卫赍往西藏,设于前藏大昭寺,嗣后藏内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呼图克图等呼毕勒罕时,即将报出幼孩内择选数名,将其生年月日、姓名各写一签,放入金奔巴内,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办事大臣在众僧面前掣签决定。又于京师雍和宫内设一金奔巴,若蒙古地方所出呼毕勒罕报明理藩院时,即将其姓名年月缮写签上,放入金奔巴内,交掌印札萨克蒙古喇嘛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与理藩院堂官共同掣签。善后章程的内容,涉及西藏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与宗教各方面,不仅扩大驻藏办事大臣的职权,更加巩固清朝政府在西藏的统治权,确定了清朝政府在西藏的完整主权。

就边政问题而言,有清一代,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经营及整顿,并未停顿。嘉庆年间(1796—1820),朝野上下,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意识到因时变通的迫切性,要求改革,已经形成一股政治潮流。道光年间(1821—1850),君臣受到当时政治改革思潮的影响,道光皇帝在即位之初,即下诏整顿内政,驻藏办事大臣奉旨查办班禅额尔德尼指控诺们罕一案,可以归入道光朝的内政问题,可将历任驻藏大臣的迁调,列出简表如下:

道光年间(1821—1850)驻藏办事大臣年表

年份	姓名	迁调日期
元年(1821)	文干	
二年(1822)	文干	
三年(1823)	文干 松廷	七月十五日,调。 七月十六日,自西宁办事大臣调任驻藏办事大臣。
四年(1824)	松廷	
五年(1825)	松廷	
六年(1826)	松廷	
七年(1827)	松廷	正月二十七日,调兵部右侍郎。

年份	姓名	迁调日期
七年(1827)	惠显	三月二十八日,自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调驻藏办事大臣。
八年(1828)	惠显	
九年(1829)	惠显	
十年(1830)	惠显 兴科	十月十九日,奉诏入京。 十月十九日,命。
十一年(1831)	兴科	
十二年(1832)	兴科	
十三年(1833)	兴科 隆文	正月初七日,召兴科入京。 正月初七日,自驻藏帮办大臣调驻藏办事大臣。
十四年(1834)	隆文 文蔚	八月十一日,调理藩院右侍郎。 八月二十二日,自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调驻藏办事大臣。
十五年(1835)	文蔚 庆禄	十二月二十日,迁盛京刑部侍郎。 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副都统衔充驻藏办事大臣。
十六年(1836)	庆禄 关圣保	八月初五日,调贵州布政使。 八月初五日,自太仆寺卿调驻藏办事大臣。
十七年(1837)	关圣保	
十八年(1838)	关圣保	
十九年(1839)	关圣保 孟保	十月二十九日,回京。 十月二十九日,命。
二十年(1840)	孟保	

年份	姓名	迁调日期
二十一年(1841)	孟保	
二十二年(1842)	孟保	十一月初三日,回京。
	海朴	十一月初三日,命。
二十三年(1843)	海朴	三月二十三日,回京。
	孟保	三月二十三日,命。十一月十一日,回京。
	琦善	十月十一日,代。
二十四年(1844)	琦善	
二十五年(1845)	琦善	
二十六年(1846)	琦善	十二月十九日,调四川总督。
	斌良	十二月十九日,自刑部右侍郎调驻藏办事大臣。
二十七年(1847)	斌良	十一月,卒。
二十八年(1848)	穆腾额	正月十四日,命。
二十九年(1849)	穆腾额	
三十年(1850)	穆腾额	

资料来源:《清史稿校注·疆臣年表十一》;《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

前列驻藏办事大臣简表中,文干是他塔喇氏,满洲正红旗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初五日,命原任驻藏办事大臣玉麟回京,文干以已革河南巡抚,赏副都统衔为驻藏办事大臣。松廷是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三年(1823)七月十六日,由西宁办事大臣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调驻藏办事大臣。惠显是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七年(1827)三月二十八日,惠显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为驻藏办事大臣。兴科是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十年(1830)闰四月,赏头等侍卫,充驻藏帮办大臣。隆文是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道光十年(1830),授驻藏帮办大臣。十一年(1831),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十三年(1833)正月初七日,授驻藏办事大臣。

文蔚是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十二年(1832)十月,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四年(1834)八月二十二日,赏副都统衔,充驻藏办事大臣。庆禄是满洲镶红旗人,道光十五年(1835)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副都统衔充驻藏办事大臣。关圣保是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六年(1836),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同年八月初五日,充驻藏办事大臣。孟保是孟佳氏,汉军镶黄旗人,道光十八年(1838),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十九年(1839)十月二十九日,充驻藏办事大臣。海朴是宗室镶蓝旗人,道光十九年(1839)七月,补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同年十月充驻藏帮办大臣。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三日,调驻藏办事大臣。琦善是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充叶尔羌帮办大臣。二十三年(1843)十月十一日,孟保回京,琦善代驻藏办事大臣。斌良是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二十六年(1846)十二月十九日,自刑部右侍郎调驻藏办事大臣。穆腾额是满洲正黄旗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正月十四日,赏副都统衔充驻藏办事大臣³³。由历任驻藏办事大臣的出身加以考察,他们都是旗人,或赏给副都统衔,或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多属于武职人员,都有专折具奏权。驻藏办事大臣是清朝治藏政策的具体实施者,驻藏办事大臣制度史,其实就是一部清朝政府治理西藏的政治史。国庆撰《论清代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一文已指出,有清一代的驻藏办事大臣良莠不齐,但多能克尽厥职,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³⁴。

清朝国史馆、民初清史馆虽为历任驻藏办事大臣纂修列传,但内容简略。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典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军机处档·月折包》等原始数据,进行探讨,有助于了解驻藏办事大臣处理西藏地方内政问题的过程,及其弊端。本文特以道光年间琦善处理班禅额尔德尼等指控诺们罕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贪黷营私案件为例,是探讨西陲边臣疆吏不可忽视的个案。诺们罕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1792—1877),汉译又作策墨林诺们汗阿旺绛贝楚臣嘉措。张庆有撰《琦善与策墨林诺们汗》一文,对诺们汗阿旺绛贝楚臣嘉措的生平事迹,叙述颇详³⁵。

呼毕勒罕(Hūbihan)是借活佛转世来转移宗教权力的一种特殊方式,也是藏传佛教的特点之一。为了解决宗教首领继承问题,藏传佛教即以灵魂转世的概念为依据,以寺庙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创立了活佛转世的宗教制度,它是用维护寺庙独立经济及宗教特权作为巩固西藏政教合一的一种统治手段³⁶。活佛转世相承的办法,对藏传佛教寺庙集团的法统继承问题及巩固寺庙集团的政治、经济

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使寺庙领导集团保持相对的稳定,避免了内部因权力之争而引发分裂。但是活佛转世的宗教制度,也有它的种种弊端。乾隆五十七年(1792),《寄信上谕》中有一段内容如下:

阿旺楚尔提穆止系西藏寻常喇嘛,因其熟习经典唤至京,朕加恩封为禅师堪布,两次派往前藏帮同达赖喇嘛办事,非如素有根基之呼图克图可比,何得有呼毕勒罕之事。此皆该喇嘛徒众藉称伊师转世,可以照旧掌管财物。着传谕和琳,如达赖喇嘛及其徒众不向和琳提及此事,竟可置之不论,惟寺庙无人管束,拣择一人作为堪布,令其掌管。³⁷

寺庙喇嘛集团为照旧掌管财物,每藉活佛转世而取得合法继承权。驻藏办事大臣和琳入藏以后,遵奉谕旨,不准寻找阿旺楚尔提穆呼毕勒罕。嘉庆五年(1800),阿旺楚尔提穆徒众竟由雍和宫金瓶掣签转世,入瓶掣定,行文到藏。从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嘉庆五年(1800),前后不过八年,竟准其转世,前后错谬。嘉庆六年(1801),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由甘肃洮洲进入西藏,在下巴拉买巴寺学经,在其前辈诺们罕阿旺楚尔提穆所修建的寿宁寺内居住,他从蓝占巴起升至堪布。嘉庆二十四年(1819),因掌办商上事务印信的第穆呼图克图圆寂,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奉命掌管印信。后来敕封诺们罕萨玛第巴克什,充达赖喇嘛正副师傅,曾经两次随同钦差大臣照料达赖喇嘛转世掣瓶坐床,又坐噶勒丹·宗喀巴床七年,道光皇帝即位后曾赏给玉如意等件。

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初三日,驻藏办事大臣琦善入藏到任后,七世班禅额尔德尼等列款指控诺们罕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贪黷营私,包括:不务清修;意存自满;拆占商上房间,创建祝庆寺庙宇;擅用未蒙恩赏轿伞;强据商上产业;侵占百姓田庐;私拆达赖喇嘛房间;隐匿逃人;铃用印信不在公所;独断独行;呈进贡物不出己资;滥支滥取;信用喇嘛改桑拉木结;勒索僧俗财物;任性听断;苦累藏民;收留逃奴以为私党;听许馈送房屋;达赖喇嘛之前不知尊敬照料等,驻藏办事大臣琦善具折奏闻。道光皇帝认为此案对藏传佛教大有关系,即谕令琦善会同班禅额尔德尼率同第穆、济咙呼图克图等逐款严究。

诺们罕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掌办商上事务多年,其擅作威福、贪赃枉法的情形,极为严重。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军机处档·月折包》中含有诺们罕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的亲供述,其营私舞弊各款,共计十七项,是就班禅额尔德尼

等呈控项目逐款供,其要点共计十七款,供认不讳,恶迹多端。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一月二十九日,琦善遵旨将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历次所得职衔名号,全行褫革,查封其资财。原任驻藏办事大臣孟保奉旨回京,革去副都统。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军机处档·月折包》内含有《查封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资产清单》,详列名称及其重量,主要包括金银器、服饰布疋、珍玩器物等类,品类繁多,数量屈指难数。

琦善审拟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等犯奏折到京后,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十五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片留中。”军机大臣等遵旨议覆,将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为奴,永远不准他再出呼毕勒罕³⁸。从乾隆末年以来,清朝政府已将西藏内部事务视同内政问题来处理,但因西藏地处边陲,鞭长莫及,同时对藏传佛教信仰因俗而治的历史背景,理藩院则例亦无拟罪专条,僧俗人众犯事,未便动辄科以内地刑律,以致藏中事务,积弊丛生,对西藏社会也产生了负面的作用。琦善入藏后曾经拟订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但因掌办商上印务威权已重,复兼达赖喇嘛师傅,集大权于一身,易滋舞弊,而莫敢谁何,西藏内政的兴利除弊,遂难上加难。琦善具奏时指出,“商上出纳,全从夷俗,项非国帑,势难代为握算。”理藩院例载商上各公所一切公用收支,均责成驻藏办事大臣稽核出纳,札什伦布出入连布施,亦交驻藏办事大臣稽查。琦善具奏时指出,“前后藏各只粮员一人,并无候补试用闲职,与内地各有专责层层握算者,迥不相同,全责成大臣持筹代为经理,又系番语番文,目所未经,只不过依样葫芦,有名无实。”因此,琦善奏请“嗣后商上及札什伦布一切出纳,仍听该喇嘛等自行经理,无庸驻藏大臣插手”³⁹。琦善原奏,说明向来驻藏办事大臣对商上出纳,只是虚应故事,有名无实。同时反映清朝中央政府始终未能控制西藏地方的财政权。

天高皇帝远,驻藏办事大臣,是否恪尽厥职,尽忠职守?琦善查办案件,有无捏饰?仍待商榷。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曾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十八日递进呈文,此外还有三件书面请求,指出“因琦大人所奏,多有捏饰。”向例驻藏办事大臣抵藏到任,藏中僧俗大众都要备礼前往迎接。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原呈中指出,“琦大人到任,大众照向例去接,小僧也接去了,并没违误,并照向例备礼往送,也不晓得是礼送太少了,大人见怪。”驻藏办事大臣有使用折子上奏的特权。向例,驻藏办事大臣缮折进呈时,为示恭谨,多于密封驰递时,行九叩礼,并放九炮。但据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在原呈中指出,“向例大人们上折

子,都是九叩首,放九炮。但藏中小人等都知道这规矩。今琦大人奏折时,也不叩首,也不放炮,与例不合。”西藏僧俗都敬重达赖喇嘛,琦善对待达赖喇嘛似有不敬之处。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原呈指出,“向来大人们待达赖喇嘛都是恭敬的,今琦大人到达赖喇嘛那里去,因达赖喇嘛年幼,由床上抱在地下,引着过来过去,只当小孩儿般顽耍。”原呈又称,“向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远出,多要奏明。今琦大人并不奏请,也不与钟大人商量,竟自打发通事至后藏将班禅额尔德尼于八月初五日请到前藏,在驻藏大人衙门内住下,与向例不合。”清朝中央政府为振兴黄教,而以本教、红教为邪教。道光年间,章嘉呼图克图亲往红教寺院求经,琦善并不阻止,而破坏了黄教的规矩。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原呈指出,“向来奉旨黄教是正教,余外本卜经是黑教,呢吗经是红教,均系邪教,既不准念。章嘉呼图克图到藏,有多只札寺院向念呢吗经,章嘉呼图克图亲往求经,坏了黄教的规矩。”原呈又称,“第穆呼图克图在藏,向来按着黄教规矩办事,极为安静,自章嘉呼图克图来后,就不安静了。不晓得章嘉呼图克图临走时如何把第穆呼图克图教坏,师父的话也不肯听,老徒弟的话也不肯听。跑马射箭打枪,穿有袖子的衣服,还有女人,满汉的人多知道琦大人到藏,与第穆呼图克图相好,他的不好处,琦大人都知道,全不办。”⁴⁰

藏传佛教久为藏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所信奉,清初诸帝,护持黄教,可谓不遗余力。乾隆年间对藏传佛教的改革,以及驻藏办事大臣权力的提高,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因西藏地处边陲,驻藏办事大臣不谙藏族语文,理藩院则例,徒属具文,驻藏办事大臣除了军事监督外,对西藏内部的财政、行政,并无决策权,驻藏办事大臣有名无实,虚应故事而已,以致驻藏办事大臣进呈皇帝的奏折,多有捏饰。譬如拉达克喇嘛跟役执持诺们罕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所发路票,欲由济咙龙返回原游牧地,路过布竹厂地方,遭遇阻挡后,改赴前藏。后经查明起因于诺们罕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私将布竹厂地方赏给外番洛敏达部长管理,盖印断牌。前任驻藏办事大臣孟保不闻不问,任听其擅行发给外番印照住牧。孟保办理错谬,奉旨革去副都统,召回京师⁴¹。姑且不论孟保的错谬,或琦善的捏饰,都充分反映边臣疆吏天高皇帝远粉饰太平的苟安心理。

结 语

康熙年间开始实行的奏折,是清朝政府体制外的一种君臣秘密通讯工具,亦

即皇帝和相关文武大臣之间所建立的单线书面联系。皇帝藉朱批谕旨勸勉臣工,指授方略;外任臣工藉奏折下情上达,奏陈请旨。密奏制度充分发挥了高度沟通的作用,有利于政令的推行。

不断分割内阁部院权力,逐渐由外朝转向内廷,是清朝政治发展的一种显著特色,军机处的设置,就是内廷集权的产物。军机处具有辅助、协调、执行的作用。外任臣工的朱批奏折,由军机处录副存查,皇帝谕旨由军机大臣撰拟,重大案件人犯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等衙门审拟,录有供词。《宫中档》朱批奏折、《军机处档》谕旨、供词、呈文等,都是可信度颇高的源文件资料。充分利用第一手直接史料,对清朝西陲边臣疆吏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并进行纵向探讨,就是考察西陲边臣疆吏的基本方法。

清朝西部边陲的经营,有其历史发展过程。雍正年间的“新疆”,主要是指云南、贵州的苗疆地区。云贵地区的治理,边患的消弭,边疆与内地关系的调整,都需要周详规划,高其倬、杨名时、鄂尔泰等人先后补授云贵总督。高其倬、鄂尔泰都是旗人,有带兵经验,治绩良好,君臣互动关系密切,奏事称旨,成为皇帝的股肱心腹。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化边疆为内地,对边防的巩固,具有积极的意义,高其倬、鄂尔泰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雍正五年(1727)十月初一日,鄂尔泰祇领钦赐御书匾对“诚悃宣猷”四字,“体国公忠股肱膺重寄宪邦文武梁栋得纯臣”十八字。高其倬、鄂尔泰都是克膺重寄,公忠体国的股肱栋梁,他们在云贵政治舞台上都扮演了喜剧角色。杨名时是汉人,在满汉族群矛盾尖锐化的历史背景下,身为汉人领袖的杨名时虽然熟谙地方事务,但他与雍正皇帝的互动关系,并不密切,他的奏折件数偏低,又要由高其倬代缴朱批奏折,雍正皇帝对杨名时的沽名钓誉,颇不以为然。当新任云南巡抚宋纲题参杨名时狗隐废弛时,杨名时便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乾隆年间的“新疆”,是指天山南北路。清军平定准噶尔、回部后,将新疆纳入清朝版图,派兵屯田,携眷驻防,设置伊犁将军,这种具有移民实边性质的八旗驻防,对西北边防的巩固,产生重要的作用。伊犁将军明瑞、阿桂等人对驻防与屯田的周详筹划,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奎林在伊犁将军任内任性乖张,擅杀罪犯,纵酒糊涂,诸凡不具折请旨。从参赞大臣海禄参奏奎林各款恶迹,可知奎林对边疆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作用。虽因驻防屯田制度的稳定性较高,并未因奎林的有失职守而导致边疆社会的动荡,但也反映了边臣疆吏天高皇帝远缺乏忧患意识的个性。

西藏久隶清朝版图,雍正年间,正式设置驻藏办事大臣。但因西藏地处边陲,与尼泊尔等地接壤,边疆危机较为严重。乾隆末年,乾隆皇帝乘清军进剿廓尔喀军事胜利之余威,改革西藏内政,加强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提高驻藏办事大臣的地位与权力。从道光年间驻藏办事大臣琦善处理班禅额尔德尼等指控诺们罕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贪渎营私案件相关奏折、供词、呈文等档案资料,反映了西藏内政的各种弊端。从乾隆末年以来,虽然将西藏内部事务视同清朝内政来处理,惟因西藏地处极边,鞭长莫及,益以朝廷对藏传佛教因俗而治的政策,理藩院则例,徒属具文,驻藏办事大臣除了军事的监督权外,对西藏内部的财政、行政等,并无实际指挥权,只能虚应故事,以致奏折内容多有捏饰,欺上瞒下,充分反映了边臣疆吏天高皇帝远粉饰太平的苟安个性。总之,探讨清朝西陲云贵、新疆、西藏三个区块的边臣疆吏在不同政治舞台所扮演的各种角色,是有意义的。

〔注 释〕

- 1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7年12月,页496。
- 2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辑,页526。
- 3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辑,页197。
- 4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一辑,1977年11月,页825。
- 5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辑,页652。
- 6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三辑,1978年1月,页593。
- 7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辑,页362。
- 8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三辑,页363。
- 9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三辑,页650。
- 10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三辑,页504。
- 11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三辑,页837。
- 12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五辑,页646。
- 13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五辑,页484。
- 14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五辑,页646。
- 15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六辑,页59。
- 16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六辑,页874。
- 17 张捷夫撰《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4月,页273。
- 18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六辑,页603。
- 19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六辑,页371。

- 20 张捷夫撰《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清史论丛》，第三辑，页202。
- 21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四辑，页79。
- 22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七辑，页120。
- 23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九辑，页108。
- 24 《清史稿校注》，台北，国史馆，1989年2月，第十册，列传七七，页8834。
- 25 《清国史·大臣画一传档次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6月，卷一，页452。
- 26 《清国史·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奎林列传》，卷一六八，页175。
- 27 《乾隆朝上谕档》，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6月，第十四册，页59。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于时和供词。
- 28 《乾隆朝上谕档》，第十四册，页59。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奎林供词。
- 29 《读例存疑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三），页420。
- 30 《乾隆朝上谕档》，第十四册，页149。
- 31 《乾隆朝上谕档》，第十四册，页160。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
- 32 《清史稿校注·疆臣年表九》，第九册，台北，国史馆，1988年2月，页6968；《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台北，华文书局，1964年1月，卷五二，页30。
- 33 《清国史·大臣画一传档次编》，卷八九至一二八；大臣画一传续编，卷十、十五、六一、八七；大臣画一传后编，卷二二、五八。
- 34 国庆撰《清代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西藏研究》，1998，第二期，页55。
- 35 张庆有撰《琦善与策墨林诺们汗》，《西藏研究》，1990，第二期，页74。
- 36 孙雨志等撰《谈谈西藏宗教习俗》，《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三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9月，页106。
- 37 《宫中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2731箱，44包，7967号。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琦善奏片。
- 38 《军机处档·月折包》，台北，故宫博物院，第2752箱，114包，73608号。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军机大臣穆章阿等奏折。
- 39 《宫中档》，第2731箱，44包，7970号。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琦善奏片。
- 40 《军机处档·月折包》，第2752箱，113包，73363号。阿旺札木巴勒酷勒提木札木素原呈。
- 41 吴丰培辑《清代藏事辑要》，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页413。

临危受命 尽职尽责

福建水师将领：一支“精英之师”？

柯兰(Paola Calanca) 著

吴旻 译

清军南下之际,无论从抵抗的激烈程度而言,还是从相继发生的冲突的持久程度而言(一直持续到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沿海地区都是最为关键的前线之一。16世纪亚洲海上贸易激增,中国沿海走私活动猖獗,以及从16世纪中期的倭寇横行,都使东南沿海地区成为问题焦点,显示了其作为沿海边疆的重要性。而早在明初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之时,他就已经在整个沿海增加了驻军和卫所,将海岸线纳入明朝边疆防御体系之中。然而,除非在非常时期,由于在这一前线的威胁极小,因此中央政府对于维护其防御设施的关心相当有限。清朝立国之初,在攻占及平定了南方地区之后,上述情况再度重演,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欧洲人占领东南亚地区并且深入到中国南部沿海后,清廷视之作为一种威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1716年12月9日),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在有关海防和海外之事的谕旨里,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西洋人的猜忌,对于汉人亦是如此: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又汉人心不齐,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¹

由于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使得政府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对沿海居民和海事活动的控制来维持东南沿海的稳定:即实行“海禁”并严格保甲

制度。这种政策的好处在于可以限制维持一支能够作战的水师的军费。在人员方面，朝廷特别关注招募熟识东南沿海的有经验的人。朝廷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些边远地区，主政的关键就在于入乡随俗，因势利导。因此，当一位官员推举候选人之时，首先考虑和重视的是他在地方州县或是沿海地区的为政经验，他是否出身于沿海地区也是条件之一，有时后一条件就足以使他当选。由于在东南沿海经常有盗匪横行，因此不得不在选拔官吏，甚至文官时，都倾向于选择一位实干家，要求他不仅有优秀的管理才能，而且在平叛剿匪的行动中或是在训练军队之时也具有非凡的能力²。对于军队将领来说，这一点就更加重要，基于他们对于地方事务的熟悉³，他们被选中后甚至可从文官转为武职⁴。一些文武高官因熟悉当地事务民生、海战军务，在同一职位上任职多年。还有一些武官则自始至终一直在沿海任职，在仕途上一步步攀升⁵。

与文官相比，任用武官的规则没有那么严格，对于那些好水手而言，在水师里步步高升轻而易举⁶。甚至于回避制度在军队里实施时也有许多例外情况存在。特别是经常看到武职官员就在他们原籍的省份，甚至是原籍的地区服役。这一措施，在江防和海防的水师成立之初就开始实施，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建立一个熟悉当地事务习俗的精干的官员整体，更重要的是弥补当地正途官员的严重不足⁷。例如，从康熙初年（1662）至嘉庆末年（1820），历任水师提督大都为福建本省籍，特别是闽南沿海的泉州、漳州人。本文试图厘清政府在水师里优先招募本地人员是出于何种目的、受何种因素影响；而海疆的诸多因素究竟在任用官员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并且试图诠释是否在海防事务中存在一支“专业”的官员队伍⁸。

在我们前期研究中已经看到，一方面由于经费拮据，另一方面由于贪污腐败的原因，福建的军队似乎前景堪忧⁹。同时，在该省服役的、本省出身的大部分水师将领的确对于海疆的管理，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整个海事活动的控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样的选择也可以理解为政府的一种努力，试图使该省饱受长期战争蹂躏的人民有一种亲切感，利用这里人们非常重视的桑梓之情，获得他们的认同，以便尽快重建起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经济秩序。除此之外，政府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平定台湾郑氏战争的胜利，不仅应归功于这支以福建本省人为主的水师，而且其指挥者又多为郑氏降将，所以由此取得的最初成效，使得政

府更加坚定了这种选择：在18世纪初期，地方政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真正的合作。然而这种情况却没有持续很久，从18世纪中期开始，在文官与武官之间，高层与地方官员之间，当然还有官府与百姓之间，都开始出现矛盾和怨恨。特别是当地的基层武官，他们通常出身于沿海地区，或者因长期任职而融入当地社会之中，似乎从此时起，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参与政府决策。尽管目前还不能完全解释这种“裂痕”的原因何在，然而它是否对18世纪中期以后的水师组成与活动产生了影响？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其他沿海省份武官出身的状况，尤其是那些南方的省份（从浙江到广东），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这种选择的缘由，似乎任用诸多原籍为福建的武官主要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即需要熟悉航海技能的人。在平定海疆之前，清朝政府已经在福建的民众中招募水师统领——当时他们多为原郑氏军中之人，通过这种做法，使得清军迅速建立起一支有实战能力的水师¹⁰。此后，甚至连福建这样以出优秀航海家著称的省份，似乎也感觉缺少有经验的水手。最能干的水手事实上被优厚的待遇吸引到了商船之上工作。正如雍正十二年（1734）福建水师提督王郡（？—1756）所言：既要有海上经验又要有实战指挥经验，真是一将难求，“缘水师事务无不溅水沾泥，举动粗率，以故长于水师者未免短于营伍”¹¹。而招募士兵同样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一方面需要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而另一方面又要保证他们不曾也不再与当地的海盗、走私者有所勾结¹²。朱克简也在奏议中间接指出：要招募沿海府州的本地之人，也就要求带兵的将领能够懂得当地的方言，而这些方言往往又以难懂著称¹³。

康熙四十七年（1708），为了招募有能力的人才而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议准福建、广东二省，武进士、举人、生监、民人内有练习水师事宜，愿随官兵出洋巡哨效力者，该省督抚豫先列名咨部。果能擒盗立功，保举引见叙用。”¹⁴自康熙起，皇帝都对这种人才的匮乏十分担忧，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关心，正如雍正十一年（1733）六月，雍正帝谕兵部：

武弁中熟习水师之人甚为难得。该管大臣，若不于平日留心储养，何以收人地相宜之效？每见督抚提臣中，有将熟习水师人员题请调用陆路者，此皆未曾周详筹算之故。著通行传谕，嗣后细加体察。若在水师中平常，而长

于陆路者，准其调补；若系长于水师之员，俱留于水师题补，不可因陆路需人，轻易改调，以致用违其长。从前有如此误用者，可查明题请改调。向后部中推升之缺，亦著该部声明请上。¹⁵

这道谕旨强调指出，水师官员中精通航海技术者甚少，如果朝廷不在天下安定之时加以留意，如何能在日后得到合适的人选呢？因此各省军政要员必须严禁将这些人员调入陆军，即便是陆军出缺也不允许。

其他一些官员调动的原则也随之跟进，例如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就规定在决定一位官员升迁与否之前，必须让他出海以检验他是否真的具有很好的航海知识¹⁶。乾隆三十一年（1766），当蓝元枚（1736—1787）和柴大纪（？—1788）从陆路调入水师之时，的确是照此办理的¹⁷。然而根据当时的公牍记录，这一原则在此之前并非一直如此运用。康熙四十二年（1703），皇帝看到将领的海战能力降低，提出在任用水师统领之时要加倍留意。三年之后，康熙皇帝曾谕令福建陆路提督蓝理（1648—1719），谈到他对此事的担忧：

福建近海，关系紧要，曩时谙练海战者，犹有其人，今则寥寥矣。且天下承平日久，人皆贪于逸乐，若不时加训练，万一有事，欲令其舍命冒险，难矣。¹⁸

到了18世纪20年代，情况丝毫没有改善，至少在闽浙总督高其倬（1676—1738）看来如此。在雍正四年（1726）的一份奏折里，他将武官分为三类，并且对他们海上指挥所需的能力作了归纳：“其最高者，不但本处海洋情形无不熟知，即各处港口之宽狭，沙线之有无，何处外洋岛澳是洋盗寄泊取水之所，何等日色云气是将作台飓回澜之候。因其熟极，故能生巧；因其详知，是以胆壮。其于巡防，实为有益，此为第一等。其次或熟知数处形情，或熟知本处形情，此为第二等。又其次者，于本处形情，亦知大概，在船不晕，能上下跳动运使器械，此为第三等。”而在此三等以下，尚有“仅不甚晕吐，只坐舱内不能上下跳动运使器械者，此种不过充备人数而已”。在高其倬看来：“现在闽浙水师将弁兵丁之中，如第一等者，或一营之中竟无其人，或仅有二三人，而年近老迈筋力就衰者居半。所有之好者次好者，不过第二等第三等之人，而仅不晕吐，不能上下跳动运用器

械者参半。”而“此等不知港沙之可以行走与否，不知岛澳之可以寄泊与否”之人，在实际航海作战中，肯定是毫无用处的¹⁹。

高其倬这本奏折针对的主要是下层官员和兵丁，而在雍正十二年（1734），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则以不通海战事宜为由，上奏折建议将南澳总兵撤职：因为此人晕船，根本无法亲自参与巡洋及其他所有活动²⁰。更为严重的是，一般来说，在攻打海盗的战斗中，总兵必须上阵指挥，而位于闽粤交界处的南澳，不仅是个战略要地，也是有名的从事非法交易的中心。从清朝立国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再到康熙六十年（1721）平定朱一贵之乱时，此处一直战事不断，而在此后沿海地区才平静下来，时人已将水师的战斗力下降归咎于这种和平。战争能锻炼出将官和兵丁，也能培养出新一代的接班人。

在福建，这种缺少精干官员的现象，也与政府常将有能力的官员，尤其是低级官员中的最优秀分子调离别省作为教官有关。雍正二年（1724），福州将军发现在沿海驻军及督抚各标都缺少统领，因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被选调他省了。甚至连省城都严重缺乏军事将领²¹。根据官府来往公牒，通常是兵丁和低级军官如千总、把总等人被外调为教官²²。例如雍正六年（1728）在验看全国水师之后，皇帝诏命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1664—1730）选派 50 名兵丁前往浙江（同样也调往湖广 50 名）²³。

很难招募到好的水师统领可能大大削弱了其战斗力，然而当地出身的官员占据统帅之任的情况对于这一问题的出现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福建，除了难以招募到熟悉航海的人员之外，还面临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在必须招募本地兵卒与维持军纪之间取得协调，可能后一难题远比他省更为严重。例如一位对此大有忧虑的官员台湾知府沈起元（1685—1763）²⁴是这样论述其同僚情况的：

水师偏裨之不宜用闽人也。向来台地兵卒，大抵骄横懒惰成风。近日行伍数足，约束颇严。顾闻各路分防之将校，终有不能严加约束者。原其故，实缘将领即系闽人，则部下之卒，非其旧时侪伍，即其同乡戚友。在提镇大员，分尊势重，可以弹压。若夫参游以下，分既相联，情复甚接，握手相向，

耦居无猜；非甚大犯，谁不姑息，狃于成习，渐不能制。夫闽海水师，固非闽人不可；至于将校，似仍宜以外省人领之。即如江、浙、粤东之人，亦能便习水道。易地相制，则在将校可以法绳下而无所瞻徇，在兵伍自严奉约束而不敢怨怼，此亦转移积习之微权也。²⁵

乾隆十二年(1747)，政府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提出副将和参将不得在其原籍省份任职，而游击、都司和守备也必须在离其原籍 500 里以外之地任职。而在此官阶以下官员尚可以在原籍招募。实际上早在 18 世纪 20、30 年代，福建军政当局就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旨在压制这些军官的气焰，因为这些人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压迫那些不属于他们关系网里的民人，并且胡作非为²⁶。然而，由于军事将领的缺失，在发布上述规定的几个月之后，朝廷就不得不将之取消，至少是说上述规定不再适用于水师副将²⁷。从此之后，尽管每次“回避”律例变更之时都会提及这一条：但只是在每一次补缺之时应用，这一条例似乎未被视为定例。王郡在我们上文提到的雍正十二年(1734)的奏折中也间接认识到本地官员的用处，对于下层职位，不推荐本地出身以外的人来担任。但是他也强调必须将之置于原籍别省官员的辖制之下，以免军纪成为地方关系的牺牲品。对此的指责经常出现，嘉庆五年(1800)前后海盗问题达到高潮之时，皇帝再一次旧事重提：

朕闻闽省漳、泉地方营汛兵弁，平时于汛地漫不稽查，偶遇有缉捕盗匪，辄向地方官索需供给费用。甚或有不法兵弁，私通巨盗，得受贿赂，反为容隐藏匿，以致缉捕徒劳，案悬不结。海洋地方所设营汛兵丁，原以资捕盗之用，今不但不实力查拿，而转受盗赃，为其通信。并闻此等恶习，不独漳、泉为然，即沿海各省分营兵等，亦有暗通洋匪，利其赃贿，名为海倭之事。顶凶承认，以致真盗漏网，似此玩法养奸，何以绥靖海疆，肃清洋面？²⁸

详细分析康熙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662—1820)间福建水师将领的实际状况，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²⁹。按照规定，绿营的最高层统帅分属陆路提督和水师提督。有时，这两个职位都由同一人担任，仅在福建，长期不变地单设水师提督一职。对不同省份的职官录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担任福建水师提督一职的原籍人士占有重要的比例。在康熙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间的 34 位福建水师提督中，其中只有 13 位不是福建籍。在这 13 位中，有 6 位的原

籍不是沿海省份³⁰，而在他们当中，又只有许文谟(?—1824)一人没有在沿海任职的经验(只在调任福建之前短时间担任过广东提督)，但他是因为嘉庆元年(1796)剿灭白莲教有功而得到擢升的。王郡和张旺(?—1712)，尽管其原籍分别为陕西和山西，但被认为是水战方面的专家。例如王郡，康熙三十年(1691)从陕西逃荒来到福建，随即入伍。他曾在台湾参与平定朱一贵叛乱，从担任台湾守备开始，他的仕途很顺，职位不断攀升，先后在东南沿海担任不同的武职³¹。

而担任陆路各级统帅的官员出身就比较多样化了，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他们都有在沿海各地服役多年的经历。事实上，在江南、浙江和广东提督中也都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然而在福建的陆军之中也赫然有几位本地籍的提督(占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一特点在浙江或广东却是看不到的，在名录中完全没有本地籍的提督。而福建籍人在此两省中仍然占据重要位置：浙江的52人中有10人，广东的47人中则有19人。东南沿海三省的提督大都原籍福建的情况，尤以18世纪最初20年间，1740—1760年间以及19世纪初较为突出。18世纪下半叶这种情况几乎绝迹，而到了19世纪初海盗活动最为猖獗之时，又再度出现。

同时，这些人担任陆路和水师提督的年限，也未遵循律例规定的三年³²。在福建，以及在其他沿海省份，这些官员通常在任上许多年³³。如果仔细地加以研究，就会发现从整体上来看，他们是优秀的武官，曾数次出现在沿海各省的职官表上。但只有在八闽地区，这种做法一直在延续，而在江南、浙江和广东等地，这种做法曾在清初出现过，因为那时更需要信得过的人员担任此官职，而到了18世纪及19世纪初，一般官员的任期都没有超过6年。在福建，近乎四分之一的武官高层任期都超过两个三年。但是在18世纪末的二十年间，这种情况却不多见，只有两位旗人有此殊遇³⁴。尽管这些人留任之时都是些重要的时期，甚至是关键的时期，但我们还是要对他们带兵的能力质疑，至少是针对其中的一部分人，由于他们年事已高，并对他们的留任是否有充分理由质疑。例如，某些水师提督竟死于任上，而某些人则显然不具备履行职责的充分条件(特别是身体条件)。

在政府的公牍中，也有对此提出质疑的。例如，雍正七年(1729)，署理福建总督史貽直(1682—1763)曾向朝廷上奏折，告知蓝廷珍的身体状况极为不佳，

希望朝廷采取相应措施派人接任。在这一奏折中，史貽直首先强调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及其繁重程度，麾下管理 25 个军营，并且是一个战略地位不容忽视的省份。而现任水师提督“蓝廷珍年逾六旬，向有脾泄之症。入冬以来泄泻不止，病势甚笃”。最后，史貽直建议由 58 岁的许良彬（1671—1733）继任。这一建议被采纳了，许良彬接任福建水师提督一职，直至 1733 年 62 岁之时死于任上³⁵。施琅（1621—1696）和吴英（1637—1712）都以七十五岁的高龄死于任上³⁶。同样，王郡曾于乾隆十一年（1746）上奏折，因年老体弱而要求解甲归田，当时他年近 70 岁，甚至是年过七旬了³⁷。黄仕简（1722—1789）则不像上述前任那样体面地结束自己的仕途，乾隆五十二年（1787），在他 65 岁高龄之时，因平定台湾林爽文（1786—1788）叛乱无能而被撤职。

在重要的岗位上任命和留用年长且有经验的军官，应该被朝廷视为是维持稳定和良好政务的保证。这些官员对于当地事务民生的了解，似乎在当时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和条件之一，因为在那时，尽管海盗活动受到一些抑制，但是偷渡和走私仍然是海防之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另外，这批老臣曾经参与过稳固清朝政权的重要战役（平定三藩、收降郑氏、收复台湾，以及剿灭朱一贵等），有丰富的经验可传授给后辈。有一些人在与这些勇敢的上司、公认的航海和指挥大师共同作战的过程中，崭露头角。但这一理由仅仅适用于清初的状况，我们不禁会想，除了上述这些堂而皇之的理由以外，君主们这样做是否还想以某种方式褒奖一下他们的卓越战功呢？这些职位无疑是肥缺，除了正常俸禄之外，他们还有耗羨、赢余、羨余等等名目的入账。这些额外的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与盗匪的勾结及收受贿赂的风险。

例如，施琅担任此职时，水师提督从澎湖的渔税里抽取规礼 1,000 两。而许良彬上任之时，则提出将此项归公。雍正皇帝（1723—1735 年在位）尽管对他的廉洁大加赞赏，但是却没有接受他的这一请求³⁸。吴振强也称赞他是不腐化的官员³⁹。我们并不是要质疑许良彬的品德，只是猜想先前已经积攒起来的小小财富使得他比那些不那么富有的同事们更能表现出这样的慷慨大方。事实上，在许良彬投身行伍之前，曾对从文感兴趣，之后才转而研究军事及海事。在游历过东南亚之后，他定居广州，在广东军界大员——其中有他的叔长辈许贞（？—1695）和姚堂（？—1723）⁴⁰的庇护之下，开始从商。在家道殷实之后，他捐任了

一个同知之职,并从1722年开始,运用他的经商之才,为曾经庇护过他、时任福建陆路提督的姚堂服务。在闽浙总督满保(?—1725)的支持和蓝廷珍的干预之下,他从文职调任武职,在陛见皇帝之后,被任命为水师参将⁴¹。以上只是一个事例,从中可以看出收取耗羨规礼之例,应该在整個福建商界普遍存在,甚至连皇帝都予以支持,因此这样做不但可以补贴地方行政运作的费用,也使得官员各安其职。

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一些高层武官在同一个岗位上任职时间如此之长,现在就下定论还为时过早。这除了作为对优秀官员的奖励之外,至少我们目前可做出一个初步的推断:其主要原因在于朝廷希望在这些岗位上留住精干的官员。很显然,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任用当地人士之外,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已经预先做了很多变通,为的就是能够得到精通海事民俗的武官。从18世纪晚期的福建情况即可看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当时福建的官员如走马灯一般频繁更换,其中又多为福建省籍以外的人士。同样,18世纪中期时还在浙江和广东官员名录占有很大比例的福建官员,到嘉庆初年消失得无影无踪。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在成为众多优秀水师将领的摇篮之后,福建省也面临人才危机?尤其是乾隆末年正值海盗活动十分猖獗,地方政府却不再依赖本地官员以挽救局势?此前的研究已揭示出18世纪后半叶地方政府内部关系紧张,表现在官员任用上可能就是任命了一批非福建籍的人士。当时形势非常混乱,在海盗、走私猖獗,天地会作乱的情况下,福建省的军事指挥活动似乎不像邻省那样卓有成效。例如,浙江上下级官员已经合作多年,自相传承。而闽浙总督玉德(?—1809)⁴²和阿林保在对付海盗蔡牵(?—1809)的策略上,就与李长庚(1750—1808)意见分歧很大。在前者去职之后,有经验的将领又回到了他们的岗位上,并且再次延长了任期:许文谟(?—1824)嘉庆十一至道光四年(1806—1824年)任福建陆路提督,而李长庚的老伙伴王得禄(1768—1842)则在嘉庆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808—1820)间任福建水师提督。在几个海盗头子如蔡牵与朱濆(?—1809)相继死去之后,政府似乎又回到原来既定的方针上去,并且这种方针的确卓有成效。

此种情况是否也体现在军队的其他阶层之上呢?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指出的那样,在水师中任用福建籍将领并非是军队高层的特权,尽管有律例所限,但政府仍在军界大小官职上任用福建籍人士。历任金门和海坛总兵多为沿海各省之

人，而来自八闽地区的将领任职则多在清初直至18世纪中这一时期内⁴³。南澳总兵的情形亦与此相类似，尽管闽人后来一直有人担任此职，但是任期都不长。而比他们官阶略低的官员，福建水师提督标下的参将与游击则绝大多数都是本省籍者，并且大多出生于闽南的同安、晋江、龙溪及漳浦等地⁴⁴，而这也是他们任职地之所在。尽管因律例所限，他们在一个职位上只服役两到三年，但是他们升迁之后还是留在同一个协区，因此他们还是在同一个地点驻留很长时间。而在福建陆路提督标下，固然也能看到任用本地人士的情形，但通常都在少数，并且都遵循任职地去原籍500里以外的条律⁴⁵。

在对参将和游击名录进行比对之后，还有一个差别：在陆军中的升迁要比水师里稳定得多，乾隆末年，特别是在嘉庆年间，任命了多位水师官员，而继任的官员通常是“署理”或“护理”的身份，且人员变动极为频繁⁴⁶，但此特点仅见于水师提督标下直属五营将官。而部下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人，以及整个省内军队的大部分兵弁都是福建本省人⁴⁷。这一特点在其他南部沿海省份亦能见到，也可以解释为何政府要求招募的官员同时又是有经验的水手所遇到的困难。如果上面高其倬与王郡所说水师将领对航海了解甚少之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应该而且必须招募当地人士入伍，才不致使水师将士对任职地水文条件一无所知。

对福建军事统领名录进行研究之后，我们的初步结论是政府充分意识到海疆的战略意义。尽管它没有财力，或者可能根本没有意愿来维持一支有能够实战的水师，但它特别关注招募和选拔能够担负海防任务的将领兼任此职。这一政策首先表现在任用了一批原籍沿海地区的将领。这一点虽然对于控制海事活动和民众有一定影响，但是却保证了直到18世纪中期的沿海地区实际上的稳定。而在沿海地区的陆路军队中保留有与沿海地区没有任何联系的将领，可能是地方政府处于对大量出身于闽南地区的将领的权力进行控制的目的来考虑的。现在需要弄清的还有陆路军队与水师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泉州府的状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绝佳的实例。在泉州驻守着大军，其中有分属陆路提督和水师提督标下的军队。泉州府是战略要地，其下辖的厦门是各类船只的必经之地，也是台湾驶入海船的停靠之地。如果将陆路提督和水师提督标下五营将士做个比较的话，其差别便一目了然：在陆军中，福建籍人士占了8.13%（160人中的13人）；而在水师中这一比例高达73.09%（301人中的220人）。

在18世纪后半叶,政府似乎希望严格执行回避制度,以期限制武官滥用权力,这一点已由福建各级官员一再强调并指出过。然而乾隆末年、嘉庆初年正值海盗活动愈加猖獗之时,这项制度的执行似乎又不那么严格和有力了,因为在19世纪前十年间,政府又开始寻求招募本地将官。与乾隆朝的整个倾向相一致,旗人经常取代原来绿营将官的位置,同时沿海出身将领的指挥所的位置也越来越远了。这也许可以解释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何地方政府各级官员无法再团结合作了。那些被任用的旗人一般都在指挥岗位上任职很长时间,但却对地方情况缺乏了解,以至于无法应对地方政府必须应对的新问题,例如当时天地会活动的高涨即是一个典型例子。

从浙江、福建与广东各省的武官名录中可以看出,直到18世纪中期那些优秀的水师将领——其中有大量福建籍人士,同属一个小圈子,而这个圈中的人都受到朝廷的信任,这从他们历年在沿海地区的官职升迁中即可看出。闽籍将官比浙江、广东的同僚更胜一筹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们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更容易理解海上世界,因此也容易采取行动控制海事及沿海的突发事件。上文列举的许良彬为广东和福建官员服务的例子,蓝鼎元在他的堂兄弟蓝廷珍身边所起的作用(参见苏尔梦文),以及陈伦炯(?—1751)在任内一直与福建商人保持密切的联系⁴⁸,说明他们的关系网都牢固地建立在当地社会之中,特别是与海事活动有关的社会群体当中,他们都是在危机发生之际可以倚重之人。而海盗在海上横行、他们的喽啰在陆地上发展势力,困扰地方政府长达三十年局面的形成,除了没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水师之外,恐怕这种关系网络的缺失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的确,当第一批海盗舰队来势汹汹到达沿海时,沿海的高官并未掌握理解沿海与海上世界的基本要素。这可能也间接造成了18世纪80年代左右海盗活动的再次猖獗。

〔注 释〕

- 1 《圣祖仁皇帝实录》,第六册,卷二七〇,页649—65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条。
- 2 雍正十二年(1734),由于惠潮道去世,两广总督鄂弥达(?—1761)与广东巡抚杨永斌(1670—1740)建议由广州知府庞屿接任。他们举荐他的理由是他在抓捕盗匪之时表现出色,并且在知府任上政绩卓异。此外,他还曾在惠潮地区代理过政事,对当

地情况十分熟悉。[《军机处录副奏折》,〈内政一职官〉,290—293;雍正十二年二月四日(1734年3月8日)]。同年,福建水师提督王郡极力褒扬台湾知府为精干的官吏,甚至在1732年那样的非常时期,也将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并且积极训练军队。[《军机处录副奏折》,〈军务—人事〉,872—874;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1734年3月29日)]。

鄂弥达,满洲正白旗人,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曾请来边疆问题专家蓝鼎元(1680—1733)。

- 3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版,卷五七二,页1a。
- 4 例如在雍正元年(1723),时任两广总督的杨琳(?—1724),曾提议由陈还出任其前营参将。陈还看来是前朝遗民,曾追随郑氏前往台湾。他归降后,被抬入汉军正白旗。他祖籍奉天,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康熙四十七年(1708),他被任命为广东东部肇庆府开平县县令。在此任上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因母丧回乡守制。杨琳认为尽管陈还是文官,但他熟悉军务,并且精通航海。(《宫中档——雍正》,第一册,页459—460)。杨琳本人隶属汉军正红旗,出身武职,曾在沿海地区任职多年,先是任福建提督(1711—1714年),继而转任省内各职,升任广东巡抚,直至两广总督。从杨琳的各项奏议中可以看出,他对地方政务极其关注,积极推行沿海防御政策。在他任内曾对改善海防提出过诸多建议。
- 5 众多陆路或是水师统领都是如此,有些从授任第一个官职开始便一直在福建任职。(《福建通志》,1829版,卷一百二十)。
- 6 参见苏尔梦文,文中提供了漳浦蓝氏家族成员有关仕途升迁的实际事例。
- 7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版,卷五七二,页1a。
- 8 本文是建立在对沿海各省官员名录的长期研究基础之上的,目的就是更好地了解沿海各部的运作情况。收集到的数据都以不同的表格形式记录(按照姓名、所属部队、籍贯之省、府、县等)以便进行交叉分析。据此我们可以全面追踪军官的整个行伍生涯,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人才招募有全面的了解。
- 9 Paola Calanca, *Piraterie et contrebande au Fujian. L'administration chinoise face aux problèmes d'illégalité maritime (17^e-début 19^e siècle)* (福建的海盗与走私:17至19世纪初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海上犯罪), Paris, Éditions des Indes savantes, forthcoming.
- 10 这种举措实际上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地方政权会将一些归降的海盗编入军队,或是招募一些渔民以及商船上的水手为己所用。
- 11 《军机处录副奏折》,〈军务—人事〉: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734年12月16日)王郡折。我们看到黎赫留(Richelieu)对于优秀的航海家的定义与此庶几相近:一个“勇敢的水手,喝的是海水和酒”(1627年6月30日黎赫留写给拉波尔特的信,转引自, M. Vergé-Franceschi 1991, p. 13)。

- 12 朱克简,《按闽奏议》,卷四,页2a—3a。朱克简(1616—1693),江苏宝应人,顺治四年(1647)中进士。顺治十二年(1655)他写此奏议时,官任福建巡按御史,曾参与郑氏的战斗。
- 13 朱克简,《按闽奏议》,卷四,页2a。
- 14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版,卷五六七,页1a。
- 15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32,雍正十一年六月丁巳(1733年6月8日)。
- 16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版,卷五六三。嘉庆五年(1800),这一原则被再次重申(《大清会典事例》,光绪版,卷五七六)。
- 17 《明清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7,戊编,上册,第三本,页486—487。
- 18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二六,页3024(7a—7b):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三十日(1706年9月6日)条。蓝理,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五年至五十年间(1706—1711)任福建提督。他的武官生涯曾几次因贪腐渎职而面临危机,但直至去世他一直受到皇帝的庇护。(《清史列传》,1987,第三册,卷十一,页817—819)。
- 19 《宫中档——雍正》,第六册,页823—827:雍正四年十一月八日(1726年12月1日)折。
- 20 《军机处录副奏折》,〈军务—人事〉,页866—868:雍正十二年二月十八日(1734年3月22日)折。
- 21 《宫中档——雍正》,第三册,页241—242: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724年11月10日)福州将军宜兆熊折。
- 22 《内阁提本——兵科红本》,〈防务—战争〉,0039:乾隆十二年五月一日(1747年6月8日)福州将军新柱折;0047:乾隆十六年十月二十日(1751年12月7日)来保折。乾隆二十九年(1764),福建和广东的武官仍被选去编入健锐营(《大清会典事例》,光绪版,卷五六一)。
- 23 《世宗宪皇帝实录》,第七册,卷七三,页1085(2a—3a):雍正六年九月二日条(1728年10月4日)。
- 24 沈起元是江苏太仓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雍正年间,他曾相继担任福州、兴化和台湾知府。他似乎对当地民俗和闽省官员流弊知之颇深。他曾着力限制某些官员敲诈商船(《清史稿》,第三十四册,卷八七,页10431—10433)。
- 25 《清经世文编》,卷八十四,页2090。
- 26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1977—1980,第二十三册,页799—801:雍正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1734年12月16日)福建水师提督王郡折;Ng Chin-keong, 1983, pp. 34—35。
- 27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版,卷五七二,页1a—1b。
- 28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五八,嘉庆五年正月十九日(1800年2月12日)。又见《大

清会典事例》，光绪版，卷六三〇，页 5a。

- 29 未收录顺治朝的原因是当时军事系统有过多次变革。直到 1670—1680 年间，由于当时朝廷不仅要应付各地起事，又要保证军队的粮草供应，因此军队的官阶和部队的部署仍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
- 30 其中有苍保，汉军旗人，曾在嘉庆六年至七年（1801—1802）任此职，但我们尚未找到他的详细资料。但是我们知道他对沿海地区有所了解，因为他曾在广东的雷州和琼州任职。
- 31 《清史稿》，第三十四册，卷二九九，页 10426—10427。
- 32 《大清会典》，嘉庆版，卷四四四，页 906。
- 33 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督抚大员身上。
- 34 即满洲正黄旗人玛尔吉阿蒙古正黄旗人哈当阿，他们分别于乾隆五十六至嘉庆四年间（1791—1799）与乾隆五十三至嘉庆四年间（1788—1799）任提督与将军。
- 35 《宫中档——雍正》，第十四册，页 903—904；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二日（1729 年 12 月 31 日）折。
- 36 吴英，莆田人，曾积极参加对郑氏的战斗。在收复台湾一役中，他曾与施琅并肩作战，在施琅去世后，他被召回福建，先是担任福建陆路提督，后来又任水师提督（《福建通志列传选》，页 164—167；《清史稿》，第三十三册，卷二六一，页 9875—9877）。
- 37 《清史稿》，第三十四册，卷二九九，页 10426—10427。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及，王郡于康熙三十年（1691）来到福建时加入行伍。入伍时年仅 16 岁，那么乾隆十一年（1746）他应该接近或是超过 70 岁了。
- 38 《明清史料》，戊编，页 149—150；《福建通志》，1993，页 800。
- 39 Ng Chin-keong, 1983, p. 205.
- 40 许贞，漳州海澄人，曾在郑氏军中任职，康熙三年（1664）于漳州降清。初授左都督，驻守九江。寻移赣县，以荒地畀降兵屯垦，号“屯垦都督”。后耿精忠反，许贞参与平叛。此后打击盗匪屡建战功，凡二十余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他上本乞罢，皇帝慰留未允，并将他调任广东提督。许贞在此任上十四年，对海防事务多有留意（《清史稿》，第三十三册，卷二五七，页 9804—9807；《福建通志列传选》，页 226）；姚堂原籍福建漳浦。
- 41 《福建通志列传选》，页 226—227。
- 42 玉德属正黄旗瓜尔佳氏，嘉庆元年（1796）他出任浙江巡抚，后升任闽浙总督（1800—1806）。在打击海盗的战斗中，他与李长庚关系紧张，经常干涉后者采取行动。最后他被撤职，并且由于对海盗作战不力而被流放。
- 43 从康熙十九年（1680）（此职位创建于是年）至嘉庆末年，历任 40 位金门总兵中有 19 人原籍系福建。在这 19 人当中，15 人任职期在 1680 至 1752 年间；18 世纪下半叶

任职官员主要来自于广东。历任海坛总兵的49人当中则有17位闽人,任职期从康熙年间直至1780年,之后担任此职的主要是粤人及浙人。

- 44 值得注意的是出身于闽县(福州)的将领也占很大比例。
- 45 在康熙朝,也有福建陆路提督标下参将未遵任职地与原籍相隔500里以上的条例,但其属于少数之列。
- 46 本文所论根据目前已经寓目之史料而言,尚在研究的初步阶段,此结论尚有待与不同版本之地方志及《缙绅全书》、《清代官员履历档全书》等文献材料作进一步比较研究。
- 47 除了一些特例之外(如泉州的城防营),任职地与原籍相隔500里以上的条例在陆路中要比在水师中执行得好。
- 48 陈伦炯的仕途起伏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陈氏为福建同安人,父陈昂,幼与母居灌口(泉州)。少孤贫,无力业儒,弱冠习贾,泛东西洋,熟悉各地海岛、港湾及风潮情形。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台时,他作为施琅的幕僚随同前往,开始了他的行伍生涯,之后在军中屡屡升迁,直至广东总兵。在朝廷下令禁南洋贸易之时,他曾上书要求不禁外洋贸易,以其有益于沿海民人。康熙四十六年(1717)宣布的禁令并不是全面的,皇帝可能还是听从了陈昂的一些建议(《福建通志·列传选》,页191—192;《厦门志》,卷十二,页480)。陈伦炯则完全是在军中建功立业,但是他因写作《海国闻见录》而备受文人推崇。陈伦炯自称此书是为商贾和担任海防的武官提供实用信息的。在他一生的宦海生涯中,总是对同乡倍加照顾。例如他在浙江为官时,曾特地购买墓地,以便客死他乡的福建商贾有葬身之地(《厦门志》,卷十二,页480)。

参考文献

- 《(重纂)福建通志》,孙尔准等修,1829版。
- 《定海县志》,陈训正、马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省专辑38,1993。《福清县志》,饶安鼎等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集20,2000。
-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1980。
- 《广东通志》,邹鲁修,国立中山大学,1935。
- 《黄岩县志》(光绪版),陈宝善等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省专辑51,1993。

《晋江县志》(光绪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集25,2000。

《明清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7。

Ng Chin-keong (吴振强),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贸易和社会:中国沿海的厦门网,1683—173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1899版),李鸿章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

《清经世文编》(1836版),贺长龄、魏源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

《清史稿》(1927),赵尔巽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76—1977。

《清史列传》(1928),王钟翰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

《清代职官年表》,钱实甫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泉州府志》(乾隆版),黄任等编,泉州书社,1984。

《厦门市志》(民国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集3,2000。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1991。

《乍浦备志》(1843版),郑璟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0,1992。

朱克简,《按闽奏议》,年代不详。

走过留痕——松筠驻藏的政绩与著述

冯明珠 著

一 前言

松筠(1752 或 1754—1835)是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颁布后被清高宗选派入藏的,从选定到入藏长达两年,经过高宗刻意安排与训练,目的在落实廓尔喀之役(Gurkha-Tibet War 1788—1792)¹后清廷在藏所推动的改革,确立《章程》颁布后西藏的典章制度,更进一步巩固清廷在藏的治权。松筠衔命入藏,他驻藏四年²对西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透过他留下的满汉文奏折与著述,论述一位称职的疆臣如何不负君王的嘱咐,提升驻藏大臣的职权,落实一地的典章制度,以及如何以“忠孝仁义,格物致知”儒家理想推动边域施政,成就一位疆臣典范。松筠驻藏的所作所为,不但影响当时清廷与西藏关系、奠定了清朝藏域版图,更影响到百年后的中英西藏交涉。

松筠,字湘圃,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生于乾隆十七或十九年(1752 或 1754)³,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享年八十四岁,历仕乾、嘉、道三朝,是位颇富官箴的清中叶重臣。他由翻译生员出身,考补理藩院笔帖式,历经军机章京、员外郎、内阁学士、户礼工刑四部侍郎、镶黄正红正白等蒙古满洲汉军正副都统、御前侍卫,内务府大臣等,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擢升军机大臣,五十九年(1794)七月奉派入藏办事时,已是位历练完整、文武兼备、正当壮年的封疆大臣。他驻藏四年后更受嘉庆皇帝重任,总督陕甘、湖广、两江等腹地,又持节东北、蒙古、新疆等边域,前后两次出任伊犁将军,在新疆为官十三、四年,死后入祀伊犁名宦祠,说明了他任疆臣的政绩⁴。松筠身后传记不少,对他治理边疆的积极贡献,均予以肯定⁵。《清史稿》论曰:

松筠廉直坦易,脱略文法,不随时俯仰,屡起屡蹶。晚年益多挫折,刚果不克如前,实心为国,未尝改也。服膺宋儒,亦喜谈禅。尤施惠贫民,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

又曰:

保宁、松筠、富俊并出自藩族,久膺边寄,晋纶扉,称名相。伊犁、吉林屯田,利在百世;然限于事势,收效未尽如所规画甚矣,缔造之艰也!松筠在吉林,请开小绥屯垦,当时以不急之务沮之,至咸、同间,其地竟划归俄界。苟早经营,奚致轻弃,实边之计,顾可忽哉!

《清史稿》评论松筠在吉林小绥屯垦受阻,以致国土流失,然松筠在藏的巡边阅兵、赈济抚恤,则有意无意间确保了清朝在藏的领域(详后)。

笔者以为松筠治边的最大贡献是:走过留痕,留下丰富的记录,对继任者有着指引作用。他曾任库伦办事大臣、吉林将军、驻藏办事大臣、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绥远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等,留下的著作包括:《西招纪行诗》、《秋阅吟》、《西招图略》、《西藏图说》、《新疆识略》、《西陲总统事略》、《西藏图说》、《绥服纪略》、《台规》、《百二老人语录》等,涉及的边域范围与边务极广。近年来中外史学界对松筠的介绍与评论也日渐增多,如大陆学者纪大椿《论松筠》,吕育良《松筠、祁韵士和徐松对新疆方志事业的贡献》,徐燕《论松筠的经济思想》,吕玉良、赵星华《松筠及其〈钦定新疆识略〉》等;日本学者有中见立夫《关于〈百二老人语录〉的各种抄本》,村上信明《清朝中期における蒙古旗人の自己认识——正蓝旗蒙古人松筠の例を中心に》,平野聪《清帝国とチベット问题》及德国学者达素彬(Sabine Dabringhaus)“Das Qing-Imperium als Vision und Wirklichkeit: Tibet in Laufbahn und Schriften des Song Yun (1752—1835)”⁶等对松筠各方面均有所论述;笔者注意松筠始于二十多年前研究中英西藏交涉课题之际,发现从清季至民初中英两国展开藏域界线交涉之中,中国官员常引的图籍即松筠的《西藏图说》,或深受松筠影响的《卫藏通志》⁷与黄沛翘《西藏图考》⁸等,中国官员据以力争藏域,笔者于1996年撰成《松筠〈西藏图说〉与清季藏域

之争》⁹，论述松筠治藏期间巡边之作对近代藏域界线之争的影响，本文即在前文的基础下，再度细读松筠三度巡边¹⁰留下的著述与满汉文奏折¹¹，讨论松筠的治藏理念，全面考察《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颁布后松筠驻藏的种种施政，并再度论述其巡边之作对近代中英西藏交涉的影响。

二 松筠驻藏

（一）受任

清高宗正式任命松筠为驻藏办事大臣是在乾隆五十九年（1796）七月十九日¹²，但早在廓尔喀之役后，福康安（？—1796）与和琳（？—1796）在西藏办理善后期间，清高宗便已决定派遣松筠接续和琳出任驻藏大臣。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一月初三上谕：

……此时藏内诸务正当整饬之际，关系紧要，朕意原欲令松筠前往办事，但伊在库伦驻扎七年，甫经换回，未便即令远出……俟二三年后，松筠亦已在京休息数年……再令松筠前往。¹³

说明松筠是清高宗早已规划的驻藏大臣人选，也相信松筠有能力在此关键时候落实他在西藏推动的政治改革。乾隆五十八年（1793）七月初二，高宗又谕令军机大臣应未雨绸缪选妥继松筠后入藏办事之人：

……现在藏内值甫经整顿之后，是以仍留和琳在彼办理，以资驾馭，将来系松筠前往接办，亦属可信之人，但松筠亦不能久驻藏内，嗣后接手者，岂能尽如伊二人足资倚任……¹⁴

这两段上谕充分说明清高宗重视入藏办事人选。乾隆五十八年七月高宗任命松筠以御前侍卫兼内务府大臣及军机大臣参与接待英国使臣马戛尔尼（Earl of Macartney, 1737—1806）¹⁵，笔者认为这也是清高宗蓄意让松筠熟识英国事务，为人藏办事预作准备¹⁶。乾隆五十九年（1794）七月十九日，松筠正奉命前往湖北荆州审办关税及河南卫辉府被水事宜时，突然接到上谕，擢工部尚书，即日审结荆州关税案，就近驰赴西藏办理驻藏事务¹⁷；翌日，又接到五百里传谕，说明任命

原因以及入藏办事原则,任命原因:¹⁸

松筠前在库伦办理边务,甚为妥协,此次奉差湖北,路过卫辉,督办水灾抚恤事宜,实为尽心,朕所深嘉,今令前赴西藏接代和琳,自能胜任。

入藏办事原则:

卫藏地方,经和琳悉心整顿,定立章程,一切驾驭各部落、训练番兵,所办俱有条理,仍着和琳再向松筠将钜细事宜面为告知,俾得循照成规经理,倍臻妥协,以副委任也。……和琳俟松筠抵藏面行交代,并将应办事宜详悉告知后,即速加紧驰驿来京陛见……

清高宗认为:

总之,藏内诸事,节经朕详悉指示,和琳俱能认真遵办,已具端绪,仍宜趁此斟酌尽善,永远可遵,再交与松筠接办数年,实力奉行,俾积习尽消,庶将来更换之人,即循谨自守,亦可率由旧章,不至仍前废弛,方为妥善。¹⁹

清高宗令松筠入藏办事的主要目的即在落实初经颁布的善后章程,使之成为制度,令继任者知所依据。

乾隆五十九年(1794)七月二十日清高宗再度以五百里廷寄,分别传谕四川总督孙士毅(1720—1796)、驻藏大臣和琳与在荆州办差的松筠,令松筠直接入藏接替和琳;和琳等候松筠到藏当面交代治藏细节后立即驰赴四川接任;孙士毅则待和琳到日立即回京入阁办事,因为大学士嵇璜(1710—1794)于三日前(七月十七日)病故,已无汉大学士在阁办事²⁰。然而西藏穹远,旅途艰险,松筠抵达拉萨已是四个月后的事了,和琳则于与松筠会晤后方始离开²¹;有鉴于此,松筠认为驻藏官员修为之一便是“述事”,“夫处一方,宜悉一方故事,述而书之,便览焉”。松筠要求驻藏大臣不但要熟悉地方事务,而且要留下记录,便于后人阅览,所谓“钦差善言,提撕警省也”²²,松筠做到了,他在藏整整四年留下丰富的满汉文奏折与著述;松筠深知他奉皇命入藏办事的目的在落实《西藏善后章程》,提升清廷治藏主权,树立驻藏大臣的典范,因此他的著述有着浓厚的垂教于后、

莫立典范的意含,将做为一位称职的驻藏大臣应有的分为、操守、当做之事与特别注意事项,钜细靡遗,一一开列。

(二) 治绩

1. 确立制度

松筠继和琳之后入藏办事,清高宗付予的重要任务是落实甫经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²³,章程的核心目的是巩固清廷治藏主权,落实主权的首要方法是提升驻藏大臣地位,削弱达赖喇嘛原有的政权。清朝充任的驻藏大臣或驻藏帮办大臣者多是满、蒙人士²⁴,也多是藏传佛教信徒,《藏内善后章程》颁布以前,信徒与教主间的关系并无明文规范;廓尔喀之役后清高宗为了提升驻藏大臣的地位,明定驻藏大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间平等的关系,不能行信徒与教主之间应有的教仪,以免矮化驻藏大臣的地位。乾隆五十七年(1792)闰四月二十四,清高宗谕令驻藏大臣和琳曰:

闻向来驻藏大臣不谙大体,往往因接见时瞻礼,因而过于谦逊,即与所属无异,一切办事,与噶布伦等视若平行,授人以柄,致为伊等所轻,诸事专擅,并不关白大臣,相习成风,已非一日……鄂辉、和琳均系钦差大臣,除拜佛瞻礼外,其办事原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至噶布伦等,即系属员,诸事先须禀命钦差办理。²⁵

松筠接任,他的先世是蒙古喀尔沁部人²⁶,也定然是一位藏传佛教的信徒,清高宗为了稳住驻藏大臣的地位,再度谕令松筠:

伊系蒙古,素遵黄教,倘不知自重,恐将来办事,仍虞掣肘。着传谕松筠抵藏后,接见达赖喇嘛等,不可叩拜,即使遵奉黄教,俟年满回京之日,再行礼拜,亦无不可。²⁷

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一月十三日松筠在旅次领旨回奏遵行,并于抵藏任事后落实了与达赖喇嘛见面礼仪²⁸。总之,清廷于乾隆五十七(1792)年陆续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后,驻藏大臣的职权与地位起了很大的变化,基本上是将原来政教合一的制度分离,达赖喇嘛虽然仍掌部分教权,但确认他的身份与管理西藏

的政权则转控于驻藏大臣手中,表面上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仔细分析则政权实高于教权。然而善后章程谁来落实呢?这便是清高宗责成驻藏大臣的使命。然则松筠完成了这项任务吗?以下便透过《善后章程》的内容与松筠入藏后执行的事项,检视松筠是否落实了《善后章程》颁布后驻藏大臣应有的职权。

在“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廓尔喀档》²⁹中有关《藏内善后章程》的规范记录得十分仔细,也不仅止于一般藏学书籍中所刊载的二十九条,其中有关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间权力消长的规范则有下列几点:

(1)“呼毕勒罕不得听其仍前任意妄指,私相传袭,以除积弊而服人心”³⁰、“各寺坐床堪布应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秉公补放”³¹,清高宗在拉萨大昭寺与北京雍和宫各设置一金奔巴瓶,大昭寺负责选出康、藏、卫、青海等西藏文化区的转世活佛,雍和宫则负责选出蒙古地区的转世活佛³²。松筠治藏期间以金瓶掣签方式产生并经清廷正式确认与册封的转世活佛有:察木多帕巴拉与嘉木样呼图克图呼毕勒罕³³;乾隆六十年(1795)六月廿九日松筠奏藏地大小活佛已一律遵照金瓶掣签制度³⁴。

(2)“嗣后藏中诸事皆当隶驻藏大臣管束料理,不得任听达赖喇嘛及噶布伦等专擅”³⁵、“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等,事无大小均应禀命驻藏大臣办理”³⁶;松筠一改过去“驻藏大臣惟知坐镇,诸事不复预闻”的弊端,积极主导西藏的内政、外交与僧俗官人事布局³⁷;更积极的做法是更换了达赖喇嘛印信保管人,由原来达赖私人秘书改为济咙呼图克图,并要求依照《达赖喇嘛印信使用章程》办理用印。据松筠奏:“查达赖喇嘛印信之钥匙,向由笔齐齐(满文音译,秘书)等佩戴,从古到今有何弊端,并无查实之人,凡有达赖喇嘛吩咐即行钤用,殊属非是,奴才等晓示情理于达赖喇嘛,令笔齐齐交回印信钥匙,由济咙呼图克图佩戴,嗣后理应钤印之事,由济咙呼图克图、噶布伦共同验看钤用,事由备档,一月汇总一次报知奴才等衙门查核,以绝弊端。朱批:甚善”³⁸;“善后章程”中也明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族属一概不准管事”³⁹。

(3)“藏内大小番目缺出应定立等级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秉公拣放”⁴⁰,松筠非但任命在藏的汉族官弁,也积极主导西藏地方政府文武僧俗官员的任用,参与寺院中管事喇嘛的补放,提升了驻藏大臣的人事主政权⁴¹。

(4)“蒙古延请喇嘛诵经或入藏熬茶应由驻藏大臣给照前往以资查考”⁴²、“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外番通信应告知驻藏大臣详细商酌”⁴³等,取

消了达赖喇嘛对外交涉权。18世纪末西藏的涉外关系主要是廓尔喀,清廷的基本政策是恩威并施,对贡使依制宽容以待,对中尼边域则严阵以防。松筠驻藏期间完全掌控了西藏的涉外关系;⁴⁴

(5) 主掌西藏税务钱粮抚恤赈灾等事务,主导西藏的经济与社会福利政策⁴⁵。自《西藏善后章程》颁布后西藏的税收、贸易、铸币基本上已全由驻藏大臣掌控,并有权稽查达赖喇嘛与商上收支出纳⁴⁶。

(6) 巡边阅兵;维护国防⁴⁷。《西藏善后章程》规定:驻藏大臣与驻藏帮办大臣每年春、秋两季应轮流亲自巡查边境顺便操演驻防官兵,校阅营伍,以重地方。松筠驻藏四年,三度亲自巡查卫藏地方。(详下节)

(7) 掌控了西藏的司法⁴⁸。

以上仅就笔者所能查阅的松筠奏折稍作分析,松筠驻藏落实的权力包括:综理藏务、监督宗教、管理人事、统制军队、巩固边防、主持外交、管理商务、稽查财政、管制差徭、司法诉讼、社会福利等,已完全行使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颁布后驻藏大臣应有的职权,也达成了清高宗赋予他的使命。

2. 提撕警省

(a) 巡边阅兵

“钦差善言,提撕警省也”。松筠在驻藏大臣任上完成了四部著作:《西招纪行诗》、《秋阁吟》、《西招图略》、《西藏图说》,道光年间又撰成《绥服纪略》,虽以库伦俄罗斯事务为主,但也忆述及于藏域。这五部书合称为《西招五种》,又名《镇抚事宜》⁴⁹,处处流露松筠以笔代口向后继入藏办事者“提撕警省”之处,他在离藏前夕总结了驻藏经验,提出了二十八条驻藏大臣当为当守之事,分别为:安边、抚番、戒怒、遏欲、抑强、除苛、厉俗、慎刑、绥远、怀柔、成才、述事、审隘、量敌、合操、行操、练兵、申律、制师、馭众、坚阵、出奇、倡勇、谨胜、善始、持志、防微、守正等二十八条⁵⁰,首要任务即是“安边”。如何“安边”?除彻底落实《藏内善后章程》每年春、秋两季与驻藏帮办大臣轮流巡阅前后藏外,更重要的策略是“审势行权,恩威并施”,“宜威则威,宜惠则惠,然后仁以厉其俗,义以作其气,惩贪除苛,使知节用而爱人,并教以诚信,虽蛮夷可冀知感、知畏矣”。施恩的手段则在“绥远”,松筠主张“荒服宜绥,绥之道贵在羁縻得中,而又本乎自治”;“绥远”的方法又分两方面:一是对内,使边域隘口如济咙、聂拉木、绒辖、喀达、定结

等地番民休养生息,民生安乐自然能吸引域外民众倾诚内向;一是对外,每遇贡期则按定例款待,薄来厚往,加倍酬答廓尔喀等国所献方物。施威的手段则展现在巩固边防上,二十八条中有审隘、量敌、合操、行操、练兵、申律、制师、驭众、坚阵、出奇、倡勇、谨胜、善始、持志、防微、守正等十六条均与边防练兵有关事,松筠驻藏四年,三度巡边,亲临边域,特别重视“审隘”、“阅兵”,除绘制《西藏图说》图文并茂详细记录他所经过的道路里程、阨塞隘口外,也依章程亲自检阅日喀则、江孜、定日等处驻军,要求各军“合操”、“行操”实地演练,务求训练一支能守能战的劲旅。松筠对于边防讲究“量敌慎防”、“防微杜渐”;用兵主张“出奇制胜”、“严阵以防”,使敌人望而生畏;他于卫藏四汛(前藏、后藏、江孜、定日)主持实地演习,要求将领仁爱倡勇、军律严明、赏罚有度、守正示信,方能义正荒夷,边域永安⁵¹。

松筠的边防措施虽是照章办理,但执行上与前后任驻藏大臣有所不同,因为他更用心去留下痕迹。松筠于乾隆六十年(1795)春季以及嘉庆二年(1797)秋季分别前往后藏巡边⁵²,留下了《西招纪行诗》与《秋阁吟》两卷五言诗作,在《西招纪行诗·诗序》中松筠开宗明义说明了著作的目的:

夫诗有六义,一曰赋,盖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余因抚巡志实,次第为诗共八十有一韵,虽拙于文藻,或亦敷陈其事之义,名曰西招纪行诗,后之君子奉命驻藏者,庶易于观览,且于边防、政务不无小补云。

《诗序》中说明是为接任驻藏者而作,为巡边留下痕迹。乾隆六十年(1795),松筠带着清高宗发下的四万两帑银,沿途视察民情,抚恤赈灾,宣布皇恩,顺道巡边阅兵,察看汛道与边域,将所经各地的山川险要、风俗民情,以五言诗句敷陈直言,关键处则以释文附注,是一首以五言古体诗撰成的一篇藏域地理民俗志。巡边路线:出拉萨西南,循驿道到达“西招第一隘”曲水、过巴则岭(又名巴然、西昆仑)、白地、朗噶孜、春堆、洋卓海(洋卓雍湖),到达江孜,校阅驻军后,继续向西抵达后藏日喀则;再以札什伦布为据点向南巡视帕克哩,再西行到达干坝庄、定结、萨迦、协噶尔、定日、宗喀、衮达、卓党、济咙、绒辖、聂拉木,抵达阿里后折返。(图一)这次巡边的重点有三,抚恤、阅兵、视察西藏西南边域,他在驻军重要地点如江孜汛、定结汛、定日汛、日喀则,邻近廓尔喀边境重要隘口如济咙、绒辖、聂拉木以及阿里都有详细的记录;对于边民,松筠特别嘱咐“营官妥为抚养,以结

民心,可期永为保障。”这正是松筠“绥远”之道。

廓尔喀之役后,清廷感受到来自喜马拉雅山域的威胁,重新布署了西藏的西南边防,加重了日喀则与江孜的汛防⁵³;松筠特别提醒:江孜土地肥沃,良田数千顷,民生宽裕;由此西行两日即达札什伦布,班禅额尔德尼驻地;南行七日抵帕克里(Phari),为藏地南大门,设正、副营官,外通布噜克巴(不丹 Bhutan)、廓尔喀(尼泊尔 Nepal),道路平坦,廓尔喀人贡象皆由此入;西南界连哲孟雄(锡金 Sikkim);由帕克里西行三日抵干坝,再西行一日到达定结汛,为后藏西南重要防线,江孜汛防官兵咸宜深悉⁵⁴。廓尔喀之役后新设的藏域西南重要边防有二,一是定结汛:驻汉兵40,番兵500,松筠记注曰:“定结、干坝两隘口距离札什伦布只有四、五日程,外通廓尔喀,最为险要。”⁵⁵一是定日汛:设守备一员,驻汉兵40,番兵500;由定日西北行四日经宗喀可抵济咙;西行两日抵聂拉木;南行三日抵绒辖,三处边外均与廓尔喀通⁵⁶。这些汛口在18世纪后成为西藏的重要西南边防,驻藏大臣每年必须亲自巡察,主持营伍演练,并确保驿道畅通迅速移防。

《秋阁吟》是松筠于嘉庆二(1797)年二度巡边留下的作品,巡边与著作目的在《诗序》中亦有明言:

乾隆乙卯岁(六十年),高宗纯皇帝发帑金四万两,赈恤卫藏番民,恩至渥也。余照例巡阅,周览边城,敬布皇仁,凡所经行既着篇什。洎丁巳(嘉庆二年)之秋,又因稽核赈务,重阅招西,见民气已苏,钦圣慈之广被,窃幸恭际盛时,遍历佛地,按程缓辔,偶述见闻,以补前纪之未云。

这次巡边路径大致与乾隆六十年(1795)同,然多载了道路里程以及以阳巴井为驻地巡视校阅前藏营伍记录,补充了前著的不足。《秋阁吟》的创作技巧与《西招纪行诗》有所不同,后者是以五言古诗体创作的一首长诗;《秋阁吟》则以长短不一的五言诗,对亲临巡视各地(45处)一一描述。以下是《秋阁吟》中记录的巡边路程:拉萨(70里)—业党(90里)—曲水(55里)—巴则(90里)—白地(90里)—朗噶孜(120里)—春堆(120里)—江孜(90里)—后藏(90里)—岗坚喇嘛寺(60里)—花寨子(110里)—彭错岭(60里)—嘉汤(60里)—拉孜(90里)—甲错山(120里)—罗罗塘(50里)—协噶尔(70里)—密玛塘(60里)—定日(110里)—莽噶布蔑(50里)—莽噶布堆(100里)—叠古芦(90里)—拉错海子(110里)—宗喀(100里)—衮达(110里)—邦馨(20里)—济咙

(20里)—邦馨(100里)—衮达(110里)—宗喀(90里)—霍尔岭(90里)—恰木果(80里)—列克隆(60里)—达克孜(140里)—汤谷(130里)—桑萨(90里)—札布桑堆(60里)—阿木岭(140里)—僧格隆(80里)—察布汤泉(90里)—萨迦庙(110里)—察咙(150里)—那尔汤(50里)—后藏(经7站690里)—阳巴井(经3站240里)—达木观兵6站495里)—拉萨。(彩图4)

嘉庆三年(1798)春,松筠三度巡视后藏边域⁵⁷,并总结了巡边心得撰成《西藏图说》一卷,以总图一幅、十四幅分图画出从廓尔喀首府阳布(清代文献称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Kathmandu)为阳布)向东行抵打箭炉的道路里程,并以一图一说详载各地山川险要,提示驻藏主事者特别注意。松筠在嘉庆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奏报查看后藏西南边界及驻防绿营唐古特官兵技艺等情》中说道:

此数年奴才查看之所有险要隘口,分别绘图,卫藏之全部官兵等得以熟知各地形势,既于官兵之意有攻守之凭恃,方可谓有力、敏捷之军备。将此地陆续遵旨办理之事,一齐交付官员,使历任莫忘交付。⁵⁸

说明《西藏图说》于嘉庆三年春巡边之际已陆续完成,绘图的目的则在于使官兵熟悉藏域山川形势,也让后继者莫忘朝廷交付。在《总图》中松筠阐述作图的原因:

国家幅员远迈前古,前卫后藏特西南一隅耳,绘为此图者,就巡阅之所经,识山川之阨要,特俾驻藏汉番官兵熟其形势,故分图于西、南、北三面为稍详,至于东抵鱼通,此六千余里,向化者百数十余年,舆隶版图供赋役者,毫无以异,则但记其道里程站,而悉在所略焉。

彩图3则解释图起于极边原委:

图为备边而设,故分图从边疆起,由远而近亦怀柔内向,而图皆绘以北向,缘取拱极之义也。

《西藏图说》既为边备而作,因此对18世纪末的西藏的边域有详细的描述,不但如松筠所言让当时驻藏汉番官兵熟识了西藏的形势,影响更及于清季到民初的

中英西藏交涉⁵⁹。

(b) 内政外交

前文讨论松筠被清高宗钦选入藏,目的在落实改革后驻藏大臣的制度,也透过实务分析松筠在藏的施政,然而作为一位理想的边臣,松筠有自我的期许,“钦差善言”也都记录在《西招图略》中:

守边之要,忠信笃敬也,而忠信笃敬,莫不本乎格致诚正,故格物所以穷理,致知所以通俗,诚意所以不欺,正心所以寡欲,忠信笃敬于是乎行之。钦承圣训,教以宽柔,无分遐迩,一皆羁縻,而向化怀德,是在修德也,然修德者必矜细行,而图治者宜防未然,目书二十八条以叙其事略,复绘之图以明其方舆,名之曰西招图略。⁶⁰

松筠以“忠孝仁义,格物致知”儒家思想,规范一位理想的疆臣,西藏适逢战后,强敌压境,安边成为第一要务,然而“安边”要配合“抚番”,“抚番”的不二法门是“羁縻”、“教之而养之”,施教的方法在于“戒怒”,理想境界则是“循循抚导,好言以教,不怒而威”⁶¹。松筠入藏后目睹达赖、班禅但知念佛修行,放任属下僧俗官员苛征暴敛,乌拉极重,因此他要求驻藏官员“除苛”、“抑强”,罢免或减轻一切苛捐杂税。松筠认为“除苛所以苏民,苏民所以安邦”。他于乾隆六十年春携带清高宗所赐四万两银于巡边沿途视察灾民抚恤赈灾,酌定《抚恤章程》;并晓谕达赖、班禅及西藏各世家大族效法朝廷恤民之意,豁免草料银、柴薪等杂税;散发各庄佃农籽种三年以内不必回缴收成;并奏请免收贡马银⁶²;总之,从和琳到松筠,清廷在藏推动的种种恤民免税措施,详见于《卫藏通志》⁶³。

松筠驻藏时西藏的涉外关系主要是廓尔喀,松筠主张以“怀柔”政策对待,所谓“怀柔”,是“来者安之谓之怀,所以劳其远,而慰其诚也”。对入藏学经、布茶、朝佛的信徒,怀柔以对;边外各部落来使,更亲自接见以慰其劳;对来藏贸易商旅不应扰累;对早年来藏贸易并已定居藏域的巴勒布(尼泊尔)商人及卡契回(克什米尔)商人应一律保护不得骚扰⁶⁴。在《西招纪行诗》有一段关于松筠处理商务的记载:“济咙田肥多产稞麦,凡有运货至宗喀以内贸易者,率由宗喀营官抽收牛粮各色杂税,实为苦累,日久怨生,以致心存两望;于是宗喀等处百姓有背盐赴济咙易粮者,该处番民亦私行抽税分用,其营官等亦不之问,此复成何事

体。因谕以圣主鸿恩、达赖喇嘛慈悲，其济咙、宗喀互相抽税一事，概行严禁，将两处无名杂赋分别减免，各发给印照，以垂永久。”说明了松筠是主张边域自由贸易的。内蒙古学者徐燕根据松筠的《绥服纪略》与《西陲总统事略》总结了松筠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 垦荒屯田，发展农业生产经济思想，提出改革原屯田的经营方式；

(2) 丰富的商贸思想，主张“训商如训农”，倡导公平互利，诚实守信，以法制规范商贸活动；

(3) 救荒抚困的经济调节思想，积极主动抚贫救荒。⁶⁵

徐燕的主张在松筠治藏期间已露端倪，他的抚恤救贫、垦荒种植及对商旅的态度前文已有叙述，廓尔喀之役后达赖、班禅及西藏世家大族庄田、乌拉制的改革起自和琳，松筠沿袭，晓谕全藏落实执行。

松筠对驻藏大臣应有的操守在二十八条中亦有所规范，前文提到的“戒怒”是其一；“遏欲”，钦差大臣不可收受贡献，更是一位边臣当守的分际，薄来厚往，所以柔远；“厉俗”，卫藏尚黄教，应尊重其信仰，因其教而教之；至于藏域特殊的服饰仪制、风俗习惯，更不必责令尽如内地，本其俗而厉以朴素，矢恭、矢顺可也；正所谓“致知所以通俗，诚意所以不欺，正心所以寡欲，忠信笃敬于是乎行之”。⁶⁶这是松筠的自我期许，也是治边的理想境界。

(三) 走过留痕

1. 影响及于光绪年间(1875—1908)西藏舆地志书的编辑

松筠于《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颁布后入藏办事，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巩固制度，落实《章程》中驻藏大臣应行的职权，完成朝廷赋予他的使命，做为一位疆臣，松筠非但称职而且十分出色，他离开驻藏大臣任后的经历——陕甘总督、伊犁将军、伊犁领队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绥远将军、盛京将军、吉林将军等⁶⁷，也说明了清廷是肯定他作为一位疆臣的出色表现的。成功的角色扮演对当代、对制度都有一定的影响，自不待言；然而松筠三度巡边，留下的著作对后代西藏问题影响之深，则是松筠本人也始料未及的，其中又以图文并茂的《西藏图说》为甚。

近代中国的政治版图，发展到乾隆晚期大致确定下来，清朝的统治者面对多民族组成的社会结构，采取了“齐其政而不易其教，因其俗而不易其宜”的统治

政策,设置理藩院作为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中枢机构,在边域派官驻军、建立驿站、设置卡伦、定期巡阅,在各边域民族不滋事端又服从中央政令的原则下,各民族可维持其风俗传统自由发展,西藏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廓尔喀之役因英国资本主义势力抵达印北而起,清廷以外交斡旋与武力抵抗勉力平定了事端,事后削弱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权力,巩固了清廷对西藏的统治,确立了中尼边界,但也放弃了在喜马拉雅山域角逐的野心,如是勉强维持了西藏半个多世纪安定祥和。到了19世纪中叶,国际局势变幻,西方势力环伺亚洲,个个欲瓜分中国而来,清朝政府以处于颓势的国力再度斡旋于列强之间,对于大清版图的争与不争之间,正好说明清廷维护祖先基业的决心与不愿涉及域外事务的国力;对于藏域亦然。然而藏域的范围到底在哪?它不仅涉及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Ladakh)等被清朝政府认为是境外的地域,发展至清末民初又出现有川藏、甘藏、青藏界线之争。在这些疆域、边界争夺交涉之中,中国政府(包括清朝与民国)的立场有时强硬、有时软弱、有时放任,虽说与国势盛衰相关,然细究原委,康、雍、乾三朝政治版图的确认,似乎更有效地主导着藏域尺寸之争。

记载盛清藏域版图的图籍不多,官方的舆图志书多藏之于内府,疆臣不易得见⁶⁸,嘉道年间便已传世的松筠著述,正好弥补了这项缺失,成为疆臣们办理边务时的重要参考图籍。光绪年间英军入侵藏域,地方人士掀起了编辑西藏图志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光绪年间出版的二十卷《卫藏通志》,由于作者不详,问世后常被著录为和琳、松筠或和宁所作⁶⁹;根据《清朝文献通考》⁷⁰:《卫藏通志》是桐庐人士袁昶于光绪年间据钞本编辑而成,因对廓尔喀之役、《藏内善后章程》颁布后的藏域记载极详,又收录有大量福康安、和琳与松筠等驻藏大臣的奏折、巡边的道路里程,因而被误以为是他们的作品。且不论《卫藏通志》的作者是谁,据笔者细读,这部志书与松筠有关则是不争的事实。光绪十二年(1886)出版的另一部重要的西藏方志类图书,是黄沛晓编著的《西藏图考》,作者在卷首《例言》中提到参考了包括新旧《唐书·吐蕃传》、《明史·西域乌斯藏传》、《四川通志·西域志》、果亲王焦应祈《西藏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但最重要的参考图籍便是松筠的《西藏图说》,并转载了书中的附图与入藏里程,书中揭示的藏域范围完全承袭了松筠的主张,而这三部志书(松筠《西藏图说》、黄沛晓《西藏图考》与袁昶《卫藏通志》)正是清末民初中英藏域之争中,中国据以力争藏域的依据。

2.《西藏图说》所揭示的西藏边界

诚如松筠所谓:《西藏图说》是为备边而设,故于西、南、北三面稍详。正确的说法是该书揭示了西藏西南、西北与正南边界,也正是西藏与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阿萨姆(Assam)等地交界处。以下根据《西藏图说》略作说明:

西南—西藏与尼泊尔交界处

《西藏图说》中的图一、图二、图三,详载西藏与尼泊尔交界处的边城,聂拉木与济咙,出城南行可抵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松筠指出:聂拉木与济咙是“西藏极边之界”,济咙往南过热索桥,聂拉木往南过札木铁索桥(现名章木,有章木大桥),即为尼泊尔境域。乾隆五十八年(1793)廓尔喀之役后,福康安、和琳等奉命厘清西藏与廓尔喀界线,沿肋噶尔、定日、宗喀、萨喀以南山岳绵延处设置“鄂博”,亦于驿道可达的两座边城济咙与聂拉木设置“鄂博”,厘清了尼泊尔与西藏的交界⁷¹。松筠绘图时离战后不久,巡边时特别一一考察驿道可通之“鄂博”,故《西藏图说》起于这两座边城。

济咙、聂拉木是进出西藏与尼泊尔间的两座边城,也是喜马拉雅山区贯穿南亚与东亚的重要通道,尼泊尔希望占据这两座边城,进而主控这一带的贸易,乾隆年间发动侵藏战争,目的之一在此,结果非但未能如愿,反而引起中国警觉,在此置设“鄂博”,正式纳入西藏境域。到了19世纪中叶,清廷先后爆发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与太平天国等内忧外患,尼泊尔以为有机可乘,先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向清廷提出:与西藏共管聂拉木与济咙;到了咸丰五年(1855)又以尼藏间边务、商务与贡使未获妥善照料等等纠纷,要求:(1)赔偿尼泊尔商欠;(2)归还聂拉木及济咙两地;(3)割让西藏达拉冈(Taklakot);挥军侵入藏域,占领聂拉木、济咙、达拉冈(普兰宗境内)、帕嘉岭等处,并向宗喀挺进。面对藏域被占,清廷除责令驻藏大臣赫特贺(?—1857)从中调解,并令成都将军乐斌(?—1875)率领四川屯兵三千入藏,于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与藏军统帅噶布伦才丹多吉联合,兵分三路夺回了聂拉木、济咙、宗喀等地,保住了西藏领域⁷²。

西北:阿里范围

《西藏图说》图四《宗喀接连萨喀、阿里图》:宗喀北行过萨喀(即萨迦),转西北抵冈底斯山,经麻帕木海,又西行至如妥(即日土 Rudok),俱属界内;如妥山

南的拉达克、库诺等部,则在界外。又据《西招纪行诗》载:“萨喀邻宗喀,北接阿里汤。游牧缺禾稼,生计唯牛羊。民力苦竭蹶,背盐以易粮。”注曰:“阿里乃卫藏西北极边,驻有营官两员,边外西北与拉达汗部落交界……由阿里西行半月抵布陵(今普兰),驻有营官一员,为阿里营官统辖,境内有冈底斯山大雪山,相传为名胜;境外南与廓尔喀、作木朗等处交界,西与库诺部交界,所有此一带拉达克、库诺、敏汤、作木朗皆与唐古忒和好,唯作木朗一部渐为廓尔喀侵占。迨尽此皆本界外之事,与唐古忒并无干涉,然所有阿里、布陵、萨喀等处边民,必飭营官妥为抚养,以结民心,可期永为保障。”为了抚养阿里境域的居民以及加强当地驻防,松筠巡边抵达萨喀、宗喀阅兵时,亦依例令驻防阿里的绿营、唐古忒军同步操练,奖赏拉达克与布鲁克巴头人并令其代为巡视拉达克与布鲁克巴边界。⁷³换句话说,松筠虽然认为拉达克、布鲁克巴是境外,但为求地方安宁,他交好当地的统治阶层,并以赏赐的方式令其代为巡边。

阿里是清代西藏四部(喀木、前藏、后藏、阿里)之一,焦应祈《西藏志》载:“阿里地方亦分三部,即阿里噶尔渡(今阿里首府噶尔)地方、纳达克(即拉达克 Ladakh)及谷古结塞(古格王国),三部通好,其中纳达克、谷古结塞乃康熙年间(1662—1722年在位)新抚之地。”⁷⁴也就是说,清圣祖的藏域版图是包括拉达克的,到了18世纪末廓尔喀之役后,清高宗明显地缩小了西藏的版图,将原与西藏密切关系被西藏认为是属邦的领域均被画出大清版图之外,有小西藏之称原属阿里领域的拉达克,被松筠明白记载为域外,这正可以解释,道光十四至十九年间(1834—1839)印度查漠(Jammu)地区多格拉族(Dogra,中国文献称为森巴人 Sing-pa)的土王古拉伯·辛格(Raja Gulab Singh)崛起入侵拉达克,拉达克部长曾向驻藏大臣孟保(?—1873)求援被拒,拉达克遂沦为克什米尔属境;同理,当古拉伯·辛格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侵入在《西藏图说》明白标示为西藏领域的如妥、阿里、古格之际,驻藏大臣孟保闻讯随即调兵遣将,与之周旋,最后签订停战协议⁷⁵,确保了阿里、古格,放弃了拉达克。

正南:西藏与锡金、不丹交界处

《西藏图说》图七《拉孜至札什伦布图》与图八《江孜以南边界图》有两段记载与藏域的边界有关:由定结东行一站至干坝,又东行三站至帕克里,为藏地南界;帕克里以外西通哲孟雄(锡金),东连布鲁克巴(不丹),帕克里东、西、南三面皆山,唯有巴珠布拉(藏语 La 即山口,亦可释作关)是进出西藏主要通道,再向

东可达加尔各答(Calcutta)。松筠虽未明言锡金、不丹非西藏领域,但俱在帕克里外,隐然属界外,这正可以解释嘉、道年间锡金、大吉岭面临被英属印度政府蚕食之际,锡金数度向清廷求援被拒的原因;然而锡金与西藏分界点究竟在哪?《西藏图说》中并未言明,因而爆发了光绪年间的隆吐撤军事事件,当然此时的清廷国力已衰,无力与英国周旋力争藏域了⁷⁶。

《西藏图说》图九《后藏至前藏图》:“由布达拉东渡江,至东德庆,转而南至乃东,又分为二,一稍东行至结纶孜、错纳(今错那)、达旺抵布鲁克巴界,皆藏中所谓山南处。”也就是说:松筠主张“达旺”这块至今仍是中印边界争论焦点之一的地区属于藏境。

达旺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治所在达旺镇的达旺寺,达旺寺是西藏三大寺之一哲蚌寺朗色林札仓的属寺。境内以色拉关(Ze-La Pass)为界,将达旺分成两部分,色拉关以北及达旺中部一带,由错那宗管辖;色拉关以南地区,主要隶属达旺寺,由该寺委员管理与收税。由于达旺地区的海拔相对要低一些,气候较为温和,是可产稻米的农业区,也是错那宗的避寒所。由于达旺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又与阿萨姆接壤,因此当英国势力抵达阿萨姆便引起英属印度政府的注意,将之纳入“东北边境特区”(North-East Frontier Area)⁷⁷。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政府为了让英国承认中华民国,同意召开西姆拉会议(Simla Conference),会议中西藏议约代表厦札私下与英国代表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秘密换文,将达旺地区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进了英属印度版图,这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之外线。然而厦札与麦克马洪私下规划的藏印边线,于民国廿三至廿四年(1934—1935)曝光后成为中印边界争执的焦点,一直延续迄今。

总之,从清季到民国初年中国政府竭力维系的藏域,与松筠《西藏图说》所载范围完全吻合,应不是偶然吧!⁷⁸

三 结论

松筠是一位蒙古旗人,受到良好的旗人教育,廿一岁由翻译生员考补理藩院笔帖式,卅二岁擢至内阁学士,派往边域效力,从此与藩务相始终,是一位出任边臣人为宰相的清中叶重臣;松筠“服膺宋儒”,深受汉文化影响,他的治绩与著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学界对于松筠这位深受儒家熏陶的蒙古旗人进行了较多的讨论,深入分析他是否仍保有蒙古人意识(consciousness)?或已然“满州

化”、“汉化”？日本学者平野聪评论松筠是一位“深具儒家思想的蒙古人精英”，村上信明则论述松筠“是同时拥有‘蒙古人’与‘旗人’意识而毫无矛盾”；当然也有学者主张：清朝的蒙古旗人随着时间过去而日渐失去了蒙古人的特质，先是“满洲化”，进而与满洲旗人一同“汉化”。⁷⁹本文仅就单纯的角色扮演角度评论松筠在驻藏大臣任上的功过得失。

松筠治藏的重要政绩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 落实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巩固了清廷治藏主权，完成了朝廷赋予的使命。关于此点文中已有叙述，此不赘言。特别值得再作说明的是：嘉庆十九年（1814）闰二月间，发生了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相见时座次礼仪之争，当时九辈达赖（1805—1815）年幼，由第穆呼图克图·罗桑土丹吉美（de mo blo bzang ‘jam dbyangs dpal’ don grub rgya mtsho 1811—1819 摄政九年）摄政，当他安排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相见时，特别将达赖座床置于堂室中央，左边安设驻藏大臣座位，并摄政座位平等，俨然居于下首；驻藏大臣瑚图理（1811—1814 任职）发现了这现象，上奏请示，令松筠复议，松筠回奏曰：“达赖喇嘛高坐于左，驻藏大臣、帮办大臣向外一字排开平坐，从未面向达赖旁坐”；奏上嘉庆皇帝令依旧制执行⁸⁰。松筠是虔诚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众⁸¹，于乾隆五十九年驻藏办事，奉命不得向达赖、班禅跪拜瞻礼，松筠一丝不苟奉命执行，这或许正是日本学者村上信明主张的：松筠同时拥有“蒙古人”与“旗人”两种意识，作为蒙古人他是虔诚的格鲁派信徒，作为旗人，他效忠朝廷，执行君主交付的任务；松筠也深受汉文化影响，他以五言古诗体及流利的笔法留下了驻藏记录。

(2) 松筠在藏推动的抚恤、济贫、免税、垦植、屯田、兴商、除苛、改革差役等措施，基本是“民为邦本”的儒家治国理念，《西招纪行诗》启首的廿四句即描述了松筠治藏的基本思想与做法，诗云：

治道无奇特，本知黎民苦。卫藏番民累，实因频耗蠹。
达赖免粟征，班禅蠲田赋。皇仁被遐荒，穷黎湛雨露。
奉敕曰钦哉，尽心伺待哺。敬副恩纶宣，咸使膏泽布。
度地招流亡，游手拾农具。譬如医大病，既愈宜调护。
仁以厉风俗，教之已革故。圣慈活西番，蛮生咸恬裕。
谁云措置难，应识有先务。安边惟自治，莫使民时误。

诗注曰：

藏地各属设有营官第巴管理，向不知抚恤，其科敛一切于民力，能否从无理会，蛊蠹已久，达赖、班禅不之知也。乙卯春，达赖、班禅闻知我皇上普免天下积欠钱粮漕粮，始知有蠲免番民粮赋之请。时奏入，我皇上深为嘉悦，赏银四万两抚恤唐古忒百姓。卫藏所属，在在穷民，查明概行恤赏，前后藏招集流亡番民，给予籽种口粮，各归本寨安插，力作者共千有百余户，俱令三年后再与达赖、班禅当差纳粮，既赈之后尤宜休养生息。《左传》：“仁以厉之，厉风俗也。”因教之以洁己爱民之方，并访得凡所以蛊蠹百姓者，皆分列条款，缮写告示，檄谕各营官，尽使严革故弊。

松筠针对西藏特殊的社会阶级结构，推动了一些改革，如令达赖、班禅及西藏世家贵族减免差税，安插贫民回归屯田等，这种富民裕民政策落实了多少，有待查考；但他在战后推动的抚恤安民德政，则为后人所称赞，《清史稿·松筠传》特别提到他因施惠贫民，而名满海内；清国史馆《松筠列传》则记载了松筠为了安边，抚恤喀达、定结、帕克里等地边民，向四川借藩库银五千两赈济，这项欠款至转任陕甘总督时方奏请在养廉银中扣还。⁸²

(3)当然松筠治藏的最大影响是他走过留痕，留下了丰富的著述，《西招五种》的评价与影响有下列四端：

1. 是了解 18 世纪末西藏社会与政局的重要依据；
2. 体现了一位称职的边臣对自我的期许与要求；
3. 勾勒出清朝的西藏范围，确定了西藏的版图，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力争藏域的依据；
4. 开启了西藏舆地图志编纂文化事业。

总之，作为一位官员，松筠勤政爱民又能执行中央的决策，身后入名宦祠；作为一位文人，他精通满、汉文，能诗能文又勤于著述，在乾、嘉方志学兴起之际，他乘职务之便率先投入边域史地图志的编著工作，完成了《西招五种》，又促成《西陲总统事略》的编纂，并以史诗般创作记录了边域风情，成就了不朽的文化事业，死谥文清；作为一位边臣，他刚柔并济，安边抚番，建立制度，捍卫国防，确保了边域的安宁，是一位实至名归出色的边臣。

〔注 释〕

- 1 廓尔喀(Gurkha)一词原指尼泊尔(Nepal)境内的一支民族,崛起于16世纪,并不断向外扩张,1769年廓尔喀王子博赤纳喇(Prithvinarayan Shah)征服加德满都山谷(Kathmandu Valley),结束了原有的玛拉王朝(Malla Dynasty),建立了新的廓尔喀王朝(Gorkha Dynasty),十九年后(乾隆五十三年,1788)即入侵后藏,与清廷发生战争,停战未及三年冲突再起,清高宗以福康安挂帅,挥军直捣其境,获得胜利,史称“廓尔喀之役”,也是乾隆十全武功最后一役。详拙著《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第二章《英国势力介入西藏事务之始》,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96。
- 2 案:松筠于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奉派为驻藏办事大臣,同年十二月初九行抵拉萨接任,至嘉庆四年元月廿五日奉谕回京接掌户部尚书,在藏任事整整四年。见乾隆五十九年《上谕档》(档案编号60100006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页85—87及表二《松筠驻藏期间所奏与藏事相关奏折》1、8、145。
- 3 松筠生年不详。据清国史馆《松筠本传》(档案编号3405—1、2049、5679)均载:松筠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享年八十二,据此推算松筠应生乾隆十九年(1754);然清国史馆《松筠本传》亦载:道光十一年松筠八十生辰,获赏“耆龄锡祜”匾额,据此推算松筠卒时享年应为八十四岁,生年应作乾隆十七年(1752)。
- 4 详表一《松筠履历》。
- 5 松筠传记资料有清国史馆《松筠传包》(档案编号702003405)内有《松筠事迹清册》七册、《松筠传稿》一册,清国史馆《松筠列传》(档案编号701002049、701005679)、清史馆《松筠列传》(档案编号701006747、701007700),以上档案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史列传·松筠传》(台北,中华书局印行)册四,卷三二,页1—12;《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台北,明文书局印行)卷三六,页31—54,收录有宗室昭樞撰《松筠传》及梁章钜撰《松筠传》;《续碑传集》(台北,艺文印书馆印行)卷1,页1a—16b,收录有沉垚《松筠事略》、《吉林通志·松筠传》;《国朝先正事略·松筠传》,台北,文海书局印行,卷32;《清史稿校注·松筠列传》,台北,国史馆印行,卷三四九,列传129。
- 6 案:纪大椿《论松筠》,《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吕育良《松筠、祁韵士和徐松对新疆方志事业的贡献》,《新疆地方志》1997年第2期,新疆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出版;徐燕《论松筠的经济思想》,《内蒙古师大学报》第28卷第5期,内蒙古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吕玉良、赵星华《松筠及其〈钦定新疆识略〉》,《中国地方志》第1—2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2001年;中见立夫《关于〈百二老人语录〉的各种抄本》,《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出版,2003年5月;村上信明《清朝中期における蒙古旗人の自己認識—正藍旗蒙古人松筠の例を中心に》,《内陸アジア史研究》第20号,2005年3月,内陸アジア史

- 學會出版;平野聰《清帝國とチベット問題》,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Sabine Dabringhaus,“Das Qing-Imperium als Vision und Wirklichkeit Tibet in Laufbahn und Schriften des Song Yun”,这是达素彬 80 年代末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博士论文。
- 7 《卫藏通志》作者不详,自光绪年间出版问世后常被著录为和琳、松筠或和宁所作,原因是该书收录的资料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颁布后福康安、和琳、松筠或和宁奏报施政为主,其中卷四《程站》收录松筠《巡边记》;卷十四上《抚恤》全录松筠多件奏折及颁布的抚恤章程,本文因而主张《卫藏通志》受松筠影响。又据《清朝文献通考》,台北,新兴书局印行,1963,卷二二六,《经籍考》十载:光绪《卫藏通志》二十卷(原志十六卷,袁昶复辑出版时将卷十三《纪略》分为上中下三卷,卷十四《抚恤》分为上下两卷,成二十卷),不具作者姓名,实为桐庐袁昶所辑,不忍湮没特表而出之。本文征引的是光绪丙申西渐村舍刊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8 案:黄沛翹《西藏图考》,光绪丁酉秋镌刻本,台北,故宫博物院,卷首《例言》明载该书引据图志之一即松筠的《西招图略》;卷一《藏图小引》亦云:“内府西藏全图,外间未见临本,惟松文清公图与盛氏绳祖图识刊行于蜀,松图最为明确,而方位倒置;盛图则模糊,不可辨识。”卷二《续审隘篇》全录松筠《西招图略》、《西藏图说》、《秋阁吟》及西藏程站考。
 - 9 收录于《第二届中国边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 153—184,台北,蒙藏委员会与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2006 年五月出版。
 - 10 案:根据《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驻藏大臣与驻藏帮办大臣每年应分别前往前后藏阅兵巡边,松筠驻藏四年三度亲赴后藏巡边阅兵,时间分别是在乾隆六十年四月、嘉庆二年八月与嘉庆三年四月,详表二,22、27、31、32、44、45、111、115、123、126、128、130、133、138。嘉庆元年十月由驻藏帮办大臣和宁前往后藏,松筠则在前藏巡视阅兵,详表二,84《奏报西藏官兵训练情形折》载:“本年后藏一带地方官兵奴才和宁于各处操阅后,前经奏报在案。此中前藏所有绿营官兵暨唐古忒兵,奴才等加意阅……奉朱批:毋得耽搁怠慢”(温浩坚译),说明嘉庆元年松筠未前往后藏。再者,松筠三度前往后藏巡边均留下著作,详后文。
 - 11 案:松筠驻藏期间留下的满汉文奏折详列于表二。
 - 12 详见乾隆五十九年《上谕档》(档案编号 601000061),页 85—87,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此则上谕又见于《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印行,1964,卷一四五七,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丙辰上谕。
 - 13 详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一六,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戊戌上谕。
 - 14 详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三二,乾隆五十八年七月癸巳谕军机大臣。
 - 15 案:松筠任内务府大臣在御前侍卫行走在乾隆五十八年四月间,九月奉谕出京传谕英吉利贡使即参与接待马戛尔尼截至送贡使离华。见清国史馆《松筠传包·事迹

- 清册上》(档案编号 702003405—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16 案:笔者以为当时的清廷意识到廓尔喀之役涉及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力量,为了牵制英国势力,不使英国势力助廓尔喀,影响战争的结果,清高宗在发兵廓尔喀前夕,终于同意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华;又派遣储备的驻藏大臣松筠负责接待马戛尔尼,笔者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有着必然的关系。关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力量涉及廓尔喀之役,详拙著《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第二章《英国势力介入西藏事务之始》。
 - 17 同注 11,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丙辰。
 - 18 详见乾隆五十九年《上谕档》(档案编号 601000061)页 87—88、《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五七,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丁巳上谕。
 - 19 引自《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三二,乾隆五十八年七月癸巳上谕。
 - 20 引自《寄信上谕档》(档案编号 604000044),页 107—108,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上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21 松筠于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抵藏,连续三天与和琳密谈,和琳交代所有事务后于十二月十三日起程离藏。详表二《松筠驻藏期间所奏与藏事相关折件》1。
 - 22 引自《西招图略》页 20,述事。
 - 23 案:清廷在廓尔喀之役后派福康安、和琳等人藏善后,先后颁布了多项《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然《善后章程》究竟有多少条?正式颁布于何时?条款是以汉文书写?是满文本?或是藏文本?至今未有定论。藏学界目前通行的《钦定藏内二十九条章程》,有两种藏文本:《水牛年文书》与《荟粹本》,三种汉文本:《汉文全译本》、《汇编本》与《荟粹本》,然都被藏学界认为并非原始版本。笔者最近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廓尔喀档》与内府黄绫本《钦定廓尔喀纪略》编辑出版,并撰《廓尔喀之役与〈廓尔喀档〉》一文(待刊),提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绝不仅只有二十九条,也不是在同一时间、一次颁布的,而是在福康安等处理西藏善后事宜中陆续规划,陆续奏报、陆续奉谕、并陆续颁布实施的。
 - 24 详吴丰培、曾国庆编撰《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 25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〇三,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壬辰上谕。
 - 26 详注 4 所引《松筠传》。
 - 27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五八,乾隆五十九年八月丙寅(十二日)上谕。
 - 28 详见表二《松筠驻藏期间所奏与藏事相关奏折》4、10、152。
 - 29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廓尔喀档》共十三册,档案编号 614000001—614000013,时间乾隆五十六年九月至乾隆五十八年三月。
 - 30 引自《廓尔喀档》(档案编号 614000009),页 203—204,乾隆 57 年 8 月 27 日上谕。
 - 31 引自《廓尔喀档》(档案编号 614000013),页 109—117,乾隆 58 年 1 月 21 日军机

大臣奏议覆福康安等续奏藏内应行办理章程。

- 32 见《上谕档》(档案编号 601000061),页 044—045,乾隆 58 年 3 月 15 日上谕。
- 33 参见表二,3、5、42、43、74、87、91、94、98、110、113、119 等。
- 34 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册五,页 2138。
- 35 引自《廓尔喀档》(档案编号 614000009),乾隆 57 年 8 月 27 日上谕,页 213—214。
- 36 引自《廓尔喀档》(档案编号 614000012),乾隆 57 年 12 月 27 日上谕,页 103—105。
- 37 参见表二。
- 38 引自表二,42“奏报设金瓶掣签后无人敬信拉穆吹忠并八世达赖印匣钥匙酌情保管情形”,译文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册五,页 2138—2140 及表二,55。又参见萧金松《清代驻藏大臣》,台湾唐山出版社,1996,页 143。
- 39 详《廓尔喀档》(档案编号 614000012),页 105—112,乾隆 57 年 12 月 27 日上谕。
- 40 同上,页 105—111。
- 41 参见表二,71、73、86、89、101、118、122、125 等。
- 42 引自《廓尔喀档》(档案编号 614000013),页 109—117,乾隆 58 年 1 月 21 日军机大臣奏议覆福康安等续奏藏内应行办理章程第十条。
- 43 引自《廓尔喀档》(档案编号 614000013),页 109—117,乾隆 58 年 1 月 21 日上谕。
- 44 参见表二,7、12、25、26、33、38、40、47、52、60、63、64、65、67、70、72、75、83、103、104、106、107、108、116、131、134、135、140。
- 45 参见表二,13、14、15、17、22、23、24、27、28、29、30、31、44、45。
- 46 详《廓尔喀档》(档案编号 614000013),页 11,乾隆 58 年 2 月 1 日上谕。
- 47 参见表二,22、27、45、49、51、84、86、101、112、115、120、123、126、128、130、132、133、139。
- 48 参见表二,37、88、97、131。
- 49 案:《西招五种》于清季便曾多次印刷出版,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本文征引的版本是根据道光刻本影印出版者。参见张羽新编《中国藏学汉文历史文献集成》第三册,《西招五种》出版说明,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年。
- 50 详《西招图略》,是松筠在藏的最后部著作,完成于嘉庆三年秋。
- 51 详松筠《西招图略》之安边、绥远、审隘、量敌、合操、行操、练兵、申律、制师、馭众、坚阵、出奇、倡勇、谨胜、善始、持志、防微、守正等十八条。
- 52 松筠于乾隆六十年四月巡边抚恤所上奏折见表二 22、23、27、28、32、44、45;嘉庆二年八月巡边时所上奏折见表二 111、115。
- 53 案:日喀则是班禅额尔德尼的驻地,廓尔喀之役中沦陷,札什伦布被洗劫,战后加强

了日喀则防卫,设都司一名,驻汉兵 40,番兵 1000;日喀则东南最近的防汛是江孜汛,则驻有守备一员,汉兵 20、番兵 500。见《西招记行诗》,页 4a—5b。

54 详见《西招记行诗》,页 4ab。

55 见《西招记行诗》,页 5a。

56 见《西招记行诗》,页 8ab。

57 松筠于嘉庆三年三月三度巡边所上奏折见表二,126、128、130、132、133、139。

58 引自表二 130,林士铎译。松筠于嘉庆三年春巡边后绘制藏边界隘口防汛全图事,又见于表二,126、132 两折中。

59 松筠著《西藏图说》既是为了让驻藏人员熟识西藏形势,自然会将之留交接任驻藏者,更重要的是松筠的著作于道光年间坊间便有通行本;到了光绪年间中英因西藏问题发生冲突交涉时,相继出版的西藏地理志的书籍亦多受松筠的影响,例如黄沛翘《西藏图考》(光绪丁酉秋镌刻本)将《西藏图说》全部收录其中;光绪二十二年刻印的《卫藏通志》(光绪丙申浙西村舍根据写本刊印本),也收录了松筠巡边抚恤的资料;至于清末民初中国官员更是据以力争藏域,详拙著松筠《〈西藏图说〉与清季藏域之争》。

60 引自《西招图略》序。

61 详《西招图略》抚番、戒愬。

62 详表二,13、14、15、17、22、23、24、27、28、29、30、31、44、45。

63 详见《卫藏通志》,卷十四上下,抚恤。

64 《西招图略》,怀来。

65 徐燕《论松筠的经济思想》,《内蒙古师大学报》第 28 卷,第 5 期,1999 年 10 月。

66 《西招图略》,遏欲、厉俗。

67 详附表一,《松筠经历》。

68 乾隆年间是西藏舆图绘制的鼎盛时期,除了官修图志类,如《乾隆内府地图》、《钦定西域同文志》、《大清一统志》等内附西藏部分外,存世的尚有《乾隆五十九年鄂博位置图》(现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四川西藏等处图》(满汉对照,墨印纸本,纵 1 公尺,横 2.54 公尺,制者不详)、《西宁至达赖喇嘛地方图》(满文,彩绘绢本,制者不详)、《西藏地方图》(汉藏文并记,板框纵 61 厘米,横 89 厘米,制者不详,不注比例)、《西藏全图》(汉文,彩绘纸本,集者不详)、《前后藏图》(汉文,彩绘纸本,纵横一公尺,制者不详)、《前藏地图》(汉文,彩绘纸本,制者不详)、《西藏图考》(汉文,色印,制者不详)、《西藏全境道里图》(瞿继昌制,汉文,共十一幅,墨绘)、《班禅额尔德尼入西藏至塔尔寺路程图》(汉文,二幅,制者不详)、《西藏帕古里附近道里图》(汉文·官绘本,色印)、《西藏至塔尔寺图》(汉文,彩绘纸本,制者不详)、《西藏番族图》(汉文·彩印,制者不详)、《雅鲁藏布江图》(汉文·板框纵 56.3 厘米,横 58.5 厘米,不

- 注比例,制者不详)等。见王学清、邓桓祥《清代、民国时期的西藏测绘考略》(《西藏研究》1994年第3期)。案:王学清、邓桓祥服务于西藏自治区测绘局,文中介绍的乾隆朝西藏典图出处不详,是否由测绘局征集所得?现藏何处?待考。
- 69 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丙申刊印渐西村舍本《卫藏通志》及《卫藏通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2004年出版)注录作者是和琳;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之《卫藏通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与《中国边疆丛书》之《卫藏通志》(台北文出版社,1966)作者注录则为和宁;《续修四库全书》之《卫藏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作者注录则为佚名。
- 70 见《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二六,经籍考10载:光绪《卫藏通志》,十六卷,不具作者姓名,实为桐庐袁昶所辑,不忍湮没特表而出之。
- 71 案:福康安与和琳奉命厘清西藏与廓尔喀交界设立鄂博事,见《和琳奏设立西藏边界鄂博已派员查勘绘图贴说俟阅边时眼同堆设》、《谕内阁和琳设藏边鄂博训练蒙汉藏官办理妥协给予奖励》,《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册五,页2228—2230。济咙与聂拉木则是驿道可通之处,至今仍是进出西藏与尼泊尔间的通道。
- 72 详拙著《松筠〈西藏图说〉与清季藏域之争》。
- 73 详附表二,41—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二日松筠满文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温浩坚译)
- 74 见焦应祈《西藏志》《疆圉》,页15b—16a。沈云龙主编《中国边疆丛书》19—2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
- 75 详拙著《松筠〈西藏图说〉与清季藏域之争》。
- 76 同上。
- 77 详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pp. 229 - 3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1989.
- 78 详拙著《松筠〈西藏图说〉与清季藏域之争》。
- 79 详村上信明《清朝中期における蒙古旗人の自己認識—正藍旗蒙古人松筠の例を中心に》。
- 80 详表二、152及《瑚图礼等奏复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坐次礼仪折》、《字寄瑚图礼等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坐仪仍照旧章办理》,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页2217、2220。
- 81 村上信明研究指出:松筠宅第内设有佛堂,不分寒暑每日清晨四时在佛堂中礼佛,见《清朝中期における蒙古旗人の自己認識——正藍旗蒙古人松筠の例を中心に》。
- 82 清国史馆《松筠列传》(档案编号701002049、701005679)。

(彩图3)乾隆六十年四月松筠巡卫藏边域路线图——详《西招纪行诗》

拉萨(出前藏西南行一日宿业党)—业党(又行一日宿曲水)—曲水(渡江越山宿巴则)—巴则(旁临洋卓海宿白地)—白地—朗噶孜(宿)—春堆(宿)—江孜(阅兵,西行两日抵札什伦布)—日喀则

日喀则(出日喀则行三日抵彭错岭)—彭错岭(西行一日宿拉孜)—拉孜(又西行过甲错山,无水草与雪山相连)—甲错山(宿于中途次日越山抵罗罗塘,隘口)—罗罗塘(由甲错山、罗罗塘行二日抵协噶尔)—协噶尔(出协噶尔宿蜜玛次日行60里抵定日汛)—定日(定日汛镇守三边,最为紧要,松筠在此阅兵。)—通拉(自定日西行过通拉山暮抵巴都尔)—巴都尔(由巴都尔过达尔结岭行一日抵极边)—聂拉木(聂拉木依山临洞,有小关门无墙垣,营官寨筑于关门外,居民不多,仅有廓尔喀属巴勒布二十余人常川贸易于此)

聂拉木(由聂拉木过达尔结岭西行宿峨拉喇嘛寺)—峨拉(次日过嘉纳大山宿伯孜草地)—伯孜(宿拉错海子南岸)—巩塘拉(山势陡峭险要,有琼噶寺,离寺南行六十里抵宗喀)—宗喀(设营官寨,后接喇嘛寺,周围有墙垣,势颇坚。西南行一站宿袞达)—袞达(袞达西南行一站至卓党,两地间有察木“卡”,数里间有长桥三座,廓尔喀战中有著名的察木卡之役,是卫藏重要保障)—卓党(草木茂盛,有田禾人家,南行八十里抵卫藏极边济咙)—济咙(济咙,外接廓尔喀,西南行十日抵阳布,有番民四百余户,地气和暖,一年两熟。设正副营官,不驻防。)

济咙—宗喀(自济咙旋程,经宗喀转向东北走桑萨)—桑萨(十二程回到拉孜由东南入山径至)—拉孜(十二程回到拉孜由东南入山径至)—萨迦(三日程回到札什伦布)—日喀则(出日喀则渡藏布河七日抵阳巴井)—阳巴井(三日程回拉萨)—拉萨。

江孜(自江孜南行七日抵帕克哩)—帕克哩(卫藏南大门,外与布鲁克巴、哲孟雄交界,西通廓尔喀,道路平坦)—干坝隘(由帕克哩西行三日至干坝)—定结(由干坝西行一日至定结,干坝、定结两隘口相距札什伦布仅4—5日程,外通廓尔喀最为险要)——记载并未实地巡示

定日岔路有三:

(1)定日(出定日西北行四日至宗喀)—宗喀(出宗喀西南行三日抵济咙)—济咙(边隘,与廓尔喀毗连)

(2)定日(出定日西行二日至聂拉木)—聂拉木(边隘,与廓尔喀毗连)

(3)定日(出定日南行三日抵绒辖)——绒辖(边隘,与廓尔喀毗连)

萨喀、阿哩、布陵:东南邻宗喀,西南与廓尔喀的作木朗、落敏汤两部交界,北接阿里,卫藏西北极边,驻营官二员,边外西北与拉达克汗部交界,拉达克北行月余可抵回疆叶尔羌。阿里西南行半月路程抵所属布陵地方,驻营官一员为阿哩营官统辖境内有岗底斯大雪山,境外与廓尔喀、作木朗等处交界。所有拉达克、库诺、落敏汤、作木朗皆与唐古忒和好。

所有萨喀、阿哩、布陵等处边民,必飭营官妥为抚养。

(彩图4)嘉庆二年秋松筠巡卫藏边域路线图——详《秋阅吟》

拉萨(70里)——业党(90里)——曲水(55里)——巴则(90里)——白地(90里)——朗噶孜(120里)——春堆(120里)——江孜(阅兵)——白朗(90里)——日喀则(西行90里)——岗坚喇嘛寺(60里)——花寨子(110里)——彭错岭(60里)——嘉汤(60里)——拉孜(90里)——甲错山(120里)——罗罗塘(50里)——协噶尔(70里)——密玛塘(60里)——定日(阅兵,110里)——莽噶布蔑(50里)——莽噶布堆(100里)——迭古芦(90里)——拉错海子(110里)——宗喀(100里)——袞达(110里)——邦馨(20里)——济咙(还宿)——邦馨(还宿)——袞达(还宿)——宗喀(90里)——霍尔岭(90里)——恰木果(80里)——列克隆(60里)——达克孜(140里)——汤谷(130里)——桑萨(90里)——札布桑堆(60里)——阿木岭(140里)——僧格隆(80里)——察布汤泉(90里)——萨迦庙(110里)——察咙(150里)——那尔汤(50里)——日喀则(7站690里)——阳巴井(3站240里)——达木观兵(6站495里)——拉萨

(彩图5)嘉庆三年秋松筠《西藏图说》所载卫藏里程图

图一:济咙(南行)——阳布(正路计程18站)

聂拉木(南行)——阳布(小路较近,商旅多行此路)

图二:济咙(东北行)——宗喀(左峭壁,右深涧,林木森然,是济咙以内宗喀以外长城)

聂拉木(东北行)——定日(正路,通拉雪山是天然屏障)

聂拉木(北行)——定日

图三:定日(南行3站)—喀达

定日(东南行4站)—绒辖

定日(西南行3站)—聂拉木

定日(西北约250—260里至迭古芦险地)—迭古芦

图四:宗喀—萨喀—阿哩

宗喀(北行4站)—萨喀(西北行至盐池,西行)—冈底斯山—麻帕木海(西行)—如妥(山南
即拉达克、库诺等部,界外)

图五:定日四达图

定日(西北走)—宗喀

定日(西〔东〕南达)—绒辖

定日(南行)—喀达(见图三)

定日(东北走)—拉孜

定日(100多里)—协噶尔(南行)—宜霞尔(宜喜尔)—定结

定日(100多里)—协噶尔(东行)—罗罗—甲错山—拉孜(约320多里,卫藏通衢;南行约200
里至萨迦)—萨迦

图六:喀达—隆迈—阳布(西南经隆迈约700里达阳布)

图七:拉孜—札什伦布图

拉孜(东北行)—彭错岭—札什伦布

拉孜(东南行)—萨迦—札什伦布

拉孜(南行4日)—定结(东行1站干坝)—干坝(再东行3站帕克里)—帕克里(藏南界)

拉孜(东行200余里)—江孜

图八:江孜以南边界图

江孜(南行4站达帕克里)—康玛尔(康玛尔多山,南有山峡之险,皆沿途扼塞)—帕克里(东西南
三面皆山,西通哲孟雄,东连布鲁克巴,东南达—达噶里达〔加尔各答〕,北4站达江孜)

帕克里

图九：后藏至前藏图

札什伦布(东北行10日约900里为大路)—江孜—春堆—巴则—曲水—党业—拉萨

札什伦布—江孜(捷径行8日)—仁本—巴则—曲水—党业—拉萨

札什伦布(东北渡江)—阳巴井—拉萨

阳巴井(东北行3站)—达木蒙古

拉萨(东渡江)—东德庆(转南)—乃东(分两路：

(一稍西行)琼结—质谷(直谷)—多宗(突宗)

(一稍东行)雅堆—至结纶孜—错纳—达旺—布鲁克巴界(皆藏中所谓山南处)

图十：布达拉北面图

拉萨(西北走)—阳巴井(北走)—那木里(纳木错)—哈拉乌苏(喀喇乌苏、那曲)

图十一：前藏至拉里图

拉萨—墨竹工卡—鹿马岭(以西路平坦)—常多(重山峻岭终年积雪)—拉里

鹿马岭(以南)—达克布

鹿马岭(以东)—工布(恭布)

鹿马岭(以北)—哈拉乌苏三十九族放牧地

图十二：拉里至昌都(察木多)图(1000余里共设22站)

图十三：昌都至巴塘图(1000余里共设20站)

图十四：巴塘至里塘图(500余里)

图十五：里塘至打箭炉图(600余里9站)

成都至后藏路程(成都至后藏7125里)

成都(出南门,40里)—双流县(尖,50里)—新津县(宿,50里)—斜江河(尖,60里)—邛州(宿,40里,渡南大河)—大塘埔(尖,50里)—百丈驿(宿,50里)—名山县(尖,40里)—雅州府(宿,45里,渡平羌江)—观音铺(尖,45里)—荣经县(宿,60里)—小关山(尖,70里,过象岭)—清溪县(宿,30里)—富村(尖,50里,路益险)—泥头驿(宿,35里)—林口(尖,40里,上飞越岭)—化林坪(宿,30里)—里冷迹(尖,45里)—泸定桥(宿,35里)—大烹坝(尖,40里)—

头道水(宿,35里)—柳杨(尖,30里)—打箭炉(宿,自成都到打箭炉970里11站。出南门,10里)—工竹卡(差使到此照口外支应)—折多(宿,换乌拉,50里)—提茹塘(尖,35里)—阿娘坝(宿,路平好走,30里)—瓦切(尖,25里)—东俄洛(宿,路平好走,30里)—高日寺(尖,深林密菁人迹稀达,45里)—卧龙石(宿,60里)—八角楼(尖,60里,过雅龙江里塘界)—中渡(宿,35里)—麻盖中(40里)—剪纸湾(尖,此段最难行,60里)—西俄洛(宿,换乌拉,45里)—咱吗拉洞(尖,过大雪山,陵谷深邃,有夹坝,70里)—火竹卡(宿,25里)—火烧坡(尖,25里)—里塘(宿,换乌拉,自打箭炉至里塘685里8站)—头塘(宿,换乌拉,40里)—干海子(尖,65里)—喇嘛丫(宿,55里)—二郎湾(尖,路更难走,55里)—三坝塘(宿,50里)—松林口(尖,50里)—大朔塘(宿,90里)—崩察木(尖,岭高雪深,极难走,40里)—小巴冲(宿,50里)—巴塘(宿,换乌拉,自里塘至巴塘545里6站,40里)—牛古(尖,险要,50里)—竹笼巴(宿,45里)—公拉(尖,渡金沙江,50里)—空子顶(40里)—莽里(宿,换乌拉,30里)—邦木(尖,50里)—南墩(尖,40里)—古树(宿,40里)—普拉(尖,60里)—江卡(宿,50里)—山根(尖,过河,70里)—梨树塘(宿,50里)—阿拉塘(尖,换乌拉,60里)—石板沟(宿,80里)—阿足塘(宿,高山积雪,无人居,必须带行粮,50里)—歌二(尖,过河,50里)—洛加宗(宿,供乌拉,40里)—俄伦多(尖,40里)—乍丫汛(宿,换乌拉,50里)—雨撒(尖,60里)—昂地(宿,路险雪深,寒冷彻骨,30里)—噶噶(尖,山峻路险,60里)—王卡(宿,换乌拉,25里)—三道桥(尖,30里)—冒贡(宿,60里)—苦弄(尖,40里)—宿(宿,70里)—猛卜(尖,20里)—小恩达(尖,60里)—察木多(宿,设粮务塘汛,有土城,自巴塘至察木多1435里14站。40里)—俄洛桥(尖,35里)—浪荡沟(宿,30里)—果角塘(可宿,80里)—拉贡(尖,换乌拉,60里)—恩达(宿,寒冷积雪,20里)—恩达塘(40里)—牛粪沟(尖,20里)—瓦合山(高峻寒雪,鸟兽不栖,50里)—瓦合塘(宿,20里)—瓦合寨(可宿,40里)—麻里(尖,换乌拉,40里)—嘉裕桥(宿,30里)—鼻奔山根(尖,50里)—洛龙宗(宿,换乌拉,90里)—铁凹塘(宿,20里)—曲齿(尖,50里)—硕板多(宿,换乌拉,50里)—忠义沟(尖,50里)—巴里郎(宿,55里)—索马郎(尖,45里)—纳子(宿,50里)—边坝(尖,换乌拉,60里)—丹达(宿,50里)—察罗松多(宿,过丹达山,50里)—郎吉宗(宿,40里)—大窝(尖,换乌拉,55里)—阿南多(宿,30里)—破寨子(尖,40里)—甲贡(宿,40里)—大板桥(尖,40里)—多洞塘(宿,30里)—破寨子(尖,40里)—甲贡(宿,40里)—大板桥(尖,40里)—多洞塘(宿,80里)—擦竹卡(尖,60里)—拉里(宿,自察木多至拉里1500里15站,50里)—阿咱(尖,110里)—山湾塘(宿,70里)—常多(尖,60里)—凝多(宿,50里)—松多(尖,60里)—江达(宿,换乌拉,60里)—顺达(尖,100里)—鹿马岭(宿,120里)—堆达(宿,60里)—乌苏江(宿,60里)—仁进里(尖,70里)—墨竹工(宿,40里)—拉木(尖,50里)—占达塘(宿,30里)—德庆(宿,50里)—蔡里塘(尖,过河,30里)—西藏(宿,自拉里至前藏1070

里,10站。40里)一登龙冈(尖,40里)一业党(宿,40里)一僵里(尖,50里)一曲水(宿,土地沃饶平坦,百里居人稠密,20里)一铁索桥(30里)一冈把泽(尖,40里)一马陇(宿,60里)一白地(宿,50里)一挾鲁(尖,50里)一朗噶孜(宿,55里)一翁古(尖,70里)一热龙(宿,70里)一谷洗(尖,70里)一江孜(宿,55里)一人进冈(尖,60里)一白浪(宿,70里)一春堆(尖,40里)一札什伦布(宿,自前藏至后藏915里9站。)

表一 松筠履历

职 衔	时 间	备 注
翻译生员	乾隆?—三十七年	出身
理藩院笔帖式	乾隆三十七—四十二年	考取
主事	乾隆四十二—四十三年	补
员外郎	乾隆四十三—[四十五]年	升
三座塔理事司员	乾隆四十四—[四十八]年	充
户部银库员外郎	乾隆四十五—四十八年	调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乾隆四十八年—五十一年	超擢
镶黄旗蒙古副都统	乾隆四十八—四十九年九月	授
正红旗满洲副都统	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五十五年三月	缘罪革退
户部右侍郎 留库伦 办事	乾隆五十一年闰七一五十五年三月	缘罪革退
库伦办事大臣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五十六年	以四品顶带留任
工部左侍郎	乾隆五十六—五十七年四月	授
正白旗满洲副都统	乾隆五十六—五十九年八月	
户部右侍郎	乾隆五十七年四月—五十七年十月	调
蒙古翻译考试官	乾隆五十七年七月	充
户部左侍郎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五十八年二月	

职 衔	时 间	备 注
崇文门副监督	乾隆五十八年二月	充
御前侍卫	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嘉庆四年十一月	缘罪革去
内务府大臣	乾隆五十八年四月	授
军机大臣	乾隆五十八年四月	授
国史馆副总裁	乾隆五十八年七月	充
工部尚书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嘉庆四年一月	升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嘉庆四年一月	授
陕甘总督	嘉庆四年二月—五年一月	授
伊犁将军	嘉庆五年一月—闰四月	授
伊犁领队大臣	嘉庆五年闰四月—七年一月	调
伊犁将军	嘉庆七年一月—一十四年三月	调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嘉庆十四年四月—嘉庆十四年六月	调
陕甘总督	嘉庆十四年六月—十四年十二月	调
两江总督	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六年一月	调
两广总督	嘉庆十六年一月—十六年九月	调
协办大学士	嘉庆十六年六月—十八年九月	授
镶红旗满洲都统	嘉庆十六年九月—二十一年七月	授
军机大臣	嘉庆十七年九月—十八年一月	授
御前大臣	嘉庆十八年一月—二十二年六月	革职
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	嘉庆十八年一月—二十二年六月	革职

职 衔	时 间	备 注
伊犁将军	嘉庆十八年六月—二十一年五月	
东阁大学士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九年八月	
武英殿大学士	嘉庆十九年八月—二十二年六月	革职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嘉庆二十年九月—	兼署
镶蓝旗满洲都统	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年六月	革职
两江总督	嘉庆二十一年十月—	署
察哈尔八旗都统	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年十月	召还回京
绥远城将军	嘉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年一月	署
兵部尚书	嘉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年九月	
盛京将军	嘉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年四月	
山海关副都统	嘉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年四月	
热河都统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一年五月	
兵部尚书	道光一年五月—七月	
吏部尚书	道光一年七月—二年六月	革职
军机大臣	道光一年八月—二年六月	
直隶总督	道光二年一月—	署
上书房翻译谕达	道光二年六月—	
吉林将军	道光三年九月—四年二月	调补左都御史
乌里雅苏台将军	道光五年九月—五年十月	署
镶红旗蒙古都统	道光五年十一月—	署
兵部尚书	道光六年二月—	署

职 衔	时 间	备 注
礼部尚书	道光六年五月—九年六月	兼管太常寺鸿胪寺事务
热河都统	道光八年一月—	署
直隶总督	道光九年四月—五月	署
兵部尚书	道光九年六月—十一年八月	以病开缺调理
正红旗蒙古都统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年五月	
阅兵大臣	道光十三年六月—	
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道光十三年九月—	署
左翼监督	道光十三年十月—	充
都统衔	道光十四年一月	命以都统衔休致
太子太保衔	道光十五年五月	病故 加恩晋赠

案：松筠履历见清国史馆《松筠传包》（档案编号 3405），内有《松筠列传》一、《松筠事迹册》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表二 松筠驻藏期间所奏与藏事相关奏折

编号	松筠奏折题要	具奏或朱批时间	具奏内容	出处
1	奏抵藏接任视事及和琳起程日期	乾隆五十九年一月十七日	上任	元以来藏案汇编 ¹ 页 1640
2	谕松筠抵藏后见达赖喇嘛不可叩拜	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十二日	确立制度	传包·事迹清册 ²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1920
3	奏设金本巴瓶掣签确定帕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	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四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³
4	奏抵藏后不向达赖喇嘛行跪拜礼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编号	松筠奏折题要	具奏或朱批时间	具奏内容	出处
5	奏为掣定帕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情形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6	奏报锡瓦拉呼图克图入贡佛像等物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7	奏报接任后应否晓谕廓尔喀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8	奏报接任日期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史馆满文奏折
9	奏报前往布达拉宫会见八世达赖喇嘛并转交御赐哈达等物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怀柔赏赐	一史馆满文奏折
10	奏会见达赖喇嘛不行跪拜礼	乾隆六十年一月十七日	确立制度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211
11	奏报八世达赖七世班禅请求遣使庆贺太上皇	乾隆六十年二月十日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12	奏报廓尔喀遣使请安	乾隆六十年二月十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13	奏报达赖班禅同体皇上鸿慈唐古忒百姓分别抚恤蠲免粮石缘由 朱批:好事即有旨	乾隆六十年 2 月 10 日 3 月 9 日奉	抚恤赈灾	卫藏通志·抚恤 ⁴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301
14	奏为达赖班禅请将伊等所属唐古忒百姓本年度应缴粮石及旧欠各项银粮一律豁免散给贫民糶籽种及修补房舍事	乾隆六十年二月十日	抚恤赈灾	卫藏通志·抚恤
15	为后藏百姓乌拉等项差事应遵照乾隆五十八年前后藏会商所立图结永远遵奉给后藏商上印照	乾隆六十年二月三十日	抚恤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303
16	奏报挑选班禅经师	乾隆六十年闰二月二十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编号	松筠奏折题要	具奏或朱批时间	具奏内容	出处
17	奏为达赖请将伊等所属唐古忒等应缴粮石及旧欠银粮宽免并赈济贫人等事	乾隆六十年闰二月	抚恤赈灾	传包·事迹清册
18	奏为七世班禅师傅患病请另行拣授折	乾隆六十年三月二十日	确立制度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1920
19	奏报八世达赖七世班禅派巴尔雅堪布等赴京递丹书克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日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20	奏报八世达赖七世班禅叩谢赏赐及拨银赏藏众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日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21	奏请分赏前藏各寺喇嘛银两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日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22	奏报起身查边阅兵亲带恩赏一万两赈抚事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日	边防军事怀柔施恩	卫藏通志·抚恤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303
23	奏为遵旨抚恤番民酌定抚恤章程缮写告示遍行晓谕事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日 五月二十七日奉旨	抚恤确立制度	卫藏通志·抚恤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304
24	奏为三十九族地方番民每年应缴贡马银向由驻藏大臣征收入正项请旨一律豁免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日 五月二十七日奉旨	怀柔施恩	卫藏通志·抚恤
25	奏报遵旨备办廓尔喀王请遣使进京事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26	军机大臣寄信松筠妥善办理廓尔喀王遣使进京事	乾隆六十年四月四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27	奏报自前藏至后藏定日西南一带实施抚恤情形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六日	抚恤怀柔施恩	卫藏通志·抚恤元 以来藏案汇编 页 2306
28	奏报遵旨减免百姓差徭告示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怀柔施恩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306

编号	松筠奏折题要	具奏或朱批时间	具奏内容	出处
29	奏报和宁于前藏办理抚恤完竣事	乾隆六十年四月三十日 八月四日奉旨知道了	怀柔施恩	卫藏通志·抚恤
30	奏为八世达赖喇嘛因钦赏西藏银两恩准蠲免钱粮谢恩折	乾隆六十年五月四日朱批时间	怀柔施恩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309
31	奏报阅边抚恤番民酌减赋役缘由	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八月四日奉旨俱悉	怀柔施恩	卫藏通志·抚恤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311
32	奏报本年度卫藏地方雨水沾足各处稞麦茂盛可期实收	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八月四日奉旨俱悉	地方情形	卫藏通志·抚恤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312
33	奏报廓尔喀王拉特纳巴都尔请求遣使进京事	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34	奏请赏给驻藏帮办大臣和宁翎子	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人才	一史馆满文奏折
35	敕谕八世达赖喇嘛为即禅位着照驻藏大臣指示行事并赏物品	乾隆六十年五月	确立制度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36	敕谕七世班禅喇嘛为即禅位着心习经并赏物品	乾隆六十年五月	确立制度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37	奏报唐古忒番民击毙廓尔喀商民申明正法事	乾隆六十年六月一日奉上谕	司法	寄信上谕档 ⁵
38	遵旨奏明廓尔喀王遣使人觐事	乾隆六十年六月十一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39	奏报八世达赖七世班禅谢赏布达拉札什伦布众喇嘛银两	乾隆六十年六月十一日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40	奏报廓尔喀王所遣贡使抵藏后即行赴京师等情	乾隆六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编号	松筠奏折题要	具奏或朱批时间	具奏内容	出处
41	奏报给赴藏熬茶蒙古颁发路票后藏达赖班禅所得布施有增无减	乾隆六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徠远	一史馆满文奏折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290
42	奏报设金瓶掣签后无人敬信拉穆吹忠并八世达赖印匣钥匙酌情保管情形	乾隆六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43	奏报查明西藏大小活佛转世概入金瓶掣签定人私令吹忠作法等情形	乾隆六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确立制度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138
44	奏为聂拉木沿边一带番民贫苦自应轻其赋税	乾隆六十年六月	确立制度	传包·事迹清册
45	奏为巡边抚恤番民	乾隆六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抚恤	传包·事迹清册
46	奏报遵旨稽查钦定颁发路票后达赖喇嘛等所得布施情形	乾隆六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确立制度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290
47	奏报廓尔喀使臣进入西藏地界等情	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二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48	奏谢赏锭子药	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二日	君臣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49	奏销岁赏驻藏绿营兵唐古特兵及达木蒙古三十九族番人银数	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二日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50	户部查驻藏大臣领养廉银口粮及岁赏达木蒙古等银两支給情形覆军机处	乾隆六十年八月	报销	一史馆满文奏折
51	奏销乾隆五十九年所用奖赏兵丁等银两数目折	乾隆六十年八月二十一朱批日期	报销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231
52	奏报廓尔喀贡使到藏起程	乾隆六十年九月十二奉谕	涉外关系	传包·事迹清册 寄信上谕档

编号	松筠奏折题要	具奏或朱批时间	具奏内容	出处
53	奏奉旨谢恩	乾隆六十年十月二日	君臣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54	奏奉旨将廓尔喀所贡大象分赏八世达赖七世班禅	乾隆六十年十月十三日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55	奏报自颁旨更定达赖喇嘛印信使用章程后已无弊端情形	乾隆六十年十月十三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56	奏报奉八世达赖七世班禅叩谢赏赐	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六日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57	奏报八世达赖七世班禅恭贺生擒苗民首领吴半生	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58	奏报八世达赖七世班禅庆贺立皇太子	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59	西藏应选送京雍和宫喇嘛数目致八世达赖喇嘛呈	乾隆朝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60	奏报廓尔喀王派员到藏恭贺平定湖南滋事苗民表	嘉庆元年正月九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61	敕谕赏赐七世班禅	嘉庆元年正月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62	敕谕赏赐八世达赖	嘉庆元年正月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63	员外郎忠齐护送廓尔喀贡使赴藏事致军机处呈	嘉庆元年二月二十九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64	奏报将廓尔喀王所贡物品送京	嘉庆元年四月十一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65	奏报派员资送回赏廓尔喀王物品	嘉庆元年四月十一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66	奏谢赏福字荷包等物	嘉庆元年四月十一日	君臣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67	奏报将廓尔喀王叔巴都尔萨野派员来藏请求陛见	嘉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编号	松筠奏折题要	具奏或朱批时间	具奏内容	出处
68	奏报班禅派年班堪布等自藏起程	嘉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69	谕达赖班禅照旧进献丹书克	嘉庆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70	奏报将廓尔喀公巴都尔萨野派员来藏请求陛见当经驳回等事	嘉庆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涉外关系	长编总档 ⁶
71	补放前藏代本员缺	嘉庆元年六月十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72	奏报将廓尔喀王谢赏蟒袍	嘉庆元年六月十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73	谕将如本多尔济策凌补放前藏代本	嘉庆元年七月十三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74	奏为掣定察木多帕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	嘉庆元年八月十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75	奏报觐见廓尔喀贡使经藏返回	嘉庆元年八月十八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76	奏报达赖班禅等不必加倍进献丹书克	嘉庆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77	奏谢赏药	嘉庆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君臣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78	奏谢免罪	嘉庆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君臣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79	奏报达赖班禅等谢赏皮袄等物进献佛像事致军机处呈	嘉庆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怀柔施恩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80	奏谢免罪留任	嘉庆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君臣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81	奏报达赖班禅等谢赏银两并进献佛像等物	嘉庆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怀柔施恩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编号	松筠奏折题要	具奏或朱批时间	具奏内容	出处
82	奏报济咙呼图克图谢赏匾额	嘉庆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83	奏报廓尔喀王到藏谢赏敕谕等物	嘉庆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84	奏报西藏官兵训练情形	嘉庆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军事边防	一史馆满文奏折
85	奏报廓尔喀王到藏谢赏物品致军机处呈	嘉庆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86	奏为边俸期满前藏粮员刘印全办事勤练	嘉庆元年十一月一日	人才	传包·事迹清册
87	奏为掣定察木多帕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及将达赖进献物品送京致军机处呈	嘉庆元年十一月九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88	奏为在藏贸易民人鬪毆毙命	嘉庆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司法	传包·事迹清册
89	奏为西藏钞局委员杨在韵期满	嘉庆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人才	传包·事迹清册
90	奏为达赖等代帕巴拉呼图克图谢赏佛像等物并进献物品	嘉庆元年十一月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91	奏为察木多帕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是里塘人及容貌端庄	嘉庆元年十一月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92	奏呈七世班禅谢赏玉碗缎匹等物奏书	嘉庆元年十一月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93	奏呈八世达赖谢赏玉佛等物奏书	嘉庆元年十一月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94	奏为未将青海郎汗部番人唐乌特都喇之子定为嘉木样呼图克图呼毕勒罕	嘉庆二年一月八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编号	松筠奏折题要	具奏或朱批时间	具奏内容	出处
95	奏为察木多帕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等谢赏佛像等物	嘉庆二年二月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96	敕谕赏赐七世班禅	嘉庆二年二月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97	奏报拏获行劫毙人命之夹坝盗犯申明办理	嘉庆二年三月十日	司法	长编总档
98	代奏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并僧众为认定并赏赐事谢恩折	嘉庆二年三月十日 朱批日期	怀柔施恩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141
99	奏为八世达赖照例遣使堪布囊索赴京觐见	嘉庆二年四月六日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100	奏赏荷包等物	嘉庆二年四月六日	君臣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101	奏为江西都司戴文星于军务出力操兵勤奋请留后藏效力	嘉庆二年五月六日	人才	传包·事迹清册 长编总档
102	奏代江卡噶伦敦珠布策旺等谢赏缎匹	嘉庆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103	奏将自廓尔喀逃回之四川巴旺地方番兵送回原籍	嘉庆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104	奏报赴京进象廓尔喀使臣经藏返回	嘉庆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105	奏自廓尔喀逃回之四川巴旺地方番兵陇泰口供单	嘉庆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106	奏报将布鲁克巴等部非西藏所属处晓谕廓尔喀使臣	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107	奏报廓尔喀王派员来藏进贡方物并回赏等情	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108	奏报廓尔喀王派员到藏请安并声称其叔父病故等情	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109	奏谢赏定子药	嘉庆二年闰六月二十六日	君臣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编号	松筠奏折题要	具奏或朱批时间	具奏内容	出处
110	奏为察木多帕巴拉呼图克图呼坐床并代其谢恩	嘉庆二年闰六月二十六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111	奏为奉旨申饬谢恩	嘉庆二年八月三日	君臣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112	奏报后藏官兵训练情形	嘉庆二年八月三日	军事边防	
113	奏为掣定嘉木样呼图克图呼毕勒罕	嘉庆二年八月三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114	奏为代七世班禅谢赏及进献佛像	嘉庆二年十月十五日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115	奏报巡查后藏边境地方及江孜等处绿营官兵训练情形	嘉庆二年十月十五日	边防军事	一史馆满文奏折
116	奏报廓尔喀王禀称与邻邦和睦相处以报皇恩等情	嘉庆二年十月十五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117	奏为七世班禅请师父(附单)	嘉庆二年十月十五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118	奏请补放巴克硕特等寺札萨克喇嘛	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119	奏为复掣定西宁嘉木样呼图克图呼毕勒罕	嘉庆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120	奏报前藏官兵训练情形	嘉庆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朱批日期	边防军事	一史馆满文奏折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231
121	奏为七世班禅叩谢赏其经师诺门罕名号	嘉庆三年二月十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122	奏为济咙呼图克图叩谢补放巴克硕特等寺札萨克喇嘛	嘉庆三年二月十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123	奏报理应巡查后藏定结喀达一带地方边界关口等情	嘉庆三年三月十二日	边防军事	一史馆满文奏折
124	奏谢赏福字荷包	嘉庆三年三月十二日	君臣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编号	松筠奏折题要	具奏或朱批时间	具奏内容	出处
125	奏为请简放第穆呼图克图叩所 属寺院札萨克喇嘛	嘉庆三年三月十二日	确立制度	一史馆满文奏折
126	奏报前往巡查后藏定结喀达一 带隘口酌情绘制全图事	嘉庆三年四月十五日朱批日期	边防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232
127	奏七世班禅派年堪布进京献丹 书克	嘉庆三年四月十九日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128	奏报赴后藏西南地方巡边日期	嘉庆三年四月十九日	边防	一史馆满文奏折
129	奏报驻防守备冉玉畴擧获凶犯 请奖励	嘉庆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人才	一史馆满文奏折
130	奏报查看后藏西南边界及驻防 绿营唐古特官兵技艺等情	嘉庆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边防军事	一史馆满文奏折
131	奏报廓尔喀王感谢征办抢劫其 商人之唐古特人情形	嘉庆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内政:司法	一史馆满文奏折
132	奏报巡查后藏定结喀达边隘重 修鄂博操练兵丁等情形	嘉庆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朱批日期	边防军事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232
133	奏报查看卫藏绿营唐古特官兵 操演等情	嘉庆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边防军事	一史馆满文奏折
134	奏报廓尔喀王献给七世班禅哈 达并照例赠物品情形	嘉庆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135	奏报廓尔喀王送给七世班禅大 小两象	嘉庆三年	涉外关系	传包·事迹清册
136	奏报八世达赖七世班禅接奉敕 谕佛像等物谢恩情形	嘉庆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怀柔施恩	一史馆满文奏折
137	奏报派往西藏学习唐古特文学 生抵达并选师教习情形致军机 处呈	嘉庆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138	奏报察木多粮员三年期满	嘉庆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人才	传包·事迹清册

编号	松筠奏折题要	具奏或朱批时间	具奏内容	出处
139	奏报前往后藏巡边练兵所须自备银两不敷咨请户部准借事致大学士呈(附咨呈户部文稿)	嘉庆三年十月十九日	边防军事	一史馆满文奏折
140	奏报喀尔喀郡王派子赴藏念经并达赖班禅等谢恩	嘉庆三年十月十九日	涉外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141	奏报达赖班禅进献丹书克庆贺太上皇万寿	嘉庆三年十月十九日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142	奏报八世达赖喇嘛等为太上皇九十寿辰请派堪布祝寿折	嘉庆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地方与中央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1727
143	奏报八世达赖喇嘛等为各寺众僧普得布施银两议恩寿折	嘉庆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地方与中央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291
144	奏七世班禅请安进献哈达及佛像等物	嘉庆三年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145	奏七世班禅献物清单	嘉庆三年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146	谕回京接户部尚书英善赴藏办事	嘉庆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离任回京	一史馆满文奏折
147	奏请准一人进京叩谒太上皇梓宫	嘉庆四年二月十五日	君臣关系	一史馆满文奏折
148	奏太上皇驾崩八世达赖等进献哈达佛像并在大小昭念经(附达赖呈)	嘉庆四年二月十五日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149	奏太上皇驾崩七世班禅等进献哈达佛像并率众喇嘛念经(附班禅呈及清单)	嘉庆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地方与中央	一史馆满文奏折
150	奏报八世达赖喇嘛为乾隆帝念经熬茶情事	嘉庆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地方与中央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1727
151	奏请停止摊扣廓尔喀军需	嘉庆四年五月二日奉上谕		上谕档 ⁷

编号	松筠奏折题要	具奏或朱批时间	具奏内容	出处
152	遵旨复奏在驻藏大臣任内与达赖喇嘛相见仪注	嘉庆十九年闰二月二十七日	建立制度	元以来藏案汇编 页 2219

案：松筠留下的奏折、提本十分丰富，笔者曾检索

(1)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内阁大库档》（<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sncmeta.htm>，检索日期 2006 年 7 月 28 日）松筠档案共 543 笔，以松筠为具奏人者 231 笔；

(2) 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http://npmhost.npm.gov.tw/tts/npmmeta/metamain.htm>，检索日期 2006 年 7 月 28 日）松筠档案共 329 笔；

唯上列这两项档案资料，时间均在嘉、道间，与松筠驻藏事务无关。

再者，松筠驻藏所上奏折多为满文，其译文多已收录在《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本文征引的部份满文奏折，是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件译出；笔者深信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奏折录副”、“译汉月折”等档案中仍有松筠驻藏奏折，因无目录无从查考；又笔者查阅过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印之《乾隆朝·上谕档》、《乾隆朝·朱批奏折》等。

〔注 释〕

- 1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 2 清国史馆《松筠传包》（档案编号 702003405），事迹清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份》，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 年出版。
- 4 《卫藏通志》，光绪丙申用写本刊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5 《寄信上谕档》，档案编号 60400004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6 《长编总档》清国史馆编，档案编号 22800022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7 《上谕档》，档案编号 60100006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满洲将军福康安： 1792 至 1793 年西藏政务改革的先驱¹

谷岚(Fabienne Jagou) 著
吴旻 译

福康安(?—1796),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战功卓著,名噪一时,时人多有传记传世。乾隆(1736—1796 年在位)有颇为自诩的“十全武功”,曾专门著文以纪其事,而在这著名的十大边疆战役中,福康安就参与了其中的三次。福康安以骁勇善战、“用兵如神”² 和善用谋臣著称³。但同时他也以肆无忌惮闻名于世,并且一般人都认为他政绩平庸⁴。他一生中参与的最后一次战役,即 1792 年第二次廓尔喀之战,从这次战役的起因的背景研究到参与这次战役的藏人以及福康安在这场战役中的作用,都曾引起很大争议⁵。

尽管这次战役作为乾隆“十全武功”的最后一役,尽管在拉萨特地立碑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⁶,尽管廓尔喀从此向清廷纳贡⁷ 并重新勘定边界,但真正为这场战役画上句号的却是《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拟定和颁布。

在廓尔喀一事中,福康安先是作为军事将领后是作为行政管理官员:满洲官员长期驻扎西藏并且担任封疆大吏,这是极不寻常的事,特别是福康安只是以其军事才能著称。乾隆选中福康安担任此职显然不是看中了他的勇敢,而是考虑到其他的因素,我们试图在此作一探索。《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是改革了西藏政治宗教组织的重要文件,我们也试图研究在它的撰写中福康安究竟有哪些作用和影响。

福康安

从名人传记中看到的福康安形象简直是完美的。他有高贵的出身,有卓越的战功,节节高升的仕途也无愧于他的赫赫功绩。

家世背景

从我们现有的传记数据中,根本无从了解福康安其人。事实上,关于他的个人情况很简单,而且基本千篇一律:

福康安(满文:Fuk'anggan)⁸,字瑶林,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恒第三子也。富察氏自哈什屯以来,世有勋绩,及福康安以孝贤纯皇后之侄补侍卫。⁹

富察氏至福康安已是第五世,似乎这个家族里的名人都是从侍卫开始他们的仕途¹⁰。福康安的显赫家世如果不是像上面写得那样简略,就是像下面这样突出重点:

福康安,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曾祖米思翰,户部尚书;祖李荣保,察哈尔总管,俱追封一等公。父傅恒,保和殿大学士、一等忠勇公,追赠郡王爵衔。¹¹

1736年,当福康安的一位亲姑母嫁给清高宗乾隆皇帝,成为日后的孝贤纯皇后之后,这个家族地位就愈加显赫。

富察氏家族成员因此都有了封爵,而其中最高的就是福康安的“贝子”衔。罗友枝(Evelyn Rawski)指出有清一代他是爱新觉罗氏以外唯一拥有这一爵位的满洲贵族¹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逐渐老去的皇帝对他的特殊眷顾,因为传说他是乾隆帝的私生子;或者可以看作是皇帝对他打的那几个漂亮仗的合理褒奖。

我们对福康安的儿子德林了解甚少,只知道他是副都统,承袭了爵位¹³。同样我们对福康安的妻子也了解得很少,只知道她是阿颜觉罗氏,总督明公山之女。她看来性格坚强而且参与了有关边疆问题文档的整理(这在当时是十分令人惊异的,因为女子不可能为官)。她陪伴在福康安身边二十余年,去世之时福康安已经故去十余年了¹⁴。

卓著战功

福康安的仕途在他被任命负责击退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早在第一次金川之役(1776),福康安随同阿奎(1717—1797)作战,其勇敢与善于用兵便为人所知。之后由于英勇善战,他多次被派往前线,其中包括跟随阿奎在甘肃平定回回叛乱(1784)。他又相继平定台湾(1787),在西藏击退廓尔喀人(1792),在这几次战役中,海兰察都作为他的参军。福康安还曾历任云贵总督(1780—1781;1794—1795)、四川总督(1781—1783;1793—1794)、陕甘总督(1784—1788)、闽浙总督(1788—1789;1795)、两广总督(1789—1793)。但仅仅关于他的赫赫战功,特别是他在击退廓尔喀人一役中使用的谋略已经被人大书特书。

与尼泊尔廓尔喀人进行的两次战争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第一次(1788)的原因是西藏向尼泊尔政权提出反控,因为在尼泊尔铸造的西藏钱币的含银量越来越低;而第二次(1791—1792)¹⁵的原因则是西藏拒绝向尼泊尔交纳他们1788年同意交纳的第二次赎金,以及班禅家族的一个成员的过度荒淫。正是在两次战争的时空背景之下,福康安临危受命,在第二次战争之时重建西藏的秩序。

对于乾隆皇帝而言,由满洲将军、扎什伦布和萨迦两寺喇嘛取得的第一次战争和约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损害了清军强大的威名。从一开始,廓尔喀人向聂拉木、济咙和绒辖地区的进攻(1788),以及如何保护当时年仅6岁的班禅(1782—1853)都使得皇帝十分担忧,乾隆已随时准备派兵介入¹⁶。因此,当得知尼泊尔军队侵入西藏内地,且驻藏大臣雅满泰(副大臣:1786—1788;1790—1791)十分无能之后,他立刻命令鄂辉(大臣:1791—1792)和成德(大臣:1792—1793)指挥的绿营以及驻扎在四川的藏军向前挺进¹⁷,而驻藏副大臣庆林(副大臣:1783—1788)则接到命令优先保护班禅本人¹⁸。当廓尔喀军队撤退之后,扎什伦布寺的总管宗巴胡图克图和萨迦胡图克图开始着手与尼泊尔人媾和,这样不仅抢在了乾隆的钦差鄂辉和成德的前面¹⁹,而且“自必因官兵将到,借此声势,以为慑服之计”²⁰。乾隆拒绝承认叛军的退却完全归功于由西藏高僧开始的谈判,坚持认为尼泊尔军队宣布投降是因为清军的到来。为此,他还特地褒奖了成

德、鄂辉和新任驻藏大臣巴忠的忠勇²¹。

然而,乾隆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廓尔喀人并没有被完全压服。过后还不到三年时间,他们又开始威胁西藏边境。尽管遇到在上一场战争之后驻扎在当地的西藏驻军的抵抗,廓尔喀人还是占领了聂拉木、定日和济咙。这一次,廓尔喀军队不仅人数多(3,000至4,000人),而且推进速度快。保泰(大臣:1790—1791)将七世班禅喇嘛安全安置在拉萨八世达赖喇嘛(1758—1804)身边。²²叛军占领了萨迦,到达日喀则地区并且抢劫了扎什伦布寺(班禅喇嘛的驻锡地),当时有300名绿营官兵护卫该寺²³,然后向尼泊尔方向撤退²⁴。与此同时,集结在四川的清军向卫藏进军²⁵,乾隆皇帝还嫌他们速度太慢。由于皇帝担心上述这样的事件还会再度发生,因此他决定派一支一万人的军队镇压廓尔喀人。这一次清军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乾隆任命福康安消灭无理驻扎在定日(或者济咙²⁶)的叛军,并且命其负责西藏军政事务²⁷。在前辈学者已经充分研究利用的魏源(1794—1857)的《圣武纪》中²⁸,提到福康安的军队消灭了叛军,一直打到加德满都附近。只是由于乾隆无意扩张他的版图,清军才重新回到西藏境内。

然而根据档案记载,似乎福康安被委派过去的时候已经相当晚了,当时廓尔喀人已经退到西藏边境之外。H. Richardson 已经在他的 *Ch'ing dynasty Inscriptions at Lhasa*(拉萨的清代碑文)²⁹一书中提出过这一问题,即廓尔喀人在劫掠过扎什伦布寺之后立刻撤退,是否还有必要派遣清军入藏,因为事实上福康安到达西藏之时已是在这次劫掠之后了。福康安被任命之后,他的军队直到1791年11月27日还迟迟没有动身,而这时廓尔喀人已于10月4日放弃进攻卫藏区并退守尼泊尔边境。显然清军应该等待冰雪消融之时才向西藏西南部进军,而这时廓尔喀军队可能也在等待雪融之时伺机再度进军西藏。开春以后,福康安向廓尔喀人提出重修沙马尔巴,这被认为是第二次战争的原因,并且归还扎什伦布寺的寺产³⁰。叛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战火重燃。在中文档案和传记数据中都对这些小型战斗描述得很详细。乾隆为此写了纪念的诗文并且为每一首诗都配了画³¹。福康安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和指挥若定的能力被充分肯定。而这些占领战略点的战斗清军实际上赢得很轻松,因为根据数据记载,清军的人数在70,000到113,000人之间³²。

在这次胜仗之后，与他以前平定大小金川（1773—1776）、甘肃回部之乱（1784）、台湾（1787）和苗部（1795—1796）一样，福康安受到嘉奖。在击退廓尔喀人之后，福康安在平定台湾天地会起义时获得的嘉勇公封号中又增加了“忠锐”头衔³³。在乾隆撰写的用以自诩兵强马壮³⁴、赫赫武功的《十全记》中也提及他的大名并大加赞扬。

而看来对于当时已经八十高龄的乾隆皇帝来说，表现帝国军队的强大远比已经入不敷出的国家财政重要，其中尤以他在位期间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为代表。当然，比起前面几次战争耗费国库的情况，廓尔喀之战的代价已经不算昂贵了³⁵。即便这样，部队的给养问题曾被多次提出，而在第一次廓尔喀之战（在这场战争里，清军得到西藏方面的许多馈赠³⁶）结束之后，鄂辉还针对战士的补给、驻藏清军的组织和驻藏大臣的权力撰写了专门章程³⁷。在第二次廓尔喀之战中，福康安的大军到来之前，将军们已经购买了可以足够供应万人军队的粮草³⁸。八世达赖本人为了感谢清朝皇帝为他派来了数以千计的士兵，打开了金库大门为这支军队提供补给，并且允许清军使用西藏的资源 and 劳役制度³⁹。

然而，在任命福康安处理西藏军政大事之时，乾隆并未在卫藏区设立满洲行政系统。由于无力将官僚系统扩展到边缘地带⁴⁰，皇帝还是决定派一个既可以击退廓尔喀入侵，又可以重新组织西藏地方事务的人前去。

封疆大吏

为什么乾隆认定福康安有能力重组西藏事务呢？原因还不是很清楚；正如恒慕义（Arthur W. Hummel）指出的那样，作为封疆大吏的福康安，其放荡和贪腐之名仅次于臭名昭著的和珅（1750—1799）⁴¹。福康安特别欣赏西藏文化？还是乾隆认为他比在此期间任命的众多驻藏大臣（ambans⁴²）都要称职？

了解西藏之人

事实上福康安此前已经多次接触过藏区。

他曾经在西藏康区的金川作战。福康安和阿桂（1717—1797）曾在第二次金川之战中指挥部队（第一次金川之战是在 1747 年至 1749 年之间）。这场战争

旷日持久(从1771至1776年持续5年之久),军耗无算(花费了5,300万两白银之多)⁴³。然而福康安却从这场战争中获益匪浅,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并被封为三等嘉勇男。

乾隆曾特地将六世班禅(1738—1780)在1780年经北京时送给他的礼物,一个西藏右转法螺,转赐福康安作为他远涉台湾海峡(1787)的护身符。之后福康安非常小心地又将之带回并归还国库⁴⁴。

另外,镶黄旗富察氏此前也已经有人在西藏任职。如1727年马喇(1673—1735)曾任西藏“骠骑将军”⁴⁵;傅清(?—1750),李荣保的次子,福康安的伯父,曾在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里任副都统(1745),驻藏章京笔帖式(1746)。在他与同僚一起杀了当时监国的 Gyur med rnam rgyal 之后,衙门遭到藏人的攻击,在这次攻击中傅清自尽⁴⁶。福康安让人修复了为纪念傅清在衙门废墟上修建的祠堂并刻碑⁴⁷。1781至1785之间,傅清额曾任驻藏副大臣,并曾受命护送在北京去世的六世班禅遗骨返回扎什伦布寺⁴⁸。

福康安抵藏时清廷在西藏的行政体系

在拉萨,福康安还没有开战,他的到来已经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人们把他视为可以“避免西藏流血”的人⁴⁹。当时还遵行了一些礼仪:如达赖喇嘛未让福康安行叩拜礼,因为福康安是位大将军并且也代表“圣鉴”;在庆祝藏历新年时,达赖为他设置的座位只比自己的低一点。只有在私下里,达赖才让福康安行叩头礼⁵⁰。

福康安在去往尼泊尔边境开战之前驻扎拉萨之时,已经开始奠定他作为封疆大吏工作的基础。当时因为西藏民众受到天灾与天花肆虐的威胁,福康安借此机会留在拉萨观察西藏政府的行政运作。西藏摄政是 *bsTan pa'i mgon po kun bde gling* (1789—1810),由他辅助八世达赖喇嘛执政,而后者尽管已经年过三十,但还是不愿独立管理西藏政务⁵¹。实际上是他的各位大臣们在作决策,管理国家。在西藏的领主家族里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并不罕见,这里也包括达赖喇嘛的家族,而在高官里面也是如此。

作为外交官员,福康安对佛教僧侣表现出了很大的尊重。他参拜佛寺,为僧

侣布施,被视为一位好施主⁵²。他曾经多次见到八世达赖喇嘛。他请求达赖喇嘛为他的母亲诵经求长寿,并为达赖喇嘛本人念了7天的百度母经⁵³。他也为他的士兵祈福,为他们求得每人一尊小佛像,保佑他们在战争中不受伤害⁵⁴。

这个从八世达赖喇嘛的传记中流传下来的中原与西藏关系的优美记载却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大相径庭。*T. W. Shakabpa* 指出,正是在福康安驻拉萨期间,出现了一些告示要求福康安的部队离开,并且反对驻藏办事大臣干涉西藏的行政事务,尤其是在解决与廓尔喀人冲突的方式之上⁵⁵。

从尼泊尔人第一次入侵(1788)到福康安撤出拉萨(1793),相继任命了9位驻藏行政大臣和6位副大臣,这反映出了制度上的问题,并且可能这也是为何福康安被任命作驻藏大臣,为何他在西藏进行行政改革的原因之一⁵⁶。

首先人们指责驻藏大臣采取的决策不够深思熟虑,使得局势难以收拾。福康安刚刚到达拉萨,就去向八世达赖喇嘛道贺,因为达赖喇嘛没有听从保泰的建议从卫藏区腹地撤到青海⁵⁷。乾隆已经申斥过保泰,因为他决定让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都撤到青海的主意使得人心惶惶,藏人都收拾细软准备离开拉萨⁵⁸。在占卜得到廓尔喀人不会占领拉萨的启示之后,八世达赖喇嘛决定留在拉萨,这才将民心安抚下来。事实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后来一直留在布达拉宫,而廓尔喀人则驻扎在西藏的西南边境。保泰和雅满泰则被撤职:根据 *Shakabpa* 的看法,是为了平息由于清廷势力出现在拉萨而引起的骚乱状况;而根据中文材料记载,则是由于他们不善应对局势⁵⁹。军机处因此决定任命福康安全权处理西藏的军政事务⁶⁰。

继而在处理第一次廓尔喀之战时驻藏大臣的无能也被揭露出来。福康安立刻开始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的原因和过程。福康安首先开始弹劾巴忠、鄂辉和成德,他们都曾经因为第一次廓尔喀战争而受到皇帝的嘉奖。然后,福康安认定巴忠要为与廓尔喀人签订的和约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懂得藏语,可以和代表拉萨政府与廓尔喀人谈判的西藏大臣多仁班智达(1760—?)直接对话,而另外两位代表则对巴忠言听计从。福康安甚至还攻击巴忠,说他曾给那位藏族大臣施压,以便尽快结束这场争斗⁶¹。巴忠因此自尽。

无论巴忠、保泰或是雅满泰,都是突然置身于一场尼泊尔、西藏和锡金的国际纷争当中,然而他们的职位和经验却不足以走出困境。他们的职权定义不是很明确,并且他们“管理藏区事务”的职权也十分笼统,缺乏准确性。这些驻藏

大臣都不具有与另一国谈判应有的能力。他们的身份仅仅是作为观察员,并以这个身份向皇帝报告西藏的情况。并且他们也要取得藏人同意才有机会干预藏人的内政。对于第一批驻藏大臣的情况,他们为何被任命以及这个职位在他们的仕途上有何重要性,我们知之甚少;而且,对于他们的从政经验我们也了解得不多。

事实上在起草西藏善后章程之前,福康安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与驻藏大臣的职能有关。他承认西藏官员大臣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治理西藏,而八世达赖喇嘛由于对世俗权力不感兴趣,因此这一情况已是既成事实。他建议八世达赖与满洲驻藏大臣一同管理西藏事务,并且达赖喇嘛负责以快件形式向皇帝报告官员及特派员的不良行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福康安在可能的驻藏大臣人选中指定了舒濂(副大臣:1791—1792),因他“办事精细,熟悉番情”,但是他一到西藏就去世了;同时他也举荐已经任过此职的奎林(大臣:1791):后者还在四川担任将军之时,就为起草条约与鄂辉(大臣:1791—1792)一起驻留西藏。对于奎林必较有利的是,他有着与福康安一起重建台湾的经验;但也有对他不利的一面,那就是他不是佛教徒。最后,福康安临时指定额尔登保(1748—1805)和原任的鄂辉为驻藏大臣⁶²。福康安对额尔登保并非一无所知。在大小金川之战、平甘肃回部和平台湾之战中,他俩都曾并肩作战。但是最终由于鄂辉“懦弱”,而成德“粗率”,一向公认“细心”的和琳(1753—1796)与鄂辉一起被任命为驻藏大臣⁶³。

在选中和琳作为驻藏大臣之时,乾隆已经改变了对于管理西藏事务的态度。和琳的任命表明他希望驻藏大臣不再仅仅是“谨饬”的“中才”,而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⁶⁴。这种意愿也体现在1792年7、8月开始起草,1793年4、5月完成的《西藏善后章程》的开篇之上。

和琳属正红旗钮钴禄氏,也非默默无闻之辈。他的仕途从任职工部开始,继任杭州织造并任御史。在被任命为驻藏大臣之前,他任兵部侍郎兼汉军正蓝旗副都统⁶⁵。同时他也是乾隆宠臣、首席军机大臣和珅的弟弟。事实上,准备起草西藏善后章程的官吏中,除了负责补给的惠龄之外,如福康安、孙士毅(1720—1796),再加上和琳,都与和珅有一定的关系。福康安在平定甘肃回部的前线曾经接替和珅之职,而自从乾隆将和珅从原属的正红旗抬入上三旗之后,和珅与福

康安便同属镶黄旗。孙士毅也是和珅集团一员,而根据恒慕义的研究,如果没有首席军机大臣的庇护,他不可能如此飞黄腾达⁶⁶。在 1789 年平安南之战时,他曾与福康安并肩作战;在 1792 年的战斗中,他与惠龄一起负责为福康安的大军提供军需。而惠龄也曾在河南与和珅一同任职。从这些官员的高级别以及他们与和珅这个帝国实际的掌权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来看,都显示了中央政府意欲重新掌控西藏政事。

尽管日后都将藏内善后章程的制订主要归功于福康安,但是我们也应该提到所有参与合作的官员,即福康安、孙士毅、惠龄与和珅⁶⁷。

章程的草拟

虽然很难界定他们每一位在其中的作用,但是我们却不能怀疑每一位主角对于西藏的认识。福康安在西藏的一年中,跑遍了卫藏区,数次到西藏、尼泊尔边境(甚至去到加德满都附近)。为了充分利用达赖喇嘛答应可供使用的西藏劳役制度,保证驻藏清军的给养,孙士毅与和珅也曾多次巡视藏区。此外,西藏善后章程的基本材料也显示出其对西藏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强弱的真正认识。

不仅基于以上经验,章程的制定者还借鉴了 1789 年第一次廓尔喀战争之后鄂辉所制定的章程,并且该章程在当时还经首席军机大臣和珅的修正。在鄂辉提出的 19 条措施中,有 8 条涉及军队,5 条涉及驻藏大臣的职能,4 条有关与尼泊尔的贸易,1 条有关西藏和清廷的保护制度,还有 1 条有关西藏官员任用⁶⁸。福康安自己承认在草拟新的章程的时候曾经参考了前一份章程⁶⁹。福康安的章程则有 18 个条款,其中 3 条关于保卫边疆,8 条针对反腐败,2 条有关僧侣的管理,1 条有关税收,最后 2 条则有关驻藏大臣的职能,而上述这一切都将在驻藏大臣的监管之下。这两份文档的草拟中也将廓尔喀人两次入侵的诸多原因考虑在内。例如针对第一次战争,强调军事威胁和贸易问题,而对于第二次,则主要突出反对腐败和加强僧侣控制,并把这一切置于驻藏大臣的严密监管之下。

这些 19 条或是 18 条的草稿之后,只有一个有着 29 条款的正式文本,并且是用藏文写的。

最后文本

最近出版的藏文文献《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以其带有多重意义而引起学者的关注⁷⁰。

这一文献对于理解清廷和西藏的关系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种关系日后发展为今天的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控制。事实上,在这份文献里,将处理西藏内政的大权,以及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内的对大小活佛的转世灵童的选择,都掌控在驻藏大臣,亦即皇帝本人的手中了。因此,如果单独地去阅读它,很有可能就会将之视为唯一的文献表明清廷对于西藏政务的控制,或者按照目前中国政府的话来说,就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而,由于这份文献的独一性,我们有必要对它的合法性置疑:这是一份由满清官员拟写的文档,但是它唯一的存世版本却是藏文的。这种不合理性引起了研究中国历史和西藏历史的学者的关注。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对这份文献的撰写,它在档案中以及在近代西藏历史背景下的时效性及其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⁷¹。我们可以指责福康安行政管理能力的不足,指责他倾向于用武力解决争端,而武力也是这场事件的起因。然而福康安却没有匆匆离开拉萨。直到越南国王阮光平(1752—1793)⁷²去世之后安南可能会发生动乱,急需福康安远赴广西处理之时,他才向皇帝上本奏报他要离去⁷³。福康安离开拉萨之后,和琳就全权负责起西藏事务。应该是对文档最后定稿,但事情显然不是如此。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份在和琳的善意之下以藏文形式撰写的文档,只是针对藏人的。这份文献不同寻常的形式,以及缺少中文文本这一事实,都使它看起来更像是对福康安从拉萨发回的条款再经军机处审阅后的一个文档的综合。

文件的真实性

目前找到的两个藏文版本一份藏于拉萨的政府档案之中,另一份则藏于驻藏大臣的衙门之中,这看起来确也合于情理。然而至今还未找到该档的中文版本。

廖祖桂曾提及这两个藏文版本。其中的一种交给达赖喇嘛及其辅臣,以防另一份有丢失之虞。这也是流传于卫藏区的版本,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它是如何

种形式流传⁷⁴。1950 年曾找到一份文档集,它就在其中,并且被分藏于两处。一部分藏于拉萨的大昭寺,另一部分则藏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另一个藏文版本的文档则在《西藏历史档案汇编》中影印出版,是告示的形式,原文刻写在拉萨的石碑上,之后以纸本拓印,并流传至卫藏区⁷⁵。该文件是 1811 年在驻藏大臣衙门中发现的。

由于这一版本是告示的形式,因此该藏文文本没有标题。我们推测在文档的两份附页之一末尾的藏文标题是后加的,也就是 1811 年在拉萨的衙门之中找到它们的时候加上的⁷⁶。我们亦不能以之后汉文翻译的标题为准(相继有 1950、1953、1993 和 1995 的翻译⁷⁷),因为还没有找到任何其他档案来加以证实。

驻藏大臣的大印似乎可以证明这份藏文原始文献的真实性,但是如廖祖桂所言,在衙门的档案中找到这份盖有大印的文档这一事实本身就很值得讨论⁷⁸。因为如果这份文档盖有驻藏大臣的官印,它应该在西藏政府的档案里而不是在驻藏大臣的衙门里⁷⁹。副本上是不应该盖有大印的。我们可以推测由当时的驻藏大臣于 1811 年找到的这份文档实际上是一个副本,而盖有官印和带有标题(公告本身是没有的)的两张附页是 1811 年由驻藏大臣加上的⁸⁰。

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份文档究竟最初是用哪种文字撰写的,清廷驻藏的官员与当地藏人交流用的是哪种语言,而清廷驻藏官员与北京朝廷官员之间的书函又是使用的哪种语言?

我们目前并不清楚在选择驻藏官员的条件里是否有懂得藏语一条,也不清楚这些官员到达拉萨之后是否会学习当地语言。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福康安认为,巴忠做出不智的决策就应该归咎于他通藏语,至少这是其中部分原因。福康安本人不会说藏语,他会见达赖喇嘛之时都有通译随行⁸¹。尽管有时有孙士毅陪同前往布达拉宫,似乎只有福康安一人直接与达赖喇嘛会面。目前档案中没有任何材料可以告知我们孙士毅⁸²、惠龄、和琳等人的藏语水平究竟如何,但我们知道鄂辉是能够对藏文文档作书面翻译的⁸³。

此外,由于目前留存大量汉文档案,人们习惯地认为当时清廷驻藏官员与朝廷联络之时使用汉文。例如尼泊尔的来函都被翻译成了汉文⁸⁴。但是一些文献之尾的附注文字却向人们揭示大部分文档是用满文而非汉文所写。例如在孙士

毅的一份奏折中,他声明由于和琳与鄂辉到藏区巡视,因此这封奏折未能像平时有关藏区事务的奏折那样用满文撰写⁸⁵。有时候上谕也会被翻译成蒙文⁸⁶。并且从整体上来说,有清一代,较为重要的文件都是满、蒙、汉、藏四种文字书写的。如果我们放弃这份文档只是针对藏人所写这一假设,那么很可能它还应该有满文和蒙文的版本。

措施或是规章?

原版的汉文或是满文文献的这一缺失,它只是为藏人所写这一假设,以及它更多的是一套措施而并非一种章程这一事实,都可以在有关福康安的材料以及时代较晚的汉文史料中提到的该文献的组织形式中得到证实。

福康安承认曾经参考过 1789 年鄂辉提出的措施并对其加以改进。目前历史学家并不了解鄂辉提出的各项建议,但这两套措施似乎先后经过了同样的程序⁸⁷。鄂辉和福康安先后向军机处提出了一些有关西藏政务改革的建议,当中相隔三年。然后他们又分别收到了当时一位军机大臣的批语,前有和珅,后有阿桂。但是这两套措施都就此搁置下来,都未能最终取得带有“钦定”字样的汉文或是满文最终定本。

尽管福康安最后的奏议称之为“善后章程十八条”⁸⁸,并且福康安的传记之中都将“奏藏内善后十八事”⁸⁹归于他的名下,但是在汉文历史著作中这份文献仍有许多其他不同的形式⁹⁰。如在《卫藏通志》之中,就有一份“钦定章程几大臣议奏”⁹¹,内有 102 款条例,其中福康安的奏议都被划归在相应的条例之下;而《圣武记》则将福康安的奏议做了总结,只收录了其中最为重要的条款(如驻军,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权力均等,任命西藏政务官等)⁹²;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则有“西藏设驻扎大臣”一条,下收 20 款条例⁹³。

最后,还有一点足以说明该档是清廷对西藏政策的措施汇总,并且专门为藏人撰写的。在福康安最后的奏议之上,章程草拟者又增加了藏蒙大小活佛转世的条款。这一来自于福康安最初奏议的条款曾被列于藏文文献的头条位置,但不久之后又被摒弃,成为另文论述的主题:《喇嘛说》。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乾隆在讲述了一些混乱状况之后,重申他对于格鲁巴教派的支持——这也是达赖和班禅所属的教派,并确立了金瓶掣签的制度⁹⁴。目前这份《喇嘛说》的藏文版文稿和刊印本均未在西藏找到过。

结 语

两次廓尔喀之战,以及在西藏设立政务新章的意愿,使得清廷对于西藏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在此期间两地的奏章议覆往来十分频繁,数量非常可观,使得我们可以对 18 世纪末清廷对于西藏决策的每一位参与者所起的作用进行评估。福康安可说是其中关键的一位,是他向朝廷通报了西藏社会的混乱状况并且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和建议。在京的军机大臣,先是和珅,后有阿桂,将这些建议修改并接受下来。然而这种新的政策肯定不是光靠几位高官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可能对西藏的政事产生影响的那些军机大臣身边的谋臣。

〔注 释〕

- 1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文文献来写的。
- 2 《清史臣工传》,七篇,页 67。
- 3 阿桂(1717—1797)在金川一役中曾与他并肩作战,而海兰察(?—1793)在打败廓尔喀战役中作为他的谋臣。
- 4 A. W. Hummel, pp. 253—255.
- 5 H. E. Richardson, pp. 27—39; L. Boulnois; Li Ruohong.
- 6 H. E. Richardson, pp. 39—47. 也请参照:庆祝征服廓尔喀胜利之石碑(1793), H. E. Richardson, pp. 48—53。
- 7 廓尔喀首次向北京进贡图《廓尔喀陪臣至北京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021185。
- 8 在此感谢庄吉发教授所提供之信息。Fuk'anggan 此一满文由汉文演化而来。
- 9 《清史臣工传》,七篇,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传稿。
- 10 E. S. Rawsky, pp. 86—87; 参见文章后附录富察氏世系图。
- 11 《清国史·传》,第七册,卷一,页 463。
- 12 E. S. Rawski, p. 87.
- 13 德林袭了贝子之爵(见《清史列传·大臣转次编》,卷二一六,页 212b)。
- 14 《嘯亭杂录》,卷三;见李春光,《清代名人轶事辑览》,页 2681。
- 15 《清史臣工传》,篇七,《福康安传》,页 061。第二次廓尔喀人入侵(1791)的原因还有待确认。这种说法对于满人很有利,至少使他们摆脱了扎什伦布寺的激战劫掠的责任。
- 16 多杰才旦,《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卷七,1993,842 号文件,1788 年 8 月 28 日上谕。下文将简称为《汇编》。

- 17 清军由李世杰和成德统领,藏军则来自明正、里塘、巴塘和德各。各路人马形成一个3,000至4,000人的队伍。《汇编》,844号文件,大学士伯和1788年8月29日给成都将军鄂辉,四川巡抚李世杰以及提督参赞成德的命令。
- 18 《汇编》,846号文件,1788年9月21日给庆林的敕谕。
- 19 《汇编》,851号文件,大学士伯和1788年11月7日给巴忠、成都将军鄂辉、四川巡抚李世杰以及提督参赞成德的命令。
- 20 在尼泊尔和西藏签订的和约当中(未被达赖喇嘛修改):西藏从此向尼泊尔纳贡,割让边境城市 Kouti 和 sKyid sgrong 给尼泊尔,并接受仍在尼泊尔境内铸造西藏货币。参见 L. Boulnois, p. 101;而乾隆则命令一个千人的军队长期驻扎在尼藏边境。
- 21 《汇编》,854号文件,大学士伯和1789年1月28日给成都将军鄂辉、四川巡抚李世杰以及提督参赞成德的命令。第一次尼藏战争也签订了驻藏清军的补给方式。参见《汇编》,851号文件,1789年6月9日巴忠的奏章。
- 22 《汇编》,864号文件,1791年9月15日保泰的奏折。
- 23 《汇编》,866号文件,1791年9月15日保泰的奏折。
- 24 许多学者认为这次廓尔喀人的撤退是因为担心被严冬季节困住,大雪封山后无法保证军队补给。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当时天花在西藏地区肆虐,不仅影响到了当地藏民的健康,也威胁着廓尔喀军队的安全。这场天花于1792年初在卫藏区开始蔓延,参见《八世达赖喇嘛传》,2003,页243。
- 25 《汇编》,867号文件,1791年10月5日鄂辉的奏折;《汇编》,876号文件,1791年11月24日内阁给保泰的谕。
- 26 H. E. Richardson, 1974, p. 35.
- 27 《汇编》,876号文件,1791年11月24日内阁给保泰的谕;《汇编》,877号文件,1791年11月27日内阁折:任命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和奎林为参军。
- 28 如:W. W. Rockhill, pp. 1-104.
- 29 H. E. Richardson, pp. 34-36.
- 30 同上,p. 35.
- 31 平定廓尔喀图,1—7幅:分别是协布噜(第一幅),东觉山(第二幅),玛噶尔辖尔甲(第三幅),济咙(第四幅),热索桥(第五幅),帕郎古(第六幅),擦木(第七幅)。
- 32 G. Bogle, p. lxxvii; T. W. Shakabpa, p. 166.
- 33 A. W. Hummel, pp. 253-255.
- 34 十全武功是:两次准噶尔之战、平定甘肃回部、两定大小金川、平定台湾、降缅甸、降安南以及两次廓尔喀之战。《钦定廓尔喀纪略·十全记》,卷4,页11a—17b;H. E. Richardson, p. 37;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
- 35 两次廓尔喀之战共耗费白银350万两,而平定伊犁和准噶尔(1755—1760)则耗费白

- 银 2,300 万两,第一次金川之战(1747—1749)耗银 800 余万两,第二次金川之战(1771—1776)则耗银 530 万两,而 1760 年末降缅甸一役则耗银 900 万两。参见 R. Greatex, p. 615。
- 36 乾隆也曾下令鄂辉为这些粮草付款,《汇编》,853 号文件,1788 年 3 月 12 日。
- 37 他特别提出要建立起带有粮仓的补给站,这些补给站或者是由四川巡抚掌管,或是根据驻地不同由驻藏大臣掌管。《汇编》,857 号文件,1789 年 8 月 17 日军机大臣和珅议复。
- 38 《汇编》,879 号文件,1791 年 12 月 11 日鄂辉奏折。
- 39 《八世达赖喇嘛传》,页 241。
- 40 S. Naquin, E. S. Rawski, p. 133.
- 41 A. W. Hummel, p. 254.
- 42 驻藏大臣最初设置于 1727 至 1728 年,在清军帮助平定了西藏内乱之后建立的。参见《圣武记》,卷五,页 12b。
- 43 R. Greatex, pp. 615—632; 庄吉发,页 109—183。
- 44 P. Berger, p. 186.
- 45 L. Petech, n. 3, p. 99. 我们目前没有足够的传记数据来建立起富察氏的确切族谱。
- 46 L. Petech, pp. 198—210.
- 47 这一碑文的法文从魏源的《圣武记》中译出,由 M. Jametel 出版,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 (外交史回顾), vol. 1, 1887, cité par H. E. Richardson, pp. 54—55。
- 48 吴丰培,曾国庆,《清代驻藏大臣转略》,页 56—57。
- 49 《八世达赖喇嘛传》,页 239。
- 50 同上,页 240—241。最后强调的这一点究竟何意?
- 51 T. W. Shakabpa, p. 156; 163.
- 52 《八世达赖喇嘛传》,页 242。
- 53 同上,页 244; 246。
- 54 同上,页 243。
- 55 T. W. Shakabpa, p. 168。
- 56 相继担任驻藏大臣的有:佛智(1788—1789),舒廉(1788—1790),普福(1790),保泰(1790—1791),奎林(1791),鄂辉(1791—1792),成德(1792—1793),和琳(1792—1794)。副大臣则有:雅满泰(1786—1788; 1790—1791),普福(1789—1790),舒廉(1791—1792),额尔登保(1792)及和宁(1793—1800)。参见 J. Kolmas, p. 610。
- 57 《汇编》,891 号文件,1792 年 2 月 14 日福康安的奏折。
- 58 《汇编》,872 号文件,1791 年 11 月 6 日军机处给保泰的命令; T. W.

- Shakabpa, p. 165。
- 59 T. W. Shakabpa, p. 168。当福康安发现在与尼泊尔人谈判当中,这两位驻藏大臣将有关西藏须向尼泊尔纳贡的来往信件对朝廷隐匿不报时,他们的罪责就非同小可了,参见《汇编》,897号文件,1792年1月26日福康安的奏折。
 - 60 《汇编》,876号文件,1791年11月24日军机处给鄂辉的命令。
 - 61 《汇编》,892号文件,1792年2月14日福康安的奏折;《钦定廓尔喀纪略》,卷首三,页22a。
 - 62 《汇编》,894号文件,1792年2月18日福康安写给达赖喇嘛的奏折。
 - 63 《汇编》,903号文件,1792年3月22日军机处命令。
 - 64 同上。
 - 65 A. W. Hummel, p. 286.
 - 66 A. W. Hummel, p. 682.
 - 67 《汇编》,919号文件,1792年10月12日军机处给福康安、孙士毅、惠龄与和琳的命令。
 - 68 《汇编》,857号文件,1789年8月17日和珅的决定。
 - 69 《汇编》,947号文件,1793年4月4日福康安、孙士毅、惠龄与和琳的奏折。
 - 70 《西藏历史档案荟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图50。
 - 71 陈友新,页185—214;廖祖桂、李永昌、李鹏年,2004,2(页30—43);2004,3(页69—87);2004,4(页57—75);A. Chayet, p. 125 - 145;廖祖桂、李永昌、李鹏年;张云,页120—136。关于章程的各个版本详情,参见A. Chayet, p. 137, n. 49。陈友新根据清廷档案研究的是29款章程的最后定本的起草过程,并且对于松筠(1754—1835,1794—1799间任驻藏大臣)撰写的102条款的章程进行探究;廖祖桂试图确定目前的两个藏文版本中哪一个才是正式的,Anne Chayet则对于这份档的研究重新置于对西藏政治机关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
 - 72 《清史臣工传》,篇七,页064。
 - 73 《汇编》,947号文件,1793年4月4日福康安等写给皇帝的奏折。
 - 74 廖祖桂,2004,2期,页34。作者提到这份档是在*Recueil des documents de l'année eau-boeuf*(水牛年文书)之中,但是没有具体出处也没有藏文标题。这份档应该就是《Chu glang wang shu tshur phul gyi deb gzhung》,Chab spel Tshe brtan phun tshogs, *Bod kyi gal che'i lo rgyus yig cha bdams bsgribs*, A. Chayet 书中曾有引用, p. 135, n. 35。
 - 75 同上。《西藏历史档案汇编》。有关该文件的具体描述,参见A. Chayet, p. 138 - 140。
 - 76 关于藏文标题事,参见A. Chayet, p. 139。
 - 77 最初的两个翻译是从扎什伦布寺*Recueil des documents de l'année eau-boeuf*(水牛年

文书)中找到的文件而来。第一篇翻译的时间是1950年,刚刚发现这份原始文件之时。其标题为:《清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二十九条权力》。1953年这篇翻译被再次修订,其标题改为《清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二十九条权力译文校注》。我们在牙含章所著《达赖喇嘛传记》(页62—71)中可见这篇1953年的翻译。这第二篇也见于《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之中。而最后一篇翻译则从原版公告中翻译出来,收录于《西藏历史档案汇编》当中,编号为50号。参见廖祖贵,2004,2期,页36。

78 廖祖贵,2004,3期,页74。

79 在此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李宗焜教授致谢,在解读官印的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大帮助。

80 对于这些残页的介绍,参见 A. Chayet, p. 138 - 139。

81 《八世达赖喇嘛传》,页236。

82 根据 A. Chayet 的研究,孙士毅通藏文。这可能也是他不时陪同福康安去往布达拉宫的原因。

83 《汇编》,900号文件,1792年3月22日福康安的奏折,提及鄂辉对一封多仁班智达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作了翻译。

84 《汇编》,911号文件,1792年8月15日福康安与海兰察给皇帝的奏折。

85 《汇编》,914号文件,1792年9月5日孙士毅、和琳与鄂辉给皇帝的奏折。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是不加掩饰地承认他的满文水平不足以撰写奏章。

86 《汇编》,872号文件,1791年11月6日军机处颁给保泰的上谕。

87 直到现在历史学家普遍将1793年的《善后章程》视为1750年章程的延续,如陈友新就持这一看法。

88 《汇编》,935号文件,1792年12月24日福康安给军机处的奏报。

89 如《清史列传》,卷二六,页19b。

90 A. Chayet 指出这份文献并非像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条例,而更像是1792至1793年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参见 A. Chayet, p. 129, n. 13。

91 《卫藏通志》,卷十二,页1a—5a。

92 《圣武记》,卷五,页14b—15b。

93 《钦定理藩部则例》,卷六一,页1a—11a。

94 关于该文1792年12月13日的汉文版,参见《卫藏通志》,喇嘛,卷五,页1a—4b。这篇文章以汉、藏、满、蒙四种文字勒刻于北京雍和宫的石碑之上,但似乎在拉萨并未找到这样的石碑。参见 H. E. Richardson, p. 52。

参考书目

- 《八世达赖喇嘛传》，内部数据(2)，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3。
- Berger Patricia,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空虚的帝国：清代中国的佛教艺术和政权)，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 Bogle George, *Voyages au Tibet, faits en 1625 et 1626 par le père Andrada, et en 1774, 1784, 1785 par Bogle, Turner et Pourunguir* (西藏之行：1625 和 1626 年 Andrada 神父之旅以及 1774、1775 及 1785 年 Bogle, Turner 与 Pourunguir 之旅)，Paris, 1796 (traduit par J. -P. Larrand et J. B. Billecoq).
- Boulnois Luce, *Poudre d'or et monnaie d'argent au Tibet* (西藏的金粉银钱)，Paris, CNRS, 1983.
- Chab spel Tshe brtan phun tshogs, *Bod kyi gal che'i lo rgyus yig cha bdams bsgrigs*, 1991. (Gangs can rig mdzod 6).
- Chayet Anne, 《A propos du règlement en 29 articles de l'année 1793》(关于 1793 年 29 条款的善后章程)，*Les Cahiers d'Extrême-Asie* 15, 2005, p. 125 - 145.
- 陈友新, 《乾隆五十八年前定西藏善后章程初谈》，第二届中国边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记，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1996 年 5 月分，页 185—214。
- 多杰才旦主编,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7 册，1993。
- Greatex Roge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Jinchuan War” (第一次金川之战简介)，in A. McKay, *The History of Tibet*, Londres, Curzon, 2003.
- 和琳编, 《卫藏通志》，1896。
- Hummel Arthur Waddel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清代[1644—1912]名人)，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 Jametil M.,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 (外交史回顾)，vol. 1, 1887.
- Kolmas Joseph, *The ambans and Assistant Ambans of Tibet (1727—1912)* (驻藏大臣与副大臣[1727—1912])，A.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西藏史)，vol. II, The Medieval Period : c. 850—1895.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Paramountcy (佛教统治的发展), Londres, Curzon, 2003, pp. 602 – 614.
(*Première publication* : Ihara Shoren, Yamaguchi Zuiho (eds.),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5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国际藏学会第五届研讨会论文集), Narita, 1989, Narita Shinshoji, 1992, vol. 2,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pp. 541 – 557.

《喇嘛说》。

李春光编,《清代名人轶事辑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

Li Ruohong, *A Tibetan Aristocratic Family in Eighteenth-century Tibet. A Study of Qing-Tibetan Contact* (18 世纪西藏的一个藏族贵族家庭:清廷与西藏接触个案研究),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2002.

廖祖桂,李永昌,李鹏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中国藏学,2004 年第 2 期,页 30—432;2004 年第 3 期,页 69—87;2004 年第 4 期,页 57—75。

廖祖桂、李永昌、李鹏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条〉版本考略》,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McKay Alex, *The History of Tibet* (西藏史), Londres, Curzon, 2003.

Naquin Susan, Rawski S. Evely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8 世纪的中国社会), Taipei, Taiwan,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Inc., c1989.

Petech Luciano,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18 世纪初的中国和西藏:中国在西藏的保护制度建立的历史), Leiden, Brill, 1950.

Petech Luciano, “The Dalai Lamas and Regents of Tibet” (达赖喇嘛与西藏的摄政), *T'oung Pao* 47, 1959, pp. 368 – 394.

钦定廓尔喀纪略。

钦定理藩部则例。

《清国史》,传,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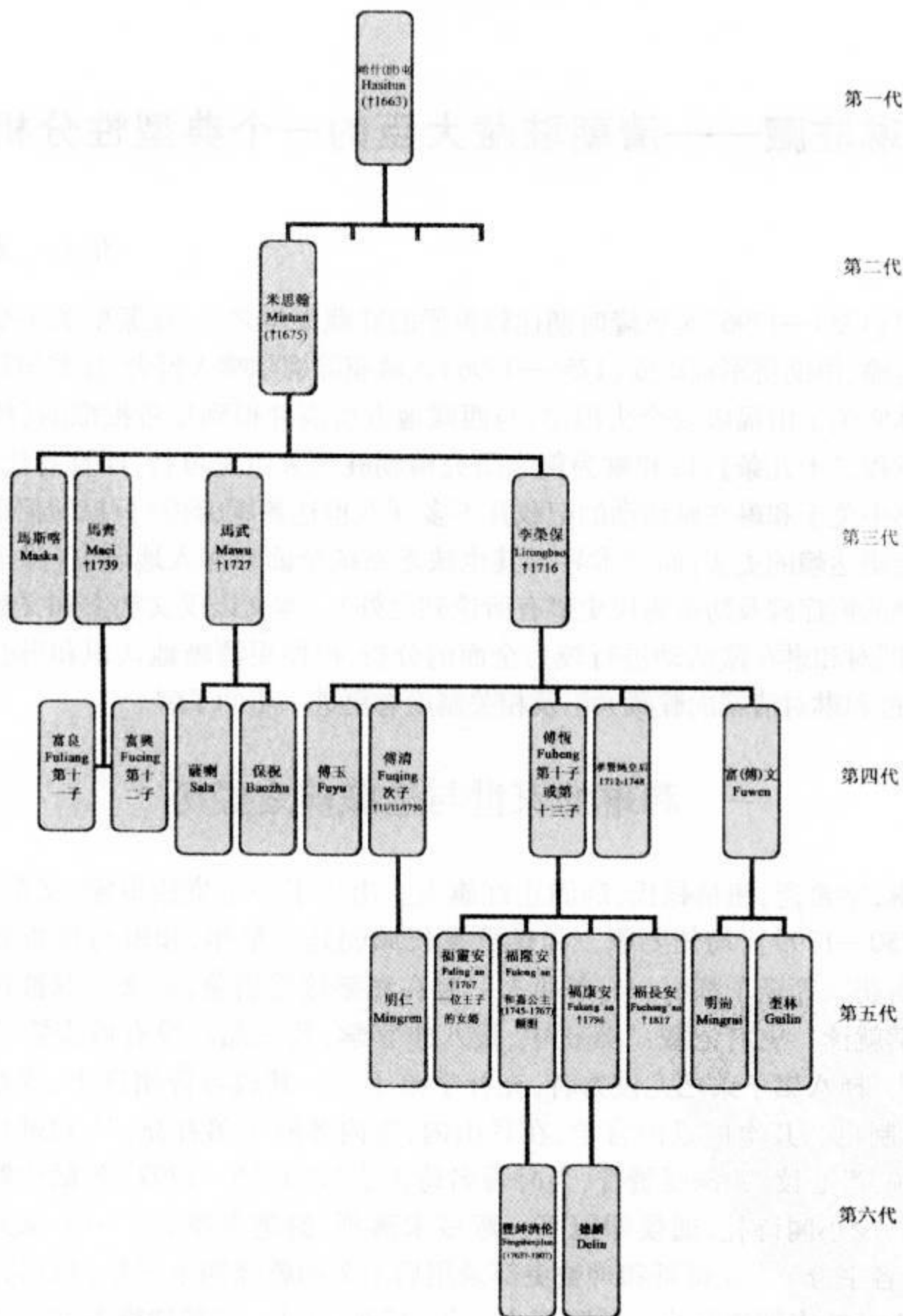
《清史臣工传》,7 篇。

《清史列传》,《大臣传次编》。

Rawski Evelyn,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最后的皇帝:清代国家机构的社会史),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Richardson E. Hugh, *Ch'ing Dynasty inscriptions at Lhasa* (拉萨的清代碑文), Rome, Ismeo, 1974.
- Rockhill William, "The Dalais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 1644—1908" (拉萨的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1644—1908]之间的关系), *T'oung Pao* X, 1910, pp. 1—104.
- Shakabpa Tsepon,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西藏政治史), New York, Potala, 1976.
- 魏源,《圣武记》,卷五。
- 吴丰培,曾国庆编,《清代驻藏大臣转略》,拉萨,人民出版社,1988。
- 西藏历史档案汇编(*Bod kyi lo rgyus yig tshags gces bdus*),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 《啸亭杂录》,卷三,记载于李春光,《清代名人轶事辑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26。
- 牙含章,《达赖喇嘛转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张云,《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形成与版本问题》,《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 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

富察氏



和琳驻藏——清朝驻藏大臣的一个典型性分析

张云 著

和琳(1753—1796)是乾隆时期比较重要的驻藏大臣之一,在紧要关头受命负责粮饷运输、协助将军福康安(1754—1796)入藏驱除廓尔喀入侵者,接着担任驻藏大臣具体实施了由福康安牵头拟定、与西藏地方协商并得到皇帝批准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以和琳为例来研究清朝驻藏大臣是可行,而且有代表性。藏文史书中关于和琳在藏活动的记载并不多,《八世达赖喇嘛传》只提到福康安与和琳等会晤达赖的史实;而学术界对其也缺乏系统全面和深入地研究(除了对其所立拉萨的痘症碑及防痘惠民史事有所论列之外)。本文以汉文档案和文献记载为主,试图对和琳在藏活动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以便更清晰地认识和琳驻藏活动,并通过和琳对清朝的驻藏大臣及相关制度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一 和琳的家世与进藏前之经历

和琳,字希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出生于一个贵族世家,父常保,兄和珅(1750—1799),均任要职。和珅更是权倾朝廷。早年,和琳与哥哥和珅靠祖上积荫获三等轻车都尉。兄弟两人一起在私塾接受启蒙,后来双双被选入咸安宫官学就读。史料记载:“雍正中,设八旗官学,凡三品。设有咸安宫官学在西华门内,择八旗子弟之尤俊秀者,充补学弟子……其教习皆用进士,或参用举人,非旧制也。其次曰景山官学,在景山内,皆内务府子弟补充。”¹和琳与和珅天资聪颖,潜心读书,深受赞誉,当时著名诗人袁枚(1716—1797)曾赋诗颂扬这对兄弟:“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落雁,健笔李摩云。……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²在哥哥和珅被吏部录用后不久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和琳也由文生员补吏部笔贴式。乾隆五十一年(1786)五月,经和珅推荐并受乾隆帝派遣,和琳随军机大臣阿桂赴浙江查询杭州织造盛住贪污案,因办事妥贴,受到

器重。乾隆五十四年(1789),湖北按察史李天培假公济私,用官船运送私人木料给福康安,和珅授意和琳向乾隆弹劾李天培。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1717—1797)受命查办此事,和琳先期查明李天培之子李洵曾用官家运粮船给当时的两广总督福康安送植木 800 件等事,李天培被“褫职遣戍”,福康安也因纵容部下而受到乾隆皇帝指责。和琳在这桩案子中显示出卓越的处事才能,乾隆帝“嘉和琳伉直,下部议叙,由是遂见擢用”。“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初八日(1791 年 3 月 12 日)内阁奉上谕,巡漕给事中和琳已降旨补授内阁学士。”同日“上谕福康安前因木植一案罚总督养廉三年以示惩戒”³。九月,命巡视山东漕运,颇有建树,为乾隆皇帝所赏识,后官至兵部、工部侍郎。五十七年(1792)正月,授正蓝旗汉军副都统。由此看来,和琳早年的仕途以查办官员贪污、负责山东漕运而颇著功绩,赢得乾隆皇帝赏识。

二 和琳驻藏事迹

1. 协助运送粮草、军火物资进藏

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廓尔喀侵扰后藏,朝廷派遣将军福康安等统师进剿,因为粮运为军行首务,而台站乌拉(驿站负责传送公文,支应过往官员食宿、马匹等,这种支应差役,突厥语称之为“乌拉”)最关紧要。朝廷命和琳驰驿经理藏务,督办前藏以东台站乌拉等事。其时,经福康安与达赖喇嘛(1758—1804)、济咙呼图克图(1759—1810)等札商,为了军需运输创造了良好条件,使各站俱有受雇牛只,照例给价,到站即行⁴。为了加强军需运输,朝廷还采取分段督办的方法:起初确定济咙(今西藏吉隆县)以内粮运乌拉等事,由和琳在藏督办,鄂辉(?—1798)往来穿梭催查。而济咙以外,及大兵所到之地的粮运乌拉事务由四川总督惠龄(1743—1804)办理。不久,协办大学士署四川总督孙士毅(1720—1796)亲自前往昌都(察木多)催办粮饷,形成四位大员办理粮饷运输的局面,有力地保障了军需运输的顺利畅通⁵。

和琳于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四日(1792 年 4 月 24 日)出打箭炉,十五日至巴塘西之竹巴笼地方。军需运输贵在神速,当时牛马皆系各土司营官备办,照例给价;督办的委员,都是按照朝廷委任文件添派。当时行程,人夫日行二、三十里不等,牛马日行四、五十里不等,每起军需到台,须得等候齐集,方可发给乌拉,速度甚慢。和琳加以改革,“立定限期,申明赏罚”,斟酌定拟,“险阻之区,每日限

行八十里,漫坡之路,每日限行九十里;凡一起军需到站,不必俟其齐集,各台员立即分派乌拉,武职拨兵护送,随到随行下站,查明时日,折算限期。”延误期限者,除微末员弁从严究办外,其沿途总理道府、副参、游击等员,亦应一并严参治罪。⁶从而大大加快了军需运输速度。同月,驻藏帮办大臣额勒登保(1748—1805)出征御事,和琳抵藏继任驻藏帮办大臣。乾隆皇帝又特别颁布谕旨,谓:“和琳平素尊佛,此次到藏,见达赖、班禅,自必照常瞻礼,其办事原与达赖、班禅平等,应加意整饬,力矫从前积习。”⁷从而保持身份,维护体制。

由于和琳督办台站乌拉等事颇为得力,在他即将到达西藏时刻,乾隆皇帝令驻藏大臣惠龄领兵剿贼,而不必再回前藏,其一切藏务,令和琳妥为经理。五十七年闰四月十三日(1792年6月2日)和琳到藏。五月十九日(1792年7月7日)奏上,朝廷著加恩赏给都统衔,并著加赏御用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玉搬指一个,以示优眷。乾隆皇帝十分满意和琳的工作,声言:“至和琳此次前往西藏,系朕特简,和琳未经先行奏恳,朕之用和琳,初不过以其人尚细心,遇事奋勉,是以派往,实不料其如此能事。朕深庆得人,国家得一好大臣,实自幸大功或易就也。”⁸也就在这时(闰四月初七、十六日,即1792年5月27日、6月5日),乾隆皇帝鉴于“大臣中如和琳细心晓事者,即不可多得,将来事定后,派往驻藏大臣。”同时确定两位驻藏大臣都驻前藏地方,当前要务是“先将济咙贼匪剿尽,克期攻捣阳布(今尼泊尔加德满都),扫穴擒渠,为一劳永逸之举计”。⁹

福康安所部大军进入西藏后,从前藏到廓尔喀前线的运输问题,依然是乾隆皇帝十分关心的大事,他亲自安排和琳、鄂辉、惠龄三人担负此责:“所有济咙以内粮运乌拉等事,节经降旨令和琳在藏督办,鄂辉往来梭织催查。但伊二人所办,同系一事,断不可稍分畛域,致滋推诿。务须互相商酌,彼此关照,两人共事,如同一人。若和琳在藏驻扎时,鄂辉即至沿途催查趲运;如鄂辉回至前藏时,和琳即赴后藏,至济咙一带督率催查,总期军粮转运迅速无误。至济咙以外,鞭长莫及,非二人经理所能周到。今思惠龄本系参赞大臣,又系本省总督,一切呼应较灵,所有济咙以外,及大兵所到地方,需用军粮,竟著惠龄专办,不必同福康安带兵前进。将来大功告竣,惠龄转输之功,即与战胜之功无异,朕必与福康安、海兰察(?—1793)一体加恩,并不因伊未曾督战稍存歧视。惟自济咙以外,粮运设有缺误,则惟惠龄是问。”¹⁰

驻藏大臣和琳遵照皇帝嘱咐,认真核实运到军营饷银数目。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二十七日(1792年6月16日),驻藏大臣兵部侍郎和琳、鄂辉等具奏:“和

琳到藏后,半月以来,统计陆续到藏者,火药重五千三百余斤,大小铅子四万六千六百余颗,火绳四百六十斤,劲弓五百张,箭三万枝,饷银二起,共十五万两,又军装靴鞋二千双,均经臣和琳在途派留弁兵勒限押送前来,俱能如期而至,当将解弁营官等分别奖赏,以示鼓励。……各台运送药弹、弓箭、饷鞘、军装等项,臣和琳经过后,截至闰四月初十日(1792年5月30日)止,计已过察木多者十七起,过恩达者十一起,过拉里者八起,抵前藏者六起。……至前藏采办粮石,臣和琳亦曾询之济咙呼图克图等。据称实有十二万六千八百余石,均系分派番民寨落,随时炒磨,于附近粮台交纳滚运。日来官兵云集,所需口粮甚多,先经臣鄂辉与达赖喇嘛商酌,严飭办理粮石济仲喇嘛、第巴头人,务于本月内全数磨出,交与站员滚运,赶赴军营。盖粮不难于采买,而难于挽输。查,济咙、聂拉木等处进兵之路,山程险隘,牛马多不能行,早经伤令前后藏预派人夫一万名,在拉孜、定日两处,伺候大兵前进,随往大营,一俟官兵深入,凡系粮石军火,均可用夫背运。……臣即与济咙呼图克图商酌,又于各粮台附近地方,每处酌量添雇番夫二三百名,以资背送。”¹¹

与此同时,和琳很好地利用班禅的影响和威望,使之在地方安定和军需运输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1792年7月17日),驻藏大臣和琳具奏,班禅额尔德尼(1782—1853年)移驻前藏已经十月之久,其札什伦布庙宇,遭劫之后均已修理完整,百姓生产得以恢复。他曾与福康安协商,鉴于后藏由岁本(gsol-dpon)堪布一人料理,尚不能安抚众心,如果请班禅额尔德尼回札什伦布安住,对督促运送军粮军火、支应乌拉等项必有帮助,而且此时痘症疫情已除,福康安收复吉隆(济咙)后,卫藏僧俗人心牢固,班禅额尔德尼返回,实属两有裨益¹²。

八月初七日(1792年9月22日),在剿除廓尔喀入侵者取得全胜的条件下,乾隆皇帝嘉奖有功之臣,福康安著加恩实授大学士、孙士毅实授大学士。“和琳身到藏后,催办粮运,实心整顿,设法劝惩,俾该处疲玩积习,日有起色,昨经奏请驰赴宗喀、济咙一带,与福康安所奏适合,现今奏报即日迅赴该处,赶紧催趲,俾军食接济充裕,无误师行,奋勉可嘉,所有吏部满尚书员缺,著金简调补,其工部尚书员缺,即著和琳补授,和琳未到京以前,工部尚书事务,仍著金简兼署,吏部尚书汉员缺,著刘墉调补。”¹³

在八月十八日,和琳详细汇报了三月十七日到八月十七日之间(1792年4月8日至10月2日),自前藏至后藏直至乃安塘一路,运送粮饷的具体数目,并

对尚未运到军营的数十万两饷银,“现在何处停搁,何处截留过多”等,据实查办。当从前藏运送饷银已足敷军营支应后,他立即建议朝廷,将陆续运到的饷银留存前藏,以供回兵各站支放,以节省运脚。八月二十五日,和琳致书四川总督孙士毅,将出口各项军需,就近于里塘、巴塘、察木多、拉哩四台停贮。其饷银一项,除已拨出口者,仍应赶运,以备回兵使用¹⁴。

可以看出,和琳尽职尽责,认真筹划,精心算计,圆满地完成了军火粮饷运输任务,赢得了乾隆皇帝和进藏同僚的赞赏。

2. 参与制订与实施《钦定藏内二十九条章程》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十日(1792年10月25日),福康安等接到圣旨,乾隆皇帝肯定了孙士毅、和琳奏会商凯旋事宜一折的建议,同时指出藏内善后事宜,专交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四人会商妥办,将来撤兵后必当妥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诸大臣按照圣旨初步确定,会办章程条款应包括:镇抚、营制、番目、贸易、钱法、租税、差徭各门¹⁵。

档案资料显示,由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联合上奏,经过朝臣商议,乾隆皇帝批准,最后出台了一系列涉及西藏政治体制改革、宗教管理、噶伦等各级官员拣选、商上收支稽查管理、驻军及训练管理等措施和制度,如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1792年12月6日)“奏拟将钦颁金瓶在大昭寺供奉折”、“周边国家商人在西藏贸易交往须立法稽查折”,十一月初二日(1792年12月15日)“奏酌定稽查商上收支并劝谕达赖喇嘛蠲免租赋折”、“奏复酌定额设藏兵及训练事宜六条折”,等等¹⁶。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藏内大小官员缺出、应行定立等级,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放,也就是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掌握着西藏地方官员的任免权。而作为驻藏大臣的和琳,不仅亲自参与了这些政策和制度的制订,而且在福康安等率军离藏、诸大臣返回内地后,具体落实了二十九条章程中所规定的各项措施与制度。诸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九月,由工部尚书和琳、副都统成德(?—1802)具奏,新造乾隆宝藏银钱,酌量变通、以利番民的建议等¹⁷。都是由担任驻藏大臣的和琳领衔提出,并相继落实的。

3. 严格活佛管理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1793年9月10日)接到乾隆皇帝圣旨,内称:沙玛尔巴在羊八井(阳八井)地方的旧有庙宇,不能再由其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徒众

继续安居,命令福康安等,于事定后,将其庙宇改给黄教喇嘛居住;所有沙玛尔巴徒众,概勒令还俗,分发闽粤等省安插¹⁸。

八月十四日(1793年9月18日),驻藏大臣和琳上奏,提出对沙玛尔巴寺庙和相关遗物、属民田产等的处理意见,内容包括:(一)阳八井庙内所供、重约二百余斤的前辈红帽喇嘛江阿娃镀金大铜佛一躯,销毁变价;内供沙玛尔巴画像数轴,亦应销毁。(二)寺内103名徒众由委员分起解赴前藏,如果勒令他们还俗,反而担心其妖言惑众,别滋事端,不如将其改为黄教,分与前藏各大寺堪布等严加管束。(三)沙玛尔巴家私,如僧衣、幔帐、金银铜铁器皿、妇女首饰等约略值数千金;其各处庄田所交青稞、麦子、豌豆、酥油等项约值二千余金;奶牛委人牧放,按年征收酥油,计值五百余金;现存青稞、麦豆、茶油、食盐、约值二万金。可补充军需,或入藏库充公备用,以节省正项。寨落庄田收入青稞按年征收,交纳噶布伦变价,解交粮务,以充兵丁盐折、口粮折色之用。(四)阳八井庙内一座,共楼房七百七十八间,又僧房三百五十七间,又山下小庙一座,计三间,其中大小佛像甚多,必须有人经管。可赏给颇著功绩的济咙呼图克图,使其香火不致毁坏,寺内属民也归其节制,俟济咙呼图克图离藏后,再行请旨定夺。乾隆皇帝基本采纳了和琳的意见,以沙玛尔巴之寺属财物充作添补防兵钱粮盐菜之用。对销毁沙玛尔巴大小画像数轴作出新的指示,“如业经销毁则已,若尚未销毁,亦著送京。”该寺僧人若情愿改归黄教,仍可在藏焚修,如不愿改归黄教,即将其一并解京。¹⁹从此,该活佛转世系统停止,信仰由噶举改宗格鲁。

在钦定二十九条章程颁布后,和琳按照新的规定处置与活佛转世有关的问题。五十八年二月十三日(1793年3月24日),和琳等上奏,涉及处理西宁及科尔沁等处送到各呼毕勒罕、遵旨入瓶签掣事宜。这是办理活佛转世新办法颁布后的首次金瓶掣签仪式。当时送到的呼毕勒罕有九名。按照惯例,“所有各呼毕勒罕俱非大呼图克图,向来转世,并不报明理藩院具奏,亦不由吹忠指认,惟将本处所出之呼毕勒罕名字,送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诵经指定,历来俱系如此办理。”和琳认为,“钦颁金本巴瓶今既供奉在藏,自应将送到之呼毕勒罕,各按名字人数,分别入瓶试掣,因先期令济咙呼图克图等,带同喇嘛于大昭宗喀巴前虔诚诵经。二月十一日(1793年3月22日),达赖喇嘛下山前至大昭,臣等亲往监视,写签入瓶,公同抽掣。”其中逊巴呼图克图、达赖喇嘛罗卜藏多布丹之呼毕勒罕各有三名,分别掣出一名。而达赖喇嘛罗卜藏丹津、罗卜藏达布凯、伦珠布班珠尔三人之呼毕勒罕送来者每人只各一名。是以写名签三枝,各配空签一枝,分三次入瓶抽掣。后者掣出空

签,另行寻觅。和琳同时指出,嗣后西宁地方距藏较近,将所出之呼毕勒罕就近送藏,入瓶抽掣。各蒙古地方所出之呼毕勒罕,俱应遵照圣旨,由理藩院行文,令其将名字送京,在雍和宫金本巴瓶内签掣,以别真伪²⁰。

为了揭露吹忠降神的虚假性,并为金瓶掣签制度的推行铺平道路,和琳受命让吹忠当众演试,授以刀剑,而神汉们俱各战栗,不攻自破,顿失神秘与权威,这就为落实金瓶掣签提供契机,并通过实践建立新的机制和制度。

乾隆五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1793年2月25日),和琳上书,认为卫藏地方,虽皆属达赖喇嘛管辖,如察木多、类乌齐、乍丫、萨喀等处,各有呼图克图管理,一切事件,从不关白藏中。而各呼图克图中,又有红、黄、黑三种,各行其教,各子其民。“自去年臣等行文各处,令将所有呼图克图,无论大小有名无名,俱著将转世辈数开列呈报,以凭咨明理藩院立案去后。昨据陆续报到。嗣后遇有呼图克图圆寂,即令随时呈报,不必俟其出世,以凭一体办理等。”²¹

和琳还命人清查了历辈达赖喇嘛、班禅的生长地方,父母姓名,圆寂年貌地名,某年差过堪布进贡,某辈某年蒙皇上赏过敕书等情况,以备朝廷咨询²²。

通过和琳的整饬和初次按章寻定转世活佛,并统一化管理,影响西藏地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活佛管理问题,开始步入新的轨道。

4. 划定边界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乾隆皇帝谕令福康安等,与廓尔喀划定边界,“查系藏内边地,一一设立鄂博”,不久,福康安等“于济咙外之热索桥,聂拉木外扎木地方之铁索桥,及绒辖边界,均已设立鄂博,厘定疆域”²³。五十八年(1793),清朝政府批准了这次划界。廓尔喀认为,此次“定立地界极为公道”,表示“两家照旧和好,永远不敢滋事”,对于“所立地界,永远遵奉,不敢丝毫有违”²⁴。

五十九年(1794),驻藏大臣和琳以“藏界西南通外番地方,如萨喀、定结、帕克里等处,均未定有鄂博,难保日久不无事端”,遂派游击张志林(?—1821),“会同各营官,自萨喀起,酌于紧要处所,将应立鄂博地方,绘图贴说”,在福康安划界基础上,补充划界。同年五月,和琳奏报划界过程与结果:“定日阅兵完竣,随带游击张志林、噶布伦丹津那木结、代本拉旺策卜丹等,携带噶厦底案,由萨迦、宗喀、聂拉木、绒辖、定结、帕里克沿边一带,率同该处营官,悉心讲求,查对底册。张志林所拟应立鄂博处所,均与噶厦底册及年老番民禀告相符。查各处路

径崎岖,雪山重叠,臣分派营弁,跟同各该处营官,将旧有玛尼堆者,加高添砌;其全无形迹者,一律堆设整齐。所有唐古忒西南,与外番布鲁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廓尔喀歌交界处,均已画然清楚。”²⁵

“自札什伦布西行,由拉孜至协噶尔、定日、宗喀、萨喀,通狭巴岭山、锅拉纳山、毕都纳山、朗古山顶、纳汝克喀山顶、朗杂山顶,均设立鄂博,此内为唐古忒境,此外为洛敏汤、作木郎二部落境。又自宗喀通济咙,至热索桥,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廓尔喀境。又自定日通聂拉木,至铁锁桥,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廓尔喀境。又自拉孜通绒辖,至波底山顶,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境。又自定结至萨热喀山顶、卧龙支达山顶、羊玛山顶,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境。又自干坝至洛纳山顶、丈结山顶、雅纳山顶,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境。又自帕克里至支木山顶、臧猛谷山顶、日纳宗官寨,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布鲁克巴二部落境。又臧曲大河南,本系哲孟雄地界,被廓尔喀侵占已久,臧曲大河以外,俱系廓尔喀境。”²⁶

通过前后两次划界,西藏与“外番”布鲁克巴(不丹)、哲孟雄(后之锡金)、廓尔喀(尼泊尔)等的边界初步得以明确。

5. 练兵、加强边防

乾隆皇帝对和琳在藏的成绩做了充分的肯定,并在批文中强调指出;“和琳奉差以来,办理一切卫藏边疆军需各事宜,定立章程,抚辑各部落,训练蕃兵,均能实心整饬,经理妥协。”²⁷这里提到了他在练兵和加强边防方面的活动。

史书记载,福康安等针对两次廓尔喀战争中,“藏内番兵乘间即逃、遇敌即退,不能守御出力”的情况,分析了藏兵缺乏战斗力的原因,认为此“固由番兵怯懦性成,亦因平日练兵之道,毫无法制,势难使之振作。”提出了“酌定额设藏兵及训练事宜六条折”,内容包括:确定西藏前后藏各驻兵一千,定日、江孜各五百,形成三千人的藏军队伍,“以肃兵制”;核定军兵等级,“以专责成”;藏军官兵,分别酌给钱粮、口粮,“以资养赡”;发给军火武器,认真操练,明示赏罚,“以肃军纪”;以及严禁军官欺凌士兵和役占士兵,“以实营伍”等²⁸。由此建立起一支比较正规的藏军。

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工部尚书和琳、副都统成德具奏,为前藏新设番兵挑选足额,一律操演,并赴后藏较阅。五十九年(1794)五月,工部尚书和琳、

内阁学士和宁(?—1796)根据西藏地方局势发展需要,对驻藏大臣的巡视和阅兵制度提出改革意见。先前福康安(包括和琳本人)等奏定章程中每年春秋二季,驻藏大臣分往各边界巡阅一次,顺道阅兵,完全合理的,而现在时过境迁,周边诸部畏服,边境安宁,各处堆立鄂博,境界分明,而“卫藏地方较冷,三四月间方始播种,八九月内收割,凡巡阅之期,正番民农忙之候,虽减从轻骑,一切照例发与价值,而所用乌拉人夫,在所不免。”特建议,嗣后驻藏大臣,每年于五六月间农闲之时,阅边看兵一次,既不致营伍废弛,亦不致有妨农业²⁹。

我们知道,这些措施的形成,是以福康安为首的进藏大军首领共同调查、协商确定的,但是它的落实,却是由驻藏大臣和琳来实施和完成的。应该说,和琳对清朝藏军的建立,对士兵的早期的训练,以及加强清代的西藏边防,颇著功绩。

6. 拉萨痘症碑与改良风俗

这一时期,西藏发生天花疫情,受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和人们错误观念的影响,“凡遇番众染患痘疹,皆逐赴山谿躲避。而被逐之人,家道可度者,日食饱暖,尚可将息,望其全可;若贫苦之家,一经被逐,口食不资,露处山谿,父子兄弟夫妇至亲,两不相顾,任其冻饿,无人照管,因至多有病毙者”。和琳闻其情状,十分怜惜,当即于浪荡山谷找一空寨,“捐廉购办酥油、糌粑、茶叶、柴薪,专派弁兵,及已出痘之番民,早晚散给,以资养赡。半载以来,该出痘贫民等,得有口食,痊愈者已有数百余人”。他还致书给达赖喇嘛、班禅采取同样办法。“嗣后凡遇痘疹被逐之人,必须首领倡率,捐给酥油、糌粑、茶叶、柴薪,派人前赴避痘之处,早晚照管给散,俾有口食,以免冻馁之虞,则活人性命,功德无量矣。”获得了巨大成效,百分之九十的患者存活下来,深受西藏百姓感念³⁰。五十九年(1794),和琳立“永远遵行”碑以纪其事,该碑至今保留在大昭寺前³¹。

改革西藏丧葬风俗,严禁碎割死尸,以重人伦、以厚风俗。和琳担任驻藏大臣以来,力图对西藏的旧有风俗进行整顿,首先面对的是“天葬”习俗,从中原传统出发,他认为“所有宰割尸身、喂鹰喂狗一事,尤为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加”。规定“嗣后如有人死,概不许割裂尸身,喂鹰喂狗,自己有庄田者,于本庄田内,择地安葬;如无庄田贫民,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于前后藏拨出空地两三处,作为义冢公地,报官掩埋。倘有无知番民,仍敢不知悔改,一经本部堂查出,即令在藏文武官员,将死者之子孙,凌迟处死,并将在旁助恶动手之人,正法示众”³²。这项措施虽经严厉申明,但是由于违背西藏民俗,并没有达到预期目

的,天葬、水葬习俗在此后依然得以保持下来。可见,风俗改革必须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单凭良好愿望,并不能达到设计目标。

7. 处理与外藩的关系

福康安率领大军驱敌,原由廓尔喀的入侵引起,战争之际及战后,如何处理好与西藏南部的诸“外番”的相互关系,也是要事,他首先遭遇到的如何处理曾经协助参与剿灭廓尔喀入侵者的哲孟雄部落的“讨要赏项”问题。根据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九日(1792年8月6日)奏折,和琳曾就此事与达赖喇嘛商议,达赖喇嘛“竟无主见”,惟听和琳定夺。和琳认为,福康安未曾深入之先,曾檄调该哲孟雄和布噜克巴进兵,以分其势,那时他们都以不服水土为辞,退守边界。现在讨赏,纯属贪心。何况已经朝廷对有功的头人赏过银牌、缎匹、茶叶等项,不应再有奢求,同时谕令他们严兵坚守。朝廷肯定了和琳的做法,并传谕福康安等,“如该部落有似哲孟雄之请兵讨赏者,福康安等亦当照和琳所办,严辞拒绝,酌赏缎匹、茶叶等物。”³³同时谕令各部落,积极效力,待将来荡平贼境,将被廓尔喀侵占土地归还给各部落,否则别指望收复失地。

和琳还详细查明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月廓尔喀派大小头人三名来藏的有关情形,据此知,廓尔喀使者呈递谢恩表贡,并带银钱式样,稟请与唐古特(西藏)通商买卖,结果被噶厦喇嘛噶布伦(噶伦)令人收下,内有毡裹匣、白布包、皮裹包、共十五件,白布包内还有信字。和琳命人译出,表内并无讨要地土俸禄之语。³⁴说明讨要“地土俸禄”应是后来之事。

8. 查处驻藏大员

和琳直接办理了查处副都统衔鄂辉和前任驻藏大臣孚习浑(即保泰)、雅满泰(?—1812年)渎职等案件。

鄂辉,碧鲁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署四川总督。廓尔喀侵西藏,据济咙、聂拉木诸地。乾隆皇帝命令鄂辉还四川,与提督成德率师赴援,又命侍郎巴忠(?—1791)前往处理纠纷。巴忠先前曾经担任驻藏大臣,熟悉藏事,他擅自示意噶布伦,采用贿赂方式让廓尔喀军退出所侵占地区。鄂辉等遂与议和,疏陈善后事。朝廷授其四川总督。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因未获贿金,再次侵入济咙、聂拉木等地。乾隆皇帝命将军福康安督师讨廓尔喀,责鄂辉误用巴忠议致复生事,夺官,予副都统衔驻藏,听福康安指挥,福康安令其督饷。工部

尚书和琳劾鄂辉得廓尔喀贡表不以上闻,命夺副都统衔,逮赴前藏荷校示罚。五十八年(1793),命还京师,授拜唐阿。加员外郎衔,迁热河总管³⁵。

在查处俘习浑、雅满泰案件中,和琳依据在廓尔喀使者寄呈将军、提督、总督的信内,均有“要照大人以许的话行就是了”等语,进行彻底调查,亲自提审俘习浑、雅满泰,并与打完胜仗归来的大将军福康安一同质审。和琳认为,雅满泰系乾隆五十五年十月二十日(1790年11月26日)到藏,俘习浑系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791年1月3日)到藏,普福(?—1802)系十二月初三日(1791年1月7日)起身进京,而廓尔喀头人系十月初来藏,冬底方回,所以俘习浑、雅满泰不得将责任推委给普福一人承担。乾隆皇帝依据和琳调查结论,降旨著福康安、孙士毅、和琳、惠龄即将鄂辉革职,同俘习浑、雅满泰三人,亲提究诘,严切刑讯,毋任稍有遁饰。对于和琳在处理本案坚持原则,乾隆皇帝给予很高评价,“普福系和珅保举之人,和琳并不因系伊兄所荐,稍存回护,据实查奏,甚为公正,著赏给御用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以示奖励。”同时又强调指出,若和琳此时隐庇不奏,将来别经发觉,恐和琳等亦不能当其咎也³⁶。应该说,和琳是否公正查实案情,也直接担负着巨大的责任。

三 驻藏时期的人际关系

和琳在藏的时间为1792年3月22日—1794年8月14日,在这一时期,有几个人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有可能影响到他的驻藏大臣职责的履行。

1. 和琳与和珅的关系

和琳与和珅是骨肉兄弟,他的成长和后来仕途上的发展都与哥哥有一定的关联。乾隆五十六年(1791)二月,和琳被擢升为内阁学士。同年十一月,又兼署工部左侍郎。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月,和琳又任正蓝旗汉军副都统,担任驻藏大臣。驱除廓尔喀战争胜利后,福康安、和琳等受到嘉奖,和珅也受奖,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接着和琳被任命为四川总督。有些研究者认为,和琳担任驻藏大臣是和珅刻意安排的结果,而他的仕途的进步主要受影响于和珅的得势与弄权。但是,我们从史书中有关和琳史事的记载以及乾隆皇帝对和琳的评价来看,和琳个人的品格、素养和细心勤勉办事,以及政绩才是更重要的因素。因为在涉及重大军事、刑事案件问题的处理,缺乏才能,不能取得圆满的结果,在乾

隆皇帝时代,也许可以因特殊姻亲关系免除罪责,却很难获得奖励和迁升的机会。和琳的迁升无疑与担任军机大臣的兄长和珅有关,乾隆皇帝在封授和琳都统衔时,就告知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和琳是他特派之人,又是大学士和珅弟弟,其身份自然非同一般。同时,又申明“至和琳此次前往西藏,系朕特简,和珅未经先行奏恳”³⁷。真正获得升迁的原因,还在于和琳自己建立功业,特别是在西藏两年多时间作出的出色成绩,乾隆皇帝喜欢和琳主要是因为他的个人才干和勤勉工作。

和琳和和珅兄弟情深意笃,和琳在镇压苗民起义中身亡,和珅伤心万分,曾做诗十五首悼念胞弟。和珅在诗序中写道:“希斋(和琳字希斋)弟督军疆受瘴而卒,痛悼之余为挽词十五首。言不成声,泪随笔落,聊以当歌。”情真意切,见诸笔端:“看汝成人瞻汝贫,子婚女嫁任劳顿。如何又为营丧葬,谁是将来送我人。”³⁸

2. 和琳与福康安的关系

福康安,富察氏,满镶黄旗人。乾隆时任侍卫,授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福康安的父亲傅恒(?—1770),是乾隆之后孝贤皇后的兄弟,而福康安则是孝贤皇后的亲侄子。民间有福康安是乾隆皇帝与傅恒妻私生子的传闻。福康安生于乾隆十八年(1754),自幼乾隆即将他带到内廷,亲自教养,待之如亲生。福康安十九岁时,即以头等侍卫统兵随定西大将军温福征剿大金川,此后担任过吉林将军、盛京将军、成都将军、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要职。参加过平定大小金川、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击退廓尔喀入侵等重大战役。福康安去世的时候,乾隆悲泪长流,赐谥文襄,追赠嘉勇郡王,配享太庙³⁹。

和琳与福康安发生直接的联系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初,他自笔帖式累迁湖广道御史。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私交粮艘带运木植,鞫得两广总督福康安寄书索购状,帝嘉和琳伉直,下部议叙,由是遂见擢用。自吏部给事中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这次被认为是协助他的哥哥和珅打击政敌一个组成部分。福康安因此被罚俸三年,直到受命前往平定廓尔喀之乱,才被乾隆皇帝免除尚未缴纳的罚金⁴⁰。

第二次是他受命入藏与福康安共事。应该说,这段时间两人相互配合默契,和琳积极地支持了福康安所部大军的后勤运输保障工作,而福康安也对和琳的

工作赞赏有加。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十二日(1792年8月29日),大学士署四川总督孙士毅抵前藏,八月初七日(9月22日),接到乾隆谕旨,内言:“昨据福康安奏,鄂辉办事稍软,和琳能驾驭番民,实力振作,飞咨和琳前往济咙一带,督办粮饷。适和琳奏到,亦恳请前往,与福康安相奏恰合,当经降旨嘉奖。今和琳接到福康安咨,即于十八日(10月3日)起程驰往,计此时早抵济咙,定能赶紧趲办,以济军营应用。”⁴¹从乾隆皇帝谕旨中可以看到两人相互支持、配合默契的情况。

关帝庙碑文显示,福康安见扎什城关帝庙“堂皇湫隘”,故在磨盘山修建新的关帝庙,驻藏大臣和琳在驱廓战争胜利后又重修了札什城关帝庙,“卑者崇之,隘者拓之,有庀有堂,有严有翼”,之所以要重建该庙,用和琳在所撰碑文中的话来说,就是清兵大胜“固圣主(乾隆)庙谟广运,指示机先,大将军(福康安)运筹帷幄,靡坚不破,然究属帝君(关羽)威灵呵护之所致也。”⁴²这里实事求是,同时也比较充分地肯定了福康安的首功。

第三次两人共事是镇压贵州苗民起义。五十九年(1794),和琳被任命为四川总督。六十年(1795),贵州苗石柳邓叛清,波及正大、嗅脑、松桃等地,湖南苗吴半生、石三保应之,围永绥,乾隆皇帝命已担任云贵总督的福康安带兵镇压。和琳此时正准备入京,行至印州,松桃的反叛军已阑入秀山境。和琳得到消息立即带兵前往,督参将张志林、都司马瑜击走之;后复败苗民造反军于晏农,进攻砲木山黄陂,通道松桃,颇有功绩,乾隆皇帝赏其双眼花翎。当时福康安已解正大、嗅脑、松桃之围,攻石柳邓于大塘汛,和琳率兵与之会合,朝廷便任命和琳参赞军事,和琳率部屡建战功,受到乾隆皇帝赏赐嘉奖,先后封一等宣勇伯、加太子太保。嘉庆元年(1794),福康安战死,乾隆皇帝命和琳督办军务。八月,进围平陇,卒於军。晋赠一等公,谥忠壮,赐祭葬,命配飨太庙,祀昭忠、贤良等祠,准其家建专祠。四年(1799),其兄和珅被诛,朝廷有人论和琳藉势邀功,嘉庆皇帝“亦追咎其会剿苗匪,牵掣福康安,师无功,命撤出太庙,毁专祠,夺其子丰绅伊绵公爵,仍袭三等轻车都尉”⁴³。

3. 和琳与孙士毅的关系

孙士毅,字智冶,一字补山,浙江仁和人。乾隆进士,原为文官,后因功封一等谋勇公,授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乾隆五十六年(1791)摄四川总督,督办粮饷。五十七年(1792),廓尔喀入侵之乱平息,获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与福康安、和琳等一起驻前藏,处理善后事宜。福康安率金川土司入觐,朝廷命

孙士毅再度担任四川总督。福康安转任云贵总督后,以和琳代其为四川总督。乾隆皇帝命孙士毅留四川办理廓尔喀之役军需奏销,孙士毅希望留福康安、和琳一同办理,乾隆皇帝没有同意。孙士毅与和琳共同受命负责粮饷运输,而且与和琳哥哥权臣和珅有很深交情,所以他无疑是此时和琳交际圈中重要人物之一。在孙士毅的《百一山房赴藏诗集》中有多首诗歌是与和琳唱和而作,如“西招送春,和希斋司空”、“寄希斋司空西藏”等均属此例⁴⁴。

4. 和琳与和宁的关系

和宁,字太庵,额勒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甲午(1793年12月7日),被授予副都统衔,前往西藏办事。五十九年(1794)抵藏,继成德为驻藏帮办大臣。不久授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仍兼副都统。六十年春间,会同驻藏大臣松筠奏免前后藏百姓赋税钱粮,酌定章程十条,督率办理前后藏东南北各属。

和琳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二月担任驻藏大臣。和宁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以内阁学士、副都统衔担任驻藏帮办大臣,至嘉庆六年(1801)调回北京⁴⁵。两人合作共事有9个月之久。如前引,和琳与和宁联合上奏改革了驻藏大臣巡边和检阅士兵操练的制度等事项。

和琳在其《甲寅仲冬余奉诏东旋,留别太庵四律,聊作骊歌一阙耳》中写道:“半载追随互见招,深谈不惜坐通宵。灯明客馆杯浮蚁,月转碉楼句入瓢。治藏有经烦手纂,理以无策代梅调。重牢小队旗亭饯,一派离情系柳条。”⁴⁶和宁也写有多篇诗作酬和和琳,如:“一剑寒霜兴不群,新论拜仰列星文。黑头方伯虚谈政,白发儒生壮统军。敢信文章夸异俗,漫劳弓矢建殊勋。冰衔此去清凉界,天语回春入梵云。”⁴⁷在和宁的《易简斋诗抄》中,与和琳的唱和之作有二十余首之多⁴⁸,如《送别和希斋(琳)制军之蜀十首》,包含深情厚谊,而和琳的和诗如《春堆却寄太庵》、《江孜归次却寄太庵》、《江达寄太庵》等都反映出和琳对和宁的惜别之情。足见,两人在藏合作愉快,感情深厚。有研究者认为,“《卫藏通志》原为驻藏大臣和琳根据乾隆皇帝指令,为向新任驻藏大臣松筠办理交接事宜,命帮办大臣和宁根据驻藏大臣衙门档案编撰的。”⁴⁹足见,和琳与和宁在西藏不仅是同僚,和衷共济,而且是诗道同好和情谊深厚的朋友。

5. 和琳与松筠的关系

松筠(1752 或 1754—1835),字湘浦,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破格提拔为内阁学士兼副都统。五十九年(1794),任吉林将军。不久受命往荆州督察税务,道出卫辉,大水环城,率守令开仓赈恤。诏嘉奖,授工部尚书兼都统⁵⁰。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四年(1794—1799)就任驻藏大臣。松筠改革西藏赋税等制度,减免赋税债务及差役负担,休养生息;赈济百姓,扶助逃亡户恢复生产;限制使用乌拉,有偿支付雇费;严禁霸占水渠、农田和乘机敲诈勒索等,颇有政绩。他还勤于著述,有《西藏巡边记》、《西招图略》、《西招秋阅记》、《西藏图说》等大量作品存世⁵¹。

松筠是和珅的政敌,清朝宗室昭槲在《啸亭杂录》中说:“自和(珅)相秉权后,政以贿成,人无远志,以疲软为仁慈,以玩愒为风雅,徒博宽大之名,以行徇庇之实,故时风为之一变。其中行不阿者,惟松相公筠一人而已。”⁵²《清实录》本传也记,松筠“充驻藏大臣,抚番多惠政。和珅用事,松筠不为屈,遂久留边地。在藏凡五年”⁵³。恰巧,在那里松筠又是接替和珅弟弟和琳而担任驻藏大臣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他们两人的关系,但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二月松筠接替和琳,双方有职责交接方面的密切接触。有学者认为,和珅和松筠为夙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乾隆五十九年(1794)松筠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实际是这场斗争的一个小插曲。和珅是利用这种手段,将权势日益增涨的松筠排挤出军机处。同时又可从西藏调回自己的弟弟和琳,为其在权力阶梯上向上爬创造条件。”⁵⁴和琳和松筠之间的关系,因为其兄长和珅之故,并不十分融洽⁵⁵。

但是,从和琳、松筠的为人处事,以及史书中没有出现他们在藏的负面报道来看,两人的关系还是和睦的,至少没有因为和珅的原因而出现公开纷争的情况,甚至还存在融洽合作的局面,乾隆五十九年(1794)七月,朝廷命令松筠接替和琳担任驻藏大臣,同时谕令:“卫藏地方,经和琳悉心整顿,定立章程,一切驾御各部落、训练番兵,所办俱有条理。仍著和琳再向松筠将巨细事宜面为告知,俾得照成规经理,倍臻妥协,以副委任也。”⁵⁶松筠于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五日(1794年12月26日)抵达西藏,“和琳将此数年谨遵训喻办定各项事件,阖藏各地黄黑人等习俗、廓尔喀等恭顺情形、交界地方所设各卡情势、每年操演兵丁巡边事项、达赖喇嘛以下众呼图克图、噶伦等如何相见等项,一一详密告知。”松筠、和琳等在一起三日,详细面议,凡宜交代事项,和琳明白交代完毕后,于十二月十三日(1795年1月3日)遵旨赴京入觐。而松筠也表示要留意遵照执行,表

示要与和宁一起,“慎守钦定章程,不负圣上倚重之恩,慎之又慎”。这一过程和相关活动由松筠、和琳、和宁三人联名上奏乾隆皇帝⁵⁷。

四 从和琳看清朝鼎盛时期驻藏大臣的地位与作用

1. 驻藏大臣应具备的素质

关于驻藏大臣所应具备的素质,清朝文件并无明确规定,我们只知道驻藏大臣是一个有副都统衔的钦命边疆大员。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乾隆皇帝对驻藏大臣和琳的肯定性评价中,看到驻藏大臣所应具备的良好素质,同时也可以从前任驻藏大臣受查办的缘由,及乾隆皇帝对其失职之责备言辞中,看到担任驻藏大臣应禁止的行为。

就和琳本人而言,保留在《卫藏通志》中的乾隆的评语已有鲜明的反映,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三十日(1792年3月22日)上谕:“此时正届大兵进剿,一切军需要务,均资妥办,和琳人本细心,遇事尚有主持,在藏驻扎,于筹办粮运,接济官兵,及查办整饬诸事,自所优为。”《清实录》收录乾隆皇帝谕旨中说明任命驻藏大臣的一些条件:“今思鄂辉人本软弱,成德遇事粗疏,二人驻藏未能得力。侍郎和琳心思详细,堪以管理藏务。”⁵⁸这里提到并受到乾隆肯定的良好素质是“细心”、“心思详细”、“有主持”等,并与不堪担任驻藏大臣的“软弱”、“粗疏”禀赋相对应。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初七(1792年5月27日)、十六日(1792年6月5日)上谕:“现因西藏办理军务,一切粮运乌拉,关系紧要,且当诸务废弛之后,亟资整顿,是以特派和琳前往督理。但大臣中如和琳细心晓事者,即不可多得,将来事定后,派往驻藏大臣。”这里提到和琳的优点,以及将来拟作为驻藏大臣遴选重要条件的是他的“细心晓事”。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九日(1792年7月7日)上谕:“至和琳此次前往西藏,系朕特简……实不料其如此能事。朕深庆得人,国家得一好大臣,实自幸大功或易就也。”对和琳进行综合评价,特别提出他“如此能事”即办事能力极强。此外,乾隆皇帝还肯定了和琳在查办官员贪污、渎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持原则、“公正”无私,以及在帮助百姓解除天花灾害中表现出的爱民如子,在改良风俗习惯中展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尽管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琳和接替他的松筠都信仰佛教,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宗教知识,这也成为部分驻藏大臣所具备的一个条件。结合其他驻藏大臣的情况来看,还应包括临危不惧、果断勇敢,以及熟悉藏情等。而软弱、粗疏、无能和怠

惰等则是驻藏大臣不应有的品质。

由于廓尔喀入侵西藏而导致的西藏边疆地区的危机,也为清朝在用人制度方面忽视边疆大员的选拔使用敲响了警钟。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1792年10月12日),乾隆皇帝颁布谕旨指出:“向来大臣内才堪办事之人,多留京供职。其从前派往驻藏办事,多系中材谨饬之员。该大臣等前往居住,不过迁延岁月,冀图班满回京,是以藏中诸事,任听达赖喇嘛及噶布伦等率意径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并不预闻,是藏驻大臣竟成虚设。嗣后藏中诸事,皆当隶驻藏大臣管束料理。如遇出有噶布伦、商卓特巴、第巴,戴本等缺,皆应归驻藏大臣秉公拣放奏补。自当妥立章程,俾资经久。不得仍前任听达赖喇嘛、噶布伦等专擅,以致滋生弊端。”与这样的改革相配套就是,要在驻藏大臣的选择方面,使用优秀人才,从而确保对西藏地方的涨控和各项政策的贯彻⁵⁹。

驻藏大臣还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驾驭全局、主持一切的能力。乾隆皇帝反复说明自己使用和琳进藏办事,原来不过是因为其处事细心,而在实践中和琳所表现出的突出才能,逐渐让乾隆皇帝不断委以重任。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朕之用和琳,初不过因其人尚细心,遇事奋勉,是以派往。实不料其如此能事,朕深庆得人,国家得一好大臣,大功可易就也”⁶⁰。最后选定和琳担任驻藏大臣,处理驱除廓尔喀入侵、各项善后章程完善与执行的各项事务。乾隆五十七年是十一月丙申/元日(1792年12月14日),在考虑和琳之后的驻藏大臣人选时,乾隆皇帝想到的是刚担任库伦大臣七年、刚刚卸任休息的松筠,并谈到了为什么没有考虑担任驻藏帮办大臣的成德继承驻藏大臣的理由,即“成德才具,亦止可在藏帮办,不能总理一切”⁶¹。可见,驾驭全局的才能也是选择驻藏大臣十分重要的一个条件。

2. 驻藏大臣的主要职责和权力

和琳担任驻藏大臣是在西藏地方发生廓尔喀入侵及被驱除、清朝中央政府颁布“二十九条章程”并调整西藏地方管理体制之际,“二十九条章程”对他履行驻藏大臣职责的规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西藏地方一切权力由驻藏大臣操控,驻藏大臣办理西藏地方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平等,驻藏大臣负责督办西藏一切政务;噶伦及以下各级官吏及各高僧活佛均为属下,其任免、升迁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班禅负责;驻藏大臣负责西藏防务,统率绿营兵弁、指挥

操练地方军队,每年定期轮流巡察边界;稽察财政收支,督察地方司法、户口、差役;办理一切涉外事宜,主管对外贸易及铸造钱币;监督主持达赖班禅等高僧转世灵童掣签和坐床等。由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位活佛,均系出家之人,除了章程赋予驻藏大臣独揽的军事、财政和外交大权之外,事实上,驻藏大臣已经成为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

而和琳作为“二十九条章程”颁布后的首位驻藏大臣,其扮演怎样角色、发挥何等作用,同样对驻藏大臣履行职责具有一定的影响。和琳入藏之际,乾隆皇帝深知他信仰佛教,顾虑他因敬信佛教而不能恰当处理好与达赖喇嘛的关系,而影响到朝廷的治藏体制的建立。从事实来看,和琳经受了这一考验。他遇到涉及西藏地方重大决策,先征求达赖喇嘛和班禅的意见,在两大活佛主动让度决策权的情况下,他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定。从驻藏大臣制订与实施《钦定藏内二十九条章程》,处理违法活佛、规范活佛转世制度,划定边界、设立鄂博,练兵、加强边防,改良风俗、救济贫民,以及办理对外藩关系来看,他很好地行使了“钦定章程”赋予的权力,充分履行了西藏最高行政长官的职责。《卫藏通志》卷七“番目”门按语谓:西藏地方官员“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议定章程,并赏给顶戴,分隶职司,俱由驻藏大臣主持升调,其品级、考铨、选法,实与内地官阶无异”。卷九《镇抚》门按语谓“卫藏事务,向由商上自行经理,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钦定章程,一切大小事件,统归驻藏大臣办理,责任綦重”⁶²,反映的就是这一重大转变。

3. 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及噶厦政府的关系

在和琳驻藏时期,由于时值廓尔喀入侵西藏被驱逐之际,对于这一事件的发生,作为西藏地方政教首领的达赖喇嘛也有督责不严的责任,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达赖喇嘛用心于宗教,不谙世俗事务,于是,和琳新任之际,在就西藏重大问题征询达赖喇嘛意见时,达赖喇嘛主动放弃决策权,虽然是就处理对待廓尔喀而言的,但是,在涉及达赖喇嘛和班禅个人住锡地转换、乃至亲属违法问题等方面,驻藏大臣都有权裁决。按照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规定,驻藏大臣办理西藏地方事务,其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达赖喇嘛和班禅潜心于宗教,以及驻藏大臣握有西藏地方的军事、财政和外交大权,并负责向皇帝转奏达赖喇嘛、班禅的奏折,下传皇帝旨意,事实上,在和琳担任驻藏大臣时期,驻藏大臣的行政权力的影响要大于达赖喇嘛。而作为噶厦政府高级官员的噶伦等,其地位在驻藏大臣之下,这是钦定章程规定了的。在实践中,如划定边

界等重大活动中,噶伦均听命于驻藏大臣和琳,是其属下官员。

任用怎么样的驻藏大臣,其资历背景如何,都会在西藏地方上层产生影响。对此,连乾隆皇帝本人也有清晰认识,他曾言:“和琳系朕特派前往之人,又系大学士和珅胞弟,即达赖喇嘛亦必待和琳较优,是以该处番俗人众见和琳到彼,均知所惩劝。……鄂辉曾经获咎,若复在前奏事,不特伊心有所不安,众番见事权无所统摄,于公务转属无益。”所以,加恩赏给和琳都统衔,奏事名列鄂辉之前,“以资事权归一,呼应更灵”⁶³。

驻藏大臣熟悉西藏事务,甚至信仰佛教,对于办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是一大优势,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信仰和职责上的不协调问题。对此乾隆皇帝一直比较重视,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壬辰(1792年6月13日),乾隆皇帝就提醒刚到西藏办事的和琳,听说“和琳平素敬佛,此次到藏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自必照常瞻礼致敬,于佛法固当如此”。但是,由于过于谦逊便和所属无异,地位竟同噶伦一样。“鄂辉、和琳均系钦差大臣,除拜佛瞻礼之外,其办事原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⁶⁴要力矫积习,从而使事权归一,实现“抚御番民,永绥卫藏”目标。

通过两年多的实践,和琳很好地处理了信仰佛教、尊敬达赖喇嘛、班禅与履行驻藏大臣职责的关系。五十九年八月丙寅(1794年9月5日),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等,根据成德的奏折,“和琳办事甚妥,且见达赖喇嘛不行叩拜,达赖喇嘛惟命是听”。他认为和琳如此举动甚为得体。“现派松筠赴藏办事,伊系蒙古,素遵黄教,倘不知自重,恐将来办事仍虞掣肘。著传谕松筠,抵藏后接见达赖喇嘛等,不可叩拜,即使遵奉黄教,俟年满回京之日再行礼拜,亦无不可。”⁶⁵于此可见,处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关系的重要意义,以及当时的一般状况。

在涉及接待外番使者方面,驻藏大臣有责任提醒达赖喇嘛、班禅注意外交事宜。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就廓尔喀派遣其噶箕人等前往布达拉宫谢过,达赖喇嘛、班禅如何应对问题时,和琳建议必须“词严义正”,乾隆皇帝认为,这一点最为重要。同时提醒和琳转告达赖喇嘛、班禅,对廓尔喀贡使礼物“酌量收存,加倍酬给回赏,不可为廓尔喀所轻”⁶⁶。

4. 驻藏大臣在清朝中央对藏决策和落实中央对藏政策中的实际作用

按照规定,驻藏大臣只能转奏西藏地方实情,并贯彻皇帝旨意,但是实际情况是,西藏远在西南边陲,和内地往来沟通全依驻藏大臣的汇报,更多的情况下,

是驻藏大臣依据西藏的事情草拟相应对策呈报朝廷,由皇帝最终决定,或者交由朝廷大臣商议对策,最后由皇帝裁定。和琳以其细心认真而赢得了皇帝的信赖,从而也使他的诸多建议得到采纳,上升为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政策。

按照规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无权直接向皇帝奏呈折子,而只能通过驻藏大臣转奏,他们有关西藏问题的所有建议、意见和情况反映,都只能通过驻藏大臣这一个途径。因此,驻藏大臣在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之间的决策和执行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媒介角色。这种角色,可能会因为驻藏大臣的优秀和尽职而促成政令畅通、地方安定局面的出现,同时,也可能因为驻藏大臣的无能和无为而导致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关系紧张、地方各项事业废弛。从史书记载和实际情况来看,和琳显然属于前者。

乾隆皇帝在处理驻藏大臣的人选时,既意识到选择优秀人才的重要性,同时也注意到制度建设的特殊意义。乾隆五十八年(1793)七月,乾隆皇帝曾经谈到驻藏大臣对西藏地方局面的驾御,既要依赖可信的优秀人才,同时从长远来看,也要有制度保障,这就是对达赖喇嘛商上各项用度的稽查。“现在藏内值甫经整顿之后,是以仍留和琳在彼办理,以资驾驭,将来系松筠前往接办,亦属可信之人。但松筠亦不能久驻藏内,嗣后接手者岂能尽如伊二人之足资倚任?”解决的办法就是让驻藏大臣稽查商上用度形成制度,以后的继任者遵照执行⁶⁷。

〔注 释〕

- 1 昭槁,《嘯亭杂录》,卷九,北京,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1980,页287。
- 2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五,见《袁枚全集》第一册,页850,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 3 赵尔巽、柯绍忞等,《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和珅,附弟和琳,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册35,页107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上谕档》,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册16,页152—153。
- 4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西藏志·卫藏通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页382。
- 5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383;页392。
- 6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381—383。
- 7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〇三,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壬辰,《清实录》,册26,页852,北京,中华书局,1985。
- 8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392。

- 9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原目作方略”，页 381。
- 10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 381。
- 11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 385—386。
- 12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 391。
- 13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 413。
- 14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 421—422。
- 15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 433。
- 16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四），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页 776—821。
- 17 《卫藏通志》，卷十，钱法，页 327—328。
- 18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 413。
- 19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 417。
- 20 《卫藏通志》，卷五，页 265—266。
- 21 《卫藏通志》，卷五，页 269—270。
- 22 《卫藏通志》，卷五，页 270—272。
- 23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一，《清实录》，册 26，页 977；《卫藏通志》，卷二，页 187。
- 24 《卫藏通志》，卷二，页 188。
- 25 《卫藏通志》，卷二，页 193—194。
- 26 《卫藏通志》，卷二，页 194—195。
- 27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五七，《清实录》，册 27，页 428。
- 28 《卫藏通志》，卷八，兵制原目作番兵，页 303—309。
- 29 《卫藏通志》，卷八，番兵，页 310—311。
- 30 《卫藏通志》，卷十四上，抚恤下，页 495—496。
- 31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内部资料），拉萨，1985，页 120。
- 32 《卫藏通志》，卷十四上，抚恤下，页 497—498。
- 33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 395—396。
- 34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 395—396。
- 35 《清史稿》，列传卷一百十五，鄂辉，册 36，页 10901—10902。
- 36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 436—438。
- 37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〇五，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丙辰，《清实录》，册 26，页 8875—876。
- 38 和珅，《悼亡诗》，“希斋弟督军首疆受瘴而卒，痛悼之余，为輓词十五首”之一，见《嘉乐堂诗集》，嘉庆刻本，卷一，页 31b。
- 39 《清史稿》，列传卷一一七，福康安，册 36，页 10917—10918。
- 4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上谕档》，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册 16，页 561。

- 41 《卫藏通志》，卷十三中“纪略中”，页414。
- 42 《卫藏通志》，卷六“寺庙”，页279—280。
- 43 《清史稿》，列传，卷一六〇，和珅，附弟和琳，册35，页10757。
- 44 孙士毅，《百一山房赴藏诗集》，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页219，页242—243。
- 45 《卫藏通志》，卷九，页324。
- 46 和琳，“甲寅冬仲，余奉诏东旋，留别太庵四律，聊作骊歌一阕耳”，《芸香堂诗集》（上下卷），嘉庆刻本，卷下，页18a。
- 47 和宁（和瑛），“冬至月奉命以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充驻藏大臣恭纪”，《易简斋诗抄》四卷，道光三年刻本（四卷），卷一，页27b。
- 48 张羽新，《卫藏通志》作者是和宁，《清代治藏要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页434。
- 49 张羽新，《〈卫藏通志〉作者是和宁》，《清代治藏要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页435。
- 50 《清史稿》，列传卷一二九，松筠，册37，页11113—11114。
- 51 吴丰培，《卫藏通志著者考》，《西藏志·卫藏通志》，页568。
- 52 昭槁，《啸亭杂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09。
- 53 《清史稿》，列传卷一二九，松筠，册37，页11114。
- 54 张羽新，《〈卫藏通志〉作者是和宁》，《清代治藏要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页425。
- 55 张羽新，《〈卫藏通志〉作者是和宁》，页425—426。
- 56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五七，《清实录》，册27，页432。
- 57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四），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页1640。
- 58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七，《清实录》，册26，页766。
- 59 《卫藏通志》，卷九“镇抚”，页315。
- 60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〇五，《清实录》，册26，页875—876。
- 61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六，《清实录》，册26，页1046。
- 62 《卫藏通志》，卷九“镇抚”，页315。
- 63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〇五，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丙辰，《清实录》，册26，页875。
- 64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〇三，《清实录》，册26，页852。
- 65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五八，《清实录》，册27，页462—463。
- 66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四，《清实录》，册26，页1017。
- 67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二，《清实录》，册27，页142—143。

羈縻：18 世纪至 19 世纪初 清朝西北边疆政策制定的动态性

吴劳丽(L. J. NEWBY) 著

汤芸 译

引言

若要研究某位清朝官员,有很多文献可查,我们可以翻阅他的生平传记,或者还能找到他的笔记,我们也能研读他留下的众多奏章,以及他所流传下来的诗词歌赋,但即便我们能把这位官员的所有相关文献资料都读完,仍会发现在这些文献中几乎看不到他个人的想法与思考,他却依旧是一个谜,依旧是难以捉摸的陌生人。我们如何才能得以了解这些清朝官员?如何才能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世界,如何理解自身在其中的作用的?在清朝时期严格的职官监察体系以及自我监督机制中,清朝官员们的个性都被各种官衔所遮盖,我们或许永远无从真正了解他们,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对他们的研究,因为他们并非只是在王朝机制中的一个自动运作的环节,他们有自己的创见与看法,他们对职官系统中的既复杂又相互冲突的职责划分,并非毫无怨言。

边疆是一个着手探寻清朝官员的好地方。这里远离朝廷的注视,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加之此处的领土防守十分险要,官员们的决策常常无法等到朝廷的批示,因此边疆的清朝官员们或许能够也愿意显露出他们的真实本性。越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朝廷就越依赖于地方官员来实施政策并给出政策上的建议。不过,每个帝王都知道,也正是因为边疆是一个敏感地带,并且远离中心,因此牵制边疆官员,尤其是有能力的官员,是非常关键的。

清朝官员的命运是无常的,能在官路上一路畅通,不受到各种程度的责难甚至罢官的人是极少数的。他们的施政方式有多种,从“反应性的、监督性的以及督导性的”到“强制干预性的”¹,但都没有成功的秘籍。边疆官员们在一个职位上效力不过 3 年至 4 年,因此他们能影响主要的决策取决于中心和边缘的各种因素²。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这样一种平衡机制,即探讨在一种集权化的官僚体系中,中心与边缘间的相互牵制³。评判官员是与否,衡量政策得与失,都不是本文所关心的。

本文的探讨集中于新疆地区,尤其是其南部的阿勒特沙(六城),文章分析的展开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 18 世纪与 19 世纪,边疆与中心的权力关系是动态的,并在不断地改变。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基于对这一地区早期治理的分析,试图展现 18 世纪末,清朝廷,尤其是军机处,是如何建立与维持自己在新疆的治理的。这一过程逐渐扼杀了边疆官员的主动性,也成为后来的一些麻烦的滋生地。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时期的特点符合罗友枝(Evelyn Rawski)的论断——“18 世纪与 19 世纪之交的混乱,是 18 世纪所取得成功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⁴。这一时期也验证了另一些学者的观点,即尽管乾隆年间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与成就,但中国仍被旧有的结构所束缚;或许也正是这些成功与成就造成了这种束缚⁵。

本文的第二部分关注的是 19 世纪初期,此时的官僚体制改革以及西北边疆的不稳定,极大地影响了任职于新疆的官员的组成及其能力。在 19 世纪 20 年代至 1840 年的短短十多年间,中心的控制变得较为松散,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关于新疆南部边疆治理的政策讨论。朝廷广为征集任职于边疆的官员们的意见,从而让我们有难得的机会观察到一些官员的个人想法。官员们的观点当然各有不同,但这些观点的确表明了一种或一些新的治理边疆的理念。最后,通过分析 1828 至 1833 年任职于新疆的壁昌(?—1854)的奏章与文章,本部分试图从更丰富的细节来分析这些治理边疆的“新理念”。

一 懒惰的边疆

我……是历代王朝中的一个尽责的官员,任职于这一懒惰的边疆,坐等

告老还乡。我征集什一税及其他税款,治理着这片土地,确保驻军的供给,监管我们在此仅有的一些低品官员,监督商业,每周去两次衙门以料理事务。其他时间,我便看着日升日落,吃饭睡觉,这样也就满足了。我只希望,我过世后能在本朝的诏书上占据三行小字。除了安定与平静的生活,我别无他求。⁶

1760年,清政府征服阿勒特沙(六城),数月后,朝廷要求统计该地区各方面的情况与资料,包括各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每个城市及其辖区范围有多少伯克(地方官员),各地可供养多大规模的驻军,可征收多少税款等。清王朝计划在阿勒特沙(六城)驻军,将其建为一个军事基地,由该地区的官员控制当地日常事务,但中央对该地区的控制必须有赖于对当地资料的记录收集。许多曾积极参与到武力征讨之中的人,现已经熟悉了这一地区的地形与气候,他们被要求致力于调查与收集该地区的资料,并为新疆未来60年间的治理方案出谋划策⁷。这其中就有两个人——舒赫德(1710—1777)与阿桂(1717—1797),他们不仅在几个重要城市就职,还曾任伊犁将军,负责整个地区的治理。因此在离开新疆时,他们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关于这一地区的知识,这是他们同辈官员,以及许多他们的后辈所无法企及的。

尽管征讨显然导致了乾隆皇帝在诗词歌赋方面的热情⁸,但没有理由认为他已经对西北事务有了专门的知识,也不能认为他参与到了该地区政策的制定中⁹。这一时期,乾隆在关于新疆的奏章上的朱批,基本上只是简短的程式化的批注,而他给出详细评议的地方,也总只是批示宽恕忠诚者,严惩闹事者。不过,乾隆还是确保为他效力的人是参与过对这一地区的征讨,并参与了建立清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的人。18世纪60年代,兆惠(1708—1764)、富德(?—1776)、阿里衮(?—1769)等参与此次征讨的老兵,包括后来才参与的阿桂(1764—1765)¹⁰,都进了军机处,成为傅恒的手下¹¹。军机处是一个小规模精英团体,这些官员掌控着内廷,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以及实施是专制体系的一种延伸。

18世纪70年代,舒赫德回到京城,就任于军机处,直至三年后(1777)去世。1776年,阿桂二进军机处,直至1796年因健康问题离职。值得注意的是,这20

年间,阿桂还担任了 18 年的吏部尚书,甚至在乾隆皇帝的亲信和珅开始掌权时,他仍然任此职,未被罢官。阿桂能在政治斗争中幸免的一个原因,或许在于他早年进入军机处时,便时常离开京城很长一段时间¹²;不过,不在京城并不妨碍他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正如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所指出的,军机处标准的措辞都无懈可击,因而个人方面的影响很难断定¹³。不过,无须置疑的是,在 18 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间,阿桂的地位逐步上升,从士兵至地方官,直至成为军机处的大臣,他对新疆政策的影响因而要比其他人大得多¹⁴。

我们再来看看 19 世纪发生的大小和卓的叛乱。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清朝治理西部边疆的最初四十年是稳定的,这一结论既是基于对这一时期众多朝廷诏书中的惊人的细节的关注,也来自于对乾隆皇帝久负盛名的统治方式的认识。但军机处只负责国家主要的政策制定,并不关心日常事务;在边疆地区,其职权则体现于关心防卫,关注与相邻人民的关系,土地的开垦,殖民以及其他或大或小的被认为是威胁和平与稳定的因素的关注。由于与这段历史有一定时间上的距离,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职责区分的不明确是如何造就了边疆官员的惰性。但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勤奋的官员们,却非常仔细地审阅着边疆官员的奏章,反复核实细节,他们对边疆的认识完全依赖于边疆的高级官员们的奏章中所传达的信息。因此,在 18 世纪末的最后几十年,阿桂及朝廷中的其他官员并未觉察到,因而也无法阻止正慢慢滋生起来的腐败以及官员的失职,而这正是诱发 19 世纪的骚乱的因素。当然这些现象并非新疆所特有的,而是整个行政治理和军事管治体系衰落的一部分¹⁵。

自康熙年间起,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边疆地区的最高官员,通常是不允许由汉人充任¹⁶。1760 年,清朝廷决定在伊犁地区和阿勒特沙(六城)实行军事编制,两地官衔较高的职位(如将军、参赞大臣、边事大臣与提督等)必须由旗人(即满族,有时也可是蒙古族与汉军)来担任;甚至在乌鲁木齐及其以东等实行文官治理的地区,大部分官衔较高的官职也都是由满族人来担任的(即“定为满缺”)¹⁷。由于汉人被排除在高衔官职的选拔范围之外,而清王朝其他地区的治理也同样急需一些有边疆治理经验的满族高官,于是可为治理新疆所用的有才干的人数量骤减。除了仅有的一两个例外,19 世纪末就任于新疆的官员在官场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他们的一生也很少为子孙后代记载。当然,这并不能

证明他们全都是不称职的或腐败的,只是与随后任职于新疆的官员相比,他们的政绩的确太不突出。

关于任职于新疆的清朝官员的暴政的最早记录,随着1765年乌什叛乱而逐渐为人所知。众所周知,引发这一叛乱发生的原因,从官员的层面看,主要在于清朝驻乌什大臣素诚在这一地区的暴政。素诚勾结阿奇木伯克“阿不都拉,犯有敲诈勒索与虐待当地民众之罪”¹⁸。三年后,1768年,官员的暴行逆施,以及属下肆无忌惮地剥削罪犯,贱踏罪犯人格,导致昌吉发生罪犯的骚乱¹⁹。暴政的状况并未因骚乱而有所改善。18世纪70年代末,整个王朝的官员都越来越倾向实施暴政,在众多清朝高级官员的失职与腐败的例子中,高朴事件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高朴是清王朝任命的叶尔羌(今叶城)大臣,涉及走私玉石。这个案子不仅牵涉到当地的伯克,并且在走私的规模与玉石的重量上史无前例,但没有证据表明在高朴事件之后,清王朝曾经采取措施“整顿”阿勒特沙(六城)的官僚体系;相反,清王朝却在努力地限制对此案的调查²⁰。

如果说新疆骚乱的种子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萌芽,那么当时它们还被流沙所掩盖。阿桂于1796年退休,此时他调职军机处离开新疆已近30年。阿桂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797年,他的孙子那彦成进入军机处,但还未到新疆任过职。直到1804年,随着对托津的任命,军机处才召回了一名拥有该地区一手知识的官员。

和珅(1750—1799)集团的倒台与嘉庆年间的改革,给军机处带来了一阵变革的风气,新疆地区随后也逐渐感受到了这股风气。1815年对孜牙敦事件与图尔第事件的调查,以及松筠(1754—1835)在随后的再次查访都表明,内廷的官员们已经察觉到可能的失职与司法的不公正,并坚决地准备就这一地区进行细致公正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一些高级官员²¹。但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到,边疆官员仍能设法掩盖一些严重的暴政事件。腐败与懒惰最终结合在一起,并最终牢固地确立下来,以至于无法轻易根除。

1820年,被驱逐的大和卓波罗尼都的孙子张格尔(1790—1828),发动了对阿勒特沙(六城)第一次侵犯。尽管伊犁将军庆祥已尽全力减少内部的矛盾,但

他仍无法掩盖与消除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1822)的暴行逆施²²。并且暴政仍未终止。自征讨以来,清王朝权威的树立显然依赖于维持伯克或游牧部落的领袖对清王朝的友好态度。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这些地方领袖只要表示,哪怕只是稍稍表现得愿意合作,他们便会得到回报。然而,调查显示,当柯尔克孜首领苏兰奇竭力就张格尔的行动向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发出警告时,不仅未受重视,反倒遭到斥责,这使得他转而与张格尔结盟。整个事件及其随后镇压的方式,是边疆治理的一个主要的失败。显然,至 19 世纪早期,官员的暴行逆施在阿勒特沙(六城)不只是一两个偶然的例外事件,而是整个边疆治理过程崩溃的表现。

浩罕可汗自 18 世纪 60 年代起便为大小和卓和他们的后裔提供庇护,使得这一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浩罕可汗有长远的关于这一地区的经济规划(如果不算是领土性的规划的话)。随着清朝的军事力量的局限变得越发明显,浩罕国可汗便越发意识到自己在与清王朝的交涉中,态度可以开始变得更强硬一些。当然,浩罕可汗敢于持这种强硬态度,也是基于他对新疆危机的发展历程长期密切关注之上的。

清朝官员对边疆治理的漠视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阿勒特沙(六城),并受到翰林院学士洪亮吉(1746—1890)及其他文人的严厉批评。清王朝自 18 世纪 60 年代在阿勒特沙(六城)重建秩序以来,并未实行任何卓有成效的经济或社会改革,这逐渐滋长了一种不易从根本上改变的、腐败的与脆弱的治理体系。在征讨之后,除了一两个例外,被派往阿勒特沙(六城)就任的清朝官员的能力普遍逐步下降,并且当乾隆时期的高压政策在此地的影响逐渐减弱时,官员自身的弱点便暴露出来。同时,伯克们也变得越来越自信。清王朝先前曾制定系列措施,试图瓦解伯克所拥有的传统家族势力和地方势力的基础,但这些措施的执行并不坚决,至 19 世纪初,清王朝的权威已无法有效约束伯克们的势力。清王朝行政体系也并未尽力约束在这些地区的官员的行为,官员们于是越发残酷地压迫与剥削当地穆斯林民众。与负责清王朝在新疆的事务的官员们同时代的文人,魏源(1794—1857)于 19 世纪 30 年代末所写的这段文字,非常尖锐地指出,这一地区的官僚体系已经没落:

……及其久也,保举渐弛,多用侍卫及口外驻防。视换防为利藪,以瓜期为传舍,与所属司员章京,服食日用,无一不取于阿奇木伯克。伯克籍供官为名,斂派回户,日增月甚……又土产、毡裘、金玉、缎布赋外之赋,需索称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办事大臣,各城大臣不相统属,又距伊犁穹远,恃无稽察威福自出。而口外驻防笔帖式,更习情形,工搜括。甚至广渔回女,更番入直,奴使兽畜,而回民始怨。²³

这当然是以儒学的方式来给这次叛乱找到一个道德上的解释,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若未能理解到清王朝长期以来在对这一地区治理的不力,以及在清帝国边疆上的官员中的那种牢固的懒惰特性,任何将 1826 年张格尔入侵,及其夺取喀什、叶尔羌、英吉沙、和田四城的责任归结到当地民众的结论与分析都是不完整的。

二 一个新时代

第二支远征军列队出发时,将士们充满勇气,队伍中军旗飞扬,号声嘹亮,盔甲闪亮,马蹄欢腾,将士们决心踏平这片峡谷,扫荡峡谷中的野蛮人,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们一个永世难忘的教训。第二支队伍已经出发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朝廷再没有派出新的远征军,也没有他们任何消息。以往军队每天在广场上阅兵,展示马术,表演射击,这种令人兴奋的喧嚣,也早已随着远征军的出发而散去了。现在,空气中充斥着的是焦虑的谣言。有的谣言说,在上千里长的边疆上冲突已经全面爆发,北方的蛮夷与西部的蛮夷们勾搭在一起并已经组建了联军,清军的军队军力不足,无法将战线拉开;并且就在这些天,清军就要被迫放弃一些较远的哨所防守,以集中力量保护腹地²⁴。

1826 年 9 月,朝廷最终意识到了阿勒特沙(六城)局势危机,于是将长龄从伊犁调到此地,封为扬威将军,命其武力收复并重建阿勒特沙(六城)。于是,治理新疆的新时代开始了。

这一时代的背景是人们所熟知的。道光皇帝于 1821 年登基,任命曹振鏞(1755—1835)为军机处首辅,这标志着乾隆时期君主集权的治理方式最终过渡

到了道光时代的内阁政治模式。嘉庆年间对军机处的改革不仅确保了任职于军机处的大臣们(尤其是满族和蒙古族的)有更高的综合能力,而且也将军机大臣与皇帝的关系,以及军机处与其他官僚部门的关系规范化。这些改变也正好符合一些未任职于朝廷的文人想在政治舞台上发出声音的要求。于是,政治基础得以扩展,加之传统的文人—官员阶层的考官对门生的护佑,及考官之间、各门生之间以及考官与各门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都为活跃的反势力在政府中发挥更有影响力的作用开启了一条道路。曹振鏞自己也是宣南诗社的成员。宣南诗社于 1814 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是为了便于考生们与有名的考官翁方纲(1733—1818)建立联系并交换信息²⁵。但宣南诗社温和的反对声音很快被新一代文人更为尖锐的批评声所淹没,如龚自珍(1792—1841)及其他社团的成员们的批评。

与此同时,到 19 世纪 20 年代末,阿勒特沙(六城)的安全受到一系列挑战,也要求被派往西北的高级官员要比之前几十年在此就任的官员有更加显著的能力与才干。现任职于阿勒特沙(六城)的官员们与边疆的军队密切相关;他们的经历各有不同,他们对西北边疆危机的分析也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愿意就确保边疆的和平与安全的措施与政策主动给出意见,也愿意承担责任。此外,他们乐于以新的方式,甚至激进的方式思考问题。自 18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松筠、长龄(1758—1838)、玉麟(1766—1833)和那彦成(1763—1833)等人都任职于新疆。他们的官职与北部边疆紧密相关,但在同时期(那彦成要稍早些),他们也在军机处任职。他们比他们的前任们更愿意就制定政策等事务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提出一些主要的政策措施,这种积极性与主动性的源泉,一方面在于他们的资历与自信,另一方面也在于北京新的竞争性与开放性的政治氛围。

文人们关于阿勒特沙(六城)开源节流政策的观点得到很好的阐释与讨论,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已经就边疆官员们对此的争论进行了探讨²⁶。因此,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在这一时期就任于西北边疆的官员的观点显然是独立于那些文人以及朝廷中大多数官员之外的。不论是在开源节流、军队规模、殖民,还是在与浩罕的贸易上,边疆的官员们各自所采取措施,以及他们所给出的建议,都有所不同。然而,他们的一致之处在于,都认为有必要就边疆事务制定出一套全局性的方案,能将当地的人以及卡伦之外的政治环境的分析纳入其中,使之取代边疆

治理的传统模式。

西北官员并未对边疆的治理进行反思,这在阿桂的孙子那彦成的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由于主张撤兵将羁押在北京的张格尔叔父放归总辖西四城等原因,长龄失宠,与此同时,那彦成的强硬路线恰好符合朝廷的品味,而得到暂时的支持。这一政策有两个关键点:封闭边界与裁减军队,这两点不仅能避免放弃西四城,并且能节省军费,还能满足朝廷所不愿进一步疏远的文人们的要求。1828年,那彦成被封为钦差大臣,前往喀什噶尔,以恢复对边疆的治理。为实现他的基本政策目标,他需要开展一个综合其他动议的改革计划,需要对伯克系统进行检查,将柯尔克孜部落纳入他的边疆防守战略中。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计划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如果要成功,朝廷必须全盘接受他的计划,而不是只采纳与实施其中的某一些政策措施。但那彦成对边疆改革的单边措施,让朝廷担心实施他的改革可能会将清王朝带入另一个耗费巨大的战争;并且与此同时,那些主张实行一种更为温和与调解性的政策人的影响也显现出来。因此,那彦成到阿勒特沙(六城)就任不到一年,便被召回北京。但他仍密切关注于西北事态的发展,仍努力影响那里的政策。

1820至1835年的15年间,曹振鏞统管军机处。在这15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对外政策中采取一种中庸。他试图平衡两种主张,一个主张缓和与安抚的政治,另一个则提倡更为强硬的边疆政策,也不顾可能出现的军事对抗。前一个主张主要是由穆彰阿(1782—1856)及其同盟提出的。那彦成对放弃西四城的反对跟他在新疆任职有关,以及他坚决实施他自己认为是行动方针所必须的政策,导致他被过早地召回京城,这或许都可以被视为朝廷动态政治的表现。但本文的目的并非就某位官员所提出的一些具体政策的得失进行评判,而是关注于这样一个事实:19世纪初,自征讨以来,边疆官员们第一次试图控制边疆政策的制定,并努力将之引向一个新的方向,尽管这些尝试失败了。至19世纪40年代,朝廷处于忧患之中,改变新疆的机会与动力便不复存在了。

长龄、松筠、那彦成、玉麟等人无疑在西北政策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但在其他情境中,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对边疆的治理以及“边疆思维”做出了贡献,则需要对他们关于新疆以及其他边疆地区的奏章与文章进行进一步的梳理与分析,

才能给出答案。接下来,我将集中从壁昌(1778—1854)的文章中的信息,来分析这种“新思维”的出现。壁昌是蒙古人,属镶黄旗,他于 1828—1832 年任职于新疆。壁昌不及松筠、那彦成和长龄有名,研究他的人也不多。他从未进入军机处,在新疆的七年任期是他关于北部边疆仅有的经验,但他是和瑛(?—1821)的儿子。壁昌的父亲和瑛曾任职于新疆,也曾是军机处大臣。他编写了《回疆通志》与《三州辑略》,这使得研究新疆的人对他非常熟悉。在被任命为河南和直隶知府之前,壁昌是一名工部的笔帖式。1828 年,他陪同那彦成到新疆,并曾在叶尔羌、阿克苏、乌什和喀喇沙尔等地任参赞大臣、都统等官。1830 年,叶尔羌被浩罕人围困 80 天,作为叶尔羌办事大臣,他成功指挥了该城的防卫战。因此次战功,他后来担任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伊犁的参赞大臣。他官场生涯的最后几年,则是在与东部沿海防卫相关的两个官位上渡过的——即两江总督(统管今江苏、江西和安徽等地)及福州将军²⁷。

翻阅壁昌的文章,会发现他在语言、风格、内容与阐释方面都并无特别之处。当然他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同时代的人及后来的人也不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或军事家。然而我想说明的是,他的文章的确反映了一种关于边疆治理的独立思考的新方式,这在 19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开始显现出来,只是在 19 世纪中期,由于清朝受到更大的外来压力的逐渐增加而被掩盖与压抑。

这些事件戏剧性地塑造了壁昌的人生,他对这些事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解释模式的一种反映,这种解释也是他父亲所推动与传播的解释方式。这种“接受的智慧”也是值得再研究的,因为它正是壁昌和其他人所试图打破的传统思维方式。

根据壁昌自己的叙述,在清朝征讨之前,阿勒特沙(六城)是由准噶尔治理。在这一时期,突厥的穆斯林人经受着残酷压迫,奸淫虏掠时有发生,他们吃的是干硬的饼,睡的是稻草,他们将自己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都埋在地里藏起来。18 世纪,清朝皇帝派兵前来驱逐了准噶尔,并释放了大小和卓,但是阿勒特沙(六城)的穆斯林却叛乱了,因为他们对大小和卓崇拜且虔诚,但对于皇帝的恩典却并不领情。最初阿勒特沙(六城)的穆斯林民众一碰到一个中原之人就会

觉得担心,但后来,随着穆斯林人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他们开始将清朝的官员视为神一般,对之产生了一定的敬畏之情。清王朝的官僚体系为当地人提供了一种庇护,让人们安心地生活事耕,于是人们日渐变得富裕起来,人口规模也增长了。当地与内地之间的贸易来往也得到发展,当地人也能享用到中原的物品,如茶叶、大黄、丝绸、陶器及糖块等。但问题是:伯克们不懂得要爱护自己辖区内的民众,他们压迫民众,剥削民众的劳动力,他们敲诈勒索,将搜刮来的钱财放入自己的口袋,于是失去了民心。而安集延人(浩罕人)相信依赖和卓能解除自己的负担,于是煽动张格尔和卓攻打阿勒特沙(六城)并为其提供内应,六城中的四个城市失守。清军的增援到来后,迅速发起攻击夺回这些城市,俘获张格尔。浩罕人在将阿勒特沙(六城)洗劫一番后逃离²⁸。

这让我们回到了璧昌到达此地的前夕,在他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录中,我们突然接触到了他自己对这些事件的生动解释,在其中非常惊人地批评了之前的政策:

彼时若乘兵威,兴师问罪,浩罕时尚胆怯,亦必投诚,照旧通商。是罪首在张逆,不在浩罕也。八年善后,惟以严禁通商,治其生命,原欲其献出逆裔,款求再准进卡贸易,接办者不如法,以致结怨。²⁹

因此,可见在璧昌看来,清朝廷两年前提出的这些误导性的政策,是诱发这些事件的直接原因。1830年秋,玉素和卓(?—1835)召集浩罕人组建了一支据说有10,000人的军队准备攻打叶尔羌,璧昌得到消息后开始着手准备保卫叶尔羌。但当璧昌前往叶尔羌时,可用的只有20几门大炮与约1,200人,他知道自己无法坚持太久³⁰。

璧昌开始采取措施来进行防卫。首先,他允许所有的汉商以及从巴勒提、坎巨堤和巴达克山来的商人进入军营,并联合他们成为守卫叶尔羌的力量。然后他将自己的精力转向确保地方平民支持他抵抗即将到来的攻击,因为如果当地人倒向支持叛党,如果这座穆斯林城市失守,那么位于叶尔羌城西侧的军营也将沦陷。阿奇木伯克阿不都尔曼则负责组织穆斯林民众,并让他们相信支持帝国的军队是他们最好的选择。直至10月初,与阿克苏的联系中断,叶尔羌被孤立,

几天之内,浩罕人迅速发起进攻。据壁昌后来回忆,当时军营的气氛十分紧张。浩罕人攻入老城,砸坏军营周围的商店,汉商、巴达克山与克什米尔的商人奋起突围,迫使浩罕人的军队撤回穆斯林城市。城中有约 200 户他们的同族人都躲了起来,而当地的男人与女人则涌入街道,将这些入侵者赶走。有了这样一个由当地人与来自外地的商人所组成的坚固的团队共同对抗入侵者,壁昌和他的军队才得以成功地抵挡住浩罕人的反复进攻,直至 11 月增援军队到来,共同再次击溃浩罕人的军队。

如我们所料,壁昌是以一种非常标准的、不带感情的语气来描述他在这次围攻中的作用的,但很明显他是一个有着超凡魅力并且意志刚强的人,并且对领导心理学十分精通³¹。在喀什噶尔,穆斯林伯克与汉商人之间互相猜忌从而导致灾难,而叶尔羌的情况则不同,壁昌的策略则是首先建立穆斯林与清军及汉商之间的团结。为避免当地人与入侵者的联合,壁昌先利用伯克和阿訇先以威胁的方式让当地人不要响应入侵者,然后再设法让他们愿意和与他们有着同样信仰的人开战。具体的做法是让他们宗教领袖为他们说明,伊斯兰教义中无禁止剥夺生命,而汉经中也同样无禁止杀生——这样的比拟实际上明确地暗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人的利益是共通的,双方都有权力保护他们自己和家人的生命³²。

在围攻事件发生时,壁昌在阿勒特沙(六城)呆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但他对这一地区的安全问题的论断却早已明确指出:

……回性懦弱,比之以羊,八城八群也。吾辈司牧者也,恐守之不周,必须饲狗,其布鲁特狗也。群外之吠,是我藩篱。浩罕乃儿狼也,两次犯卡,得进羊群,饱食而归。狼多狗少,狗亦随狼,食羊大得滋味。今狗之空吠,亦不足深信矣。³³

鉴于自己在叶尔羌的经历,鉴于对救援军队未及时到达几乎导致叶尔羌失守的认识,壁昌认为危机时刻从内陆调派军队并非解决之道。在他详细的关于边疆城市防范攻击及守卫的方案中,他给出了极为细致的措施:从强调城墙必须加固,加高并拓展,以让商人能在城墙之内进行交易,到士兵的矛头应更长,以能刺穿敌人厚实的衣服³⁴。但壁昌相信,边疆的安全最终还是取决于当地官府的

好坏,因此,如同他之前的许多官员一样,他建议将税率合理化,减轻劳役,明确赏罚制度。他认为,一个好的官府应当是建立在对当地人的依靠上,应当能在保证地区的安全上充分调动当地人的积极性。因而,在叶尔羌的围困中,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民众团结在一起,不仅仅是解决危机的权宜之计,更是和平时一个好官府的基础和首要目标。璧昌强调应视地方民众为家庭的一部分并信任他们。他认为只有团结才能强大:

昔吐谷浑有子二十人,命各献一箭。取一而折之,取十九则不能折,此孤则易折,众则难摧。果能同心努力,何敌不克。又如同舟遇风,谁是局外者乎。今居同疆之中,彼众我寡,若连成一体,彼此相护,断无勾结外夷之心。³⁵

璧昌对团结的强调本身或许并未构成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但如果我们将它与其他人的观点与政策关联起来看,如那彦成的一体化的边疆政策的观念,松筠对地方民众福利的关注,以及玉麟对与外界通商重要性的坚持等,我们会看到,对边疆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并与朝廷仍在采用的传统模式与规则有着很大不同。首要的是,“新模式”认识到对清朝皇帝而言,单纯借助武力来使那些位于卡伦之外的人臣服是不够的;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在对边疆独特性的认识与理解的基础之上更具综合性的政策,需要认识与考虑到边疆民众的福利,也需要认识到这一地区的局限性,从而制定出能突破这些局限的政策来。

结 论

18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许多就任于军机处的高级官员们都已经拥有了广泛的关于西北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但也并非仅仅是从18世纪中期的军事战役中得到的。本文所要说明的是,在征讨之后,乾隆时期朝廷所颁布的丰富详细与有见地的诏令,反映了这些官员们关于这一地区的知识与兴趣。最初,来自中央的强烈控制在这些边疆地区非常有效,朝廷在阿勒特沙(六城)似乎并不急需一些特别有创见或者非常有才干的官员。但随着时间流逝,了解边疆的官员都离开了军机处,甚至连阿桂,这位唯一一位曾参与征讨战役的人,对新疆的情况也越来越陌生。此外,随着中心控制的放松,在官员体系中已经扎下根的官

员的惰性以及暴行逆施的后果便在这一地区突显出来。勿需怀疑的是,边疆官僚体系的衰落对于 1826 年张格尔之乱的发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朝廷为重建对阿勒特沙(六城)的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现在所急需的是派遣有着非凡才能的官员到边疆的这个角落中。这些官员中有的事实上是边疆官员的第二或第三代后代。他们自己也长期在北部边疆任职,也由此产生了对当地及其人民间的同情。同样重要的是,正是由于拥有对边疆的知识与技巧,他们认为需要发展出一种理性的边疆治理方法。他们认识到自己任职于北部边疆的时期,正是朝廷急需群策群力之时,自然会毫不迟疑地表达自己对安全与边疆治理关系的看法。因此,在 19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这一时期之中,阿勒特沙(六城)官员的文章与奏折都反映出了一种新的独立思考的方式,也让我们得以观察到这些官员不同的个人风格。然而,尽管这些个人为边疆的管理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清朝官僚体系的集权化本质让中心所承受的压力无法允许中心采取任何长期而彻底的改革,于是这些官员的专长也无从得以表现。至 19 世纪 40 年代,改革的机会不复存在,朝廷也不再愿意让其北部边疆官员影响边疆政策的制定。对这种权力重新回归到中央的后果的探讨,是本文篇幅所无法进行的,但可想而知,这些变迁影响了 19 世纪 60 年代的一些事件——包括清朝军队从新疆被驱逐出来,阿古柏伯克重新控制这一地区十余年。

〔注 释〕

- 1 Raymond Chu and William Saywell, 1994, pp. 11 - 12.
- 2 关于不同的官职通常的任期,参见齐清顺,1991,页 102—105。
- 3 使用“集权化的官僚体系”(centralized bureaucracy)一词,并不是要否认在帝国体系内地方官僚制度的多元性,而是要强调各省文武官员的权力与职位都是仰仗于朝廷的,朝廷可以在任何时候任免这些官员。
- 4 Evelyn Rawski, 2005, p. 38. 很感谢本文的匿名评阅者的意见,评阅者指出本文的探讨应参考彼得·甫杜(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中国西进),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的论文。甫杜指出,清帝国在对北方进行征讨之后,便开始走向没落。我觉得还应强调的是,当前的研究表明,西北边疆的治理并非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衰败。
- 5 戴逸,1993,页 1—35。转引自 Evelyn Rawski, 2005, pp. 38 - 39。
- 6 J. M. Coetzee J. M., repr. 2000, p. 8.

- 7 见《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1990，卷七〇，页6b—7b；卷七五，页38a—39b。
- 8 关于乾隆皇帝对在诗词歌赋方面的热情，见 Harold Kahn, 1971, pp. 10—11。
- 9 这正符合 Beatrice Bartlett 的论断：乾隆几乎不参与政策制订，当然这一论断也有争议。见 Bartlett Beatrice, 1991, p. 276。
- 10 刘统勋(1753—1773 年就任于军机处)或许也能算作其中一员，尽管他没有参加对新疆的征讨，但他曾担任陕甘总督，因而熟悉新疆的东部。
- 11 尽管傅恒自己并未在新疆任职，但他却负责编写了《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
- 12 见 Arthur Hummel, repr. 1964, vol. 1, pp. 6—8。
- 13 Beatrice Bartlett, 1991, p. 269。
- 14 关于阿桂在新疆就任时在政策制订方面的影响的探讨，见阿拉腾·奥其尔, 1996b; 及其 1996a, 页 35—41。
- 15 有大量作品都论述了这一衰败。如 Philip Kuhn, 1970, pp. 119—20, p. 214; Harold Kahn, 1971, pp. 256—257。
- 16 在 1688 年的一个诏书中，清皇帝明确规定只有满族才可担任户部尚书、刑部尚书、以及陕西与甘肃的总督和提督。见《大清汇典》，卷八, 1732, 页 2a—b。
- 17 齐清顺, 1991, 页 101—102。
- 18 阿桂是平定此次叛乱的统帅，他认为不必处决所有反叛者，但朝廷不同意，于是他被军机处所疏远。关于乌什叛乱的详细论述，参见 James Millward, 1999, pp. 124—125; 及 Laura Newby, 2005, p. 39, 第 60 注释。
- 19 王希隆, 1995, 页 49—53。
- 20 关于此案的详细论述，参见 Torbert, Preston, 1977, pp. 136—171。
- 21 孜牙敦被指控鼓动叛乱，图尔第也被指控为其同谋，两人后来都被判死刑。详细分析见 Laura Newby, 2005, pp. 73—94。
- 22 事实上，直至在数年后，在 1826 年间的一次对早期参赞大臣能力的考察中，斌静的暴行逆施才被真正揭示出来。
- 23 关于此时期对于阿勒特沙(六城)的腐败以及治理的没落的严厉谴责，见魏源，《圣武记》，卷四, 1842, 页 33b。
- 24 J. M. Coetzee, repr. 2000, p. 135。
- 25 见 James Polachek, 1992, p. 46, p. 303, 第 62 注释。
- 26 Laura Newby, 2005, pp. 112—6, 124ff.
- 27 就我所知，璧昌只主笔了四本著作：《叶尔羌守城纪略》、《守边辑要》、《兵武闻见录》和《牧令要诀》。《叶尔羌守城纪略》1848 年版的序言，他对这次围困进行了记述。虽然他的描述不及《扬州十日记》与《嘉定屠城纪略》等有名的对围攻战役的记录般有声有色，也没有丰富的社会细节，但作为一手的数据，他的记录仍有很大的价

值。这些著作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壁昌本人的途径。《守边辑要》(1839 年版的序言)也是基于壁昌在新疆的经历而写的,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所得出的经验与建议,对于边疆官员而言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兵武闻见录》和《牧令要诀》二书的序言,则是典型的官箴,是 18 世纪与 19 世纪所流行的官员的指南与手册。《兵武闻见录》是就军官而给出的建议;《牧令要诀》则是针对文官的。关于壁昌的生平,见《清史稿》,卷三六八,《列传》,卷一五五,页 11485—11486。

28 关于此事件的叙述,来自于《守边辑要》和《叶尔羌守城纪略》。

29 壁昌,1978(1839),页 5b—6a。

30 壁昌,1978(1848),页 2a。

31 关于喀什葛尔屠杀的详细叙述,见 James Millward, 1999, pp. 216—20。

32 壁昌,1978(1848),页 1b—2a。

33 壁昌,1978(1839),页 3a。

34 同上,页 12a—b。

35 同上,页 7a。吐谷浑让阿柴当任 4 世纪至 7 世纪时期居住于青海甘肃一带的吐谷浑人民的第一任统治者。有许多传说描述了他在临终前如何嘱托他的弟子继任他的位置,并让他的 20 个儿子与他的弟弟团结一致,不要争夺继位的权力。

参 考 文 献

阿拉腾·奥其尔(Altan Ochir)(a),《阿桂在新疆》,《西域研究》,1996 年第 2 期,页 35—41。

——,《清代伊犁将军论稿》(b),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Bartlett, Beatrice,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皇帝与宰相:中国清朝中期的军机处),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壁昌,《叶尔羌守城纪略》(1848 年序言),近代中国史料综刊辑编(重版),第五二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龄山,《守边辑要》(1839 序言),近代中国史料综刊辑编(重版),第五二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Chu, Raymond and Saywell, William, *Career Patterns in the Ch'ing Dynasty* (清朝时期的职官类型),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4.

Coetzee, J. M.,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等待蛮人), London, Vintage, repr. 2000.

戴逸,《十八世纪中国的成就局限与时代特征》,《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页1—35。

Hummel, Arthur W.,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1644—1912: 清朝时期显赫的汉人),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1944, Repr.,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1964.

Kahn, Harold, *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 Images and Reality in the Ch'ien-lung Reign* (皇帝眼中的帝制: 乾隆年间的景象与现实),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Kuhn, Philip (孔飞力),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Millward, James (米华健),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关外: 清朝时期中亚的经济、民族与帝国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Newby, Laura J., *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1760—1860* (皇帝与可汗: 1760—1860 年间清朝与浩罕的政治关系史), Leiden, Brill, 2005.

Perdue, Peter (彼得·甫杜),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中国西进),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olachek, James, *The Inner Opium War* (内部的鸦片战争),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齐清顺,《清代新疆官员的更换制度》,《西北史地》,1991年第1期,页101—102。

《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1768年),傅恒主编,共4卷,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再版。

Rawski, Evelyn, "The 'Prosperous Age'; China in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igns" ("康乾盛世": 康熙、雍正与乾隆时期的中国), in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中国: 1662—1795 年间的三位皇帝), London, 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05, pp. 22—40.

Torbert, Preston M., *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清朝内务府),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王希隆,《清前期昌吉遣犯起事考述》,《西北史地》,1991 年第 1 期,页 49—53。
魏源,《圣武记》(1842 年序言),共两卷(重版),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乡谊姻亲 同表共济

北宋晚期对广西的经略 ——以程节、程邻父子为中心的讨论

黄宽重 著

一 前言

相对于中国历史上汉唐盛世,宋代是一个武备疲弱不振的朝代。即使如此,宋朝在疆土的拓殖上仍有很大的进展,其中以东南的开发最为突出。西南地区则因为接邻的少数民族多,情况复杂多变,成绩不如东南地区;但自北宋中晚期以来,宋廷对广西实施镇抚兼施、军事侵略和政治经营交相并用的政策,获得实质的进展。广西遂由北宋的化外之地一变而为南宋西南门户。

宋史学界对广西的研究目前已获致相当丰硕的成果。其中,关于宋廷对少数民族政策、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以及经济的发展上,用力最深¹。南宋时代由于数据丰富,成果更为坚实。曾冠雄的《从化外到门户——论政权南移与南宋广西的发展》²及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³可为代表。

然而,由于西南边陲事务并非北宋朝廷关切的要务,相关记载较为缺乏。因此,除宋与交趾关系及王安石(1021—1086)等涉及宋廷对外政策有较多的资料及研究成果之外,关于北宋西南地区的开发与民族关系等议题,仍有探讨的空间。

自神宗熙宁(1068—1077)变法以来,新旧党人对内政的改革,意见固然相左,对外政策也迥然有异。因此,当主政者更迭,对外关系也随之变化。这种因政局变动,而涉及对外与边疆政策的更替,越到后来越趋明显。以广西为例,北

宋晚期,朝廷除延续前朝侵逼与羁縻交相为用的政策外,更可以真切地看到新旧党轮替执政后,对经略广西的极大差异。这种情况到哲宗、徽宗二朝,更为明显。

不过,如前所述,北宋一朝涉及广西的资料不多。像《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宋会要辑稿》二部重要史籍对宋廷在广西经略发展的情形所记甚少,哲宗(1085—1100)、徽宗(1100—1125)二朝,留存的资料更为缺乏,以致后人多认为广西的发展肇始于南宋。其实从南宋的记述与北宋晚年新旧党执政的变化中,仍可以看到当时开发与经营广西的痕迹,只是史籍向来忽视地方事务的记载,加上靖康之变(1126),文献散佚,遂难呈现广西发展面貌。

墓志数据正可以弥补这段历史记录的缺失。本文拟透过二位长期在广西担任最高长官的——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程节(?—1104)、程邻(?—1120)父子的生平事迹,与其在广西的作为,重建并讨论北宋晚期宋廷经营广西的实况,希望进而了解新旧党争与执政更迭对宋廷推动边疆政策的影响。程氏父子在广西任职前后近三十年,是北宋晚期开拓广西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可惜宋史无传,使他们二人的生平事迹无从得知,也使北宋晚期在广西经略这段历史几成空白。1991年出版的《江西出土墓志选编》中,收录了程氏父子及其夫人共四人的墓志铭,详细记录程氏父子在广西开拓经营的事迹,可以填补这一页历史记载。

本文希望透过搜集、整理这几件重要的墓志资料和宋代典籍,试图经由北宋晚期政局变动与政争情况及其对宋廷经略广西政策更迭的影响,检讨汉人拓殖对民族与文化所造成的冲击,以期掌握宋朝对西南地区,特别是广西拓展的样貌。

二 对外政策与边疆开发

北宋的国防重心与对外关系密切相扣。宋代的外患主要来自辽与西夏,为稳定北方,宋廷对西南边疆采取了宽待蛮夷、不生事端的安边弭兵政策。尤其在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出兵征交趾受挫后,宋廷在西南边防改行安宁保疆策略⁴,但后来也逐渐受到二种力量的挑战而需要调整,其一是交趾。交趾趁晚唐五代中原纷乱、政权更迭之际,逐渐疏离中国;赵宋建立政权之后,虽向宋朝贡,但以“内帝外臣”的模式,积极图谋自主独立,并趁宋北方多事,向北推动开疆拓土的政策,广西首当其冲。其二是民族冲突导致侬智高之叛。由于商业的发达,贸易往来及军事政治力的推动、移民的垦殖、交趾的招纳等诸多因素,使中原王

朝与原多为羁縻州的少数民族,有更多的互动与冲突。皇佑二年(1050),侬智高(1025—1055)据勿阳洞称叛,兴兵攻宋,是最大规模的变乱。侬智高率部席卷岭南各地,使宋南疆边防的空虚完全暴露。这二种情况在仁宗(1022—1063)时期都浮现出来,因而引发朝臣热烈讨论边务,认为原有的姑息羁縻政策,难于安边,需要积极面对,检讨因应,遂使原处帝国西南边陲,介于交趾与蛮部之中的广西,越发突显其重要性。

为了边防需要,加强军事部署,但北兵南调却衍生许多问题。宋廷为防交趾侵扰及蛮洞乱事,原派三万四千多人屯戍。侬智高乱起,宋廷发北兵踰万人戍守岭南⁵,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北兵共五万一千余人⁶。在变乱平息已久,仍驻屯这么多正规军,显示宋廷对西南边防仍存有隐忧。但正规军多属北人,驻守岭南瘴疠之区,不服水土,多致病而死。狄青为此曾建议“命彼处守土重臣,多方询察久谪彼地之人寿而健者,问其所以起居调摄之方,详稽备述,刻梓以颁士卒,每队伍中,选一人专司其事”⁷,但效果似乎有限,以致“每至岁满戍还,瘴死者十有三四”⁸。而且广西税收甚少,粮食无法供应军需,以致粮饷均由内地转输,增加宋廷的财政负担。况且防戍的北兵,以镇摄为职,期满轮调,对当地环境缺乏了解与掌握,反易造成军队与居民的紧张关系,对宋廷疏离。可见调兵防戍的方式,也不利于边防与统治政策的长期实施。

为了改善此一情势,自仁宗以来,宋臣在广西相继推动较积极的做法。像狄青(1008—1057)、文彦博(1006—1097)等人都先后提出建议,乃至具体推动团结土人及增置镇寨,以加强守御能力。狄青在奏章中建议“得善吏十数人,分置诸州,募土人为乡军,复其租调,视州大小、户多少为数,统以步伍,教以进退,皆以彼所长技,相与追逐”⁹,宋廷也以重金招揽人才¹⁰。不过,宋廷终究因疲于应付与辽、夏关系,无力兼顾西南边防,虽偶有积极作为,但事平之后,即归原状,对广西边陲之地,缺乏进取性的经营拓展策略¹¹。

三 神宗(1067—1085)对广西的经略

神宗即位后,为追求富国强兵,一改以往怯懦消极的对外政策,积极开拓边疆。在君臣合作下,一面加强军政革新,一面强化边区军力及开边政策¹²。不过,宋廷的四邻中以辽、夏最强,西、南两方较弱,因此,在应付外在形势变化时,须考虑自身的实力与现实环境,制定不同的策略与实施方式。总体而言,宋对辽

较为稳重,即使被人指为积极开边的王安石,在对辽外交政策上也显得理性而灵活,并非一意主战¹³。

但宋廷在对付西夏及西南诸夷,显然表现的更为积极。首先,为了钳制西夏经营河湟地区,自种谔取绥州之后,韩绛取银州,王韶更在王安石嘱意下开熙河。其后,沈括(1031—1095)、徐禧(1043—1082)等人相继拓展西北¹⁴。对西南边疆也以拓垦的方式积极向羁縻州推进。如章惇(1035—1106)开五溪、熊本(?—1091)用兵泸、渝等地,对荆湖广南之地,展开大规模开边行动,以武力将羁縻州改置为州县,遂行直接统治,并谋透过寨堡的设置,作为建立军事拓展的据点,而以教化来推展汉人文化价值,扩大赵宋王朝在西南边疆的政治影响力。司马光(1019—1086)曾指出:“神宗继统,材雄气英,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武、河西陷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¹⁵从中国对疆土扩展的角度看,神宗一连串对西南开边的作为,对两湖、两广的开发具有历史意义。

神宗对广西的经略与武力拓殖,除了要彰显变法图强的决心,更直接的因素,是防止侬智高之乱重演及解决交趾不断北上发展的危机,也就是改变仁宗朝推动的安边弭兵政策,积极在广西建立一个缓冲的藩篱¹⁶。

神宗自即位之初,便有“纲纪海内,鞭撻四夷之志”¹⁷,对交趾扰边造成边界的不安,深为不满。他认为“交州”小丑无不可取之理。因此积极接纳来归蛮部,奖励归化,封酋长为归明官,更任命被仁宗罢黜的萧注(1013—1073)、石鉴等人经略岭南、广源附近之地,争取族群的支持,阻止交趾的蚕食¹⁸。由于萧注的驻防经营有成,宋在西南边防趋于稳定。此后,神宗对广西渐采进取之策。熙宁六年(1073)正月任命曾任陕西转运使、度支副使的沈起(1017—1088)为天章阁待制知桂州兼广西经略使,取代熟悉民情风俗,对交趾动静有充分掌握而采持重安边政策的萧注¹⁹。神宗更换边帅,“密经制交趾事,诸公皆不与闻”,有关广西边事,沈起得依陕西四路的方式,只需申经略司专委处置,又可主动差人出界外了解边情,剥夺了原广南西路转运司与闻边事的权力,“凡所奏请皆报听”²⁰。沈起的任用,宣示了宋廷对交趾政策的转变,神宗谋以战争的方式,完成对交趾的统一,因此也开启了经略广西的新页。

沈起任职后,在广西采取了几项积极作为。一是派官深入蛮界巡历,招谕蛮部,入峒点检教阅兵甲,组织保甲,团结溪峒,如遣澧州司法参军谢延甫,深入融、辰州溪峒,转运判官杜璞巡历邕州左、右江溪峒,并以组织邕州五十一溪峒丁

排成保甲,派官教阅²¹。二是辟地建寨。沈起在招谕蛮夷之后,将之籍为省民,并补蛮酋为职官,纳入宋廷统治范畴。为了便于统摄管理,进一步建置州县城寨。沈起在熙宁六年(1073)十一月即希望“于新地内创建五七寨,大者屯兵六七百人,小者三五百人”²²。遂于融、宜州疆界置城寨²³。三是招纳交趾臣民²⁴。沈起听从都巡检薛举之议,擅纳交趾逃民依善美等六百余人,请任为归明官。依善美的隶属身份相当复杂,沈起认为他们所居是宋地,被交趾侵取,遭赋役诛求,因而请求归宋,沈起将之改为恩情州。但交趾王李干德(1072—1127年在位),却认为他们是交趾定边州人,移住恩情州后逃入宋七源州,故要求遣还。宋廷纳依善美,引起交趾不满,遂有纵兵进犯宋地之举;加上先前沈起派安抚都监刘初领兵到正诚州,置城寨,开道路,引发蛮夷不满²⁵。上述事势的发展,显示沈起的开边作为,有为宋燃起战火之虞。在广西转运使张觐的检举下,熙宁七年(1074)三月,神宗有意以在泸州经划夷事有成的熊本,取代沈起。但王安石等人认为广西情势紧急,泸州距离太远,建议由知虔州刘彝(1017—1086)就近替代。于是,神宗以沈起“于南方干赏妄作,引惹蛮事;若不早为平治,则必滋长,为中国巨患。”将他调知潭州,改任刘彝知桂州²⁶。

刘彝继任后,仍持续沈起强硬的开边政策。神宗对南方边政虽然较前朝积极,但为避免因交趾的冲突,引爆四边烽火,希望藉刘彝的安抚以缓和边事;不料刘彝妄意宋廷有攻取交趾之谋,接任之后,急于立功,积极派遣官员进入溪峒,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阵图,要求定期练习,禁止沿边州县与交趾贸易,命督塩运的舟师于沿海习水战²⁷。同时,建议宋廷招纳依智会,以断绝交趾买马路,作为邕州的屏障,共抗交趾,以固边圉。此一作法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正面支持²⁸。不过,刘彝一连串积极性的作为,引起广西蛮夷溪峒的骚动。知邕州苏缄探知交趾亟谋兴兵,函请刘彝停止挑衅行为,以免挑起战端,彝不听,反责缄沮坏大事。刘彝的举措引起交趾的不安,乃于八年(1075)十一月号称集结八万兵丁,进犯钦、廉州,陷之²⁹。旋即破邕州的太平、永平、迁陆、古万四个要塞,苏缄率郡兵士卒二千八百人死守邕州四十二日,援兵不至,城破,士民死伤五万余人;连同钦、廉之地,宋人死者十余万人³⁰。交趾谋进一步寇桂州,岭南诸州告急,宋廷震动,改任邕人石鉴知桂州,石鉴与广南西路转运判官周沃与蔡烨等人共同追究刘彝之罪。熙宁九年(1076)二月,责沈起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岛安置,刘彝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均州团练使,随州安置³¹。

交趾兴兵入寇,迫使宋廷采取更积极的攻伐策略。刘彝引惹事端固然造成

宋与交趾反目相向的主因,但交趾经常招纳沿边各部,使边境日无安宁。宋廷为了抑制交趾的侵犯,于熙宁八年(1075)十二月下诏讨伐交趾,成立安南道行营马步都总管、本道经略招讨司,任命赵鼎(1027—1091)和李宪(1042—1092)为正、副使,同时调集河北、广东、江西、福建、夔州等路土丁、效用赴广西³²。熙宁九年(1076)二月,改任判太原府郭逵(1022—1088)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招讨使兼荆湖广南路宣抚使,赵鼎为副使³³。神宗谕令赵鼎以重兵威临溪峒,“选募精劲土人1,000、2,000人,择枭将领之,以胁峒丁,谕以大兵将至,从我者赏,不从者杀。若果不从,即诛三两族。兵威既立,先胁右江,然后胁左江。此等既归顺,则攻刘纪巢穴不难也”³⁴。并令于平定交州日,依内地列置州县³⁵。宋兵分由水陆二路进攻交趾,陆路从邕州到左右江、横山寨等进兵,而以杨从先为安南道行营战棹都监,谋由海道深入其西南隅,捣其空虚³⁶。从这些举措显示,神宗是要以水陆并进、二面包抄的方式,遏止交趾的进犯。

然而,广源州的刘纪与杨光偕等,尚挟持两端,成为宋攻伐交趾的绊脚石,辽廷也乘机邀索。神宗为避免两面受制,要求郭逵尽速行动“亟期殄灭,以尊强华夏,使边隅自此稍知敛戢”³⁷。郭逵积极在左右江州峒的要害处立寨栅,追集强壮溪峒,轮番训练,与正兵合力备御³⁸。宋廷也担心将溪峒之地改置郡县的政策,导致“美利悉归公上”,引起蛮部抗拒,要求郭逵对蛮夷“与其所利,诱之以爵赏,迫之以诛戮”³⁹,以恩威并济的方式争取蛮部的支持。同时为了缓和因战争征调民力,引起反弹或加重宋廷的负担,宋廷下令钦廉二州须籍用民力的部分,只在本州岛任役,不必搬运军需粮草⁴⁰。建城立寨之后,分兵戍守,要求只领部分打弩手,在要害处驻扎,不必派驻军马供应钱粮,以免“缀留大兵,有妨南讨,害国重计”⁴¹。

宋廷以武力为后盾,以利益招诱的措施,获得各地州峒支持,军捷屡传。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宋将燕达率兵由太平寨攻广源州,迫降刘纪⁴²,进兵富良江,交趾兵大败,“蹙入于江者不可胜数,江水为之三日不流。斩首数千级,杀伪大将洪真,禽左郎将阮根。”⁴³交趾领兵逆击,宋军未能突破富良江防线,遂退回广源州⁴⁴。但此次举兵,也使交趾战力受挫。李干德遂奉表乞降,纳苏、茂、思琅、门谅、广源五州之地,并归还所掠子女。宋将也以军食且尽,十万大兵及二十万运夫,冒暑涉瘴,死亡过半,存者皆病瘁,无力再战而班师⁴⁵。宋与交趾终归于和。

战后,宋为稳定西南形势,将广源州改为顺州,筑城,任知邕州陶弼知顺州。

为便于防守,宋廷准用熙、河、沅州沿边之例,配罪人为牢城军⁴⁶,并专置顺州等地坑冶的机构,命官负责⁴⁷。不过,广西之地毕竟位处瘴疠,宋廷出兵交趾及建置州县的过程中,官兵既困于水土不服,也在开发过程中,因争夺地方利益,引起反弹。另一方面,交趾仍争取的广源之地,虽已设州,但地远难治,戍兵重费,加重财政负担⁴⁸。神宗遂于熙宁十年(1077)七月要求赵鼎、李平一、苗时中(?—1091)等人共同检讨分析广源州经营及固守之道⁴⁹。此时,宋臣反战之议频起,而交趾李干德于元丰元年(1078)上表请复修职责,划疆界、贡方物、不侵犯,及赐还广源、机榔等州县⁵⁰。宋朝廷以交趾在富良江之役元气大伤,已无力再犯边,而且“顺州所筑堡寨,深在贼境,馈运阻绝,戍卒死者,十常八九,不如弃之”⁵¹。为了维持南方边境的安宁,以便全力应付北方,元丰二年(1079)冬十月戊申,交趾归还所掠宋民,宋廷废顺州,以其地畀交趾⁵²。为了避免冲突,宋廷迁徙原参与战争的边臣、投靠宋的边民及酋长,乃至可能勾结的边境部族⁵³。此后,宋与交趾之间,除了偶有划地等小规模冲突外,关系相当稳定。而在划界谈判中已意谓宋朝放弃了神宗对交趾郡县而治之的统一计划。事实上,承认了交趾的独立地位。

四 哲宗朝对广西的经略与开发——以程节为中心

神宗晚期南方军情虽趋稳定,但先前为抑制交趾入寇,筹备及发动战争的过程,均需对广西边防有所调整。王安石即指出邕州所辖两江溪峒是邕州的藩篱,更是二广恃以为安的长城,以往由于宋廷不能善用溪峒之人,以致交趾兵围邕州四十余日而不能解。建议建城壁、辟道路及善用溪峒之酋,团结系籍丁壮⁵⁴。不过,加强军备,设立城寨,供应粮饷,结团溪峒壮丁,羁縻或讨伐蛮部的作法,固然使宋廷的统治力得以深入西南边陲,却直接面对复杂多元、叛服无常的蛮部,而先前为了对付交趾所部署的战力,以胜利为要务,在战时紧急处置下,许多作为都是权宜性的,非长久之策。一旦战争结束,边境趋于稳固,则如何有效统治新纳入的土地,或进而扩张成果,作为巩固边防的基础,这是战后宋廷所要面临和作为的。

然而,对广西的积极开发是利是弊,具有高度的争议性。加上推动积极开边政策的王安石,是将它与变法改革的设计联结在一起的,虽然得到神宗的支持,得以积极推动,却遭到反对派强烈的批评。苏轼在元祐元年(1086)三月即指出

“熙宁(1068—1077)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生隙四夷。王韶(1030—1081)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安南”⁵⁵。张方平也认为熙宁战争是可痛心之事,主张回归宋太祖“列之外蕃”,才是宋廷长警远御之术⁵⁶。宋廷在广西的经略,是国防政策中重要的环节,自然也随着人事的改变而更易;王安石罢相以后,历哲宗、徽宗二朝,是新旧党轮流执政,党争愈趋激烈的时期,在此情况下,宋廷对广西的经营,一方面呈现了与神宗战时体制、紧急权宜性的作为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更呈现了时而积极,时而消极,政策摇摆的现象。因此,也出现在边地实际执行者与中央决策者政策不同调,其所冒政治风险大,以及成果难以持久的窘境。

现存宋代史籍对哲宗与徽宗二朝在对广西经略的记载相当有限,使研究者对这一时期宋廷经略事迹的了解不足。幸好江西出土二件程节、程邻父子的墓志数据,使我们对北宋晚期宋廷在广西经营的变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程节、程邻父子是江西浮梁人,其先世约在五代时由徽州移居饶浮梁。大约以渔业产销致富,而成为地方大姓。程节的父亲程暹积极鼓励程节与程筠二兄弟读书进取。这时,德兴富室张潜,为了让子弟专心举业,特别搜集万卷图书,建立图书室,设置学舍,延聘名师倪天隐任教;除了自家小孩外,也招纳乡里中有潜力的青年学子,如彭汝砺(1041—1095)、熊本、刘正夫(1062—1117)以及程节等人,与其子弟一起受业。这种聚集乡里子弟共读的机缘,不仅对程节兄弟的仕途崛起和家族发展有关键性的影响,也让这些年龄相近的举子建立了良好情谊,为他们未来在仕途发展,建立了强固的关系,甚至缔结婚姻。程节与熊本的仕途机缘,就建立在同乡同学的情谊上⁵⁷。

程节是嘉祐八年(1063)中进士,时年三十一岁。中举后,先任临江军司法等官,熙宁初年,荆广察访使任命他为义宁县令,倚他招谕广西诸蛮。他首创桑江寨,在知武冈县时,劝使酋首杨光僭率众请降。后以亲老请求离开广西。到元丰五年(1082),广西安化蛮叛,杀宜州守王奇、将官费万,岭南震动。神宗改命在泸州平息罗晏之夷叛,在谕州平定南川獠人木斗之叛有功,而且为王安石所欣赏的熊本,以龙图阁待制知桂州⁵⁸。熊本有意以武力作后盾,来稳定广西局势。基于情谊,及程节对广西情势的掌握,乃辟他为管勾机宜文字,协助处理宜州蛮犯等事,这是程节在广西开创事业的开始。

熊本上任后,鉴于先前临时性的作为无法长久,亟谋长治之道。他明斥候、严禁约,戒边吏勿生事,劳问溪峒酋长,练土兵取代正规军,增加买马以足骑兵,

以威抑制兴讼的土酋,恩威并用,终能平息乱事。如宜州戍兵掳降酋至桂州,要求归屯湖南,熊本以武力镇服,使桂州乱事消弭。当时,宋与交趾的疆界未明,交趾狙于小胜,谋乘宜州之叛,拟取侬智会所守勿阳之地,乃兴兵逐侬智会,熊本添兵屯驻,并责问安南,交趾请罪。宋臣以新建的顺州深入境外,不易守,熊本请以隘外宿桑八洞不毛之地给交趾,使岭表无兵祸⁵⁹。

程节积极任事,不仅协助熊本怀柔蛮夷,稳定广西的政情,更为自己在广西的仕途发展奠下基础。先是,沈起以都怀失守,屠杀士兵。宋廷以前车之鉴,命熊本善处两江事;熊本委程节措置,终能稳定两江情势。元丰七年(1084)五月,宋廷以程节招纳浔、融、王江的溪峒蛮,及开辟道路,置驿站有功,改为朝散郎⁶⁰。八月,程节又受命招纳王江一带,自大湓口以上接连檀溪诸蛮。当时荆湖相度公事孙览建议宋廷筑一堡寨以备守御。程节则认为建城寨须派兵驻守,不如由沿江及中心岭,各治道路渐进,先置堡铺,留兵丁以防抄截粮道,为久安之计。程节的意见被宋廷接纳,于是受命措置融州,由左右两江打通湖南北飞山十州的道路,以备军情之需。但所经都是蛮夷之地,程节遂以轻骑到蛮夷境上,说明宋廷怀柔远人之意,诸酋顿首纳款,将土地户口归于朝廷,从此桂、融、道、徽等数百里道路相通。程节在广西的作为,颇获神宗的肯定,认为他是奇才⁶¹,旋即被任命为广南西路转运判官。奉旨进筑四堡寨,置佛寺,设学校,使蛮部习知礼法,鼓励解辫,袭冠带等华夏之风⁶²。显然程节在广西的工作,除了镇摄蛮部外,还辟建道路、堡寨等,都是以宋廷深入蛮夷的统治权为出发点。而置设学校、寺院,则以推动中原汉文化的教化为主,这些举措已然走出了军事统治的阴影,而是为久远的政治统治奠定基础。

不过,程节在广西的作为,随着王安石罢相和神宗逝世而有了很大的变化。哲宗即位之初,高皇太后摄政,任用司马光为相,反对新党积极开边的政策,熊本以划捐八洞给交趾,被夺官⁶³,程节改任湖北转运判官,离开广西。此时,荆湖蛮人叛服不常,时时入犯汉地,帅臣采消极退缩之策,程节先威后怀的建议,不被接受。次年八月,渠阳蛮入寇,宋廷仍无积极作为,沿边局势纷扰,其后,罗家蛮叛乱,枢密院虽指示程节申奏对策,并要求他在渠阳筑寨及协助措置蛮事⁶⁴,及时遏止了变乱,但他积极镇边的主张,仍并不为当政者所接受。宋廷甚至改调程节为江西转运判官、江淮等路提点坑冶铸钱、京东路提点刑狱公事等职,远离边境事务。总之,在元佑旧党执政期间,鉴于前朝积极开边,造成宋与蛮部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加宋廷的财务负担,改采安抚退缩的政策;原来推动积极开边的官员

或帅臣,相继被罢或调职。程节自追随熊本,参与边事以来的主张与作为,既与当道不合,被调离经营西南边疆的职务,自然难以发挥他在边政上的长才。

及至哲宗亲政,程节重返广西,缔造事业的颠峰。元佑八年(1093)十月,哲宗亲政,力主绍述之说,意在绍复熙宁新政,主张改革的新党再度获用。绍圣元年(1094),程节被任为朝奉大夫、广南西路计度转运副使,再回到两广任职⁶⁵。他知道广西地瘠民贫,主张审慎处理刑狱,不该违道以干誉,以奉承董劝,察奸慝,以裕生计为主⁶⁶。由于勇以任事,元符元年(1097)被擢为朝散大夫直秘阁,权知桂州兼经略安抚使⁶⁷,是宋廷在广西政策的最高执行者。

程节在广西任职前后十一年,对稳定边防,加强宋廷的统治权,成绩颇为卓越。他以外严守备,内兴教化为施政主轴。这时广西的邕、宜等州,地多瘴疠,缘边的羁縻州峒达六七十处,“险峻隐蔽”,远来的正规军既不熟悉地理环境,也无法适应当地的水土,难以有效维护治安,需要当地土人捍御乡土。程节深知此一状况,为谋有效维护边疆安宁,乃于闲暇时召见当地土著、酋长,拔擢黄忱和岑利强二位对宋忠诚的蛮酋为归明官。不久,安化蛮聚集龙城下,意在剽掠。程节遣黄忱预防,二年春,安化三州一镇的蛮夷,结集了八千多人在卸甲岭、吴村、蒙家寨等地作乱,黄忱领兵丁近三千人平乱,杀了近六百人,俘获酋首蒙光有等,蛮兵大败,夺到牛羊器械三万余⁶⁸。在程节的招抚下,又有三万余蛮人乞降。于是,复筑四堡寨旧城,率领将士进至古融,夷人老幼拜服。

战争结束之后,程节进一步将所有驿铺道路都加以整治,三路进筑,强化了宋廷在广西的统治能力。此外,更招抚蛮部,推动汉化;他积极在蛮部因俗设教,推动儒学教化,使宋与交趾息兵之后,广西地方开发及风俗民情有很大的改变,以至辖境的土民说:“天子留程公以绥远方,吾曹慎勿为恶。”交趾的使人也说:“我众何敢舍耕渔之乐,以利兵毒矢伺为害,得全命洞穴,皆程公赐也。”⁶⁹这都是程节在广西任职前后十一年的成果。因此,为他写墓志的程遵彦盛赞他“因俗设教,督属郡外,严边备,除戎器,阅兵马,号令肃然。内邵农安富,丰财恤贫。兴学校,礼师儒”。所述不免过于夸饰,却也反映他的行事作为和成效。徽宗即位后,任程节为朝请大夫直龙图阁权知桂州,充广南西路兵马都辖兼经略安抚上护军,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是他权位最高的时候。不过长期经营边陲,处置军戎,体力与精神耗费巨大,遂于崇宁三年(1104)辞世,享年七十二岁。

五 徽宗朝对广西的经营——以程邻为中心

接续程节为宋经营广西而有成的,正是他的儿子程邻。程邻字钦之,生于熙宁三年(1070),是程节的次子。他以任子恩补太庙斋郎,弱冠试太学,曾获乡试第一,表现优异。绍圣元年(1094)程节由户部员外郎改任广南西路计度转运副使时,邻为永州司户参军。徽宗即位,程节任知桂州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再奏辟邻以知延安府司录参军,充广西经略安抚使司管勾书写机宜文字⁷⁰,正式追随其父参与经营广西边务。当时,蔡京掌政,亟欲复熙丰鼎新之规,进行积极拓边策略,程邻参与其父筑桂州义宁县桑江等寨,以控扼蛮部,颇有成效,他的才能也受到肯定。崇宁元年(1102)与三年(1104)相继丁其母沈氏及父程节之忧。

不久,宋廷为便于统治新纳蛮地,即以程邻出任新设黔南路长官。当安化三州一镇顺服之后,广西经略安抚司奏请将该地析为溪、叙、驯、乐四州⁷¹。宋廷为加强对广西的控制,于大观元年(1107)十二月,分融州和平州,加上观州、柳州、宜州等新拓羁縻州,设置黔南路。以程邻久历岭南事务,熟悉该地环境,乃授他为宣义郎,提举黔南坑冶。溪叙四州境界划定之后,宋廷拟派遣宽厚有威望又得蛮部信服的官员,宣谕宋廷的德意,徽宗即命邻出任。大观二年(1108),程邻以三州一镇户口六万一千上报朝廷,顺利完成使命;宋廷正式任命程邻知融州兼黔南路马步军总管,兼经略安抚使。蛮人寇围观州,邻遣将授以方略,击溃蛮人,守住观州城。其后,宋廷评估增设新的路级行政区,会加重财政负担,决议罢黔南路,将其所属州县还隶广南西路。程邻改任知永州、知夔州等职,虽离开广西,仍与蛮部有关。二年之后,回任广西,为知桂州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⁷²。程节、邻父子二代相继担任广西帅臣,为时人所称道。

程邻承继其父在广西的作风,以筑寨驻兵与主动攻击来压制诸蛮。当时诸蛮中以南丹酋长莫公晟最为凶悍,附近蛮部都十分畏服,莫公晟怨广西帅臣王祖道(?—1108)听州都巡检刘惟忠之议,诬杀其兄莫公佞,并改南丹州为观州,乃谋联合诸蛮内犯,作为报复。程邻命岑利强守观州。由于程氏父子镇守南疆,威名在外,诸蛮无所获,乃相继派其子弟、部众叩边纳款。程邻为稳固时局,又听从黄忱之议,奏请宋廷增筑高峰寨⁷³,驻重兵,以堵南丹州的咽喉,使南丹州不敢逾寨,寇犯省地。此外,距桂州险远的安化蛮最为桀骜不驯,程邻担心地远难遥制,亲率兵,出其不意围攻之。乐州之役,宋军兵力单弱,邻多张旗帜以疑敌,蛮部望

风起疑,宋军整队而行,斩首数百,夺得万余器械,班师而回。一连串的强势作为,使邕州右江广大地区的诸蛮都向宋归服。

政和三年(1113),宋廷任命程邻为集贤殿修撰知桂州,行经略安抚司事⁷⁴。邻莅任后,平海南黎人及陆家寨蛮之乱,颁布宋廷的政和新乐予交趾。他主张“彼以诚来,当以诚应”⁷⁵。命蛮酋广州观察使黄璘办理,招纳右江诸蛮,由忠州团练使李坦领军负责招抚工作。从政和四年(1114)冬至次年春,“凡所录州、县、镇、洞、村、团、隘共一千三百七处,丁口五十七万四千一百余人,鼎收赋金谷毡马等物,每岁各以一千六百有奇为定式”⁷⁶。分建隆、兑二州,设置安江、金斗、凤怜、朝天、思王五寨,“井邑、居舍、城隍、楼櫓,不淹时,悉完具”、“沟池浚清、充实府库、开设学校”⁷⁷,为记录此一盛事,特别勒石“大宋建筑隆兑州记”,并向朝廷进表。这时他的官职为朝奉郎,充集贤殿修撰权知桂州军州管勾学事兼管内劝农事,充广南西路兵马都铃辖,兼本路安抚管勾经略司公事,借紫金鱼袋,可说集军政民政大权于一身,也是他一生事业的颠峰。

由于程邻长年在岭南从事抚谕与镇压的工作,深入蛮区,感染瘴气致病,上表请求回乡疗治。政和五年(1115)八月,宋廷改命他为提举杭州洞霄宫。不久,湖北沅州蛮杀守臣张建侯,宋廷以邻长于兵戎,匆忙间召他再领荆南,以经制其事。他带病上任,终能救平蛮乱。政和七年(1117),宋廷命他为右文殿修撰知广州,兼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宋廷为倚重他的声望,镇守岭南,相继奖励他昔日守广西的功迹,如以隆、兑建州,转两官,改朝请郎。叙海南功,加朝奉大夫,磨勘转朝散、朝请大夫。在广逾年,以病再请宫观。宣和二年(1120)卒,享年五十岁。

程邻的子侄辈,也都参与广西经营工作。他的侄儿程杲,自幼丧父,是在程邻妻子陈氏照顾下成长,以荫入仕,被辟担任广西帅府的幕僚,杲擅长书法,政和五年,建隆、兑二州碑记时,他负责篆额。程邻的长子程升,也以荫入仕,大观三年(1109),宋廷以程邻抚谕安化蛮归顺有功,改叙程升官职。次子程昇(?—1116),政和年间(1111—1117)任广西书写机宜文字,五年,昇衔父命奉隆、兑图籍赴临安入奏,中途因病卒于荆门。可见程邻的子侄在他担任广西经略安抚使期间,都追随他任随从机要的工作,职务并不高。由于程邻英年早逝,加上宋廷因联金灭辽所引发一连串军事冲突,北方局势紧张,无暇顾及南方,不久又有靖康之难,政权南迁的惨剧,当然便无力经营广西。因之,在广西发展的程邻子孙辈,很快的在历史上消声匿迹。

徽宗一朝,宋廷在广西的经营是在宋与交趾关系缓和后展开的。程邻也是在蔡京积极开边的政策下,追随其父程节的模式,以武力为后盾,积极招纳蛮夷,开拓疆土。宋廷谋加强对边陲的统治,程邻扮演先锋的角色,招抚安化三州一镇的蛮部,纳入王土。宋廷因之增设黔南路,任邻为经略安抚使。后虽罢黔南路,但邻随即出任知桂州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以军事的优势和羁縻的手段,将邕州右江广大的蛮地纳为版图,而增隆、兑二州,这是北宋经略广西最盛时期,而他对交趾的态度,也反映自熙宁战争以来,宋廷改以推动经济交往呈现朝贡贸易政策为主轴的基调⁷⁸。可惜宋廷内部党派争斗不断,对外政策屡变,缺乏一贯性,使负责边防重任的帅臣动辄得咎,难以遵行。加上程邻英年早逝,都使得宋廷对广西的经营成效难以展现。

当然,程邻积极开边的作为,是配合当时新党执政的政策,但由于政争及政局变化,使宋廷开边政策瞬息万变,也使得后人对程邻在广西的作为,评价不一。宋室南迁后,为重建统治权,高宗曾派朝臣至各路宣谕,并掌握政情;负责宣谕广西的明橐,对程邻的开边作为,采取批判态度。他在《请罢岭南西路平、观二州奏》中,批评由高峰寨改置的观州,岁费钱一万二千九百余贯,米八千八百七十七石,“州无税租、户籍,皆仰给邻郡,飞挽涉险阻,或遇蛮寇设伏,阴发毒矢,中人辄死。人畏贼,悉委弃道路,纵然达州,糜费亦不可胜计”。而由王江砦改置的平州,岁费钱一万四千四百十八贯六百文,米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州无租赋、户籍,转运司岁移桂、融、象、柳之粟,以给之”。并说平州的存设是程邻受到边吏沈季垣的欺骗,使得“百姓有征戍转输之苦,诚为可悯”,因此建议罢平、观州⁷⁹。此议到绍兴四年(1134)九月被宋廷接受,“废观州为高峰寨,平州为王口寨”⁸⁰。不过到次年七月,又因边吏指出废州之后,提刑转运司不究边防利害,“邻路盗贼未息,深虑诸蛮观望,结集作祸”,建议依旧存留。于是宋廷听从广西经略使李弥大之议,于“二寨各置都巡检使兼提举诸堡寨盗贼公事,益戍兵各五百人”⁸¹。从这个角度看,程邻设置州的行政区,仍有它为维护边境治安以及宋廷的统治权的考虑。如果进一步从南宋在西南边疆的发展,以及晚宋对抗蒙古的历程看来,程节、程邻父子的政策若有延续,宋廷在广西的情势更具优势。

此外,程氏父子在桂州执政期间,也有许多文化建设和文化活动。现存《粤西金石略》即留下如建湘南楼、程公岩等石刻资料,其中有程氏父子兴筑工事,夸耀事功之举,也有关于二人与士人属僚游赏赋诗的记事活动,及称颂二人政绩伟业的记录。这些文教记事后来曾招致讥评,如南宋梁安世(1136—?)就有诗:

“宣政喜边功,隆兑筑□□,程公自名岩,刻石记所建,得既不偿费,中兴弃不缮,诞漫磨崖辞”⁸²,批评程氏父子浮夸事功之风。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活动却也体现宋朝由军事转向政治统治,及落实文化活动的变化。

六 结语

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拓展有多种途径,武力征服是其中之一,另外就是从风俗文化的改变着手。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两种途径,都有其正、负面的影响与评价。从汉文化的发展与扩大的角度看,以武力征伐,不仅扩大疆域,开发新的地区,借着教化的手段,更让大汉文化得以深入异民族,扩大主流文化的影响力。不过,以武力为后盾,强势推销主流价值,对弱势民族与文化则是一项摧残与破坏。因此,我们在讨论宋朝的开边政策或程氏父子经略广西的方式时,并不宜过度宣扬其价值。

宋朝中国对西南,尤其是广西的拓展状况和成绩,显然与其政策有密切关系。辽夏长期压力,使宋廷穷于应付,只好对西南采取羁縻安抚的策略。但交趾的独立与北向发展,以及移民所造成的民族冲突,对宋的南疆形成潜在的威胁,须设法遏止;于是,位处边境的广西,成为宋廷推动经略政策的场域。在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在广西采积极开边政策下,宋廷加强对广西的经略,其目的即在阻遏交趾独立运动与北上发展,进而扭转列之外蕃的消极御边政策,以达到统一交趾的目的。因此,经营即带有浓厚的军事统治色彩,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冲突乃至战争。这种军事性扩张的举措,又引起朝臣的批评。其后随着神宗和王安石的主导性消失、交趾的威胁减少,宋廷也打消统一交趾的企图。为了长期稳固边疆,宋廷在广西改行长期统治的策略,程节、程邻父子躬逢其盛,为宋廷在广西执行拓边任务。二人任事,以武力为后盾,积极开疆拓土,推动教化,谋由长久性的经营,稳固统治。不过二人在广西任职期间,正值新旧党交替执政、政争激烈、政策骤变的时期,不但使二人的作为常遭批评,职务常遭调动,更使宋廷拓边的政策难于落实,绩效无法持续,一直到宋室南渡之后,才又有比较积极的经营。因此,从这一个角度看来,程氏父子在广西经略的成效并不彰显;不过,他们从军事转向民政的执行策略,却为南宋经营广西以及广西的开发,奠下基础。

就程氏家族而言,程节、程邻父子的墓志铭透露了家族崛起兴衰的重要讯息。程氏父子二代在广西经营前后达三十年,不仅是北宋广西经略的极致,对二

人而言,也是仕途发展的最高峰。获致这样的荣耀,固然与程氏父子的卓越领导才能有关,但与二人特殊的际遇更为密切。程节考进士后,因新党的核心份子熊本延揽而到广西任职,更在新党开边的政策下出任帅臣,展现文人领兵的才能。这种由文臣领兵的现象,是宋代重文轻武国策的体现,自范仲淹以来,更成为常例。然而,程邻非进士出身,以荫补的身份,追随其父经略广西,而能以事功获任高官,则是较特殊的例子。以恩荫补官是宋代对高官优待的一种政策,不过,在承平时期,以恩荫出仕者通常不易获致高位。然而,像广西这么偏远的地区,一般文官不愿出任,正好为荫补者缔造崛起仕途的空间,也让他们有发挥军事领导才能的机会。从程节子孙辈在广西任职及程邻的杰出表现,都说明这种特殊的际遇,为个人及家族创造兴盛的机会;但由于时局的转变,宋对广西经略中辍,程氏族人失去表现的舞台,加上在重文政策下,以荫任官者在仕途发展上终难与科第出身者相比,遂使程氏家族日益消寂。程氏父子经略广西的作为,也在朝廷政策摇摆下,无以为继,甚至受到批评,加上《宋史》无传,程氏父子生平与作为,遂未留下记录。从这点看来,程氏父子二代四人的墓志铭虽不免有隐恶扬善、夸大失实之处,但可以透析人物的生平事迹、人际关系、家族发展,乃至填补史籍记载不足或失误,而成为了解时局变动及社会发展很好的材料,正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源。

〔注 释〕

- 1 如:陈伟明,《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1期,页20—31;吴永章,《论宋代广西羁縻州制》,《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2期,页44—53;张雄,《宋代广西左江羁縻州概说》,《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页5—10;覃成号,《宋代南丹蛮、抚水蛮、环州蛮之社会形态》,《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21期,页87—91;日本学者河原正博,《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84;陈冠文,《宋代广西汉壮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4期,页68—71。
- 2 曾冠雄,《从化外到门户——论政权南移与南宋广西的发展》,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6月。
- 3 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大陆杂志》卷八八,第1期,台北,大陆杂志社,页7—19;卷一八八,第2期,页14—17;卷八八,第3期,页15—27。
- 4 黄纯艳,《宋朝对交趾和占城的政策——以朝贡贸易为中心》,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第十届海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6年8月25—26日,

页 17。

- 5 狄青,《论御南蛮奏》,收录于汪森,《粤西文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页 19 上一—20 上。
- 6 文彦博,《奏减广南东西路戍兵》,《粤西文载》卷四,页 21 上一—22 上。
- 7 汪森,《粤西文载》卷四,页 20 下。
- 8 文彦博,《奏减广南东西路戍兵》,收录于汪森,《粤西文载》卷四,页 21 下。
- 9 文彦博,《奏减广南东西路戍兵》,收录于汪森,《粤西文载》卷四,页 19 上下。
- 10 汤佩津,《北宋的南进政策——以交趾为中心》,台湾嘉义,中正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 9 月,页 94—97。
- 11 关于宋仁宗时代宋与交趾之关系之变化,参见黄纯艳,《宋朝对交趾和占城的政策——以朝贡贸易为中心》,页 17—20。
- 12 汤佩津,《北宋的南进政策——以交趾为中心》,页 145—149。
- 13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 年 7 月初版,第六章,页 131—167。
- 14 安国楼,《宋朝周边民族政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 8 月初版,第二章,页 23—24。
- 1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己丑,页 8689。
- 16 汤佩津,《北宋的南进政策——以交趾为中心》,页 158。
- 17 苏辙著,曾枣庄等点校,《栾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四七,页 1032,《进御集表》。
- 18 汤佩津,《北宋的南进政策——以交趾为中心》,页 158—159。
- 19 《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四月戊寅,页 5933。
- 20 《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四月戊寅,页 5933。
- 21 《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四月壬辰,页 5939;《长编》,卷二四六,熙宁六年八月丁亥,页 5993;《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九月乙亥,页 6021。
- 22 《长编》,卷二四八,页 6059。
- 23 《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丁酉,页 6639。
- 24 《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十月丙申,页 6031。
- 25 《长编》,卷二六四,熙宁八年五月,页 6479。
- 26 《长编》,卷二五一,页 6108。
- 27 《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丁酉,页 6639。
- 28 《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乙未,页 6425。
- 29 《长编》,卷二七一,页 6639—6640。

- 30 《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页6638；《长编》，卷272，熙宁九年正月，页6664。
- 31 《长编》，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二月庚寅，页6676。
- 32 黄纯艳，《宋朝对交趾和占城的政策——以朝贡贸易为中心》，页22。
- 33 《长编》，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二月戊子，页6674。
- 34 《长编》，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二月辛丑，页6683。
- 35 《长编》，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二月甲寅，页6689。
- 36 《长编》，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三月癸未，页6697；卷二七六，熙宁九年六月辛丑，页6748；汤佩津，页175—176。
- 37 《长编》，卷二七六，熙宁九年六月壬子，页6753。
- 38 《长编》，卷二六五，熙宁九年五月，页6725。
- 39 《长编》，卷二七七，熙宁九年七月己未，页6767。
- 40 《长编》，卷二七七，熙宁九年七月癸亥，页6769。
- 41 《长编》，卷二七七，熙宁九年七月，页6771。
- 42 《长编》，卷二七九，熙宁九年十二月癸卯，页6831。
- 43 范祖禹，《范太史集》（四库全书本），卷四〇，《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页16上。
- 44 参见黄纯艳，《宋朝对交趾和占城的政策——以朝贡贸易为中心》，页23。
- 45 《长编》，卷二七九，熙宁九年十二月癸卯，页6844。
- 46 《长编》，卷二八〇，熙宁十年正月己卯，页6886、6867。
- 47 《长编》，卷二八〇，熙宁十年正月己卯，页6856；《长编》，卷二八一，熙宁十年三月，页6883。
- 48 汤佩津，《北宋的南进政策——以交趾为中心》，页180—189。
- 49 《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秋七月庚午，页6938。
- 50 《长编》，卷二八七，元丰元年正月乙卯，页7011。
- 51 《长编》，卷三〇〇，元丰二年冬十月戊申，页7310。苗时中奏。
- 52 《长编》，卷三〇〇，元丰二年冬十月，页7310。
- 53 汤佩津，《北宋的南进政策——以交趾为中心》，页189—191。
- 54 王安石，《论邕管事宜》，《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上海，中华书局，1934，卷一三九七，《广西总部艺文一》。本文不见于《王安石文集》。
- 55 《长编》，卷三七三，元佑元年三月己卯，页9027。
- 56 张方平，《乐全集》（四库全书本），卷二六，《论事讨论岭南利害九事》，页4上。
- 57 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6年6月，第参篇第一章，《乡望与仕望》，页205—206。

- 58 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页62,《熊本墓志》。
- 59 《熊本墓志》,见《江西出土墓志选编》,页63。
- 60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影印,1976年初版,以下简称《宋会要》,页5—89,《蛮夷》。
- 61 《程节墓志》,见《江西出土墓志选编》,页77。
- 62 《程节墓志》,见《江西出土墓志选编》,页75。
- 63 《熊本墓志》,见《江西出土墓志选编》,页64。
- 64 《长编》,卷四一八,页1下。
- 65 参见谢启昆,《粤西金石略》(清嘉庆六年铜鼓亭刊本),卷四,第4册,页228。
- 66 《程节墓志》,见《江西出土墓志选编》,页75。
- 67 《长编》,卷四九六,元符元年三月乙亥,页11812。《宋会要》选举33之2。作知潭州,误。
- 68 宋廷为此奖励有功人员,见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卷五,第4册,页233,《崇宁癸未奖谕勅书》。
- 69 《程节墓志》,见《江西出土墓志选编》,页76。
- 70 《程节妻沈氏墓志》,见《江西出土墓志选编》,页80。
- 71 参见脱脱,《宋史》,鼎文书局点校本,台北,鼎文书局,1978,卷二十,《徽宗本记》上,页379;卷九十,《地理志》六,页2239。感谢匿名审查人提供修正意见。
- 72 《程邻墓志铭》,见《江西出土墓志选编》,页100;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卷六,页3上。
- 73 汪森,《粤西文载》,卷四,页24上下。
- 74 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卷六,页9下—10上;《宋会要》,选举33之28。
- 75 《程邻墓志铭》,见《江西出土墓志选编》,页101。
- 76 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卷六,页10上。
- 77 《程邻墓志铭》,见《江西出土墓志选编》,页101。
- 78 黄纯艳,《宋朝对交趾和占城的政策——以朝贡贸易为中心》,页24。
- 79 汪森,《粤西文载》,卷四,页23下—26上。
- 80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八十,页6上。
- 8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一,页21下—22上。
- 82 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卷九,第4册,页267。

论郑芝龙与明清王朝权利互动之关系

李国强 著

郑芝龙是中国海疆史上具有传奇式的人物。学界已经有一些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深入解读这一历史人物,无疑是十分有益的。本文力图通过对历史上中国边疆官吏与中央王朝权利互动关系的研究,从更深的层面考察郑芝龙在中国海疆史上的独特地位。

一 郑芝龙的两元性——商人与海盗的个性意识

郑芝龙无疑是明、清两朝交替之际中国海疆史上最为显赫和最为特殊的人物。之所以显赫,是因为郑芝龙以其过人的智商,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之所以特殊,是因为郑芝龙以其超人的胆识,成为中国海上叱咤风云的海盗。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集商人与海盗为一身的郑芝龙。与其说时代造就了郑芝龙,不如说郑芝龙代表了一个时代更为直接。

郑芝龙(1604—1661),明福建南安石井人,号飞虹,字飞黄,小字一官。石井为闽南渔村,郑芝龙从小习海事。儿时,家庭生计艰难。十八岁时,偕其弟郑芝虎、郑芝豹到澳门,投靠其舅父黄程学习经商。黄程是个海商,在澳门从事海外贸易。郑芝龙在黄程身边做帮手,协助商务。

郑芝龙俊秀奇伟,智勇双全,音律歌舞,雅有文才。在商业竞争和海上贸易的角逐中日益显现和施展出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在澳门时,多与葡萄牙人打交道,因而深受其影响,郑芝龙接受天主教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Nicholas),外国人称他尼古拉·一官(Nicholas Iguan),之后他经常往来于东南亚各地。

因有一批白糖、奇楠、麝香、鹿皮附泉州海商李旦船载往日本,黄程派郑芝龙随往。郑芝龙随李旦到日本后,寄身其门下,“以父事之”。李旦,泉州人,居日

本平户。他资本雄厚,拥有一支船队,专门从事海外贸易,是当地华侨的首领。李旦过世后,郑芝龙继承他的海商事业,于1623年接收李旦的船队,继续从事海外贸易活动¹。但因日本施行锁国政策,遂于1624年与同党颜思齐将基地从日本正式迁到台湾笨港(今北港附近)。

郑芝龙从事海外贸易,主要是同日本通商。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与《平户荷兰馆日志》记录:崇祯四年(1631)郑芝龙两艘商船从日本长崎载货物返航泉州安海。崇祯十二年(1639)驶往长崎的郑芝龙商船多达数十艘。崇祯十三年(1640)郑芝龙的两艘商船满载黄白生丝及纱绦、绸缎等货物,运往日本。另据《长崎荷兰商船日志》记录,从1641—1643年(崇祯十四至十六年)间,郑芝龙运载大量生丝、各类纺织品、黑白砂糖及麝香、土茯苓等药物,运往日本,颇受欢迎。

郑芝龙通晓葡萄牙、荷兰等五国语言,为其经商海陆中外,掌控浙闽粤海洋贸易,提供了极大便利。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建立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郑芝龙致力于发展海上贸易,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国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商业贸易的最强竞争对手。

正是由于具备非凡的商业才智,郑芝龙海上贸易的足迹遍布日本及南洋,并迅速积累了财富,其家产富可敌国,其拥海船万艘巨舰三千,堪称一代船王。

1624年,郑芝龙与颜思齐等从日本航海到台湾,建立海上活动基地,着力开拓了台南以北到嘉义附近沿海地区,并筑十个寨。颜思齐死后,郑芝龙被推举为首领。当时,郑芝龙的根据地三门湾蛇蟠岛齐聚了中国海盗的主力,包括东海枭雄“海盗祖师”孙恩、“蟹民先祖”卢循、“浙东海精”方国珍、“净海王”王直。家庭殷富与长期的经商生涯,使郑芝龙意识到,要维护其海上贸易的“霸主”地位和既得利益,就必须首先维护自身的强势地位;而强势地位的存在需要雄厚的资金为支撑。为此,他不断扩大船队、充实武装力量,开展亦商亦盗的活动。

此后不久,荷兰人登岛,驱逐了以台湾岛为基地的日籍海盗,郑芝龙遂携妻子定居于大陆沿岸离岛,以劫掠为生,并成为当时福建沿海实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号称横行于闽海。

郑芝龙的一生注定与中国海疆紧密相关,当商人与海盗双重身份集于一身

时,我们不难看出郑芝龙个性的两元性:一方面是商人性格,审时度势,灵活善变,四海为家,冒险犯难,投机钻营,精于计算,惟利是图,处世务实;另外一方面是“海盗”性格,拥兵自重,独霸一方,擅行海上,肆意劫掠。亦商亦盗的两元性,似乎有天壤之别的感觉,但是,当我们审视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时,恰好找到了破解之钥。

明清时期以来,中国海商在东南沿海十分活跃,在海上与欧洲、日本、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商人展开商业竞逐,明代东南沿海出现了徽商、倭寇、海盗与海外贸易的复杂关系。著名学者叶显恩教授指出,16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全球范围内海上探险和殖民扩张,海盗掳掠和合法贸易与时俱进,贸易就是掳掠,掳掠也是贸易。文明与野蛮相结合,这也是中国海盗的特点。以世界视野和发展眼光评判明代海盗、倭寇,既要看到其消极野蛮一面,也要看到它推动经济发展,适应世界潮流一面。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的海盗与走私、贸易之关系,实在是难分难解²。正是通过走私贸易,郑芝龙不仅成为富甲一方的财富大亨,而且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牢牢控制。

二 郑芝龙的选择——徘徊于现实与权利之间

郑芝龙的一生跨明清两朝,其政治生涯与明清时代的时局变化相随相伴。郑芝龙先后受命于明(包括南明)、清两朝,其目的性是如此明确,商人的“追本逐利”的本性在其间表现地淋漓尽致。维护其海上贸易利益的最大化,似乎是郑芝龙的终极目标,为此,他可以置“名节”于不顾,置官位大小而不计。正由于商业利益至上的思想左右了郑芝龙,使他在政治上宛如一个懵懂的少年,沿着极端“务实”的轨道并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郑芝龙被明清两朝委以官职,在仕途上,郑芝龙企图“权”、“利”并收。其权在于代表朝廷打击其他“海盗”,打击荷兰人;其利在于在明清两朝“海禁”政策下,获得海上贸易的垄断性权利并使其地位合法,以维护其海上贸易的利益和独霸地位。这一指导思想几乎贯穿于郑芝龙的整个政治生涯。

郑芝龙的人生经历中,先后有三次受命于朝廷:

第一次,1625年末,专心经营自己“海盗”事业的郑芝龙,在短短数月间,其船队即扩大至千艘以上的规模,在对明政府的海防造成很大困扰的同时,他与荷兰人保持着友好关系,这种局面持续到崇祯元年(1628)。是年九月,郑芝龙接

受了巡抚熊文灿的招抚,被授为游击将军,负责福建海防³,从此由“海盗”变成了“官员”。

崇祯元年接受招降以后,郑芝龙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是打击同行业的竞争对手,兼并其他海商集团,发展为最大的海上势力,从而实现了垄断中国东南海域海上贸易的目的。崇祯元年九月,郑芝龙的原合作伙伴李魁奇因对利益分配不满而另起炉灶。次年,郑芝龙和卢毓英对李进行追捕,从城仔湾直追至澳洋,最终消灭了李魁奇并且吞并了他遗留下来的军事力量。不久,又陆续消灭杨六、杨七、钟斌、刘香等海商集团,他们的船只与资财全部被用来扩大郑氏的势力。

在对内大力清除各海商和海盗势力的同时,郑芝龙不失时机地对外扩张势力。1630年郑芝龙得到普特曼的支持,夺回了一年失去的厦门,1633年7月遭荷兰人突袭,舰队受到重大打击,但此后仅仅一个月就重新集结队伍,击败了荷兰人。在1635年消灭刘香集团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郑氏家族成为福建邻近海域的主人,所谓“海上从此太平,往来各国皆飞黄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⁴。

郑芝龙受抚后逐个消灭海上诸雄,又数次挫败荷兰殖民者对东南沿海之进犯,将台、澎地区置于控制之下,因功晋为福建总兵。之后不久,福建省内发生旱灾,郑芝龙遂出资招募漳泉之民,大举移民台湾,以巨船载饥民数万殖民台湾,他给予每位移民“三金一牛”的资助,令他们自行拓殖,不仅解决了福建沿海饥民的就食问题,又开垦了台湾的大片荒地,一时间引发了向台湾岛移民的浪潮。当时的台湾岛为荷兰人所统治,荷兰人在岛内修筑安平、赤嵌两城,但驻防近两千余人,而大陆移民却多达数万,荷兰人无力治理全岛,城外便成为郑芝龙的天下,郑芝龙因此成为台湾田产最大的拥有者。郑芝龙以其商人的手段加以经营,向移居台湾的中国人大肆征税,郑氏家族因此聚敛了大量财富。

郑芝龙以其特殊的“朝廷命官”的身份,借整肃海防为名,行其独霸海上贸易之实。郑芝龙亦官亦商,迅速垄断了东南海上贸易,“独有南海之利,商舶出入诸国者,得芝龙符令乃行”⁵,“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又以洋利交通朝贵,浸以大显,泉城南三十里,有安平镇,龙筑城,开府其间。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竟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⁶。

无论是成就海上贸易的霸业,还是经略台湾移民事务,在为任一方的地方官

吏中,郑芝龙无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第二次,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及黄道周等人在福州奉明唐王朱聿键为帝,年号隆武,郑芝龙被册封为南安侯、晋平国公,负责南明所有军事事务,一时之间权倾朝野,短短数月时间,郑芝龙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加之拥立之功,郑芝龙及其家族的地位在南明弘光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郑芝龙的四弟郑芝凤封靖西伯,五弟郑芝豹授太子太师澄济伯,族兄郑联封定远伯。在隆武帝时,“芝龙位益尊,权益重,全闽兵马钱粮皆领于芝龙兄弟,是芝龙以虚名奉君,而君以全闽予芝龙也”⁷。

随着郑芝龙权力的膨胀,他与南明政权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起来,而矛盾即缘于南明政权中文武大臣排位之争⁸,为此,以郑芝龙为首的武官集团和黄道周为首的文官集团间展开了明争暗斗,这一党争深刻反映了隆武政权内部海商集团和士大夫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郑芝龙与隆武帝之间在战略上的分歧也日渐加深,位尊权重并不能满足郑芝龙的野心,他力图立足福建、掌控朝政,以稳固其在福建等地的地位和利益;而隆武帝执意西进,期望借权力重心的转移,来限制和削弱郑芝龙的势力,稳固自己的统治⁹。随着这一矛盾的明朗化,郑芝龙深感难以继续左右南明政权,且复明无望。

此时,清军统帅博洛受命主持对闽浙战役,他求教于招抚江南经略洪承畴。洪承畴认为明隆武帝的所有兵马钱粮都由郑芝龙提供,所以郑芝龙是南明政权的关键人物,只要给予王爵之衔,他若靠来则福建可以不劳而获,浙江也顺势可得。于是,博洛派人到安平向郑芝龙招降。博洛致信郑芝龙,称“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若将军不辅立,兵未至而先附,何所取重哉!两粤未平,将藉将军听威慑之,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¹⁰,这一空头支票使处于失望中的郑芝龙大为动心,但其意欲纳降之举,遭到郑鸿逵、郑成功及其他将领的劝阻。部将周崔芝认为郑芝龙降清十分可惜,如此一来郑芝龙二十年的威望顷刻即无。隆武后期,郑成功的政治态度与郑芝龙发生对立。郑芝龙业已暗地里决定降清,而郑成功仍然忠于隆武帝。于是,郑成功阻止其父说:“闽粤之地,非北方,得以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然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以实其力;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郑芝龙说:“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勿多谈。”郑成功见父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离山不武;鱼不可离渊,离渊则困。吾父当三

思而行。”郑芝龙斥责郑成功说：“稚子妄谈，不知天时地势。”¹¹郑成功将郑芝龙投清之事告其叔父郑鸿逵，郑鸿逵力劝郑芝龙说：“夫人生天地间如朝露耳，能建功立业，垂名异世，则亦时不可失也。吾兄当国难之际，位极人臣，苟时事不可为，则弟亦不敢虚鼓唇舌。况且尚带甲数十万，舳舻塞海，粮饷充足，辅其君以号召天下，豪杰自当响应，何委身于人？此弟所不取也！”郑芝龙曰：“吾弟所言，眼前之事，非长远计耳。甲申之变天下鼎沸，亦失其鹿，故清朝得而逐之，业已三皆有二。若以小丈夫之气，振一旅而敌天下兵，恐亦不量力也。不如乘其招我，全军归诚，择主而事。”¹²郑芝龙并没有接受弟、子、部属的劝阻，率五百人及五子郑世渡，自安平住所到福州天兴府，向博洛投降。路过泉州时取出博洛之信夸示炫耀，同时并不失其商人的本色，和有兴趣求官的人谈价论钱。

降明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在郑芝龙决意降清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效应。从郑芝龙的立场来看，他原本是海盗，1628年为明朝所招抚，成为朝中官吏，继而以扫荡海上“私通贩夷”为名，将海盗同业一一制服，建立起了海上霸业。至南明政权时，郑芝龙进一步掌控南明国家命脉。而满清势力南下，一统天下已是大势所趋，所以他凭借从海盗到官吏的经验，自认为投靠清王朝，将是其官位和海商利益均可得以保全、甚至继续其霸业的最优选择。此时，投机的心理再次占据了上风。

第三次，1646年（顺治三年）11月15日郑芝龙到达福州谒见博洛，博洛得知郑芝龙启程来降，即令沿途各府县接应，凡所过驿站，供奉威仪甚为隆重，并命令文武官员郊外相迎。郑芝龙到了福州后与博洛折箭为誓，并薙发。博洛命酒痛饮三日。但三日之后博洛开始动手了，他分散了郑芝龙的五百兵，半夜里挟持郑芝龙，并立即送往北京。到京城后，郑芝龙实际被加以软禁。一直到顺治五年才被授予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衔。

多年来郑成功一直坚持抗清并且对清廷构成很大威胁，为了招抚郑成功，清廷对郑芝龙给予大力的优待：顺治八年，在京的次子郑世忠被授予二等侍卫之职；同年，部分亲属从福建被送至京城团聚；顺治十年五月初十，清廷正式颁发敕书封郑芝龙为同安侯。但是这一切不过是清政府为了招抚郑成功而使用的拉拢手段而已。而郑芝龙数奉皇帝令命其子郑成功投降，郑成功均坚辞不受。经过几次劳而无功的和谈，郑芝龙最终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并成为清廷首先要除去的祸患。尽管顺治帝在位之时始终未下决心诛杀郑芝龙，只是将之与其家人囚禁于宁古塔，但是郑芝龙终于无法逃脱最后的厄运：1661年，康熙帝即位，清廷

取得一致意见,十月初三郑芝龙与子郑世恩、郑世荫、郑世默等十一人被斩首于菜市(或作柴市),结束了他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

三 郑芝龙的权与利——边疆官吏与王朝的权力互动

郑芝龙的传奇与悲剧,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即商人与海盗兼具的豪贵成为封疆大吏,并与朝廷间表现出较强的权力互动关系。在有着深厚的“重农抑商”传统的封建国家,一个商人被任为官职,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发展成熟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其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如:缺乏个人的独立意识和参与意识;过分注重人际关系,使原本体现为奉献和给予的互动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牵制、依赖和索取等等。这些局限性,在郑芝龙与明清朝廷的权力互动中无不得到体现。郑芝龙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跳出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的模式,而致力于海上贸易,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但他无法真正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官商一体”、“以官护商”成为他难以逾越的思维鸿沟,所以,即使郑芝龙富可敌国,也不能抵御住来自朝廷的权力诱惑。

当朝廷授权于郑芝龙时,双方相互牵制、相互利用的互动关系表现得更加一览无余。这一互动关系是如此脆弱,当双方发生利害冲突或相互无须再予利用时,几乎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在这一互动关系中,作为集权的核心,朝廷实际上始终是主动者,其价值取向决定着互动关系的存在和解体;作为互动关系另一端的被动者,郑芝龙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仅其权力被大大压制,甚至其生命的存亡都掌控于朝廷。郑芝龙的一生,无不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折射出时代的特征。

其一,海商贸易是17、18世纪世界范围内最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形态,可以说海商贸易的勃兴,对支撑中国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带来了严重冲击,与在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产生冲突。在两种经济形态的激烈碰撞中,随着思想观念的变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嘉靖之后,中国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日益活跃起来,新兴的海商集团逐渐从大地主阶层中脱离出来,郑芝龙便成为海商集团的突出代表。

其二,明末,由于武备废弛加以倭寇骚扰以及荷兰殖民者的侵掠,明朝实行“海禁”,禁止商船出入于海。“海禁”政策的实施,大大限制了海商集团。为了

继续通过海外贸易获利,海商集团便以多种方式寻求出路,其中走私、海盗成为常见的手段。“虽曰禁其双桅巨舰,乡甲连坐,不许出洋远涉”¹³,但是“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海盗”与走私商人结盟,二者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合二为一、自成一体,他们不仅同明朝官军周旋,保护商船出港,而且在海上实施护卫。事实上,明末的“海盗”,本质上就是亦商亦盗的武装集团,它是明朝“海禁”政策的产物,如时人所云:“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¹⁴。郑芝龙的海上武装集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但郑芝龙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劫掠和走私,其最终的目的在于用武力胁迫官府招抚,进而以合法地位控制海疆,冲破“海禁”政策的羁绊,开放自由贸易,进而全面垄断海上贸易。而明朝招抚郑芝龙的目的也十分明确,出于镇压农民起义及抵御外族入侵的需要,利用郑芝龙“擒灭诸盗”¹⁵，“用芝龙以攻贼,借芝龙以修备”，这是明朝政府奉行的治边政策的反映,即“从来蛮夷扰我边疆,寇贼毒我生灵,非战则守,非剿则抚”¹⁶。此外,利用郑芝龙的地位聚敛财富,明王朝也可从中获得税赋上的收益,从而使明王朝缓解在防范倭寇、整治边务中的经济压力。在双方权力的互动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明朝廷不仅委以官职,而且默认郑芝龙游离于严厉的“海禁”政策之外;郑芝龙听命朝廷,在地方官吏的金字招牌下,借助官军,消灭异己,统一海上,既消除了明朝廷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威胁,又达到了他独霸海上贸易的目的。

其三,从“抗清护明”到降清,前者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后者则是在目的虽然有一定的“利益驱使”,但其政治利益的诉求更为明显,即脱离南明政权,独享官爵所带来的权益,因此郑芝龙降清突现了政治上的投机。

明朝政府给与的特权地位,使郑芝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正是这一点使他对明王朝怀有眷恋之情,并将这个情结转到了拥立南明政权上。

郑芝龙拥立唐王、“抗清护明”的出发点无疑就是确保其在台闽两地的军政利益和经济利益,以及唯我独尊的强势地位,至于是否能够实现明王朝的复兴,并非郑芝龙追求的真正目的。当南明政权力图摆脱郑芝龙家族的大权独揽和控制,而郑芝龙在台闽两地的军政利益和经济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时,双方的矛盾冲突便不可避免。

对切身利益的维护,是郑芝龙一生当中的行动指南。面对隆武帝对自己权威和利益的压制、面对南明政权的日渐式微和清军势如破竹的攻势、面对博洛授予高官的许诺,郑芝龙再次做出了最为“实际”的选择。在这一选择中,郑芝龙

与清政府间的权力互动,也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作为新兴的清王朝在摧毁南明王朝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从南明政权内部找到效忠于自己的势力,釜底抽薪方可彻底击败对手,而南明政权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郑芝龙成为清政府最合适的目标。清政府利诱郑芝龙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既可彻底消灭南明政权,又可铲除以郑芝龙为代表的、盘踞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势力,从而平定整个浙闽粤地区,使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台湾都置于清政府的政权控制范围之内。而郑芝龙的目的则在于依托强大的清王朝,继续维系自己在这地区的控制力和经济利益。但与明王朝相比,清王朝的策略显然高出一筹,清王朝清楚地知道如何驾驭这一地方豪贵,不但没有履行对郑芝龙封官的承诺,而且最终把他送上了断头台。郑芝龙仅能为清王朝贡献的,就是劝服其子郑成功降清,但遗憾的是郑芝龙没有成功,他的利用价值顷刻荡然无存。与其说是清王朝杀了郑芝龙,不如说是郑芝龙让自己走上了黄泉路。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清政府杀或不杀郑芝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清政府有效地利用了郑芝龙,实现了使郑芝龙在消灭南明政权、稳定东南沿海、威慑地方豪贵等方面的作用最大化的目的。在郑芝龙与清政府的权利互动中,后者不仅完全占据了上风,而且实现了它几乎可以设想的所有目标。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注意到郑芝龙与明清两朝间的权力互动关系有明显的差异:在郑芝龙与明朝的权力互动关系中,两者大体上处于相互利用的同一个平行线上,双方各取所需,即使明朝廷对郑芝龙委以重任,充其量是对一个原本即为地方权贵的势力加以确认,还不至于导致郑芝龙的权势凌驾于朝廷之上;而郑芝龙利用受命朝廷的一介地方官吏之机,无非是要借朝廷赋予的正统地位,在稳固和扩大其海上贸易利益的道路上扫除障碍。于是,呈现出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间的互动关系。

在郑芝龙与清朝的权力互动关系中,两者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时双方的关系并不在一个平行线上,清政府在政权和军事力量上的强势,使其在招抚郑芝龙的过程中处于更加主动的位置,它可以做出委以官职的承诺、也可以不履行这一承诺;可以“兵不血刃”地解体郑芝龙的武装力量、也可以轻易地将郑芝龙“挟持”到京城;可以授予郑芝龙毫无意义的官位、也可以将郑芝龙贬官乃至处死,郑芝龙几乎成了清政府手中的玩偶。而郑芝龙作为即将土崩瓦解的南明政权的拥戴者,审时度势的结果就是卑躬屈膝、委身清王朝,如同赌徒一般,将一生的权贵和威名押在了降清之举,商业才智在这一刻把郑芝龙导入了绝境。其

往日显赫的身价和地位,不仅没有成为他获得清王朝的信赖的基础和资本,反而成为清王朝防备、囚禁、加害郑芝龙的借口和原因。

郑芝龙由商、由盗、由官,活跃于海上、活跃于边疆,他是明清时代中国海上贸易的典型代表,虽然他曾富甲一方、权重一时,但在与明清王朝的权力互动关系中,终究难以摆脱历史的局限。于是,我们看到:第一,中国明清以来的海上商业资本力量,不仅没有因为郑芝龙的努力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遭到了毁灭性打击。郑芝龙所代表的海商集团虽然力图与世界贸易发展的大势相趋同,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传统所不容,中国海上商业资本力量的积聚不得不中止。这不仅是郑芝龙的个人悲剧,更是整个中国海疆历史曲折演进的悲剧。第二,中国历代边疆官吏权力运行的模式,并没有因为郑芝龙的传奇性而产生本质上的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特性反而愈加鲜明。从理论层面上而言,边疆官吏与中央政府权力的良性互动,是边疆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但在封建社会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下,边疆官吏与中央政府权力的良性互动却难以实现。中国边疆官吏与中央王朝的权力互动关系再次验证,中国封建制度的根深蒂固,正是中国边疆社会历史发展举步维艰的症结所在。

〔注 释〕

- 1 参见徐健竹,《郑芝龙、颜思齐、李旦的关系及其开发台湾考》,载《明史研究论丛》,第三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 2 叶显恩,《明中叶中国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载《徽州与粤海论稿》,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 3 江日升,《台湾外纪》,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 4 (清)计六奇撰,《明季北略》,卷十一,《郑芝龙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84。
- 5 (清)计六奇撰,《明季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313—314。
- 6 李天根,《燭火录》,卷十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2。
- 7 彭孙贻,《靖海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
- 8 顾诚,《南明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页289。
- 9 参见《隆武记略》,清光绪十八年抄本。
- 10 夏琳,《海纪辑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 11 江日升,《台湾外纪》。
- 12 同上。

-
- 13 《熹宗实录》，卷五三。
 - 14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
 - 15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一。
 - 16 中国第一档案馆，《郑芝龙海上活动片断（上）》，载《历史档案》，1981，第4期，页43。

从朱一贵起事的镇压事宜(1721)来看漳浦人之网络

苏尔梦(Claudine Salmon) 著

黄君艳 吴旻 译

据正史,台湾朱一贵起事被浙闽总督觉罗满保(1715—1726 年在职)麾下的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1667—1721)¹平息。平息朱一贵之乱时,施世骠由蓝廷珍(1664—1730)辅佐。蓝廷珍为漳州府漳浦县人,自 1719 年起在福建与广东两省边界处南澳岛上的南澳镇任总兵。

蓝廷珍的族弟蓝鼎元(1680—1733)留下两部关于平息台湾动乱的著作:《东征记》(1722)及《平台纪略》(1723)²,他的作品集《鹿洲初集》³中亦记载了曾经参与过战斗的人物传略:从这些作品中都可以发现,有相当数量出身漳浦县之人都曾参与了这次镇压。其中有蓝廷珍的亲族友侪,也有其他原籍该地区的军官。蓝鼎元本人在战事中担任幕僚,其长子蓝云锦随伺左右并亲身参与战斗⁴。有位友人陈少林也曾陪伴过蓝廷珍一段时间,此人对于台湾的熟悉程度无人能出其右。那些原籍漳浦的军官在这次战斗中所起的作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漳浦军官之间联系相当密切。

本文将由此出发分析这次战役的策略制定方式。若蓝鼎元所记载之事属实,好像有两个层面的人物同时参与:一,省府官方,即总督;二,漳浦县那些很快参与到镇压一事并给地方政府施压的文人。从此可以看到,漳浦人对朱一贵起事及其对福建省及台湾岛(岛上的汉人居民绝大多数来自泉州和漳州⁵)会带来的威胁尤为关注。蓝鼎元跟他的同乡一样认为,台湾岛是福建省的附属岛屿,应该对其进行控制、移民并开发。

本文将通过蓝鼎元的观点来逐步观察分析事件的爆发;在镇压的组织和进展过程中,漳浦文人及武官所起的作用;并分析在康熙帝重新考虑放弃台湾并把部分士兵遣回大陆时,文人在设计开发台湾岛的措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1. 蓝鼎元及其于朱一贵起事之所见

朱一贵突然起事的消息初传到厦门时,纷纷乘船逃离台湾的难民也开始抵达福建。起事一事震动整个闽南:“初,夏岛居民,闻台变仓猝,疑贼且长驱澎夏”⁶。而当时似乎只有蓝鼎元留下了笔述,一方面是自己对起事的所有看法;另一方面则对此提出具体对策。在分析蓝鼎元对所发事件的观点之前,必要概括地介绍这位有负责精神的文人。

一位非凡人物

蓝鼎元出身书香世家,为漳浦县⁷东北部赤岭乡上坪村人。尽管未通过乡试⁸,后来他还是成为一位大学者。他美名远扬,上达雍正(1723—1735年在位),还曾被皇帝召见。这点可以由1728年雍正帝手迹匾额作证。匾额保存在赤岭石椅村⁹蓝氏家庙中,上写四个大字:“公正廉明”¹⁰。蓝鼎元曾任教多年,并编纂了好几本地理学书籍。1724年,他被选至北京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纂,晚年他还参与安排协调《潮州府志》¹¹的编纂。此外,他还留下了好几本历史研究书籍及一本《女学》(1712),对女子教育进行辩护。尽管他只是晚年时在短时间内当过官,但其对于政治事件有着非常全面深刻的认识,而且只要觉得有必要,他总是毫不犹豫的提笔表达自己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这点可以从《鹿洲初集》中的来往信函便可看出。正如他的同乡和朋友阮蔡文¹²和陈少林一样(在后文中会谈到),他青年时期便来往于各海域之间。1696年,他沿着厦门岛行至浙江的舟山¹³,这次旅行使他对海疆问题有了尤为敏锐的观察力。他没有说明这次旅行在何种背景下进行,但这次旅行非常有战略性意义,因为当时的舟山作为福建和浙江两省的边界岛屿,拥有自己的驻军。可以猜想,这次巡游也许得助于其身为军官的亲人。

最近出版的蓝氏家族家谱无法为我们提供亲戚关系的细节¹⁴,但我们知道蓝理(1647—1719),即蓝鼎元叔祖,很早就参军,并将其几位幼弟带入军队¹⁵。后来,蓝理的好几个儿子亦从军¹⁶。另外,1691年,14岁的蓝廷珍来到舟山岛驻军部——其叔祖蓝理自1690年便在此驻军。蓝廷珍要求蓝理将其纳入军队¹⁷,很快便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1695年,他便荣升把总¹⁸。他们堂兄弟之间关系甚密,经常保持书信往来。蓝鼎元对年长自己许多的兄长经常给予建议和指导,尤其在1719年,当廷珍被任命为南澳总兵时,蓝鼎元给他写过一封长信。信中强调了军职的重要性,并分八个方面阐述,详细告诉他应该如何更好的履行

自己的新任职责¹⁹。

蓝鼎元及其对起事者及官兵先取的对策的看法

《东征纪》中主要收集了关于朱一贵的叛乱及其带来的问题²⁰等相关官方文件。蓝鼎元在其中对反叛发生的原因未作任何评价。只是在属于野史之流之《平台纪略》阐述了他对当时台湾岛的政治形势的看法。当时康熙皇帝已经去世。他当然没有对朱一贵及其同党起事给予肯定,但是对其进行了极其清楚的解释,强调政府官员的昏庸治理。

据蓝鼎元记载,朱一贵为漳州府长泰县人,他“游手无艺,好结纳奸宄,为乡里所嫉”。1713年(即康熙五十二年),他来到台湾,在“夏台道辕”被聘为役人,但不久后被革职。于是他在一个村庄落户,以养鸭为生,他饲养的鸭群早晚居然编队出入,让村民都非常惊讶。(“以饲鸭为生”,“其鸭旦暮编队出入,愚眈异焉”)。后来,朱一贵重新与奸匪勾结²¹。

台湾岛在一段时期内都风平浪静,因而对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朱一贵正好利用了这个空档。1721年春,“凤山县令缺,台郡太守王珍摄篆,委次子,颇闲,征收粮税苛刻”,而且肆意捕抓百姓。当时怨言四起,几十个反叛者聚集在朱一贵四周。朱一贵以自己的朱姓为名,伪装成明朝后裔,试图笼络村民人心:“然我姓朱,若以明朝后裔耸乡村,归者必众”。1721年5月14日(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九日),50多名起义者聚集在凤山县东北部岗山,共誓结盟宣言。几天后反叛者起事。他们在对官兵的几场交战中,接连获胜。之后于5月26日,攻占了当时无堡垒的台湾城(即现在的台南)。5月28日,朱一贵借机身穿黄袍,腰系玉带,头顶天冠,被立为“伪王”,不久之后整个台湾岛控制在起事者手中。而此时,一些胆气不大的台湾官员举家乘船至澎湖,另外一些则战死沙场²²。

据蓝鼎元记述,在消息传至福建之前,在勇士们,例如中营游击、身为北方人的刘得紫、两位漳浦人:安平县(即台湾县)把总李茂吉和水师左营游击游崇功(当时他正在笨港水域巡逻,一得知台湾发动起事,立即赶赴台湾岛入口鹿耳门给予支援)的大力协助下,总兵欧阳凯(漳浦人)²³率领台湾地方军官对抗反叛。这四位在对抗叛军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事实上,欧阳凯被他手下一名投靠叛军的官兵所杀害。如同福建省的一些地方志一样,蓝鼎元也为后两位勇士作了翔实的传记介绍。

从传记中可以得知,1683年出生于贫苦家庭的李茂吉,与其弟弟侯鹏²⁴一

样,很早便从军。在某天(具体日期未知),他与其他几个士兵及其弟弟从福建北方福清县外,名为海坛岛上的海滩镇来到台湾县。其上级军官对其欣赏有嘉,把他推荐给欧阳凯。而欧阳凯亦在总督觉罗满保面前赞赏李茂吉,后来,觉罗满保将其任命为安平镇把总。朱一贵起事时,李茂吉自荐,要求和他弟弟一起带领500名士兵作为前驱到前线捉拿反叛者。几次猛攻后,李茂吉被抓捕。而在他解开绳索,正准备夺取刀具反抗时,反叛者砍下了他的头颅。他的弟弟则只是受伤,并得以藏匿于众人当中。他几番寻找茂吉的尸体都未有任何结果,之后便护送嫂子和侄子到达漳浦。蓝鼎元似乎询问了好些个亲临现场的人,并记录道:“台湾殉难诸臣,惟茂吉最烈”²⁵。他还列举了其他英雄的名字,如欧阳凯,“欲一为之立传,惜乎末由知其生平事迹也”。

而身为漳浦人的游崇功(生于1662年),则出身于一个较好的家庭。他的哥哥是湖广辰州的守备。在安顿好丧妻的父亲后,29岁的崇功决定去汇合任职于襄阳(现湖北省)、身为总兵的漳浦人蔡元屡。蔡元屡对其极其欣赏,任命其为右营把总,后来浙闽总督又将其提拔为长福营的右军守备,以守卫长乐县海岸地区,尤其是海盗的攻击对象——磁澳港。1713年,他为地方灾荒筹集粮食,之后,被派遣至台湾任北路营守备。当其任职于诸罗县(现嘉义县)时,给予百姓很多物资救济,百姓颇为感激。之后,他又被派遣至福建省海滩镇以对抗海盗。当起事发生时,他刚被任命为水师左营游击。得知此消息时他正在笨港。他立即朝南行船,在安平镇城靠岸,看到一些官员正乘船逃离。在其女婿的帮助下,他招募了一些人力,辅佐欧阳凯和李茂吉进行最后一场战斗。骑马战斗时受伤,不久后便逝世,时年59岁,“朝廷赠秩荫子以旌其忠”²⁶。

2. 镇压起事期间漳浦文人及军官扮演的角色

从现有资料中无法看出朱一贵起事的消息如何传播开来的。只知道此消息先是随着乘船至厦门的逃难者传播到厦门。当时驻守厦门的水师提督施世驃也得知6月1日台湾岛被反叛者占据。这得益于一封来自澎湖的信。写信人为漳浦人林亮。他自1717年便任协右营守备,并在起事期间鼓励其手下军官坚守阵地,而成功的保卫了澎湖岛屿²⁷。不管是蓝鼎元还是他同乡兼朋友的陈少林的著作,都没有提起起事的消息具体于哪天传到的。蓝鼎元也没有指出,施世驃驻兵澎湖及蓝廷珍带领海军随后赶到是在什么时候。

蓝鼎元对堂兄书信的建议

蓝鼎元断言自己早就预料到1721年起事之事。蓝廷珍在南洋巡海期间,曾遭遇暴风雨,船中一士兵被雷电击中。他曾经写信就此事询问蓝鼎元。蓝鼎元回信道:如果有危险,那可能来自东方,最有可能的地方便是台湾,并力劝其堂兄做好准备,参与此事。(“鄙意雷者震也。震,东方也。振东震叠,皆非安静;恐东方有兵事,将劳吾兄,是故舟中起雷……兄其建业于台湾乎!”)²⁸

几个星期后,蓝鼎元再次写给他堂兄,告知他自己刚从市场听到的关于台湾被朱一贵叛军占据的消息。他指出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上个月的雷击之事(“兄前月舟中起雷,弟已闲谈之”)。同时他指出,在浙闽将帅中,只有廷珍才有能力应对这种局面(“屈指浙闽诸将帅可属大事无如兄者”)。最后他叮嘱道,一定要立即发号司令派遣部队,准备扎营帐篷;储备粮食和武器;选兵并装备好战船,以随时准备迎战。蓝鼎元还建议其堂兄与总督联系,请求其离开福州前往厦门,这样能随时追踪战事,亦利于商讨战略问题。最后他总结道,一方面,只要总督下令镇压起事,廷珍便可以毫无顾忌地率领其士兵奋战沙场;另一方面,有廷珍指挥的战斗,总督大可放心,战争捷报也定将传至皇帝(“内有制府弹压指挥,兄可一意前驱,无呼应不灵之患。外有吾兄统兵杀贼,制府可高枕无忧,缮飞报大捷之疏矣!”)²⁹。

这封信很有意思,从中可以看出蓝鼎元对平息起事胜利的信心,正如他谙熟官府部门职能一样。并非只有蓝鼎元对蓝廷珍加以劝导,与此同时,陈少林也决定亲自告知蓝廷珍自己的建议和见解。

陈少林对老朋友蓝廷珍提出的战略部署策略

陈少林一生动荡,他的个人著作很少保留下来³⁰。他父亲为躲避明朝末年的战乱来到广东潮州,陈少林便在这里长大。当他大概2岁时,其父母双亡,被移民至潮州的林雄收养,并资助他接受教育。而他“发愤读书,留心经济兵事”³¹。1697年发生反叛时,陈少林决定参军,而后重回福建。1710年,他行至贵州省,在那参加乡试名列首位。之后回到漳浦,开始教书,同时参与《漳浦县志》的修改工作。康熙四十七年(1708)他已经参与过此书的编辑,最终于1714年完成³²。1716年,诸罗县县令周钟瑄(贵州人,其侄与陈少林为好友)³³,邀请陈少林编写《诸罗县志》(1717年完成)。这项书籍编写工作使陈少林有机会在台湾岛内及台湾岛沿岸开展调查,特别是借此机会熟悉了各个战略要点。在陈

少林得知朱一贵起事之后,便决定要与蓝廷珍会面。蓝廷珍即向其询问政治形势³⁴。与蓝鼎元一样,陈少林也认为,应该请求总督尽快坐镇厦门,并派遣部队,分发补给³⁵。

其实在《东征纪》中可以找到蓝廷珍致总督信函的副本。这封信中,大体上叙述了蓝鼎元给予的建议,而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其中也包含陈少林的见解³⁶。我们不禁要问,这封信是否是他们其中之一所写。根据《平台纪略》中叙述,总督在6月5日离开福州,并于7日到达厦门³⁷。觉罗满保在路途中收到此信函。对于这点蓝鼎元给出了确切的叙述。他写道,当觉保行至泉州时收到南澳镇禀函³⁸,他对此非常欣慰,并说“蓝廷珍总兵所见,事事与吾吻合,吾调此君,平台得人矣”³⁹。

为边疆官员服务的文人“专家”

尽管水师提督为泉州人,而他如同蓝廷珍一样对台湾了解得不够。康熙五十九年(1720),《台湾府志》及《凤山县志》问世,出版量似乎很少,《诸罗县志》到1724年才开始出版发行。说到台湾岛的地图资料就更少。实际上,从1682年台湾被收复后,官府部门就已经试图从福建这个视角描绘台湾岛西部的地理状况。1684年的《福建通志》收入了这张地图,它可能脱胎于更古老的地图——台北故宫博物馆现存一组两幅分别著满、汉文笺注的《台湾略图》,很有可能是当时为对抗郑成功而作的⁴⁰。这张地图带有明显的军事用途,如台湾岛附近的海湾及四周地理形势,而且标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泊船。1717年的《诸罗县志》中也有一系列图片展示了当时最宽阔的诸罗县海岸,它的领土一直延伸到岛屿的北部。书籍编者在绘制台湾岛的地图时,抱怨其中的困难:尽管现存几十幅台湾地图,可没有一幅反映了真实情况(“台湾輿图不下数十幅,未有得其真者”)⁴¹。而且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在厦门发动战斗时军官可以参看台湾地图⁴²。在《漳州府志》亦不能给予清楚信息的情况下,总督求助于对台湾岛了如指掌的陈少林。

一开始,施世骠和蓝廷珍提议从三路挺进。陈少林进行劝阻并给出不同建议:“时提督施世总戎蓝廷珍议统舟师定南北中三路进取。梦林力陈南路海道险恶,舟不能泊⁴³;当会澎湖,相风便分两路,大将由中入鹿耳门,副将由北趋西港,绕贼背后,计万全”。陈少林还建议使用轻便快捷的战船,以便轻松操作。他的建议被总督一一采纳(“又陈战舰宜用轻捷以便操驶。制府用其言”)⁴⁴。后来很可能在蓝廷珍的建议下,陈少林被施世骠纳为麾下,并追随其直到

台湾⁴⁵。

如今无法知道施世驃的幕僚情况⁴⁶,但蓝廷珍在《东征纪》序中很清楚地提到,他堂弟和陈少林就曾是在自己在战斗期间的咨询对象和幕友⁴⁷。他还说“与幕友陈少林及予弟玉霜日夜筹谋,安抚整顿,至忘寝食,不敢惮烦”⁴⁸。蓝廷珍还表示出对堂弟的无限钦佩:“予胸中每有算划,玉霜奋笔疾书,能达吾意。又深谙全台地理情形,调遣指挥,并重要害,决胜擒贼手到功成”⁴⁹。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军官和学者之间的感情深厚,以至两人观点能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另外,蓝廷珍对陈少林也赞赏有加。在《诸罗县志》中,可以看到,双方提出的战略方案——如设立漳化新县并巩固军事要点,基本吻合(“设县添兵,与陈君少林修志时所建吻合”)。他也为陈少林在平息战争期间对其提供的帮助——为虏获贼人头目出谋献策(“为予计擒数巨魁”)⁵⁰大加夸颂。

蓝鼎元在整个战斗中和平息起事的一系列过程中一直都陪伴堂兄左右,时间长达一年多,而陈少林只停留了5个月,之后便要求还乡⁵¹。

漳浦军官如何参与平息起事之战

本文将不细究整个战斗过程,而是介绍战争中的一些关键时刻,如到达鹿耳门及抓捕朱一贵时,一些漳浦军官在期间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开始,当施世驃和蓝廷珍的两支水军队伍1万2千名士兵和5千名水兵,乘着600多艘战船到达澎湖时,他们下令将绝大多数士兵派往台湾对抗3万名叛军,只留下几支队伍驻守澎湖列岛。

自1706至1712年间在台湾担任把总的林亮⁵²,从1717年开始在澎湖岛担任守备。由于鹿耳门地势险恶,暗礁颇多(“鹿耳门暗礁天险”),他自荐率领20几个手下作为前锋,乘着小艇,在鹿耳门的清港入口处设置信标,为水军船只引路(“于鹿耳门清港插标,记明舟行路径”)。7月10日,水军队伍到达鹿耳门对岸,林亮带领6支小艇攻打叛军守卫的港口入口处的炮台。远远望去,炮台上到处都堆积着弹药,他立即下令向这些火药桶发射炮弹,火药立即起火,烧死无数叛军,其他叛军则纷纷逃逸,这样水兵队伍得以进入海港(“遥望炮台火药堆积垒垒,亮命炮专攻,火药桶中之火起,燔毙贼无算,贼溃,遂入鹿耳门”),靠岸并夺取平安镇城之炮台⁵³。此外,他还和另一名军官,爬上堡垒,扬起军旗;而蓝廷珍则张贴告示,以安抚百姓(“林亮、董方复登安平镇城,树立大军旗帜,廷珍出示安民”)⁵⁴。而载着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驃的船只直到晚上才到达。能从叛乱者

手中夺回台湾省,林亮在战斗中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主要的任务便是抓获藏匿于诸罗县乡村的朱一贵。身为漳浦人的差员王仁和及其村中朋友对此事件起着关键作用。王仁和的村友们邀请朱一贵在他们家落脚,与此同时,官兵将村庄包围,顺利抓捕朱一贵并将其带到施世骠处⁵⁵。王仁和之举被遗忘了,而林亮的英勇举动则轰动一时,康熙皇帝对其大加赏赐并给予高官。1727年,林亮被任命为浙江定海镇总兵,而后不久,在其60岁时去世。蓝鼎元记录到:当时世人知,在平息台湾叛乱之事时,林亮为踏上台湾岛第一人,其功劳无人可比;而不知林亮保卫澎湖岛更是功不可没(“论曰,林元戎名将也,人知其平台先登功第一,不知保守澎湖尤为节之大者”)⁵⁶。

至此,台湾并未完全安宁,对其他叛乱者的平息活动还持续了几个月。10月3日,台风袭击台湾岛,居民受难,并造成不少伤亡。施世骠因此染病,第二月便辞世⁵⁷。蓝廷珍暂时担任提督一职,直至另一个漳浦人⁵⁸姚堂接替他的位置。总督命令蓝廷珍留守台湾,继续平乱。而与此同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将台湾总兵蓝廷珍调至澎湖岛,只留下陆军参将留守台湾;合并陆兵及水兵,将士兵遣还大陆。这个奏折引起台湾百姓恐慌,也遭到蓝鼎元的反对。1721年末1722年初,又有两个叛乱分子被抓获。为防万一,1722年3月26日,蓝廷珍处决最有害的被捕捉叛乱分子,但并未遏止反叛的发生。6月,本应之后每年至台湾岛视察一次的两名御史,满汉各一名(“特命满汉御史一员,岁奉差到台巡视”),来到台湾⁵⁹。至此,岛内治理渐渐走上轨道,最后,在姚堂的努力下,蓝廷珍被命留守台湾,继续担任总兵一职。最终台湾岛于1723年完全安定。同年春,雍正帝即位,蓝廷珍被特授为福建水师提督及左都督⁶⁰。

3. 蓝鼎元:主张集中开发台湾岛之代言人

阅读蓝鼎元著作的过程中,一方面不禁讶异于他对军事的了解,另一方面,其政治远见令人惊讶。而且,他对这两方面的了解似乎是并驾齐驱的。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论述中都谈及台湾,以至于无法简单综述他的思想。

在平定台湾起事之后,他立即提出(之后他还谈到过),台湾对海外而言是个天然屏障(“海外天险”)⁶¹。在《平台纪略》的总结中,他说道,正因如此,更不应只重中国大陆而忽视台湾岛。另外,与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台湾岛相比,更加不可能遗弃当时(1723年)的台湾岛。以前的领域很小,只包括方圆一百里的台湾府。凤山县和诸罗县当时还是恶瘴之地,以至于百姓都不敢前往(“凤山、诸罗

皆毒恶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蓝鼎元记录到:“今则南尽郎娇,北穷淡水,鸡笼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趋如鹜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为野番嗜杀;今则群入深山,杂耕番地,虽杀不畏,甚至傀儡内山、台湾后山、蛤仔难、崇爻、卑南冕等社,亦有汉人敢至其地,与之贸易。生聚日繁,渐廓渐远,虽严禁不能使止也。”⁶²这里可能意味着,实际上存在一条汉人和土著的地域分界线,界限由巡抚黄叔瓚于1722年提议而划分,目的在于防止叛乱,并更好地对汉人进行控制⁶³。

接着,蓝鼎元起草了一个军事防御图来强调形势不稳定,叛乱随时可能发生。最后,他提出一个加强岛内治理、巩固军事基础的计划。尤其提到,应把诸罗县划分为两部分,在北部建立一个新县——陈少林在《诸罗县志》⁶⁴中也提到同样的建议,而事实上1723年新的彰化县被建立——并且为更好地控制百姓而加强台湾岛北部及南部的部队建设。同时,他建议,起用心善胸宽的官员,不用苛捐杂税压榨人们,而是对百姓进行安抚和教化。还应建立保甲体系,尽可能容许开垦土地,并在城市周围建筑城墙。不过,他提醒到,应该按照形势的变化来实施相应的政策(“而以实心行实政,自觉月而岁不同异”)。如果这样,就能得到预期的发展:一年后,人们心安气定;二年后边界巩固;三年后,礼让之风盛行,以前疏远的番人也逐渐与汉人之间建立亲密的联系,并成为一般百姓中的一员;如此以往,不久后整个岛屿便可以达到长久稳固(“一年而民气可静,二年尔疆圉可固,三年而礼让可兴;而生番化为熟番,熟番化为人民;而全台不久安长治”)。但蓝鼎元并不觉得这是完全可行的。因为,他认为,要把所有的百姓遣回原籍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循循诱导,使他们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但今民人已数百万,不能尽驱回籍,必因其势而利导约束之,使归善良,则多多益善”)。蓝鼎元总结到,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台湾岛,否则它将被海盗占据,如此一来,福建及广东省将受苦无穷,不仅如此,外来海盗也将侵入。所以,最好能尽快加紧与台湾岛的联系⁶⁵。

作者很多次提到这个观点,以致后来在他被宣入朝后,大约于1728年给雍正帝写了相关奏疏⁶⁶。在这个奏折里,他详细的陈列了这个天然屏障如何先吸引了日本人,后来又引来欧洲人的注目,坚持认为应该加强军事防御,而且对此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他总结到:台湾为一天堑,日本和荷兰都曾经觊觎此地。如果顺应东北之风,从台湾到北部省市只要十余天之久。此岛屿与大陆联系紧密,两者关系如同唇与齿的关系,绝不能把台湾岛当成荒远之地。台湾岛一切太平这是件幸事,但也不能因此便忽视军事防御。我斗胆上奏,不顾个人愚

鲁,也正为此(“台湾海外天险,日本、荷兰素所朵颐之地。东南风顺利,十余日可至关东。此齿唇密迩之区,未可以遐荒海岛目之,幸级盛平,不忘武备,臣所以敢竭一衷,不自知其愚且陋”)。

在提出这个主要强调战略战役问题的奏折的同时,蓝鼎元还撰写了另一奏折。其中重提前奏折中提到的主要问题,着重点落在台湾社会及其社会问题上,并给予解决的办法。他大胆揭露当时由于不允许携带家属移民的政策所导致的性别不平衡问题。他提到,在台湾省以外的南部和北部,几乎没有女性,以致带来各种社会混乱⁶⁷。因此,他提议消除禁令,并鼓励开垦土地。而为更好的进行社会控制,则应通过兴办义学,发展教育,改变民风,最终建立保甲系统⁶⁸。

首先,可以看到,蓝鼎元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了他个人将台湾岛融入中国的愿望,以至于很少谈到台湾的土著,即使提及,对其用语也带有贬义。这点与陈少林⁶⁹完全不一样。蓝鼎元又明确提出,台湾岛对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应该要对这块土地殖民化。其实,施琅⁷⁰于1683年上奏康熙皇帝,第一个竭力呼吁将台湾岛并入中国版图,并给予重视。当时康熙皇帝还认为,台湾岛为“弹丸之地”,拥有或者失去此岛屿都无碍大事(“得之无所加,不得之无所损”)。而蓝鼎元则是第一个将保留台湾岛的必要性表达得最彻底的文人。

总之,蓝鼎元的观点在当时是被同乡们广泛认同的。可以看到,在平息起事、收复台湾岛的战斗中,漳浦人之间密切联系显得更为重要。漳浦人对从军的强烈愿望及对台湾的高度重视,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漳浦县的极度贫困及该地区可耕地的极度匮乏⁷¹;另一方面,由于漳浦县的海岸多峻峭,这个地区是海盗攻击的主要对象。《漳浦县志》《和漳州通志》还详细描述了与海盗作斗争的地方英雄的英勇事迹。

很明显,不管文人还是武将,都逐渐重视台湾岛,将其视为“天堑”。可以看出,他们都能从自己所从事的领域轻松过渡到对方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人和武官具有相同特性。《诸罗县志》的作者陈少林,先前从军,并到处旅行,而最后却以文人的身份辞世。当他旅居台湾岛时,主要致力于对始建于1684年的诸罗县这个地区的了解,尤其是从战略角度来考察。当汇编《诸罗县志》时,该地区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该地区名人传记,更确切的说,那些大多移民者的名人们,数量屈指可数。可还是有一人引人注目,这源于他的漳浦人身份。他叫阮蔡文,是陈少林和蓝鼎元的朋友。他虽然接受过极其良好的教育并考中

举人,可他是作为军人来到诸罗,并于1715年担任北路参将,后来晋升为副将,不久后因在凤山诸罗那恶瘴之地感染病菌而在福州逝世。蓝鼎元在他撰写的阮蔡文传记⁷²里引用了阮蔡文的论点,这似乎表达了当时福建南部居民,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的心声:台湾的确是弹丸之地,但它关系到福建的安危;而淡水又是台湾的关键之地,从此港口,一天之内便可到达福州(“台湾虽弹丸实闽之安危,淡水又台之键钥也,由淡水至福州利风一日可达”)。

〔注 释〕

- 1 施世驃为泉州府晋江县人,出身名门,施琅(1621—1721)之子。曾效命于郑氏家族,由于郑成功抄斩了其家属,后投奔清政府,并与福建清师共同对抗郑成功。1681年,被任命为福建省水师提督;1683年,夺回台湾。右营右击为蓝理。蓝理(1649—1720),蓝廷珍之叔祖,曾因挪用公款而几番起落,最终因其对抗郑成功有功,康熙帝尽弃前嫌。
- 2 此处引用的版本是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卷七。蓝鼎元在自序中提到,他曾经购买过一本关于平息台湾动乱的著作《靖台实录》(还没有发现这本著作),其中存在不少错误,为此,他决定进行重述,以还原历史真相。
- 3 这里提到的《鹿洲初集》为光绪5年的版本。在很多地方志上可以找到那些曾经参与过平息战斗的人物的传记,比如民国11年的《福建通记》、光绪3年的《漳州府志》和民国17年的《漳州县志》。
- 4 蓝云锦,《平台纪略》后序,页35。
- 5 此外,还有从潮州和广东过来的移民。
- 6 《平台纪略》,页9。
- 7 蓝氏家族被认为是汉化的畚族人;参看:陈再成主编的《漳州历代名人传略》,漳州建州周年1300纪念活动筹委会办公室,1986,页36和页40;蓝沂水主编,《漳浦石椅种玉堂蓝氏族谱》,1991,页77—99。关于蓝鼎元的传记,主要参看Arthur W. Hummel,页440—441;林亦斌主编,《蓝鼎元研究》(为1993年纪念蓝鼎元逝世260周年于漳浦举行的研讨会成果),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蒋炳钊,《蓝鼎元传》,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年版。在此,非常感谢柯兰和谷岚两位博士为我提供了后两本著作。
- 8 蒋炳钊,《蓝鼎元传》,页85:“鼎元一生十科乡试,却一第未缘”。
- 9 蒋炳钊,《蓝鼎元传》,页1:“石椅村是赤岭蓝姓发迹的地方”。
- 10 可能只是复制品,因为据蓝氏族谱73页记载,祖祠毁于大火。1947年由印尼蓝氏出资重修,直至1982年才建成。在蒋炳钊著1998年著作第3页可以看到这四个字

的影印复制品。

- 11 郑焕隆选编校注,《蓝鼎元论潮文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 12 《漳州府志》,卷三二,页43a—44a。
- 13 蓝廷珍著:《东征纪》序,页4:“方成童时,即自厦门泛舟观海,溯全闽岛,历浙洋舟山而归”。
- 14 参见注7,编者在后记中提到旧族谱有很多舛错疏漏,校注中他得到两位厦门大学的研究人员相助。书中35—36页,还提供一份根据漳州与漳浦地方志编纂的职衔军官的族人表。此外,在台湾的蓝氏有着自己的族谱,并未归宗至石椅。
- 15 蓝理先是经营靛蓝染布行,很快和几个“旅中雄健者”一起对抗海盗,最后被官兵招募入伍;参看《鹿洲初集》,卷七,《叔祖福建提督义山公家传》,页34a—36a。
- 16 参看《鹿洲初集》,卷七,页43a—44a。
- 17 参看《鹿洲初集》,卷八,《先兄福建水师提督襄毅公家传》,页6a。
- 18 《鹿洲初集》,卷八,页6a。
- 19 参看《鹿洲初集》,卷二,《与荆璞家兄论镇守南澳事宜书》,页1a—10b。
- 20 这本著作中主要收藏信件副本,但也有一些关于蓝鼎元在台湾岛旅行的游记。
- 21 《平台略记》,页1。
- 22 《平台纪略》,页5—6。
- 23 《漳浦县志》页1973及《清史稿下》,香港文学出版社,列传71,页1108,有总兵欧阳凯传略。
- 24 据蓝鼎元记载,其真姓为江,李和侯只是他们入伍时作为替补者的假姓。
- 25 《鹿洲初集》,卷七,《李弁传》,页34a—36b;以及《漳州府志》,卷三二,页52a;《漳浦县志》,页1975;《清史稿下》,页1108,列传71,页1108。
- 26 《鹿洲初集》,卷七,《游游戎传》,页51a—53a。
- 27 《平台纪略》,页8;《鹿洲初集》,卷八,《林元戎传》,页1b。
- 28 《鹿洲初集》,卷二卷,《与荆璞家兄论舟中起雷书》,页11a—11b;这封信以及其他两封写给蓝廷珍的信件都在《平台纪略》附录中有副版,页39—47。
- 29 《鹿洲初集》,卷二,《与荆璞家兄论台变书》,页13a—13b。蓝鼎元并不提到福建水师提督,但蓝廷珍还致信于福建水师提督;这封信在《东征纪》中有副本,页3—4。
- 30 《鹿洲初集》,卷七,《台湾后遊草跋》,页20a—20b提到陈少林三次旅居台湾所写的三本诗集;第一本诗集创作时,他正在编纂《诸罗县志》,第二本写在1721至1723年的军旅期间,第三本写于1723年;这三本似乎都没有保留下来。所幸,作者其中几首诗作可以在《诸罗县志》中找到。
- 31 为纪念其养父,他为自己取名为“梦林”。
- 32 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总录》,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页168。

- 33 参看:周钟瑄序,页2。
- 34 蓝鼎元在其著作中没有提到这次活动。
- 35 这段根据脚注3中提到的三本方志的《陈少林传》所写(分别参看卷五,页2462—2463;卷三二,页45a—47b;页1928—1932)。
- 36 《东征纪》,卷一,《上满制府论台湾寇变书》,页1—2。
- 37 《平台纪略》,页8—9。
- 38 参看《漳州府志》,卷三二,页46a—46b。
- 39 《平台纪略》,页9。
- 40 参看《披荆斩棘——十七世纪后的台湾》,台北,1992,页8—9。
- 41 《诸罗县志》,台湾丛书版,第一辑,1968,页36。
- 42 蓝鼎元没有提到地图的使用。只是在平息朱一贵起事之后,台湾地理形势才成为深入研究的目标;对此可以参看 Emma Jinhua Teng, 页52。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1723—1727年间绘制的台湾地图,最近出版:《清朝雍正台湾图附澎湖群岛图》(62.5×663.5+93公分)。
- 43 打狗港(现高雄)位于凤山县附近,距离起事开始的地方很近。这里海水极不深,并且周围都是甘蔗地;参看《平台纪略》,页2。
- 44 《漳州府志》,卷三二,页46b。据蓝鼎元记载,实际上,进攻台湾岛的战斗最先在鹿耳门由其堂兄率领发起。施世骠及其水军晚上才到达。
- 45 《平台纪略》,页35。
- 46 但我们知道施琅身边至少有几位幕友,其中一位名为周彭(参见同治9年的《泉州府志》,卷五五,页10a)。
- 47 “幕友”一词用来指那些被地方官员用自己的费用雇佣而来,对某一领域有着特有知识的私人助理。若要更详细的了解,请参看 Ch'ü Tung-tsu, 页93—115。
- 48 蓝廷珍:《东征纪》序,页4。
- 49 蓝廷珍:《东征纪》序,页4。
- 50 蓝廷珍:《东征纪》序,页5。
- 51 觉满保罗曾挽留陈少林,希望其留在自己身边做幕友,但陈少林谢绝了;参看《漳州府志》,卷三二,页47a。
- 52 《鹿洲初集》,卷八,《林元戎传》,页1b;另参看 John Shepherd, 页184—185。
- 53 《平台纪略》,页12—13;《鹿洲初集》,卷八,《林元戎传》,页1b。
- 54 《平台纪略》,页13;所贴告示《檄台湾民》在《东征纪》中有副本,页4—5。
- 55 《平台纪略》,页18—19。
- 56 《鹿洲初集》,卷八,《林元戎传》,页4b。
- 57 《平台纪略》,页21—22。

- 58 参看《厦门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卷十,《职官表》,页302。据《台湾县志》(康熙59年),台湾丛书,第一辑,1968,页109,姚堂曾经于1712至1718年间任台湾总兵,1718年由欧阳凯接替。
- 59 《平台纪略》,页26。
- 60 参看《鹿洲初集》,卷八,《先兄福建水师提督襄毅公家传》,页11a—11b。
- 61 蓝鼎元还使用另外如“台疆”和“岩疆”的字眼来表达相同的意义。
- 62 《平台纪略》,页30。也可参看《东征纪》,卷六,《纪台湾山後崇爻八社》,页90—92。
- 63 主要参看 John Shepherd, 页187—190; Emma Jinhua Teng, 页117—118。
- 64 《诸罗县志》,卷七,《兵防志》,页107:淡水以南至半线三百余里,水泉沃衍多旷野平林,後垵诸港实与鹿仔、三林、海丰各水汛相为表里,宜割半线以上别为一县,听民开垦自如。
- 65 《平台纪略》,页29—30。
- 66 《平台纪略》,《台湾水陆防疏》,页71—72;这个奏则为《鹿洲初集》中节选,《奏疏》。下面注释68中亦将提到。
- 67 蓝鼎元在《东征纪》,卷六,《纪十八重溪示诸将弁》,页83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
- 68 《平台纪略》,《经理台湾疏》,页67—69。
- 69 在《诸罗县志》之《风俗志》中,陈少林详细描述了台湾土著人的风俗(番俗)。另外,有插图十幅,描绘土著的主要社会活动,也是至今为止最早的“番社采风图”。
- 40 施琅,王铎全校注,《靖海纪事》中《恭疏台湾弃留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页120—124。此文被翻译成德语,参看 Bodo Wiethoff, 页133—139。
- 71 到现在,这个地区整个可耕地面积也只是总面积的18%。参看《福建省地图册》,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3,页54。
- 72 《鹿洲初集》,卷七,《阮骠骑传》,页44b—49b;《漳州府志》,卷三二,页43a—44a。

参 考 书 目

- 陈再成主编,《漳州历代名人传略》,漳州,漳州建州周1300周年纪念活动筹委会办公室,1986。
- Ch'ü Tung-tsu (瞿同祖),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清朝时期的职官类型),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福建通纪》,民国11年。
- Hummel, Arthur W.,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清代名

人传略:1644—191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Imbault-Huart, C., *L'î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福尔摩莎(美丽之岛)历史和介绍], Paris, Ernest Leroux, 1893. Taipei, SCMC Publishing INC., 1995 (Reprint).

蒋炳钊,《蓝鼎元传》,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

蓝鼎元,《东征纪》(1722年),台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卷。

蓝鼎元,《平台纪略》(1723年),台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卷。

蓝鼎元,《鹿洲初集》,《鹿洲全集》版,光绪五年(1879)。

蓝诉水主编,《漳浦石椅种玉堂蓝氏谱》,1991。

林亦斌主编,《蓝鼎元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清史稿》,香港文学出版社,无年月。

Shepherd, John,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有关台疆的管理本领及经济政策: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Teng, Emma Jinhua (藤金花),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1683—1895* (梦幻台湾地理,中国殖民之游记及图书:1683—189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Wiethoff, Bodo, *Chinas dritte Grenze. Der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Staat und der küstennahe Seeraum* (中国的第三种边疆:中国传统的国家及海疆),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9.

杨碧川,《台湾历史年表》,台北,自立晚报出版部,1988。

《漳浦县志》,民国17年版。

《漳州府志》,光绪三年版。

郑焕隆选编校注,《蓝鼎元论潮文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诸罗县志》(康熙五十六年),台湾丛书,第一辑,1968。

朝廷与边疆

且战且和 有礼有兵

从南诏与唐朝之关系看唐朝治边及其边疆官吏

方铁 著

唐天宝年间(742—756),由唐朝一手扶持的南诏地方势力,毅然与唐朝决裂,转而与宿敌吐蕃结盟。南诏政治态度的急剧改变,造成唐朝政治格局的重大改组,被视为是古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值得重视的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起因,历来说法不一,《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典籍认为,边吏张虔陀(?—750)等无理欺压南诏,南诏王阁罗凤被迫反抗,导致南诏与唐朝关系破裂。这一说法的影响极为深远,元代以后云南的诸多地方志,乃至当今不少学人的论著,均持类似的观点。少数人则持怀疑意见,认为导致双方关系破裂的原因,应从当时形势的变化寻找,但未深入研究与阐述¹。笔者就此问题收集相关的材料,研究之后详细阐述,并由此透视唐朝之治边及其边吏相关的问题。

一 南诏之崛起

武德元年(618),李渊(566—635)建立唐朝,并于同年经营云南地区。唐高祖李渊释放被隋朝押入内地籍没为奴的爨玩(?—598)之子爨宏达,并任命其为昆州刺史,令奉父尸归葬家乡。唐朝还派遣使者俞大施至南宁州“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²。南宁州既置,唐朝统治者根据情况的变化对其建制和隶属关系又屡作调整,武德七年(624)南宁州都督府的设立³,标志着唐朝在滇东北的统治逐渐稳定。

唐朝对云南地区的经营,以滇东北和滇中为突破口,逐渐向滇西等地推进。

唐朝采取这样的经营策略,与当时云南地区联系内地主要是通过经东北部和北部入川的五尺道与灵关道,滇东北和滇中紧邻经济发达的四川地区,同时有前代经营留下的基础有关。武德元年(618)唐置南宁州,所辖的味、同乐、升麻、同起、新丰、陇隄、泉麻、梁水、降等九县主要在今滇东北一带。武德四年又置南宁州总管府⁴,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武德元年(618),唐朝改隋犍为郡为戎州⁵,以后设戎州都督府。武德四年(621)还于今云南姚安附近设置统辖一些羁縻州的姚州⁶,设治由滇东北和滇中逐渐向西面和北面发展,遂先后包有今云南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

对滇东北和滇中的统治渐趋巩固,唐朝把经营的重点放在滇西和滇北地区。贞观二十二年(648),因松外诸蛮既降复叛⁷,并影响西至身毒道的通行,唐廷令将军梁建方率巴蜀十三州兵讨之。“群蛮震慑,忘窜山谷。”梁建方遣使招降,归附者达70部、109,300户⁸。永徽二年(651),郎州白水蛮反,⁹唐遣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率兵进讨,次年大破之¹⁰。在滇西局势基本稳定后,唐廷于麟德元年(664),唐朝移姚州治于弄栋川¹¹,改置姚州都督府¹²,以统辖滇西地区。

唐初在今云南地区初步设治后,陆续有所调整,大致形成以若干都督府统辖羁縻府州,分片管理今云南及其附近地区的格局。据《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及其他有关记载,这些都督府分别是:(1)戎州都督府。武德四年(621),唐于味县设南宁州总管府¹³,管辖滇东北和滇中地区。武德七年(624)唐改总管府为都督府,所辖地区扩大到今洱海区域,州数增加到16个。贞观元年(627)唐废弃南宁州都督府,将所辖之州县隶于戎州都督府¹⁴,下辖武德初年至天宝末年(618—756年)设置的64个羁縻州,管辖范围也有所改变,如某些地区划归姚州都督府管辖,南部则扩展到今云南蒙自一带。由于羁縻府州的数目变动不常,管辖范围大小参差不一,甚至有少数羁縻府州的地域插入姚州都督府的辖境。(2)姚州都督府¹⁵。武德四年(621)唐在今云南姚安置姚州,为加强对滇西和滇北一带羁縻府州的管理,麟德元年(664)唐改姚州为姚州都督府。神功元年(697)蜀州刺史张柬之(625—706)在上表中称:“姚府总管五十七州”¹⁶,而《新唐书·地理志》载姚州都督府新设时仅有羁縻府州13个,可见在以后的30余年间其辖下增加了不少羁縻府州。姚州都督府管辖的范围,东与戎州都督府辖地相接,西至今云南保山,北面曾达今维西,南部抵今云南元江。(3)安南都护府。调露元年(679),唐在交州的基础上置安南都护府¹⁷。安南都护府主要统辖今越南北部、中部地区的羁縻府州,但在今云南文山州、红河州南部设置的郎

茫州、龙武州、岚州等一些羁縻府州,也归安南都护府管理。(4)黔州都督府¹⁸。黔州都督府主要是管辖今贵州以及湘西、鄂西南地区的48个羁縻府州,咸亨三年(672),居今滇东北、川南和黔西相连地带的“昆明十四姓”两万户降唐,唐于其地置殷州、总州和敦州,此三州在设置后的一段时间归黔州都督府管辖,后改属戎州都督府。(5)嵩州都督府¹⁹。《新唐书·地理七下》言嵩州都督府辖16个羁縻州,大部分在今四川西昌及其周围地区,仅其中的柎州在今云南丽江县北部。

总体来看,在唐朝讨伐南诏的天宝战争之前,唐朝在除今滇西北和澜沧江、怒江中下游区域以外的云南广大区域,设置了若干都督府与众多的羁縻府州。就设治之密和统治深入的程度而言,唐朝超过了以往经营云南地区的其他封建王朝,也为在这一地区有效的统治,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7世纪中叶,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自崛起以后南下洱海周围地区。约在唐贞观前期,松赞干布(约617—约650)征服附国及东方诸部,随后把位于雅鲁藏布江南面的雅隆部落发展为强大的吐蕃政权,其辖境包括今西藏全部、青海大部、四川和甘肃的一部分²⁰。吐蕃在东南面势力所及,包括今川西和川西南地区在内。在永隆元年(680)之前,唐剑南节度募兵于茂州(治今四川茂汶)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永隆元年,吐蕃以生羌为向导夺据安戎城²¹,并增兵守卫,吐蕃势力随后进入姚州和洱海周围及其以北的地区,“西洱河诸蛮皆降于吐蕃”。“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嵩等州相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²²

吐蕃势力南下并据有洱海周围地区和嵩州以西的区域,引起唐朝极大的忧虑。唐朝初期的策略是出兵滇西以遏制吐蕃南下。洱海六诏之一的浪穹诏先附吐蕃,永昌元年(689),浪穹诏首领傍时昔率25部来降;唐以傍时昔为浪穹州刺史,令统其众²³。吐蕃南下滇西,主要是通过经嵩州达姚州的道路。景龙元年(707),唐朝派姚嵩道讨击使唐九征率兵征讨姚州叛蛮,拆毁吐蕃在漾、潏二水修建的铁索桥和所筑城堡,杀死捕获3,000余人,并铸铁柱以纪功²⁴。但远征唐军撤回,吐蕃势力复卷土重来。景云元年(710),摄监察御史李知古(?—710)奏请出动剑南唐军,平定投降吐蕃的姚州群蛮,随后筑姚州城,列置州县。因李知古欲诛姚州群蛮首领,掠其子女为奴婢,群蛮怨恨,首领傍名引吐蕃军攻杀李知古,姚州道路遂被吐蕃控制,“连年不通。”²⁵自吐蕃占领安戎城后,唐军屡伐之,未攻克。开元二十六年(738),剑南节度使王昱(?—738)于安戎城侧筑两

城,运粮置军进逼之。吐蕃发兵救安戎城,唐军大败,死亡数千人²⁶。

关于吐蕃与唐朝对峙的分界,据《旧唐书·吐蕃传上》:“剑南西山又与吐蕃、氐、羌邻接,武德(618—626)以来,开置州县,立军防,即汉之笮路²⁷,乾元(758—759)之后,亦陷于吐蕃。”吐蕃攻陷安戎城后,“其地东与松、茂、嵩接。”《蛮书·异牟寻与唐朝誓文》说:贞元十年(794)南诏王异牟寻(754—808)与唐朝使者盟誓时,答应归唐后“尽收复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²⁸。又据《南诏德化碑》:天宝十年(751)南诏与唐军开战,南诏王阁罗风(712—779)差首领杨利等赴浪穹²⁹,向吐蕃御史论若赞请派援兵,“御史通变察情,分师入救”。据此,吐蕃在滇西实际控制的地区,东北面据有嵩州,在姚州一带与唐军相峙;北面以铁桥、³⁰浪穹为据点,分别在铁桥设神川都督,在浪穹遣御史镇守;吐蕃势力兴盛时,一度南下占据了洱海地区。

唐廷为抗御南下的吐蕃尽了很大努力,但俟远征唐军撤回,吐蕃势力又卷土重来。有鉴于此,唐朝在洱海周围地区诸诏中,挑选并扶植与唐朝关系最为密切的蒙舍诏,支持其统一洱海周围地区诸部,组织当地诸族共同抗御南下的吐蕃势力。

南诏是洱海地区诸诏之一³¹,因早期所居地区蒙舍川³²,位于诸诏以南,故称“南诏”,又名“蒙舍诏”。其时洱海地区较大的诏,还有蒙嵩诏、越析诏、浪穹诏、遣赕诏和施浪诏。除越析诏为麽些蛮外,其余诸诏为乌蛮³³。六诏兵力相当,莫能相统³⁴。浪穹诏、遣赕诏、施浪诏居地相近,相互关系密切,故又称“三浪诏”。除以上六诏以外,洱海地区较小的部落,还有白崖、剑川、“河蛮”等。唐朝在洱海地区设治后,分别在上述诸诏控制地区设置一些羁縻州,如在蒙舍诏置沙壹州,以蒙舍诏诏主盛逻皮(673—728)为沙壹州刺史;于浪穹诏设浪穹州,以诏主傍时昔为刺史;在遣赕诏立遣川州,唐御史李知古杀死遣赕诏主丰咩后,丰咩子咩罗皮曾自称遣川州刺史。另一方面,洱海地区诸诏又相互攻击,如浪穹诏夺据施浪诏控制的邓川城,赶走施浪诏主施望欠³⁵。

唐朝在洱海地区诸部中选择南诏予以扶持,主要是出自以下原因:首先,在洱海地区诸部中,南诏的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具备了统一洱海地区和号令诸部的实力。蒙舍川“地气有瘴,肥沃宜稻禾。又有大池,周回数十里,多鱼及芰苡之属”。“然邑落人众,蔬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³⁶。蒙舍川的畜牧业也颇兴盛,唐初蒙舍川一带“孳牧繁衍,部众日盛”。在吐蕃势力进入洱海地区之前,南诏已向周围地区发展,贞观二十二年(648),蒙舍诏主细奴逻(618—674)乘唐将

梁建方出兵西洱河的机会,攻灭以白崖为中心的白子国³⁷。第二年,南诏以蒙舍川为中心建立大蒙政权。

其次,南诏与唐朝建立密切的联系,深得唐朝信任。自细奴逻起,南诏数代诏主或贵族如逻盛(635—712)、盛逻皮、皮逻阁(697—748)等都曾入朝觐献获赏,或接受唐朝的封敕官职。在吐蕃南下洱海地区后,南诏又自动讨伐投降吐蕃的群蛮,博得唐廷的欢心³⁸。8世纪前期,唐玄宗诏令剑南节度使王昱,支持南诏诏主皮逻阁攻伐降蕃诸部,并赐皮逻阁名“归义”。南诏乃“以兵威胁服群蛮,不从者灭之,遂击破吐蕃”³⁹。在洱海地区诸部中,南诏攻击的重点是投降吐蕃的施浪等诏。迁居白崖城时傍与据有剑川的矣川罗识两位首领,与吐蕃神川都督暗中联系,“求立为诏”。谋泄时傍被杀,矣川罗识投奔神川都督,神川都督送之至罗些城⁴⁰。施浪诏主施望欠与遣赅诏主咩罗皮,联合进攻南诏失败,施望欠率族人远走永昌⁴¹。施望欠弟施望千投靠吐蕃,吐蕃立之为诏,置于剑川,有众数万⁴²。对南诏率众抗遏吐蕃势力之功,睿宗(710—712年在位)在敕文中说:“或有奸人,潜通犬戎,敢肆蜂虿。(蒙归义)遂能躬擐甲胃,总率骁雄,深入长驱,左紫右拂,凡厥丑类,应时诛剪。”⁴³

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712—762年在位)诏授皮逻阁以特进,封越国公,赐名“归义”。以后遣使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礼异”⁴⁴。经过南诏的努力,唐朝收复了洱海周围地区,吐蕃在北面的势力退守浪穹一带⁴⁵。“云南”一语源自蜀汉在今祥云一带所置之云南郡。云南王管辖的范围不超出蜀汉之云南郡⁴⁶,即以今洱海附近地区为限。

这一时期唐朝于南诏优宠有加,南诏入唐朝觐也屡见于记载。高宗时(650—683年在位),南诏主细奴逻数遣首领诣京师朝觐,“皆得召见”。细奴逻以后的几代南诏主和南诏权臣也频繁入朝进觐献物,唐多授以官职并予厚赐。例如:细奴逻之子逻盛入朝,“大蒙恩奖,敕鸿臚安置”,并赐锦袍、金带和缙彩等物。逻盛炎子盛逻皮继位后,唐朝授与特进、台登郡王,任命为沙壹州刺史。盛逻皮卒,子皮逻阁立,唐朝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授与特进,封越国公,赐名“归义”,后因有破洱河蛮之功,又授云南王,“赐紫袍金钿带七事”,其子阁罗凤和诚节也各有封赏,分别任命为阳瓜州刺史和蒙舍州刺史。天宝四载(745),阁罗凤长子凤伽异入朝宿卫,唐授与鸿臚少卿。天宝七载(748),皮逻阁死,阁罗凤继立,唐廷又遣中使黎敬义持节册封其为云南王⁴⁷。言在这一时期,南诏“既御厚

眷,思竭忠诚,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将谓君臣一德,内外无欺”。以后唐将回顾这一段历史,也说:“云南顷者求合六诏,并为一蕃,与开道涂,得接邛、蜀。许赐书而习读,遽降使而交欢,礼待情深,招延意厚;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⁴⁸

8世纪40年代,南诏获得向滇中和滇东发展的机会。唐朝任命滇东地方势力爨氏白蛮之首领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⁴⁹。爨归王袭杀爨氏其他首领孟聘、孟启父子,夺据升麻川。其时爨氏白蛮有名的首领,还有为爨归王之宗亲两爨大鬼主爨崇道,任昆州刺史的爨崇道弟爨日进,黎州刺史爨祺,求州刺史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彦昌等人。天宝四载(745),唐朝拟开通自安南都护府⁵⁰经步头⁵¹、安宁⁵²、北上戎州都督府⁵³的步头路。唐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遣越嵩都督竹灵倩先至安宁筑城。由于唐军筑城“赋重役繁、政苛人弊”,同时唐朝修建步头路引起爨氏白蛮的猜疑与不安,爨归王遂联合诸爨首领举兵反抗,杀死唐将竹灵倩并毁安宁城。玄宗闻讯,遣中使孙希庄、姚州都督李宓(?—754)等督令南诏主皮逻阁率兵讨之⁵⁴。

南诏及唐使出兵至波州⁵⁵,爨归王与诸爨首领诣南诏军谢罪,请奏释前事。玄宗见皮逻阁上疏,颁诏赦诸爨首领之罪,唐军复置安宁城。以后南诏插手诸爨事务,出兵讨伐爨崇道,崇道兵败南走黎州,皮逻阁俘获其族,“诸爨由是离弱”。天宝七载(748)皮逻阁死,子阁罗凤继立。阁罗凤召爨守隅及其妻归河赆⁵⁶。阁罗凤又派昆川城使杨牟利,以众兵强迫爨氏白蛮约20万户远徙滇西之永昌等地,滇中、滇东的爨氏白蛮部落被严重削弱,南诏遂在滇中、滇东地区建立起自己的统治⁵⁷。

二 南诏与唐朝关系之破裂

南诏既兼并云南东部爨氏白蛮地区,与唐朝关系的性质发生改变。在兼并东部爨氏白蛮地区以前,南诏在唐朝的扶植下崛起并统一洱海周围地区,南诏因此深感唐朝的知遇之恩,竭力组织洱海地区诸部抗御吐蕃,以尽藩属之责,这一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密切而友好。在据有东部爨氏白蛮地区之后,南诏坐大的趋势十分明显,唐朝开始把原来的盟友和藩属视为逐鹿西南地区的对手。唐朝对南诏的政策,也从扶植帮助转变为抑制间或还寻隙打击,其反映是唐朝镇吏对南诏的态度发生明显的变化。

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故事，南诏常与妻子俱谒都督，过云南，云南太守张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征求，南诏王阁罗凤不应，虔陀遣人冒辱之，仍密奏其罪。阁罗凤忿怨，是岁，发兵反，攻陷云南，杀虔陀，取夷州三十二。”另据记载：“归义卒，诏立子阁罗凤袭云南王。无何，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为云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谋，虔陀矫诈，待之不以礼。旧事，南诏常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⁵⁸《新唐书·南蛮上·南诏传》：“鲜于仲通领剑南节度使，卜忿少方略。故事，南诏尝与妻子谒都督，过云南，太守张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阁罗凤不应。虔陀数诟靳之，阴表其罪，由是忿怨，反。”《唐会要》云：阁罗凤继为南诏主，“与节度使鲜于仲通不相得，云南太守张虔陀复私其妻”⁵⁹。

据上所述，南诏与唐朝关系趋于紧张，似乎是由于唐朝镇吏对南诏欺压求索太甚，其实并不尽然。据天宝战争以后阁罗凤为“明不得已而叛”树立的《南诏德化碑》说：张虔陀由云南别驾改任越嵩都督之后，曾与吐蕃合谋欲灭南诏；并赦回因“不忠不孝”贬在长沙的皮逻阁庶子诚节，以离间南诏上层；还收留反抗南诏的爨崇道余部，授与南诏不和者以官荣，均是为培植与南诏敌对的势力；张虔陀等在云南缮甲练兵和向南诏倍征军粮，目的也是“密欲袭我”和“务欲敝我”⁶⁰。南诏屡表申告冤屈，但仍“不蒙矜察”。《南诏德化碑》上述所言，与其他相关记载印证，基本上可信。由此可见，唐朝对南诏的政策有所改变，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急剧恶化。

天宝九载(750)秋，阁罗凤遣大军将王毗双、罗时牟直率兵包围姚州都督府所在地姚州城⁶¹。于是年冬攻下姚州，张虔陀率守军坚决抵抗，“陷死殆尽”。张虔陀被杀。南诏随后夺据姚州都督府所辖之32处羁縻州。次年，唐朝令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693—755)与安南都护王知进领兵征讨南诏。四月，鲜于仲通等分别率8万唐军出戎州⁶²，经石门关道和走嵩州⁶³沿清溪关道攻南诏，王知进则领军自安南经步头路北入云南。鲜于仲通军既至曲州、靖州⁶⁴，阁罗凤差首领杨子芬等迎军谢罪，请还所攻姚州所俘掠，重建姚州城，且曰：“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鲜于仲通恕囚南诏使者，率兵进抵洱海地区，又遣大将王天运率军至点苍山后，拟腹背交袭南诏都城太和城。阁罗凤遂遣使至浪穹向吐蕃御史论若赞求派援兵，令长子凤伽异与大军将段全葛领兵拒王天运所率唐军，阁罗凤亲率主力迎战鲜于仲通。激战中唐军大败，全军陷没，士卒死亡6万人，王天运等被杀，鲜于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

其战功⁶⁵。天宝十一载(752),杨国忠(?—756)谎奏吐蕃出兵60万救南诏,剑南唐兵击破之于云南,克敌隰州等3城,捕虏6,300人。“以道远,简壮者千余人及酋长降者献之”⁶⁶。

杨国忠言吐蕃出兵60万救南诏未必是实,但反映了吐蕃与南诏已实现联合。南诏击败进讨唐军后,吐蕃命宰相倚祥叶乐携金冠锦袍、金宝带和驼马等慰问南诏,与之约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年(752),吐蕃于邓川册封南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授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亦号“东帝”,颁给金印;又授阁罗凤长子凤伽异为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政权之大小官吏,均获吐蕃封赏。南诏与吐蕃还约誓山河,“永固维城”。南诏改其年为赞普钟元年⁶⁷。

玄宗又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内使贾奇俊率兵再置姚州都督府,以将军贾瓘为都督。阁罗凤言:“汉不务德,而以力争,若不速除,恐为后患。”遂遣军将王兵各率军绝其粮道,又派大军将洪光乘等会同吐蕃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包围并攻破姚州城,信宿未逾,贾瓘被俘,唐军瓦解溃散⁶⁸。天宝十二载(753),玄宗诏左武卫大将军何履光率岭南五府兵进讨南诏⁶⁹。十三载(754),唐朝又令前姚州都督、侍御史、俞南留后李宓与中使萨道悬逊率兵进攻南诏。李宓将兵10余万,辇饷者在外,“涉海,瘴死者相属于路,天下始骚然苦之”。唐军广修舟楫,“拟水陆俱进”。南诏遣军将王乐宽等偷袭造船唐军,唐军锐气顿折。李宓孤军深入邓川,吐蕃神川都知兵马使论倚里徐来救,已至巴躑山。阁罗凤诱李宓军至太和城,闭壁不战。宓军粮尽,兼之瘟疫流行,军士饥病死亡过半,乃被迫撤军。南诏军跟踪追击,李宓投江而死,唐军“全军皆没”,史称这一次战役“流血成川,积尸壅水”⁷⁰。

阁罗凤收战尸筑为“万人塚”,“以存恩旧”。并立“德化碑”于太和城,记载天宝战争发生前后的经过,言于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赏,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为进攻南诏,杨国忠等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时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⁷¹。唐朝三次出兵征讨云南,均被南诏打败,“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⁷²。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彻底破裂,南诏与吐蕃也由敌对转而结盟。天宝十四载(755),范阳等三道节度使安禄山(703—757)起兵反叛,并攻陷东京洛阳,唐朝后院起火,再也无暇顾及南诏,南诏铺平发展的道路,遂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

天宝战争之后,南诏与吐蕃又合兵扫荡嵩州都督府。据《南诏德化碑》:吐蕃赞普差御史赞郎罗于悉结敕赍书南诏:“树德务滋长,去恶务除本,越嵩会同,谋多在我,图之此为美也。”南诏“恭承上命”,遂派大军将洪光乘、清平官赵佺邓等与吐蕃宰相倚祥叶乐、节度尚检赞,率军进攻越嵩⁷³、会同⁷⁴,越嵩被攻破,会同唐军投降;南诏夺取大量的人口、牲畜和各类物资,“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次年唐朝夺回越嵩,以杨廷进为都督,兼领台登⁷⁵。吐蕃赞普又遣使至南诏言:“汉今更置越嵩,作爰昆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阁罗凤乃遣长子凤伽异驻军泸水,权事制宜;令大军将杨传磨侔等,与军将欺急历如数道齐入。南诏、吐蕃联军攻占越嵩和台登,俘虏杨廷进及大部分唐军,进而攻下邛部⁷⁶,南诏势力所及,已至大渡河南岸。因南诏、吐蕃结盟,吐蕃亦以“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其控制的边界⁷⁷。

永昌⁷⁸及其以西的寻传地区,汉代以来为西至身毒道所必经,“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南通北海,西近大秦”,战略地位重要,开发前景可观。唐宝应元年(762),阁罗凤率军亲征寻传地区。南诏军“刊木通道,造舟为梁”,对征服地区的居民慑之以威、喻之以辞,永昌以西的寻传蛮⁷⁹和祈鲜山⁸⁰地区的裸形蛮等部落均被收服。南诏又在寻传地区“择胜置城”,于今云南盈江县以西的曼冒建镇西城,置镇西节度管辖当地。南诏还在今云南西双版纳设置银生节度。对滇东地区南诏也积极经营,在有盐池之利位“诸爨要冲”的安宁设置城监,加强对经道路相连的滇东北、滇东南和黔西地区的控制。次年,南诏统治者巡视昆川,认为该地“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遂于永泰元年(765)令凤伽异在今昆明市拓东路一带置拓东城,“居二诏,佐镇抚”。拓东城的地位相当于南诏的陪都,其修建大体上奠定以后昆明城的基础。拓东城建立之后,南诏政权“威慑步头,恩收曲、靖,颁诏所及,翕然俯从”⁸¹,东北至今云南昭通,南至今云南建水的滇东、滇东南地区,均被南诏所控制。

吐蕃与南诏实现联合后,在东北面和东面的势力大为扩展。广德元年(763)七月,吐蕃攻下唐朝控制的大震关(在今陕西陇县西境),连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数年之间,西北地区数十州相继失陷,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的广大地区被吐蕃占据。十月,吐蕃军至咸阳,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等20万余众,“弥漫数十里”。随后吐蕃军队进入长安,大肆掠夺纵火,代宗率下属逃往陕州,百姓避入山谷。十二月,吐蕃又攻陷松州⁸²、维州⁸³、保州⁸⁴以及云山新筑二城,唐西川节度使高适(约701—765)不能相救,

“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矣”⁸⁵。8世纪六七十年代,吐蕃再度饮马岷江,进攻时常以南诏军为前锋;南诏军操倍寻之戟,且战且进,“蜀兵折刃吞镞,不能毙一戎”。由于南诏军队攻下一地即肆行掠夺和杀戮,蜀人相语:“西戎尚可,南蛮残我。”⁸⁶吐蕃大举攻唐屡屡得手,与南诏与唐朝反目为仇有很大关系。

三 南诏与唐朝关系破裂之原因

弄清唐朝与南诏关系破裂的原由,姚州府都督张虔陀是一个关键的人物。

南诏主阁罗凤受唐朝边吏的压迫,其反抗之爆发,是包围并攻下姚州都督府所在地姚州。攻下姚州既酿成大祸,面对唐朝大军征讨,阁罗凤慌忙谢罪,并应诺归还所俘掠及重建姚州城,可见姚州在双方眼中地位之重要。前已述及,武德四年(621)唐朝于今云南姚安附近置姚州,以统辖云南西面与西北面的诸羁縻州。待滇西局势基本稳定,唐廷于麟德元年(664)移姚州治所于弄栋川⁸⁷,并改姚州为姚州都督府,下辖滇西、滇西北一带的57个羁縻州。姚州还为由成都南下云南之清溪关重要通道所必经,因此是唐朝管辖云南、监控南诏的咽喉要地与前沿堡垒。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彻底破裂之后,姚州百姓皆被南诏“移隶远处”,南诏废弃姚州城而另建新城弄栋城,“管杂蛮数部落,悉无汉人”⁸⁸。可见南诏视唐朝控制下之姚州为眼中钉、肉中刺。

关于张虔陀所任官职。《南诏德化碑》说:“越嵩都督张虔陀,曾任云南别驾。以其旧识风宜,表奏请为都督。”《蛮书·附录》“异牟寻献状”则言:“天宝九载,被姚州都督张乾陀等离间部落,因此与汉阻绝。”由此可知,张虔陀原任云南郡别驾与越嵩都督,后调任姚州都督府都督。在姚州改置为都督府之前,包括南诏辖地在内的滇西地区,均属越嵩都督府管辖,姚州改置都督府之后,滇西地区遂改由姚州都督府统辖。《唐会要》和《新唐书》称张虔陀为云南太守。据《新唐书·地理六》:“姚州云南郡,下。武德四年(621)以汉云南郡地置。土贡:赆金、麝香。户三千七百,县三。”⁸⁹据《通典·云南郡》:麟德元年(664),唐朝于弄栋川置姚州,“或为云南郡”,领姚城、长明、泸南等三县⁹⁰。另据《读史方輿纪要·姚安军民府》:唐武德中(618—626年)置姚州,初为姚州总管府,贞观四年(630)改置都督府于戎州;“《通典》姚州麟德元年(664)始移于弄栋川也,又咸亨三年(672)永昌蛮叛,寇姚州,调露二年(680)永昌蛮复寇姚州败州兵,于是废姚州。垂拱四年(688)复置,仍为都督府,羁縻诸州。天宝初(约742年)曰云南

郡,既而蒙氏据其地,天宝七载(748年)州为南诏蛮所陷”⁹¹。可见所言之“云南郡”,或为姚州都督府所属,姚州或一度称为“云南郡”。张虔陀先后任云南郡别驾、越嵩都督和姚州都督,姚州和越嵩都督府所在地嵩州(今四川西昌),均是唐朝监控南诏的关键地区,在唐朝与南诏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其官府及其要吏必首当其冲。

至于《资治通鉴》、《旧唐书·南诏传》、《新唐书·南诏传》、《唐会要·南诏蛮》所说姚州都督府都督张虔陀之不法行为,如,“南诏常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一类的说法,不仅有违常理,而且未见之于记载南诏情形的权威史籍《蛮书》,甚有可能是后人补记,可信程度并不高。记载张虔陀等唐吏所为最详细、最可信的是记载南诏与唐朝关系破裂之原由,为“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⁹²之叛非本心也”而作的《南诏德化碑》。《南诏德化碑》言张虔陀“旧识风宜”,即先前与南诏关系不错,并被认为甚知道理,因此南诏建议唐朝任命其为姚州都督府都督,若说以后张虔陀以蛮横无理、随意欺压之态度对待阁罗凤,亦于情理不合。关于张虔陀任姚州都督之后的“罪状”,《南诏德化碑》详细列举如下:

又越嵩都督张虔陀,尝任云南别驾,以其旧识风宜,表奏请为都督,而反诳惑中禁,取起乱阶。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二也。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却收录与宿,欲令仇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弊我,六也。于时驰表上陈,屡申冤枉,望上照察,降中使贾奇俊详覆。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将叛。王乃仰天叹曰:‘嗟我无事,上苍可鉴。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即差军将杨罗颠等,连表控告。岂谓天高听远,蝇点成瑕,虽布腹心,不蒙矜察。管内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实当之。自可齐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难不防,坐招倾败于此。’差大军将王毗双、罗时牟苴等扬兵送檄,问罪府城。⁹³

《南诏德化碑》说张虔陀有以下六罪:“与吐蕃阴谋拟共灭我”⁹⁴,“阁罗凤庶弟诚节因“不忠不孝”被贬在外地,而张虔陀奉使归,“拟令间我”;爨崇道“罪合诛

夷”，而张虔陀收留之，“欲令仇我”；与南诏相恶者，张虔陀授与官职，而与南诏亲好者则“咸遭抑屈”，这样做的目的是“务在下我”；其五是“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其六是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敝我”。南诏驰表上陈，屡申冤枉，唐遣中使贾奇俊前来调解，但贾奇俊“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将叛”。

《南诏德化碑》所云不能说毫无夸大，但与其他记载相印证，所言仍大体可信。贞元九年(793)，南诏王异牟寻遣三路使者致书韦皋，云：“异牟寻世为唐臣，曩缘张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为澄雪，举部惶窘，得生异计。”⁹⁵在南诏叛唐近50年之后，南诏王异牟寻仍坚持因“张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为澄雪”，南诏被迫反抗的说法，也反映了南诏一直认为张虔陀是唐朝与南诏反目为仇的主要责任者。

从以上记载看来，作为统治滇西唐朝官府的命官张虔陀，忠实地维护唐朝的利益。他根据云南形势的急剧变化，即南诏兼并滇东地区后已威胁到唐朝在云南的利益，制定周密的计划，用种种办法离间与削弱日渐坐大的南诏，为此目的还与吐蕃接洽以牵制南诏，甚至进行与南诏作战的军事准备。可见张虔陀所为十分周密并有明显的针对性，经过系统的部署，并非如《资治通鉴》、《旧唐书·南诏传》、《新唐书·南诏传》、《唐会要·南诏蛮》所言，是昏庸边吏一时的随意胡为。

据《南诏德化碑》所言，唐朝收到南诏“屡申冤枉”、控告张虔陀的奏疏后，即派中使贾奇俊来了解情况。贾奇俊“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⁹⁶将叛”，即完全肯定张虔陀的做法。阁罗凤仍坚持认为是张虔陀诬陷，致使唐廷“不蒙矜察”；遂复遣军将杨罗颠等携表上京控告，但终无下文。在这样的情况下，阁罗凤派兵包围并进攻姚州。由此看来，张虔陀等离间与削弱南诏，甚至进行与南诏作战之军事准备的做法，是得到朝廷首肯的。

因此，南诏与唐朝关系的决裂，绝非如以后的一些记载所言，是缘于唐朝镇将个人的欺压勒索，事实是南诏的扩展与唐朝在云南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双方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张虔陀无非是首当其冲的当事人而已。张虔陀对南诏采取严峻苛刻的态度，实际上是唐朝对南诏的政策从扶植和依靠，转变为抑制甚至寻隙打击的一种表现。

由此观之，张虔陀是一个较为清醒且干练的边吏，他认识到南诏势力坐大威胁到唐朝在云南的利益，于是采取相应的对策。张虔陀在这一时期的所为，在南诏叙述相关史实的《南诏德化碑》中清楚地得以体现。《南诏德化碑》之所以记

载张虔陀种种限制和警告南诏的做法,反映了南诏不愿承认也不愿相信,原本支持和庇护自己的唐朝,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了脸,从支持及庇护者变成了可怕的对对手与敌人;因此认为与唐朝关系骤然紧张,是由于镇吏张虔陀的欺压并诬告自己。南诏统治者将相关情况刻于《南诏德化碑》,是希望以后若与唐朝恢复友好关系,“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南诏德化碑》还说南诏为此“于时驰表上陈,屡申冤枉,望上照查”,即多次派人到唐朝申诉冤屈,希望唐朝统治者制止张虔陀的敌对做法,这也反映了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南诏始终以唐廷为争议的最高裁决者。

四 一些史籍归罪于张虔陀之原因

对姚州事件前后其他相关唐吏的表现,亦有必要做一分析。

对张虔陀和先后任剑南节度之章仇兼琼与鲜于仲通,以及云南郡都督李宓等重要边吏⁹⁷,在姚州事件前后的表现,有关史料之主要记载如下:⁹⁸

初,节度章仇兼琼,不量成败,妄奏是非;遣越雋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赋重役繁,政苛人弊,被南宁州都督爨归王、昆州刺史爨日进、梨州刺史爨棋、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煞竹灵倩,兼破安宁。天恩降中使孙希庄、御史韩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诏招讨。诸爨畏威怀德,再置安宁。其李宓忘国家大计,蹶章仇诡踪,务求进官荣。宓阻扇东爨,遂激崇道,令煞归王,议者纷纭,人各有志。王务遏乱萌,思绍先绩,乃命大军将段忠国等,与中使黎敬义、都督李宓又赴安宁,再和诸爨。而李宓矫伪居心,尚行反间,更令崇道谋煞日进。东爨诸酋并皆惊恐,曰:‘归王,崇道叔也,日进,弟也。信彼谗构,煞戮至亲,骨肉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佑。’乃各兴师,召我同讨。李宓外形忠正,佯假我郡兵;内蕴奸欺,妄陈我违背。赖节度郭虚已仁鉴,方表我无辜。李宓寻被贬流,崇道因而亡溃。⁹⁹

自秋毕冬,故延时序,尚仁王命,冀雪事由。岂意节度使鲜于仲通已统大军取南溪路下,大将军李晖从会同路进,安南都督王知进自步头路入。既数道合势,不可守株,乃宣号令,诫师徒四面攻围。三军齐奋,先灵冥佑,神炬助威,天人协心,军郡全拔,虔陀饮鸩,寮庶出走。王以为恶止虔陀,罪岂加众,举城移置,犹为后图,即便就安宁再申哀恳。城使王克昭执惑昧权,继

违拒请。遣大将军李克铎等帅师伐之。我直彼曲，城破将亡，而仲通大军已至曲靖，又差首领杨子芬并云南录事参军姜如之赍状披雪：‘往因张卿谗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存见亡，在得思失，二城复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劲至江口。我又切陈丹款，至于再三。仲通拂谏弃亲，阻兵安忍；吐发唯言屠戮，行使皆被诋呵，仍前差将军王天运帅领骁雄，自点苍山西欲腹背交袭。¹⁰⁰

兼琮秉节，贪荣构乱；开路安南，攻残西爨；竹倩见屠，官师溃散；赖我先王，怀柔伏叛。祚不乏贤，先猷是继；郡守诡随，贬身遐裔；祸连虔陀，乱深竖壁；殃咎匪他，涂豕自殄。仲通制节，不询长久；征兵海隅，顿营江口；矢心不纳，白刃相守；谋用不臧，逃师夜走。汉不务德，而以力争；兴师命将，置府层城；三军往讨，一举而平；面缚群吏，驰献天庭。李宓总戎，犹寻覆辙；水战陆攻，援孤粮绝；势屈谋穷，军残身灭；祭而葬之，情由故设。¹⁰¹

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玄宗天宝七载，南诏阁罗凤袭云南，仲通褊急寡谋，及云南太守张虔陀矫诈，遇之不以礼。旧事：南诏尝与其妻女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征求，阁罗凤皆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阁罗凤忿怨，因发兵反，攻围虔陀，杀之，时天宝九载也。明年，仲通兵出戍嵩州，阁罗凤遣使谢罪，仍与云中录事参军姜如芝俱来，请还其所掳掠，且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军逼天和城，为南诏所败。天宝十三载，阁罗凤既臣吐蕃，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执国政，仍奏征天下兵，俾留后侍御史李宓将十余万，犒饷者在外，涉毒瘴，死者相属于路，天下始骚然苦之。宓复败于太和城北，死者十八九。会安禄山反，阁罗凤乘衅攻陷嵩州。¹⁰²

开元二十七年，长史张宥奏充剑南采访支使。宥方谋拔安戎，独与公计划幕中之事，一以咨公，司马章仇兼琼恶之；及代宥节度，乃移郡收公，月余仍释之。俄令摄判使事，监越雋兵马，复奏充采访支使，尽护邛南军事，首尾二载，冒暑渡泸者凡一十八度。公秉操坚忮，吏人望而畏之，改授新繁尉，充山南西道采访支使。顷之，云南蛮动，琮请公往，以便宜从事。公戮其尤害者数人，蛮夏慑服。……（天宝）五载，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郭公虚己代琮节制，郭以庶务一皆仗公。……及郭公云亡，……遂拜公为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持节、充剑南节度副大使。¹⁰³

据上所述,先后任剑南节度使之章仇兼琼与鲜于仲通,以及云南郡都督李宓,虽性情各异,但对南诏之崛起亦早有警惕并采取一些行动,同时将有关情况报告朝廷,《南诏德化碑》因此说章仇兼琼“不量成败,妄奏是非”,言李宓“躐章仇诡踪”,在南诏征讨东爨白蛮时肆行离间计,并“妄陈我¹⁰⁴违背”。《南诏德化碑》为一家之言,其述章仇兼琼、李宓等唐吏之所为不可尽信;因无其他可靠记载之参证,其详细情形今已不可得知。但以下几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唐与南诏之矛盾非始于鲜于仲通任剑南节度之时,南诏与唐破裂亦非张虔陀个人之私人行为所可解释。章仇兼琼、鲜于仲通、张虔陀与李宓等唐朝边吏,对南诏在云南的扩展均持强硬态度,至于《南诏德化碑》所说张虔陀抵制与削弱南诏的种种做法,亦未见有唐朝相关诸边将反对的情形。

据《南诏德化碑》:“王¹⁰⁵以为恶止虔陀,罪岂加众,举城移置,犹为后图,即便就安宁再申衷恳。”可见阁罗凤认为冤枉和压制自己的主要是张虔陀,把张虔陀与云南其他的唐吏大致分开。对阁罗凤以上认识之一个较合理的解释,是张虔陀先后担任云南郡别驾、越嵩都督和姚州都督,是唐朝方面削弱南诏计划主要的策划者与实施之组织者,因此为南诏所深恶痛绝。此外,如前所分析,南诏一直认为张虔陀的严苛态度属唐吏个人所为,不愿承认也不愿相信原本支持自己的唐朝,立场骤然会发生改变,张虔陀的做法为唐朝所首肯。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何《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史籍,将南诏与唐朝关系之破裂,认为是由于张虔陀等人对南诏无理欺压、“遇之不以礼”所致?

笔者认为,其原因首先是朝中擅权的杨国忠等人,将唐朝与南诏关系破裂的责任推到张虔陀头上,以之为唐朝边政与用兵之失败的替罪羊。在南诏与唐朝关系问题上,杨国忠等人不止一次歪曲事实欺骗朝廷。如据《旧唐书·杨国忠传》:

南蛮质子阁罗凤亡归不获,帝怒甚,欲讨之。国忠荐润州人鲜于仲通为益州长史,令率精兵八万讨南蛮,与罗凤战于泸南,全军陷没。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仍令仲通上表请国忠兼领益部。十载,国忠权知蜀郡都督府长史,充剑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仍荐仲通代己为京兆尹。国忠又使司马李宓率师七万再讨南蛮。宓渡泸水,为蛮所诱,至大和城,不战而败,李

宓死于阵。国忠又隐其败，以捷书上闻。¹⁰⁶

据相关史籍的记载，阁罗凤未曾入唐朝为质，亦无“亡归不获”之事。另据《新唐书·南诏传》：“天宝初（约742年），遣阁罗凤子凤迦异入宿卫，拜鸿胪卿，恩赐良异。七载（748年），归义死，阁罗凤立，袭王，以其子凤迦异为阳瓜州刺史。”《旧唐书·杨国忠传》所言南蛮质子亡归者是否为凤迦异，待考。但杨国忠以“质子阁罗凤亡归不获”为由而出兵征讨，所奏与事实不符。鲜于仲通兵败南诏，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仍令仲通上表请国忠兼领益部”。以后李宓所率唐军再战失败，杨国忠“又隐其败，以捷书上闻”。在杨国忠权倾朝野、多次欺骗朝廷的情况下，他把用兵失败的重大责任推到已死的张虔陀身上，是完全有可能的。贞元三年（787年），李泌献策于德宗，建议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与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至矣”。李泌又言：“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¹⁰⁷李泌谓“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所言必有所据。

原因之二，是天宝十四载（755年）范阳等三道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叛，揭开了唐朝社会矛盾大爆发的序幕，以后在全国性长期的战乱中官吏档案大量丢失，可能致使南诏叛唐这一段历史之真相被长期掩盖。贞元四年（788）的吏部奏文中，已指出由于安史之乱导致官员人事档案大量丢失，以及由此造成铨选与考课混乱的情形：

伏以艰难以来，年月积久。两都士类，散在远方，三库敕甲，又经失坠。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诈欺。分见官者，谓之擘名；承已死者，谓之接脚。乃至制敕旨甲，皆被改张毁裂。如此之色，其类颇多。比来因循，遂使滋长。所以选集加众，真伪混然。实资检责，用甄泾渭。

奏文进而提出整顿之法：

谨具由历状样如前。伏望委诸州府县，于界内应有出身以上，便令依样通状，限敕牒到一月内毕，务令尽出，不得遗漏。其敕令度支急递送付州府，州司待纳状毕，以州印印状尾，表缝相连，星夜送观察使。使司定判官一人，

专使勾当都封印,差官给驿递驴送省……其状直送吏曹,不用都司发。人到日,所司造姓攒勘合,即奸伪必露,冤抑可明。¹⁰⁸

记载南诏与唐朝关系的第一手材料,除南诏自撰的《南诏德化碑》以外,还有咸通年间(860—874)任安南都护府官吏之樊绰,经长期细致调查呈报朝廷关于南诏情况的长篇报告¹⁰⁹。令人费解的是,《蛮书》提到张虔陀和唐朝之姚州,仅有以下数处记载,省略或有意隐匿对张虔陀与姚州事件的叙述与评价:

阁罗凤攻石和城,擒施谷皮,讨越析,梟于赠,西开寻传,南通骠国。及张乾陀陷姚州,鲜于仲通战江口,遂与中原隔绝。阁罗凤尝谓后嗣悦归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前过也。¹¹⁰

弄栋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余里,东西三十余里。废城在东岩山上。当川中有平岩,周回五六顷,新筑弄栋城在其上。管杂蛮数部落,悉无汉人。姚州百姓陷蛮者,皆被移隶远处。¹¹¹

念异牟寻乃祖乃父忠赤附汉。去天宝九载,被姚州都督张乾陀(?—750)等离间部落,因此与汉阻绝,经今四十三年。¹¹²

另据《资治通鉴·唐纪》:天宝间唐军三次进攻南诏,丧师数十万人,“无敢言者”。玄宗尝谓高力士(684—762):“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答:“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玄宗云:“卿勿言,朕徐思之。”¹¹³看来玄宗虽唯杨国忠等权臣之言是听,但对征南诏失败的情形仍有耳闻。值得注意的是高力士提醒玄宗“云南数丧师”堪忧,但未言及“云南数丧师”之原由。

由此看来,张虔陀等边吏为维护唐朝在云南的利益,采用种种办法限制及削弱南诏,其做法得到唐廷首肯。张虔陀等对南诏采取严峻苛刻的态度,反映出唐朝对南诏的政策,从初期的扶植与依靠,逐渐转变为抑制甚至寻隙打击。唐朝与南诏的关系破裂后,张虔陀成为此事的替罪羊。造成这一历史冤案的原因,可能是杨国忠等权贵欺骗朝廷并将责任推到已死的张虔陀身上,致使唐代无人敢言及在云南的失败。唐代记载南诏的第一手材料《蛮书》,避而不谈张虔陀所为及姚州事件,可能亦与上述情况有关。此外,安史之乱以后官方档案大量丢失,也是上述历史真相被长期掩盖的另一原因。《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

《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史籍,沿用杨国忠辈的说法,误认为南诏反叛,是“张虔陀无故扰之使乱”。

五 从南诏与唐朝之关系看唐朝治边及其边吏

南诏与唐朝之关系,从南诏受唐朝扶持而崛起,到南诏于唐朝反目为仇进而发展为强大的地方政权,有唐统治者治边思想与治策方面的深刻背景。

唐朝前期经营云南,显然受到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治边思想的影响。从记载来看,唐太宗具有如下治边思想:“四海如一家”,“胡、越一家”;若边疆地区藩王凌上虐下,“民延颈待救”,唐廷不能坐视不问;“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若施之德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¹¹⁴。“四海如一家”、“夷狄亦人”的华夷平等观与“德泽治夷”的施德政观,是上述思想认识的核心。这些思想认识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表明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统治者,对边疆与内地结为一体的重要性,以及应以较平等态度对待边疆民族有较深刻的认识。唐太宗的治边思想较为开明,既缘于接受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教训以及继承隋文帝治边方略的积极成分,与唐皇室有少数民族血统,“患在夷狄”的意识较为淡薄也有一定的关系。

在上述思想认识的指导下,唐朝对云南积极进行经营开发。立国当年,百废待兴,唐统治者仍把经营云南视为要事。唐朝以滇东北和滇中为设治的起点,逐渐向滇西推进;在对滇东北和滇中的统治逐渐巩固后,乃把经营重点放在滇西和滇北地区。在天宝战争之前,唐朝在除今滇西北和澜沧江、怒江中下游区域以外的云南广大地区,设置若干都督府与和众多的羁縻府州,就设治之密与统治深入的程度而言,唐朝超过前代的诸王朝。在唐初统治的100余年间,云南社会经济水平明显提高,以西部的发展最为迅速。由于有唐前期的积极经营,南诏崛起之后,洱海地区才有可能超过滇中,成为云南地区新的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南诏凭借唐前期建设的基础,也才能打败唐朝数十万军队的征讨。

同时应指出,唐太宗治边思想的局限性亦较明显。首先,太宗治边与怀柔边疆民族的思想主要是从“四海如一家”、“德泽治夷”等道德观念出发,并未充分认识到开拓、巩固边疆所具有的深远意义,此外对开发边疆获取其资源的认识也不足。因此,唐廷经营边疆消耗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却因赋税收益甚微,以致难以继。神功元年(697),蜀州刺史张柬之上书请罢姚州,其言:“(姚州)今盐布

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戈戟之用不实于戎行,宝货之资不输于大国,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¹¹⁵可见这一弊端当时已较明显,并为一些边吏所认识。

唐朝在边疆普遍设置之羁縻府州,大致未出两汉边郡制度窠臼。唐朝的羁縻府州有如下特点:首先,主要为控制边疆少数民族而设,设治的出发点并非是为征收贡赋及征集丁壮;其次,在设治地区实行轻徭薄赋,羁縻府州的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唐朝在边疆实行的羁縻府州之制,与边疆社会经济发展的较低水平相适应,对巩固唐朝在边疆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羁縻府州的设置过多过广,通常以当地酋领为羁縻府州之边将,羁縻府州之贡赋版籍又多不上户部,必然使边疆地方势力易于形成,封建国家的财政也难以承受其庞大开支。一旦政局出现动荡,羁縻府州举兵反叛或中央政府失去对羁縻府州的控制,便属情理中之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天宝间南诏与唐朝彻底决裂,便不是纯粹出自偶然。对唐朝中期以后羁縻府州治策难以为继的情形,《资治通鉴》说:

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益、翼、茂、当、嵩、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万九百人。……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¹¹⁶

唐太宗死后,先后执政的高宗(680—683年在位)、武则天(684—705年在位)、玄宗诸帝,大体上继承太宗既定的治边之策;在玄宗统治的前期,还出现被称为“开元之治”的兴盛局面。但在“开元之治”时期,由于社会矛盾加剧与上层统治集团腐化,升平景象之后已隐藏深刻的危机。“开元之治”后不久爆发“安史之乱”,虽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但唐廷用人不当导致一些重大问题上处理失误,也是加重危机不可忽视的因素。姚州事件发生后,唐朝三次进攻南诏遭到失败,南诏与唐朝彻底决裂。以后唐朝在云南乃至全国的治边举措,处理边政事务多属就事论事,实际上放弃了前期普遍推行的羁縻府州治策。

安史之乱成为唐朝之羁縻府州治策从普遍推行到逐渐放弃的分水岭,还与

玄宗晚年的骄奢淫逸、疏理政事或草理政事有关。据《新唐书·刑法》：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但以后“天子亦自喜边功，遣将分出以击蛮夷，兵数大败”，士卒死伤以万计，国用耗乏，而转漕输送，远近烦费，“民力既弊，盗贼起而狱讼繁矣”¹¹⁷。

在贯彻统治策略方面，隋唐诸帝共有的一个特点是有始而无终¹¹⁸。隋文帝、唐太宗等杰出的封建帝王，重视法制并强调依法治国，但正是隋、唐提出的法制理论及其实践，使人们看到封建法制理论与法制体系的历史局限，证明在封建社会人制始终大于法制，一些较开明的治策及其实践鲜克有终，与封建社会之政策因受人治政治支配而具有不稳定性有如影随形的关系。

封建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边疆问题十分复杂，影响边疆形势的因素很多，处理边疆问题绝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西汉建国时，王莽（前45—后23）欲穷追匈奴，部将严尤谏曰：

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猘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贵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¹¹⁹

唐臣陆贽（754—805）也说：封建王朝治理边疆及边疆诸族，“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形变不同，胡可专一”¹²⁰。

在这样的情况下，镇守边疆的将吏忠诚及干练与否，便成为影响治边成败的关键；重视并慎选合适的边吏镇将，是历朝统治者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的治边经验。唐朝前期对边吏镇将的任命有严格的规定，其内容包括必须选用忠厚名臣，边吏镇将不可久任，不能遥领，不得兼统。但自开元（713—741年）间始，出自统治者认识方面的失误以及吏治废弛的局限，唐廷遂改变原有规定。《资治通鉴》叙述了这一变化：

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

往入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¹²¹

天宝之后唐朝选任的边吏镇将,仕宦素质参差不齐,虽然有过韦皋(745—805)这样杰出的镇将,但毕竟人数不多。贞元十年(794)唐朝与南诏再次结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川节度使韦皋精明强干且讲究谋略。《资治通鉴》对韦皋作如下评价:

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赋敛,丰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士卒婚嫁死丧,皆供其资费,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乐为之用,服南诏,摧吐蕃。幕僚岁久官崇者则为刺史,已复还幕府,终不使还朝,恐泄其所为故也。府库既实,时宽其民,三年一复租赋,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至今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¹²²

总体来看,天宝以后唐朝边吏的治理水平较唐前期明显下降,成为唐后期边疆局势失控、动乱难以制止的重要原因。例如:西川节度使杜元颖(769—832)治蜀失误,给南诏以可乘之机。据《资治通鉴·唐纪》:“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南诏自嵯巖谋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嵯巖兵至,边城一无备御。”¹²³退一步来说,王嵯巖(?—859)率南诏军攻西川得手,与此前数十年唐朝疏于防备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李德裕(787—850)任西川节度使后说:韦皋任职西川时,“亭障不修,边防罢警,若后人加置一卒,缮里一城,必有异词,便乖邻好。自武元衡以后,三十余年,戎备蕩然,不可独责元颖”¹²⁴。

唐朝因吏治腐败,处理边事失当的事例又如:太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831)谋降唐,尽率其众奔至成都。李德裕遣行维州刺史虞藏俭率兵入据其城,并奏其状,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烧十三桥,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没身恨不能致者也!”文宗(827—840年在位)诏尚书省集百官商议,群臣皆赞同李德裕之策。牛僧孺(780—848)则以不可失信于吐蕃为由反

对。文宗昏庸,竟诏李德裕以其城归还吐蕃,执悉怛谋及所与偕来者悉归吐蕃,“吐蕃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¹²⁵。咸通年间(860—874年),南诏遣使者杨酋庆来谢释董成之囚,唐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欲激怒南诏以求功,竟杀酋庆。西川边将暗恨唐吏李师望贪残且聚私货以百万计,“阴遣人致意南诏,使人寇”¹²⁶。东蛮苴那时、勿邓、梦冲等三部早先附唐,曾助韦皋破吐蕃有功。其后唐朝边吏待之刻薄,东蛮诸部怨唐至深,遂归附南诏,“每从南诏入寇,为之尽力,得唐人,皆虐杀之”¹²⁷。有关记载又如:大中时(847—859年),安南经略使李琢苛墨自私,以斗盐易蛮一牛。夷人不堪,暗结南诏将领段酋迁攻陷安南都护府。雋州刺史喻士珍贪婪,“阴掠两林东蛮口缚卖之,以易蛮金,故开门降。南诏尽杀戍卒,而士珍遂臣于蛮”¹²⁸。容管辖下黄少卿万余众叛唐,国子祭酒韩愈(768—824)奏其原因言:“比缘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韩愈还说:“仍为选择有威信者为经略使,苟处置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¹²⁹可见因边吏镇将施治不当或酷剥诸蛮,导致当地夷民反抗的情形在唐朝中后期并非少见。

由于边疆路程遥远、仕宦难度较大等原因,内地官吏多不愿前往,也给朝廷遴选边吏造成较大困难。唐朝解决的办法之一是积极选用当地人,时称“南选”。据《资治通鉴》:“敕:‘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注拟土人,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谓之南选。”¹³⁰“南选”属朝廷不得已而为之,但难以保证选用边吏的质量。清人王夫之(1619—1692)因此说:

唐初桂、广等府,官之注拟,一听之都督,而朝廷不问,治之大累也。边徼之稍习文法者,居其土,知其利,则贪为之,而不美内迁;中州好名干进之士,恶其陋,而患其绝望于清华,则鄙夷之而不屑为。仪凤元年,始遣五品以上同御史往边州注拟,庶得之矣,犹未列于吏部之选也,后世统于吏部,以听廷除,尤为近理。然而县缺以处劣选,且就地授人,而虽有廉声,不得与内擢之列,吏偷不警,夷怨不绥,民劳不复,迨其叛乱,乃勤兵以斩刈之,亦惨矣哉!千年之积弊,明君良和弗能革也,可胜悼哉!¹³¹

德宗时(780—805年在位),针对唐朝治边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陆贽上疏曰:

将欲去危就安,息费从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长而已。若乃择将吏以抚宁众庶,修纪律以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迹以柔远;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彼为寇则严备而不务报复,此当今之所易也。贱力而贵智,恶杀而好生,轻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后动,俟其时而后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逼其入,寇大至则谋其人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我之所长,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难。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铍授寇者也!今则皆务之矣,犹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惩者,其病在于谋无定用,众无适从。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铃,艺乏趋敏。动则中国畏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¹³²

陆贽所论颇为精辟,可视为中国古代治边经验之重要总结。但唐朝 290 年的治边实践,与陆贽所说治边之理想境界差距甚远,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形不仅见于唐代,也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其他时期。本文之探讨涉及诸多问题,表明历史发展情形之复杂多样,以及后人认识历史真相之艰巨。进而言之,历史研究之所以具有无穷的魅力,这也是其原因之所在。

〔注 释〕

- 1 赞同《旧唐书》等史籍相关见解的论著,如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页 232。岑仲勉,《隋唐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页 281。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 611。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页 402。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 10

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1811。《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页731。

认为导致南诏与唐朝关系破裂的原因,应从当时形势的变化寻找,但未深入研究与阐述的论著,如尤中,《云南民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页136。卢勋等,《隋唐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页302。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页289。另外,一些论文分析了南诏与唐朝关系演变有关的问题,如方铁撰写的《论唐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页51;《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间的关系》,载《中国藏学》,2003年第3期,页41;《论南诏不是国家级政权》,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页50;《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页46。

- 2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两爨蛮》,页6315。
- 3 治今云南曲靖以西。
- 4 治今云南曲靖。
- 5 治今四川宜宾。
- 6 《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四·剑南道》,页1692。
- 7 在今四川盐源以南至洱海周围地区。
- 8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贞观二十二年(648)四月,页6255。
- 9 在今云南昆明至大理一带。
- 10 《旧唐书》,卷四,《高宗纪》,页69。
- 11 在今云南姚安。
- 12 《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四·剑南道》,页1697;《旧唐书》,卷四,《高宗纪》,页85。
- 13 治今云南曲靖。
- 14 治今四川宜宾。
- 15 治今云南姚安。
- 16 《旧唐书》,卷九一,《张柬之传》,页2941。
- 17 治今越南河内。
- 18 治今四川彭水。
- 19 治今四川西昌。
- 20 参见安应民著,《吐蕃史》,1989,页69。
- 21 在今四川马尔康东南。
- 22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页5224。《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永隆元年(680)七月,页6396。
- 23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永昌元年(689)五月,页6457。

- 24 《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页144。《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页6081。《资治通鉴》，卷208，《唐纪二十四》，景龙元年(707)六月，页6610。
- 25 《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景云元年(710)十二月，页6661。《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页6081。谓唐九征率兵击姚州叛蛮在李知古讨姚州蛮之后，不准确，今从《资治通鉴》。
- 26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开元二十六年(738)九月，页6835。
- 27 方案：“笮路”即指姚州通道。
- 28 《蛮书》(云南志)，附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331。
- 29 今云南洱源。
- 30 在今云南丽江塔城。
- 31 蛮语谓“王”为“诏”。
- 32 在今云南巍山县南。
- 33 麽些蛮为今纳西族的先民。
- 34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开元二十六年(738)九月，页6835。另，乌蛮为今彝族的先民。
- 35 《蛮书》，卷三，《六诏》，页102至116。
- 36 《蛮书》，卷五，《六赕》，页197。
- 37 在今云南弥渡红崖。
- 38 (唐)张九龄，《敕剑南节度王昱书》，载(清)董浩等，《全唐文》卷286，页2901。
- 3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开元二十六年(738)九月，页6836。
- 40 在今西藏拉萨。
- 41 在今云南保山。
- 42 《蛮书》，卷三，《六诏》，页109；《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传中·南诏传》，页6295。
- 43 (唐)《封蒙归义云南王制》，载(清)董浩等，《全唐文》，卷二四，页277。
- 44 《旧唐书》，卷一旧七，《南蛮·南诏传》，页5280。
- 45 在今云南洱源。
- 46 治今云南祥云县。
- 47 《蛮书》，卷三，《六诏》，页110至115。(唐)郑回，《南诏德化碑》，碑文见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页156。
- 48 (唐)高骈，《唐剑南西川节度使牒云南诏国牒》，载(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四，昆明，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 49 治今云南曲靖附近。
- 50 治今越南河内。

- 51 今云南建水。
- 52 今云南安宁。
- 53 治今四川宜宾。
- 54 《蛮书》，卷四，《名类》，页128至129；（唐）郑回，《南诏德化碑》，碑文见汪宁生，《云南考古》，页156。
- 55 在今云南祥云县境。
- 56 今云南大理。
- 57 《蛮书》，卷四，《名类》，页129；（唐）郑回，《南诏德化碑》，碑文见汪宁生，《云南考古》，页156。
- 58 《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诏传》，页5280。
- 59 《唐会要》，卷九九，《南诏蛮》，北京，中华书局，1955，页1763。
- 60 方案：此处之“我”指南诏。
- 61 今云南姚安。
- 62 今四川宜宾。
- 63 今四川西昌。
- 64 在今云南曲靖、大关一带。
- 65 郑回，《南诏德化碑》，碑文见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页156；《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天宝十载（751）四月，页6907。
- 66 （唐）杨国忠，《破吐蕃献俘表》，载《全唐文》，卷三四六，页3509；《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天宝十一载（752）六月，页6912。
- 67 郑回，《南诏德化碑》，碑文见汪宁生，《云南考古》，页156。
- 68 同上67。
- 69 《资治通鉴》，卷216，《唐纪三十二》，天宝十二载（753）五月，页6918。
- 70 郑回，《南诏德化碑》，碑文见汪宁生，《云南考古》，页156；《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诏传》，页5281；《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天宝十三载（754）六月，页6920。《旧唐书·南诏传》记载李宓所率军队至云南在天宝十二载（753），有误，今从《南诏德化碑》与《资治通鉴》的记载。
- 71 郑回，《南诏德化碑》，碑文见汪宁生，《云南考古》，页156；《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天宝十载（751）四月，页6907。
- 72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天宝十三载（754）六月，页6927。
- 73 今四川西昌。
- 74 今四川会理。
- 75 在今四川泸沽。
- 76 在今四川越西东北。

- 77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页 5247。
- 78 今云南保山。
- 79 今德宏一带景颇族的先民。
- 80 今缅甸北部之甘高山。
- 81 同 67。
- 82 治今四川松潘。
- 83 治今四川理县东北。
- 84 治今四川理县以北。
- 85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广德元年(763)七月，页 7146；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广德元年(763)十月，页 7150；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广德元年(763)十二月，页 7158。
- 86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页 6027。
- 87 今云南姚安。
- 88 《蛮书》，卷六，《云南城镇》，页 211。
- 89 《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六》，页 1086。
- 90 《通典》，卷一七六，《州郡六·云南郡》，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 4637。
- 91 顾祖禹(清)，《读史方輿纪要》，卷一一六，《云南四·姚安军民府》，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页 729。
- 92 方案：指阁罗凤。
- 93 方案：指姚州。
- 94 方案：指南诏，以下相同。
- 95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蛮上·南诏传》，页 6272。
- 96 方案：指南诏。
- 97 李宓曾任云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有关记载见郑回，《南诏德化碑》，碑文见汪宁生，《云南考古》，页 156。
- 98 《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的有关记载，参见以上所述，此不赘述。
- 99 同 67。
- 100 同 67。
- 101 同 67。
- 102 《册府元龟》，卷四四六，《将帅部·生事门》，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03 《鲜于公神道碑铭》，载(唐)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 6，《四部备要本》。
- 104 方案：指南诏。
- 105 方案：指阁罗凤。

- 106 《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页3243。
- 107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十九》，贞元三年(787年)八月，页7502。
- 108 《唐会要》，卷七四，《选部上·论选事》，页1340。
- 109 此报告即后世所称之《蛮书》。樊绰撰《蛮书》原无书名，流入民间以后被称为《蛮书》或《云南志》。其记载始自南诏崛起，至咸通四年(863年)安南都护府被南诏攻陷为止。因其史料价值极高，《旧唐书》与《新唐书》之《南诏传》，大量采用《蛮书》记载的材料。
- 110 《蛮书》，卷三，《六诏》，页115。
- 111 《蛮书》，卷六，《云南城镇》，页211。
- 112 《南诏王蒙异寻与唐朝誓文》，见《蛮书》附录，页330。
- 113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天宝十三载(754)六月，页6927。
- 114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武德九年(626)九月，页6022；卷一九四，《唐纪十》，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页6104；卷一九七，《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644)二月与十二月，页6207，页6215；卷一九八，《唐纪十四》，贞观二十二年(648)二月，页6253。
- 115 《旧唐书》，卷九一，《张柬之传》，页2940。
- 116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天宝元年(742)正月，页6847。
- 117 《新唐书》，卷五六，《刑法》，页1415。
- 118 参见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页13，页69。
- 119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页3824。
- 120 《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页3805。
- 121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天宝六载(747)十二月，页6888。
- 122 《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唐纪五十二》，永贞元年(805)八月，页7620。
- 123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纪六十》，太和三年(829)十一月，页7867。
- 124 (唐)李德裕撰：《第二状奉宣令更商量奉来者》，载(清)董浩等，《全唐文》，卷703，页7220。
- 125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纪六十》，太和五年(831)九月，页7878。
- 126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咸通十年(869)十月，页8150。
- 127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纪六十八》，咸通十一年(870)二月，页8156。
- 128 《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中》，页6284。
- 129 《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纪五十七》，元和十五年(820)十二月，页7787。
- 130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仪凤元年(676)八月，页6380。
- 131 《读通鉴论》，卷二一，《高宗》，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622。
- 132 《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页3807至3812。

参 考 文 献

古籍

- 《册府元龟》，王钦若等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
《读史方輿纪要》，顾祖禹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读通鉴论》，王夫之著，北京，中华书局，1975。
《汉书》，班固著，北京，中华书局，1962。
《旧唐书》，刘昫等著，北京，中华书局，1975。
《蛮书》（云南志），樊绰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全唐文》，董浩等著，北京，中华书局，1982。
《唐会要》，王溥著，北京，中华书局，1955。
《通典》，杜佑著，北京，中华书局，1988。
《新唐书》，欧阳修等著，北京，中华书局，1975。
《颜鲁公文集》，颜真卿著，《四部备要本》。
《云南通志》（万历），李元阳著，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资治通鉴》，司马光著，北京，中华书局，1956。

今人论著

- 安应民，《吐蕃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岑仲勉，《隋唐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方铁，《论唐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方铁，《论南诏不是国家级政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方铁，《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间的关系》，《中国藏学》，2003年第3期。
方铁，《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卢勋等，《隋唐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尤中,《云南民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隋唐宋元明清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清代边臣明谊与中俄勘定西北边界交涉

陈维新 著

一 前言

19 世纪初期,俄国势力进入哈萨克地区,向清政府所属巴尔喀什湖(Lake Balkash)以东以南地区扩张,随后将该地区擅自划入该国版图,并将其势力向特穆尔图淖尔(即现在的伊塞克湖,Lake Issyk-Kul)一带推进。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想透过谈判签约的方式,将该国所占领土地的事实,要求清政府承认,予以合法化。俄国并拟定割占西北边境常住卡伦外土地方案,拟在谈判时,要求清政府全盘接受。俄国随即请清政府派出谈判代表与俄国会商,议定两国西北边界相关事宜。

咸丰九年(1859),明谊升任乌里雅苏台将军,朝廷命他会同参赞大臣明绪(?—1866)办理西北边境勘界事宜,明谊随即对查核中俄西北边境界址一事作准备工作。同治元年(1862),俄国派巴布科夫(Bobkov,1827—1905)、札哈洛夫(Zakhalov,1814—1885)与明谊、明绪等人正式展开勘分西北边界谈判。谈判过程进展并不顺利,俄国坚持以中国所设“常住卡伦”线为界,明谊则认为若以此为界,则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塔尔巴哈台所属爱古斯(Ayague)、勒布什(Lepsey)之哈萨克、伊犁所属特穆尔图淖尔哈喇塔拉(Kharatala)之哈萨克、布鲁特等部落,原乃大清国藩属,清政府并赏给部落首领爵职俸禄,赐予游牧之地,若分隶于俄国,这些牧民生计顿失所依,广大袤延万里的土地,将被俄国包去。

明谊奉命与俄国官员商议西北边境分界问题,当时他已年近七旬,此次谈判也是他任官以来最为辛苦艰难的任务,他须面对动辄以军事武力威胁,态度强悍的俄国谈判官员,也须承受来自朝廷要求他必须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且不可畏难迁就的压力。本文拟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谊档案及相关史料,探讨明谊

与俄国官员谈判西北边境分界时,在谈判过程中他的处事态度、做法及对俄国的看法作一简单的说明。

二 明谊生平简述

依据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文献记载,明谊(1792—1868),托克托莫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进士,在道光时期曾任武会试提调、员外郎、马馆监督、张家口税务监督、广东琼州府知府、甘肃安肃道、镇迪道等职务,行政经历丰富。

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喀什噶尔城发生安集延、布鲁特人纠结当地回民,屯聚城外寻衅闹事,明谊奉命前往当地,协助陕甘总督布彦泰(1791—1880)办理肃州粮台事务,平定回部起事后,朝廷以明谊办理有功,擢升为山西按察使。明谊因在甘肃任职期间,捐输银粮修缮乌鲁木齐城垣,经乌鲁木齐参赞大臣惟勤奏请奖励,明谊又被朝廷任命为甘肃布政使,明谊此时可谓一帆风顺。

但明谊因曾招苏姓道士治病,与道士讲论按摩功夫,给予布施银两,并将该道士转荐至伊犁,为伊犁将军萨迎阿(?—1857)治病。该道士后来改装易服并更改姓名为薛执中,前往京城用符咒等术祈雨为人治病,朝廷以煽惑滋事之罪名,将薛执中逮捕严讯,薛执中供出与其交往的相关官员,其中包括明谊等人,明谊因此事被朝廷飭令回旗听候部议,旋即被降四级调用直隶州知州候补,这是明谊在官场上遭遇到的一次挫折。

咸丰三年(1853),明谊奉命前往哈密任办事大臣,会同哈密帮办大臣庆英(?—1864)办理捐输军饷有功,咸丰四年(1854),朝廷赏给明谊头等侍卫职衔,并任命他为库伦办事大臣。咸丰五年(1855),朝廷命明谊前往塔尔巴哈台担任参赞大臣,当时发生俄国设在塔尔巴哈台的贸易站被采金矿工焚毁事件,造成中俄两国关系的紧张,明谊奉命与俄国官员谈判事件解决办法,并与俄国签订《塔尔巴哈台议定补贴条约》。咸丰九年(1859)十月,明谊经朝廷擢升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咸丰十年(1860),明谊因率部属捐助银两充为军饷之用,再次得到朝廷的嘉许¹。

三 明谊担任西界谈判大臣缘由

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中俄两国“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住卡伦等处。及雍正六年(1728)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北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第三条内载西边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中间之地,设立界牌之事,应如何定立交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²。咸丰十年(1860),清朝政府接到俄国照会,要求清朝政府依照《北京条约》规定,派出官员与该国共同会勘西疆未定之界。两国并约定于次年四月在塔尔巴哈台会商查办中俄西北边界。

恭亲王奕訢(1832—1898)认为,熟谙西北边界形势的在京官员甚少,所以他建请朝廷飭令伊犁将军就近于附近各城大臣中拣选熟悉情形官员向朝廷推荐,担任谈判大臣³。随即朝廷即命伊犁参赞大臣景廉(1824—1885)负责在当地附近各城大臣中,挑选“熟悉情形,通达事体者,酌拟数员,候旨简派”⁴。景廉接到朝廷的指示后不久,即与伊犁将军常清(?—1865)联合上奏朝廷推荐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担任谈判大臣职务,奏折提到明谊曾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办理俄国在该处的贸易站被焚事件,处置得宜,“于一切情形本臻熟悉,人亦老成谙练,若令会勘边界,谅必办理裕如”⁵。清朝政府随即发布谕旨,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等人,与俄国使臣谈判西北边界事宜。

明谊接到朝廷的派令后,随即赶往塔尔巴哈台与明绪先行会商,研究相关旧存地图查核比对,并派员前往实地勘查,作为将来与俄国谈判的依据。伊犁协领哈布齐贤等人亦奉命赴塔尔巴哈台协助中俄谈判事宜。明谊上奏朝廷表示他将竭力尽心与俄国谈判,“以仰副圣主慎守边疆,杜绝边衅之至意”⁶。明谊并与俄国在当地的领事官会面,取得俄国所绘地图,明谊详细阅看后,即向朝廷奏报,俄国主要目的是要“多占开齐,以为收服哈萨克之计。若任其私心所望,袤延甚广”⁷。所以将来与俄国使臣谈判,情势艰困,他自知“知识浅陋,荷蒙简派,报称维艰,临事次第筹办,惟有随时奏请谕旨指示”。明谊并说他在临折时心情是“不胜悚惶战栗之至”⁸。由此可知,明谊虽得到朝廷的重用,担当大任,但他内心压力之大,是他人无法了解的。

当明谊在塔尔巴哈台等后俄国谈判代表时,朝廷告知俄国拟将谈判会议延至咸丰十二年(1862)四月举行。朝廷命明谊暂时先回乌里雅苏台,俟明年与俄

谈判日期届至时,再到塔尔巴哈台。

明谊要回任时,得到俄国所派谈判使臣巴布科夫来到塔城的消息,并想与中国的谈判代表先行会面。依据明谊所写的奏折内容,当时是俄国派驻塔城官员向明谊表示,巴布科夫欲与清朝谈判代表见面。但依据巴布科夫所写的《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书中提到,当他抵达塔城的当天,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即派官员前去拜会他,邀请他与明谊、明绪等人会面。巴布科夫答应此邀请,他说他被委派担任谈判大臣,他不认为自己的地位低于将军(指明谊),因尊重他年长,所以他将先去拜会明谊。但他要求在他拜会清朝代表后,明谊须在隔日向他回拜⁹。而在《明谊等奏俄督派员前来会谈并接总理衙门行知改期明年会勘西界折》中,则说是俄国驻塔城领事派员送交该国西伯利亚总督的公文给明谊,说他将派遣大官前来与明谊会面,随后塔城领事官又亲自拜会明谊,说西伯利亚总督已知明谊等人在此久候,深感不安,所以将特派大官前来¹⁰。从档案数据的记载可知中俄双方的说法并不一致。

在约定见面的那一天,巴布科夫与驻塔城领事官等人行至明谊办公处所,明谊、明绪、哈布齐贤在门口迎接,双方礼貌性的寒暄后,巴布科夫问北京方面是否有给明谊任何指示,明谊说会后他会将朝廷委任他办理勘查国界事务的上谕内容,派人送到巴布科夫处,双方首次的会见即告结束。而巴布科夫在会后所收到明谊派人送来上谕内容提到,依据两国政府先前的协议,双方代表于来年勘查国界举行会议的地点订为塔尔巴哈台,日期为咸丰十二年(1862)四月十三日。

次日,明谊至巴布科夫处所回拜,明谊问巴布科夫在塔城停留的时间,巴布科夫说这要看双方能达成来年约定会议地点的共识时间的快慢作决定(显然俄国方面不同意以塔尔巴哈台作为会议地点)。这让明谊感到惊讶,因为他未曾从北京方面得到会议地点变更的指示,所以他回答说,关于此点他从未获得朝廷的指示,所以要变更会议地点,现很难与俄方达成协议。而且朝廷给他的谕旨中都未提到此事,要从何处开始划界,现很难谈。明谊说更何况他未看到俄国政府授予巴布科夫谈判的全权证书。巴布科夫则回答说,关于办理划界事宜,是受该国外交大臣及西伯利亚总督根据皇帝发布的谕示而委任他担任谈判使臣,明谊毋庸置疑。而且现与清朝政府代表会面,完全不涉及划定疆界的实质问题,只是希望谈妥来年在何地开会,以便他可以规划事先的安排工作。此次的会面仅是涉及准备工作而已,并利用此会议,来确定来年从何处开始划界。最后双方仅达成再派员协商的协议后,会议即告结束¹¹。

在明谊的奏折中则说,双方初次见面后三天,明谊等人至巴布科夫处所回拜,巴布科夫即向明谊表示,他与塔城领事官即是该国派来办理划定疆界代表,随即要明谊尽速展开划界工作,以便回国交差。明谊则向其询问有无带该国政府授权谈判印信,是否携有履勘地图,但俄方均无法呈出。明谊并说两国既有协议定于明年四月在塔城会议,自应届期再办。而俄方急欲与明谊会商,明谊认为巴布科夫未带印信前来,只是该国西伯利亚总督派来的官员而已,未便再与其会晤,所以才派哈布齐贤、遇春、萨勒哈春等三人前去再与俄方商议¹²。

过了几天,明谊派哈布齐贤及随员两名前往巴布科夫处所商谈,但哈布齐贤对于俄方安排会议座位席次方式表示不满,指俄方有意贬低他的身份。但巴布科夫认为此事是哈布齐贤“仗恃我们没有委任证书,要利用对我们的优越地位来进行谈判”。而且这种情况,显然是中国官员预先设计好的。所以对座位席位的争议,俄方并未让步。因为俄国认为若照哈布齐贤的要求,则巴布科夫及塔城领事官都要坐在低级的座位,结果双方不欢而散,俄国并将与哈布齐贤交涉争执过程,发文给明谊,要他公正处理此事¹³。

明谊将此事奏报朝廷并给俄方覆文,文中指责俄方的不是,并称对于俄方所提会议日期建议,在他未得到朝廷的指示前均无法决定,须等到明年才能会商。当然巴布科夫对清朝政府的答复甚为不满,为了得到清朝政府较为肯定的答复,经多次折冲,巴布科夫又与明谊等人会面,巴布科夫提出明年在沙宾达巴哈界碑处举行会谈,但明谊还是坚持依据朝廷给他的指示,谈判的地点绝不能在其他地方,而是要在塔尔巴哈台,而且是要在明年四月举行。巴布科夫则说“依据《北京条约》,按照地图约定国界方向,现在也可以实行,不必拖延到来年,到那时就可以直接开始设置界碑”¹⁴。俄方说明谊还是坚持划界一事须等到明年始可。

对于双方座位争议一事,明谊的说法是俄方“倨傲无知,预坐上位,令哈布齐贤下位坐议。哈布齐贤以宾主之礼,与之讲论,渠坚不肯让,哈布齐贤恐失体制,未能尽辞即回”。而明谊认为“华夷分界,事关重大,岂可因此小节与之辩论,肇启争端……此小节均可无较”¹⁵。而俄方塔城领事官此时送来该国西伯利亚总督的公文,称因巴布科夫启身仓促,所以才未及给予授权印信。文中并说勘界之事,现办与不办由清朝政府决定。明谊则覆文表示等到明年再议。

此时巴布科夫认为他已无留在塔尔巴哈台的必要了,而且他也利用在塔城停留期间,收集许多有关边界划定的相关资料,也包括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明谊、明绪等人在官场服务情况、才能、个性、嗜好等资料,调查非常详细,作为日后谈

判的参考依据。例如对明谊所收集的资料除了他历任那些公职外,还提到明谊具有温和个性,对自己的家属非常依恋,主要的弱点是喜欢喝酒。对于他担任边界谈判大臣一事,俄方的看法是明谊“不仅从欧洲的观点,而且从中国的观点来看,大概都不是很熟悉的”¹⁶。这些数据均有助于巴布科夫在与中国谈判时,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随即向明谊辞行,离开塔城。

四 明谊筹办勘定西界计划

明谊在塔城与俄国使臣交涉,将其心得上奏朝廷,他说巴布科夫“言词种种欺蒙,语多谲诈……外托和好,内肆侵贪,覬觐多端,窥伺已久,意在急遽商订,易行其诈”¹⁷。所以明谊建请朝廷将前订会议日期再与展缓,并先派出官员前往巡查边境各卡伦,并将易与俄方发生争议的地方如勒布什、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等地绘图作为未来与俄方谈判的依据。明谊并胪列豫商事宜五条,上奏朝廷:¹⁸

第一、分查履勘须添派委员:明谊认为因西界国境袤延万里,许多地名无可考,部分边界与唐努乌梁海、土尔扈特等处蒙古部落毗连,须增添人手办理。

第二、分界履勘须缓日月:由于当地气候关系,七月以后即下雪,天寒地冻,须待春尽夏初才能前往,所以查勘事宜须在立夏前即赴各处赶办,并于六月前完成。

第三、履勘必须请颁旧图:明谊查到旧有伊犁档案载有乾隆二十五年(1760)伊犁大臣阿桂(1717—1797)奏请朝廷颁发当地毗连哈萨克、布鲁特地图,经军机处绘制完成所颁的地图,但该档案现已不全,图志无考,但此图虽非俄国分界凭借,但仍可藉此图与俄国比论。

第四,按条约与该国从我境内卡内分界不敢擅专:明谊认为从沙宾达巴哈,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距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经由哈萨克、布鲁特,并毗连土尔扈特、杜尔伯特等十余处蒙古部落,俄方并未指明逐段立界地名,恐任其侵占,须于会议时据图理论。若特穆尔图淖尔,则在伊犁边内,至于斋桑淖尔,则明明在塔尔巴哈台、辉迈、拉扈等三处卡伦之内,而俄国约在此处分界,心存欺混,已可概见。若照原约自此议分,不特占据我国边界,恐将中华原设卡伦,更被其包入。所以关于此条,明谊才说他不擅断,须请示朝廷。

第五、俄国所订会议月日,须往后展缓:明谊分界表示准备工作繁琐,最快也

要到明年六月完成地界查对,绘图贴说,呈阅核准后,才有凭据与俄方分界,若照原订四月举行,势必赶办不及,所以建请延缓至七月。

明谊并将如何与俄国分界的办法列出,他建议请俄方增派官员二名,分作西北两路,与明谊等人办理分界。而分界起止为“沙宾达巴哈末处为乌理雅苏台起处,至阿拉坦淖尔为止处。即科布多起处至辉迈拉扈为止处。即塔尔巴哈台起处至津吉里克为止处。即伊犁为起处至勒布什浩罕边界为止处”¹⁹。而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两城为北路,塔尔巴哈台与伊犁为西路。明谊说必先勘明我境,核准舆图,并派员即赴各路查勘,绘图说明,再经核对后再与俄方会同办理分界。

针对明谊所提出与俄国谈判新疆边界的计划,恭亲王奕訢建请朝廷同意明谊所奏,他也上奏补充说明与俄国谈判应注意事项,其中提到“俄国至浩罕间之地,袤延万里,其中仅有沙宾达巴哈,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三处地名,故须加派人手会同当地蒙古官员查勘方可于事有济”²⁰。奕訢认为条约上所说,沙宾达巴哈末处起至浩罕边界,此段边界中间经过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及伊犁等四城,疆域袤连,不啻万里,而且该处是哈萨克、布鲁特及土尔扈特、杜尔博特等十余蒙古部落游牧之地。另外特穆尔图淖尔及斋桑淖尔均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及辉迈拉扈等三处卡伦之内。若议分归于俄国,则俄国不但占据大清帝国的边界,而原先所设卡伦更被其包入,往后势难阻止俄国侵越。而原为大清帝国所属之蒙古各藩部,也岌岌可危²¹。所以奕訢说明谊“膺此重任,当悉心筹划,虑出万全,固不可徒事纷争,致启边疆之衅。亦不可稍事迁就,使遂侵占之谋,办外国事,能以不刚不柔处之,则该国亦无所用其狡滑矣”²²。

朝廷同意明谊及奕訢所奏,并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文予俄国驻京公使巴留捷克(Balliuzeck 任期 1861 年 6 月—1863 年 5 月),告知查勘西北地界分为两路办理。同治元年(1862)三月,明绪收到俄国驻塔城领事官送来的文件,系该国西伯利亚总督回复的函文,文件内容是说若分两路分界“恐道途遥远,况山岭无路,人亦难行,不能容易办理,……应将分界事宜,迅速办理完结”。所以他还是认为应照《北京条约》内容规定办理。亦即拒绝明谊所提分西北两路办理的计划。对于俄国不愿意分两路办理分界,明绪向朝廷建议照俄国咨请,仍在塔尔巴哈台归为一处会议,俟议定后再会同俄臣分赴各地界建立界碑鄂博²³。朝廷同意明绪的建言,并命明谊等相关人员须在六月十五日前至塔尔巴哈台与俄国会议定界。明谊所精心策画的两路分界计划,尚未实施即告失败。

五 俄国蓄意私立鄂博侵占中国藩属

但在双方尚未开会前的这段时间,却发生几件事情,均由俄国发端,使未来的会议,凭添许多变数。例如在同治元年(1862)四月,俄国在哈萨克游牧地区哈喇塔拉一带,阻挡清朝政府巡边队伍前进,并在该地附近之呢玛图地方私设卡伦,巡边领队富珠尔泰向俄国官员札哈洛夫表示,他率队前往勒布什,此地是在大清帝国疆界之内,与俄罗斯毫不相干。但俄国官员强悍表示若强行通过就动手开战。五月初,俄国又派员勾结哈萨克及布鲁特族人约五六百人,包围富珠尔泰扎营处,并威胁说“此处是我们的地方,哈萨克、布鲁特是我们的,奉我国吩咐来此处专拦你们,不准过去”。富珠尔泰迫于形势,只得退回,并将此事往上呈报²⁴。

同治元年(1862)三月,俄国行文清朝政府表示,清朝政府所册封之哈萨克汗王阿勒坦莎拉(1826—?),其实是该国属民,且俄国及哈萨克早已将爵位撤除,且阿勒坦莎拉在俄国称为素勒坦,并在俄国领土内安居游牧,俄国希望清朝政府不要管他国“属民”之事。

俄国在咨文中亦提到早在阿布赉(?—1781)当政时期,已亲向俄国皇帝表示他与他的后代及哈萨克所属人民,永远归顺于俄国,而阿勒坦莎拉是阿布赉的子孙,其当然是俄国的属民,所以俄国不承认清朝政府册封阿勒坦莎拉爵位的事实²⁵。

清朝政府对于俄国所说情形,随即命令伊犁将军常清及景廉两人查明此事,其实景廉早在咸丰八年(1858)即已上奏称,阿勒坦莎拉曾于咸丰年间两次遣其子前来进贡马匹,并携带阿勒坦莎拉袭爵之敕书求见,清朝政府亦同意承袭汗位,所以阿勒坦莎拉确实为哈萨克汗王。但俄国称,早在阿布赉执政时期,他与该部人民均投顺于俄国,所以哈萨克早是该国所属之地,而俄国也早已将清朝政府册封哈萨克的爵位裁除,所以俄国认为阿勒坦莎拉是其属民,而非大清帝国所册封之汗王。

所以阿勒坦莎拉在大清帝国所属之下称为汗王,在俄国则为其属下,清朝政府认为阿勒坦莎拉“首鼠两端,情殊诡谲”,造成中俄双方之争议。所以特别交待常清等人务必查明原因。并为杜绝类似情形再次发生,有损大清帝国尊严,故要常清饬令哈萨克各台吉,推举一应承袭汗爵之人,且该人必须是哈萨克人民所信服者,才能奏请册封,并避免该部被俄国诱惑侵占。但清朝政府在给俄国的答

复咨文,并未力争阿勒坦莎拉归属问题,只是请俄国官方代为查明阿勒坦莎拉现居何处,并给回文答复而已²⁶。由上述可知,中俄双方此次在哈萨克归属问题上,俄国明显居于优势地位。

常清等人查明事实上奏朝廷后,同治皇帝发布上谕曰:

哈萨克、布鲁特地方俄国久已窥伺,此次该国胆敢率兵拦阻,是阿勒坦莎拉早已顺从,其应袭汗爵,即着常清等遵照前旨,择应袭之人,奏明承袭。该处及布鲁特地方,何时为俄国所诱从,据其文凭所言,则该两处地方,俄国竟据为己有,必应查明原委。……事关外国侵占边界,当竭力筹办,断不可含糊了事。²⁷

明谊对俄国利用会议尚未开始之际,侵入大清帝国边境之地,私自设立鄂博,作为会议时俄方侵占大清帝国领地之借口。明谊认为若不详细处理,将被俄国欺混,关系甚巨。明谊说:

该国现已将伊犁、塔尔巴哈台西南边界之内游牧哈萨克、布鲁特匪去大半,所有该哈萨克等,皆与该国交纳租马,并为其所使,以致该国以哈萨克等系伊所属之人,地方系该国所属之地。……哈萨克、布鲁特住牧,系我国平定新疆赏给之地,岂能一旦弃之不顾。但僻处荒边,与强邻逼近,久被侵占,我国鞭长莫及,自不能时时代为护庇。……该国移兵筑堡,致滋它族,实偏处此,日久恐为心腹之患。²⁸

对于俄国私人中国境内、宣称哈萨克、布鲁特为该国所属的行径与目的,经明谊等几位大臣的剖析,恭亲王奕訢认为,俄国人早已预谋将哈萨克、布鲁特等部落据为己有,其处心积虑,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中俄西段国界,如和约中第二款仅记载“沙宾达巴哈、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三大名目,其自沙宾达巴哈至特穆尔图淖尔浩罕边界止,其间地段甚多”²⁹。所以何处为中国地方,何处是俄国界址,均未清楚,若不亲历其境,无从会勘清楚,这也是俄国借机私设鄂博欲瞒混侵占的原因。奕訢要明谊查明清楚,向俄方据理力争,不容其无理侵占。

六 中俄勘定西界会议交涉

同治元年七月八日,俄国使臣巴布科夫等人来到塔城,与清朝代表明谊等人会议。兹将双方在会议中所持意见整理如下:³⁰

巴布科夫:依据条约载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住卡伦为界,所以应以此原则定界。俄方拿出地图一张,内点有红色为界限,并说“不论中华边疆,止以常住卡伦为界,所有卡外应给该国之地”。

明谊:俄方说法有误,条约内所载现在中国常住卡伦等处,并无为界之语,应细查条约,遵照地图,于从前已定旧界之外,现应专论从前未定之界。详细查勘后,秉公商办。即如唐努乌梁海、勒布什之哈萨克、特穆尔图淖尔哈喇塔拉之哈萨克、布鲁特、皆系我国赏给游牧养生之地,并固赏给爵职俸禄,若将其地分隶予俄国,其人生计立蹙,又将谁归,必仍甘心内附,对俄国并未有利。明谊并传唤阿勒台乌梁海散秩大臣,询问该蒙古游牧之地是否为中国所属。该大臣说“我们投诚大清国有年,赏爵食俸录,不容你们(指俄方)占据我们地方”。明谊并将伊犁地图内载之界址逐名指令俄使阅看。

巴布科夫:图内所载界址,均系该国所属乌梁海、哈萨克、布鲁特游牧之地。

明谊等人认为俄使初来,对分界边境地区情况并不熟悉,但却执拗己见,定有人从中主使,若再与之争议,徒费唇舌而已,所以建议会议暂停,双方订十一日再开。届日,巴布科夫率塔城领事官前来开会,但双方又发生争议:

巴布科夫:仍坚持以条约所载两国应以中国常住卡伦为界。

明谊:条约所载,因系是未定之界,所以两国才特派你我等官员会议,现我国存有旧图,自应照图议办。

巴布科夫:若是要如此,俄方拒绝再议,不能以中国自绘之地图为凭。只好带兵占据卡外,不由得清朝政府不给。

至此,谈判又陷入僵局,双方协议改日再议。依据《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书中所述,两方的会议并非在原订时间召开,原因是当时明谊正好生病,所以会议延迟几天后才举行。巴布科夫等人来塔城谈判前,俄国外

交部曾颁发国务大臣的训令给予巴布科夫。训令上说塔城的谈判极为重要,它的成功关系到全部事宜的良好结局,所以谈判代表须先向中国代表声明,俄国对国界问题处理的愿望,只是一丝不苟的执行北京条约,而且不管交涉地点是在边疆或在中国首都,作为交涉的依据还是条约。训令中又说,中国常常不顾常住卡伦,曾经屡次将它的临时卡伦推进,俄国为避免造成双方在边疆的纷争,所以未特别注意³¹。

训令还提到要巴布科夫等人说服中国代表,在划定国界时以常住卡伦为基础,这样“全部划界问题获得良好结果的主要障碍,毫无疑义将会消除”。俄国外交部的训令要巴布科夫等人对与此点要特别注意与坚持³²。而从俄国政府的训令内容可看出,俄国坚持要以中国的常住卡伦作为划定边界的原则,这也是全部划界事宜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明谊要说服俄国,依据清朝政府所订原则划界,是很难达成的。

七月二十八日,双方再次会议,俄国驻伊犁领事官札哈洛夫加入俄方谈判阵容,依据巴布科夫的描写,札哈洛夫在中国居住二十年,精通中国语文,尤其是满文,他非常了解中国的事务,俄国在塔城的贸易站被焚毁事件,即由他与明谊谈判,俄方得到近三十万卢布的赔偿。在往后双方的谈判的过程中,札哈洛夫扮演重要的角色,强硬坚定咄咄逼人的态度,使明谊等人受到甚大的压力。而会议一开始双方即争辩不已:³³

札哈洛夫:若不照条约内载以常住卡伦为界,那是中方先废了条约。

明谊:彼此疆界各有定制,西疆未定交界,即应由两国派员秉公商办。条约系总其大刚,双方商办后始能定界址,而且有地图参考定界。例如我国之勒布什边界地方,乾隆年间即立有石碣,现仍尚存。伊犁、塔尔巴哈台当地驻军,每年均派员前往当地查收哈萨克呈交之租马,均在此会合,所以此地是在大清国境界之内。

札哈洛夫:我们就知以两国所订条约内载以中国常住卡伦,已经定为交界为据,中国的地图,我们不看,实不能照图定议。所说勒布什边界所立之石碣,是你们伊犁将军私兴偷立,何以算得是交界。伊犁将军真乃小人之行。

双方谈判又陷入僵局,只好散会择日再议,明谊对札哈洛夫加入谈判之事,上奏廷表示,他认为札哈洛夫“人甚狡黠,且通晓满汉语,两相与会,彼可径达所言,其同来之使臣,不能不听其指挥”,而札哈洛夫又意存构衅。明谊忧虑若俄

国以札哈洛夫为谈判主事者,则不仅分界事宜不能妥办,且恐将另生枝节,致成边衅³⁴。

明谊更进一步指出俄国所绘地图是在中国常住卡伦等处画红线,指为应分之界,该国欲分之大山大河,均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界内,有侵占唐努乌梁海地方之疑。而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三处常住卡伦,离城距离不过数十百余里,及两三百里不等。而塔尔巴哈台所属之哈萨克、布鲁特各部落均在卡外边境内住牧,西南西北一带若允俄国自卡伦议分,等于将“三处西南西北疆界均被该国侵占。且将乌、科二城所属之蒙古收去数处,及出产每年例进貂皮之地方,亦被包去,并将伊犁、塔尔巴哈台所属,岁收租马之哈萨克、布鲁特各部落,尽被该国收服”³⁵。倘若各部落不愿归附俄国,欲进卡要求内附又无地安置时,不但俄国借端寻衅,哈萨克等无游牧之地,若到处乱窜,亦将造成当地军民惶乱。

明谊忧虑谈判情事越来越复杂,俄国方面态度强硬高傲,欲要求俄国照中国的办法分界,困难重重,若处理不当,遭朝廷究责,实非其所意愿。所以他将此事上奏,他并引述哈布齐贤所说“边疆大事,究应如何定立交界,有无关碍之处,不敢作主”,显示他内心的压力与不敢擅作自主的无奈。朝廷接到他的奏折后,发布上谕说,明谊等人“与俄方谈判,能够据理驳斥,词义严正,而札哈洛夫‘复肆争执,意图狡赖,情形已可概见’”,这是俄国谈判的一惯伎俩。朝廷对明谊的指示是“务当晓以利害,谕以情理,使之无可置词,再行酌量办通,适中定议”。最后并提醒明谊等人,“不可畏难迁就,但能挽回一分,于国家即得一分之益”³⁶。

但是双方各持己见,激烈争执的状况并未有任何改变,俄方的态度依旧强硬,在八月二十四号的会议:³⁷

明谊:若照俄国所议,则我国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卡外唐努乌梁海、阿勒坦淖尔乌梁海,蒙古王公游牧地方,将被你们包去,我国断不能让。且该两蒙古两旗,世受我国俸爵,岂肯甘心归附你国。而且现有两旗总管官员为可以作证,俄国有何凭据。

札哈洛夫:乌梁海人数众多,不尽是中国两旗,其地方原是公共游牧之地,自应就地议分。

明谊:向俄方代表说明分界的办法,即从沙宾达巴哈至斋桑淖尔,从斋桑淖尔至塔尔巴哈台之辉迈拉扈等处卡伦,往南至雅尔裕勒,再往西南直至伊犁边界勒布什地方,以西边为俄国境界,东边属中国境界。由勒布什至特穆尔图淖尔及浩罕边界,除浩罕界址不能代替俄方议分外,其伊犁境内边界,亦应拟在旧界议

分。明谊并向俄方抗议该国屡次派兵阻拦清朝官员前往当地勘查,并私立卡伦。

札哈洛夫:中国原无旧界,中国官兵出卡,即系私人我国境内,所以派兵拦阻,且我们设立卡伦,并非中国境界以内。

双方意见相左,无法达成协议,会后俄方拟一份议单,内容仍是坚持要以常住卡伦为分界原则,若清朝政府不以俄国所提意见分界,则毋庸再议。明谊收到此份议单,想必心情沉重。对此他上奏表示,在谈判陷入僵局,俄方态度傲慢强悍,若再约该使理论,“恐其意在构衅,设于言语之间,偶有不合,立成决裂,致与大局有碍”,所以明谊说他将逐步以理驳斥俄方,“俾遁辞知其所穷,履以印文,彼不得以面议无证之言,藉端绞赖生衅”。朝廷对明谊所奏,称许他与俄方谈判,“剴切理论,极为明晰”,给明谊的指示仍是要他“恪遵前旨,适中定议,方免日后流弊”而已³⁸。

在《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书上提到明谊等谈判代表,在会议上声明他们奉朝廷的命令,只是进行国界的谈判,但是他们对于国界定址不能有所决定,而且他们也不能根据《北京条约》进行谈判,因为此条约是不了解地方情况的北京大臣所签订的。而且凡是相互协商所谈的一切,他们均须向朝廷呈报³⁹。俄国方面认为,该国进行谈判的基本原则与清朝政府对于划订西部国界问题的观点是完全分歧的。俄国政府授权他们不仅是进行国界谈判,而且也被授权能决定中俄双方在塔城协议划分的国界线。而中方代表若事事均要送北京审核,那此种谈判是无益的,俄国谈判代表将离开塔城。

札哈洛夫又发文给明谊,文中再度表明以常住卡伦分界的立场;另外对哈萨克、布鲁特等部落,虽有接受中国册封授予爵位者,亦有接受俄国授爵者,两部落原住游牧地方,分在何国界内,即作为何国所属之人。而唐努阿勒坦淖尔乌梁海蒙古人等所住牧地方上未分界,原是公共游牧之地,不能竟据为中国所管之人,依据两国在北京所议定条约,应顺山岭大河常住卡伦为界,则已指明乌梁海蒙古地方应归俄国管辖⁴⁰。札哈洛夫并抱怨双方已会议多次,若中国不以常住卡伦为界,则无开会之必要,俄方代表将离开塔城。明谊见状知已无法续留札哈洛夫等人,也只好说再等双方政府协议后再行开会。明谊将此事上奏,并命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等四城防范俄国利用停会期间派兵强占卡内土地。

俄国方面认为清朝代表的做法是违反《北京条约》的规定,而且北京当局也指示明谊“真正避免执行条约的第二条,主要是规定并按照常设卡伦划分国界

的那一部份,而这是要把从前属于中国的土地让给俄国”⁴¹。而且明谊等人拖延不愿尽快解决国界问题,也是在“掩盖自己边疆外族人面前的软弱无力,因为这些外族人至今虽然在实质上和名义上都承认受中国的统治,但是由于《北京条约》,却必须永远归属于俄国政权之下”⁴²。俄国方面认为清朝代表既不同意俄方所提划分国界草案,所以他们也就不能再和明谊等人谈判。虽然谈判未达成任何具体成果,但透过会议,将划分国界问题,以对俄国有利的方式提出,使将来谈判时不能以别的方式举行,而只能让中国接受俄国所提的国界草案,在谈判桌上,俄国将主导一切。

七 明谊对俄国侵占大清领土看法

双方会议结束后,明谊仍为分界事宜驰抵科布多,与参赞大臣锡霖(?—1865)等人勘查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等蒙古地界情形,并对邻近所属蒙古各藩部加以晓谕,要各部落“坚心向内”,对大清帝国忠诚不贰心,并随时侦探及防范俄国派兵入侵。明谊认为边界问题已拖延近两年仍无进展,最主要是“俄方蓄谋已久,见两年会议不能遂其侵占初心,执意回国,故将此贪求委之而去,又佯为废约寻衅之词,暂作退步,虚声恫吓”,所以明谊说为今之计,只有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等四城,各就本境抚内攘外,俾各蒙古各外夷毫无疑惧之心,以杜俄国要挟之计,则中国无损失之忧矣”⁴³。

明谊认为俄国欲侵占大清帝国领地,均有其阴谋,如俄国欲夺取科布多及乌里雅苏台两城边界之地,而该地方是唐努乌梁海及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等蒙古部落猎貂维持生计之场所;而占据塔尔巴哈台边界地,则可将在该地游牧的哈萨克族人收服,并可夺取当地属中国的雅尔噶图金矿厂;而夺取伊犁边界之地目的有二,一是可就近收服邻近的哈萨克与布鲁特,二是可从此处取道直至叶尔羌、喀什噶尔,而不经由浩罕即可至该两地通商⁴⁴。

明谊并分析俄国设计侵占向大清帝国称臣内附藩部的方法有三:

(一)和诱:如对属乌里雅苏台管辖的唐努乌梁海,属于科布多管辖的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等部落。因两地与俄国邻近,彼此相安无争,俄方将该国土产货物换取两地蒙古牲畜,而蒙古民众视俄国货物新奇,与俄方私自贸易日盛,以致俄国认为可用此法,乘势将两地所属蒙古部落并吞。(二)威胁:如对属塔尔巴哈台管辖的哈萨克部落,因俄人窥见哈萨克人“首鼠两端,畏威忘德”,乘间诱惑,

并要哈萨克供给驼马及丁役,哈萨克人对俄国“畏之如虎”,这是俄国对塔尔巴哈台边界地之蓄谋也。(三)兵争:如对属伊犁所管辖的哈萨克及布鲁特部落。因伊犁边界卡伦内外均有两部落民众游牧,且该地与俄国边界相邻,早在道光年间(1821—1851)俄国曾派兵窥伺该地,并怂恿浩罕抢劫大清帝国所派巡查边界队伍,使得当时伊犁将军下命暂停每年向例寻查边界至该地的任务,至今仍未恢复。使得原向大清帝国朝贡,称臣内附的哈萨克及布鲁特两部落,与大清帝国关系渐渐疏远,因而受到俄国的胁迫不得不从,故俄国欲据其地为己有⁴⁵。

明谊向朝廷奏报,俄国早在数十年前即计划侵入中国西北边境,他审度时势,窥伺大清帝国虚实,对我诱惑胁迫,侵占计谋,成竹在胸。所以俄方利用谈判暂停之际,运载炮械至边境,私立卡伦,阻止清朝政府巡查边界工作,使得未来恢复谈判工作更为困难。明谊只能尽量向所属各蒙古藩部及哈萨克、布鲁特各总管、王公、台吉等晓谕,鼓舞诸部王公、台吉,能与大清帝国同仇敌忾,对付俄国的入侵。

明谊也行文予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向他抗议札哈洛夫非俄方专派谈判大臣,却态度强悍专横,会中常以若不照俄方划界草案行事,则将派兵强占来威胁明谊等人。明谊并说,俄国欲占“如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之臣服中国,食俸授爵之乌梁海等处蒙古藩王,及塔尔巴哈台、伊犁,交租马之哈萨克、布鲁特住牧,全行包去”⁴⁶。而且这些中国藩属,将不甘心被俄国抢去,势必启争端,若是如此,对俄方并无益处。明谊并将应如何划界的办法详细说明,希望俄国能尽速派员再度会谈协商。

八 强势俄国派兵威吓

俄国在准备与清朝政府谈判之前,即有出动军方部队到边境向中国威吓的计划。俄国方面认为,中国人永远是对强势让步,而对软弱的敌人逞勇,而在亚洲的国界上,特别是对中国人的行动中,一个连的步兵,两个或四个炮队,就是向中国威胁的武力。俄国用武力占领边界,也有其政治考虑,在与中国谈判时,俄国早已拟定如何划出在地理上稳定的,而且对俄国有利的国界。且一经拟定,就要让中国知道俄国非常坚持,而这要用武力来作后盾⁴⁷。

同治二年(1863)三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获悉,俄国军队三四百人携带器械炮车至巴克图卡伦附近,并向前往该地查巡的清朝官员说,卡伦之外就

是俄国的土地,拒绝清朝官员请俄国兵队撤离的要求。另外明绪也查出俄国也派出军队数千人,分赴斋桑淖尔一带地方耕地建房,并派人至哈萨克游说,要哈萨克臣服于俄国⁴⁸。

四月,明谊又获报在科布多昌吉斯台卡伦一带,有俄国军队近百名,声称要在卡伦附近住牧,另外在霍呢迈拉扈卡伦附近,有俄兵四十余人,与驻守卡伦清军发生冲突,清兵有十二人被俄方殴打后押走,马匹、武器也被夺走,随后放回清兵⁴⁹。这些突发事件又让明谊等人一团慌乱,除了命令各地方严加防范外,也小心谨慎不与俄方发生正面冲突,即使俄方将清朝驻防卡伦兵丁押走,也只是行文俄方表示抗议而已。

六月,又有俄国军队百余人携带武器,至乌里雅素图卡伦外驻扎,并有俄兵进入卡内情形。明绪派人前往查问,俄方带队官称系奉上级命令前来防守,不准中方巡查卡伦官员越界,至于派人前往卡内是要履勘当地情形,作为将来定界参考。俄方带队官并说若清朝官员定要过去,他们就要动武拦阻。随后俄军更要求塔尔巴哈台章京萨勒哈春带同驻喀卡伦兵丁强移离卡伦数里地方驻居。该章京惟恐事态扩大,而启衅端,不得不答应俄方要求⁵⁰。

伊犁将军也奏称俄国兵约两百多人,携带武器炮车,到博罗胡吉尔卡伦外搭房驻扎。另外在鄂尔果珠勒卡伦所属格根地方有俄兵两百余人,倭根塔斯地方有五百多名俄国人进入,奇沁卡伦附近爱达尔科木地方亦来百余名俄国人。均称是奉上级之命前来⁵¹。

巴布科夫在其书上也提到,他为考察斋桑泊与额尔济斯河至塔尔巴哈台的国界地形,为让工作顺利进行,避免受到中国方面的阻碍,而派出武装部队前往国界边境,并在同年(1863)三月发布命令,将各部队调往国界地区,并在四月初向各指定地点推进,并占领指定的阵地,计有九处,例如前面所述格根地方、昌吉斯台卡伦、巴克图卡伦等地方,均包括在内⁵²。

九 弱势清廷的回应

明谊对在俄国派兵侵入卡伦附近中国所属地方,立即上奏表示:第一,他已命各地驻守官兵妥密严防。第二,晓谕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及乌、科两城卡外蒙古、哈萨克、布鲁特诸部,不可听信俄国利诱之计,亦不可受其恐吓,应齐心御侮,各守藩篱。明谊并警告各部落说,若各部不倾心内附,杜绝俄国威胁利诱之计,

届时被俄国欺凌,落得无安身之处,则“我国岂能强制其心,使不为所摇夺,又何能代为御侮,转授俄人以肇启兵端之词”。明谊向朝廷关于办理分界事宜,他将“竭尽血诚,万不敢徒托空言,粉饰目下”⁵³。

朝廷对明谊所奏,除了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俄国驻京公使提出抗议外,要求公使行文西伯利亚总督撤回兵队,并派谈判分界大臣尽速与清朝代表开会。也要明谊晓谕当地藩属,不为俄国诱胁⁵⁴。

但是当俄国军队强押并殴打昌吉斯台卡伦清兵一事发生后,朝廷则说,明谊要蒙古部落同心御侮,虽属良策,但蒙古诸部落畏惧俄国强横,未必能与俄国相抗,如此次事件,俄方来兵并不多,却将驻卡蒙古兵押去十二人之多,可见“同心御侮之策,亦不过徒托空言,万不足恃”⁵⁵。可见朝廷对明谊联合蒙古等诸部落共同抵抗俄势力入侵之策,没有多大的信心。

同年六月,明谊再上奏,奏折内已不提联合蒙古诸部共同御侮之事,他说从三月间至今,塔尔巴哈台、科布多边境有俄国兵队三起,强来肆扰,科境两起,共四百五十人,殴拘蒙兵,抢夺马匹军械,而塔城境内现又有三百多名俄兵前来滋扰。明谊认为该国兵分两路前来,就是要在会议之前,多占中国领地。明谊说他不知俄国何时会派人前来开会,他也不敢置所辖境地于不顾,面对俄国派兵入侵一事,与乌、科二城大臣商酌筹防事宜⁵⁶。随后并将筹办相关事宜奏报朝廷⁵⁷。

恭亲王奕訢对于俄国派兵入侵卡伦附近一事,曾向俄国驻京公使提出抗议,他再三思考此事后认为:

其所以纷带兵强占者,大抵均由中国多故,饬欲分兵北顾,力必有未逮,因而恃其历来惯技,得尺得寸,来势相凌。……臣等竭虑殚思,现只有仍照条约逐层讲解,力与争辩。⁵⁸

诚如奕訢所说,当时清朝政府集中全力处理太平天国动乱之事,确实无法也无力采取强硬的态度来面对俄国派兵强占卡伦附近土地一事,无坚强的实力作为后盾,与俄国据理力争,这不仅是参与谈判明谊等人面对俄国强横,及肩负朝廷重托,来自双方的沉重压力与无奈,也是大清国当时实力不如人,只好忍气吞声,只能要求明谊等人在谈判桌上,费尽唇舌与俄方辩论的无奈。

清朝政府并向俄国发出照会,要求俄方迅将兵队撤回,并迅速派出分界大臣与明谊等人开会协商分界事宜,而俄国的答复是俄国兵队至俄国所属土地驻扎,

有何不对,两国西北边界未定,全是中国所派分界大臣(指明谊)之咎,若现要恢复会谈,必将西北疆界按照和约规定办理,否则派出谈判大臣,仍是徒劳无益。

清朝政府对俄国的答复,随即回文表示,双方谈判未成均是俄方代表札哈洛夫偏解条约,并蛮横说若不照俄方意思分界,则要带兵强占,今竟有其事,俄兵各处滋扰,均是领事官札哈洛夫“欲不遵条约,故从中阻挠,使去年不能速为定议也”⁵⁹。

而俄国的回复再次强调:第一,俄文和约所载由沙宾达巴哈往西南至斋桑泊,而非中国方面所说往西,这是中国方面翻译错误所致。第二,清朝政府照会中称“两国疆界应顺某岭某山某河勘办,自然不免弯曲之处……如贵大臣所言,贵国卡伦皆系常住卡伦,试问不常住卡伦何在,本国早已将中国卡伦分为两类,是以条约注明常住卡伦一类,缘在此事不应有两论”⁶⁰。俄国政府说,两国大臣若欲再次于边界会议勘定疆界,若清朝政府不按照俄国针对条约内容的说明办理,俄方将不派出大臣与会。俄国政府强硬的态度,也让清朝政府无可奈何。

俄国派兵侵扰的事件并未因清朝政府的抗议而停止,明谊又获知奉命派往博罗胡吉尔等处防堵俄兵侵犯的清军已和俄国军队发生两次冲突,互有伤亡。而且竟有哈萨克台吉铁色克率兵协助俄军滋扰。明谊说铁色克助纣为虐,建请朝廷将他捉拿严办。另外明绪亦告知塔尔巴哈台所属霍呢辉迈拉扈等三处卡伦均被俄兵强占⁶¹。而此事依现实情势,明谊也无法处理,他说既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请俄国派员来会,他将前往塔城等候。

清朝政府接获明谊所奏后,即发布上谕说,俄国方面称卡伦以外驻扎兵队,不能撤回,俄国军队住扎在哈萨克边界,名为防守中国官兵出卡,其实是欲将分界事宜早为议定,以遂其诡谋。所以“应速筹了结之方,避免借端寻衅”。随即谕令明谊等人,准照俄国议单定议分界,并要明谊行文给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双方定期会勘。朝廷强调要明谊遵照朝廷前所发谕旨,照会俄国迅即派员与会,俟日期决定后,即行照议定会勘处所,妥为办理⁶²。清朝政府会有如此决定,愿照俄国议单定界,是因为当时回乱已蔓延至新疆境内,而俄国当时也对伊犁虎视眈眈,若利用此情势将事端扩大,清朝政府无法两面兼顾,若处理失当,不仅伊犁,整个新疆岌岌可危,所以想尽速与俄国达成协议,全力对付回部起事。

明谊接到朝廷谕旨后,即在塔城等候俄国使臣前来定议,并饬令各地守军,严防俄军再次入侵,他说已命令乌里雅苏台等四城官兵,若再见俄军前来,应告知朝廷已议准照俄国政府议单办理,应静候该国使臣来塔城议定,不应构衅致伤

和好⁶³。

恭亲王奕訢看到军机处转交明谊的奏折后,奕訢说建议照俄国所开议单办理分界是因为他同意明谊奏折内容所说:

将来兵祸连结,必致更难收拾,……若日久相持,将不堪设想,如果该国遣使复来,奴才惟有与明绪等审度时势,于利害两形之下酌其轻重,竭尽写诚,勉图收束,并陈明万不得已之苦心,自有天日照临,俯查衷曲。⁶⁴

明谊此番话道尽他心中所受且累积甚久的沉重压力,及与俄国谈判时,并无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无法与俄国据理力争的无奈,也只好说权宜情势,酌其轻重,并向朝廷表明他忠心耿耿,绞尽心力,努力办事的心境。所以恭亲王奕訢也说:

是此事件处两难,两害相权则取其轻,……夷务之坏,皆因从前内外臣工互相推诿,稍有关紧之事,即不肯身任其责,日是一日,遂致酿成不可救药之势,迨来时局艰难,中外臣工总应涤虑洗心,勿蹈从前故辙。⁶⁵

奕訢所说也是在表明现在对外交涉工作的所面临艰难的局势,均是以前官员不愿且不敢负责,推诿敷衍了事,造成今日负责对外交涉人员处处受到外国的牵制,甚难办事。但他主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对明谊所奏,他不能有推诿之见,让明谊等人独任其难。关于划分西界之事,“既就该将军等迭奏为难情形,得有依据,即为承担。……惟此事见中外大局将来乌梁海等众,作何安置,哈萨克、布鲁特等部作何抚慰,尚有几许应办之事,全赖将军等躬亲其事之时,就近酌度情事,悉心筹划”⁶⁶。奕訢说,此事虽已奏明允准照该国议单勘分疆界,他给俄国驻京公使的照会内,仍有“妥商照办之语”,所以请朝廷飭令明谊等人,在会议时酌量情形妥为商办,倘能替国家挽回一二,对于边疆亦不无裨益,而不可意图卸责于人,将就了事。

朝廷接报恭亲王奕訢、明谊等人所奏后表示,俄国使臣大约在明年春季到来,届时明谊应将分界事宜,径行断结,不要事事再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示,避免公文往返稽延,又给俄国借口,另生枝节,要以妥速为要,不可意存诿卸。朝廷并要明谊拟妥安置边境藩属的计划,例如设法让俄国让出数百里地,以便安置当地蒙古部众⁶⁷。

十 中俄《塔城界约》交涉

明谊接到朝廷谕旨后,随即筹划安置哈萨克、布鲁特、蒙古诸部事宜,他认为未来开会时,要让俄国使臣同意让出数百里地,甚为困难,所以他建议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城所属之乌梁海蒙古及塔尔巴哈台内服之哈萨克住牧之地,可援中俄两国划分东边国界办法,让原向来在当地属于中国的游牧部众,准其照旧住牧渔猎,而伊犁所属索伦等部落亦比照办理。但伊犁方面,则比较难处理,明谊说当地“有碍之处过多,恐换约后,所有四爱曼人等生计攸关,难免构衅”。但若“不照俄国所拟草案换约,势必马上决裂,情势更难收拾,这是让他觉得两难之处,他请求朝廷裁夺。另外明谊也上奏说,已有哈萨克近千余人进卡住牧,并说因俄国人滋扰当地,他们不愿投顺俄国,即逃出进入卡伦内地方游牧,并请求清朝政府给予安置⁶⁸。

恭亲王奕訢向朝廷说他同意明谊所奏,若俄国使臣不从让地之议,则照明谊所拟办法办理,但这只是第二层办法,还是要设法请俄国让出一带地方较为妥当。明谊不能因有此一办法,即存畏难之见,而不与俄国使臣辩驳力争⁶⁹。朝廷同意恭亲王奕訢及明谊两人所奏,但还是提醒明谊说“总之分界事宜,固不可于原约之外听其稍后侵占,亦不可使其稍有借口,藉端决裂”⁷⁰。

同治二年八月,俄国谈判分界代表巴布科夫及札哈洛夫抵塔城后,双方在九月初举行会谈,俄方拿出该国所绘以常住卡伦议分之地图,并说若不照此图分界,他们就马上回国。明谊与俄方代表辩论,但札哈洛夫说去年所开界议单分界之处,已奉该国政府核准,所以俄方坚持要明谊等人接受。双方争辩甚久,并无任何进展。随后明谊质问俄方在双方未完成分界时,即派兵越境入侵中国各处卡伦,并在伊犁滋事,有失两国和好之道。俄方则说派兵至卡伦是要阻挡清朝官兵前往俄国所属哈萨克地方,而伊犁冲突事件兵非俄方首先滋事,是索伦人将俄方官员杀死,才引起双方开仗,至此双方谈判又告中断,协议缓日再商⁷¹。

明谊认为俄方毫无凭公商办之意,一味狡赖,希图侵占,欲将不能定议之责任,加诸在他等人身上。而且俄方执意谈判不成即要回国,暗示该国欲以武力强占并吞之意。为避免启衅端,明谊即行文予俄方表示,若该国能秉公商办,则明谊等人可从权按条约将应勘之界再为折中。明谊把该如何划界之意见,向俄方说明。俄方札哈洛夫回复说该国驻北京公使通知他们说,恭亲王奕訢已通知该

公使,表示清朝政府已经允准,且札哈洛夫等所拟之界址定义,而且会将此事通知明谊等人遵照办理⁷²。

明谊则说他并未接到通知,这可能是俄方“捏称已经允许之辞,窥探我意,希图蒙混迁就”。俄方则说该国早已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通知,已有一个月之久,明谊不可能尚未收到。应是明谊为在本年不将划分疆界之事办完,而不遵朝廷谕示,而随意办事。若是这样,双方就不须再开会。他们已请该国驻京公使询问恭亲王奕訢,为何“廷臣可行,疆臣不可行,致令他国耻笑”⁷³。俄方谈判代表随即离开塔尔巴哈台。

明谊见谈判又受阻,语重心长的表示,他奉命办理勘界事宜已逾三年,扪心自问,寝食不安,若不照俄国所提议单分界,恐将兵祸连结。且对蒙古、哈萨克、布鲁特、索伦人等生计造成重大影响。明谊将俄国议单所划界址、对蒙古等部落有何影响向朝廷奏报,并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该驻京公使议定后,再请该国谈判使臣前来议定界址。稍后明谊接到朝廷寄来以前发出的五道上谕,明谊即遵照谕示,照会俄国西伯利亚总督,说朝廷已准照俄国所开议单以常住卡伦为界,请他派札哈洛夫等人前来塔城换约⁷⁴。

对于明谊所奏与俄国使臣交涉经过,恭亲王奕訢对于俄国使臣说他曾告知俄国驻京公使,表示朝廷同意照俄国所提分界议单划分边界,并已将此讯息通知明谊照办一事,奕訢无法理解。而且札哈洛夫责难说“我国廷臣可行,疆臣不可行,致令他国耻笑等语”,奕訢说俄方说法,毫无根据,实属狡赖已极。奕訢说总理衙门曾发出照会给该国驻京公使,表示两国对于分界事宜应公同妥商,尤其是让蒙古诸部落在划界后能照旧游牧或让地安插两事,奕訢也在照会中提到,这是双方在分界会议时应讨论的重点。而所谓“准照议单”分界,是指与条约相符之处可以办理,若与条约不符,仍应由双方会同妥商。奕訢强调“中国无论在内在外大臣,总以条约为主,毫无歧异”⁷⁵。奕訢表示现在俄国既不愿派员前来与明谊等人会商,明谊现在也不必强要俄方派人与会,可以暂行缓办,俟双方对条约内容沟通讲明后再开会议。并要明谊行文给西伯利亚总督,声明在未分界前,中国不派兵出卡,巡查边界,而俄方亦不得派兵滋扰,不得在卡外私设鄂博。

朝廷同意恭亲王奕訢所说,并命令明谊等人,须“力与驳辩,或今于卡伦外让出若干,方为妥协”。而朝廷勉励明谊说,他身膺重任,须通筹熟计,替国家挽回一分,即受一分之益⁷⁶。

明谊获知恭亲王奕訢所奏及朝廷指示后,对于如何安排分界后受到影响的

蒙古、哈萨克、布鲁特、爱曼等部落生计、安置于何处……等问题,明谊将筹办情形上奏向朝廷报告,特别提到伊犁附近情况复杂,明谊等人认为若以常住卡伦为界,对于在伊犁附近游牧的索伦、四爱曼人生计影响甚大,且附近又无地可安插内附部落,明谊说他与俄国使臣会议时,将竭力请俄国让出卡外原属索伦、爱曼人游牧之地,或比照东部边界划分办法,“向有中国人游牧,仍准中国人照常耕作”,以便解决此难题⁷⁷。

明谊并向朝廷抱怨伊犁将军常清似乎无法与他合作,例如有关伊犁附近如何安插内附之哈萨克、布鲁特部众,并安抚爱曼人等,不要俄国人发生冲突等事宜。本应由该将军负责筹妥,并要立即通知明谊,以便明谊等人再请俄国使臣前来议定换约。明谊说,若该将军不能妥速咨覆,则他无法与俄国率行换约,若因而另生枝节,所关非轻也⁷⁸。

明谊对常清办事相当有意见,明谊在另一奏折又向朝廷告状,明谊说“迭接常清覆文,只言窒碍,其如何安置抚绥一切事宜,毫无措置”,并说伊犁协领色布贞泰曾向常清请示如何处理分界事宜,而常清竟未指示,让该协领不知如何办事。所以明谊见此情形即向朝廷奏报,建请朝廷令常清尽速筹办如何安插哈萨克、布鲁特人众,抚绥索伦、四爱曼人。俾便他与俄使办理换约⁷⁹。而朝廷接到明谊所奏,即飭责常清,朝廷说“究竟常住卡伦之外,必以何处为界,方无关碍,常清何以并不咨明明谊,殊属颟顸”⁸⁰。朝廷命令常清应将卡伦以外,应由何处定界,应迅速咨会明谊,并办妥安插蒙古诸部与约束四爱曼人勿向俄国人构衅等事,不得耽延。弱势的清朝政府面对强大的俄国,要在谈判桌上争取更有利的条件,已属不易。现又因两位边疆大臣为筹办分界事宜而不合,这让明谊等人处理议定疆界事宜更显艰困。

正当朝廷与明谊等人忙于筹划分界事宜并催促常清尽速办事之际,明谊接到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来文,俄国称:⁸¹第一,明谊要求俄国使臣再来塔城会商,对于分界一事仍欲与俄方辩驳,是不遵守条约,欲争论占界。第二,按照该国议单,以大岭大河及常住卡伦为界,所有在卡外住牧蒙古、哈萨克、布鲁特人众,应归属于该国。第三,该国并未占索伦、四爱曼人等居住之处。第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俄国驻北京公使照会里,虽有将边界事宜,妥为商办之语。但并无要求俄国让出一二百里之意,这应是明谊等人拟给照覆时,擅自添加的。第五,西部边境勘界之事,不能比照两国所订东部国界划定条约处理。

俄方并要求明谊“迅将或照该国议单指出界址,毫无更改,抑或背约,仍坚

执侵占不应得之地,咨覆该国”。而俄国西伯利亚总督会依据明谊所答复内容考虑是否派出使臣至塔尔巴哈台会商或向该国皇帝请示,将谈判使臣撤回,停办分界事宜。

明谊认为俄国此次覆文,态度依然强硬,要求需照该国议单办理分界,丝毫不能更改,才愿意派人前来定界换约。明谊即向俄方发文说明:⁸²第一,该国分界议单内所指界址,有许多含混不清之处。两国既要將边界事宜“妥为商办”,则何能以照含混不清的议单,即定界址。第二,若照俄国议单分界,索伦、四爱曼人生计必受影响,他们岂能甘心忍受住牧之地被占,势必逞强阻挠,若致启争端,责任将归谁负责。第三:蒙古等部落,归顺中国有年,接受中国册封赏赐,俄国怎可说他们不是中国所属之人,若被俄国“将伊等生计全行包去,伊等断不能束手待毙,我国又何能驱令归服贵国”。明谊说“惟有仍遵前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咨,准照贵国议单,并酌量各处情形,约贵国大臣前来,妥为商办应分之界”。明谊并称希望该国总督收到此文后,即派使臣前来塔城,中俄双方能“按照条约,妥为商办”。若该总督不愿派人前来,则可照该总督前次之来文所说,撤回谈判大臣,停办勘界事宜,并应将停止几年,何时再开会议,向他回复。双方在恢复谈判前,均不得派兵私行侵占土地。

明谊对于与俄交涉分界事宜,他费尽心思筹办,希望能完成朝廷所交办任务。但是在同治三年(1864)五月,新疆回民起事反清,新疆南路各城相继失守,北路各城为之震撼,伊犁等城随之亦发生骚乱,情况危急。而俄国却趁此时机派兵入侵博罗胡吉尔卡伦等地,借机强占中国土地。朝廷对新疆局势颇感忧虑,曾发布上谕给明谊等人,上谕内容提到“此时新疆地方回气猖獗,而俄国兵队又节节移近图尔根河西驻扎,强占卡内地方”。朝廷要明谊等人密切注意当地情势发展⁸³。

不久,明谊上奏朝廷说俄使札哈洛夫等人,于八月间到塔城与他会面,俄方仍坚持以该国所提议单划分国界,但明谊还是认为若依俄国议单划分,蒙古、哈萨克、布鲁特等中国藩属,将被俄国全行包去。明谊还是未与俄国使臣换约,而札哈洛夫等人亦随即返国。不久,随即接到朝廷命令,说有关所有分界一事,准照俄国使臣议单迅速办结,但札哈洛夫等人当时已启程返国,无法挽留。

而当时新疆情况紧急,不仅俄国兵队进入图尔根河西驻扎,并强占卡内地方,似有添兵之势,且乌鲁木齐等城相继被围失守,伊犁亦岌岌可危。他与常清等人商酌拟给俄国照会,称朝廷已准照俄国所提议单分界,速派使臣前来换约,

并请俄国将兵队撤出卡外。但俄国在八月间,派出兵队六百余人,携带炮械至巴克图卡卡伦外附近小水地方住札,俄国带队官称是上级派他们前来等候该国分界大臣到来,明谊认为俄方有逼兵挟制之意。

明谊等人随即联络俄国使臣订期会商,八月十八日,明谊派阿克敦布前往俄国在塔城领事馆见札哈洛夫等人商订双方会议日期,札哈洛夫向阿克敦布说,他坚持须按照议单换约,而定界后将分入俄国地面旧住人丁,均为俄国所属。若照如此分界,则将派员来此地,若清朝政府不允,则将派兵强占。八月二十二日,明谊与札哈洛夫等人见面会商,俄方态度依然强悍,丝豪不让。明谊认为札哈洛夫等人未来之前,先派兵驻扎于卡伦附近,“会议时不但询问我国西路回匪变乱情事,且竟敢动辄以用兵为词,肆意强横,窥其情形,非特急欲挟制完案,且趁我内外不能兼顾之际,有意寻衅”⁸⁴。明谊说,“若不允其所求,必至立成决裂,且恐于议单外更添枝节,值此西路回气猖獗之时,若再加以俄人肇衅,更难收拾”。随即在九月七日,与札哈洛夫等人互换记约完案。《中俄勘定西北界约记》(亦称《塔城界约》)签订后,原为中国藩属如哈萨克、蒙古部分部落,已被俄国侵占,俄方进而将中国西北领土强占面积达44万多平方公里。

十一 结论

明谊背负朝廷的重任,负责筹划并参与中俄两国勘分西北界约的谈判工作,从本文的论述,他可说是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想在谈判桌上替国家为藩属挽回几分利权。但是明谊的努力最终仍告失败,有下列几点原因:

第一,清朝政府谈判的资料准备不足:中俄双方谈判西北边境国界问题,事前准备当重要,尤其是对于边境山川等地势地形、当地游牧部众分布情况的数据整理,甚为重要,有完整的资料才能在谈判时有充分的依据。如前文所述,明谊在上奏朝廷的“臚列豫商事宜五条”中,亦提到当时从旧有的伊犁档案得知,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当时伊犁大臣阿桂请朝廷颁发的绘有新疆及哈萨克、布鲁特等地方的地图一张,但因档案不全地图遗失,明谊请朝廷颁发,朝廷才在内务府找到伊犁回部图一张、天下全图一张,而这些均是乾隆时期(1736—1796)的旧资料,已近百年。当时所绘地图内容,与同治时期(1862—1875)新疆边境情况是否一致颇有问题。清朝政府在边境所设之鄂博界碑是否被对方移动,亦很难知晓。在无最新的地图数据可以辅助明谊作为谈判依据,要与俄方谈判取

得有利的情况是很难达成的。恭亲王奕訢对此事亦曾上奏表示,“惟控制中外之要,以形势为先,斟酌险易情形,当取图为藉,……现当整顿边防之际,……形势既殊,事机亦异,倘仍执旧图为据,其间谬误必多”。⁸⁵恭亲王奕訢又说若以前朝廷所派边境大臣服在俄国未侵占边境土地之前,“即援据图籍讲求疆界,实力巡查,何致任其潜盖卡房,年复一年,暗行侵越,以致酿成不可救药之势,由此以观,是图藉之所观,甚非浅鲜,不可不亟讲求”。⁸⁶而俄国的准备就与清朝政府不同,依据巴布科夫的《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 1859—1875 年》书中,他在谈判前及谈判中,均前往中国边境收集并实地进行测量工作,图籍资料准备充分,相形之下,清朝政府在此方面确实不如俄国。另外,明谊在咸丰十年(1860)奉朝廷谕旨赶赴塔尔巴哈台参与边界谈判事务。

第二,清朝政府官员遇事推诿,不能合作:与俄国谈判,并非只靠明谊一人即能完事,若参与勘查边境界址等边疆大臣,不能实时提供相关边境信息及如何安置当地蒙古等部落生计的筹办计划给明谊,明谊如何与俄方代表力争所属藩部安置问题。他才会上奏朝廷对伊犁将军常清的作法与态度表示不满。恭亲王奕訢说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不能顺遂,都是以前朝廷内外臣工,互相推诿,遇有要事,都不能身任其责,日复一日,才导致无可就药之情势。明谊及恭亲王奕訢的一番话,可知若朝廷官员不能合作配合,勇于任事,要在谈判桌上与俄国力争,是很难之事。

第三,清朝政府对俄国态度软弱:清朝中叶以后,对外战争不断。对内,咸丰年间(1851—1862)有太平天国之乱,接着西北陕甘回部事变又起,蒙古地区亦发生多起蒙民动乱事件。使得清朝政府内外应接不暇,疲惫不堪,元气大伤。在经历内部的动乱及俄国等西方列强军事力量的冲击后,清朝政府实行“重内轻外”的政策。将“太平天国”、“陕甘回部反清起事”……等内部动乱视为心腹大患,将西方列强势力的入侵,则看成是“肢体之患”。所以是倾全力镇压国内之动乱,对于外国势力入侵,则采取妥协退让、逆来顺受的作法。例如明谊在担任乌里雅苏台将军之前,曾奉命往塔尔巴哈台,处理俄国在塔城贸易圈被焚烧事件,朝廷即要明谊从严惩办相关人犯,并给予俄国优渥的赔偿。而明谊在与俄国使臣谈判分界事宜时,朝廷给他的谕示内容有“不可徒事纷争,致启边疆之衅”、“不可使其稍有借口,藉端决裂”等语。对于俄方派兵进入卡伦强占土地,甚至将驻防卡伦的清军押走,朝廷的得知消息也是要求明谊等人小心谨慎,严密防范,不要与俄军发生正面的冲突。另外明谊为塔尔巴哈台所属巴克图卡外小水地方,旧住种地民庄一事,也显见明谊畏惧俄国之压力,当地民人在该地居住种

地已久,俄方却要⁸⁷求将该地民人内迁,土地归俄方所属。明谊无法与俄国力争,保留该地民庄,让民人不致顿失依靠,流离失所。但明谊只为当地民人争得中俄立界后,十年陆续内迁的时间,最终当地民庄百姓还是必须离开自己长久居住的家园,前途茫茫,明谊在这事情的处理方式,也有可议之处⁸⁸。清朝政府此种畏首畏尾的软弱态度,不敢与俄国正面对峙,更让俄国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更加强硬。

第四,弱势清朝无法抵抗强势俄国:清朝中晚期,尤其在自鸦片战争后,大清朝国势渐衰,政经文化发展迟缓,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及维系与藩属间的宗藩关系,虽然困难重重,但仍是尽最大力量坚守。但是现实的问题是清朝政府国力已不如外人,不但无力慑服藩邦,更无力在藩部、属国遭遇危难时,负起“兴灭继绝”之责⁸⁹,甚至连本身的安危也无法妥善处理。面对俄国强大的压力,中国境内又动乱不已,在内外都无法兼顾之下,明谊才会无奈的说,此时若不允俄国所求,必至立成决裂,而俄国若启衅端,则难以收拾。

笔者认为“国力”是决定外交谈判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使是谈判者能力甚强,若没有坚强的国力作后盾,国家不能给予以充分的支持,要在谈判上占得先机,甚属困难,而明谊所面临的情况即是如此。俄国使臣札哈洛夫等人,在该国以武力威胁中国之下,一开始就态度强悍,毫无退让之意,明谊在国家实力、现实情势均无法与俄国相抗之下,无奈的签下条约。同治五年(1866),他因病开缺,回乡调理,七年(1868)逝世,享年七十七岁,清朝政府以明谊“克供厥职”,赐予“勤果”谥号。

〔注 释〕

- 1 有关明谊生平事迹,可参考传稿《明谊列传》,文献编号:2605;《臣工列传—明谊》,文献编号:6727;包《明谊》,文献编号:2164。以上档案均为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
- 2 (清)文庆监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台北,国风出版社,出版年月不详,页15。
- 3 《奕訢奏请派查勘东西边界大臣》,《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下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9,页1042—1043。
- 4 同前注,《谕景廉着提出与俄会勘中俄西界大臣明单候旨简放》,页1044。
- 5 同注3,《常清等奏拟会勘地界大臣名单起旨简派折》,页1075—1076。
- 6 同注3,《奏驰抵塔城会勘西界因俄使未到先行查卷预办情形折》,页1172—1173。

- 7 同注3,《会见俄领事官并借阅其地图情形片》,页1194—1195。
- 8 同前注。
- 9 (俄)伊·费·巴布科夫着,王之相译,《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页98。
- 10 同注3,《明谊等奏俄督派员前来会谈并接总理衙门行知改期明年会勘西界折》,页1206。
- 11 同注9,页102。
- 12 同注3,页1207。
- 13 同注9,页106—107。
- 14 同注9,页108—109。
- 15 同注3,页1207。
- 16 同前9,页104。
- 17 同注3,《明谊等奏为俄存心诈占我领土请展缓会勘日期待我先普勘后再会议折》,页1209—1210。
- 18 同前注,《明谊等奏呈关于筹备查勘西界五条》,页1210—1213。
- 1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4—5。
- 2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16。
- 2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17—19。
- 22 同前注,页20。
- 2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页3—5。
- 2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页3—7。
- 2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同治元年6月,页44—47。
- 26 《廷寄档》,同治元年夏季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页115—118。
- 27 《廷寄档》,同治元年秋季册,页27—29。
- 2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同治元年7月,页52—55。
- 29 同前注,页60—61。
- 3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同治元年闰8月,页35—36。
- 31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上册,页199—200。
- 32 同前注。
- 3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页39—41。
- 34 同前注。
- 35 同前注,页41。
- 36 同前注,页45。
- 3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页10—12。

- 38 同前注,页 12。
- 39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上册,页 223。
- 4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页 51。
- 41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上册,页 232。
- 42 同前注。
- 4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三,页 1。
- 44 明谊,《奏为通筹分界事宜敬陈管见折》,《月折档》,同治二年正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页 1—5。
- 4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三,页 2—5。
- 4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四,页 31—33。
- 47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上册,页 186—187。
- 4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九,页 49—55。
- 4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六,页 1—2;15—16。
- 5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七,页 3—6 页。
- 51 《奏报博罗胡吉卡伦有俄兵居住经严密防范并派员晓谕情形折》,《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8911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52 俄国派兵进驻地点可参考《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上册,页 246。
- 5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六,页 1—3。
- 54 同前注,页 3。
- 55 同前注,页 17。
- 56 《奏报俄国尚无确信会议俟明绪探实再行定止折》,《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88869,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57 《奏驰抵塔城与麟兴会商边防事宜》,《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89172。
- 5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七,页 28—29。
- 59 同前注,卷十七,页 37—40。
- 60 同前注,卷十七,页 42—47。
- 61 《奉报与俄国议办分界事》,《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90323。
- 6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九,页 16—17。
- 63 《遵办分界情形折》,《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9277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二,页 13—15。
- 6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二,页 24—27。
- 65 同前注,卷二二,页 25。
- 66 同前注,卷二二,页 25—26。

- 67 同前注,卷二二,页34—36。
- 68 《奏接奉谕旨迅拟分界事宜折》,《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94524;〈明谊奏哈萨克人众内附〉,《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95346。
- 69 《奕訢奏折》,《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94328。
- 7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三,页22—23。
- 71 《明谊等奏俄使到城仍持常住卡伦前议未与换约由》,《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95341。
- 72 同前注。
- 73 同前注。
- 74 《明谊奏接奉议定分界大局现在筹办情形由》,《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95342。
- 75 《奕訢奏览议明谊等奏分界事宜》,《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95630。
- 7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四,页25—26。
- 77 《明谊等奏为遵旨筹办与俄国勘界事宜由》,《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96312。
- 78 同前注。
- 7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23。
- 80 同前注,页24。
- 81 《明谊等奏遵议分界事宜》,《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96955。
- 82 同前注。
- 83 《明谊等奏分界事宜照俄使议单换约由》,《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99958。
- 84 《明谊等奏分界事宜照俄使议单换约由》,《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9995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九,页20—23。
- 8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二,页27—28。
- 86 同前注,卷二二,页29。
- 87 例如在道光时期,俄国已将侵略的触角伸入哈萨克地区,并与宣称对哈萨克拥有主权的清朝政府发生多次争议,清朝政府在处理哈萨克主权归属交涉态度上,即畏首畏尾,不敢与俄国力争。详文请参考拙作《道咸时期中俄外交争议中的哈萨克问题》,《民族史研究》,第五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办,民族出版社出版,2004,页342—378。
- 8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九,页23—24;33—36。
- 89 例如在道光时期,俄国已将侵略的触角伸入哈萨克地区,并与宣称对哈萨克拥有主权的清朝政府发生多次争议,清朝政府在处理哈萨克主权归属交涉态度上,即畏首畏尾,不敢与俄国力争。详文请参考拙作《道咸时期中俄外交争议中的哈萨克问题》,《民族史研究》第五辑,页342—378。

晚清康区甘孜地方势力与改土归流¹

王秀玉 著

甘孜在20世纪初处于众多的土司管辖之下,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纷争常常让屈指可数的清廷边吏感到棘手和迷惑;这些边吏习俗上通称为“汉官”,并没有严格的族部分类含义,名义上有管辖权。孔撒,麻书,朱窝,东科,白玉各有一土司,林葱有一土百户。这些霍尔部落对于清朝来说是由四川的打箭炉厅管制,虽然它在1896年前从没有委派过官员或干预过这些地区的自治。此后曾试图过改土归流,但因省官内讧而放弃²。川省权利的扩张因省督轮换受遏,复辟后的霍尔部落和瞻对又落为川省权限之外。只有到了1904至1907年间,蒙清廷信用的重臣锡良在朝廷的有力支持下,才对此土司局面进了几个重大的调整³。1904年11月9日,清廷批准在章谷设一委员,权限上监督以上五土司,并收回印信号纸,但保留头衔。又进行初步改革,清查户籍,设定税额,绘图分区。税额减低三分之一,作为赢得当地居民支持的主要决策,但同时也减少了本地官府文武部门的开支,以降低四川省的财政负担⁴。

省督锡良(1853—1917)的扩张主义固然是这次川省权利伸展至康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甘孜当地政权内部的竞争分裂却给四川提供了机会,使其财政和人员资源得以插入原本独立的土司权力体系。在晚清时期,有两类土司之争经常成为清廷利用的对象:土司家族内部的空缺纠纷及土司之间的较量。二者彼此相联且有循环恶化趋势,驱使与众多长期性的矛盾问题,诸如界限、乌拉、联姻、族盟及寺院的支援。

具体就甘孜而论,锡良采取这一行动的来由是区内土司区域之间的错综纠纷,使他觉得到了能够造成边区不宁和拉萨势力延伸的危险地步。比如,1902年章谷土司死而无嗣,邻边的朱窝,麻书土司之间因争相吞并章谷而纠纷顿起并恶化成武斗。朱窝土司获得已故章谷土司的印信号纸,即土司职位的书面凭证,接着联盟瞻对,且拉萨管辖的瞻对已经经营有年,试图吞并弱小土司。而麻书在地

理位置和家族联系上与章谷更加接近。已故章谷土司旺钦瞻登是麻书土司之弟,因作章谷老土司之婿而承袭其位,然本人没有后嗣。但是,旺钦瞻登入赘章谷以前已有一个儿子名叫扎喜旺甲,是与另外一女子所生。扎喜旺甲承袭了无嗣的麻书土司之位后,自己也于1903年无嗣而死⁵。章谷和麻书土司两家皆由此断后失去直接继承人,这给麻书土司下的头人提供了一个吞并章谷的黄金机会,但也让朱窝土司吞并章谷的希望成为可能,如果他能够借助瞻对在麻书头人竞争中占到上风的话。所以这些位袭界限上的争执有很强的地方倾向性,而且地方史上一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官方很明显的缺少直接而有力地介入地方事件中,认为地方纠纷最好由那些凶顽的地方人自己来纠缠。此次藏管瞻对介入是个例外,却恰好印证了这个官方行为的普遍性:拉萨如果没有介入,锡良极有可能就会按兵不动。他解释章谷设员,主要是基于拉萨介入这个因素使得地方土司之争扩大到了区域性的威胁。他上奏皇上的定论是不能允许土司之争发展成切断打箭炉与中藏的障碍,而在章谷设一委员则能够维系人心,抵制“强邻”,暗指着英属印度和俄罗斯⁶。清官方之所以介入甘孜地方是由瞻对的参入引起的。

以上牵涉到章谷,朱窝和麻书三土司权力斗争的背景对于本地区从孔撒土司起头的改土归流运动的过程有重要的影响。土司权力体制机构与土司家族机构之间的紧密交叉使其斗争具有流动可变性和多维性,使清朝边吏很难轻易解决。官府机构原有的以其自己的类型来划分人群的倾向肯定变得更加强烈:边吏们通常惯于重复地肯定边区人民有一共同身份,就是属于“甘孜五土司”,吏属打箭炉厅。这种笼统的概括淡化地方之间的不同点,使整齐划一式的官方政策显得合理,然而地方级政权通常却强调彼此之间的独特性,以便于独占地盘。1906年1月间,照锡良的建议,兵部将孔撒和麻书兼并,由俄朱宜美多吉管辖,他母亲是孔撒土司女儿,父亲为德格头人,入赘到孔撒。俄朱宜美多吉也入赘与麻书土司之女为婚,并在他十八岁那年因岳父无子而死成为合法继承人之一⁷。这样,由清朝官方的角度来看,1906年的甘孜地区是包含了一个清朝委设的委员及其下的孔撒麻书,东科,朱窝及白利。

对于川省,这个行政上的虚构也许方便与统一管理甘孜地区,但对处于前线的清朝官员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系列不同的人群和事件,了解不完全清楚,并不完全符合他们头脑中的界限条框。在执行省政策甚至在掌握政策重点的变动上失败的现象并非偶然。例如,在1909年9月,甘孜的清朝官员不可能知道

改土归流已被定为是眼下的政策,因为还没有边区动乱出现。他们可能会认为眼下工作的中心是说服康人多送儿童去新设官学,因为康区土司,尤其是朱窝土司,一直在拖延甚至请求关闭官学。他下面的康人看官学为一种税务负担,甚至是对于被送到成都上学的学生的生命危险,对他的要求非常不满,抱怨说他为讨好汉官而牺牲他们的儿女。文献记载,孩子的父母们埋怨土司对孩子们缺乏爱心,他们威胁说“如果强迫他们的孩子去上学,他们宁愿投河自尽”⁸。这些反抗言论让甘孜的清廷官吏感到非常棘手,设立官学是上级官员视之为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新委任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1845—1911)曾经平息了在喀木发生的叛乱,他对违反命令的人从不心慈手软。但是很少人知道他真正的工作重心是要移除甘孜和瞻对地区的地方官员,相较之,设立官学就不是那么重要了。1908年,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被朝廷指派为四川总督,赵尔丰在10月17日给赵尔巽的信中提到巩固协同边境上的改革,再一次暴露了他扩张的企图。他认为德格的平定使得改流甘孜和瞻对的时机已经成熟,在瞻对发生的任何公开的反抗都可以为使用武力提供借口。他认为推迟或不采取行动都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赵尔丰认为哥哥是个更好的战略家和奏折撰写人,他便请他的哥哥帮他修改请示向瞻对——甘孜地区派遣军队、收取甘孜的奏折⁹。

当地的清廷官员并不了解这些举措,他们不清楚在各类事务上应该如何与康人相处。太过严厉不仅开销大、不讨好,也会导致土司反抗,使边务受挫;太过谨慎避免与康区土司发生冲突又会使其丧失威信。对于消息并不是那么灵通的清廷官员来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就变成了每天要面对的功课。仲裁、民族问题和当地的党派之争,稍有处理不当,就会成为隐患。例如,1909年10月,麻书地区的千总就让自己陷入了麻烦中。事情起因是他向瞻对地区的一个村子讨要乌拉,一种无需付费的交通苦力服务,他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但当地的头人竟断然拒绝了他的命令,并将他的名字——封国恩报到了赵尔丰那里。封不恰当的举措惹怒了赵尔丰,由于不懂拉萨管辖下的瞻对地区是被豁免提供乌拉劳力的,赵两次责备封在这样不妥的时间里让朝廷官员丢脸¹⁰。由此可见,虽然赵氏弟兄正在考虑对瞻对地区实行强力,但如果一个清廷官员对该地政治和文化的复杂性估计不周,就仍会使其事业受挫。

清政府对当地牢固的土司制度的无力还表现在1910年6月与一位女土司发生的冲突中。事情始于政府试图阻止一位女土司携带两土司印信到拉萨¹¹。1910年5月底,赵尔丰收到报告,甘孜内一个小城麻书的女土司正计划于6月2

日通过林葱,登科到拉萨去,随身携带着麻书土司办公室的印和三个邻近土司的相关文档,同行的还有600人,其中400喇嘛,以及700多头牲畜。据女土司说,这次行程的目的是为了还两年前的愿,以及给拉萨的寺院献礼。文献记载无论清朝官员如何希望说服她取消旅行计划,央机执意要按照计划行事。她甚至要求官员发给她护照以及可以使用乌拉的执照¹²。官员虽然怀疑她旅行的真实目的,但因缺乏证据,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建议她在私人旅行中携带印章似乎很不妥当。

但是赵和他手下的官员们在开始时并不知道是否对此事应该做出反应或者应该怎样反应。这个“事件”还没有被定义之前,又有一报告说女土司已经改道走德格,正派兵拦截。接着,德格一头人前来投诚并要求保护,可能感觉到一场冲突即将来临¹³。在应对这些突发性的事件时,前线官员们没能请求赵就采取了行动。赵本人也同意这件事情很严重,但一下子却不能判定危险在哪里,对策是什么。然后,赵想出了一个名目,定这件事为“携印逃走”,为此罪央机和她家人应被拿获,下监,再接受更重的惩罚。他斥责了下属不应该违背规章发给央机护照放行,却没有指明什么是正确的规章。赵赞成不能让央机入中藏,并调动了更多驻扎在甘孜与中藏之间的部队参加追捕。又下令在抓到土司和她的儿子时,要把他们武力看守¹⁴。至于那两个投诚的喇嘛,赵对他们是否真心半信半疑,注意到他们“词语草率”未具文书,也没有点明谁是他们的掌管喇嘛¹⁵。

正当赵全力捕获携印“逃走”的土司时,德格道员又来禀称两喇嘛投诚乃是真心。说两喇嘛“乃甘孜人最敬仰崇信者”且愿意亲自前来上交投诚信和帮助编制当地姓名清册,这通常是改流后的第一件重大措施。更重要的是,道员说另有一德格喇嘛愿意投诚,并代表三俄洛女酋,叫做四吉芝麻,来探听赵的意允¹⁶。道员强烈倾向于接受投诚,认为这对赵和国家都有利,说:

然彼既有此归附之思想,亦是摄于宪台之声威,并景慕宽仁之德政,近悦远来之语,不信然乎。倘此事能达其目的,幅员之广,弥拓弥宏,维有宪台殊勋,国家之幸福也。¹⁷

赵欣然采纳了此建议。他指示道员使四吉芝麻“具出甘结,盖用图记”,遣一二名妥实头人来他行辕。他回忆到上年曾示谕过她投诚,却被忽视。“又闻孔萨土妇近又逃匿改土酋处”,他写道,“如果属实,四吉芝麻能将孔萨土妇现

出,愈见投诚真心”¹⁸。赵答应如果土妇自投或四吉芝麻能说服她投降,就不追究其“逃逸之罪”。指令里也暗示着四吉芝麻最好按自称的那样来投降,以免自己忽视赵令一事被追究,及消除对自己是四吉芝麻同伙的怀疑。赵接着命令孔萨土司可能经过的路途附近各分队尽一切方法截拿¹⁹。

1910年6月12日,新军右营管带朱宪文报告查到女土司所在,营队已开往附近一寺院并切断其后路。朱管带派了一个本地头人去见女土司,二人同意会面协商。据朱所言,女土司言辞决绝,拒不交印,有必要动武。朱令土司就地继续协商,希望拖延时间等更多追兵赶到²⁰。没料到第二天就来了四个分队,朱于是变得强硬起来,用兵包围了央机的人马。央机被迫交出了印信号纸,但这时朱却改口拒绝让她前往中藏,下令让她的下人返回家里,留她一人本地等候在成都的赵尔丰的指示²¹。当夜,央机和属人逃走,留下所带的一些食物和五十余人。朱审问众人但没问出央机逃去哪里,于是分兵四路追寻²²。先抓到央机的母亲,她供出了那个藏匿央机的喇嘛的名字。之后不久央机和另些家人被捕获关押²³。

央机被关押期间,虽然她抗议说自己只是去拜佛,应该如赵早先承诺的那样被宽大对待,赵还是没收了她的印,并要求她支付最大数目的罚金²⁴。赵在一整本奏折上数算了央机的罪行,使她在案件中看起来像是喀木地区最阴险的土司,认为她的行为构成了谋反。央机其他罪行还包括不合规矩的嫁娶行为(在她的父亲去世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嫁人),不孝(由于母亲不赞同她的嫁人,便和母亲脱离关系),不忠(把丈夫赶走),以及篡夺前夫的职位。还有在麻书土司去世后夺取他的职位给自己的儿子,囚禁他的遗孀,赶走扎噶寺的掌头喇嘛并让自己另一个儿子成为住持。赵也没有忘了提及两年前他经过其领地去往德格的路上,看到女土司竟敢在她的堡垒内囤积多达800名士兵,赵强调这足以看出其蓄意谋反的迹象。赵最后总结说,根据央机过去的这些记载,她的罪行构成谋反,应该处以极刑。但为了表明他的宽大,赵请求饶她一死,将另外两名孔撒和麻书的土司改土归流²⁵。他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

央机在甘孜地区权力的丧失给周围的土司很大的压力。1910年6、7月间,霍尔的白利土司带领其下的寺庙和林葱土百户的部下归降朝廷。邻近的东科土司和倬倭土司也很快归降。不久,一个改土归流官员被指派到甘孜地区,在那里建立衙门,制定税收政策,规划郡县界限,以及进行人口普查和户籍注册²⁶。归降的土司被授予汉官职衔,比他们之前的“土”职衔更高,薪金也有所提高,只是

没有真正的权力,他们可以保留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朝廷故意对这些土司恩典有加,以期与孔撒和麻书土司形成对比,后者被罢黜职位,且没有任何从朝廷而来的补偿。这些是为了让人看到朝廷的政策是奖赏“自愿归降”,惩罚任何拖延和反抗的行为²⁷。

新的体系将甘孜分为5个区,包含9个乡,下面是最小的单位——村。大村有超过100户人家,小村有80或更少户人家。最大的变化是在村以上、县以下的乡,它允许国家权力更深的渗透,朝廷命令现在可以通过县传达到更易于管理的保正——准官吏的当地精英,而非之前松散的村落或家庭聚落。如我们在巴塘一例中所看到的,保正是国家和当地之间的中介。他既充当被大家推举出来的当地代表,可以和村中的头人和村民有直接的交往,又担当国家的代表,根据他的表现被指派或罢职,他们在县级官员以下的工作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收入。仿照德格的体系,甘孜也选出了5个保正,每个保正管理1个区,监督和管理其下村中的头领。保正和村长都任期1年,如果各方满意可以被复选。保正的收入是固定的200藏元,后者相当于其管辖下的每户每年8分²⁸。

甘孜地区之政务负担, 1909—1911

区	乡	村长	村	户家	村长管辖户家数目
江东区	麻书	12	27	760	63
东北区	东科	6	5	897	150
正西区	杂科	4	13	353	88
西南区	阿督	2	2	143	72
	倬倭,贡陇	4	8	366	92
正中区	孔撒	8	13	760	95
	白利	4	7	316	79
	林冲	3	4	224	75
总计	9	43	79	3,819	每村长平均 89 户

资料来源:民国甘孜县图志,页125—129。

这一体系之所以被制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理这一地理人口都具有极大多样性的地区的必要性,再此表也能看得出来。由地理位置决定的区包含不同数目的乡、以及不同的人家密集程度。例如,从阿督的 143 户人家到东科的 897 户人家,村长负责的行政区域差异很大,麻书是每个村长负责 63 户人家,而在邻近的东科要负责 150 户人家。人口分布上的不平均迫切需要行政上的标准化,但同时也指出这样标准化的不足。一个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是如何监督 79 个村子中的 43 个村长,因为他们的工作对税收的进行有直接和严重的影响²⁹。正如甘孜委员观察看到的,地理距离是妨碍县级官员监督及避免属下腐败的主要原因。保正做了绝大多数监督和评估的工作³⁰。

与喀木南部和中部的改土归流相比,甘孜一例突出的特点是对一位极有权势的女土司使用武力,以次威胁邻近的土司们。有些土司出于害怕,上交了他们的印,这被朝廷视为“自愿归降”。因为这是在南部喀木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之后发生的,甘孜改土归流遇到了较少的反抗。县以下保正和村长制度是对巴塘和德格的模仿,这两处都是清政府压制最严重的地方。因此,甘孜一例结合了喀木改土归流的不同模式,集合了强迫和劝说,以及国家发起和当地自主的行为。

结论

我在本文中特别考察了清朝在喀木扩张中甘孜改土归流的情况,强调了当地历史、藏民的能动性,以及在清政府官僚中各个利益团体间的协调。当地政治形势的独特性、藏民丰富的自发性、以及在清政府内缺乏集中的带领意味着本地的改土归流至多是权力之间的协调,而不是一次清政府对西藏的“胜利进军”。当赵听到甘孜的女土司携带自己的印上路,他不仅要被迫对当地的事件作出及时反映,同时也是对一套陌生的管理体系做出反应。当地的头领是个女人,而赵等官员很难将女人和头领认同起来,他们偶尔才称呼她为土司,大部分时间都是叫她“土妇”甚至“恶妇”。她声称为了朝圣旅行到拉萨,这对赵和他的官员来说,也不成之为理由。由于赵从来没有清楚的表明为什么土司在旅行中带着她的印是不可以的,原因很可能是来自于难以用清政府的参考体系来将之归类——女人却又是头领,朝圣却携带官印,得到清廷的认可却又在本地关系网络中有一席之地,这些都使得她的出行看起来更像是一次潜逃。这样看来,改土归流很明显是一次后知之明,其中的理念也是被特别加工而成的。赵在抓到女土

司之后,才意识到甘孜区域的广大,才开始推行改土归流,朝廷并没有听到这个故事的其它版本,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甘孜归降以后,赵用它来威胁白利、林葱、东科和倬倭投降朝廷。这些都有其偶然因素,并没有遵循一个固定模式。遥远的朝廷只是默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不驯服的边疆之地并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作为。赵对甘孜地区改土归流时军队规模的大小以及他小心培养出的为人残酷的名声,都与“标准”的改土归流程序殊少类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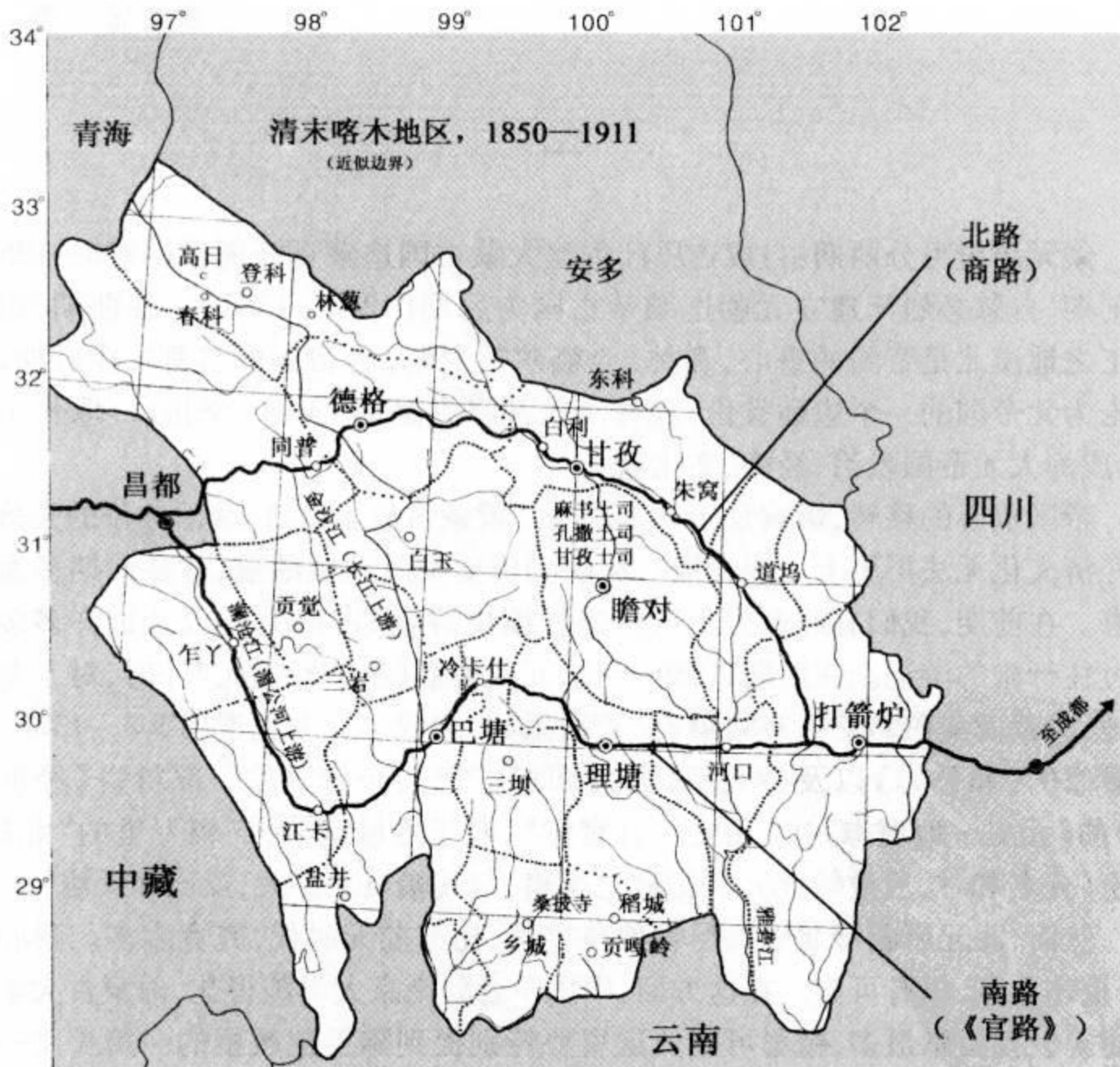
在史学论角度上看,甘孜案例突出表明了研究晚清帝国在康藏或者其他边疆地区的势力扩展上多视角研究法是有效益的,此方法将政府中心的政策制定作为因素之一处理,而非唯一重要的因素,并注重它与前线官员面临的实际限制和地方势力在其自身历史环境内产生的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看从北京和成都所发政令为总体性的影响因素要比看其为具体决定地方事态发展的原因要更准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中央政府的一些政策可看成是对地方情况的反应。这个研究框架对地方权力的现实情况给予足够的重视,看其为地方社会演变的一个来源,可以减弱,损坏或绕过中心的利益。地方势力的行动越是强烈,越有文化差异性,就越有力量促使边吏做出反应。这就解释了为何四川官员们虽然对央机“携印潜逃”一事中有哪些团体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没有了解清楚,却越是因为央机显得决心坚定、行动躲闪而越是强化了对她的追拿。从概念上讲,边缘社会是中心利益和地方问题之间的张力网区。边区社会里变动具有使各方介入后果重要的彼此互动之中,却不一定按照任何一方的目标而发展的可能性,也因此能使社会变革走向新方向的潜能。

〔注 释〕

- 1 此文初稿在2006年旧金山亚洲年会发表,修改稿发表于在同年十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法国远东学院举办的“中国历代边臣疆吏”国际研究讨论会。笔者感谢 Edward J. M. Rhoads, James A. Millward, 王明珂和本刊匿名评阅人的评论,也感谢 Bianca Horlemann 惠送一份资料。
- 2 1896年间,作为川督鹿传霖(1836—1910)把对瞻对的控制从拉萨移到四川手下计划的一部分,他曾试图在朱窝和章谷改土归流,以切断其与瞻对的联系。没有与他边事上的同僚成都将军恭寿协商,鹿先派兵入瞻对,在即将完成他计划时借恭寿之名写了一个“联名奏折”,希望借此让朝廷接受一个既成事实。让他失望的是,恭寿的激烈反对不但彻底破坏了他们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而且也招致了与恭寿过交的现驻成都的驻藏办事大臣文海上书朝廷斥责他的企图。有关鹿传霖康北活动,参考“鹿传

- 霖藏事奏牍,”见于《清季筹藏奏牍》,2:页974—975;2:页992—995;2:页1002—1003和2:页1019—1021。有关鹿传霖与同僚之间的激烈争辩,参考《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9,1:页14—36(#12—#23)。
- 3 有关锡良的四川政策,参考 Roger Des Forges, *Hsi-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New He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4 锡良,《锡清弼制军奏稿》,锡清弼制军奏稿,台北,文化出版社,1974,页425。
 - 5 《锡清弼制军奏稿》,页425。
 - 6 《锡清弼制军奏稿》,页425—426。
 - 7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1:70(#57)。这条资料显示出清朝土司继承法规在土司死后无嗣的情况下允许土司之妻,女婿,甚至不属土司家人但“为夷民信服者”继承。
 - 8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2:382(#343)。
 - 9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2:411—412(#369)。
 - 10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2:432(#385)。
 - 11 清文献追溯甘孜土司至唐朝,那时称为甘有孜土司。历经元,明到1642年,当地的白利土司被青海蒙古征服。清分而治之,于1737年分出麻书土司与其兄孔撒土司共治。到了1792年,所谓的“霍尔五家”正式被承认。参见“民国甘孜县图志”页107。
 - 12 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页244。
 - 13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245。
 - 14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245—246。
 - 15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246。
 - 16 三俄洛指甘孜北面尚未纳入的地区,它北邻青海,东接阿坝,南至色达,西临石渠,包含清资料中所称的上,中,下俄洛,也称果洛克。民国甘孜县图志记载了5250户,文化部落的构成各不相同,管辖予以母系继承的一女土司之下。虽名义上归四川的松潘厅,当地居民却被划分为“化外野番”,不纳税。民国甘孜县图志,页51—2。
 - 17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246。
 - 18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247。
 - 19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248。
 - 20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248—249。
 - 21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250。
 - 22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250—251。康北和康西北的清兵绝大多数参与了这次追捕,包括朱宪文带的新军右营,刘玉贤带的中路前军第一营,刘庆先带的第三营,及在登科,德格和石渠的兵力。
 - 23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251。

- 24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 252。
- 25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 256—258。
- 26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 253。
- 27 白利、倬倭土司从安抚司“提升”到千总世袭，东科，林葱土百户升为把总世袭；二职位薪水分别为 96 和 72 两一年，出于甘孜税收。《赵尔丰川边奏牍》，页 261—262。
- 28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 255。
- 29 甘孜委员寇卓报告里提到这地区的年税额包括 2,646.92 石杂粮，4,135 藏元的牛马税，1,306 枚铜元；居民有 16,222 人，包括 6,851 男丁，1,800 喇嘛，7,441 女，130 侨居汉人。《赵尔丰川边奏牍》，页 255—256。
- 30 《赵尔丰川边奏牍》，页 255。



王秀玉绘制

和林元碑与岭北官员管窥

洪金富 著

一

蒙元历史可分两期：自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迄蒙哥汗逝世(1206—1259)为前期，自忽必烈汗建立元朝迄顺帝亡国为后期(1260—1368)。在前期，祖宗兴王之地漠北是帝国的重心，和林(今额尔德尼昭)为帝国的首都¹；在后期，漠北沦为元帝国的一个边远省份，和林由国都降为路治，大都(今北京)取代了和林，成为大元帝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

帝国重心的移转，影响及于许多层面。就蒙古故土而言，政治地位的失落意味经济文化无法再更上一层发展。反映到历史文献记载的量，就是前期多而后期寡。在前期，我们有北亚史上第一部长编史诗《蒙古秘史》，以及许许多多中西过往行旅的游记。在后期，1330年代，元人编纂《皇朝经世大典》时，对于龙兴故地，总裁虞集(1272—1348)就有“记载邈如”之叹。元末危素(1303—1372)发愿纂修的《和林志》以及撰人不详的《和林广记》，今皆亡佚。取材自《经世大典》的《元史·地理志》和《元史·百官志》，对于地域辽阔，广幅万里的“北边”省份(先名和林，后改岭北)，其记载之简略，与其幅员之广大，反比如天壤²。

然而，蒙元后朝岭北史料尽管稀疏零落，比起前元时代，究竟多多。耐心搜集，重建史事，仍有可为。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如南京大学陈得芝、内蒙古大学周清澍等教授贡献最多，精彩可观。这里要特别提到陈得芝教授的一篇长文——《元岭北行省建置考》。该篇鸿文对于整个蒙元时期漠北统治体制的建立和发

展,分析精辟,见解独到。我们从中认识到,漠北境内“诸王星布棋列”,岭北行省(大德十一年[1307]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皇庆元年[1312]改名岭北)及其所统唯一路级总管府(大德十一年置和林路总管府,皇庆元年改名为宁)的管辖权限不及于诸王领地。岭北省及和林路的主要职能有异于其他行省和其他路级政府³。然而,或由于体例所囿,或由于其他缘故,对于该省该路的官吏编制和组成因素,是否因此不同于其他行省和其他路级政府,该文扼要概括,未暇深究。拾遗补阙,本文所以作也。

二

重建一份完整的岭北省与和林路官吏清单无异缘木求鱼。官署题名是最为便利的基础材料。《和林金石录》诸碑所见题名,自然成为我考察的首要标的。我发现这本小书的若干问题,必须先行廓清。

请从该书的来历说起。按十九世纪末叶,俄人访古于和林,发现多处古迹和若干文物,包括十多通突厥、回鹘、波斯、蒙古以及汉文的碑刻。这些文物古迹的影像,由拉特禄夫(V. V. Radloff, 1837—1918)于1892年在圣彼得堡集结出版,题名《蒙古古物图志》(Atlas of Mongolian Antiquities, 俄文)。次年,沙俄驻清公使喀西尼(A. P. Cassini, 1835—?)以拉氏书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解说,于是清人始知有《阙特勤碑》以及《九姓回鹘可汗碑》等北族重要史料而争相传抄。西人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等氏也如获至宝,屡屡引用。由于此书入华首站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故清人或称之为总理衙门书,而抄撮其中汉文诸碑以成书者,则多称之为《和林金石录》,盖因诸碑皆得之于和林废墟或其左近之故也。1897年,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罗振玉(1865—1940)先后见到汪康年(穰卿, 1860—1911)的传录本和章寿康(硕卿, 1850—1906)的手录本。章本附录了元史名家李文田(1834—1895)的跋。罗振玉利用章本校正汪本,写在书眉上,交给湖南督学江标(建霞, 1860—1899)刻版,编入《灵鹫阁丛书》中⁴。江标刻本尽削罗振玉的眉校,罗氏相当不满。稍后,署库伦办事大臣三多(1871—1940?)以和林碑拓寄赠罗振玉⁵。罗振玉遂以新获墨本再校诸本,拟写定付梓,适值辛亥(1911)国变而止。1928年,罗振玉流寓辽海,重作冯妇,企望得遂宿愿。唯诸碑拓本已多散佚,不及复校,只好以行篋尚存的原先稿本为底本,在儿子罗福葆的襄助下,重新

写定他的《和林金石录》⁶。本文所用即为罗氏校定本⁷。

罗本《和林金石录》不分卷,卷首书名次行题《顺德李文田撰》,又次行题《上虞罗振玉校定》。题曰李撰者,盖因碑后跋语出于文田,示不掠美也⁸。

罗本《和林金石录》首罗序,次目录。目录十六行,各行首字一概低二格,罗氏显然认定他的这本书著录的碑石是十六方。我对此有异见。罗氏所拟的部分碑名,我也不能赞同⁹。至于碑中部分文字的释读、若干人物的考订,我也有不同的看法。非敢议论前贤,实因幸存的这几方元碑,或已断残,或已磨损,无一完肤,既不易缀合,又难于释读,多方揣摩,或有一得,故不避翦陋,献曝以祈行家之教正。

按是书前三碑为突厥、回鹘碑,与蒙元无涉,不必论。第四碑以后迄最末一碑,计十三碑,系蒙元旧刻,罗氏所拟碑名如下:

- | | |
|--------------|------------------|
| [4]三皇庙残碑 | [5]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 |
| [6]题名残碑 | [7]文 |
| [8]三灵侯庙碑 | [9]四世同居立石 |
| [10]敕建兴元阁记 | [11]三皇庙残碑 |
| [12]大司农保厘朔方记 | [13]岭北省右丞郎中总管收粮记 |
| [14]残碑 | [15]题名残碑 |
| [16]汉塚石 | |

(一)

第[4]与[11]两石同名,启人疑窦,值得一探。按第[4]石原据拉氏书图版42之(1)及(2)两片,第[11]石据图版54之(1)及(2)两片。拉氏谓此四片系发现于Gurban Juu院中。Gurban意为三,Juu意为庙,罗氏考其内容定为三皇庙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和拉氏都把这四片残石配对错了。为方便说明,我权将图版四片以A、B、C、D代之。罗氏以为A、B一组,同刻于一石,A在阳,B在阴;D、C为另一组,同刻于另一石,D在阳,C在阴。我认为A与B不同组,D与C也不同组。查B题名有陶元璟,为和宁路司吏,A题名亦有陶元璟,已为兵马司吏目。司吏地位低于吏目,可证B片刻于前,A片刻于后,BA两片并非一组。然则A、B、C、D四片的关系究竟若何?私意以为D与A原为一石,刻的是张益所撰、李塔失怙木儿所书的一篇文章¹⁰,此从文章内容以及字体、字距、行距一致无差可知也。原石已断裂为二,上部皆已破损,故而失拓。文章右行,D在

右,A在左。拉氏误将D、A分属二石,或因不谙汉字之故。D、A两片关系既明,B、C两片关系即可容易解决。按B不与A同组,已如前述。C不与A同组,亦有明证。查C题名有贾福,为和宁路医学正,A题名亦有贾福,已升为教授,可证C刻在前,A刻在后,CA两片并非一组¹¹。今既证明C与A不同组,而A已知为D的后半段,则C与余下的B为一组的可能性就很高。观察B片左侧断痕以及C片右侧断痕,可知B、C两片原为一石,B在右,C在左。这是据断裂情况来判断。从内容上看,这一判断无疑可以成立。按两片具为题名,分三列,第一列几乎断损俱尽,每行至多只剩一个字。第二列自右而左,由B至C,依序是和宁路最高长官达鲁花赤以次各级官员及所属儒学、蒙古学、医学、阴阳学、兵马司、祇应司的官员题名;第三列为和林仓、平准库、丰盈库、医人、阴阳人、耆老的题名。二三两列如上的排名次序,合乎当时的官僚尊卑体制,进一步证明我们所作B右C左、原属一石的判断正确无疑¹²。(重组后的四片残拓影像,请看拓影一)

DA一组刻庙记,BC一组刻题名,庙记刻石晚于题名,已如前述。两石竖立年月,亦知大概。查庙记文中有“经始于至顺元年之春,落成于至顺二年之夏”(见A片2行)云云,可知庙记立石当在至顺二年(1331)之夏之后。题名内有“兵马刘天锡”及“儒学正张思明”(见C片7、9行)。按《和林金石录》本书所收第五碑即为张思明所撰刘天锡去思碑,碑中两人衔名与题名同。去思碑立于至顺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故知题名立石当在是年是月是日之前。简而言之,题名立石于至顺二年十月前,去思碑立石于至顺二年十月,庙记立石于至顺二年十月后,前后相距不久。

为避免混淆,便利引用,我权将BC两片定名为“三皇庙题名残碑”,DA两片为“三皇庙记残碑”。“题名”与“庙记”两者的关系,仅靠目前所见拓影,实难辨识清楚。就字迹判断,两者极可能皆为李塔失怙木耳所书。就拓本高广而论,两者似乎同刻于一石,一在阳,一在阴。设使为真,则“庙记”当在阳,“题名”应在阴,两者皆镌刻于一时。但是,前文已经考订,“题名”镌刻在先,“庙记”镌刻在后。此中矛盾,如何疏通,煞费周章。据调查,“题名”与“庙记”碑,今尚幸存于哈刺和林的Gurban Juu内¹³。我们还有释疑解惑的机会。

(二)

第[6]石题曰“题名残碑”,第[7]石题曰“又”。“又”者,又一“题名残碑”之谓也。为便利说明,姑称之为E片和F片。据拉氏书,两片同出一地。罗氏

著录为二通,F在前,E在后。其实两片原刻一石,后来断裂为二,倘将F片置于右,E片置于左,其断裂处若合符节,从可知也。这是一证。题名排列次序则是又一证。按两片题名具有上、中、下三列。倘将两片并列,F右E左,则可发现题名的排列次序是依衙门层级与官员职位之高低为序,质言之,衙门层级高者在上列,低者在次列,官员则高官在最左侧一行,以次向右逐行排列。这就是所谓左行。按传统汉文书写方式系由上而下,由右而左,逐行书写,即所谓右行。元朝蒙古文,不论是畏兀字或八思巴字,都是左行。元代部分汉文碑刻的题名,由右行改而为左行,肯定是受到蒙古文左行的影响之故。罗氏正确指出这两片题名残碑都是左行,倘能把它们并排陈列,必能发现两片残碑原为一石。一步之差,殊为可惜。(重组后的四片残拓影像,请看拓影二)

两片残碑因何而立,已不可知,设在碑阴,则阳面所刻为何,亦不可考。石已漫漶,不可识读的文字大约三之一弱,名列其中的官吏人等姓名或姓氏可辨者一百一十二人,其中唯有三人见载于《元史》,可藉以考订年代。三人之一为帖陈。《元史·泰定帝纪一》载,泰定元年(1324)春正月“丁未,以称海屯田万户府达鲁花赤帖陈假岭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近侍忽都帖木儿假礼部尚书,使西域诸王不赛因部”¹⁴。这个帖陈,也就是残碑F片所见任岭北参知政事的帖陈(帖字左半已磨损,也有可能是个帖字)。据此可知,残碑不会早于泰定元年正月。另外两人具见于《明宗纪》天历二年(1329)四月乙巳条,云:“监察御史言:‘岭北行省,控制一方,广轮万里,实为太祖肇基之地,国家根本系焉。方面之寄,岂可轻任。平章塔即吉素非勋旧,奴事倒刺沙,偃起宿卫,辄为右丞,俄升平章,年已七十,眊昏殊甚。左丞马谋,本晋邸部民,以女妻倒刺沙,引为都水,遂除左丞。……’”¹⁵平章塔即吉,即F片第一人右丞塔即吉¹⁶。他出任右丞不久即升平章。左丞马谋,F片作马某,应是穆斯林人名Mahmūd的异译。两人同时被劾罢,时为天历二年四月。塔即吉短暂担任右丞应当早在数年之前,即两片残碑树立当年。总而言之,“题名残碑”当立于1324至1329年间。为避免和下文第[15]石“题名残碑”相混淆,我权将此碑定名为“塔即吉题名残碑”¹⁷。

(三)

第[15]石亦题曰“题名残碑”。原石已断裂为两片以上,两片拓影见拉氏书图版49之(1)及(2),今姑且以G、H代称之。H应在G之上,罗氏未为改正。两片上下具有缺损。H之第一列各行仅存一字,由右至左为“赖、出、口、焉、理、

题、久、孰、至、北、记”诸字，末行为“月二十八日建”，据此可以判断，H之上部所刻应为一篇文章，惜石已断佚，因而失拓。第二列以下有题名三列，右行。G也有题名三列，同样右行。按元制，行省设官员数，平章二、左右丞各一、参政二，管勾一，等等¹⁸。今查残碑题名，平章四（咬哥、仓赤、蛮子、蛮子），左丞三（木八刺沙、塔海铁穆尔、阿忽刺），参政五（李伯述、丁元、某、某、白守忠），管勾四（鲁浑沙、周彬、八刺沙、刘都怙木儿），俱多于定制，其他职衔的官吏员数亦然。据此可知，此一残碑所见诸官吏，系包括某一时期内前后任诸人，而非立石当日的现任官员。质言之，这是某一衙门的题名记。至于是何衙门，可据所载职衔来判断。查G片题名最后一列为行省管勾题名，以下疑有令史、译史、通事等题名，唯石已断佚，不可覆查。推测原石应为岭北省府题名，没有和宁路总管府的官吏。（重组后的两片残拓影像，请看拓影三）

立石年月已佚去。五参政之一的李伯述也就是所谓《大司农保厘朔方记》的撰文者，该记撰于至正六年（1346），李伯述当时官职已难考察；另一参政丁元为《三灵侯庙碑》的书写人，碑立于重纪至元五年（1339），丁元署衔奉政大夫（正五品）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从五品），本题名残碑竖立当年他已升为中奉大夫（从二品）岭北行省参知政事（从二品）。据此可知，本题名残碑建立年代绝对不会早于1339年，可能已到1350年前后。

李文田认为该碑立于顺帝中叶，大致不差。但是，他以《元史·宰相年表》所见之蛮子其人考定立碑年代，我无法同意。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宰相年表》所见之蛮子，即本方残碑中出任平章、名为蛮子的二人（见H片第2列）中的任何一人。元代以蛮子为名者多，考辨綦难。《元史》中名为蛮子、受任岭北平章的记载仅此一条：至正十八年（1358）夏四月“庚寅，以翰林学士承旨蛮子为岭北行省平章政事”¹⁹。这个蛮子比李氏所指的那个蛮子，更有可能为题名中的任何一个蛮子²⁰。若然，则原碑应立于至正十八年以后某年某月的二十八日。

这一题名残碑，章寿康误分为H、G两碑，李文田、江标、罗振玉已更正，可惜未能发现上下颠倒的错误。至于名称，章寿康将G碑命名为“咬哥等题名”²¹，李氏沿用之，江罗两人则改为“题名残碑”。为免混淆，我权称之为“咬哥题名残碑”。

（四）

命名疑为不当的有[9]和[12]两石。前者残存二片，罗氏定为碑阴的一片，存字三行，罗氏释读作“和林耆老/塔木丁 姚秀实 陈（下阙）/李文□□（下

阙)”。罗氏定为碑阳的一片,存字四行,行二十三字,罗氏释读如下:
昔于至正癸未(1343)冬赴省幕任,问闻而知公之□□以故家为河南之洛阳县人,四世同居,蒙以义表其门者是。

大元至正四年(1344)岁次甲申春二月二十有八日己未之吉

和林耆老贾成、赵国宝等立石

正文残存四十字,殊难说明这块碑石是因为表扬某人四世同居而立。李罗两氏命名为《四世同居立石》,我不能苟同。我宁可推测说碑文是岭北省某一幕僚(“省幕”)所撰,他在文中因故提到某人(“公”),此人今居和林,原籍洛阳,家族在洛阳四世同居,被表为义门。我的推测仅止于此。诸氏的命名有导引读者相信某一家族已在和林四世同居之嫌。曾有学者引申说,“汉人在和宁路居民中占有很大比例,中下级官员和吏目多是汉人,有耆老赵国宝等,故里为河南洛阳,迁和林后四世同居,被表为‘义门’,立石纪念”。

此碑原石已佚,正确命名已不可能,姑且称之为《至正四年和林残碑》。

第[12]石命名为《大司农保厘朔方记》,同样不妥。这块碑石四边皆已断佚,存字九行,第二、三两行罗氏释读作:

以康。丙戌(至正六年1346)秋,光禄大夫大司农别(下阙)

为平章政事,躬行俭约,保厘朔方(下阙)

大司农人名仅存一别字,李罗诸氏以为即《元史》之别儿怯不花,我疑另有其人。考《元史》卷140《别儿怯不花传》,他在重纪至元四年(1338)已拜御史大夫,知经筵事,寻迁中书平章,位居从一品。至正二年(1342),拜江浙左丞相,从一品官。四年(1344),还京为中书左丞相,正一品官。本传随即说到“朝廷议选奉使宣抚”的事,并说别儿怯不花于是年“周行沙漠,洗冤除弊,不可胜计”²²。但《元史·顺帝纪四》将皇帝诏“命奉使宣抚巡行天下”一事系于至正五年十月辛酉²³。疑别儿怯不花周行沙漠时间当在至正五六年间。但是,别儿怯不花周行沙漠固然是事实,所谓《大司农保厘朔方记》上的大司农并不必然就是他。第一,别儿怯不花是否曾经受任为大司农、为岭北平章,尚欠证据。第二,别儿怯不花在至正四年已官居正一品的大司农,颇得顺帝信任,两年后反而降为从一品的大司农,再改为从一品的大司农,可能性不大。总之,碑中的大司农,可能不是诸氏考定的别儿怯不花。

关于碑名,显然是摘自残文中的文句:“躬行俭约,保厘朔方”。这句话原是对某一岭北平章的赞颂,不能肯定说它可以概括碑文主旨,用为碑名,并不妥适。最重要的是,这块碑本来就有自己的,有别于诸家拟定的名称。按原石四周虽已断损,上部碑额却残留了一个全字与两个不全的半字。此一全字甚为清晰,是个“记”字。记字之上是个残字,肯定是个“名”字。记字右边的残字,左侧应是“是”字,残存左半边;右侧应是“页”字,左右合拼,是个“题”字。我们可以肯定,碑额至少三行,行两字,右行,全额最后三个字是“题名记”三字。这块碑就是某一衙门的题名记。是何衙门,残存碑文也有蛛丝马迹可寻。按残文末三行云:

(上略)惜乎立省以(下阙)

名未著。遍考前修,泯不可得,伯述(下阙)

而无传,谨叙同协名氏,刻之于石(下阙)

末二行的伯述即本书第[15]石《题名残碑》(即前文《咬哥题名残碑》)上的参知政事李伯述,此点已经李罗二氏正确指出。文中自称伯述,显见他就是撰文者。味玩残文三行,似说岭北“立省以”来并无省官题名记之类的记录,以致省官“名未著”“而无传”,今故题其名而“刻之于石”。果然如此,则本石应为岭北省府官员的题名记。说它是“大司农保厘朔方记”,可能离事实更远。

此一残碑,章本题为《别儿怯不华德政刻石记》,李文田因之,但改华为花,有时则又称为《大司农保厘朔方残石记》²⁴,今从权定名为《至正六年题名记残碑》。

(五)

问题较为复杂难解的七石讨论既毕,请略述余下的六方石碑。

第[5]石为《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阳面碑文,阴刻题名,部分文字已经漫漶。石立于至顺二年(1331)十月二十二日,其后不知何时,有人于阳面额下镌刻梵咒六字真言,阴面则镌上佛教十相自在图案(或称咒牌),掩盖了部分文字。

撰文者张思明,署衔和林兵马司儒学正,前文《三皇庙题名残碑》也有他的名字,署衔亦同。该碑竖立时间稍早于本碑,前文已有所论。张思明者何许人也?李文田和罗振玉皆认定他就是《元史》卷177有传的河南辉州人张思明(1260—1337)。北京师范大学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第二十一册收录了张思明的一篇文章,就是这篇去思碑。校点者为史礼心。文前有张思明小传,节录自

《元史》张思明本传。史礼心显然相信李罗二氏的说法。三人都错了。《元史》有传的那个张思明在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由侍仪司舍人辟御史台掾后,经历四十余年的宦海起伏,到文宗天历元年(1328)已经贵为正二品的江浙行省左丞,怎么可能在三年后,以七十二岁之高龄,不避风寒,千里迢迢,远赴和林,屈就一个不入流品的区区学正呢!《元史》的这位张思明,在天历二年坚拒中书省的左丞职位后就致仕归隐,直至顺帝重纪至元三年(1337)死去为止。和林兵马司儒学正张思明,肯定是同名的另外一个人²⁵。

第[8]石《三灵侯庙碑》立于重纪至元五年(1339)仲夏,额题《三灵侯庙之记》,阴亦有额,曰《立石题名》。阴阳两面部分文字已漫漶难辨,阳面后来又被覆刻梵咒六字真言,多佚失了几个字。撰文者余良辅事迹不可考。书者丁元署衔奉政大夫(正五品)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从五品),第[15]石即《咬哥题名残碑》也有他,已升为中奉大夫(从二品)岭北行省参知政事(从二品)。据此可知,第[15]石《题名残碑》应建立于重纪至元五年(1339)仲夏以后,与前文(贰之四)将该石建立年月推移到至正十八年(1358)以后并无冲突。篆额者李塔失铁穆耳署衔中宪大夫(正四品)岭北行省左右司都事(从七品),前文《三皇庙记残碑》就是他写的字,唯名字改译作李塔失怙木耳(见C片),仍任都事。前文《三皇庙题名残碑》立于至顺二年(1331)十月之前,则李氏其人久任都事已长达七八年,按元制:凡官员考数,“从七历三任升正七”²⁶,三任九年,是《三灵侯庙碑》建立后,李氏即将迁官也。

第[10]石《敕建兴元阁碑》建于至正六年(1346),原石破损严重,所幸撰文者许有壬(1287—1364)的文集《至正集》卷45和《圭塘小藁》卷9都收录了这篇碑文。这篇碑文有畏兀字蒙文本,同样破损严重。先师柯立夫教授(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对此一蒙汉合璧碑刻已有十分详尽的注释和研究,题“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6”²⁷。关于此碑的最近报导,请看松川节(Mutsukawa Takashi)撰《新发现の汉モ对译『敕赐兴元阁碑』碑片》²⁸。

第[13]石《岭北省右丞郎中总管收粮记》,河东古陶(山西平遥)霍有孚撰,吕仲宽等同立于至正八年(1348)八月初一日。下截漫漶,部分文字磨损,末有畏兀体蒙古文五行,实即汉文碑题之翻译,但增加了右丞、郎中、总管的名字(Temüge, Janggi, Musavir)。1997年,松川节发表《カラコルム出土1348年汉蒙碑文》一文²⁹,1999年,松川节和松井太(Dai Matsui)发表《岭北省右丞郎中总管收粮记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8》一文³⁰,对于这块碑石的现状、已往

的研究、汉文碑文以及阴阳两面所刻的蒙古文等,详加介绍和译注。最近,南京大学博士生何启龙利用了这方《收粮记》碑、前揭《三灵侯庙碑》以及1341年立于和林的一方波斯文碑撰成《从和林碑文看元代和林城的回与汉人》一文,发表于2006年刊行的《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十八辑³¹。

第[14]石《残碑》文存十八行,行存五字,文义不明,利用价值不高。末行刻“石工韩德”字样。《收粮记》也是韩德所刻,推测此一《残碑》应为1340年代之物,今权称之为《韩德刻残碑》。

第[16]石《汉塚石》已断裂,仅存二小块,其一有额,罗氏正确释为“汉塚”二字,所谓汉者,盖因立石处(和林东北三十里小山之外)所葬皆远离汉地,旅居和林之汉人(对蒙古色目而言)故也。

(六)

按罗氏著录十三碑,经我们分合厘正之后,仅存十二碑,倘如扣除其中阴阳两面将来能够证实为同时刻于一石者,则实际碑数当然更少。各碑建立年代也大致考订清楚,其中数碑且有了新的名称。兹依立碑先后,将十二碑开列如下:

- 一、《塔即吉题名残碑》,立于泰定元年至天历二年间(1324—1329)。
- 二、《三皇庙题名残碑》,立于至顺二年(1331)十月二十二日前。
- 三、《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碑阴题名,立于至顺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 四、《三皇庙记残碑》,立于至顺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后。
- 五、《三灵侯庙碑》,碑阴《立石题名》,立于重纪至元五年(1339)仲夏吉日。
- 六、《至正四年和林残碑》,立于至正四年(1344)二月二十八日。
- 七、《敕建兴元阁记》,至正六年(1346)十一月七日敕撰。
- 八、《至正六年题名记残碑》,立于至正六年(1346)。
- 九、《岭北省右丞郎中总管收粮记》,至正八年(1348)八月朔记。
- 十、《韩德刻残碑》,约立于1340年代。
- 十一、《咬哥题名残碑》,约立于至正十年(1350)以后某年某月的二十八日。
- 十二、《汉塚石》,立石年代不详。

三

前揭和林元碑新目录中,有题名者五,其中二碑(三、五)为碑阴题名,其余

三碑(一、二、十)倘如亦刻于碑阴,则碑阳所刻是何文字,竟无踪迹可寻。来日访古于和林,或有大白之机会。

题名五碑中,建立最早的是《塔即吉题名残碑》。该碑题名人数最多,分三列,左行,残存文字请见附录一。最晚的是《咬哥题名残碑》,著录人数较前者少,残存七列,右行,皆省府官员,请见附录五³²。题名五碑中仅此二残碑刻有岭北省府的官员。

观察二碑题名,我们发现岭北省府的组织和官员结构,相较于其他行省,并无甚特殊处。蒙古、色目人据高位、掌权力,汉人居下僚、为辅佐,而实际干办公务、掌管文书的胥吏阶层则以汉人居多。题名中汉人最高官位为参政,名存者有李塔刺海(汉姓而蒙古名)等四人³³。参政之上的左丞马某是个回回,马是译音而非汉姓,已见前文。上一世纪吴廷燮撰《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岭北省部分一无汉人,证明汉人很难爬升到衙门主管的位置。胥吏中的掾史十二人皆是汉人。译史或称蒙古必闾赤六人中,二人为蒙古或色目,一人名佚,三人为汉人,汉人至少居半数。回回令史八人,四人为色目或蒙古,四人为汉人,平分秋色。理问所译史一人,名也先,姓已佚,很可能是汉姓(单姓)蒙古名的汉人。可见即使必须具备非汉语言能力的吏员,蒙古或色目员数还是居于少数。这是元代一般衙门习见之事,非独岭北为然。

岭北省府所属下一级的单位如检校所、照磨所、架阁库等衙门主管则皆为汉人,盖因这些单位或追踪公务是否失期,或审核文书是否确实,或负责保管文书档案,无一不与案牘相关关系,而处理案牘正是汉人所长而蒙色所短也。至若主管诉讼的理问所与掌兵的都镇抚司,则蒙色官多而汉官少,应与岭北讼案当事人可能蒙色人多而汉人少,以及汉人不得与闻兵事的蒙古国策有关。

比对《元史·百官志》关于行省官员的员数品秩的记载,我们发现史文一处可能不尽符合史实。志文说至大二年(1309)以后,各省设官内,“参知政事二员,从二品,甘肃、岭北各减一员”。但是,《塔即吉题名残碑》中,岭北参政有二人,一为帖陈,一即前文已提及的李塔刺海。史文所述,应为定制,然定制并非绝对不容例外。我们或可如是以观。

其次观察和林路总管府官吏的题名。题名五碑中,著录和林路官吏最多的是《三皇庙题名残碑》(见附录二),次为《塔即吉题名残碑》,再次为《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碑阴题名(见附录三),而《三灵侯庙碑·立石题名》(见附录四)仅见两人,《咬哥题名残碑》则无一人。诸碑中只有《塔即吉题名残碑》和《三皇庙

题名残碑》著录路衙的官与吏。一如省衙,路衙(路总管府)的长官和高级官员都是蒙古或色目人,汉人最高官职是从六品的推官,经历以下全是汉人,除了通事一名以及五译史中佚名的一人外³⁴。

路属四学——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的教授、学正、学录,无一不是汉人。我在十多年前草成的《元代蒙古语文的教与学》一稿中³⁵,指出镇江路历任蒙古字学的教授全是汉人,其他各地的蒙古字学官也比比皆是汉人,今又见即连蒙古根本之地的蒙古教授(职在传授国字,即八思巴字)一样是汉人,而时代推移,已届元代中晚期,可见马背上起家的弓手民族弃武从文,埋首案头是多么的不易。业师萧启庆院士近年来几篇大作澄清传统误解,证明元代蒙古士人阶层已从无而有,日益兴旺。然而,在茫茫人海中,蒙古文人毕竟是少数,犹鹤立于鸡群。

《三皇庙题名残碑》中的太医和碑阳所见的省医和惠民良医也都是汉人。或许因为三皇庙所祀为医神(伏羲、神农、黄帝),故而属于省府的省医三人,隶属不明的太医一人³⁶,以及平民身份的,全是汉人的医人五人,具见碑中。

其他路属单位如平准行用库、丰盈库、税务、司狱司、祇应司的官吏人等也是汉人多而蒙古色目人少,而且多以汉人为主管。汉地和江南常见的织染局和杂造局,和林地区未尝设置,故不见于题名。

岭北地寒,耕稼不易,粮食生产往往不敷所需,有赖汉地接济,主要仓储和林仓地位重要,甚受关注。成宗大德八年(1304)定仓官等级,“诸粮十万石以上者从七品,五万石以上者正八品,不及五万者从八品”³⁷。而和林等仓,早在三年前就已提升为从五品的提举司³⁸。《塔即吉题名残碑》和《三皇庙题名残碑》具有和林仓官题名,并以非汉人为长官(扎马鲁丁、咬难),或因和林仓的重要性甚于前述诸库司之故。

和林兵马司也是一重要衙门。除开元季革命时期因事而设的兵马司之外,承平时常设的兵马司有四:国都大都城南和城北各设一司,夏都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设一司,另一司即设于旧都和林。兵马司的责任在搜捕盗贼,维护治安。长官为达鲁花赤,正四品;下有兵马、副兵马。各司设有为数不等的巡兵和弓手,负责侦查和捕捉。《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碑阴题名所见四名机察——汉人一、蒙色三,可能就是巡兵和弓手的队长。一如和林仓,和林兵马司的长官达鲁花赤也无一不是汉人。粮食和治安毕竟不能放手给汉人。

四

蒙古高原和中国内地在元代第一次同时受治于一个政权。建立这个政权的蒙古人在龙兴之后不到半个世纪,就把祖宗根本之地化为中国式皇朝的一个边远省份。这个边远省份岭北行省虽然幅员万里,统治权力所及范围其实不大。散居在广大草原上的游牧民大部分依然是蒙古诸王贵戚的隶属民,接受封建领主的世袭统治。代表大汗统治漠北的岭北行省和雄据一方的诸多王侯的府邸,两者之间的关系饶富意义,值得深究。职是之故,岭北行省的建置始末、职权范围、人事布局、员额配置、政务运作,凡此等等,必须一一考察清楚。部分学者已有卓著成果,贡献良多。我认为建立清单,罗列岭北官吏,作为研究的基础,仍有其必要。奈何蒙元时代岭北史料,稀疏零落,后期为甚,寻觅相关人物,耗时费力,难竟其功。汇聚十来篇碑文的《和林金石录》著录人物数以百计,但绝大部分仅见于此,别无踪迹可寻。我只能因陋就简,把见诸题名的岭北省府与和林路衙两机关的官吏,依序排比,就其人事编制与组成结构做个粗浅的观察,并且和其他行省和诸路相比较。我认为就这方面而言,岭北省与和林路并无特殊处。两府的高层官员还是以蒙古色目出任为原则,中下级官僚亦以汉人占绝对多数,胥吏阶层也几乎全部是汉人。我没有什么新发现可言。唯一稍可欣慰的是,对于《和林金石录》这本流传了百多年的小书,我做了一些必要的订正。Radloff 1892 年原书已将部分断石图版拼置错误,清季著名学者李文田、罗振玉等人并无发觉。我根据石片裂痕以及题名文字是左行或右行、衙门层级高低、官员职位尊卑、立石年月先后等情况,一一更正。李、罗两氏对于部分人物的错误等同,对于部分碑石的不当命名,我也有所议论。至于蒙元皇朝岭北边臣疆吏的全面深入研究,只能期望元史同好了。

〔注 释〕

- 1 和林为元人习用的译名,全译常作哈刺和林(Qara Qorum = Kharakhorum),今乌兰巴托(Ulaanbaatar)西南三百多公里额尔德尼昭(Erdeni Juu)。
- 2 参看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中、下),〈前言〉,《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页113—116。
- 3 为避免混乱,以和林为省名时,我亦以岭北省称呼之;以和宁为路名时,我亦以和林路

称呼之。

- 4 江本但录碑文,无李氏跋语。书后有李氏的诗作,包括《题俄人和林图印本》,《和林金石诗》(附江标和诗),《万安宫遗址诗》,附《癸巳杂诗》,扉页总题曰《和林金石诗》。书末附黄楸裁《和林考》。据扉页,丁酉(1897)二月刻。
- 5 三多,锤木伊氏,汉姓张,字六桥,号鹿桥,蒙古正白旗人。
- 6 参罗振玉校定本《和林金石录》,卷首罗序及页7b—8a李文田跋。
- 7 1929年罗振玉《辽居杂著》第二辑收入此一重校写定本。
- 8 罗氏校定本刊行前,1920年,江阴缪氏已将李文田和林诸碑跋及《和林金石诗》汇合,题曰《和林金石考》,与李氏《西游录注》及《朔方备乘札记》,合为一书刊行。该书所收和林诗,已将李氏受业生江标和诗删去,新增《题沙侯拓本》一首。又,取李氏《和林金石考》复核罗氏《和林金石录》,知后者碑文之后凡低一字书者为李氏之跋,跋后低二字书者为罗氏案语,详记增补正误字数多寡。
- 9 汪章二本存佚难知,可以不论。江本卷首无目录,经查所录碑数亦为十六,名称俱与罗本同,唯有一石异,即江本题《九姓回鹘可汗碑》,而罗本则题《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李文田《和林金石考》所见碑名十九,与罗本部分不同,请详下文。笔者疑为不当的部分碑名,何人所起,已不可知,汪章江李诸氏,具有可能,今罗氏沿而用之,不知厘正,故此处及后文有时仅称罗氏以代之。又,各碑先后次序,江罗两本不同,不赘。
- 10 题目或为《三皇庙记》。北京师范大学李修生等所编六十册《全元文》(二十五册前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印行,二十六册后由南京凤凰出版社印行,1998—2004)未收。
- 11 C题名有李贵,为太医,A题名亦有李贵,为省医;C题名有李进,为阴阳人,A题名亦有李进,为阴阳学正;两人似系“学而优则仕”,一由民间医人而为官方医生,一由民间阴阳法师而为阴阳学官,若然,则此二人仕履亦可为C刻在先、A刻在后的证明。
- 12 上述ABCD四片,李文田以为分属四碑,他称之为《三皇庙碑》、《和林仓碑》、《兵马司亦思马因等题名》、《三皇庙残碑》,且谓B立石时间为顺帝(1333—1368)时,C为文宗至顺二年(1331)以前,D为顺帝至元(1335—1340)中;依序见《和林金石考》页5b(A)、3b及11a(B)、3a(C)、5b(D)。
- 13 参看松井太,《カラコルム關係碑文官職・人名總合索引》的说明中的表格,森安孝夫、Ayudai Ochir 編集,《モンゴル國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中央ユーラシア學研究會,1999,页234。
- 14 《元史》,卷二九,页643。
- 15 《元史》,卷三一,页697。
- 16 “塔即吉”这个人名疑有问题。惠蒙赵琦告知,已故杨志玖教授(1919—2002)怀疑《元史》这段记载中的人名“塔即吉”当作“塔即古”,见所著《元代回族史稿》(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第238页。为追求答案,我复核《元史》,不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发现了若干新的问题,今略述于后,以俟高明。查《元史》“塔即吉”仅此一见,而“塔即古”则有三见。一见卷十八《成宗纪一》元贞元年闰四月壬戌条,云:“塔即古阿散以不法伏诛。”(页393)余二具见卷一六三《张雄飞传》:“塔即古阿散请检核前省钱谷,复用阿合马之党,竟矫诏追夺之。塔即古阿散等俄以罪诛,帝虑校核失当,命近臣伯颜阅之。”(页3822)上引纪文和传文的标点,悉依中华书局点校本,可知点校者认为人名“塔即古阿散”是一人,非两人。又,元人译语常有“-da-”“-ta-”不分,“答”“塔”通用的现象。《元史》三见“塔即古”,已见前引,而“答即古”则有八见。八见之中,有五次与“阿散”连文,点校者具读作“答即古阿散”,意谓此乃一人之名也。此五“答即古阿散”,见卷十三《世祖纪十》,至元二十二年十月癸丑条:“赐脱里察安、答即古阿散等印”;(页280)癸亥条:“以答即古阿散理算积年钱谷”;(页280)丁卯条:“今答即古阿散等又复钩考”;(页281)十二月辛丑条:“诛答即古阿散党人蔡仲英”;(页282)卷一七〇《尚文传》:“答即古阿散等知之”。(页3986)其余三次则单作“答即古”三字,同样见于《尚文传》:“答即古闻于帝”;“且答即古乃阿合马余党”;“既而答即古受人金”。(页3986)以上三见“塔即古阿散”、五见“答即古阿散”、三见“答即古”,除了《成宗纪》的“塔即古阿散”系成宗元贞元年外,其余诸条均系世祖至元年间(《张雄飞传》的“塔即古阿散”系至元某年,其余均系至元二十二年),推测至元年间的“塔即古阿散”和“答即古阿散”指涉的对象相同无异。不论这一推测是否正确,点校本《元史》将“塔即古阿散”视为一人,也将“答即古阿散”视为一人,则是毋庸置疑的。我认为点校本《元史》可能错了。质言之,私意以为“塔即古”或“答即古”是一人,“阿散”是另一人。孰是孰非,尚祈教正。回到“塔即吉”或“塔即古”的问题。杨志玖教授系出回族,钻研回族历史数十年,疑“吉”当作“古”,应有所本。《元史》中“塔即吉”仅只一见,而“塔即古”或“答即古”却多处出现,自然要让人怀疑“吉”字可能错了。但是,目前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证明《元史》错了。不宁如是,《和林金石录》此一残碑反而可以证明《元史》是对的。残碑已漫漶,但首字为“塔”,肯定无疑。末字为“吉”,还清晰可辨,不像是个“古”字。中间一字,似“即”非“即”,似“郎”非“郎”,已因磨损而难辨。如为“郎”字,但和碑中员外郎、承直郎、将仕郎等官阶中的“郎”字,写法似乎有点差别。职是之故,我识读为“塔即吉”。假如这一释读无误,则与《元史》该条记载一致无差,可以互证。换言之,“塔即吉”可以是人名,“塔即古”或“答即古”也可以是人名,是不同的人名。假如我的释读错了,而李文田、罗振玉的释读——“塔郎吉”——是对的,那么,《元史》该条记载作“塔即吉”也有可能错在“即”字而非“吉”字。总而言之,“塔即吉”、“塔郎吉”、“塔即古”或“答即古”都有可能是人名。《元史》该条记载可疑,或者我的释读错了,恳请专家指正。

- 17 李文田题为《岭北省和宁路题名碑二通》，见《和林金石考》，页4a—4b、12a。
- 18 《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页3205。
- 19 《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页942。
- 20 G片所见左丞木八剌沙，李文田以为即《元史》，卷一八二，《许有壬传》所见的木八剌沙（页4202），见《和林金石考》，页6a。但李氏并未提出任何积极证据。
- 21 见罗本，《和林金石录》，页32b。
- 22 《元史》，卷一四〇，页3366—3367。
- 23 《元史》，卷四一，页872—873。
- 24 《和林金石录》页27b—28a，《和林金石考》页4b、11b。
- 25 对于一个正二品的左丞，降为不入流的学正，李文田感到大惑不解。他在《和林金石诗》中吟道：“碑刊至顺尚巃岈，左丞十载迁儒学，此事教人耐讨论。”注云：“撰人张思明《元史》有传，《宰相表》前十年已为中书左丞，至是乃学正。”（《和林金石考》页10a）《元史》中有蛮子，前文《咬哥题名残碑》中亦有蛮子，《元史》中有张思明，《刘天锡去思碑》中也有张思明，冒然比附，固不能无疑也。
- 26 《元史》，卷八四，《选举志四·考课·凡官员考数》条，页2093。
- 27 刊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5-1&2, pp. 1-123.
- 28 载于村冈伦编，《中世北东アジア考古遗迹データベースの作成を基盤とする考古学・历史学の融合》（龙谷大学文学部，2006），页74—81。惠蒙松田孝一教授寄赠此书，谨此敬申谢悃。
- 29 载《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12辑（1997），页83—98。宫海峰译文《哈刺和林出土的1348年汉蒙合璧碑文——〈岭北省右丞郎中总管收粮〉》，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十八辑（2006），页159—168。
- 30 载《モンゴ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页245—253。
- 31 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十八辑（2006），页5—23。
- 32 题名五碑人名见附录一至五，其余诸碑所见蒙元时代人名汇为附录六，用备参考。
- 33 其余三人是李伯述、丁元、白守忠，见附录五。别有一汉人参政左恭，见《三皇庙记残碑》。
- 34 推官，谓女真族的完颜荣祖；通事，指法忽虎口，见附录一。
- 35 1990年，徇蒙藏委员会之要求，我将所草《元代蒙古语文的教与学》一稿，交由该会印行，列为《蒙藏学术研究论丛》之一。该稿篇幅已然不短，近三万言，但可增补者仍多。因此之故，我特别要求在扉页上加注“征求意见稿”五字，冀望博雅君子赐正指教，以期来日正式发表之时，错谬之处或可稍减。弹指间，十五年过去了，原稿依旧在，不觉汗颜之至。堪可欣慰者，十年之间，偶见他人引用，而未发现重大错误，殆亦幸事。关于元代的语文政策、通译人才的培养和任用，请参考萧师启庆大作《元

代的通事和译史: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原载《庆祝札奇斯钦教授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编印,1991),页199—267;收入萧著,《元朝史新论》,台北,允晨文化,1999,页323—384。

- 36 太医有二义,一是隶属太医院,为宫廷及贵族、官僚服务的医生,二是对民间医生的尊称,参看陈高华、史卫民著,《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页251。《三皇庙题名残碑》有太医李贵,见第一列,排在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教官之后,兵马司官吏之前,而第二列又有医人周中信等五人题名,推测太医李贵并非一般的医生,而是官方设置、为民服务的惠民药局里的医生。
- 37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八年五月癸酉条,页459。
- 38 《大元仓库记》:大德五年“五月,省议和林宣慰司所辖仓库,除广济库官别行诠注,称海、札浑、也迭别县不系常川收粮仓分,如和林、昔宝赤八刺哈孙、孔古烈仓,收支粮斛浩大,又系紧急支持去处,拟将上项诸仓改立从五品提举司,各设官三员: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六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周岁为满,于列选人内选充……”(仓圣明智大学刊本,页15a。)

附录一《塔即吉题名残碑》(1324—1329 间)

资德大夫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塔即吉

资善大夫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马某

中奉大夫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帖陈

中奉大夫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李塔刺海

奉议大夫岭北省左右司员外郎:暗都刺

奉议大夫岭北省左右司都事:亦速福

奉议大夫岭北省检校官:萧守信 书吏:王克弘

承直郎岭北省照磨:韩守益 高斌

承直郎岭北省管勾:张察罕不花

掾史:景元利 丁璧 连克明 褚世衡 马禎 朱邦宁

艾恭默 赵从玉 王从善 张宽 梁延义 张汝健

译史:赵仲明 尚柱班 脱欢 安梯不花□□□ 吴希孟

宣使:马□ 辛德 姚闰 贺伯川 (中阙) 杨文益

回回:李也先 哈散 也先 刺刺 王伯令 忽都伯 耿嘉 李征

典吏:武行本 王伯亨 赵守中 张国英 房志 书写:杨也先 张玉

朝列大夫岭北省理问:扎忽儿歹

亚中大夫岭北省理问:爱薛

武略将军岭北省付理问:秃儿迷失

中顺大夫岭北省付理问:刘谦

承直郎理问所知事:李说 译史:□也先

提控案牒:邢文通 令史:孙友□ 李明□□敬

省□□□□行素 武顺谦 李(下阙)

(以上第一列)

朝列大夫和宁路达鲁花赤:兀都蛮

大中大夫和宁路总管:赛甫丁

进义校尉和宁路同知:也失哥

承务郎和宁路判官:忽都帖木儿

奉训大夫和宁路推官:完颜荣祖

奉训大夫和宁路经历:王□罗帖木儿

承务郎和宁路知事:许□泽

将仕郎和宁路提控案牒:王克义 刘弘远 张革 侯从道 张瑄 许恭祖

司吏:李霆 周郁 张从礼 张居仁

译史:吴友直 □□ 关也先 孙士元 魏思贤

通事:法忽虎□

敦武□□□司狱:燕伯颜不花

敕授儒学教授:颜□ 学正:刘粉 学□:教子长

敕授蒙古字教授:郝完泽 学正:吴不花

宣武将军省都镇抚:忽刺真

武德将军省都镇抚:捏古列思

忠显校尉付都镇抚:亦□□

承事郎付都镇抚:脱(下阙)

案牒(下阙)

(以上第二列)

承直郎和林兵马达鲁花赤:脱速

承直郎和林付兵马:伯颜

吏目:郭崇节

司吏:荣继明 刘德 贺美 牛恭祖

译史：毛朵里别歹

承务郎和林仓提举：扎马鲁丁

奉训大夫和林仓同提举：马泽

昭信校尉和林仓付提举：成塔海

承务郎和林仓付提举：蔡汝霖

司仓：卫□荣 温荣

仓司吏：李忠 王辅 张者

忠翊校尉岭北〔丰盈〕库提（下阙）

忠显校尉岭北（下阙）

进义付尉岭北（下阙）

库子：皇甫（下阙）

忠翊校尉平准库提领：□□思不花

承德郎平准库大使：尚（下阙）

忠翊校尉平准库付使：（下阙）

库子：韩钦甫（下阙）

承事郎和宁务（下阙）

（以上第三列）

附录二《三皇庙题名残碑》（1331）

和宁路

达鲁花赤：别速坚 嘉议

达鲁花赤：欢赤 昭武

同知：都怜 奉训

治中：纽邻 中顺

判官：蛮子 奉训

经历：侯瑞 承直

知事：睦民泽 从仕

提控案牘：李守正 从仕

司狱：刘文质 从仕

司吏：侯松 陶元璟 石怀宝 张思贤 冯泽 张保直 宋□□ 侯从道

张恒道（上阙）石光（下阙）

儒学教授：杨寿春

蒙古字学教授：裴佑

医学教授：刘明 学正：贾福

阴阳学正：张允恭 太医：李贵

兵马司

达鲁花赤：亦思马因 中顺

兵马：刘天锡 奉议

副兵马：马奴 进义

吏目：胡宗瀚 儒学正：张思明

司吏：坚童 许继先 王仪 李守德 张震 冯邦彦 张从义

祇应司提领：席大川 大使：郭思亨

和林仓

都提举：咬难 奉议

同提举：尚柱班 奉训

付提举：彭别帖木儿 承直

付提举：不花 承直

司仓：张天佑 范德谔

司吏：张翥 马飞卿

提控斗子：贾成 侯文秀 冯君祥

平准库

提领：王古大 奉训

大使：杜师鲁

（上阙）子成（下阙）

（上阙）嘉纳 承务 付使：时弼 从仕

税使 提领：章元泽 奉直 大使：完者秃 忠翊 付使：赵也先不花 将仕

丰盈库付使：吕复

医人：周中信 张翼 刘润甫 常士突 王仲贤

阴阳人：朱诚翁 王明见 刘进 王节 高（下阙）

耆老：周元 娄温 曹政 常兴 杨德 裴全 周亨 魏义

宋怀德 郑云卿 侯思温 魏信 李觉福 王实

【附】《三皇庙记残碑》所见人名

* 非蒙元时代人不录。人名后有星号 * 者见正文中,无星号者见正文之首或末。

□□□制造兼国史院编修官国子监丞张益撰

□□□省参知政事刘塔失怙木儿篆

□□□省左右司都事李塔失怙木儿书

参政左恭 *

□□□彻彻都 *

□□□郎捏古栢立石 路吏李仲宗督工 和宁路医学教授贾福董役
儒学录苏仁 兵马司吏目陶元璟模鐫 医学正李叔亮 宋郁 高侃
惠民良医杨仲文 省医胡景勛 武舜谦 李贵 阴阳学正刘进 张光

附录三《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碑阴题名(1331)

司官

朝列大夫兵马:张积

进义校尉付兵马:马奴

前吏目:梅只子温 □□□

司吏:朱良弼 乔秉中 王思温 王敬 张允 坚□ 席大川

译史:□□□

(以上上列)

首领:崔仲和 张 顺 任 全 张 福 王德成

机察:□都刺 吉仲实 奴刺丁 阿老丁

祗候:彭仲福 侯德霖 吴国瑞 赵 祯

石匠:王 润 冯 四 刘 四 冯 二 魏 二

(以上下列)

【附碑阳所见人名】

和林兵马司儒学正张思明撰

和宁路儒学正彭诣书丹并篆盖

至顺二年岁在辛未十月甲子

父老:张 山 周元 姜温 陈贵 张天禄 常仲兴 李温 赵融 周亨

马君胜 王俊 曹政 裴全 宋怀德 杨 德 白良 杨德 赵诚

杨 润 立石
 首领:赵仲实 李伯颜普华

附录四《三灵侯庙碑·立石题名》(1339)

耆老

北京王成甫 高八哈失 (举)〔学〕录:钱国宝 社司:刘善甫 库子:兰庆甫
 崔亮 曹仲和 刘大川 程国英 魏良卿 肖塔赤怙木儿 (以上第一列)
 张显之 曹伯通 沈子玉 陈仲良 兰和甫 秦才甫 孙弘道 常仁卿
 李文义 梁德成 (以上第二列)
 孟君祥 王义 郭彦祥 陈仲仁 杨和卿 常庆祥 梁德诚
 铁匠:姚信甫 (以上第三列)

【附碑阳所见人名】

亚中大夫和宁路达鲁花赤暗都【王束】助缘

和宁路儒学学正金陵余良辅撰

奉政大夫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丁元书

中宪大夫岭北行省左右司都事李塔失铁穆耳篆

〔高〕八哈失*

滕阳陶士宜刊 石匠周元

至元己卯(1339)仲夏吉日古并杨达、侯克诚立石 兰庆甫、钱国宝督工

附录五《咬哥题名残碑》(约 1350 以后)

□赖/□出/□马/□/□理/□题/□久/□孰/□至/□北/□记

□月二十八日建

(以上第一列)

政事:咬哥

荣禄大夫岭北行省平章政事:仓赤

银青禄大夫岭北行省平章政事:蛮子

光禄大夫岭北省平章政事:蛮子

(以上第二列)

北行省左丞:木八剌沙

荣禄大夫岭北行省左丞:塔海铁穆尔

资善大夫左丞:阿忽剌

(以上第三列)

北行省参知政事:李伯述

中奉大夫:丁元

中奉大夫□□

中奉大夫□□

中奉大夫参知政事:白守忠

(以上第四列)

□左右

□赵温

□李绂

□郎中

□郎中

□员外郎

□儿

(以上第五列)

北省左右司都事:郭择善

承务郎雷维翰

承务郎陈□□

文林郎买住

奉□大夫郝世□

承德郎成刚

承直郎亦□□

奉议大夫都事:和锡檀迪奴思,字仲明

征事郎都事:伯要兀台,字彦晖

(以上第六列)

行省管勾:鲁浑沙

从仕郎岭北行省管勾:周彬

从仕郎岭行省管勾:八剌沙

承事郎岭省管勾:刘都怙木儿

(以上第七列)

附录六其他各碑所见人名

大元至正四年岁次甲申春二月二十有八日己未之吉,和林耆老贾成、赵国宝等立石。(《至正四年和林残碑》)

和林耆老 塔术丁 姚秀实 陈□□ 李文□ 秃□(《至正四年和林残碑碑阴》)

大司农别□□□* 伯述□□□*(《至正六年题名记残碑》)

河东古陶进士霍有孚撰 滕阳陶士宜刊 刘沙的监工

河东大卤段起祖书 石工韩德

和宁路司李褊璫篆 都社长张仲泽 贾仲□ 高彦温助〔缘〕

监省上相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刺沙*

中奉大夫参知政事蛮子亚相、承直郎左右司员外〔郎〕伯加奴*

奉政大夫左右司都事郭氏从道*

资政大夫右丞怙木哥*

□□□□长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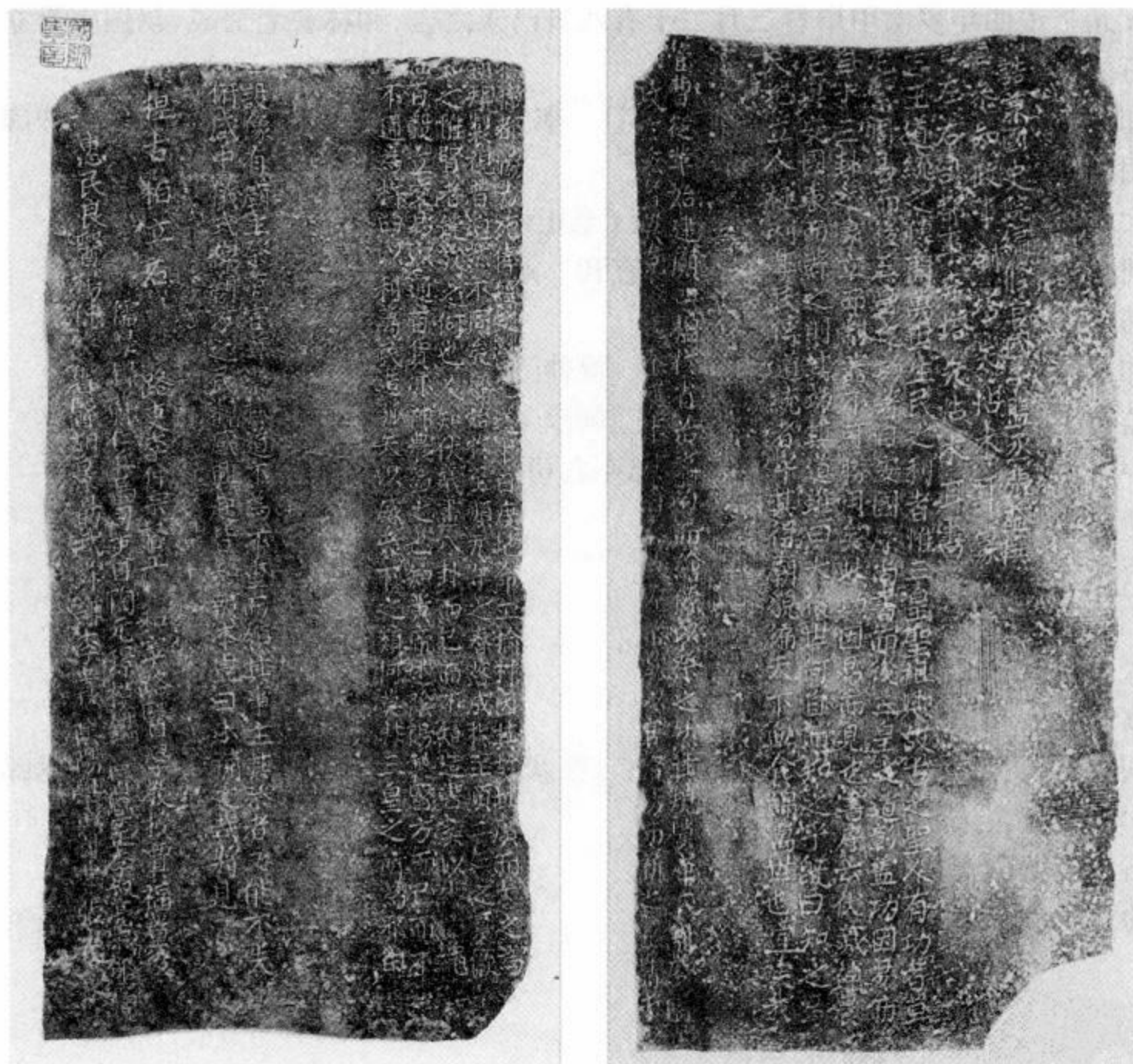
掾史赵氏景文*

嘉议大夫和宁路总管木薛飞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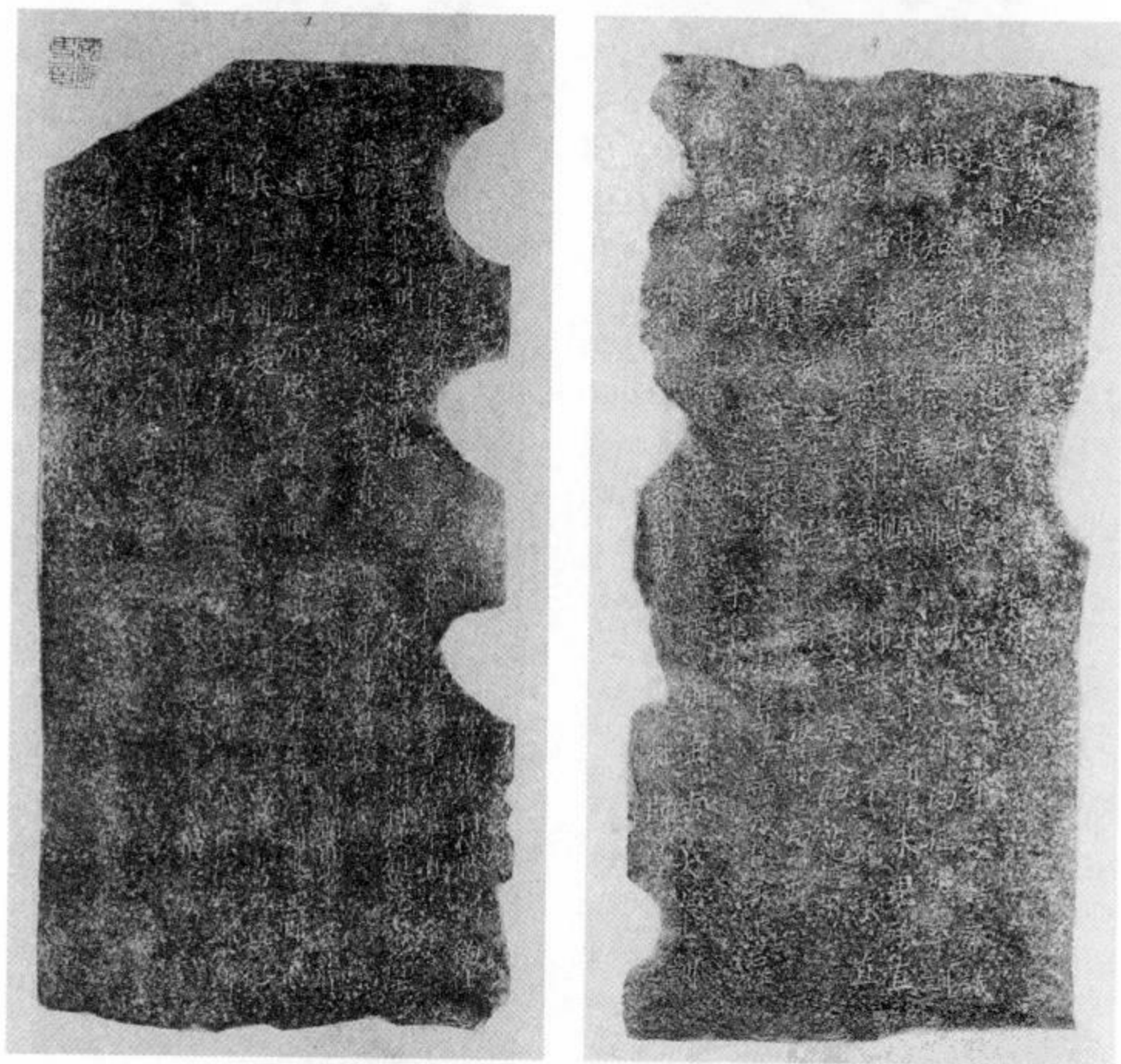
同立石人:吕仲宽 刘良甫 刘孝先 曹彦亨 □□□(以上见《岭北省右丞郎中总管收粮记》)

石工韩德(《韩德刻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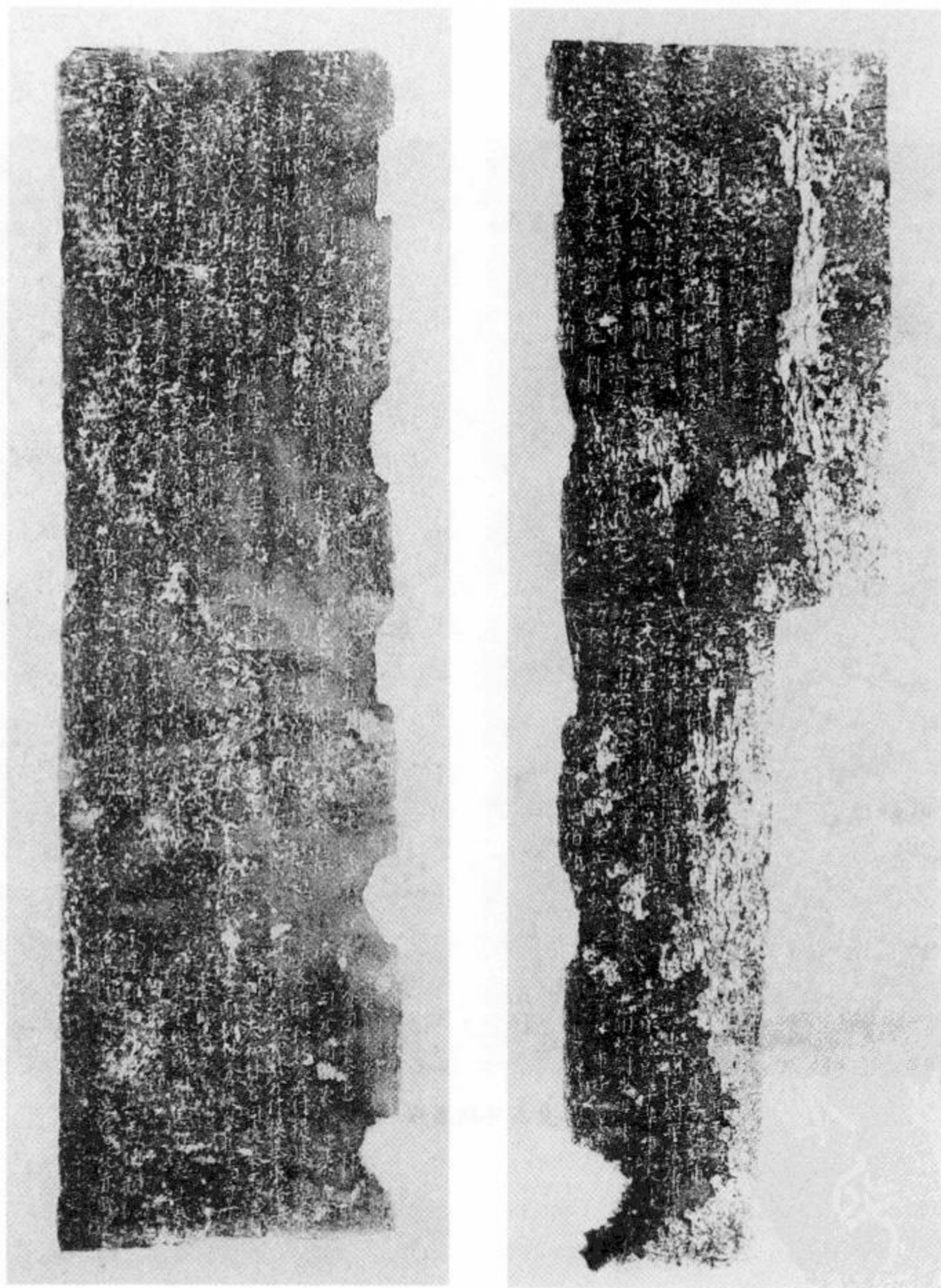
徐君*(《汉冢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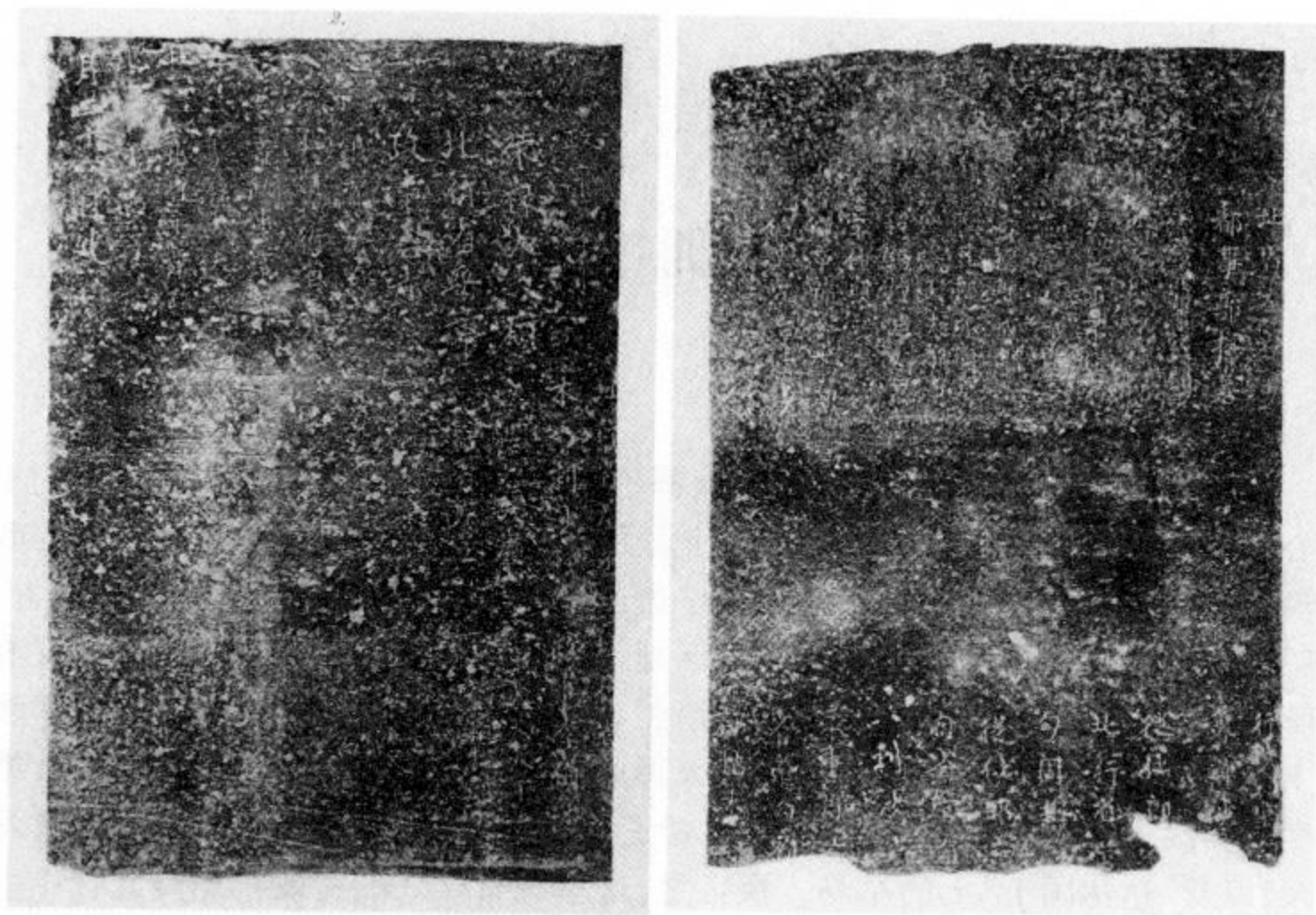
拓影一(a):三皇庙记碑,参看附录二。



拓影一(b):三皇庙碑题名残碑,参看附录二。



拓影二：塔即吉题名残碑。参看附录一。



拓影三：咬哥题名残碑。参看附录五。

试论元朝对岭北行省的统治政策

赵琦 著

蒙古前四汗时期(1206—1259)建都于哈刺和林,漠北草原是大蒙古国的重心。到世祖忽必烈汗(1260—1294)建立元朝,定都中原之后,岭北在全国的政治地位逐渐下降,由“兴王故地”沦为“边远之地”。元朝在这里设置和林行省,后改称岭北行省,使它与全国的行政区划一致。但是,岭北行省与其它行省又有所不同。首先,岭北行省遍布着蒙古诸王、贵戚等封建领主的封地。这些封建领主各有隶属民,保持着自成吉思汗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在千户长统率下游牧维生。其次,岭北行省尚有大汗封授的晋王坐镇漠北,统领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以及“达达国土”上的军马。换言之,这里既有汉式的行政机构岭北行中书省,又有不受行省节制的蒙古宗王出镇制度,更有蒙古旧有的斡耳朵制、千户制等。岭北行省的统治体制可说错综复杂,十分混乱。宗王出镇、斡耳朵制和千户制等的具体情况,已有学者初步探讨,尚乏深入研究。本文拟就岭北行省的官署设置、官员任用和行省职责等三个问题,观察蒙元的北部边区统治政策。

一 岭北行省的官署设置

元代的岭北地区,或称和林地区,广袤万里,地位重要。元人揭傒斯说:“和林跨大漠,肇造此根柢。东际浩海头,西控流沙裔;北穷阴山外,南倚两都势。连营列万里,仓庾千万计。”¹可以说,岭北地区涵盖了元朝的整个北边国土。中统五年(1264),世祖忽必烈在与其弟阿里不哥(?—1266)的争位战争中获胜,取得了对岭北地区的控制权。但是以窝阔台(1229—1241)后裔海都(?—1301)为首的宗王叛乱接连不断,岭北地区战火频仍。为适应战争需要,元政府相继在岭北设置了一系列行政机构,包括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和林都转运使司、和林宣慰司、和林等处都元帅府等。成宗铁穆尔(1294—1307)即位后,为加强对漠

北地区的控制,于大德二年(1298)重置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八年(1304),元朝在打败西北宗王之后,与之约和,边境安宁。十一年(1307)五月,武宗海山(1307—1311)即位于上都。七月,罢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设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与和林路总管府。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311—1320)皇庆元年(1312)二月,改省名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省治和林路改名和宁路²。

《元史》说:“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治和宁路,统有北边等处。”又说,“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³元人张思明也说,和林“官治与京畿同”⁴。一般而论,把岭北行省比同内地行省,大致不错。除行省机构之外,天历二年(1329)岭北设行枢密院,“掌边庭军务,凡大小事宜,悉从裁决”⁵。岭北行省有参加全国科举会试的定额员数⁶。行省所属的唯一路级机构和宁路总管府设有儒学教授,但是岭北行省并无其他行省例皆设置的儒学提举司。除和宁路外,岭北行省下属建置还包括称海宣慰司,辖区在行省西部。称海宣慰司与行省互有官吏迁调关系⁷。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亦在行省辖境内。元代北安王、晋王等以宗王出镇北边,自有其军队、驻地,并非岭北行省权限内事。行省境内诸王、贵戚的千户也与行省无统属关系,故行省的直辖地区颇为有限。洪金富先生通过对元代和林碑刻的研究,指出:“岭北省府的组织和官员结构,相较于其它行省,并无甚特殊处。”⁸岭北行省未设处理境内诸王事务的机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行省与诸王之间并无统属关系的事实。

岭北行省与监察体制的关系少有学者触及,这里略作补充。按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系统完整、机构完备和人员庞大的监察体制⁹。中央设有御史台(简称内台、中台、大都台),总管全国监察事务;地方上设江南和陕西两个行御史台,分别监察帝国南方和西方行省。全国各地设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按自然地理情况分属上述三台。具体的监察工作由三台下属的察院(其主要官员是监察御史)和二十二道廉访司负责。内台直辖北方的内八道肃政廉访司,其监察区域包括河南行省、中书省(腹里)和辽阳行省,但不包括地处最北的岭北行省。然而,岭北行省并无监察豁免权。大德四年(1300),成宗“命省、台差官同昔宝赤鞠和林运粮稽迟未至者”¹⁰。延祐三年(1316),仁宗明确下令“监察御史监治岭北,钩校钱粮,半岁更代”¹¹。七年,在至治改元诏书中提到:“和林、甘肃……镇守新附、汉军,除常例外,每名给布一匹,病者官给医药,死者给烧埋中统钞二十五两……违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严加纠察。”¹²

内台与行御史台、廉访司的分工大致是“在内御史台弹劾中书省、枢密院等

内外百司奸邪非违,在外行御史台、廉访司弹劾行中书省、宣慰司以下诸司官吏奸邪非违”¹³。岭北行省境内并未设置廉访司,其省级官员由中央的御史台直接监察。天历二年(1329),监察御史对岭北省官提出弹劾,认为他们“不谙政务,并宜黜退”,得到明宗和世(1329)的肯定与嘉奖¹⁴。文宗图帖睦尔(1328—1332)至顺元年(1330年),监察御史朵罗台、王文若以岭北行省平章政事哈八儿秃声誉欠佳,“钱谷甲兵之事懵无所知”为由,建议黜罢,得到皇帝批准¹⁵。从地域分属方面看,岭北应在内台的管辖范围内,上述两例中的监察御史应该是内台察院的御史。至大四年(1311)闰七月的一件公文,表明岭北行省省级以下官员的监察也是由内台负责的。公文内容如下:

江西廉访司承奉行台札付,准御史台咨,据监察御史呈:察知赴任官和林行省陈郎中等一行,经过站赤内,打拷头目人等,不应多取分例羊口,拽车铺马,兀刺赤差使报焉。取讫陈郎中名政,员外郎忽辛等各各招词。施行间,钦遇释免。

呈奉中书省札付,刑部呈:……本部议得:和林省郎中陈政、员外郎忽辛、管勾孙英、提举张吉等所招,因赴和林之任,不合打拷站官人等,多要分例羊口,又用铺马乘驾车辆等罪。钦遇原免,比例拟合解见任,别行求仕,标附相应。具呈照详。都省:仰依上施行。¹⁶

这件由监察御史提出的弹劾案是针对和林行省郎中陈政(从五品)、员外郎忽辛(从六品)、管勾孙英(正八品)、提举张吉等人的。这里的监察御史同样应指内台官员。

监察官员行使职权的途径之一是每年按时出巡辖区。监察御史和廉访司官员都负有这样的任务。岭北行省亦在监察官员分巡之下,虞集有“御史按事北边”¹⁷之说。黄潜(1277—1357)记载御史买奴分巡岭北的事迹云:“皇庆初,擢监察御史,分巡岭北。平反和林冤狱而置真杀人者于法,出其诬服者五人。念民之受役莫重于站赤,奏请官备和林站首思,岁增给木连、帖干两站米百石;有贫乏而鬻其妻子以应役者赎而归之;沙岭至上京十一纳钵所须柴薪,宜勿科于民,以纾其力;斡耳朵户求运载和林官物者宜禁止,而以雇募之值十万余定赋于站户,使蒙其利。上皆可其奏。赎还其妻子者,仍户给羊百,牛马各十。民瘼既苏,乃撤酒肆以变淫风,兴儒学以崇德教。”¹⁸可见,监察事务遍涉刑狱、驿站、经济、商业、

教育诸事。

岭北行省不设廉访司,监察事务由内台直接负责,大概是因为岭北行省作为蒙古人的主要聚居区,其政治、军事地位重要,监察事务交由内台直接负责,蒙古统治者易于掌控之故。而且如上所述,行省直辖的管区仅和宁一路和称海宣慰司等处,机构和事务无多,由内台兼管监察事务,从实际操作上也可以行得通。

二 岭北行省长官的选任

岭北行省“外则诸王星布棋列,于以藩屏朔方,控制西域”¹⁹。由于这一特殊地位,使出任行省长官的人选尤重于他省。下面根据收集到的史料,将岭北地区的长官任职情况分列三表:《表一:和林转运司、宣慰司都元帅府长官表》;《表二:和林、岭北行省与行枢密院长官表》;《表三:岭北行省下属和宁路、称海宣慰司、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长官表》。

表一 和林转运司、宣慰司都元帅府长官表

姓名	职名	任官时间	前职	出职	族属	资料来源
小云失别	转运使兼提举交钞使	至元 9.5 ²⁰ 上任			色目·回回 ²¹	元史 7.141 ²²
刘哈刺八都鲁	宣慰副使、同知、宣慰使	至元 17— 27	王府长史	河东山西道宣慰使	汉人	元史 169.3974
怯伯	宣慰使	至元 25— 26.6			蒙古?	元史 15.323, 169.3974
乃满带	宣慰同知	至元 26.6			色目?	元史 15.323
八黑铁儿	宣慰副使	至元 26.6			蒙古? 色目?	元史 15.323
暗普	宣慰副使	至元年间			色目·回回	永乐大典 19418.11a
张均	副元帅、宣慰同知、都元帅	大德 1 始任 副元帅	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		汉人	元史 166.3909
忽刺出	宣慰使都元帅	大德 2.5 上任			蒙古?	元史 19.419, 21.451

姓名	职名	任官时间	前职	出职	族属	资料来源
耶律希周	宣慰使都元帅	大德 2.5 上任			契丹(属汉人)耶律楚材孙	元史 19.419; 国朝文类 ²³ 57.22a
纳邻合刺	宣慰使都元帅	大德 2.5 上任			蒙古?	元史 19.419
塔海	宣慰同知	大德 11.5		中书右丞	蒙古?	元史 22.479
憨刺合儿	宣慰使、都元帅	大德 11.6		同知枢密院事	蒙古? 色目?	元史 22.480

表二 和林、岭北行省与行枢密院长官表

姓名	职名	任官时间	前职	出职	族属	资料来源
月赤察儿	和林行省右丞相(以下均为和林行省长官)	大德 11.7— 至大 4	枢密、宣徽使		蒙古·许兀慎氏博尔忽子	元史 22.483, 119.2949
哈刺哈孙	左丞相	大德 11.7— 至大 4	中书右丞相		蒙古·斡刺纳儿氏,曾祖启昔礼	元史 22.483—484, 136.3291
曩家带	右丞	至大 2.12			蒙古	元史 23.519
孛里	右丞	至大 4.6			蒙古?	元史 24.543
马速忽	右丞	至大 4.6			色目·回回	元史 24.543
乃蛮台	岭北行省右丞(以下均为岭北行省长官)	延祐 7— 至治 2	宣徽院使	甘肃行省平章	蒙古·扎刺儿氏木华黎五世孙	元史 139.3351
换住	右丞	延祐 7.2 上任	中书左丞		蒙古?	元史 27.598
阿散	平章	延祐 7.5	中书左丞相		色目·回回	元史 27.602
忻都	省臣	延祐 7.8			色目·回回	元史 27.605
宋绍明	参政	至治 1			汉人	章邱县志 ²⁴ 14.77a

姓名	职名	任官时间	前职	出职	族属	资料来源
帖陈 ²⁵	参政	泰定 1.1 上任	称海屯田 万户府达 鲁花赤		蒙古?	元史 29.643
泼皮	左丞、平章	泰定 1.4 自 左丞离任; 泰定 5.6 上 任平章		中书左丞	色目	元史 29.646, 31.695, 32.717, 182.4205
撒忒迷失	平章	泰定 3.1 上任	知 枢 密 院事		色目·回回	元史 30.667
左恭	参政	泰定末			汉人	和林金石录 24b
塔失帖 木儿	平章	致和 1.5 离职		中书平章	蒙古? 色目?	元史 30.686
那海	平章	天历 2.4 上任			蒙古?	元史 31.698
塔即吉 ²⁶	右丞、平章	天历 2.4 任后职			色目·回回?	元史 31.698; 和 林金石录 18a
马某 ²⁷	左丞	天历 2.4			色目·回回	元史 31.698; 和 林金石录 18a
李塔刺海	参政	天历年间 ²⁸			汉人	和林金石录 18a
燕不邻	左丞	致和 1.9 离职		知枢密 院事	蒙古? 色目?	元史 32.712
哈八儿秃	平章	至顺 1.9 离职	中书平章		蒙古	元史 31.697, 34.766
也先帖 木儿	平章	后至元 6.2 离职	行 宣 政 院使	御史大夫	蒙古·蔑儿 乞氏	元史 39.840, 40.854, 138.3345
乃蛮台	左丞相	后至元 6— 至正 2	上都留守	辽阳行省 左丞相	蒙古·扎刺 儿氏木华黎 五世孙	元史 139.3351
刘塔失帖 木耳	参政	后至元时期			汉人	和林金石录 24b
月鲁帖木 儿	右丞	至正 2		宣政院使	蒙古	至正集 ²⁹ 45.53a

姓名	职名	任官时间	前职	出职	族属	资料来源
张宓	参政	至正 2—3	吏部尚书	山东东西道宣慰使	汉人	山左金石志 ³⁰ 24.35a
李伯述	参政	至正 6			汉人	和林金石录 28a, 32b
别不花 ³¹	平章	至正 6—8	大司农		色目·康里氏	金华黄先生文集 28.9a; 和林金石录 27b
蛮子	参政、平章	至正 8 参政; 至正 18.4 上任 平章	由翰林承旨出任 平章	由平章出任知枢密院事	蒙古?	和林金石录 29a; 元史 45.942, 47.976
帖木哥 ³²	右丞	至正 8			蒙古	和林金石录 29a
阿剌吉	左丞相	至正 13.5 上任	太尉		蒙古?	元史 43.909
老章	丞相知行枢密院事	至正 21	知枢密院事		色目·畏吾氏	元史 206.4597, 134.3263
搠思监	丞相? ³³	至正 24 上任	中书右丞相		蒙古·怯烈氏	元史 46.966, 113.2847, 205.4585
危素	左丞	至正 24— 25	翰林承旨		南人	宋学士文集 ³⁴ 59.5a
山僧	左丞相	至正 25.10	中书平章		蒙古?	元史 46.970, 113.2860
失列门	左丞相	至正 27.5 上任	知枢密院事	左丞相	蒙古?	元史 47.978
桑哥答思	平章	顺帝时期			色目·西夏	元史 145.3447
沙嘉室理	参政	顺帝时期			色目·西夏	元史 145.3447
朴赛因不花	右丞	顺帝时期	大司农	平章	高丽(属广义汉人)	元史 196.4435
张翥 ³⁵	平章	顺帝末期	翰林承旨		汉人	苏平仲文集 ³⁶ 5.2b

姓名	职名	任官时间	前职	出职	族属	资料来源
秦从龙 ³⁷	左丞	顺帝末期		江南行台侍御史	汉人	罪惟录 7.2a
伯颜	和林知枢密院事	至元 26	中书右丞相		蒙古·八邻氏	元史 104.3114
乃蛮台	知岭北行枢密院事(以下为岭北行枢密院官)	至顺 2.2—至正 2	上都留守	辽阳行省左丞相	蒙古·扎刺儿氏木华黎五世孙	元史 35.776, 139.3351
谨只儿	知院	至顺 2.2	太禧宗祿使		蒙古?	元史 35.776
答邻答里	知院	至顺 2.2	太禧宗祿使		色目·钦察	元史 33.727, 35.776
笃烈捏	知院	至顺 2.2	太禧宗祿使		蒙古?	元史 35.776
纽的该	知院	后至元 5—至正 15	同知枢密院事	中书平章	蒙古·阿儿剌氏博尔术四世孙	元史 139.3363
老章	知院	至正 21	知枢密院事		色目·畏吾氏	元史 206.4597, 134.3263

表三 岭北行省下属和宁路、称海宣慰司、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长官表

姓名	职名	任官时间	前职	出职	族属	资料来源
塔海	路总管	武宗时期	通政金院	汴梁路总管	色目·合鲁氏	元史 122.3005
兀都蛮	路达鲁花赤	天历年间			色目·回回	和林金石录 18b
赛甫丁	路总管	天历年间 ³⁸			色目·回回	和林金石录 18a
暗都	路达鲁花赤	后至元 5			色目·回回	和林金石录 22a
木萨飞儿	路总管	至正 8			色目·回回	和林金石录 29a
别速坚	路达鲁花赤				蒙古?	和林金石录 13b
赤	路达鲁花赤				蒙古?	和林金石录 13b

姓名	职名	任官时间	前职	出职	族属	资料来源
桑哥八剌	同知称海宣慰司事				色目·西夏	元史 145.3447
刘好礼	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	至元 7—18	永兴府达鲁花赤	澧州路总管	汉人	元史 167.3924

下面根据表二,制作《表四:岭北行省宰执民族成分统计表》,并略作说明。颇多省臣的相关资料极少,无法明确其出身,只能从名字来判断他们所属民族。不少色目人也会起蒙古名字,无法确定他是蒙古人还是色目人,遇到这种情况,列为蒙古或色目。表二内有一人担任两种以上职务者,按两种以上职务和人数计算。未言明具体职务者,不计入表内。

表四 岭北行省宰执民族成分统计表

职务	总数	蒙古	色目	蒙古或色目	蒙古、色目总和	蒙古、色目占总人数比率	汉人(含南人)	汉人(含南人)占总人数比率
丞相 ³⁹	8	7	1		8	100%	0	0
平章政事	12	4	6	1	11	92%	1	8%
右丞	9	6	2		8	89%	1	11%
左丞	5		2	1	3	60%	2	40%
参知政事	9	2	1		3	33%	6	67%
省臣全体	43	19	12	2	33	77%	10	23%

《元史·百官志序》言:“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⁴⁰从表四可以看出,丞相一职全由蒙古、色目人担任,平章政事、右丞多为蒙古、色目人,而左丞、参知政事职位中汉人渐多。岭北省臣的任命符合元政府的任官规定。但是从担任岭北省臣的人员总数上看,蒙古、色目人比例极高。在顺帝朝以前,仅有3名汉人(宋绍明、左恭和李塔刺海)出任过省臣之职,这是中书省和其它行省完全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虽然与资料不全有关,但也反映了岭北行省的一大任官特点。担任岭北丞相、平章政事的官员并非普通的蒙古人、色目人,而多是“勋旧重臣”。举凡可以查出家世的丞相和平章政事,均

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包括世袭四怯薛长之职的蒙古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家族,以及成吉思汗封为答剌罕的启昔礼家族。岭北行省丞相搠思监出身蒙古怯烈氏,“四世为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鲜与比盛”⁴¹;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所出蒙古蔑儿乞氏,三世四人为相;平章政事别不花出身的“康里氏三叶疏王封者六人,践相位者四人”⁴²;丞相老章所出畏吾氏脱忽怜家族,三世相继为相⁴³;平章政事泼皮是泰定帝时期(1323—1328)权相倒剌沙之子。省臣选官出现上述特点亦应是岭北地区为蒙古人聚居区,所选官员以蒙古、色目勋贵为主,便于协调行省辖区内诸王、勋臣领地和属人的有关事务,同时似乎含有防范汉人之意。

顺帝时期(1333—1367)的省臣选择情况与前期迥异,出任省臣的共有7名汉人:包括1名平章政事,1名右丞,2名左丞,3名参知政事。任用较多的汉人充当岭北省臣似乎反映了元末社会动荡之际,自元朝中后期以来一向被蒙元统治者所排斥的汉人重新得到信任和重用。

三 岭北行省的职能

岭北地区行政机构的职能大致可以大德十一年(1307)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设置的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和林都转运使司、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和称海宣慰司等机构,主要是适应元朝与西北诸王战争的需要,为作战军队提供军需物资,组织屯田等。大德末年,随着西北战火的平息,元朝在岭北地区设立了行省。行省的职能也从为战争服务,转为以民政为主。但是“保安边境”,使朝廷“无北顾之忧”,仍是其主要职能之一,故岭北屯驻有大量的军队。简言之,行省的主要职能即“钱谷甲兵之事”。⁴⁴

“钱谷”之事主要是指救济辖区内从西北叛乱诸王处投降而来的民户,漠北诸王属下的贫民和灾民,以及赈济驿户、维持驿路畅通诸事。大德十一年,初立和林行省,安置从海都叛乱中归来的降户是行省的主要职责。元政府应和林省臣之请,“给钞二千锭,岁收子钱,以佐供给,仍以网罟赐贫民”。至大元年(1308),“以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仰食于官,非久计,给钞百五十万锭、币帛准钞五十万锭,命太师月赤察儿、太傅哈刺哈孙分给之,罢其廩给”⁴⁵。刘敏中(1243—1318)《丞相顺德忠献王碑》说:“和林控北边,始置宣慰。时(大德末)诸部落降者百余万口,乃罢宣慰,诏王(哈刺哈孙)以太傅为左丞相,行省事。”⁴⁶“八十六万八千户”的数目与“百余万口”相距甚远。据《元史》卷一三六《哈刺

哈孙传》,“和林为北边重镇,今诸部降者又百余万”;卷一七三《马绍传》,“宗亲海都作乱,其民来归者七十余万,散居云、朔间。”马绍(1239—1300)建议“计口给羊马之资,俾还本土”,得到采纳。则“七十余万”或“百余万口”应比“八十六万八千户”更接近来降民户数。行省首任左丞相哈剌哈孙到任后,“分遣使者赈降户。奏出钞帛易牛羊以给之,近水者教取鱼食。会大雪,民无取得食,命诸部置传车,相去各三百里,凡十传,转米数万石以饷饥民,不足则益以牛羊。又度地置内(两?)仓,积粟以待来者”⁴⁷。安置降户的工作持续了几年。至大三年,“和林省言:‘贫民自迤北来者,四年之间靡粟六十万石、钞四万余锭、鱼网三千、农具二万。’诏尚书、枢密差官与和林省臣核实,给赐农具田种,俾自耕食,其续至者,户以四口为率给之粟”⁴⁸。岭北行省救济漠北贫民与灾民的记载所在多有。《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至大四年闰七月壬戌:“命赈恤岭北流民。”皇庆元年(1312)二月庚寅:“敕岭北省赈给阙食流民。”卷二七《英宗纪一》延祐七年(1320)六月乙丑,“赈北边饥民,有妻子者钞千五百贯,孤独者七百五十贯”;甲戌,“边民赈米三月。”这些降户、饥民、贫民多是漠北诸王的部民。延祐六年,“敕晋王部贫民二千居称海屯田”⁴⁹。至顺二年(1331),“镇宁王那海部曲二百,以风雪损孳畜,命岭北行省赈粮两月”⁵⁰。据《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元朝在岭北行省立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三道驿站共一百一十九处。⁵¹维护岭北诸驿站,赈济驿户也是行省的职责之一。延祐六年,“赈北方诸驿。”⁵²至治三年(1323),“和林阿兰秃等驿户贫乏,给钞赈之”,“禁驿户,无质卖官地。”⁵³泰定元年(1324),“木怜撒儿蛮部及北边蒙古户饥,赈粮、钞有差。”⁵⁴至顺元年(1330),“铁里干、木怜等三十二驿,自夏秋不雨,牧畜多死,民大饥,命岭北行省人赈粮二石。”⁵⁵

“甲兵”之事指的是为岭北驻军提供军钞、军粮、军备等军需物资。元朝指派宗王出镇漠北,并在和林屯驻军队。为这些出镇宗王以及和林戍兵提供军需成为行省的重要职责。北方的军需支出是国家的主要财政负担之一。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和林、甘肃、大同、隆兴、两都军粮,诸所营缮,及一切供亿,合用钞八百二十余万锭。”⁵⁶到仁宗时,北边军需达“六七百万锭”⁵⁷。岭北所占份额亦应不少。《元史》诸本纪中常有分拨给岭北驻军军需的记载。大德九年(1305)三月丁未,以和林所贮币帛给出镇漠北的怀宁王海山所部军。至大二年(1309)二月辛未,“调国王部及忽里合赤、兀鲁带、朵来等军九千五百人赴和林”,八月甲寅“以阿速卫军五百人隶诸王怯里不花,驻和林,给钞万五千锭,人

备四马。”⁵⁸延祐二年(1315),“给钞买羊马,赈北边诸军”。五年(1318),“以钞给北边军为马价。”⁵⁹七年(1320)三月,“赐边戍诸王、驸马及将校士卒金银、币帛有差。市羊五十万、马十万,贍北边贫乏者”。七月,“运和林粮于札昆仓,以便边军。市马三万、羊四万,给边军贫乏者”。“八月丁未朔,岭北省臣忻都坐以官钱犒军免官,诏复其职。”⁶⁰至治二年(1322)四月己亥,“岭北蒙古军饥,给粮遣还所部”,三年二月癸未“赈北边军钞二十五万锭、粮二万石。”四月己卯,“北边军饥,赈之”。三年(1323)五月乙卯,“以钞千万贯,市羊马给岭北戍卒,人驢马二、牝马二、羊十五。”⁶¹泰定元年(1324),赐“北边戍兵钞万六千八十锭。赈蒙古饥民,遣还所部。”⁶²

“钱谷甲兵”之事均需大量的经济支持。除政府赐与外,在岭北组织屯田以保障民用、军需也是重要途径之一。和林行省首任左丞相哈剌哈孙即以“治称海屯田”,“岁得米二十余万”,号称“北边大治”⁶³。至大四年(1311),“命和林行省右丞孛里、马速忽经理称海屯田。”⁶⁴担任屯田的主要是岭北戍军,少部分是漠北的流民或灾民。大德十一年(1307),“以汉军万人屯田和林。”⁶⁵至大元年,“和林贫民北来者众,以钞十万锭济之,仍于大同、隆兴等处余粮以赈,就令屯田。”⁶⁶皇庆元年(1312),“敕称海屯内汉军存恤二年”⁶⁷。延祐六年(1319),“分拣蒙古军五千人,复屯田称海。七年……发军一千人于五条河立屯”。岭北的屯田一在称海,一在五条河。“英宗时,立屯田万户府,为户四千六百四十八,为田六千四百余顷。”⁶⁸钦察哈剌赤一直屯驻漠北。至元二十六年(1289),海都犯边,岭北地区土土哈所部“合刺赤饥,出粟四千三百二十八石有奇以赈之”⁶⁹。到顺帝末期,为平宗王阿鲁辉帖木儿之乱,“至称海”,起钦察“哈剌赤万人为军”⁷⁰。

除屯田外,元政府还采取了募民运粮、从外地调粮和禁酒等各项措施来强化岭北的粮食供应。大德延祐年间(1297—1320),“大同宣慰使法忽鲁丁,扑运岭北粮,岁数万石,肆为欺罔,累赃巨万”⁷¹。延祐三年(1316),“中籴和林粮二十三万石。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万石”⁷²。“募民中粮以饷边”成为惯例和旧制。⁷³和林建有不少粮仓,储粮“以备赈贷供亿”⁷⁴之需,很多粮食是由外地调拨输入岭北的。《元史》卷一百四十《铁木儿塔识传》载:“岭北地寒,不任穡事,岁募富民和籴为边饷,民虽稍利,而费官盐为多。铁木儿塔识(时任中书平章政事——引者)乃请别输京仓米百万斛,储于和林以为备。”⁷⁵为减少粮食消耗,元政府经常在岭北发布禁酒的命令。⁷⁶但是上述种种措施仍不足以满足岭北戍兵和平民的基本需要。岭北戍兵饥贫的记载常常可见。皇庆元年(1312),“给羊

马钞价,济岭北、甘肃戍军之贫者。”⁷⁷延祐七年(1320)七月“壬午,运和林粮于扎昆仓,以便边军。市马三万、羊四万,给边军贫乏者。癸未,括马于大同、兴和、冀宁三路,以颁卫士。”⁷⁸至治二年(1322),“岭北戍卒贫乏,赐钞三千二百五十万贯、帛五十万匹”⁷⁹。戍卒贫乏,可能引发兵变。“岭北戍士多贫者,岁凶,相挺为变。”⁸⁰岭北也常发生饥荒。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志道,以“和林大饥,救荒有惠政,时称能吏。”⁸¹延祐七年,“和林民阉海瘞殍死者三千余人,旌其门。”⁸²

岭北行省由于赈济、军需支出等原因,日常开支颇大。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全国“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⁸³,也就是说各省为年度开支的“备用”钞是120万锭⁸⁴。延祐四年(1317)六月,政府“给岭北行省经费钞九十万锭、杂彩五万匹”⁸⁵。可见,延祐四年岭北一省的经费钞就占十年前全国各省经费总备用钞的四分之三。但是岭北本省的收入极为有限。以全国财政收入记载最为明确的天历元年(1328)为例,在全部货币收入中,盐课所占比例最大,为80.4%,其次是商税,约占10%,再次是酒醋课,占5%。如上所述,岭北行省是要消耗国家盐课来补充粮食供给的。在商业税收方面,全国商税总额为939,682锭4两8钱⁸⁶。岭北行省商税额数为448锭45两6钱⁸⁷,仅约占全国税额的千分之零点四八,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岭北行省并无酒醋课征收。由此可见,岭北行省的支出远远大于收入。

综合上述,岭北在元世祖以后虽然失去了作为国都所在地的中心地位,但是它仍然是元政府最为重视的一个区域。大德十一年(1307)初设和林行省时,以太师、淇阳王月赤察儿为行省右丞相,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为行省左丞相,后来的行省丞相也多是“勋旧重臣”,说明了朝廷对岭北行省的重视。岭北行省还有宗王出镇,屯有大量戍兵。岭北行省的政治、军事地位为其他行省所不及。《元史·地理志》将岭北列为第一行省,不无道理。行省的经济职能也是为其政治、军事需要服务的。岭北行省对全国的经济作用毫不显著,却要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元政府每年对漠北诸王给予数额巨大的岁赐,所谓“贫极江南,富夸塞北”,这是一因。虞集(1272—1348)说:“和林城控制要害,北边重藩。往时朝廷岁出金缯布币糗粮以实之。转输之事月日相继,犹以为未足。又捐数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胜计。由是遂为殷富。又尝有大臣镇抚经理之,安庶比于都会。仕有不次之擢,贾有不赀之获,而侥幸之民争趋之矣。”但是,元政府耗费大量财力经营的岭北并未能成为其稳固的后方。“迩者一旦边警遽至,非亡则随丧失其所主守,缓急无一可赖者。”⁸⁸这种情况到元末亦复如此。顺帝末期

(1333—1367),元政府起用不少汉人充当原来汉人极少染指的岭北省臣就透露了个中消息。农民军起义后,“诏宗王以北方兵南讨”。但是,漠北诸王、窝阔台后裔阿鲁辉帖木儿(?—1361)非但不应诏,反而拥众数万,“胁宗王以叛”⁸⁹,加速了元朝的灭亡。这也说明了元朝对岭北地区政策的失败。

〔注 释〕

- 1 揭傒斯,《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志道哀词》,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诗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页228。
- 2 有关蒙元早期岭北地区的机构建置原委,请参阅陈得芝先生《元岭北行省建置考》,同氏《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页113—200。
- 3 《元史》,卷九一《百官七》,页2307;卷五八《地理一》,页1346。
- 4 张思明,《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李文田撰、罗振玉校,《和林金石录》(1929年刊本),页15b。
- 5 《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页2157。
- 6 《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科目》,页2021。
- 7 《元史》,卷八四,《选举志四·考课》,页2105—2106。
- 8 洪金富,《和林元碑与岭北官员管窥》,2006年10月台北“中国历代边臣疆吏”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 9 洪金富,《元代监察制度的特色》,《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报》,1975年第2期,页219—276;郝时远,《元代监察制度概述》,《元史论丛》,第三辑,元史研究会编,中华书局,1986年,页82—104。
- 10 《元史》,卷二十,《成宗纪三》,大德四年十一月壬寅条,页432。
- 11 《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延祐三年十一月壬寅条,页575。
- 12 《元典章》,卷二圣政卷一,《抚军士》,台湾故宫博物院,1972,页又14a。
- 13 唐惟明,《宪台通纪续集》,《作新风宪制》,《永乐大典》,卷二千六百九,世界书局影印本,第90册,页9a;洪金富点校,《元代台宪文书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3,页97。
- 14 《元史》,卷三一,《明宗纪》,天历二年四月乙巳条,页698。
- 15 《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至顺元年九月辛卯条,页766。
- 16 《元典章》,卷五四刑部十六,《杂犯一·违例·省官多取分例》,页25a。
- 17 虞集,《送苏子宁北行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四部丛刊》初编,页12a。
- 18 黄潜,《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答失蛮)神道第二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四,《四部丛刊》初编,页19。

- 19 朱思本,《贞一斋诗文稿》一,页21,《和宁释》。《宛委别藏》106,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 20 “至元9.5”意为至元九年五月,下同。
- 21 “色目·回回”谓其人为回回。回回在元代属于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制中的色目。
- 22 “元史7.141”指《元史》,卷七,页141。下同。
- 23 《国朝文类》,《四部丛刊》初编。
- 24 曹楫坚,《章邱县志》,《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2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 25 《和林金石录》,页18a,《题名残碑》有“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贴陈”,或即此人。从《题名残碑》上所记与他同时为官的塔即吉和马某的任官时间推断,帖陈在天历二年时仍为岭北行省参政。
- 26 《和林金石录》,页18a,《题名残碑》,李文田释读为“塔郎吉”,洪金富先生释读为“塔即吉”。《元史》,卷三一,《明宗纪》亦作“塔即吉”。今从洪氏之考订,说见洪氏前揭文。
- 27 《和林金石录》,页18a,《题名残碑》写作“马某”;《元史》,卷三一,页698,《明宗纪》写作“马谋。”
- 28 据《和林金石录》,页18a,《题名残碑》所记与他同时为官的塔即吉和马某的任官时间推断。
- 29 许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30 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
- 31 《和林金石录》,页27b,《大司农保厘朔方记》有“丙戌(至正六年,1346)秋,光禄大夫、大司农别下阙为平章政事”云云。李文田、罗振玉考订应是出任中书省丞相的别儿怯不花。据《元史》,卷一百四十,《别儿怯不花传》,页3366—3367,至正“四年,拜中书左丞相。朝廷议选奉使宣抚,使问民疾苦,察吏贪廉,且选习北藩风土及知典故者,俾别儿怯不花周行沙漠,洗冤除弊,不可胜计。又奏发使谕诸王,赐以金衣重宝,使各抚其民,毋踰法制,于是内外震肃。”传中并未提到别儿怯不花曾任大司农,也未提到他出任岭北行省平章。黄潜《敕赐康里氏先莹碑》,页9a,提到别不花,记其官职为“岭北行省平章政事”。《先莹碑》写于至正八年,与《大司农保厘朔方记》年代相近,疑《记》中的大司农别某为“别不花”,但别不花曾否任大司农,目前尚乏证据。
- 32 据松川节、松井太的研究,《和林金石录》,《岭北省右丞郎中总管收粮记》中所录碑文“帖木阙”应为“帖木哥”。参阅松川节、松井太(Matsukawa Takashi / Matsui Dai),

- 《岭北省右丞郎中总管收粮记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8》,森安孝夫,Ayudai Ochir 编《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中央欧亚学研究会,1999,页247。
- 33 《元史》,卷二百五,《朴不花传》,页4554,有“壅蔽簧惑主听之罪,屏擿思监于岭北”云云,未明言擿思监在岭北的职位。擿思监以中书右丞相遭贬,所任或许为岭北丞相。
- 34 宋濂,《宋学士文集》,《四部丛刊》初编。
- 35 《元史》,卷一八六,《张翥传》,页4285,仅言张翥曾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未提及他出任岭北行省平章政事。
- 36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四部丛刊》初编。
- 37 查继佐《罪惟录》,卷七,《逸运外臣列传》言秦从龙“仕元累官和林行省左丞”。按秦从龙任职时已为元末,行省之名早已改为岭北行省。《四部丛刊》三编。
- 38 兀都蛮与赛甫丁的任官时间,据《和林金石录》,页18a,《题名残碑》所记与他们同时为官的塔即吉和马某的任官时间推断。
- 39 据《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行中书省》,页2306—2307,行省“丞相或置或不置,尤慎于择人,故往往缺焉。”大德十一年初设立和林行省,设右、左丞相各一员。至大四年(1311)“省右丞相”。《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页538,至大四年二月乙巳,“命和林、江浙行省依前设左丞相,余省唯置平章二员。”担任过和林行省右丞相的仅月赤察儿一人,故表中仅列“丞相”一栏,不区分右、左丞相。
- 40 《元史》,卷八五,页2120。
- 41 《元史》,卷二百五,《擿思监传》,页4588。
- 42 黄潜,《敕赐康里氏先莹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八,页1a。
- 43 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页89。
- 44 《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至顺元年九月辛卯条,页766。下文论述多有参考陈得芝先生上揭文之处。
- 45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大德十一年秋七月丙戌条,页485;至大元年三月乙丑条,页497。
- 46 《国朝文类》,卷二五,页7b。
- 47 《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孙传》,页3294—3295。
- 48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至大三年六月乙卯条,页524。
- 49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延祐六年十一月庚子条。
- 50 《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至顺二年四月甲子条,页783。镇宁王那海是阿里不哥后裔。
- 51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页1383。
- 52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延祐六年十月丁卯条,页592。

- 53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至治三年正月壬寅条，页627；五月乙卯条，页631。
- 54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泰定元年四月辛巳条，页646。
- 55 《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至顺元年九月丁未条，页767。
- 56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至大元年二月乙未条，页495。
- 57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至大四年十一月辛丑条，页547。
- 58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页510、514。
- 59 《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延祐二年十二月癸巳条，页572；卷二六，《仁宗纪三》，延祐五年九月壬申条，页586。
- 60 《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页605。
- 61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页631。
- 62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泰定元年六月庚申条，页648。
- 63 《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孙传》，页3295。
- 64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至大四年六月丁巳条，页543。
- 65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大德十一年十二月癸卯条，页492。
- 66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至大元年二月甲寅条，页496。
- 67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皇庆元年二月丁卯条，页550。
- 68 《元史》，卷一百，《兵志三·屯田·岭北行省屯田》，页2564。
- 69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至元二十六年六月辛巳条，页323。
- 70 《元史》，卷二百六，《阿鲁辉帖木儿传》，页4597。
- 71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八月庚子条，页454；卷一七六，《曹伯启传》，页4100。
- 72 《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市籴》，页2470。
- 73 《元史》，卷一三九，《乃蛮台传》，页3351。
- 74 《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延祐七年二月己未条，页598。
- 75 《元史》，卷一四〇，页3373。
- 76 如《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延祐四年四月乙丑，页578，“禁岭北酒”；卷二七，《英宗纪一》，延祐七年四月己未，页601，“申严和林酒禁”；卷二八，《英宗纪二》，至治三年五月乙巳，页630，“岭北米贵，禁酿酒。”
- 77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皇庆元年六月己巳条，页552。
- 78 《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页604。
- 79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至治二年闰五月丙午条，页623。
- 80 《元史》，卷一七七，《张思明传》，页4122。
- 81 《元史》，卷一八三，《苏天爵传》，页4224。
- 82 《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延祐七年五月壬辰条，页602。

-
- 83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大德十一年九月己丑条，页488。
- 84 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页765。
- 85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延祐四年六月己未条，页579。
- 86 陈高华、史卫民上揭书，页756、652。
- 87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页2400。
- 88 虞集，《送苏子宁北行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页11b—12a。
- 89 《元史》，卷二百六，《阿鲁辉帖木儿传》，页4597。

晚明福建财政与福建疆吏对台湾问题的处理

徐晓望 著

台湾与澎湖群岛临近福建,在历史上也曾长期归属福建管辖。明代台湾面临来自外界的侵略,福建封疆大吏也力图保护台湾及台湾海峡的航行安全。然而,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福建巡抚无法施展全力,乃至台湾于明末被荷兰及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占领¹。

明朝实行科举制度,被选拔出来的官员大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经过一二十年宦途的磨炼之后,仕至一省封疆大吏的官员不仅具有出众的才华,而且具有丰厚的管理经验。万历年间(1573—1620)担任福建巡抚、布政使一类职务的高官,大都是优秀人才。徐学聚(生卒年不详)为兰溪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至三十五年(1607)任福建巡抚,著有《历代瑄鉴》,另有一部200卷的《明朝典汇》也是他写的。再以黄承玄(生卒年不详)(万历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在任,即1615—1617年)来说,《明史》记载,黄承玄著有:《河漕通考》45卷,《安平镇志》11卷,《北河纪略》14卷,《秦金通惠河志》2卷。以上著作说明他是一个研究地理学卓有成绩的学者²。又如王士昌(生卒年不详,万历四十六年至万历四十八年在任,即1618—1620年),《画史会要》记载,“王士昌,字永叔,号斗溟,浙临海人,入江西新建籍。万历时官至都御史,抚闽中。风流蕴藉,宛若晋人。能诗,亦能鉴古物,山水得黄大痴笔意。但惜腕自珍,笔不轻发”³。可见,就才华而言,他们⁴当得上最优秀人才的赞誉。当他们升任福建巡抚或布政使之类的高官后,对台湾问题也是十分关注的。有些策划的设想也很好,但是因为明末福建财政的困境,他们的设想很难付诸实行。

一 福建财政与万历前期林凤等海盗的平定

福建位于东南一隅,山多田少,在以田地为主要征收对象的古代,福建负担

的税收也不多。明代中叶,福建田地数为1,353万亩,共纳田赋正税夏税麦877石、秋税粮841,353石,全年田赋正额不到85万石,大约相当于江南地区的一个中等府州⁵。因故,明代中叶的福建有民淳讼简之誉。“闽之地,僻在海隅,其地僻,故其事简,土瘠产薄,无纷华之习,故其赋省,土之民言大而心小,惧法而畏义,故其民淳,当简省淳朴之地,又无往来应接之冲,凡缙绅名公卿之宦于兹土者,去后之思,率以为易治。然则民之可亲,莫过于闽矣。”⁶随着晚明海外市场的开拓,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福建⁷,晚明福建经济有很大的发展。明中叶弘治年间(1488—1506),福建全省仅有171个墟市,但到了明万历年间,福建全省墟市共计350个,比明代中叶增加一倍。福建沿海的福州、泉州、漳州都成为国内小有名气中等城市,而厦门与月港也成为海内外著名的海港城市⁸。在此期间,虽说嘉靖年间(1522—1567)的倭寇给福建沿海造成很大的破坏,但戚继光(1528—1588)率浙兵入闽之后,倭寇逐次被平定,福建经济也很快恢复发展,并在万历初年进入长时间的繁荣时代。

经济的繁荣给福建财政打下坚实的基础。隆庆年间(1567—1573),庞尚鹏在福建主持一条鞭法改革;万历初年,在张居正(1525—1582)的主导下,全国各地都进行了清丈田亩,这两项措施的施行,使福建省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这给明朝福建驻军的支持是很大的⁹。其时,戚继光带领的浙兵在平倭战争中表现极好,受到福建官员的信赖。其后,戚继光虽然奉调北方,但浙兵长驻福建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些士兵受到良好的训练,作战技术精巧,具有强大的战力。福建官员将他们倚为长城,为其支付高额军费。在这一背景下,活动于台湾海峡的海盗多次遭受福建水师的重击。

万历年间的海盗活动与倭寇有关。约在嘉靖末年,戚继光入闽,他率浙兵从北到南,将倭寇逐入广东境内,但因广东方面与戚继光配合不好,所以,与倭寇有些关系的广东海盗多次躲过了戚家军的打击。在隆庆、万历年间,广东海盗极为猖狂,吴平(生卒年不详)、曾一本(?—1569)、林道乾(生卒年不详)、林凤(生卒年不详)等海盗头目都曾北上台湾海峡,其中林道乾与林凤还到台湾活动。关于林凤部在台湾的活动,《明史》的记载较简单,而曹学佺的《石仓全集》对此记载较为详细,其中有一些内容不见于其他书籍。曹学佺说:“万历元年(1573),潮寇林道乾勾倭突犯漳泉海洋,窜据澎湖,寻投东番。其党林凤最黠,代领倭众四出杀掠,屡挫官兵。”福建方面记载:“六月,风贼突至福清万安所,夺兵船五只,又至烽火寨汛地,破鉴江、塘头二堡。”¹⁰按,过去广东的海寇袭击福

建,多是沿海岸线北上,因此,只要来自广东的海寇出现在福建海面上,福建南部的诏安、玄钟水师便可知道,马上将消息上报,沿海戒严,海寇很难得逞。但林凤盘据台湾之后,随时可以袭击福建任何地方,所以,对福建海防构成极大的威胁。于是,闽粤水师动员,夹击海盗。《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年(1574)六月戊申,福建巡抚刘尧诲(1522—1585)揭报:‘广贼诸(朱)良宝,总兵张元勋(生卒年不详)督兵诛剿。其逋贼林凤鸣拥其党万人,东走福建,总兵胡守仁(生卒年不详)追逐之。因招渔民刘以道谕东番合剿,远遁’。”¹¹可见,当时的明朝还命令台湾土著——“东番”一起夹击林凤。这是福建疆吏与台湾发生关系的明证。林凤失败后,将其活动范围转到菲律宾。万历二年(1574)十一月,在闽粤之间流窜的海盗林凤率战船62艘,士兵2,000人,及妇女儿童1,500人来到吕宋,他的船队两次猛攻马尼拉,企图驱逐西班牙人。然而,都被西班牙人打败。林凤只好率部转移到吕宋的彭加丝兰(Pangasinan)驻扎,建立山寨。西班牙人在先进的火器支持下,组成了一支由150名西班牙人与2,000名菲律宾人组成的远征军,在万历三年(1575)的三月底,将林凤的山寨围困。然而,林凤终于突破重围,又一次北上台湾。《石仓全集》记载:“四年,林凤复驾大伙倭船百余只乘风突出澎湖,闻两省大兵洊至,凤以轻舟四十只直走西洋吕宋国。”¹²可见,林凤是在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四年(1576)之间多次来到台湾,但因受到闽粤水师的夹击,无法在台湾立足,最终逃遁南洋。以上林凤于万历四年(1576)第二次入台的行踪,唯独见于曹学佺的记载。林凤被驱逐后,台湾海峡恢复平静,在台湾的东番部落,因林凤的焚掠,“稍稍避居山后。忽中国渔者从魍港飘至,遂往以为常。”¹³福建商民经常往来于台湾岛,“又有小番,名鸡笼、淡水,地邻北港捕鱼之处……北港船引,一例原无限数”¹⁴。这是福建官府比较有效控制台湾的时期。但是好景不长,至万历中叶,福建已经出现财政困难的情况。

二 福建巡抚与澎湖驻兵行动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这是日本企图征服亚洲大陆迈出的第一步。由于嘉靖年间(1522—1567)倭寇曾经大举入侵闽浙沿海,因此,明朝得到日军攻下朝鲜都城汉城的消息,十分紧张,东南沿海一带全面动员。为了抵御倭寇,福建疆吏首先想到的是在台湾海峡要道澎湖驻兵。然而,虽然早在万历二十年(1592)就有了驻兵之议,福建水师真正来到澎湖群岛,却是在万

历二十六年(1598)¹⁵。为什么如此重要的计划却拖延五年才实行?这与福建的自然灾害有关。就在福建官府提出在澎湖驻兵的次年,福建沿海发生大灾。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福建巡抚许孚远(1535—1634)的《乞勘灾荒疏》说:“又据泉州府声称:本府所属柴邑,晋(江)、南(安)、惠(安)、同(安)肆县滨海,安(溪)、永(春)、德(化)叁县依山。去岁旱魃为灾,所幸广谷通贩,米价不腾,物情乃定。今春以来,地土承久旱枯涸之后,虽甘霖屡降,水积不深,灌注不广,间多不种之田,既而螟蝗为害,根叶俱伤,正当吐实之时,又遇飓风大作,摧折扫荡,殆无虚日。至陆月初旬,淫雨如注,溪水下奔,海潮上涌,滨海禾苗,尽被淹没,负山稻谷,多属糠粃,天祸属邑,捫口嗷嗷。又闻广惠澎五谷不登,迺来米价遂至腾贵,民情汹汹,相率哭泣。”¹⁶“看得闽省襟山带海,地势倾仄,而少平衍,雨水之来,易盈易涸,频年苦旱,五谷鲜收。今岁夏初,雨泽不均,早禾不得尽植,漳泉地方,失种者半,乃陆月初旬,淫雨连绵,日夜倾注,溪流暴涨,四望成浸,一时庐舍漂流,田禾淹没,人民牛畜,间遭陷溺死亡。”¹⁷福建海口的同安县灾情尤为厉害。许孚远:《乞勘灾荒疏》:“同安县声称,本县田土,本来瘠薄,全赖雨泽滋生,今春不雨,其地居高亢者既不得施种,近水者稍得插苗,方在吐穗,突生螟蝗……兼之潮谷不到,米价日腾,贫民束手待毙。”¹⁸福建沿海一向依赖广东的粮食,但因广东也同样遭灾,广东官府禁止粮食出口,许孚远说:“而闽地米谷素少,半藉他省接济,乃闻广中又方闭籴,米价骤至腾涌,山海盗贼,渐觉发生。”¹⁹在大灾发生的背景下,很显然,福建官府主要精力用于救灾,许多大事被放在一边。其次,由于澎湖隶属于泉州,而在澎湖打渔的多为漳州人,当时规定澎湖游兵的粮饷归泉漳二府供应,“春汛粮支给于泉,冬汛粮支给于漳”²⁰。在泉州遭逢大灾的情况下,其士兵粮饷很难得到保障,这时候派兵到澎湖,肯定是不适宜的。

与此同时,福建财政也十分困难。福建巡抚许孚远说:“万历拾肆年(万历十四年、1586)起至拾玖年(万历十九年、1591)止,闽省共未完饷银贰拾壹万肆千玖百叁拾柒(二十一万四千九百三十七)两零。”²¹“看得闽省军饷先经会计,岁费贰拾捌万玖千(二十八万九千)余两,毫不可缺。该司括凑原额仅止贰拾柒万(二十七万)有奇,所入之数,已不足供所出,况每年逋欠,常有数万。番舶近始开禁,寺田查理未清,原议各项,有名无实。臣又近经题请大整水陆兵防,岁约加费伍万上下,既无别项,箕敛又难加派于民,故不得已而有权动司库之议,据藩臣所称,动用贰拾[二十]万为止,且不足以充肆年之需。”²²在财政困难的背景下,福建官府很难有大作为,澎湖驻兵因而拖延。一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

福建水师才常年驻守澎湖。

如前所述,福建经济在万历年间(1573—1620)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只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发生,才使赋税无法征纳,军费遇到困难。不过,万历二十六年(1598)之后,情况大有变化。该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病死,日军退回本土,援朝抗倭之役获得胜利,明朝征纳的税收也随之削减。福建财政大有改善。另外,渡过自然灾害之后,福建农业经济也得到恢复,政府的税收渐有保障。福建水师有了经费的保证,开始活跃起来。万历三十年冬(1602年底—1603年初),沈有容率福建水师击败在澎湖、台湾活动的一股海盗,登陆台湾北港一带,受到台湾原住民的欢迎²³。

三 万历四十四年前后在台湾屯垦的搁置

万历四十四年(1616),福建巡抚黄承玄得到来自琉球国的情报,日本尝试大举南下,侵占台湾。《明实录》记载,万历四十四年六月乙卯(1616.7.29),“琉球国中山王尚宁遣通事蔡廪来言:迩闻倭寇各岛造战船五百余只,欲协取鸡笼山;恐其流突中国,为害闽海,故特移咨奏报。巡抚福建右副都御史黄承玄以闻,谓‘鸡笼逼我东鄙,距汛地仅更数水程;倭若得此,益旁收东番诸山,以固其巢穴,然后蹈瑕伺间,惟所欲为:指台、礮以犯福宁,则闽之上游危;越东涌以趋五虎,则闽之门户危;薄澎湖以瞰漳、泉,则闽之内地危。非惟八闽患之,恐两浙未得安枕也。若夫琉球之告,有谓借以相恐喝者,有谓假以温贡道者;又有谓中山不能自专,直狡倭遣以探我虚实者。臣不能逆睹,但乞早为之备耳’。疏下兵部。”²⁴其年夏天,果有日本肥前州大名村山等派出13艘船只南下,企图侵占台湾。这支船队在台湾海峡遇到风暴被吹散。次年,日本的大名村山等派明石道友送被掳的福建官员——董伯起回闽,于是,福建海道副使韩仲雍(生卒年不详)招明石道友等日本人交谈,当韩仲雍问起日本人为何侵略台湾并屡屡骚扰大陆沿海时,明石道友回答:“自平酋(丰臣秀吉)物故,国甚厌兵。惟常年发遣十数船,挟带资本通贩诸国;经过鸡笼,频有遭风破船之患。不相救援,反掠我财。乘便欲报旧怨,非有隔远吞占之志也。”²⁵其时福建疆吏向日本表达了坚决捍卫台湾的决心,“旋又谕以上年琉球之报谓汝欲窥占东番北港,传岂尽妄”。“悬示通倭禁例,益严其实。每岁引贩吕宋者一十六船,此等唐货岂尽吕宋小夷自买而自用之乎?又各远屿穷棍,挟微资,涉大洋,走死鹜利于汝地者,弘纲阔

目,尚未尽绝。汝若恋住东番,则我寸板不许下海,寸丝难以过番。”²⁶可见,在与日本的交涉中,福建官府的立场是坚定的。

万历末年的台湾有三个港市初步繁荣,这三个港市是北部的鸡笼、淡水,南部的北港(今台南市)²⁷。有几伙海盗商人在此活动。在北港,以经商为主的是林谨吾(生卒年不详)等人²⁸。以抢劫为主的是同安人袁进(生卒年不详)及漳浦人李新(又称李忠,生卒年不详)。万历四十四年(1616)之后,漳州水师右翼军首领赵秉鉴(生卒年不详)在北港的赤墘筑一小城,与当地海盗商人势力联合。曹学佺说:“[万历]四十六年(1618),巡抚王士昌提孽寇赵秉鉴毙诸狱。秉鉴即若思也。往犯常刑,幸免,复谋海总。初焉招贼充兵,后竟连兵作贼,外结东番逆酋为援,内纠漳泉叛民为党,建议袭取东番,实启兵端。以图叵测。至是诛灭,漳人德之,见于缙绅公揭。”²⁹赵秉鉴被杀之后,袁进与李新以台湾为巢穴,大举进犯福建沿海,并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秋接受福建方面的招抚。于是,福建官府的势力伸及北港³⁰。为了巩固对台湾北港的管辖,福建巡抚有在北港屯田的计划。天启年间(1621—1628)出版的姚旅《露书》记载:“北港……其人散居无君长,惟甲长之类为头目。中国十人以下至其地,则彼杀之。五十人以上,则彼闭户而避。我捕鱼、逐鹿者入其境,必分赠甲长土宜。闽抚院以其地为东洋(此处应指菲律宾)、日本门户,常欲遣数百人屯田其间,以备守御。”³¹按照姚旅透露福建巡抚的计划,当时福建巡抚想出兵数百人,在北港屯田³²。倘若这一计划付之执行,福建官府便能切实控制台湾的北港。然而,福建巡抚提出了计划却未尝实行,其原因也在于财政困难。

万历后期,努尔哈赤(1559—1626)崛起于东北,频频发动南下掠夺的战争。为了抵御八旗军队,明朝从各地调来的大军云集辽东。由于经费开支浩大,各地官员都在搜罗库存白银运到北方。福建布政司原有库存银被搜括一空,全部被输送到国库。缺少了这笔多年来积累的库存基金,福建财政更显紧张。除此之外,加派再一次出现。曹学佺(1574—1646)说:“辽饷者,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有事于辽,部文该派每石七分一厘七毫,共该派银四万七千七百三十两四钱一分,经布政司皆公懋良、粮道魏公时应,说抚院王公士昌,按院崔公尔进搜括盐钞银抵解,各州县一年免派矣。四十七年(1619)又该派银如上年,经二公搜括料剩站剩银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一两三钱一分抵解,每石实只派五分耳。四十八年(1620)部文加派至一钱八分四厘三毫,共派一十二万二千七百二十五两三钱,几与起运正粮等。二公又多方搜括银二万七千五百三十四两三钱抵解,每

石得减派四分。天启元、二年(1621—1622),又该加派如上年,而前后布政闵公洪学、游公汉龙,详抚院商公周祚,按院郑公宗周,又多搜括银五万二百五十六两一钱六分,抵解,每石减去七分五厘,只派银一钱零八厘,视上年又多减矣。故闽省虽有辽饷而不甚为害,以此。然所虑者,搜括有限而辽祸未艾,瘠民困何以堪之。所愿当道诸大夫预为之所,节缩他费以补派额,庶临渴掘井之患。其可免乎?”³³可见,当时福建巡抚为了缓和赋税对民众的压力,想了很多方法,多方挪用,这才保证了上纳朝廷的赋税。然而,这都不是长久之计,经过几年的搜罗,福建财政囊空如洗,不得不将加派银两施之于民,据《福建通志》的记载,明末福建“共计每年应派辽饷二十九万四千九百两三钱”,这是个相当沉重的负担³⁴。

税收的增加,必然引起相应的社会问题。明代的税收人员胡作非为,无人管辖。“盖公税一,私税十”³⁵成为当时的惯例。有权有势的家族可以多方避税,而没有权力的百姓,往往被征以十倍的税收。“而今者财用日诎,赋役烦兴,规避精巧,彼强宗巨姓蕃衍至于什百,视国初通天诡寄之名尤甚,县官曾不得庸调其寸缣,则荷重役者,俱属何人?近有蜃户输鱼课米,里胥犴索至一丁一斗,每银一两。吞声哽咽,曾不得泣诉。县官是驱之使盗也。孰如清其户口,使利归公家,额外之派,藉可以少减乎?派多矣,耗亦随之,天不能雨粟,麦不肯两岐,而蓄田之家,无利有害,望门持一券,十不一售,此亦闽俗之大变也。”³⁶可见,虽说当时税收总额看似不多,其实际效用是使民众不敢蓄田,以免承担过多的税收。这对以农立国的明朝,是致命的。由于对农业的投入下降,福建有限的田地收获锐减,粮荒更为严重。

以泉州为例:“泉郡宅于海山间,闽越奥区也。山海之产视九州之得于山海者,贸繁而异。山而居者,岁食其山之入,犹出其余以贸易于海;海之居者,亦食其海之入,举得而有焉。盖山海之利居田之半,其民亦侈然安其利以自足矣。民乐安其利,相观而善,故吏于土者恒不劳而理,号曰佛国。数岁以来,有赋其山之利于官……有赋其海之利于官……始而开若赋,继而倍若赋,今则殫其山海之出而赋之,而山海之人俱告困矣。”³⁷而且,泉州人倍感投诉无门,“维泉介在海隅,去京师八千里而遥。其去藩城,亦无虑三百里。故下民之困,仰不得其平者,上不能直之于辇毂,次不能直之于台省,皆求诸府而直焉。”³⁸泉州号称福建最富裕的府州,而且是福建水师的主要驻地,远赴台湾外海的水师,多从泉州下属的港口出发,泉州的经济情况很差,会使福建疆吏不敢轻易派出水师。这应当是万历(1573—1620)、天启(1621—1628)之交福建水师屯垦台湾计划一直无法实行的

原因。

从财政上看,由于辽饷过重,百姓不堪负担,欠税是常有的事。由于辽饷不可一日缺少,福建官员只好挪用福建水师的军饷。水师常遭欠饷,士气受挫,许多人逃亡。福建方面不得不裁减水寨军兵。这使自戚继光以来威名远播的福建水师受到沉重的打击。此后,福建各地水寨军兵数量大减,而战船腐朽,得不到补充。何乔远(1558—1632)说:“万历间,开洋市于漳州府海澄县之月港。一年得税二万余两,以充闽中兵饷,无所不足。至乎末年,海上久安,武备废弛,遂致盗贼纵横,劫掠船货。”³⁹福建水师的削减,使海盗无所畏惧,纵横于海上。大约自万历三十八年(1610)之后,台湾海峡又开始出现海盗,对福建沿海区域构成威胁。迄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以后,袁进、李忠的海盗船队纵横台湾海峡,成为东南区域的一大问题。一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袁进与李忠才接受官府的招安,于是,福建巡抚再次控制了台湾南部⁴⁰。

四 天启崇祯年间在台湾设置郡县计划的流产

明人周婴在其同名为《东番记》的一文中提到了有人提倡在台湾建立郡县的计划,他说:“泉漳间民渔其海者什七,薪其岭者什三。言语渐同,嗜欲渐一,唯以雕伪之物,欺诱其情,异海翁之狎鸥,等狙公之赋芋,疆场喜事之徒,爰有郡县彼土之议矣。”⁴¹如上所述,天启(1621—1628)、崇祯(1628—1644)年间福建与台湾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所以,有一些人主张在台湾设立郡县。其时,虽有荷兰人占据台湾北港的热兰遮城,但荷兰人在这里的地位不明。其真实情况是福建官员允许荷兰人在此居住而已。所以,福建官府若要在台湾设置郡县,荷兰人无法阻拦。

然而,这一时期福建的财政情况极差,民众无法忍受日益增多的赋税,纷纷下海为盗。迄至崇祯初年,情况更为严重。曾异说:“夫自频年加赋,稽人秧苗于土而税已输官,豪恶吏乐于赋重而耗羨多,且曰司牧者用催科殿最也。不崇朝而岁之三征必既,势不能无逋,于是而官府之鞭朴烦,輿胥之叫嚣急,斯二者费又与加赋耗羨等,夫民自常供而外,而加赋输其一,耗羨输其一,捶楚追呼之费,又输其一,三者费,又与常供等,然则是民一岁再赋也,而公府尚不能无余逋。夫民安得不入海。”⁴²可见,当时民众的负担大大增加。

在天启、崇祯年间,福建省最大的问题在于:赋税负担的严重不均。这一不均

首先表现为丁口的赋税负担极重,达到“丁四粮六”的比例,也就是说,福建在一条鞭法之后,其赋税的收入不是摊丁入亩,而是按丁四粮六的原则征收。其人丁要承担相当比例的赋税。这是福建省不同于其他省的地方。其他省实行一条鞭法后,政府税收的大部分摊入田地征收,这样,其承担者为地主。而福建省人丁要占相当比例,原则上说,所有的成年人丁都要承担相当比例的税收。这就使贫穷之户也要承担相当数量的税收。明末官府掌握的征税人丁数远远脱离实际。强宗大族隐瞒人丁,“夫一邑之户,始衰而终盛,一族之人,始寡而终众,奈何必因其旧也哉?是故豪宗巨家,或百余人、或数十人,县官庸调,曾不得征其寸帛、役其一夫;田夫野人,生子黄口以上,即籍于官吏,索丁银急于星火,此所以贫者益贫,而富者益富也。”⁴³由于这一原因,按人丁收税给下中户带来极大的压力。如《长乐县志》的作者夏允彝说:“余生吴越间,所闻丁口银不一,俱绝寡,长吏鲜有催科及此者。长邑丁银至重,且十倍吴越,民其巧者,贿里之长,多漏脱,拙者身输全丁,又每为其父兄既没、亲故逃亡者代输,苦不堪忍。”⁴⁴其次,福建田地数也存在着严重的瞒税情况,按,“南靖土田,不经清丈,区亩税粮,原无定则,奸民乘之,欺隐日滋。间尝覆通田亩,不下三十万,其登赋税者十五万九十有奇耳。此外皆他邑豪所居者也。”⁴⁵可见:南靖县隐瞒的土地至少在15万亩左右,约相当于纳税田地数。福建其他地方隐瞒土地的情况也类似于南靖县。在这一背景下,重新确定各地的田地与户口、合理分配负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福建的大族势力强大,地方官因循守旧,即使是在张居正清丈时期,福建的田地数也未真正点清过。因此,到了明末,福建社会已经存在着严重的赋税不均。一方面,有权有势的大族只要承担很少的赋税,经济上较为充裕;另一方面,许多小姓人家,面临日益加重的赋税无力承担,被迫逃亡,无处谋生。他们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

由于长期性对农田投入不足,明代末年福建的农田抗灾力下降,偶尔发生的灾荒十分严重。福建人曾异说:“夫全闽山海之郡,半山郡,不患人满,诸海邦食地浅,人溢于土,虽大穰仅足当他省下岁,其难治者一,中原北地,地重,民心难动摇,吴浙桑帛沃土,大室多盖藏,虽兵荒水旱,民犹强忍耐饥苦。闽地水浅土轻,民易制易动,大户少兼岁之储,米粟价稍踊,则待哺者嗷嗷。省会今岁米未及千钱一石,较之大江南北,价不能逮半。民情汹汹然,非威惠并行,赈恤多方,张口求食者,几攘臂而起,其难治者二。诸大郡负海民出没易为奸地,丰歉不一,豪大为乡里请粟,名为无遏余,当事者不得不听,或漏以养寇,泛舟之役,几与赍盗粮无异。其难治者三。”⁴⁶

“窃惟七闽全省之为邦,而四郡一州皆附海,惟漳泉二府地则少而民则多,且荒疫连年,赋愈加而生愈蹙,乘船下海,出门既易以为奸,买犊卖刀,仰屋又无以自给。故啸聚于风涛万里之外,时出没于福兴二郡之间,且铜山与潮惠为邻,而福宁乃温台接壤,南走广而北走浙,彼此业易以相推将与市,而卒与和出入,公然而无忌,或寨或游。”⁴⁷“且蹈海贫民,不如贩海富民之为患,而他日外寇更甚。今日内寇之可虞,今内地奸人以通倭为外府,而要津巨室,皆接济之主,藏贼可杀,而商可不尽诛,寇易平而豪未易卒问,始则为利,后渐生端,界在华夷,互相勾引,诚恐嘉靖末年之变,将为闽地后日之忧。”⁴⁸崇祯年间(1628—1644),福建的民众起义风起云涌,施琅的传记写道:“会泉郡山寇四起,当事稔公(施琅)能,命率师剿捕。挥戈一指,贼亡魂溃散。后先廓清山寨三百余所,活民命不胜计。”⁴⁹从泉州府有300多所反抗官府的山寨来看,崇祯年间的泉州极为混乱。

其时,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也不时发动对福建沿海的入侵。何乔远说:“兼以红毛一番,时来逼夺,当事者遂有寸板不许下海之令,至以入告,而海禁严矣。然海滨民众多生理无路,兼以天时旱涝不常,饥谨洊臻,有司不能安抚存恤,致其穷苦益甚,入海从盗。其始尚依一二亡命为之酋长,既而啸聚渐繁,羽翼日盛,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海滨男妇束手受刃,子女银物,尽为所有,而萧条惨伤之状,有不可胜言者矣。”⁵⁰然而,由于荷兰的入侵,福建又不得不增加开支,自“夷江以来,增兵制器费至二十余万”⁵¹。这些开支以不同的名目加于百姓身上,又加重了社会危机。在这一背景下,福建官府在台湾问题上无所作为。有之,即是在郑芝龙(1604—1661)的建议下,在灾荒之年运送灾民至台湾屯垦。

明代的北方自天启、崇祯以来,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农业歉收,边患严重,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的全面暴发,形成广泛而又持久的农民战争,努尔哈赤率后金军队不断南下掠夺,在内外夹攻下,明朝最终灭亡。与其相比,明朝的东南似乎继续维持着繁荣的表象,但我们深入分析明末东南的社会形势,便可知道:其实以福建为核心的东南区域存在着广泛的社会矛盾。明末东南的繁荣是局部的,主要存在于城市。而广大农村与山区的社会危机相当严重。在这一背景下,官府的主要工作是想方设法安定社会,缓和社会矛盾,对台湾的一切措施都被放在第二位,这是福建官府最终放弃在台湾实现郡县制计划的原因。俗话说,“有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在明代福建疆吏统筹台湾问题上,又证明了这一道理。

〔注 释〕

- 1 关于福建巡抚对台湾的谋划,可参见徐晓望,《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福建,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
- 2 张廷玉等,《明史》,卷九七,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标点本,页 2416。
- 3 朱谋璣,《画史会要》,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 66。
- 4 张廷玉等,《明史》卷九七,页 2416。
- 5 引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页 333。
- 6 龚用卿,《玉堂稿山居集》,卷五,《送吾郡太守慎斋胡公入觐序》,福建省图书馆藏抄本,页 8。
- 7 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 178—179。
- 8 徐晓望,《福建通史·明清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页 296—313。
- 9 徐晓望,《福建通史·明清卷》,页 395—403。
- 10 曹学佺,《曹能始先生石仓全集》,《湘西纪行》卷下,《倭患始末》,明崇祯刊本,页 43。
- 11 《明神宗实录》,卷二六,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 1962 年后影印本,册 51,页 646。
- 12 曹学佺,《曹能始先生石仓全集》,《湘西纪行》卷下,《倭患始末》,页 43。
- 13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東番考》,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 106。
- 14 许孚远,《敬和堂集》,卷七,《海禁条约行分守漳南道》,日本东尊经阁文库藏明刊本,页 11。
- 15 徐晓望,《论晚清对台湾、澎湖的管理及设置郡县的计划》,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第 3 期,页 111。
- 16 许孚远,《敬和堂集》,疏卷,《乞勘灾荒疏》,日本东尊经阁藏明刊本,页 30。
- 17 许孚远,《敬和堂集》,疏卷,《乞勘灾荒疏》,页 36。
- 18 许孚远,《敬和堂集》,疏卷,《乞勘灾荒疏》,页 30。
- 19 许孚远,《敬和堂集》,疏卷,《乞勘灾荒疏》,页 37。
- 20 阳思谦等,万历《泉州府志》,卷十一,《水寨军兵》,万历四十年原刊,福建泉州,泉州市志编纂委员会 1985 年影印出版,页 10。
- 21 许孚远,《敬和堂集》,疏卷,《迄免征积逋疏》,页 65。
- 22 许孚远,《敬和堂集》,疏卷,《迄免征积逋疏》,页 68—69。
- 23 方豪,《台湾早期史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4,页 114。
- 24 《明神宗实录》卷五四六,册 64,页 10352—10353。
- 25 张燮,《东西洋考》,卷十二,《逸事考》,页 250—251。
- 26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册 64,页 10558—10559。

- 27 徐晓望,《论明代台湾北港的崛起》,北京,《台湾研究》,2006,第2期,页48。
- 28 陈宗仁,《北港与“Pacan”地名考释:兼论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之际台湾西南海域贸易情势的变迁》,台北,《汉学研究》,第二十一卷第二期,2003,总第43号。
- 29 曹学佺,《曹能始先生石仓全集》,《湘西纪行》卷下,《海防》,页45。
- 30 徐晓望,《晚明台湾北港的事变与福建官府》,台北,台湾各姓渊源研究学会编,《台湾源流》,2005年冬季刊,卷三三,页145。
- 31 姚旅,《露书》卷九,《风篇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页703。
- 32 徐晓望,《论晚清对台湾、澎湖的管理及设置郡县的计划》,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第3期,页113。
- 33 曹学佺,《曹能始先生石仓全集》,《湘西纪行》,卷下,《赋役》,页21。
- 34 陈寿祺,道光《福建通志》,卷十九,《田赋志》,清同治十年刊本,页24。
- 35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七,《同安溪南蠲税功德碑》,福建省图书馆1980年据崇祯本抄,页45。
- 36 曹学佺,《曹能始先生石仓全集》,《湘西纪行》,卷下,《赋役》,页22—23。
- 37 黄河清,《送太守李君之任泉郡序》,录自陈国仕辑录,《丰州集稿》,福建省南安市,南安县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刊本,页277。
- 38 傅夏器,《袁莪溪泉州府节推序》,录自陈国仕辑录,《丰州集稿》,页281。
- 39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三,《浯洲建料罗城及二铕城议》,页16。
- 40 徐晓望,《晚明台湾北港的事变与福建官府》,《台湾源流》,2005,卷三三,页140。
- 41 周婴,《远游篇》,附《东番记》,明末刊本,福建师范大学藏手抄本,页37。
- 42 曾异,《纺授堂文集》,卷一,《为福州海防聂公寿序》,明崇祯十五年刊本,页11。
- 43 林烜等,万历《福州府志》,万历四十一年刊本,卷二六,《户口》,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丛刊》,1990年影印本,页5。
- 44 夏允彝,崇祯《长乐县志》,卷四,《食货志》,《户口》,崇祯十四年刊本,页1—2。
- 45 蔡克恭等,万历《南靖县志》,卷三,《赋役志》,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胶卷,页8—9。
- 46 曾异,《纺授堂文集》,卷一,《为三司公贺闽督抚都御史肖公报政序》,页44。
- 47 曾异,《纺授堂文集》,卷六,《海寇平贺某抚公启》,页16。
- 48 曾异,《纺授堂文集》,卷六,《海寇平贺某抚公启》,页18。
- 49 施德馨,《襄壮公传》,录自施琅,《靖海纪事》,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刊本,页23。
- 50 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二三,《请开海禁疏》,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页31—32。
- 51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三,《浯洲建料罗城及二铕城议》,页16。

赛因诺颜部贵族与清朝 ——兼论清朝的北方民族政策

王希隆 著

赛因诺颜部原为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属部¹，其始祖图蒙肯以护持黄教著名。顺治(1644—1661)年间，清朝令图蒙肯子丹津喇嘛“岁贡九白，如三汗例”，赐“遵文顺义号”。康熙(1662—1722)年间，丹津喇嘛孙善巴(?—1707)以军功劳绩晋爵和硕亲王。雍正三年(1725)，善巴再从弟策凌奉命率赛因诺颜部十九札萨克从土谢图汗属下析出，自成一部。从此，喀尔喀蒙古由原先的三大部改为四大部，而四部中唯赛因诺颜部封有两位亲王。在稳定北部疆域，抵御与平定准噶尔战争中，赛因诺颜部是清朝“倚为长城”的一支中坚力量。

对赛因诺颜部贵族与清朝关系的考察，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喀尔喀蒙古内部的诸多问题，也可以加深对清朝北部边疆民族政策的认识与理解。国内学者杜家骥、台湾学者李毓澍，前苏联学者沙斯季娜，日本学者若松宽、冈洋树等人，在赛因诺颜部研究方面已有一些很好的成果²。本文拟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赛因诺颜部的崛起及其贵族与清朝的关系作一考察述论，并就赛因诺颜部自成一部等提出自己的认识。

一 图蒙肯及其后裔丹津喇嘛、 善巴的活动及其与清朝之关系

1. 赛因诺颜部始祖图蒙肯护持黄教的活动

赛因诺颜部始祖图蒙肯是成吉思汗后裔，也是著名的喀尔喀黄教护法王。

明中期，元太祖十五世孙达延车臣汗统一大漠南北，诸子徙漠南，唯幼子格埒森札札赉尔瑋台吉留漠北，“号所部曰喀尔喀，析其众万余为七旗，授子七人领之，分左、右翼。”³格埒森札札赉尔第三子诺诺和，掌管喀尔喀左翼，号伟徵诺

颜。诺诺和生有五子，长子名阿巴岱，即土谢图汗袞布之祖父；四子即图蒙肯。

图蒙肯，号昆都仑楚琥尔，生年不详，他的活动记载时期是在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万历（1573—1620）年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赴漠南蒙古弘扬佛法，驻锡归化城，图蒙肯长兄阿巴岱前往谒见。《蒙古游牧记》记此事云：

格埒森札第三子诺诺和掌左翼，号伟徵诺颜。子五：长阿巴岱，赴唐古特谒达赖喇嘛，迎经典归，为众所服，始称汗，号斡齐赉巴图……⁴

阿巴岱“迎经典归”，在喀尔喀蒙古地区建立了首座藏传佛教寺院额尔德尼昭（汉名光显寺）。但当时喀尔喀蒙古尚未独尊黄教，图蒙肯为确立黄教在喀尔喀蒙古的独尊地位不遗余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黄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赞赏与重视。《蒙古游牧记》又载：

初喀尔喀有所谓红教者，与黄教争。伟徵诺颜诺诺和第四子图蒙肯尊黄教，为之护持。唐古特达赖喇嘛贤之，授赛音诺颜号，令所部奉之视三汗。⁵

“赛因”意为好；“诺颜”意为长官。此为赛因诺颜部名号之起源。这里所说的“唐古特达赖喇嘛”，当为四世达赖云丹嘉措。云丹嘉措生于万历十七年（1589），被确认为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后，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经西藏三大寺代表迎请，入藏坐床，万历四十四年（1616）底圆寂于拉萨哲蚌寺。

图蒙肯是喀尔喀蒙古王公中最为著名的黄教护法王，据说：

这位大诺颜，除了没有汗号外，勇武贤智备具。醉心于七和硕的政教合一，首先开创了西藏巡礼的惯例。参拜了两释迦像和班禅仁波且、善巴钦波、德茂化身等，以盛大的供物，供养色拉、哲蚌、甘丹三寺和扎什伦布寺等大小寺院的众僧。当建立一切智者云丹嘉措的银舍利塔时，奉献了一万两银子，迎请（达赖四世云丹嘉措的）尊贵的帽子作为供养，由于成为银舍利塔的施主，班禅大一切智者给予“法王无忧苦者昆都仑楚琥尔”的名号，刻有这一名号的银印被放在释迦佛像的供物内三日后取出。⁶

如果“首先开创了西藏巡礼的惯例”的说法确实,图蒙肯自应是喀尔喀蒙古贵族中最先赴西藏朝觐礼佛的王公。关于这次入藏的时间,据说是在云丹嘉措圆寂后的第二年(万历三十二年,即1617年,藏历火蛇年秋季)。时当藏巴汗禁止达赖转世,西藏黄教处于危急之时。图蒙肯与土默特台吉罗卜臧丹津联合率军进藏,修建灵塔,举行葬礼,并将云丹嘉措的舍利迎回喀尔喀供养⁷。这一活动在西藏和喀尔喀蒙古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图蒙肯因此得到了“昆都仑楚琥尔”的称号,进一步受到黄教领袖们的重视。

图蒙肯大约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经四世班禅确认,次年(1642)在与杭爱山相接的哈苏地方呼吉勒图出生的一世札雅格根罗布桑普稜,其前世即“被颂为勇武和贤智的诺颜昆都仑楚琥尔。”换言之,一世札雅格根即图蒙肯的化身。由此形成了黄教在喀尔喀的三大活佛系统之一——札雅格根也即札雅班智达转世系统(另两个为温杜尔格根也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额尔德尼班智达也即喇嘛音格根转世系统)。这三个活佛转世系统历久不衰,在喀尔喀蒙古家喻户晓,有着重要的影响。光绪十八年(1892)进入喀尔喀蒙古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考察家波兹德涅耶夫记到:

在喀尔喀各个系统的呼毕勒军中,只有少数的几位呼毕勒军受到了世界的注意……如果您问喀尔喀人,蒙古的呼毕勒军中哪几位地位最高?他会告诉您:“察罕格哩图汗——哲布尊丹巴,沙拉格哩图汗——札雅班第达,哈拉格哩图汗——喇嘛音格根。”即白帐汗哲布尊丹巴,黄帐汗札雅班第达、黑帐汗喇嘛音格根。这三位胡图克图的膳房(其中执役的大多为平民)确实盖着上述颜色的毡子:哲布尊丹巴用白色,札雅班第达用黄色,喇嘛音格根用黑色。⁸

万历年间,经过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不懈努力,黄教在漠南蒙古深入人心,并传入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与此同时,在漠北喀尔喀蒙古左翼贵族阿巴岱和图蒙肯的倡导下,各部贵族相继皈依黄教,并从黄教领袖达赖那里得到了梵封汗号。左翼称汗者有二,右翼称汗者有一,形成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三汗部。赛因诺颜部隶于左翼土谢图汗部,其始祖图蒙肯虽无汗号,但由于他居于喀尔喀蒙古护法王的地位,具有尊崇护持黄教的重大影响,故四世达赖“令所部视之如三汗”。四世班禅则认定札雅格根一世是图蒙肯的化身。在喀尔喀蒙古各

部以尊崇护持黄教弘扬佛法扩大影响,提高本部地位的过程中,图蒙肯积极而出色的护法活动使赛因诺颜部在喀尔喀蒙古中居于独特的地位,为该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丹津喇嘛的宗教活动及其政治动向

图蒙肯有子十三⁹,他卒后赛因诺颜部由次子丹津喇嘛统领。丹津喇嘛继承了其父尊崇护持黄教的传统事业,据说:

[他]穿着喇嘛和诺颜的衣服,为了二规[世间和宗教的规律]很好的保持了法的事业和政治的一致,是常人智慧所达不到的。五次去卫藏,给胜者父子[达赖与班禅]以莫大的赠品,供养色拉、哲蚌、甘丹三寺与扎什伦布寺等大小寺院的众多的僧人。在蒙古,修建了如甘丹纳姆吉勒斯和达西群培的华丽房舍等,以善行和经世之举,在全体喀尔喀有着很大的权力。¹⁰

继四世达赖云丹嘉措赠予图蒙肯赛因诺颜号之后,丹津喇嘛又从五世达赖罗桑嘉措那里得到了“诺们汗”的梵封名号。

丹津喇嘛与其父的化身一世札雅格根罗布桑普稜结为善缘。顺治十七年(1660),罗布桑普稜首次赴西藏学经,行前拜谒了丹津喇嘛,他的《自传》中提到:

庚子年[1660],去拜谒诺们汗,报告去西藏等事,甚是欢喜,得到了僧服一套、银壶、以五匹西藏马为首的良马四十匹、骆驼十头、蒙古茶十包等赠物。然后到哲布尊丹巴身旁接受了按手礼,被允许到西藏去。¹¹

一世札雅格根罗布桑普稜是一世哲布尊丹巴的弟子,去西藏之前,他曾三次接受一世哲布尊丹巴的按手礼,受到长寿灌顶。丹津喇嘛资助一世札雅格根赴西藏学经修行,对于提高札雅格根一世在喀尔喀蒙古黄教僧侣中的地位,以及扩大赛因诺颜部的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

据说丹津喇嘛在第五次赴西藏熬茶途中,病逝于拉萨,他不久也有了化身,在扎什伦布寺修行¹²。

丹津喇嘛统领赛因诺颜部时期,正是明清交替之际。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

两代的经营,大清政权在东北建立,影响远及于喀尔喀蒙古。崇德三年(1638),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向清朝进“九白之贡”,建立了政治联系。《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提到丹津喇嘛也参与了这次政治活动:“遣使通贡,优赉遣归。”¹³这次通贡很可能是以三汗的名义,由七和硕代表共同组成的一个喀尔喀使团。

喀尔喀蒙古与清朝的政治联系建立后,又经历了一些波折。顺治三年(1646)因漠南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斯叛逃漠北,土谢图、车臣二部援腾机斯,为豫亲王多铎所败,土谢图汗部属又掳掠漠南蒙古巴林部人畜。喀尔喀蒙古与清朝一度失和,至顺治十二年(1655)方恢复关系。《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记载了丹津喇嘛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动向:

顺治四年,以偕其族土谢图汗衮布等合兵援苏尼特部叛人腾机思,诘责之。七年,遣子额尔德尼诺木齐上书乞好,诏偕衮布约誓定议。十一年额尔德尼诺木齐复奉表至,谕曰:尔奏言喀尔喀左翼四旗皆尔统摄,凡有敕谕罔弗遵行,今即如所请,可速飭尔部长遣子弟来朝,有不遵者即行奏闻。¹⁴

额尔德尼诺木齐两次出使活动,反映出喀尔喀三汗与清朝失和后,丹津喇嘛争取与清朝恢复和好关系的政治动向。顺治十二年,喀尔喀三汗及赛因诺颜部部长丹津喇嘛,各遣子弟来朝乞盟。诏赐盟宗人府,设八札萨克,仍分左、右翼,“命丹津喇嘛领左翼札萨克之一,岁贡九白,如三汗例。十八年(1661),赐遵文顺义号,给之印。”¹⁵

顺治十二年会盟,是喀尔喀三部与清朝政治关系恢复的标志,也是双方政治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起点。会盟前土谢图汗衮布刚刚去世,其子察珲多尔济继掌左翼,当时尚为一青年¹⁶。丹津喇嘛为察珲多尔济之祖父辈¹⁷,在喀尔喀左翼中居于元老的地位,其政治动向当对察珲多尔济有直接的影响。换言之,丹津喇嘛的政治动向和活动对促成此次会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清朝赐丹津喇嘛遵文顺义之号,是对其政治动向与活动的肯定。

3. 亲王善巴及其在平准战争中的贡献

顺治年间,清朝赐丹津喇嘛遵文顺义号,命“岁贡九白,如三汗例。”时赛因诺颜部为喀尔喀八札萨克之一,仍隶于左翼土谢图汗属下。康熙初年,丹津喇嘛

卒,子塔斯希布继任赛因诺颜部长,不久即卒。塔斯希布之子善巴继任札萨克后,诏赐善巴信顺额尔克岱青号¹⁸。

善巴博学多识,文武兼备,是当时喀尔喀蒙古贵族中杰出人物。善巴对本民族的历史尤为关注,于康熙十六年(1677)完成了《阿萨格拉齐史》。这部著作从成吉思汗的先世写起,截至17世纪中期,记载了5个世纪中发生的事件,被列为17世纪蒙古族学者们完成的5部蒙古编年史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由于黄教在蒙古各部的广为传播,蒙古诸汗起源于印度和西藏的说法风行一时,而善巴不囿于俗说。前苏联学者沙斯季娜对《阿萨格拉齐史》评论说:“善巴有时却写出了对当时所确立的蒙古史学观念的独特的批评性意见,正是这个情况使他的著作特别引人注目。善巴在蒙古史学上头一个对蒙古诸汗起源于印度和西藏的说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¹⁹

善巴继承了祖父丹津喇嘛的政治立场和原则,长期与清朝保持着密切联系。特别是在康熙朝中期与准噶尔部的战争中,善巴的政治立场和活动对赛因诺颜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1632/1644—1697)早有兼并喀尔喀蒙古的图谋。康熙二十七年(1688)五月,趁喀尔喀左、右翼内讧之机,噶尔丹率军3万,越杭爱山大掠喀尔喀牧地。土谢图汗长子噶尔旦多尔济率军迎击,在忒木尔地方被准军击败,噶尔旦多尔济弃军先逃,随从生还者仅有8人²⁰。噶尔丹乘胜麾军进击哲布尊丹巴驻地,焚毁其坐床寺庙额尔德尼昭。“折卜尊丹巴携土谢图汗妻与子媳及喇嘛班第等,共三百余人夜遁。喀尔喀通国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等,纷纷南窜,昼夜不绝。”²¹

土谢图汗整顿部属迎击,善巴率赛因诺颜部众从征,与准军激战于鄂罗会诺尔。关于此次战役之经过,史载:

八月初三、四等日相遇于鄂罗会诺尔之地,鏖战三日,厄鲁特兵夜袭善巴额尔克带青之营,破之。喀尔喀属下诸台吉星散,土谢图汗独身力弱,乃越瀚海,奔至折卜尊丹巴所。²²

这一记载虽很是简略,但从中已能看出:持续了三天之久的鄂罗会诺尔战役极其激烈;土谢图汗方面,善巴所属敢战,是一支中坚力量,只是在准军夜袭善巴军营成功之后,“诸台吉星散”才成败局,表明善巴及其所率的赛因诺颜部众在

此次会战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当噶尔丹自杭爱山转掠克鲁伦时,喀尔喀各部多已溃走,而善巴之从弟托多额尔德尼“独拒战,杀伤略相当,贼众稍衰,有两人共一骑及削木为杖者”²³。这是噶尔丹进军喀尔喀初期,在连战连胜、气势最盛时遭到的一次少有的打击。

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诺尔会盟,善巴受封多罗郡王,仍兼札萨克,领赛因诺颜部,管北路右翼中军事。多罗郡王是赛因诺颜部贵族最早得到的封爵。

康熙三十五年(1696),出塞清军在昭莫多尽歼噶尔丹主力,叙功,善巴晋封和硕亲王。《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善巴的军功劳绩云:

理藩院奏曰:喀尔喀郡王善巴,擒解噶尔丹伊喇古克三库图克图所差煽惑六鄂罗斯之奸细尼尔巴格隆;又向噶尔丹使人博喇特和卓问明噶尔丹事情来报;又遣其人德得黑舍津,于库克纳他喇纳侦探,收获旺舒克部落巴图达等五户来解;又遣其副都统扎尔等,至库伦拜尔齐尔侦探;又善巴之诸子,自巴尔哈苏台地方以外,遣人侦探;且善巴奏言,不可容留噶尔丹在克鲁伦;是役效劳于西路大军中,尽出所有马匹,给军士乘用……上命以郡王善巴为亲王……其原封善巴信顺之号……应仍存之。²⁴

《皇朝藩部要略》卷4,《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二》康熙三十五年五月条记到:

先是善巴遣属札勒等赴库伦伯勒齐尔侦贼踪,比还,报噶尔丹党博罗特和卓潜入界,善巴捕获之。奏噶尔丹若久居巴颜乌兰,必窥塞肆掠,请敕大军速剿,上趣其言。及大军行,谕所属选兵千,善巴增选千五百赴调,以健马给官兵,且献羊助食。昭莫多之战捷,降其众五百五十九,军旋……晋封和硕亲王,仍留信顺旧号。

综合两种记载,善巴晋爵亲王的功绩有四:多次遣人侦探了解敌情,使清朝及时掌握了噶尔丹的动向;充分认识到噶尔丹盘踞漠北的危害,力请迅速出军剿灭;尽调所部兵丁1,500名从征,并助出征清军羊只、健马;昭莫多之战,多有俘获,建有军功。这些功绩表明,多伦会盟后,善巴以其坚定的政治立场、超众的远见卓识及积极的军事活动,在诸多喀尔喀蒙古王公中居于突出的地位,正如沙斯

季娜所说：“善巴札萨克以一个全心全意倾向于满清的封建主出现在我们面前。”²⁵

时喀尔喀蒙古诸部晋爵亲王者，除善巴外，只有扎萨克图汗部的策旺扎卜。善巴受封亲王，所领之赛因诺颜部虽仍隶于土谢图汗属下，但随部长晋封亲王爵位，该部之政治地位显然已有提高。

善巴卒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长子达什敦多布“袭札萨克和硕亲王，寻授盟长”²⁶，领赛因诺颜部。但赛因诺颜部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是在善巴再从弟策凌崛起之后。

二 清朝培养并倚为长城的超勇亲王额驸策凌

1. 策凌生年与尚公主诸问题考

策凌之祖父为图蒙肯第八子丹津，号班珠尔。父纳木札勒，号约苏图伟徵阿海。纳木札勒生有二子，长子即策凌，次子名恭格喇布坦。

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率军攻入喀尔喀蒙古牧地。善巴率赛因诺颜部众随土谢图汗抵御准军，在鄂罗会诺尔会战中遭准军袭击并溃逃漠南之时，策凌尚年幼。其牧地塔米尔遭准军攻掠后，家族残破，牲畜尽失，辗转流徙。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祖母格楚勒哈屯²⁷的带领下，策凌兄弟及裔属一百三十余户南下投奔清朝。

策凌随祖母投奔清朝时有多大年龄？由于策凌生年不见记载，只能根据相关史料进行推测。就笔者所见，学界唯蔡家艺、杜家骥二先生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蔡家艺先生据《啸亭杂录》卷二《超勇亲王》条中“王时弱冠，负祖母单骑叩关降”的记载，认为：“‘弱冠，’古时男子二十岁之称谓。策凌偕祖母投奔清朝事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以此类推，可知其生于康熙十二年。”²⁸

杜家骥先生认为：“策凌兄弟二人由其祖母携至北京依附清廷……当时他们大约都不到10岁。”²⁹

蔡、杜二先生所言都有一定之道理，但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认识。笔者梳理有关记载，进一步补充说明如下：

1. 《蒙古游牧记》卷八，《外蒙古喀尔喀齐齐尔里克盟游牧所在·喀尔喀赛因诺颜部》载乾隆帝悼策凌《御制长律》，有“丁年尚主令名闻”句，丁年可理解为

二十余岁之青年。策凌尚公主之年为康熙四十五年(1706),如以康熙十二年(1673)为生年,尚公主时已34岁。

2.《皇朝藩部要略》卷四,《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二》载,策凌兄弟至京时,康熙帝“念其幼……”按“幼”当不过10岁,但这是对其兄弟二人笼统的说法,或恭格拉布坦尚不足10岁,而策凌已经10岁或已10岁出头。

3.《啸亭杂录》卷二,《超勇亲王》条载:“王时弱冠,负祖母单骑叩关降。”似策凌携其祖母赴京。但《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二,康熙三十一年(1692)七月己巳条载:“格楚儿喀屯以属裔来归……应将格楚儿喀屯及其两孙并属裔一佐领,附于镶黄蒙古旗下。”而且《皇朝藩部要略》等书中提到格楚勒哈屯携两孙来归,都有康熙帝“念其幼”的记载。如果我们把昭槁关于策凌的几条笔记内容与《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中的相关记载作一比较,显然昭槁笔记多带有文学的色彩,不实之处甚多。

4.《皇朝藩部要略》卷五,《外蒙古喀尔喀要略三》载,乾隆六年(1741),“寻以策凌年老,谕移军营于塔米尔。”古时之“老”有各种解释,但是年策凌当不会小于60岁。

据此,笔者认为,策凌生年应当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前后,如以康熙二十二年为生年,三十一年(1692)策凌随祖母格楚勒哈屯自塔米尔来归时年已10岁,四十五年(1706)尚公主时为24岁,乾隆十五年(1750)卒时年已68岁。

满蒙联姻是清朝长期奉行的国策。康熙中期以前,清皇室主要与漠南蒙古贵族联姻。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后,出于巩固北部疆域的政治目的,清皇室开始关注与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联姻。与此同时,康熙帝创设了教养内廷制度,即将蒙古王公贵族子弟收养于宫中,与诸皇子一起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教育。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蒙古王公贵族子弟,不仅具有很高的满汉文化和骑射勇武素质,而且对清朝有着很强的向心力,与清皇室习俗相近,情感密切,是皇室公主、格格联姻的首选对象。据杜家骥先生研究,最早与诸皇子接受内廷教养的蒙古贵族子弟即策凌与其弟恭格喇布坦³⁰。

康熙三十一年七月,策凌兄弟随祖母至京,康熙帝“念其幼,为图蒙肯嫡嗣,故施恩尤渥”³¹。“诏授策凌三等轻车都尉,赐居京师,教养内廷。”³²策凌与诸皇子一起受到了良好的皇室教育,他“禀性朴诚,赋质沈毅”,有大器之才,加之为喀尔喀黄教护法王图蒙肯之后,“裔本名藩”³³,更为康熙帝看重。四十五年(1706)九月,康熙帝以第十女纯悫公主(1685—1710)下嫁策凌,³⁴并授和硕额

驸,不久,又赐贝子品级。这是继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孙敦多布多尔济尚康熙帝第六女恪靖公主³⁵之后,清皇室与喀尔喀蒙古贵族的又一次重要联姻。与策凌一同教养于内廷的恭格喇布坦,尚皇长子允禔第三女,授固山额驸,居于京师。

纯悫公主下嫁策凌后,“令仪益茂,式著贤声”,但享年不永,只与策凌共同生活了三年半时间,四十九年(1710)三月薨于京师,时年仅26岁。康熙帝感伤不已,特命“抚遗孤于京邸……卜葬于近郊”³⁶。策凌则奉命返回了漠北塔米尔牧地。

策凌与公主生有子嗣,这从康熙帝特命“抚遗孤于京邸”可以得到证实。策凌生子八人,列谱者六。长子成袞札布(?—1771),次子车布登札布,三子苏巴什里,四子札木禅多尔济,五子额琳沁多尔济,六子西勒格图呼图克图。另有二子,为其妾所生,后为准噶尔掠去,不传名。列谱之六子中,成袞札布、车布登札布二人也非公主所生。满文朱批奏折档案中记有:

康熙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允祉等奏:窃九月初三日,系六公主下嫁喜日。臣等查前诸公主下嫁例,未有臣等亲送之处,只俟下嫁之后,臣等经奏准看望公主。今于十三日应否臣等亲送,再公主下嫁后,臣等亲去看望公主之处,伏请皇父谕旨。朱批:不必去。³⁷

这里所说的六公主即康熙帝之第十女纯悫公主,不计殇,为第六女。据此,策凌与公主成婚之时间为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初三日。策凌之次子车布登札布生于康熙四十四年³⁸,与其兄成袞札布自非公主所生。换言之,策凌在尚公主以前已有一妻,并已生子。因此,公主所生之子很可能为第三子苏巴什里。

2. 赛因诺颜自成一部与策凌在喀尔喀蒙古王公中之地位

当策凌返回塔米尔牧地时,赛因诺颜部部长、亲王善巴已卒,³⁹其长子达什敦多布“袭札萨克和硕亲王,寻授盟长”⁴⁰,领赛因诺颜部。但数年后,善巴后裔领赛因诺颜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康熙五十四年(1715)春,策妄阿拉布坦犯哈密,清准战事再起。九月,策凌来朝,奉命赴北路军营防御策妄。五十九年(1720)七月,策凌与土谢图汗部辅国公巴海,札萨克图汗部贝勒诺尔布班第和札萨克伊达木札布等,随振武将军傅尔丹(1683—1753)进击准噶尔。清军出布拉罕,至格尔额尔格,擒准噶尔宰桑

贝坤,斩杀、俘获近七百人,并焚毁准军屯集于乌兰呼济尔的粮草,回师途中,又设伏于哈达青吉勒,再次重创尾追准军。⁴¹此次出击,策凌首建军功,次年(1721),授札萨克。

雍正帝即位,为加强阿尔泰一线防务,倚重策凌,特封为多罗郡王。附牧于察哈尔蒙古镶黄旗下的策凌属裔佐领,奉命调往北路军营,随策凌效力。⁴²雍正帝又特封策凌弟恭格喇布坦为多罗贝勒,命赴北路军营,随兄驻防,但不幸卒于途中。⁴³雍正二年(1724)初,策凌等入觐,时策妄遣使议和,廷议撤回北路大军,雍正帝谕王大臣等:“额駙策凌、贝勒博贝,俱在阿尔泰驻扎年久,地方情形,皆所悉知,现皆在京,可详询阿尔泰一路兵丁如何撤回,及驻防兵丁应于何处安设之处,确议具奏。”后议定阿尔泰留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兵二千名驻防,由策凌及土谢图汗部郡王丹津多尔济(?—1738)、札萨克图汗部贝勒博贝统领调遣,三人分别被任命为管辖喀尔喀中路、左翼、右翼兵丁副将军,各授印信⁴⁴。值得注意的有两点:1、喀尔喀蒙古旧分左翼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右翼为札萨克图汗部,并无中路之设,这里首次将赛因诺颜部兵丁作为中路兵丁;2、喀尔喀各部旧无副将军,“所部有副将军自此始。”⁴⁵不久,诏命三将军所统兵隶上三旗,策凌军用正黄旗纛,丹津多尔济、博贝军分用镶黄、正白旗纛,更突出了赛因诺颜部之地位。

雍正三年(1725),正式令策凌率赛因诺颜部近族亲王等十九札萨克,自成一部,称喀尔喀中路。《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云:

雍正三年,上以所部系出赛因诺颜,较三汗裔繁衍,而额駙策凌自简任副将军,劳绩懋著,命率近族亲王达什敦多布、贝勒纳木札勒、齐素咙,贝子策旺诺尔布,辅国公阿努哩、敦多布额琳沁、札木禅、旺札勒、台吉格木丕勒、齐旺、锡喇札布、达尔济雅、根敦、车布登、巴朗、延达博第、呢玛、特克什、诺尔布札布,凡十九札萨克,别为一部,以其赛因诺颜号冠之,称喀尔喀中路,不复隶土谢图汗。喀尔喀有四部,自此始。⁴⁶

这是清朝对喀尔喀蒙古旧制的重要变革,其意义有二:一是自此赛因诺颜部不再是土谢图汗属部,而是与土谢图、车臣、札萨克图三部地位相等,喀尔喀蒙古自此由原来的三大部改为四大部(或称四盟);二是善巴长子达什敦多布自康熙四十六年(1707)“袭札萨克和硕亲王,寻授盟长”⁴⁷,但正式以赛因诺颜部为喀尔

喀中路时,却是令策凌领赛因诺颜十九札萨克,达什敦多布的盟长地位名存实亡。次年(1726),达什敦多布以年迈为名乞休,清朝命其长子喇嘛扎布袭亲王爵。⁴⁸

雍正三年(1725)分设喀尔喀中路之后,策凌虽尚为郡王爵位,而实际上已成为喀尔喀四部中最受朝廷倚任的王公。雍正五年(1727)五月,中俄恰克图会谈,隆科多、策凌、四格、图理琛等奉命赴楚库河与俄使萨瓦议界,是清朝谈判代表中唯一的一位喀尔喀王公。俄国使臣萨瓦抵达边界布连斯奇河畔时,见到“中国朝廷派往处理边境事务的两位大臣(第三名大臣图理琛是与使臣同来的),一位是蒙古王公、将军、博格德汗的驸马策凌郡王,他属下约有五千蒙古人,另一名是皇帝的舅舅隆科多……”⁴⁹中俄双方会议八次,未有结果,⁵⁰而隆科多私抄玉牒事发,逮京治罪,改由策凌担任首席谈判代表。⁵¹策凌与萨瓦划定东起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彦岭之中俄中段边界,奏准立石定界。关于此次谈判中策凌之功过,学界多有评论;这里不作赘述,但仅以担任首席谈判代表而言,可见朝廷对其之倚重程度及其在喀尔喀蒙古王公中之特殊地位。

3. 策凌建立之奇功与出任赛因诺颜部长

策凌善用兵,忠而勇,具大将之才。他针对准噶尔骑兵善于驰突,而喀尔喀部众无军纪约束,临战易溃败的弱点,对部下严加训练,“每游猎及止营,皆以阵法部勒,万众森严如对垒,由是赛因诺颜一军雄漠北”⁵²,成为喀尔喀蒙古中的一支劲旅,在抵御准军,护卫喀尔喀牧地的战役中建立了奇功。

噶尔丹策零(1695—1745)即位后,准噶尔进入了全盛时期。雍正八年(1730)冬,清准战事再起,准军声东击西,掠西路科舍图卡伦,围鲁克沁等城,其主力则集中于北路。九年(1731)夏,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冒进,被准军围困于和通淖尔,万余官兵退回科布多大营者仅十分之二。秋,准军乘胜自和通淖尔进窥图垒、茂海诸界,策凌奉命偕翁牛特部贝子罗卜藏等率兵迎击。此时,准部名将大、小策凌敦多卜率军三万进取喀尔喀,得知科布多、察罕度尔驻有重兵,防守严密,遂屯军于苏克阿勒达呼,命部将海伦、曼济各领兵三千,分道劫掠喀尔喀游牧。振武将军顺承亲王锡保(?—1742)命策凌与土谢图汗部亲王丹津多尔济率喀尔喀蒙古官兵攻击苏克阿勒达呼准军大营。据锡保折奏:

九月二十日,臣令王丹津多尔济、额駙策凌等合兵邀击贼于苏克阿勒达

呼。二十一日至鄂登楚勒,遣台吉巴海等领兵六百名,夜入大策零敦多卜贼营,擒贼三人而还。大策零敦多卜遣贼将袞楚扎卜、锡喇巴图鲁率兵三千来追,巴海等诱至鄂登楚勒大营。二十二日,王丹津多尔济、策凌列阵力战,自辰至午,斩贼将锡喇巴图鲁,其锡喇等俱负重伤,率贼败遁。我兵复擒杀数百余贼。是夜策零敦多卜等即移营台西里山。二十五日贼将曼济亦败北归营,俱自哈卜塔克拜塔克一路遁去。⁵³

锡保选满洲蒙古兵四千名,令丹津多尔济、策凌等分路追击,至登达勒毕山,准军已逾阿尔泰山而去。鄂登楚勒之战重挫准军锐锋,时称北征第一战功。⁵⁴ 诏晋封策凌和硕亲王,赏银万两,“寻授喀尔喀大札萨克。”⁵⁵ 关于喀尔喀大札萨克一职,杜家骥先生认为,指统辖赛因诺颜部 24 旗的大札萨克,在清代蒙古的诸部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一认识是很有道理的。问题在于为何要设大札萨克? 笔者认为,以赛因诺颜部为喀尔喀中路时,令策凌领赛因诺颜十九札萨克,达什敦多布的盟长地位已名存实亡,但清朝并未明确策凌为盟长。故任命策凌为大札萨克,实际上进一步强调了策凌在赛因诺颜部的统领地位。

准军锐锋受挫,但主力未受重创。雍正十年(1732)六月,小策凌敦多卜率军三万自奇兰进至额尔德毕喇色钦,策凌偕将军塔尔岱赴本博图山迎击。准军转掠克尔森齐老,策凌偕塔尔岱复赶往截杀,奋战二日。小策凌敦多卜恨鄂登楚勒之战败于策凌,分兵袭击策凌牧地塔米尔,掠其妾及二子,收其牲畜而去。策凌闻讯大愤,回军追击。时准军主力深入喀尔喀牧地,进趋额尔德尼昭,欲劫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策凌偕丹津多尔济等率领满洲、蒙古、索伦、喀尔喀等兵二万余人,奋勇尾追,途中败敌十余次。八月五日,在额尔德尼昭附近之鄂尔坤河畔追及准军主力。小策零敦多卜退踞杭爱山麓,逼鄂尔坤河列阵。策凌令满洲兵背水列阵河南诱敌,蒙古诸军列阵河北,亲率万人伏山侧待战。满洲兵接战即退,准军追逐,策凌率伏军起,迎头痛击,“杀贼万余,尸满山谷。”小策凌敦多卜督余众渡河,蒙古兵趁其半渡时进击,准军大多毙于水中,“河流尽赤”,小策凌敦多卜及残余准军“悉负伤大奔”。三万准军被歼灭大半,“所获器械驼马牛羊无算,”⁵⁶ 此战被称为“光显寺大捷”。策凌“勇冠诸藩”⁵⁷,居首功,赐号“超勇”。因戚属、牲畜被掠,诏给策凌马二千、牛千、羊五千、银五万,令察赈所属失业者,并命在塔米尔筑城,建造宫室。是年冬,诏授策凌固伦额驸,追赠纯惠公主为固伦长公主。”

当策凌等于鄂登楚勒大败准军时,大策凌敦多卜遣被俘之赛因诺颜部人送信与亲王喇嘛扎布,欲行策反,被策凌截获。据被擒之送信人供称:

大策零敦多卜等,付噶尔丹策零寄我王喇嘛札卜之书,并云我等原在一处居住,甚相和好,因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与尔等不睦,各自散居,后尔等投顺中国,当差纳贡,深为尔等憾之。尔等系成吉思汗之后裔,并非人之属下,何不将游牧仍移于阿尔泰,与我会居一处,共享安乐,以联旧好,如有兵戎,协力相拒等语。⁵⁸

这里虽未录噶尔丹策零给喇嘛扎布书信之内容,但噶尔丹策零为何选择赛因诺颜部长喇嘛扎布为策反之对象,值得注意。其后,克尔森齐老之战,“喇嘛扎卜弃军归牧,议削爵论死”,雍正帝念其祖善巴军功劳绩,命削爵免死永远监禁,札萨克亲王爵改授其弟德沁扎布,并撤还一佐领给策凌。⁵⁹善巴后裔的地位因此事受到很大影响。就在次年,策凌配定边左副将军印,进屯科布多,“寻授盟长”。而善巴后裔德沁扎布于“乾隆十六年授所部副将军,寻授副盟长。”⁶⁰赛因诺颜部部长由善巴家族转入善巴再从弟策凌家族。

4. 任定边左副将军之策凌及其卒后之赐典

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设立于雍正十一年(1733)正月,初名靖边左副将军。雍正七年(1729)三月,设靖边大将军统北路大军征讨准噶尔,由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出任⁶¹。九年(1731)十一月,改任顺承亲王锡保⁶²。经雍正八年(1730)鄂登楚勒之战,十年(1732)克尔森齐老、额尔德尼昭之战,策凌威名大震。十一年(1733)正月,“命铸靖边左、右副将军印二颗,交大将军收贮,以备额驸策凌等调遣满洲蒙古兵丁之用。”⁶³五月,策凌奉命掌管靖边左副将军印信⁶⁴。不久,锡保获罪革职,多罗平郡王福彭出任大将军,“靖边”名号改为“定边”。十月,定边大将军多罗平郡王福彭折奏:

本月十九日,臣遵旨将定边左副将军印信,交额驸策凌掌管,由乌里雅苏台起程,前赴科布多,其定边右副将军印信,亦交额驸策凌带往。⁶⁵

这是策凌出任定边左副将军的最早记载,由此还可得知,副将军初设时为两

员,策凌尚带有定边右副将军印。

策凌任定边左副将军之后,清、准之间进入议和时期。噶尔丹策零提出阿尔泰原为厄鲁特牧地,请由哲尔格西喇呼鲁苏至巴里坤划界分守。雍正帝命征询策凌意见定夺。策凌提出:“至厄鲁特游牧,应以额尔齐斯为止……策妄阿喇布坦在时,其游牧原在河泊克萨里、察罕胡济尔以西,数年以来,渐越额尔齐斯……使伊游牧相逼太近,则防守实难,断勿令过阿尔泰岭,方为善策。”⁶⁶噶尔丹策零不遵,事未定而清朝帝位交替。

乾隆帝即位,元年(1736)正月,定议北路大军撤回,定边大将军庆复回京。诏设参赞大臣二员,协同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办理事务,统喀尔喀蒙古官兵驻乌里雅苏台,分防鄂尔坤。自此,定边左副将军已非定边大将军之副职,而成为喀尔喀最高军政建制。凡喀尔喀一切军政事务,朝廷皆询策凌意见为定夺。因策凌久在喀尔喀军营,祖母居京师,不得朝夕定省,乾隆帝特命策凌第三子苏巴什里将祖母“送归游牧,用慰孝思,并赐治装银五千两”⁶⁷。

乾隆二年(1737)四月,噶尔丹策零遣使来京议划地,先致书策凌,称之为车臣汗,求仍游牧于阿尔泰。策凌献书于朝廷,奉命复书驳噶尔丹策零。策凌书云:

阿尔台乃天定交界,尔父琿台吉时,阿尔台以南原无厄鲁特游牧,自灭噶尔丹博什克图以来,我等建城驻兵其地,众所共知。其不令尔众游牧者,原欲以此为闲地,两不相取,彼此隔远,庶永相和好,不起争端耳。今台吉反云难以让给,试思阿尔台果系谁地?谁能让给?……台吉尚尔饰说,是不愿休息众生也……尔诚遵旨定议,我兵必不为祸始,亦不复向科卜多居住。倘尔复造衅端,我惟坐待其来,并不烦内地兵,惟尽我喀尔喀之力,上报主恩。⁶⁸

十一月,准噶尔使达什、博吉尔至,召策凌驰驿来京主持议和。因噶尔丹策零未指明地界,三年(1738)三月,侍郎阿克敦等与达什、博吉尔赴准噶尔再议。十二月,准噶尔使哈柳随阿克敦等奉表至,乾隆帝再召策凌来京主其议。哈柳提出“循布延图河,南以博尔济昂吉勒图、乌克克岭、噶克察等处,北以逊多尔库奎、多尔多辉库奎至哈尔奇喇、博木、喀喇巴尔楚克等处为界,准噶尔人仍在阿尔泰山后游牧”。此议与策凌提出之原则相合。但哈柳复求托尔和、布延图两卡

伦内移,“诏弗允”⁶⁹。四年(1739)二月,哈柳还伊犁与噶尔丹策零议。十月复至京,请按原议,不复提内移卡伦事。

自与准噶尔议界,策凌三至京师,始定和议。期间哈柳送还策凌供养之大喇嘛罗卜藏西瓦⁷⁰,转达噶尔丹策零欲送还掠去之策凌妾及二子之意。策凌断然拒绝,上奏称:“臣世世受恩深重,前准贼入我游牧,掳二子及使婢一人而去,若等应即自尽,以报国恩。苟且偷生,至今尚在彼处居住,全不知耻。臣欲得此不肖之子何用?且与国事何益?噶尔丹策零性本诡诈,臣若欲得二子,彼必不论可否,妄行干请,所关非小。国事为重,臣断无念子之意。”乾隆帝览奏后谕军机大臣等:“夫父子之道关乎天性,额驸策凌感激皇祖皇考及朕之恩,止图裨益于国家,顾惜大义,不思复与其子相见,朕心深为恻然,思有以奖之。其长子成衮扎布,汉仗好,在军前亦颇效力,著加恩封为世子。”⁷¹

策凌不仅以忠勇著称,被朝廷“倚重长城”⁷²,且勤于军政事务,出任定边左副将军后,多有建树。议和期间,在喀尔喀边界严密布防巡查,以防准军突袭。划界事定后,奉旨勘定喀尔喀游牧,约束各部,与准噶尔各守定界。自大军撤回,乌里雅苏台及鄂尔坤专用喀尔喀兵驻防。策凌总统四部官兵,每年分派参赞大臣赴各部检阅,军容严整者奏明奖赉,军纪散弛者予以严飭。六年,策凌年已老,仍亲往检阅驻防鄂尔昆之喀尔喀四千官兵,奏报称:“器械旗帜俱甚整齐,排列阵式,放枪射箭,俱已熟练……酌议以军营预备奖赏之锦段布匹等加赏……”⁷³七年,副将军青衮杂卜所部防秋兵,“所属兵丁器械全不整飭,又将伊本身开入军营行走之列,希图双俸”⁷⁴,经策凌查出后除名。

乾隆十二年(1747),策凌最后一次从塔米尔来京朝觐。十五年(1750),病重,次子车布登扎布奉命回塔米尔服侍。二月初五日薨。

早在雍正朝出征时策凌即奏明:“愿于歿身后仍归京师,合葬大长公主园寝。”⁷⁵遗言中再次请准归京师,与公主合葬。乾隆帝伤感不已,准合葬公主园寝,令赐银万两治丧,照宗室亲王例考谥建碑,并特命配享太庙,崇祀贤良祠。谥曰“襄”。昭槤称:“外藩得预侑食者,惟王一人。”⁷⁶《御制往清河赐奠诗》曰:

灵輿肃肃驻河滨,归殡佳城别塞云;即此始终怀大义,果然卓犖轶前闻。
中年自是伤哀乐,此日何堪哭感勋。见说漠陲将发引,犹教血泪洒三军。⁷⁷

《御赐八贤良祠祭文》赞曰：

名标竹帛，书崇元祀之文；绩著边陲，礼纪大丞之典。持干戈以卫社稷，夙奇股肱；有凡筵而荐馨香，式彰忠荃。尔定边左副将军固伦额駙和硕超勇襄亲王策凌，禀性朴诚，赋质沈毅。贵为懿戚，两朝之宠遇弥隆；勇冠诸藩，一代之鸿猷克壮。图丹青于麟阁，倚重长城；靖烽燧于龙庭，威行绝塞。英姿飒爽，授旌钺以犹新；大树萧森，叹弓刀之倏谢……⁷⁸

赐典之重，评价之高，为有清一代蒙古王公中所罕见，可见清朝对策凌倚重之程度。但策凌卒后，清朝在喀尔喀构建之长城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父死子代，兄卒弟及，成衮扎布、车布登扎布兄弟二人先后出任定边左副将军，继承其父遗志，为稳定喀尔喀蒙古统一局面，为平定准噶尔统一新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成衮扎布、车布登扎布兄弟的军事活动与建树

1. 成衮扎布一生之活动与建树

策凌卒，成衮扎布袭札萨克和硕亲王爵，继任定边左副将军。上谕军机大臣云：

额駙策凌为国家竭诚宣力，是以皇考加恩封至亲王，授以定边左副将军重任。额駙谋勇之名，准夷莫不慑服，训兵饬备，使喀尔喀宁静无事，实为国家勋戚重臣，不意患病溘逝，其定边左副将军之任，甚属紧要，简任务在得人。伊长子扎萨克和硕亲王成衮扎布，前在军营，著有劳绩，其才具实堪胜任，虽左副将军非世袭之职，而由才器使，有所弗拘，著将成衮扎布授为定边左副将军，其务矢忠勤，效法伊父，训练兵众，安靖地方，以副朕任用之意。⁷⁹

这里强调指出，定边左副将军“非世袭之职”，简任成衮扎布，是因其“前在军营，著有劳绩，其才具实堪胜任。”符合任此职之条件。

成衮扎布自康熙晚年清准战事再起，随父从征，效力疆场，在军旅生涯中已得到很好的磨炼。五十九年（1720）七月，振武将军傅尔丹统北路大军出击，焚准军屯积粮草，擒宰桑贝坤，多有斩获。雍正十年（1732）八月，策凌率军激战额

尔德尼昭,将三万准军歼灭大半,扭转战局。两战,成衮扎布皆有功,授一等台吉。乾隆元年(1736),封固山贝子,授赛因诺颜部副将军。乾隆帝因策凌置被准噶尔掠去之妻、子于不顾,坚持以阿尔泰为准噶尔、喀尔喀之瓯脱地,为之感动,“思有以奖之”,因成衮扎布“汉仗好,在军前亦颇效力,著加恩封为世子”⁸⁰。清制,宗室亲王始封世子,外藩亲王封世子者极少⁸¹。八年(1743),成衮扎布“扈驾诣盛京,赐杏黄辔。”⁸²

成衮扎布就任定边左副将军后,整饬军备,巡查讯界,并查出和托辉特贝勒青衮杂卜等与准噶尔私行贸易,欠账致争等事,奏报朝廷。时,准噶尔接连内讧,战乱频繁,部众离心。成衮扎布严防讯界,探察其内乱信息,及时奏报朝廷,并根据朝廷指示,接纳、接济来投的准噶尔部众。十八年(1753),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所部三千余户来投,成衮扎布奉命“动用官项牛羊,赏给伊等,以为接济”⁸³。准噶尔守边宰桑衮木特率兵二百来追车凌,擅入卡内,“上谕勿纵衮木特还巢”,但成衮扎布未能及时采取措施,致衮木特逸去,受到弘历诘责。不久,额琳沁等蒙古王公不听调遣,成衮扎布未能及时参奏,查问时又意存姑息,乾隆帝震怒,令革去定边左副将军,授为喀尔喀副将军⁸⁴。

二十年(1755)初,大军西征准噶尔,成衮扎布请随征,奉命偕护军统领塔尔玛善赴额尔齐斯督屯田。四月,屯田兵由额尔齐斯移驻伊苏图铿格尔。是年夏,达瓦齐(?—1759)就擒,屯田兵撤回。准噶尔包沁总管阿克珠勒等叛遁,成衮扎布偕塔尔玛善沿途剿擒,在乌隆古等地击斩肯哲颜达什、巴雅尔图等多人,还驻乌里雅苏台。

阿睦尔撒纳(蓄谋反叛,喀尔喀副将军、和托辉特郡王青衮杂卜为其暗通消息,“逢迎怂恿。”⁸⁵阿睦尔撒纳逃逸后,弘历因土谢图汗部亲王额琳沁多尔济未能及时采取行动,令其自尽,致使喀尔喀各部“众心疑惧”。二十一年(1756)五月,青衮杂卜擅自从军前撤回牧地,并派人至乌里雅苏台军中煽惑。一时喀尔喀地区骚乱蜂起,北路驿站被掠,羽书中断,形势急转直下。八月,弘历起用成衮扎布,仍任为定边左副将军,命率军擒拿青衮杂卜。九月二十六日,成衮扎布驰至乌里雅苏台,查阅军营官兵,筹划进剿事宜。针对喀尔喀各部的不同动向,成衮扎布采取了分化、安抚和重点打击的策略。先派遣官员,“晓谕附逆贼青衮杂卜之札萨克等,并和托辉特所属人等,令其协同擒献”;同时,遣人传谕移入青衮杂卜附近地方居住的赤伦、察达克子弟等,“明白开导,晓以利害”;并遣亲信人等往谕与青衮杂卜乌梁海连界居住的贝子朋楚克、公丹拜等,以“翦其羽翼”⁸⁶,断

其归路；接着，他亲率官兵进击，长途奔驰，军锋所指，青衮杂卜余党及受其煽惑者，接踵归降。青衮扎卜势穷，逃往俄罗斯边界。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与俄罗斯交界的杭哈奖噶斯地方被清军追及擒获。捷报传来，弘历以成衮扎布，“实心协力，迅速奏功，甚属可嘉，著加恩赏给黄带，封伊子一人为世子，以奖忠勤。”⁸⁷

时，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噶勒藏多尔济、巴雅尔、扎那噶尔布、哈萨克锡喇、车布登多尔济、尼玛、巴图尔乌巴什等先后反叛并相互攻杀，阿睦尔撒纳趁机自哈萨克返回，与诸台吉宰桑会盟于博罗塔拉，自立为总台吉，势复大振。

二十二年（1757）初，西路大军再次集结于巴里坤，而“将军重任，甚难其人。”弘历以“成衮扎布熟悉蒙古事务”⁸⁸，特选任为定边将军，赐整装银五千两，命带领索伦兵丁，驰往巴里坤军营，率军西征，定边左副将军一职由其弟车布登扎布暂为署理。

成衮扎布就任定边将军后立即布置进兵。二月十一日，大军分路进击，成衮扎布与参赞大臣舒赫德（1711—1777）由珠勒都斯前进，定边右副将军兆惠（1708—1764）与参赞大臣富德（？—1776）由额林哈毕尔噶前进。吸取前次进军之教训，成衮扎布沿途察看吐鲁番地理形势后上奏：“臣详看吐鲁番，直通伊犁，兼与回城声息相通，应即于吐鲁番派兵屯种。”⁸⁹并提议由副将阎相师管辖吐鲁番屯田，额敏和卓父子协同防守，以稳定后方，获准实行。大军长驱直入，深入准噶尔牧地，满洲、蒙古、索伦官兵奋勇剿杀，势不可挡，先后擒获车布登多尔济、巴雅尔、尼玛，噶勒藏多尔济、扎那噶尔布为部众所杀。为防止阿睦尔撒纳再次逃入哈萨克，成衮扎布奉命选派侍卫衮布等先赴哈萨克汗部宣谕，“开示利害，令其擒献。”⁹⁰六月十九日，阿睦尔撒纳等二十余人逃入哈萨克中帐，中帐汗阿布赉收其马匹，阿睦尔撒纳惊觉逃逸，渡额尔齐斯河投奔俄罗斯，不久，病死于俄罗斯托博尔斯克要塞。

进军天山北路途中，成衮扎布已侦得霍集占兄弟在天山南路反叛及副都统阿敏道被害的确讯，奏请：“俟大兵至伊犁，即前往回城剿灭。”⁹¹收复伊犁等地后，再次奏请：“阿逆现已穷威，不日即可就擒，所有回人霍集占等，应即领兵擒拿。”⁹²但弘历认为，成衮扎布系喀尔喀最高军政长官，该地区的防守重任非其莫属，办理天山南路，当另简大员统兵，谕令成衮扎布“于十二月初十以内，来京请训。”⁹³

成衮扎布赴京请训后，于二十三年（1758）三月返回乌里雅苏台，复任定边左副将军。再次主持喀尔喀军政事务期间，成衮扎布勤于政务，多有建树。

新疆统一后,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成衮扎布多次奉命从喀尔喀筹集大批牲畜、物资,运往新疆,接济驻军,支援建设。二十六年(1761)三月,令长子额尔克沙喇解送驼千峰、牛三千只、羊二万只、各色布五万六千匹、茶四万四千斤,驼屨八百副等赴伊犁。⁹⁴九月,再奏准从乌里雅苏台牧场拨马四、五千匹,送巴里坤牧放备用⁹⁵。二十九年(1764),遵旨从乌里雅苏台解送伊犁羊一万五千只。次年再奉命办理牛千只,解送伊犁备用⁹⁶。

原喀尔喀边卡,安设至阿尔泰山梁,乾隆二十六年,成衮扎布以新疆“俱入版图,向时戍守之区,俱成内地”,奏请“将扎哈沁、乌梁海、喀尔喀等卡座展拓,庶耕牧有资……”并遵旨派员查勘,提出以百里为率,自巴颜珠尔克卡至乌拉克沁伯勒齐尔及乌鲁木齐,可设卡十五处。经军机大臣会议,乌尔图布拉克、赛音塔喇、纳哩特、吉木萨四卡,由乌鲁木齐派出官兵驻扎;苏伯昂阿至乌拉克沁伯勒齐尔十一卡,复查后,将奈曼、明安等旧卡移驻,由成衮扎布督领。同时,经成衮扎布奏准,乌里雅苏台至乌鲁木齐,新设台站十八处,将递送西路一应事件,俱由乌鲁木齐分发,并裁撤旧设萨拉布拉克、巴里坤等台站二十四处⁹⁷。

科布多地处喀尔喀西北,与塔尔巴哈台、额尔齐斯,互为犄角,地理位置重要。经成衮扎布奏准,设立参赞大臣,调派绿营兵开设屯田、修筑城堡。所开屯田积贮日丰,自三十一年(1766)始,科布多至索郭克展放卡座台吉兵丁及台站兵丁所需粮米,停止从乌里雅苏台挽运,就近由科布多屯田积贮屯粮支給⁹⁸。

乌里雅苏台城建于雍正年间,乾隆二十九年(1764)春,城倾圮。因当地土性松浮,难兴版筑,成衮扎布勘查地形后,提出规划:“在齐格尔苏特、乌里雅苏台二河之间,照旧造木城,加高一丈六尺,厚一丈,周围共五百丈,内外排树木栅,中实以土,东、西、南三面有门,北面近河,掘沟引水,以环三面,即以沟中余土筑城。”⁹⁹奏准兴工。

喀尔喀地邻俄国,常有交涉事务。乾隆二十六年秋,玛哈沁色布腾等一百六十余人顺额尔齐斯河从铿格尔图喇逃入俄国,成衮扎布派出官兵追至铿格尔图喇,按条约规定向俄国边防官玛玉尔(майор,意为少校)交涉引渡,终使玛玉尔将色布腾等一百余人及军器马匹等物全行送出¹⁰⁰。次年初,再次引渡逃入俄国喀喇萨尼雅尔地方的二百余名乌梁海逃人¹⁰¹。二十八年(1763),成衮扎布侦得“俄罗斯等在卫满河源布克图尔玛库克乌苏地方,造屋树栅”,上报朝廷。奉命派出官兵,“前往库克乌苏、色必等地方,将俄罗斯木栅屋宇,尽行撤毁。”¹⁰²恰克图闭关期间,“桑斋多尔济、丑达,私遣人于恰克图贸易牟利。”三十年(1765),经

成衮扎布查明具奏,将二人严加惩办¹⁰³。

成衮扎布复任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十三年,喀尔喀地方安定无事。三十六年(1771)夏,因患病不能办理事务,弘历命其子德勒克多尔济、拉旺多尔济(?—1816)带同御医沙成玺驰驿前往诊视,并命其弟车布登扎布由游牧地赶往乌里雅苏台帮办将军事务。八月十一日薨,赐银千两治丧¹⁰⁴。命拉旺多尔济袭札萨克和硕亲王,车布登扎布补授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

成衮扎布有七子:长子额尔克沙喇,封贝子品级辅国公,掌札萨克,乾隆三十一年卒;次子伊什扎木楚,袭辅国公,代掌札萨克;三子敏珠尔多尔济,封公品级;四子占楚布多尔济,封世子;五子纳玛恺多尔济,授一等台吉;六子德埒克多尔济,封辅国公;七子次拉旺多尔济,尚固伦和静公主(1756—1775),授固伦额駙,赐双眼孔雀翎,占楚布多尔济卒,封世子,命御前行走,三十六年袭札萨克和硕亲王,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¹⁰⁵。

2. 以军功赐号超勇的郡王车布登扎布

策凌次子车布登扎布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车布登扎布天性勇往,有胆略,敢战。康熙晚年,清准战事再起,车布登扎布与兄成衮扎布随父从征,授一等台吉。雍正九年(1731)秋,车布登扎布随策凌攻击准军大营于苏克阿勒达呼,在鄂登楚勒设伏取胜,重挫准军锐锋,赐冠服。次年(1732)夏,额尔德尼昭之战,车布登扎布“力战被创,诏封辅国公,赐双眼花翎,命乾清门行走。”¹⁰⁶

高宗弘历即位,策凌时任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被倚为喀尔喀中坚,家族倍受亲信。乾隆七年(1742),车布登扎布奉命御前行走。十五年(1750),策凌病重,车布登扎布回塔米尔服侍。不久,策凌薨,成衮扎布袭亲王爵位,出任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任赛因诺颜部副将军参赞,为成衮扎布之有力助手。十七年(1752)成衮扎布奏准,将自己所属部分部落分出,交与车布登扎布管辖,自成一旗,别授札萨克。

时,准噶尔内乱,杜尔伯特台吉车凌乌巴什等携众来归,车布登扎布等随成衮扎布赴乌里雅苏台防准噶尔追兵。十九年(1754)七月,偕同部贝子车木楚克扎布剿抚乌梁海,在察罕乌苏击败乌梁海宰桑察达克。十月,获宰桑车根及厄鲁特台吉齐木库尔,降其众。复随参赞大臣萨拉尔擒准噶尔宰桑库克辛赉木特及通赉木特。十二月,叙功,赐贝子品级¹⁰⁷。

大军首次进击伊犁,车布登扎布随征。二十年(1755)五月,招降达瓦齐属

下统领兵丁驻守额贝诺尔地方之台吉和通额默根,诏授为贝子¹⁰⁸。由察罕呼济尔率轻骑三百倍道驰至集赛,擒获准噶尔宰桑齐巴汉。侦知达瓦齐聚众于格登山,夺船急渡。达瓦齐遁走,偕达勒党阿追至奎鲁克岭。伊犁平定,将军班第奏表车布登扎布军功,诏晋封多罗贝勒。

阿睦尔撒纳图谋不轨,阴与亲信纳噶察行文哈萨克汗阿布赉,自称统领大兵来伊犁,不提受命西征。车布登扎布严斥纳噶察云:“尔等匿奉天子命,反若自统兵至,可乎?”纳噶察不从,车布登扎布立即向将军班第报告,并密陈阿睦尔撒纳擅夺宰桑鄂勒锥驼马,借称防御哈萨克及布鲁特,私调兵九千驻各路等狂悖情状。班第具以奏闻。时,阿睦尔撒纳谋逆之事,同事者尚多未察觉,独有车布登扎布首先揭发其奸状¹⁰⁹。

阿睦尔撒纳反叛,二十一年(1756)春,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1759)奉命从北路出兵夹攻,弘历以“贝勒车布登扎布,人甚奋勉,著传谕哈达哈等,进兵时带同前往”¹¹⁰。有奇尔吉斯宰桑古尔班和卓等,受阿睦尔撒纳煽惑,带领部属八千余人渡伊犁河北移,欲往乌梁海,西路大军堵截未果。五月,车布登扎布随哈达哈办理乌梁海事竣后率大军赴哈萨克,经济尔玛台,适遇古尔班和卓等率部属潜赴乌梁海,乘其不备,率军掩杀,擒获古尔班和卓。弘历以其奋勇可嘉,诏晋封多罗郡王¹¹¹。青衮杂卜反叛,成衮扎布受命出任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率军讨伐。车布登扎布还驻乌里雅苏台协理军务,复奉命赴郭勒卓辉击叛属。冬十月回师,赐三眼花翎。

翌年初,成衮扎布奉命赴巴里坤军营任定边将军,定边左副将军事务交由车布登扎布暂行署理¹¹²。车布登扎布署理事务期间,分派官兵缉拿散逃各部落之青衮杂卜党徒,堵截窜往额尔齐斯一带之哈萨克锡喇,招抚乌梁海部落,加强驿站管理,抚绥达什达瓦部落,弘历认为,“办理诸事,皆合机宜,较从前大有进益,”¹¹³十月,廷议来年进剿阿睦尔撒纳事,定议以兆惠代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车布登扎布出任定边右副将军,赏银二千两整装,命驰驿来京请训。

二十三年(1758)正月,诏授定边右副将军,随将军兆惠进剿准噶尔。三月,兵至伊犁,时阿睦尔撒纳窜死,余党阿巴噶斯、哈丹、舍楞、布库察罕、哈萨克锡喇等未擒获。车布登扎布率兵搜捕,哈萨克锡喇及宰桑鄂哲特等潜遁和落霍斯,见追兵至,聚众据高岗迎战,侍卫玛璜等以所领兵少,畏惧不前。车布登扎布身先士卒,奋勇冲击,生擒鄂哲特,斩获颇多,哈萨克锡喇仅以身免。捷闻,弘历以其天性勇往,有父风,诏以其父超勇之号赐予车布登扎布。七月,侍卫玛璜解送鄂

哲特等至京,弘历亲询战况,甚为嘉悦,加恩赏系黄金带¹¹⁴。是月,车布登扎布穷追舍楞至古尔班察尔,探知舍楞已逃入俄罗斯,遂率兵进屯阿布勒噶尔。阿布赉缚献逃入哈萨克之布库察罕,阿睦尔撒纳余党基本肃清。时,靖逆将军雅尔哈善围攻库车失利,致小和卓霍集占逃脱,兆惠受命办理霍集占,车布登扎布请随兆惠赴天山南路效力。弘历谕云:“车布登扎布向哈萨克索取布库察罕解京,又请前赴兆惠军营,甚属奋勉,著加恩晋封亲王品级。”¹¹⁵不久,以在军营效力已久,命回喀尔喀游牧地休息。

二十四年(1759)四月,奉命率兵千名越阿尔泰搜捕玛哈沁,并赴特穆尔图诺尔堵截霍集占。八月,行至伊犁,分兵搜捕玛哈沁。霍集占西逃巴达克山,诏车布登扎布由阿尔泰回军喀尔喀牧地。十二月,入觐,赐宴遣归,寻授所部副将军。二十五年(1760),新疆全部平定,命图形紫光阁,御制赞曰:“拍马弯弓,无敌所向。不曾读书,如古名将。和落霍斯,少胜众彼。超勇亲王,额駉之子。”¹¹⁶

七世达赖噶桑嘉措圆寂后,从后藏托结地方寻得转世灵童,名强巴嘉措。二十七年(1762)正月,弘历命车布登扎布赴藏,主持八世达赖强巴嘉措坐床典礼¹¹⁷。

三十三年(1768),车布登扎布入觐,诏赐第京师。三十六年(1771)夏,成衮扎布患病不能办事,弘历以“定边左副将军员缺紧要,著车布登扎布即由游牧地方起程,速往乌里雅苏台,帮办将军事务”¹¹⁸。八月十一日成衮扎布薨¹¹⁹,世子拉旺多尔济袭札萨克和硕亲王,车布登扎布受命接任定边左副将军¹²⁰。三十八年(1773)五月,车布登扎布奉诏来京陛见,拉旺多尔济受命赴乌里雅苏台署理将军事务¹²¹。

车布登扎布到京后不过两月,同部亲王善巴次子、贝子品级齐旺多尔布控告其擅权牟利,弘历命大臣查办,同时下令解除车布登扎布将军职务,并令瑚图灵阿署理将军印务,拉旺多尔济来京。十月,经军机大臣会同理藩院审讯后上奏:“车布登扎布以乌里雅苏台库内发出旧烂棉甲、弓箭军器,希图便宜换易马牛,并将多换羊只存留伊旗。将伊所属,派补别部兵缺,甚为卑鄙不合,请将车布登扎布将军、亲王职衔一并革去。”弘历决定:“本应照议斥革,但年前在军营颇著劳绩,若全行议革,朕心有所不忍,著加恩仍留亲王职衔。至擢用将军,原因额駉策凌及伊兄弟为国宣劳,是以简任,非世世承袭者可比。著不必留将军之任。”¹²²此后,策凌后裔不再担任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

四十五年(1780),担任定边左副将军的漠南蒙古巴林王公巴图与车布登扎

布等,合请将札萨克图汗部牧地向西展至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等游牧之阿勒泰,札萨克图汗部空出之东部牧地由赛因诺颜部展牧,因“擅请展牧界”获罪,巴图被免职,车布登扎布被削去亲王品级。同时,弘历令制定“将军、参赞、盟长、副将军办理事务章程”,规定喀尔喀四部游牧事务由理藩院、盟长及札萨克直接管理¹²³。

车布登扎布虽受到革去将军、削去亲王品级的处分,但宠信未衰,屡受恩典。三十九年(1774),车布登扎布七十寿辰,诏赐无量寿佛及珊瑚朝珠、四团龙服。四十四年(1779),授议政大臣,弘历追念其和落霍斯奋勇击敌战功,令绘图赏赐。四十六年(1781),弘历又追念其战功懋著,由台吉洊封郡王,著恩予世袭罔替¹²⁴。

四十七年(1782)夏,车布登扎布病笃,弘历遣拉旺多尔济并乾清门侍卫台费英阿带领御医前往诊视。八月,病逝,令赏给陀罗被并银一千两办理丧事¹²⁵。长子三丕勒多尔济袭札萨克多罗郡王。

四 论清朝的北部边疆民族政策与边吏政策

1. 从赛因诺颜部的崛起来看清朝的北部边疆民族政策

以上,我们对赛因诺颜诸贵族图蒙肯、丹津喇嘛、善巴、策凌、成衮扎布、车布登扎布的宗教、政治、军事等活动及其与清朝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从中可以看出,赛因诺颜部从土谢图汗属部之一,逐步崛起,自成一部,是与其贵族顺应当时蒙古各部皈依黄教的趋势,大力护持黄教的活动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其贵族顺应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不断加强与新兴的清朝之间的联系,在喀尔喀蒙古贵族中最具向心力,在清朝奠定北部疆域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这是赛因诺颜部贵族的主动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赞叹清朝前期诸帝根据喀尔喀蒙古当时的实际情况,所实行的具有前瞻性的北方边疆民族政策。赛因诺颜部崛起过程中其贵族与清朝的关系,充分体现了清朝实行尊黄教以联络蒙古、满蒙联姻、分而治之等北方边疆民族政策的成功。

尊黄教以联络蒙古是清朝长期奉行的边疆民族宗教政策。自万历年间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迎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至青海讲经并皈依黄教之后,黄教逐步传入蒙古地区,为漠南、漠北、漠西蒙古诸部所共同信仰。以达赖为首的黄教首领在蒙古草原上具有重大的影响,诸部王公以尊黄教为荣,以获得黄教

首领赠予的名号为贵,喀尔喀蒙古诸汗王、额鲁特蒙古诸汗王名号无不得之于西藏黄教首领。当噶尔丹获得五世达赖赠予的博硕克图汗号后,即作为大事向清朝通报。蒙古贵族与西藏黄教上层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宗教联系,诸王公赴藏朝觐,大量布施,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送去子弟,拜黄教首领为师,为僧学经。蒙古诸部之间的争执,往往借用护法的旗号,如噶尔丹进犯喀尔喀蒙古,借口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不尊五世达赖之代表,称其为“乃坏宗喀巴教之人”¹²⁶,以使出师有名。蒙古诸部之间平息纠纷,举行会盟,亦往往以黄教首领代表的出面为重要,如康熙二十五年五世达赖高徒噶尔璽西勒图出席枯冷白齐尔会盟,喀尔喀蒙古诸首领当噶尔璽西勒图、哲布尊丹巴之面,跪拜佛像前宣誓,以示郑重。清朝定鼎北京前后,在与蒙古诸部的交往中,对蒙古诸部尊崇黄教、黄教在蒙古诸部中的重大影响与作用有着清楚的认识。基于这一认识,清朝奉行尊黄教以安抚诸蒙古的民族宗教政策,优遇蒙、藏黄教高僧,如五世达赖应顺治帝至清至京,乘坐金顶黄轿入城,接待规格之高,空前未有。清朝在处理蒙古问题时也往往会同西藏黄教代表,尊重西藏黄教领袖的意见,站在护法的立场上行使号令。赛因诺颜部始祖图蒙肯在喀尔喀蒙古居于黄教护法王的地位,在蒙古与西藏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清朝与喀尔喀蒙古诸部接触之初,自然有所了解,赛因诺颜部护持黄教的光环,必然引起清朝的特别关注。顺治十二年,清朝与喀尔喀诸首领会盟宗人府,即命赛因诺颜部首领丹津喇嘛岁贡九白,如三汗例,并赐遵文顺义号,以后累封善巴郡王、亲王爵位,这自然是由于丹津喇嘛、善巴具有倾向于清朝的政治立场,在喀尔喀蒙古归附清朝,并共同平定噶尔丹过程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但清朝对其特别关注并予以特别的扶持,也包含有他们是喀尔喀黄教护法王图蒙肯之后裔的因素在内。康熙三十一年(1692),策凌兄弟随祖母至京,康熙帝“念其幼,为图蒙肯嫡嗣,故施恩尤渥”即为明证¹²⁷。清朝赐策凌居住京师,教养内廷,以后率十九札萨克自成一部,都带有尊黄教护法王图蒙肯,扶持其后裔的因素在内。

满蒙联姻,是清朝的既定国策。入关之前,清朝皇室已与漠南蒙古科尔沁等部多次联姻,入关后与漠南蒙古的联姻活动更为频繁,而且逐渐扩大到漠西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和漠北蒙古。漠北蒙古中与清皇室联姻的主要是土谢图汗部和赛因诺颜部。康熙三十一年七月,策凌兄弟随祖母至京,当时兄弟二人尚在幼年,而康熙帝以其“为图蒙肯嫡嗣,故施恩尤渥”¹²⁸,诏赐居京师,教养内廷。后来以第十女纯悫公主下嫁策凌,并授和硕额駙,赐贝子品级,策凌弟恭格喇布

坦也尚皇长子允禔第三女,授固山额駙。以后,策凌不负康熙帝期望,在清准战争的关键时刻,建立奇功。如果说策凌兄弟二人尚公主、格格是康熙帝出于培养忠实于清朝的喀尔喀蒙古王公的目的,那么,策凌家族与清皇室的又一次联姻则是在喀尔喀蒙古局势处于动荡的非常时期,乾隆帝起用成衮扎布,为使其效命疆场,以稳定喀尔喀局势为目的的一次联姻。乾隆十八年(1753)成衮扎布一度失宠,被革去定边左副将军之职。次年,阿睦尔撒纳归清,受到宠信,封为亲王,二十年(1755)初清军西征,阿睦尔撒纳任定边左副将军。但收取伊犁后阿睦尔撒纳反叛,次年五月,喀尔喀蒙古喀尔喀副将军和托辉特郡王青衮杂卜为其暗通消息,“逢迎怂恿。”¹²⁹青衮杂卜擅自从军前撤回牧地,并派人至乌里雅苏台军中煽惑。一时喀尔喀地区骚乱蜂起,北路驿站被掠,羽书中断,形势急转直下。八月,乾隆帝起用成衮扎布,仍任为定边左副将军,命率军擒拿青衮杂卜。九月二十六日,成衮扎布驰至乌里雅苏台,查阅军营官兵,筹划进剿事宜。与此同时,乾隆帝将尚在襁褓中的第七女(后封和静公主)指婚与成衮扎布尚在幼年的第七子拉旺多尔济。成衮扎布不负期望,迅速出军,擒拿青衮杂卜,稳定了喀尔喀局势。更为重要的是,有经内廷教养成长起来的拉旺多尔济,成为嘉庆朝最受器重的蒙古王公,他忠贞耿介,被比作西汉霍光、金曰碑。经内廷教养,满蒙联姻的结果,使得结为姻亲的蒙古王公与清皇室关系更为紧密。经过内廷教育,长期培养的有姻亲关系的蒙古王公,当出任北部蒙古地区边疆地区的大员时,既熟悉蒙古地区的社会情况,又能领会清朝治理边疆的意图,在巩固边疆统一局面,稳定边疆局势中,发挥作用,忠贞于朝廷,与朝廷荣辱与共。这在策凌及其二子成衮扎布、车布登扎布出任清朝在喀尔喀蒙古最高军政官员——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几历四十年时间中的作为可以看出清朝满蒙联姻的重要作用。

众建以分其势,是历代大一统封建王朝治理边疆的传统民族政策。众建,可以削弱边疆民族中大的势力,使之势力分散,防止边疆民族中大的势力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众建,可以培植具有向心力、忠实于中央政权的边疆民族势力,以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清朝入关前虽与喀尔喀蒙古建立了政治联系,但入关后却因土谢图汗为首的喀尔喀蒙古左翼援助叛逃漠北的漠南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斯事件,致使双方失和。在恢复政治联系期间,赛因诺颜部首领丹津喇嘛发挥了重要作用。“岁贡九白,如三汗例”,表明清朝对赛因诺颜部的重视;“赐遵文顺义号”¹³⁰,则表明清朝对赛因诺颜部寄予的期望。以后,当噶尔丹大举入侵喀尔喀牧地时,喀尔喀诸部溃不成军,惟善巴所属赛因诺颜部敢战,是土谢图汗营垒的

中坚力量,也成为噶尔丹重点打击的对象。而善巴之从弟托多额尔德尼在土谢图汗败走后,尚孤军力战。赛因诺颜部的敢战表现与其余诸部一战即溃的状况形成的反差,必然进一步引起清朝对赛因诺颜部的重视。多伦会盟,善巴封爵郡王,他不负清朝的期望,在平定噶尔丹的艰苦战役中,建言献策,奋勉效力,其军功绩在喀尔喀蒙古诸王中居于首位,晋爵亲王。与此同时,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袭汗位以来,夺占右翼扎萨克图汗属下部众,不顾清朝与达赖喇嘛令其归还部众的劝告,引起北部边疆地区动乱。尤其是枯冷白齐尔会盟,当清朝代表和西藏黄教代表以及喀尔喀诸部首领之面,宣立重誓:“自今以往,当永远和协。”¹³¹但阳奉阴违,言而无信。又不顾清朝劝告,首先发兵执杀扎萨克图汗沙喇等,追斩噶尔丹之弟多尔济扎布,使噶尔丹寻得出军借口。而当噶尔丹大举进犯之时,又不能集众抵御,稳定局势。这些作为,自然令清朝失望。清朝不能不在安抚土谢图汗部的同时,开始在喀尔喀蒙古中寻找与扶持一支中坚力量。而自丹津喇嘛以至善巴对清朝的向心力以及该部的敢战精神,自然成为清朝首选的扶持对象。康熙帝见到丹津妻格楚勒哈屯携往京师的策凌兄弟,以其系出名藩之后,令赐居京师,教养内廷,重点培养。其后雍正三年命郡王策凌领十九扎萨克自成一部,集中体现了清朝众建以分其势的边疆民族统治政策:势力最大的土谢图汗部被削弱;析出的赛因诺颜部,其贵族为喀尔喀蒙古黄教护法王图蒙肯的后裔,且自清初以来最具向心力。其后,赛因诺颜部首领策凌在雍正、乾隆年间对准噶尔的战争中,不负清朝期望,率军抗击噶尔丹策零,扭转清准战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从定边左副将军的任用看清朝的边吏政策

清朝任用官员,有地区回避、亲族回避、师生回避等规定。任用边吏,特别是新疆、喀尔喀蒙古等重要边疆民族地区,父子兄弟连任一重要军政职务之情况极为少见。策凌父子三人任定边左副将军,父死子代,兄死弟及,几四十年之久,反映了清朝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任用边吏政策。也反映出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的管辖,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逐步正规化的过程。雍正十一年(1733),定边左副将军的设立,最初的情况与以后的定制尚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按定边左副将军,以后全称为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也称乌里雅苏台将军,是清代地方常设驻防将军之一。清制,驻防将军为武职从一品,与加尚书衔之总督同秩,例以满人专任。将军以驻防地名为号,乾隆朝定员缺为14员,即绥

远将军、江宁将军、成都将军、西安将军、宁夏将军、荆州将军、杭州将军、福州将军、广州将军、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伊犁将军。

驻防将军任内地与任边疆(或任不设督抚地区),权限又有不同。

内地驻防将军任事简略,专辖本地各驻防八旗,掌防守、训练、旗务等事,不与民事,不节制绿营,与本地之督抚、绿营各成系统,互不统属。但若会同奏事,则列名于总督之前,以示尊崇。

边疆驻防将军,如东北之奉天、吉林、黑龙江,北方之喀尔喀蒙古,西北之新疆,不设督抚,驻防将军为本区之最高军政长官。

但定边左副将军初设时非常规建制。雍正七年(1729)三月,设靖边大将军统北路大军征讨准噶尔,由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出任¹³²。九年(1731)十一月,改任顺承亲王锡保¹³³。经雍正八年(1730)鄂登楚勒之战,十年(1732),克尔森齐老、额尔德尼昭之战,策凌威名大震,为朝廷所倚重。十一年(1733)正月,“命铸靖边左、右副将军印二颗,交大将军收贮,以备额驸策凌等调遣满洲蒙古兵丁之用。”¹³⁴不久,锡保获罪,革去大将军亲王,多罗平郡王福彭出任大将军,并改“靖边”名号为“定边”。十月,“定边大将军多罗平郡王福彭折奏,本月十九日,臣遵旨将定边左副将军印信,交额驸策凌掌管,由乌里雅苏台起程,前赴科布多,其定边右副将军印信,亦交额驸策凌带往。”¹³⁵这是策凌出任定边左副将军的最早记载。由此还可得知:其一,副将军初设时为两员,策凌尚带有定边右副将军印;其二,副将军之印信,为策凌调遣满洲、蒙古兵丁之用。其后清准议和,定边大将军回京缴印,策凌留守喀尔喀,应该说,自此时起,定边左副将军实际已成为喀尔喀最高军政建制。

定边左副将军虽已成为喀尔喀最高军政建制,但乾隆十五年策凌卒,并未任命策凌家族外之人,以符亲族回避之例。在任命成衮扎布时,乾隆帝指出,定边左副将军“非世袭之职,”简任成衮扎布,是因“其才具实堪胜任。”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很难找出比成衮扎布更具条件的人选,可以倚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处于非常时期,不能不打破选任官员的常规行事。以后,出军新疆之前,成衮扎布一度被罢免,阿睦尔撒纳出任定边左副将军,率军西征。但不久阿睦尔撒纳反叛,喀尔喀和托辉特部郡王副将军青衮杂卜乘势发动“撤驿之变”,一时喀尔喀地区骚乱蜂起,北路羽书中断。在极其严重的局势中,二十一年(1756)八月,乾隆帝起用成衮扎布,仍任为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不负期望,迅速平定动乱,擒获青衮杂卜,稳定了局势,即充分证明长期培养起来的策凌家族在关键时刻是可

堪倚任的。然而,任用喀尔喀蒙古一贵族之父子兄弟长期掌握喀尔喀军政事务,有世袭之嫌,不符清朝任用官员亲族回避的常规,为此乾隆帝曾多次强调:“以六额驸原属副将军,即令为左副将军。至成衮扎布、车布登扎布等,或以人材去得,劳绩可嘉,节此补授,并非世袭之职也。”¹³⁶更为重要的是也不符地方回避的常规,日久则必有弊端出现,三十八年(1773)五月,车布登扎布奉诏来京陛见,成衮扎布之子拉旺多尔济受命赴乌里雅苏台署理将军事务¹³⁷。不久,同部亲王善巴次子、贝子品级齐旺多尔布控告其擅权牟利。乾隆帝令解除车布登扎布将军职务,并指出:“至擢用将军,原因额驸策凌及伊兄弟为国宣劳,是以简任,非世世承袭者可比。”¹³⁸自此,策凌家族担任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的历史宣告结束,而亲族回避、地方回避等任官常规才得以落实。

至四十五年(1780),担任定边左副将军的漠南蒙古巴林王公巴图与车布登扎布等,合请将札萨克图汗部牧地向西展至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等游牧之阿勒泰,札萨克图汗部空出之东部牧地由赛因诺颜部展牧。因“擅请展牧界”获罪,巴图被免职,车布登扎布被削去亲王品级。同时,朝廷制定了《将军、参赞、盟长、副将军办理事务章程》,规定喀尔喀四部游牧事务由理藩院、盟长及札萨克直接管理¹³⁹。对定边左副将军的权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冈洋树在《定边左副将军的权力回收问题》一文中已有比较详实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注 释〕

- 1 赛因诺颜自成一部之前,达赖喇嘛授赛因诺颜号“令所部奉之如三汗,”故亦称之为部。
- 2 见杜家骥《皇室勋戚策凌家族与清廷的边疆治理》,《北方民族》,1992年第3期,页66—69;《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李毓澍《定边左副将军建制考》,载《外蒙政教制考》,台北,1962;《蒙事论丛》,台北,1990。沙斯季娜《十七世纪的蒙古编年史〈阿萨拉克齐史〉》,余大钧译文,载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编《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总第57、58辑,1984年5月,页123—128。冈洋树《定边左副将军的权力回收问题》,载《史观》,第一一九册,昭和六十三年;《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及其立场——清朝统治喀尔喀蒙古研究导论》,载《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第十三集,史学哲学编,1986。
- 3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页146。

- 4 《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阿林盟游牧所在·土谢图汗部》，页150。按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自万历五年(1577)离开西藏至万历十六年(1588)年圆寂，主要生活在青海、甘肃、西康及漠南蒙古，阿巴岱“赴唐古特谒达赖喇嘛，”当为赴归化城谒三世达赖。又，或说阿巴岱谒达赖喇嘛事在万历十五年(1587)，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20。
- 5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六九，《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总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四五四册，页631。
- 6 罗布桑普稜列《自传》，引自若松宽《札雅葛根事迹考》，见薄音湖译文，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3期，页2。
- 7 (韩)金成修《16、17世纪格鲁派在喀尔喀蒙古传教新探》，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学信息》，1999年第2期，页21。
- 8 波兹德涅佐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一卷，刘汉明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页440—441。
- 9 图蒙肯长子名卓特巴，号车臣诺颜；次子即丹津喇嘛，号诺们汗；三子名车稜；四子名罗雅克；五子济雅克，号伟徵诺颜；六子名扎木本；七子名察斯喜布，号昆都稜；八子名丹津，号班珠尔；九子名毕玛里吉哩啼，号巴图尔额尔德尼诺颜；十子名锡纳喇克萨特，号珲台吉；十一子名桑噶尔扎，号伊勒登和硕齐；十二子名扣肯，号巴扎尔；十三子名袞布，号昆都伦博硕克图。除三子车稜、四子罗雅克无嗣，六子扎木本，其裔不列札萨克外，其余诸子以及图蒙肯弟巴赉(伟徵诺颜诺诺和第五子)之子噶尔玛，他们的后裔分领赛因诺颜部各札萨克。
- 10 《听闻记》卷四，引自若松宽《札雅葛根事迹考》，见薄音湖译文，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3期，页3。
- 11 罗布桑普稜列《自传》，引自若松宽《札雅葛根事迹考》，见薄音湖译文，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3期，页3。
- 12 《听闻记》卷四，引自若松宽《札雅葛根事迹考》，见薄音湖译文，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3期，页3。
- 13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六九，《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总传》，页631。
- 14 同上。
- 15 同上。
- 16 袞布生有三子：察珲多尔济居长，生年不详；次子即哲布尊丹巴一世，生于崇祯八年(1635)；三子西第什哩。按哲布尊丹巴生年推之，顺治十二年(1655)察珲多尔济当为二十岁出头之青年。
- 17 丹津喇嘛为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十九世孙，格埒森扎扎赉尔之三世孙；察珲多尔济为元太祖之二十一世孙，格埒森扎扎赉尔之五世孙。

- 18 《听闻记》记丹津喇嘛康熙七年(1668)病逝于拉萨。《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六九，《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总传》(页631)记丹津喇嘛卒，塔斯希布裘、卒，善巴裘，均在康熙三年条下。
- 19 另外四部即：无名氏撰于后金天聪元年(1627)的《黄金史纲》，鄂尔多斯编年史学家萨囊彻辰于康熙元年(1662)完成的《蒙古源流》，无名氏完成于十七世纪中期的《黄史》，喇嘛学者罗卜臧丹津完成于顺治十二年(1655)的《黄金史》。见余大钧译：沙斯季娜著《十七世纪的蒙古编年史〈阿萨拉克齐史〉》，载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编《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总第五十七、五十八辑，1984年5月，页123—128。
- 20 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康熙二十七年六月癸丑，《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八十册，页65。
- 21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庚申，第八十册，页66。
- 22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康熙二十七年八月丁卯，第八十册，页76。
- 23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三，《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一》，《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九十五册，页44。
- 24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六，康熙三十五年六月甲午，第八十册，页545。
- 25 《十七世纪的蒙古编年史〈阿萨拉克齐史〉》，页123—128。
- 26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六九，《札萨克和硕亲王善巴列传》，页635。
- 27 即班珠尔丹津之妻、约苏图伟徵阿海纳木札勒之母。《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二，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己巳，第八十册，页223，作格楚儿喀屯。《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五，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己巳，第五册，页717，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作格楚尔喀屯。《皇朝藩部要略》，卷四，《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二》，第九十五册，页48，作“格楚勒哈屯”；《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七〇，《札萨克和硕超勇襄亲王策凌列传》，页638，作格楚勒哈屯，从之。
- 28 张捷夫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九卷，上海，中华书局，1997，页243 注释1。
- 29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页144—145。
- 30 《清朝满蒙联姻研究》，页341。
- 31 《皇朝藩部要略》，卷四，《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二》，第九十五册，页48。
- 32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七〇，《札萨克和硕超勇襄亲王策凌列传》，页638。
- 33 张牧《蒙古游牧记》，卷八，《外蒙古喀尔喀齐齐尔里克盟游牧所在·喀尔喀赛因诺颜部》，陕西，人民出版社点校本，1991，页187。
- 34 和硕纯悫公主，为康熙帝第十女，不计殇，称六公主，母贵人纳喇氏，监生常素保女，雍正二年尊封为皇考通嫔。公主生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十六日，四十五年(1706)下嫁策凌，薨于四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又，公主下嫁时间，据《康熙朝满文

- 朱批奏折全译》载：康熙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允祉等奏：“窃九月初三日，系六公主下嫁喜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460。
- 35 不计殇，为四公主。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一月下嫁敦多布多尔济。
- 36 《蒙古游牧记》，卷八，《外蒙古喀尔喀齐齐尔里克盟游牧所在·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御赐公主圻志》，页184。
- 3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460。
- 38 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七一，《札萨克多罗郡王车布登扎布列传》，页656载：“（乾隆）三十九年，车布登札布年七十，赐无量寿佛及珊瑚朝珠、四团龙服。”以此推算，当生于康熙四十四年。
- 39 善巴卒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
- 40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六九，《札萨克和硕亲王善巴列传》，页635。
- 41 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七，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壬午，《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八十二册，页128—129。
- 42 《清世宗实录》，卷三，雍正元年正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七册，页87。
- 43 《皇朝藩部要略》，卷四，《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二》，第九十五册，页58。
- 44 《清世宗实录》，卷十六，雍正二年二月戊午，第七册，页274—275。
- 45 《皇朝藩部要略》，卷四，《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二》，第九十五册，页59。
- 46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六九，《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总传》，页632。
- 47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六九，《札萨克和硕亲王善巴列传》，页635。
- 48 同上。
- 49 见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165。
- 50 见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页165。又，满文朱批奏折·雍正五年（1727）七月十八日《策凌奏与俄使会议边界情形折》载：“至七月初一日，总共会议七次。”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515。
- 51 俄人记载：“傲慢的隆科多于8月8日夜间突然被捕，并被严加监禁，押送北京……”见尼古拉·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年译本，页166。满文朱批奏折《策凌奏与俄使会议边界情形折》载：“（七月初三日）隆科多奉召返京。初四日，侍郎图理琛来奴才驻地……奴才等与俄罗斯使臣萨瓦会议两次。于本月十五日，已共同议结边界事务。”《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页515、516。

- 52 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二·外四盟蒙古》，道光二十二年刻本，页9。
- 53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二七，雍正九年十月乙卯，第八十二册，页408。
- 54 昭槁《啸亭杂录》，卷二，《超勇亲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标点本，页406。
- 55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七〇，《札萨克和硕超勇襄亲王策凌列传》，页640。
- 56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三一，雍正十年八月癸酉，第八十二册，页469。
- 57 《蒙古游牧记》，卷八，《外蒙古喀尔喀齐齐尔里克盟游牧所在·喀尔喀赛因诺颜部》，页185。
- 58 《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一，雍正九年十月丁巳，第八册，页484。
- 59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六九，《札萨克和硕亲王善巴列传》，页635。
- 60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七〇，《札萨克和硕超勇襄亲王策凌列传》，页640；卷69，《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总传》，页635。
- 61 《清世宗实录》，卷七九，雍正七年三月丙辰，第八册，页36—37。
- 62 《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二，雍正九年十一月辛未，第八册，页497。
- 63 《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七，雍正十一年正月壬寅，第八册，页667。
- 64 《清世宗实录》，卷一三一，雍正十一年五月乙未，第八册，页701。
- 65 《清世宗实录》，卷一三六，雍正十一年十月戊辰，第八册，页744—745。
- 66 《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三，雍正十三年三月己亥，第八册，页884。
- 67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七〇，《札萨克和硕超勇襄亲王策凌列传》，页641—642。
- 68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三，乾隆二年四月壬午，第八十二册，页645—646。
- 69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七〇，《札萨克和硕超勇襄亲王策凌列传》，页642。
- 70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四，乾隆四年十一月癸亥，第八十二册，页671。
- 71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四，乾隆四年十二月癸酉，第八十二册，页672。
- 72 《蒙古游牧记》，卷八，《外蒙古喀尔喀齐齐尔里克盟游牧所在·喀尔喀赛因诺颜部》，页186。
- 73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六，乾隆六年八月乙卯，第八十二册，页698。
- 74 《皇朝藩部要略》，卷六，《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四》，第九十五册，页72。
- 75 《蒙古游牧记》，卷八，《外蒙古喀尔喀齐齐尔里克盟游牧所在·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御制往清河赐奠诗》，页186。
- 76 《啸亭杂录》，卷二，《超勇亲王》，页407。
- 77 《蒙古游牧记》，卷八，《外蒙古喀尔喀齐齐尔里克盟游牧所在·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御制往清河赐奠诗》，页186。

- 78 《蒙古游牧记》，卷八，《外蒙古喀尔喀齐齐尔里克盟游牧所在·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御赐八贤良祠祭文》，页185。
- 79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五二，乾隆十五年六月丙子，第八十三册，页123。
- 80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四，乾隆四年十二月癸酉朔，第八十二册，页672。
- 81 此前，唯有土谢图汗部亲王丹津多尔济之子多尔济色布腾封为世子。见《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九，《札萨克多罗贝勒西第什哩列传》，页520—521。
- 82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七〇，《扎萨克超勇亲王策凌列传》，页644。
- 83 《清高宗实录》，卷四五一，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甲戌，第十四册，页875。
- 84 《清高宗实录》，卷四六〇，乾隆十九年四月庚寅，第十四册，页978。
- 85 《清高宗实录》，卷四九六，乾隆二十年九月丁丑，第十五册，页229。
- 86 《清高宗实录》，卷五二二，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癸卯，第十五册，页580。
- 87 《清高宗实录》，卷五二八，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寅，第十五册，页654。
- 88 《清高宗实录》，卷五三〇，乾隆二十二年正月甲午，第十五册，页673。
- 89 《清高宗实录》，卷五三六，乾隆二十二年四月甲戌，第十五册，页770。
- 90 《清高宗实录》，卷五三八，乾隆二十二年五月癸卯，第十五册，页806。
- 91 《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九，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丁未，第十五册，页809。
- 92 《清高宗实录》，卷五四〇，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壬申，第十五册，页837。
- 93 《清高宗实录》，卷五四八，乾隆二十二年十月辛未，第十五册，页987。
- 94 《清高宗实录》，卷六三六，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己酉，第十七册，页107。
- 95 《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五，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己未，第十七册，页221。
- 96 《清高宗实录》，卷七二八，乾隆三十年二月庚辰，第十八册，页18。
- 97 《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二，乾隆二十六年三月戊申，第十七册，页55；卷六三九，乾隆二十六年六月乙酉，第十七册，页135—136。《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七〇，《扎萨克和硕超勇亲王策凌列传》，页647—648。
- 98 《清高宗实录》，卷七五五，乾隆三十一年二月戊辰，第十八册，页321。
- 99 《清高宗实录》，卷七一〇，乾隆二十九年五月甲寅，第十七册，页929；卷七二三，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己巳，第十七册，页1056。
- 100 《清高宗实录》，卷六四六，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丙子，第十七册，页233；卷六四七，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丁亥，第十七册，页239。
- 101 《清高宗实录》，卷六五五，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乙酉，第十七册，页330—331。
- 102 《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二，乾隆二十八年八月乙酉，第十七册，页755。
- 103 《清高宗实录》，卷七三八，乾隆三十年六月丁巳，第十八册，页135。
- 104 《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一，乾隆三十六年八月戊子、八月己丑，第十九册，页945—946。

- 105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七〇，《札萨克和硕超勇亲王策凌列传》，页648。
- 106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七一，《札萨克多罗郡王车布登扎布列传》，页652。
- 107 同上。
- 108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八，乾隆二十年五月壬午，第十五册，页123。
- 109 《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一，乾隆二十年六月戊午，第十五册，页168—169。《钦定外藩蒙古王公表传》，卷七一，《札萨克多罗郡王车布登扎布列传》，页652—653。
- 110 《清高宗实录》，卷五〇四，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庚午，第十五册，页357。
- 111 《清高宗实录》，卷五一六，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壬申，第十五册，页519。《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七一，《札萨克多罗郡王车布登扎布列传》，页653。
- 112 《清高宗实录》，卷五三〇，乾隆二十二年正月甲午，第十五册，页673。
- 113 《清高宗实录》，卷五四八，乾隆二十二年十月辛未，第十五册，页987。
- 114 《清高宗实录》，卷五六〇，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丁巳，第十六册，页93；卷五六六，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乙酉，第十六册，页171—172。
- 115 《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七，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庚戌，十六册，页195。
- 116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七一，《札萨克多罗郡王车布登扎布列传》，页655。
- 117 《清高宗实录》，卷六五二，乾隆二十七年正月丁酉，第十七册，页301。
- 118 《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一，乾隆三十六年八月戊子，第十九册，页945。
- 119 《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一，乾隆三十六年八月戊子、八月己丑，第十九册，页946。
- 120 《清高宗实录》，卷九二一，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乙卯，第二十册，页357。
- 121 《清高宗实录》，卷九三五，乾隆三十八年五月癸未，第二十册，页588。
- 122 《清高宗实录》，卷九四五，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己酉，第二十册，页802。
- 123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七，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戊辰，第二十二册，页925。
- 124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七一，《札萨克多罗郡王车布登扎布列传》，页656。
- 125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三，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丁亥，第二十三册，页577。
- 126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第八十册，页83。
- 127 《皇朝藩部要略》，卷四，《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二》，第九十五册，页48。
- 128 同上。
- 129 《清高宗实录》，卷四九六，乾隆二十年九月丁丑，第十五册，页229。
- 130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六九，《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总传》，页631。
- 131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康熙二十五年十月戊午，第八十册，页55。
- 132 《清世宗实录》，卷七九，雍正七年三月丙辰，第八册，页36—37。

-
- 133 《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二，雍正九年十一月辛未，第八册，页 497。
 - 134 《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七，雍正十一年正月壬寅，第八册，页 667。
 - 135 《清世宗实录》，卷一三六，雍正十一年十月戊辰，第八册，页 744—745。
 - 136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八，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甲申，第二十二册，页 937。
 - 137 《清高宗实录》，卷九三五，乾隆三十八年五月癸未，第二十册，页 588。
 - 138 《清高宗实录》，卷九四五，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己酉，第二十册，页 802。
 - 139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七，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戊辰，第二十二册，页 925。

结 语

在本辑《法国汉学》付梓面世之际,欣慰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有许多人为本辑《法国汉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心血和努力,许多海内外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的同仁将自己多年思考和用力良多的最新成果奉献出来,使关心和爱好此项研究者能够分享其甘醇和芬芳,是何等荣幸和有意义的东西!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在欣喜和激动之余,我们不能不想到,为我们提供这些优秀的思想研究成果和具有非凡睿智的研究者和默默无闻的辛勤耕耘者,还有法国远东学院的柯兰女士等为之所付出的劳动和努力,正是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一个对工作和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真理信念的坚定,以及超越一般人的研究境界,使我们真正感受到了科学和真理的崇高和伟大,正是他们不畏强权和世俗的勇气和斗智,使我们能够剥离历史的重重迷雾,见到一个真实的或接近历史的一个层面观察和品味真正的历史过程,而他们为此所作出的任何一种努力,都是常人所不能体味其中的甘苦的,这些探索对于一般人形同于天方夜谭,然而它却是我们的昨天和真正的历史,他们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我们的祖先和融化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历史轨迹,搭起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一个永恒延续和无法摆脱的血液纽带,而这种无法割舍的血脉联系,使它超越国界和宗族、宗教的界限,把我们紧急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对共同所关心的问题产生共鸣。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之所以引起大家如此浓厚的兴趣,并毫无怨言地为之付出,因为它是我们祖先历史的一部分,是世界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的美好回忆和时光,珍藏和研究这一段与我们密切相关的历史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和使命。它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历史生活的延续和发展。

记得是在2005年8月,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的柯兰女士和我谈起有意组织召开一次以中国历代边臣疆吏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的设想,我为柯兰女士以及法国远东学院多年来致力于汉学以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研究的精神所感动,因此对她的设想给予了积极回应。在法国远东学院台北中心谷岚女士、北京中心柯兰女士以及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诸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经过长达1年

多的精心筹备,2006年10月2日至4日在台北召开了“中国历代边臣疆吏学术讨论会”,许多海内外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专家和学者与会,大陆由11名学者提交论文并与会讨论,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此次会议的最终成果集中体现在本辑《法国汉学》发表,是我们的幸事,更是我们复原祖先历史和对那一段辉煌灿烂的过去的片断回忆和梳理,再现在我们眼前,这是历史学家馈赠的最好礼物。为此,我们要感谢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柯兰、台北中心谷岚以及为本辑《法国汉学》顺利出版辛苦工作的各位同仁。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经过前辈学者的不断深入研究和开拓创新,为这一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呈现出勃勃生机,研究领域有所拓展,无论是在历代疆域史、历代边疆治理、历代宗藩关系等方面,还是在区域性、专题性研究方面,较之以往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

中国历代边臣疆吏研究,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开展这一学术研究,有助于人们从边疆官吏与中国边疆之间所具有的特殊关系之中,探索“边疆”的含义以及边疆管理的行政模式与机制等问题,从而更加客观地揭示边疆官吏在中国疆域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本辑《法国汉学》以“中国历代边臣疆吏”研究为主题,集中反映了一个阶段内,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最新成果,它不仅能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审视中国历代边疆的发展演变的复杂过程,而且对于深化中国边疆的理论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本辑《法国汉学》刊登的研究论文看,虽然其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他们多层面的研究和创新性的立论成果,不仅为本辑《法国汉学》增添了亮丽的光彩,而且也为人们了解海内外学者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和前沿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感谢把研究成果贡献给本辑《法国汉学》的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法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

本辑《法国汉学》所选论文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原稿中既有中文,又有外文,而外文中又有多种语言,所以编辑本辑《法国汉学》难度很大,需要作很多细致而繁琐的事务性工作,这对编者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诸如将外文翻译中文,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史学论文的翻译,其难度更大,要求更高,除了“信、达、雅”的基本要求外,还有核对古籍史料、若干人名和地名的准确无误等更为严谨的要求。从总体上看,本辑《法国汉学》中收录的多篇外文论文的中译水平是较高的,质量是上乘的,这为中国学术界更多人阅读和了解海外

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我们要感谢参与本辑《法国汉学》翻译工作的朋友。

目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中国大陆研究中国边疆问题唯一的专业性学术机构。从1983年成立以来,我们致力于不断推动该学科的建设发展,致力于组织、协调中国大陆的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中国古代疆域史研究、中国近代边界史研究和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领域开展学术活动,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老一代学者的学术积淀,也是全国学术同仁共同努力并为之奋斗的体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发展的边缘学科,还有诸多学术问题需要深入探索和不断研究,诸如中国古代的藩属、属国、朝贡制度,古代中国边疆治理与开发以及中国边疆与世界各国边疆的比较研究,中国历史疆域的法律地位等等。这些学术问题的研讨,还需要海内外学术界同仁共同参与,携手合作,不断交流学术研究成果。在过去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中,我们得到了海内外诸多研究机构和研究者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开展了有益的学术研究工作。此次与法国远东学院的合作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将一如既往地与海内外的学术界同行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和合作的力度,为不断推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发挥自己应尽的桥梁纽带作用。我们感谢长期以来一直给予我们帮助支持的所有海内外的学术界同行。

学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边臣疆吏的研究同样需要海内外的研究者不断开展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才能促进此项学术研究工作的发展。本辑《法国汉学》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我们深化中国边臣疆吏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期盼在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以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繁荣贡献智慧和力量。

李国强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二〇〇七年七月

附录

作者、译者的联系方式

Paola CALANCA(柯兰)

法国远东学院(EFEO)研究员

100010 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

paola.calanca@yahoo.com

陈维新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11143 台湾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221号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

nancyhsu@npm.gov.tw

方铁

中国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650091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tiefang3849@yahoo.com.cn

冯明珠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图书文献处处长

11143 台湾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221号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

mzfung0727@yahoo.com

洪金富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115 台湾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二段 130 号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chinfu@mail.ihp.sinica.edu.tw

黄君艳

中央财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100080 海淀区学院南路 38 号

中央财经大学外语学院

sabinejun@163.com

黄宽重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11529 台湾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二段 130 号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huangkc@asihp.net

Fabienne JAGOU(谷岚)

法国远东学院(EFEO)研究员

11529 台湾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二段 130 号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法国远东学院台北中心

fabiennejagou@yahoo.fr

李国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100006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 1 号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gqli@cass.org.cn

Laura J. NEWBY(吴劳丽)
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
laura.newby@orinst.ox.ac.uk

Morris ROSSABI(罗萨比)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
mr63@columbia.edu

Claudine SALMON(苏尔梦)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
Archipel
Bureau 732 E. H. E. S. S.
54 Bd Raspail, Paris 75006
salmon@ehess.fr

Jonathan Karam SKAFF(斯加夫)
宾夕法尼亚州希彭斯堡大学教授
(Shippensbur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kskaf@ship.edu

孙琢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生
300193 天津市南开区南丰路兴华公寓4—4—501
nongzhuren@163.com

汤芸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tangyun8848@163.com; tangyun70s@gmail.com

王希隆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730000 甘肃省兰州市天水路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wangxl@lzu.edu.cn

王秀玉

华盛顿州立大学(温哥华)讲师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Vancouver)

14204 NE Salmon Creek Av.

Vancouver, WA 98686—9600

wangx@vancouver.wsu.edu

吴旻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编译主管

100010 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

edition_efeo@126.com

徐晓望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350001 中国福建省柳河路18号

福建社会科学院

xxw802@126.com

张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00101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yuyzhang@sina.com

赵琦

115 台湾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3段14巷6号1楼

zhaoqi@mail.ihp.sinica.edu.tw

庄吉发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111 台湾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

台北故宫博物院

周伟洲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710062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陕西师范大学高层1604号

weizhou@snnu.edu.cn